

英国蓝皮书有关
辛亥革命资料选译

上册

中华书局

英国蓝皮书有关 辛亥革命资料选译

下 册

中 华 书 局

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 资料选译

胡 滨 译

(上)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78452



中 华 书 局

1984年·北京

978452

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 资料选译

胡 滨 译

(下)

21/10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78458



中 华 书 局

1984年·北京

978458

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

(全 二 册)

胡 滨 译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23 印张·562千字

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7,500册

统一书号: 11018·1223 定价: 2.65元

说 明

《英国蓝皮书》是英国政府提交议会两院的外交文件，自公开刊行以来，很受各国学者的重视。目前，我国只有几个大图书馆藏有此书，一般读者借阅相当困难。因此，我把此书中有关辛亥革命的资料翻译出来，供这方面的研究者和教学工作者参考。

《英国蓝皮书》中有关辛亥革命的资料共有四册，所收录的函电起自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止于1913年10月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内容颇为丰富。它包括辛亥革命的爆发、各省纷纷响应、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南北停战及议和、临时政府北迁、民国初年的国内政治形势和各派势力的消长、“二次革命”的爆发及其失败、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等等。这些函电几乎全部是当时英国驻华使、领馆官员和海陆军将领向英国政府提出的报告，他们系根据耳闻目睹的情况所写成，所以报告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可以作为有关中文资料的印证或补充中文资料之不足。值得特别注意的是：

(一)从英国驻北京公使朱尔典、驻汉口总领事葛福、驻上海总领事法磊斯等人的函电中，可以看出：英国的外交官员们最初如何帮助清政府扑灭辛亥革命；后来鉴于革命已成燎原之势，他们又如何帮助袁世凯策划订立“停战协定”并暗中操纵“南北议和”；他们通过哪些手段对革命党人施加压力，迫使南京临时政府对袁世凯屈服；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采取哪些措施，帮助袁世凯一步步登上正式大总统的宝座。这些函电是我们研究辛亥革命史的重要资料。

(二)英国驻中国各通商口岸领事在写给英国政府的工作报告中，反映了当地所发生的许多重要情况，对我们了解辛亥革命时期各省的动态很有帮助。例如：驻成都总领事务谨顺的报告详细叙述了四川从保路到独立的经过以及该省内部的纷争；驻南京领事伟晋颂的报告详细叙述了苏浙联军攻占南京、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经过及其活动、“二次革命”期间张勋和冯国璋率军攻占南京的情况，等等。

(三)英国驻华公使馆历任武官欧特白上尉、韦乐沛中校、罗伯逊少校等，以及二等秘书罗乃音、三等秘书黑德、中文秘书巴尔敦等，多次向英国政府提出情报报告，对民国初年各地的兵变和民变、北京各报刊发表的言论、国会议员的选举、北洋军队的调动和布署等，作了较系统的叙述，为我们了解民国初年的国内形势提供了一些资料。

应当指出：这些资料都是出自英国官方人士之手，他们站在英国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一方面对中国人民大肆污蔑，说什么“中国人的教育程度不足以适应政体中如此激烈的一项变革”，只能受专制主义的统治；另一方面，对中国人民的公敌袁世凯则竭力加以美化，吹嘘他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只有通过他才能稳定中国社会秩序。我相信，读者在阅读本书的时候，是会对这些荒谬论点加以批判的。

我在翻译本书时，除原件系由中文译成英文者（如清政府、南京临时政府及袁世凯政府给英国政府的照会、文告等）一概不予回译外，对其余的资料未作任何删节，全部逐译。因此，本书基本上保存了《蓝皮书》原来的面貌。此外，本书中的第一部分，即《关于中国事件的函电：中国第一号（1912年）》，过去曾有陈国权先生的译本，收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八册内。由于陈译本中有不少的错误，而且文字方面也有些缺陷，所

以我根据原文重新译出。

关于本书中的人名、地名及事件，我作了一些简要的注解；对资料中原有的错误，也酌情予以注明。至于原书中所有的注释，我都加上了“原编者注”字样，以示区别。为了便于读者查阅本书的资料和人名，在译文后面附有《大事索引》和《译名对照表》。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得到许多同志的鼓励和帮助，资料中的许多人名、地名和教会名称都是他们不辞辛苦替我查出的，在此谨表示诚挚的谢意。

本书可能存在许多缺点和错误，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译 者

1982年11月15日于济南

目 录

说明

- 一、关于中国事件的函电：中国第一号（1912年）…………… 1
- 二、关于中国事件的补充函电：中国第三号（1912年）…………… 178
- 三、关于中国事件的补充函电：中国第三号（1913年）…………… 507
- 四、关于中国事件的补充函电：中国第一号（1914年）…………… 632
- 附录一：大事索引…………… 726
- 附录二：译名对照表…………… 740

一、关于中国事件的函电： 中国第一号（1912年）

第1件 朱尔典爵士^①致格雷爵士^②电

1911年10月10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在汉口俄租界及武昌，已逮捕了革命党人。今晨有三、四人被处决。对其余的人正在进行审讯。

第2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1年10月11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关于我10月10日的电报。

英国驻汉口代总领事报告说：武昌完全处于革命状态，衙门已被焚毁。总督^③驻在中国巡洋舰上，泊于英国炮舰的后面。他已通知总领事说，他不能保护英租界，并已请求英王陛下船舰阻止起义军渡江前往汉口。

我正请求总司令官提供他所能提供的一切帮助。

第3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1年10月12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武昌完全落入革命党人手中。整夜炮火不断。有一千名河南

① 英国驻华公使。

② 英国外交大臣。

③ 清朝湖广总督瑞澂。

部队可望于今日抵达该处。汉口城内的巡警已不知去向。租界内一切平静，昨夜由水兵及志愿兵防守。

第4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1年10月12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关于汉口发生的革命。

今夜，英国代总领事电称：起义军已占领汉口和汉阳，他们答应保护外国人，并正在维持秩序。

今天发布的一道谕旨，命令陆军大臣^①率领两镇军队前往汉口。水师提督萨镇冰奉命率领舰只前往，会同收复武昌，恢复秩序。

第5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1年10月13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关于汉口发生的革命。

又收到英国驻汉口代总领事的电报如下：

“租界的防御很好，由日本舰队司令指挥；起义军正在维护秩序。食物和金融是迫切的问题。几乎所有的传教士都住在租界内；外国人的生命财产未受干扰。

我已收到起义军统领的一封信件。该信说：他们已组成政府，将尊重对外条约以及以前缔订的借款和赔款，但不包括此后缔订者在内；只要外国人不帮助满清政府，他们便将对外国人提供保护。我等待您关于此事的训令。至于恢复秩序和信用的问题，我同起义军首领们有间接联系。”

今天，我给葛福先生^②发出如下的复电：

① 糜昌。

② 英国驻汉口代总领事。

“我已把您的电报转告外交大臣，正向他请示训令。此时，除了因英国人生命财产的安全而绝对不可避免的事情之外，您不应与起义军统领保持任何联系。”

第 6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1年10月14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关于汉口发生的革命。

今天，我给舰队司令温思乐发出了如下的电报：

“各国使节已接受汉口领事团的要求，向清政府提出紧急声明，希望它对奉命收复武昌的水师提督萨镇冰发布训令，避免在作战时使各国租界遭受炮火的危险。当萨镇冰提督到达时，日本舰队司令将向他提出类似的要求。如果发生另一种情况，便必须撤出租界，那时将要求萨镇冰提督在开始采取军事行动之前，给予撤出租界的时间。

对各国租界来说，局势将是非常严重的，今天外交团举行会议考虑此事。我们在汉口的利益需要我们竭力加以保护；我深信，没有任何人的意见比您的意见更容易为萨镇冰提督所接受，因为他以前同英王陛下海军具有密切联系，而且他对您本人极为尊敬。在这种情况下，我冒昧地建议您最好移住某处，当租界遭到危险的时候，您能够从该处向萨镇冰提督提出意见。”

第 7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1年10月14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关于我10月14日的电报。

今天向汉口发出下列电报：

“外务部通知我说：他们将立即与海军部磋商，询问是否可以电令萨镇冰提督，在发动炮击时尽可能避免使租界遭受任何危险。”

第 8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1年10月14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袁世凯已被任命为湖广总督，并统率该省部队，陆军大臣与萨镇冰提督所属各军将与袁世凯会同办理。此项任命或许将保证北方军队的忠诚，因为他们的忠诚是令人怀疑的；它还将大大加强清政府处理这次危机的力量。

第 9 件 格雷爵士致朱尔典爵士电

1911年10月16日发自外交部

关于您10月13日的电报。

我批准您对代总领事所说的意见。当英国人生命财产遭到危险时，我们必须尽力予以保护，但我们采取的任何行动，必须严格地限于此项目的。保护英国人生命财产，当然也包括对各国生命财产的保护在内，如果有此可能，而且不如此它们就得不到保护的话。

第 10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1年10月17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关于我10月14日的电报。

萨镇冰提督于昨日抵达汉口，但在援军到达之前，他或许将不采取任何行动。他已向日本舰队司令保证，将不使租界遭到危险。

革命党人正在武汉三镇维持秩序。

铁路仍由清军据守。

舰队司令温思乐当于今日抵达汉口。

第 11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1年10月21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关于英尼司吉林^①明火枪团。

英尼司吉林的士兵们将由10月24日抵达天津的沙美西^②团所替换。

当局势尚未更明朗化之前，我冒昧地建议：把即将调走的英尼司吉林明火枪团启程日期延迟一周或十天，也许是一项谨慎的预防措施，因为此地的形势虽迄今尚未出现令人忧虑的理由，但汉口所发生的事件的结果仍然是难以逆料的。

第 12 件 外交部致陆军部函

先生：

我奉外交大臣格雷爵士之命，随信送上英王陛下驻北京公使的一份电报^③的副本。该电建议说：鉴于政治形势，当前来换班的沙美西轻步兵团到达后，将驻天津的皇家英尼司吉林明火枪团继续留住一周或十天是可取的。

格雷爵士如果获悉陆军委员会能够接受朱尔典爵士的建议，将感到很高兴。

坎贝尔谨上 1911年10月23日于外交部

-
- ① 英尼司吉林系北爱尔兰的一个地名。英国新教徒于1689年在该地击败英王詹姆士二世派去的军队，因而使该地颇负盛名。后来，英军中某些团便以该地命名。
- ② 英格兰西南部的一个郡名。
- ③ 原编者注：本书第11件。

第 13 件 陆军部致外交部函

1911 年 10 月 24 日收到

先生：

我奉陆军委员会之命，报告收到您本月 23 日的信，该信转来英王陛下驻北京公使的一份电报的副本，建议将皇家英尼司吉林明火枪团撤离天津的日期延缓七天至十天的时间。

我应在答复中说明：陆军委员会将发布命令，目前延缓对该团的调动。

沃德谨上 1911 年 10 月 24 日于白厅

第 14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1 年 10 月 24 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今天收到英王陛下驻上海总领事的下述电报：

“中国电报局通知我：昨夜十一时半左右，革命党人焚毁了九江道台衙门。目前同九江的联系系通过芜湖，由该处用轮船转递。已将此事通知海军高级军官。”

第 15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1 年 10 月 26 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起义军政府已通知长沙税务司说：他可以根据他们的命令，继续行使他的职权。因此，我同总税务司磋商之后，已于今日向英王陛下驻该口岸领事发出如下的电令：

“应诱劝起义军政府同意将海关岁入暂由总税务司或领事团保管；您应当为此目的尽最大努力，与税务司会同办理。

照理说，该款应归各国持有债票的人所有，如果起义军挪用该款，结果或许将与各国发生严重纠纷。您应当向起义军政府指

出这一点。”

第 16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1年10月26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继昨天资政院弹劾盛宣怀之后，今晚又已发布谕旨，革除盛宣怀的职务，因为他对政府的铁路政策处理失当。他将永不叙用；唐绍仪被任命为邮传部大臣，接替他的职位。

第 17 件 海军部致外交部函

1911年10月27日收到

先生：

我奉海军部各大臣之命，为了供外交大臣参考起见，送上驻华总司令官本月27日关于中国局势的一份电报的副本。

格林谨上 1911年10月27日于海军部

第 17 件的附件 驻华总司令官致海军部电

1911年10月27日发自上海

汉口的局势没有变化。七里沟的桥梁由清军据守，但没有其他大军前来的迹象。在十公里处的起义军人数大概为六千至八千人，他们已得到大量增援。

预料有三十名意大利驻北京使馆卫队前来；一百名日本水兵已经到达。德国舰队司令否认有德国军队前来的传说。没有见到中国的船舰。

起义军在各地都保持良好秩序，他们已占领九江及长沙府。

由于江水迅速退落，大兵船将不得不于11月1日左右离去。

第 18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1年10月28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由于昨天资政院通过一项决议，请求皇上下令处死盛宣怀，所以四国公使走访了庆亲王，得到保证说：不会加害于盛宣怀。盛在四国使馆的十名士兵护送下，于昨天深夜前往天津，将先赴青岛。

虽然清政府坚决声称，袁世凯作为钦差大臣将于今天启程前往汉口，并对此项任命抱有很大希望，但是，公众对此事仍极为怀疑，而且此处感到非常不安，有许多人纷纷乘火车南下。

第 19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1年10月29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关于滦州兵变。

今天军谘大臣贝勒载涛在答复我的询问时，已证实现驻滦州的第二十镇部队拒绝乘火车前往汉口的传闻。贝勒殿下说：该镇统制^①在奉命启程时，曾奏请皇上立即同意制定宪法。

军谘府在决定采取行动的方针之前，将等待同该统制商谈的结果。

滦州^②位于京奉铁路线上，在天津以北一百英里处。

第 20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1年10月29日发自北京，次日收到

总司令官于10月28日发来如下的电报：

“在汉口租界的后面，整天有激烈战斗。今晨，大批起义军在

① 张绍曾。

② 原文误作“汉州”。

铁路线和靶场上建立了阵地。大约在下午二时以后，大部分起义军乘舢板和帆船渡江撤往武昌。清晨七时及下午三时，在武昌下游约五英里处的南岸上，野战炮队对清朝兵船开了炮。炮击的时间不到一个小时。兵船还击的炮火，每次都很不准确。对武昌或汉阳未发动炮击。商船和趸船都停泊在下游约十英里处。两天内起义军损失很重。汉口塞满了伤员。”

第 21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1年10月29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革命运动似乎正在扩展。

上海道台承认他没有力量守城，并且说，起义军在什么时候都能够占领它。

广州已实际上宣布它实行自主。

驻南京领事的报告说明，该处的局势极为严重。

太原府已落入起义军手中；天津正在发生动摇。

看来，好象只有经过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之后，才能重新建立满族人的权力，而对于这场战斗清政府是没有什么准备的。

第 22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1年10月30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附上驻重庆领事布朗先生来信的副本，该信对四川省内的骚乱以及导致骚乱的原因作了一个饶有兴味的说明，这个说明是成都的一位绅士向他提供的。虽然这个说明显然具有派系情绪的色彩，但它可以用来代表很大一部分群众的看法和信念，他们的愚昧无知使他们成为股东代表和省谘议局反抗政府权力的工具。

从所附英王陛下驻成都总领事的来信中，我很满意地获悉，务谨顺先生和泰克曼先生都安然无恙，而且对外国人没有进行任何攻击，只有美国美以美会的曼里先生受到殴打是个例外情况。务谨顺先生很明智地对偏远地区的传教士们及时提出警告，如果运动采取排外的性质，他们所处的孤立无援地位无疑会构成危险的源泉。

从我收到的成都近日来电看来，城内似乎没有继续发生战斗，但结局仍显然捉摸不定。现在还没有援军到达，而官兵由于逃亡以及在省城以南和以西各地经常与起义军作战，势力正遭到严重耗损。

朱尔典谨上 1911年10月13日于北京

第 22 件附件 1 代领事布朗致朱尔典爵士函

先生：

有一位绅士于9月9日离开成都，他根据保路同志会的观点，对成都暴乱以及导致暴乱的原因向我提供了下列说明。

目前骚乱的原因在于：

一、省谘议局和官员们之间在财政控制问题上发生磨擦。例如：谘议局力图削减总督及其他高级官员的薪俸。

此外，谘议局经常控告各县官吏的贪污腐化和非法刑罚，并要求撤除他们的职务，因而激怒了该省官员。

二、省谘议局及士绅对内阁的腐败和保守性怀有不满。庆亲王和那桐都是满人，徐世昌虽系汉人，但却软弱无力。庆亲王对钱财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除非首先付钱给他，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办成。各省谘议局一致感到愤慨，希望削减庆亲王的罪恶势力。

在铁路问题突出起来之前，情况就是如此。当人们发现借款未获得人民同意便已缔订的时候，他们成立了成都保路同志会，

以反对政府的政策。该会认识到，除非得到全省的支持，它的力量是很不够的，因此在各县成立分会。人们普遍认为，股东们必须着手处理这件事情。

股东大会订于8月4日在成都召开，每县各委派一名代表参加。头两次会议是秘密举行的，决定：

（一）借款问题是无关紧要的。

（二）以岁入担保偿还借款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如不担保偿还，便借不到款项。

（三）允许银行抽取佣金一事是无关紧要的。

这些决定并没有公开宣布。由于股东们不能够期望他们的要求全部获准，为了尽量获得政府的让步起见，决意提出很高的要求。因此，他们请求政府取消借款，并将铁路交还给该省办理。这项要求被提出来作为双方妥协的基础；他们还说服护理总督王人文将此意奏报朝廷。

北京方面的答复是绝无妥协的余地。于是，股东们要求，如果政府坚持接管该铁路，则请退还他们的股本。政府在答复中通知他们说：四川没有可供使用的股本，大部分铁路资金已经耗损，或被贪污盗用。如果偿还他们的股本，政府将不得不举借外债；为了偿付铁路公司手中的实际股本和资产，将发行六厘利息的国家铁路公债。北京的此项决定引起了很大的不满；人们认为，作为政府代表的上海道台和大清银行，对四川股本在1910年上海橡胶暴跌中所受的损失，负有主要责任。

股东会议草成一份冗长的声明，其中指出，四川有七千万人，除去那些极为贫穷或不愿意入股的二千万人，以及那些因居住在边界地方和山区各县而对铁路无利害关系的三千万人之外，还有二千万人，他们都将每天捐钱一文充作铁路资金。这样，每天可得钱二万吊，一年约有七百万元。有了这笔款项，他们便能够修

筑宜昌至夔州的铁路。他们的计划还具有这个优点，即款项是中国人的，并且用于中国。如果向出借款项的列强说明这一点，人们希望它们将允许把借款移作其他用途。代表们对此表示一致同意，全体在声明书上签了名。

虽然省谘议局已经作了准备，当他们认为股东们的议程不合规定时，将出面采取行动，但是，他们拒绝参加讨论。谘议局议长蒲殿俊先生没有出席股东会议，也没有向他们发表演说或以任何方式进行干预。由于他曾经劝导四川、湖北、湖南、广东等省谘议局派代表前往北京抗议内阁的保守性质，从而招致了庆亲王的严重敌视，但他仍然赞成庆亲王所进行的活动。

后来，总督赵尔丰收到一份电报，奉命将蒲殿俊、邓孝可、罗纶等人处以死刑。如果杀死了这些人，风潮将会平息下去。

对于这个电报，该省当局答复说：不可能执行死刑，他们宁可辞职，而不能服从命令。

接着，北京官员们设法任命李稷勋为宜昌铁路总办，于是人们宣布罢市。

大约在这时候，一名御史向朝廷参奏王人文和赵尔丰为铁路风潮的煽动者。于是，端方奉命查办此事。北京方面秘密决定贬黜赵尔丰，发布了一道谕旨，警告他说，如果他处理失当，便应承担全部责任。

这个期间，股东们仍继续讨论局势。他们对国家铁路债票并不感到放心，并且援引约二十年前政府发行“昭信股票”尚未偿还一事，以支持他们的看法。他们说：他们的一千六百万两股本的利息达九十六万两，其中大部分股本是由房捐提供的。朝廷曾在一道谕旨中答应给他们的股本付给每年六厘的利息。现在，四川的地丁每年可得银七十万两左右。政府坚持接管铁路，它可以占有该路以及他们的铁路股本，但是，该谕旨已经答应他们付给六厘

的利息，因此他们将从地丁中扣除。这将使当局免除付款的麻烦，而且他们的行动将符合朝廷的愿望。政府还必须偿还其余的二十六万两，但该款的一部分可通过停止经营不动产从而节省手续费方面获得补偿。

至于“捐输”，政府声称，他们太穷了。他们确实很穷。对于现在已成为历史的那些募捐活动，他们已穷到无力支付特别认缴的款额。

一份包含这些决议的长篇报告，由会议送交省谘议局，请求它转交总督，如果总督认为他们的行动是正当的，便请求他上奏朝廷，否则便极力要求他商讨此事，并说明他的意见。

谘议局议长将该报告及时地送给了总督，还附上一函说：如果十五日内没有收到总督阁下的答复，他们便认为该报告是正当的。

总督对该报告没有做任何答复，但他电告北京说：川人拒绝交付地丁和捐输，已处于反叛状态。人们认为，他没有把股东的报告交驿站火速送往北京，而是作慢件送去的。

紧接着第一份电报之后，总督又发了第二份电报，报告新津和新繁两县税局被毁，并有盐梟抢劫官盐局。

赵尔丰收到了北京的复电，该电通知他说：责任应由他承担，因为他在很早以前便应当制止这些活动。

股东代表们担心人民不了解他们所采取的方针，所以用通俗的文字刊印小册子，供在省内各处散发之用。让总督作出决定的十五天期限，已于9月2日届满，保路同志会和股东们于4日决定，将这些小册子交给他们的代表，代表们应在各县散发。接着，他们提出，如果官方企图镇压他们，保路同志会将采取什么行动的问题。他们决定召集民团，其中大部分是乡下人，依靠大地主为生，而那些大地主也是最大的股东。如果有人要诉诸武力，那就用武力反抗它；有任何士绅被杀时，便对他的家庭付给抚恤费

四千元，对越穷的人付的抚恤费越少。这些人的孩子上学，免交学费。对所有为此事而牺牲的人们，将举行普遍的悼念活动，他们的遗像将置于省谘议局会议厅内。

这时，罗纶和其他著名的人物感到，他们的力量足以对那件要处死他们的电令不予理睬。

9月6日收到的一道谕旨，命令赵尔丰逮捕首要分子，解散保路同志会，惩罚所有那些拒绝付税的人们，并粉碎一切抵抗。总督知道他的行动必将激起风潮，但他除了服从命令之外，别无任何选择，所以做好了准备。他派兵在成都四周巡逻，并在街头驻扎士兵。

同一天，保路同志会收到一位名叫赵熙的御史自北京发来的电报，他通知他们说：盛宣怀和端方坚持要镇压保路同志会，庆亲王和那桐抱有同样的意见，只有徐世昌拒绝签署该命令。

成都流传的谣言说：如果赵尔丰试图谋害保路同志会的首领，他将被暗杀。又说：有人将放火焚烧该城。赵尔丰对这些谣言的报道感到极为不安。

9月7日将举行铁路股东大会。会议结束后，每位代表都将携带关于不纳税等事的大捆小册子，各自返回本县。上午九时，总督打来电话通知会议首领们说：他已收到北京的电报，找到了解决铁路僵局的办法。他们是否愿意前来同他讨论此事？该会议的五位首领立即准备前往总督衙门。

大约有六百名股东在铁路局外面等候他们归来。过了十一时之后，他们打电话给总督衙门，询问该五人可望于何时回来，因为他们急于要开会。一位警官答复说，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讨论。股东大会开始怀疑，恐怕一切都不顺利。他们的怀疑由于二、三百名士兵的到来而获得证实，士兵们包围了建筑物，不许任何人入内。军队的到达，使股东们感到惊慌，他们询问军队前来的原因。他们被告知，城内有人纵火焚烧房屋，而且街道上发生骚乱，

“我们是来保护你们的。”那位军官不知道为什么派出这么多的军队，但是，任何人在离开之前都必须获得总督的允许。

于是，有人登上屋顶，看见北大金街发生大火，至下午二时停止。晚些时候，一名军官持总督名片前来说：“总督阁下通知你们，由于谣传如对你的首领试图加以谋害，他将被暗杀，所以他派兵把守铁路局各门。今晨，他邀请罗纶等人前往他的衙门，他们到达后立即发生失火。总督阁下已命令军队停止一切交通，目的是为了较容易地扑灭火灾，并防止抢劫。现在，火已停止，但街道上还不能通行。如果你们离开这里，便将遭到危险。在总督阁下告诉你们回去之前，你们必须等待。”这些话是不正确的，因为已经张贴一份早已准备好的告示，警告每个人说：首要分子已被逮捕，所有的人应各安生业。

省谘议局议长蒲殿俊先生听到首领被捕的消息后，往见署按察使周善培，对那种不法行为提出抗议。他说：股东会议的首领都是遵守法律的人，他们不会参加任何骚乱。周善培建议说，蒲应同他一起去见总督，商讨此事。他们两人一起前往，但到达总督衙门后，蒲也被逮捕。保路同志会中的另一著名人物颜楷，已回家渡中秋节，在他乡下的房屋中被一小队士兵捕获，并被解往总督衙门。电报局前任总办胡燏也被逮捕，但押在另一个衙门中。总共有十人被捕。

这时，在总督衙门前面，已布置军队。不久，就有一支二、三千人的队伍在该处出现。群众前面摆着已故光绪皇帝的牌位，他们中间有些人是高贵人物，其余的来自下层阶级。他们都请求总督释放被捕的人，并且答应：如果被捕的人获释，店铺便将开门营业，风潮就会平息。总督衙门突然贴出一张红色告示，警告所有的人说：无论何人进入内门，将遭枪杀。人们并不企图进入衙门，但有一位姓王的候补道看到该告示之后，命令军队开枪，死伤

的群众约有十五人。在开枪引起的大骚乱中，还有许多人受伤。

城内的另一个意外事件，发生在大金街。该处有一名警官不能从人群中强行通过，拔出手枪射击，打伤了二、三人。

城内呈现出十分激昂的情绪，人们决定举着灯笼，在总督衙门周围形成一个警戒圈，以防止他们的朋友被押出来处死。所有的人都将与他们的朋友同生共死。

那天晚上下了小雨，重新恢复了平静。

这时，铁路股东们被告知，他们可以自由回家，但是，他们在没有获悉朋友们的命运之前，拒绝回去。于是，他们接到指示说：有五位成员可以去总督衙门会见被逮捕的人。因此，五人前往总督衙门探望那些首领，其中三人回来报告说：他们都安然无恙，其余两人决定同他们一起留在衙门内。此时，人们各自回家。接着，士兵们进入铁路局，抢走了所有的书籍、文件等，并且封闭了各门。

军队还到了铁路学堂，取走所有文件及其他东西。

必须说明：铁路学生曾模仿官办的治安维持会，设立他们自己的组织，称之为四川自卫会，发布了许多份夸大其辞的通告，充满无稽之谈，叫做“川人自卫权利宣言”。除总督外，人人都把该通知当做一大笑话，而总督电告北京说，四川宣布成立共和国！为了查明该通知曾在何处印刷，对三家报馆进行了搜查，查到的全部文件均被没收。

9月8日，大雨从清晨下到深夜，一切都很平静。

9日早晨，成都的北门、东门和南门均被武装的农民队伍所包围。一队巡防营从东门出发，要求了解这些队伍为什么集结。答复是他们来见总督。当询问他们为什么持有武器的时候，他们反驳说，未持武器的人们已于前一天在总督衙门前面遭到枪杀。于是，统带军队的那名军官答应首领们说：如果他们把所有的武

器堆积起来，他将带领他们去见总督。接着，群众放下了他们的武器，军队立即对他们开火，打死和打伤好几个人，其余的人逃走了。然后，军队带着那些武器凯旋而归，并且报告他们已获得胜利。

同一天，民团杀死了一小队骑兵，其中仅有很少几个人生还。一位记者告诉我，在当地市场上，马肉每斤售十五文。有好几支小分遣部队在其他各地被击败，据说新津县的分遣部队已被消灭。

向我报告消息的人于9月9日中午离开成都。他途中至少在三座桥边被民团所阻止，民团在拱桥上悬着圆石头，对拒绝停驶的任何船只以掷下圆石头相威胁。民团在他的船上搜寻政府公文、官吏、士兵和外国人，承认他们自己很想搜得外国臣民，目的是为了诱使该外国臣民将他们的情况转告那些已签订借款合同的国家，希望那些国家认识到他们所持论点的合理性。

我从传教士和其他方面获悉，起事者在离成都约二十英里处建立了一座大兵营，保路同志会各分会从附近各县送往该处的，不仅有人，而且有食物和各种供应。尽管他们在成都附近遭到挫折，但仍有大批民团和土匪于9月19日经过嘉定。英王陛下军舰“水皂”号的布鲁克海军少校于9月19日自嘉定来信说，当地的形势似乎日益恶化。据说许多小县城的衙门已经受到攻击，有钱的中国人正迁离县城，而其他的人则从附近农村前来避难。

住在彭山的巴勒姆先生奉官吏的命令迁走，该官员通知他说，不能够继续保护他。全城已在保路同志会手中，甚至巴勒姆先生教堂内的成员也谈论与保路同志会联合起来，拘捕他作为人质。巴勒姆先生在沿江而下的途中，把船停泊在一艘中国炮船旁边，以求保护。夜间，有好几百人一伙登上炮船，搬走所有的武器和弹药，并掳获该船。成都附近的大部分中国炮船，均在保路同志会手中，该会还控制了许多较小的县城和市镇，虽然在某些情况

下他们允许知县会同他们维持城内的秩序。水路不缴纳厘金，近年来不受人们欢迎的那些捐税，大都已被保路同志会废除。传闻该会正在征收早已确立下来的那些捐税，并且把此种收入拨充军费，但无法查明此事是否属实。在许多城镇中，官吏们不得不对他们所属的警察和仆役仅付半饷，因为他们没有款项发放全饷。当半饷停付的时候，警察和士兵们或许将随意取用任何东西。

成都东南至嘉定的情况，看来就是如此。现闻官军驻在双流县，起事者退往新津及简州等县，该地区因有水陆盗匪而名声不好。英王陛下军舰“水鬼”号的一名信差于9月16日离开嘉定，携带一份电报由陆路前往叙府，被他们所阻止，他的电报被夺走。该信差认为，他很幸运地得以生还。“水鬼”号军舰根据我的请求派往成都的信差，均未能到达该城五十里以内的地方，信件都已退还给布鲁克舰长。通过法国教堂及日本人派出的信差，也未能到达务谨顺先生处。9月21日，道台报道他已收到总督通过资州发来的一份电报，该电说：起事者已被击败，至成都的道路现已畅通。至今尚未收到该城直接发来的信件，但来自遂宁及顺庆府的报道说，邈东一带极为平静。

布朗谨上 1911年9月22日于重庆

再者：关于陆军和巡警对铁路风潮的态度，向我提供消息的人说：在罢市的时候，朱庆澜统制曾对这些士兵进行一次检阅，当时他要所有那些参加保路同志会的士兵站起来，因为他希望把他们开除出伍。全体士兵竟站了起来！朱庆澜统制退了回去，后来士兵们拒绝操练。总督听到部队中的这些情况后，急忙视察了城外五英里处的凤凰山兵营，在巡防营的帮助下，搬走了大炮和全部弹药，说他打算另分配一批新的军火。

巡警所用来福枪的枪栓早已被拆走，他们获准在几天内配带这些无用的枪枝，当这些枪枝被收去时，把木棍发给了他们。

巡警和陆军大都是受过教育的四川人，对保路同志会抱同情态度；他们曾经宣布，打算拒绝对本省同胞开枪射击。

布朗又及

第22件附件2 总领事务谨顺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本月7日，我发电报向您报告说：总督已逮捕保路同志会的首要分子，成都的城门均已关闭，冲突的结果如何尚难肯定。次日，您表示收到了该电报。

这些电报是已经分别送达的与使馆往来的最后一批电报。7日下午，我把发给英王陛下驻重庆副领事的一份电报送交电报局。该电两次被报务员或此时正围困电报局的那些卫兵所拒绝，因此，我写信给总督，请他下令拍发该电。总督阁下同意了请求，但要求我今后将电报通过他代发。然而，当第二天我请求拍发一份长电给您的时候，总督阁下答复说：成都至资州——通往重庆电报线的中途站——之间的电线已被切断，但我的电报将由驿卒送往资州。昨夜，他又来信说：接受任务递送该电及7日发往重庆电报的那个驿卒，在茶店子被起事者捕获，茶店子是通往资州的三分之一行程中的一个市镇。因此，那两份电报都不可能送达，更晚些时候（11日）发出的一份电报也不可能送至尊处。

我正尽力通过本地运输机构把消息送往重庆，但我不能肯定是否获得成功。此处的中国邮政局几乎已停止工作。在总督采取突然行动之后的头几天内，该局虽曾收到和分发少数邮件，但没有把邮件发往外地。总之，成都已处于被围困状态，我不能预料我现在写的这封信将在什么时候以及用什么方式发出。然而，由于希望有某种机会出现，所以我把白上封信发出之日起此地所发生的事情，草成下列说明。

保路同志会在胜利的鼓舞下，已通过决议：所谓“捐输”应一概停止，地丁由他们即将设立的办事处征收。关于办事处的规章制度，已经草成，但尚未公布，然而规定办事处各分支机构所应奉行的办事方针的“章程”，已经以铅印传单的形式出现。我荣幸地附上该“章程”的译文，它有助于说明运动的革命性质。

这时，总督已收到中央政府的严厉命令，要他逮捕首要分子，而且已发现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些人正阴谋反叛，正象他后来在多次告示中所肯定的那样。本月7日中午前后，当保路同志会正在开会的时候，总督阁下邀请好几名鼓动闹事者前往他的衙门参加一次会议。这些人中，首先是省谘议局副议长罗纶，还有议长蒲殿俊，股东临时大会副主席张澜，清朝六部之一的小京官邓孝可，川汉铁路第一任总理的兄弟、前四川电报局总办胡燏——他因抗议不替鼓动闹事者收发电报的命令而辞职，谘议局议员江三乘，学务处委员彭兰芬，学堂监督孟载成。股东会议主席颜楷正在城外名寺青羊宫，该处举行每年一次的庙会，由二十名士兵组成的一支队伍奉命前去把他押来。

首要分子在衙门聚齐之后，总督立即简略地通知他们说，他们已被当做反叛者拘留起来，而由陆军和巡防队组成的一支卫队被派去看守那些仍留在铁路局内的股东们。赵制台^①的布署确实是很巧妙的。几天内，街上所见到的士兵，只有少数持着小刺刀的陆军，他们表面上毫无目的地逛来逛去。然而，这些士兵随时向隐藏在私人住宅、警察哨所、寺庙和其他有利地点的大队提出报告。当发生战斗的时候（以敲失火的警钟为号），人们发现街上各个地方均被军队所占领。

那些布置并未能防止某些群众所发动的示威活动。根据总督

① 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

发布的一个告示所说（该告示于11日发表在官方的《成都日报》上，但后来被禁止发行），有人冲入他的衙门，企图强行释放那些被囚禁的鼓动闹事者。总督阁下被迫命令卫兵开枪，以致有一批闹事者被杀。按照那些同情保路同志会的人们的说法，“闹事者”都是安份守己的人，他们作为恳求者来到总督衙门的大门，谦恭地跪在门前。无论他们的真实态度如何，他们中间肯定至少有十三人被枪杀，因为第二天在他们被枪杀的地方清点出十三具尸体。这里，我可以这样说：尸体已于9月9日收殓，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运往萧官庙。有人声称：总督对每个死者的家属付银四十两作为“明价”，换取收据结案。

在东大街，有群众聚集，当士兵朝天开枪时，他们便四处逃散。有好几个人受伤，还有些人被踩死。在大清银行的对面，有一人因持香烛为罗纶的被捕放声痛哭，被开枪打死。已经半开张营业的店铺，此时紧闭大门，街道上除了武装巡逻队之外，空无一人。

总督张贴一件韵文告示说：仅捕首要分子，彼等均已被捕；保路会已解散，务须各安生业。由于这时城门已闭上，而且有士兵严密防守，所以该告示在安定人心方面收效甚微；据说巡逻队在街上任意开枪，已经打死或打伤一些行人，该告示的效果就更小了。

7日夜间，通宵大雨，一直下到8日未停。可是，有些民团仍聚集在东门和南门外，叫嚷要释放那些鼓动闹事的人。他们在这个日期出现在那些地方，使总督最近常常提出的那个说法令人信服，即他们密谋于9月8日占据该城。据说，一位青年人泄露了那些密谋者的计划，他把一份计划书交给了总督。有人进一步声称，总督将要印刷并发表这个文件。

无论如何，他们确实于该日发动了对城门的攻击，但因攻击

者仅持有火绳枪和刀矛等武器，所以很轻易地便被击退了。

另一个简短的韵文告示重申，现已被捕的那些首要分子就是煽动闹事的人。至于铁路问题，已在奏折中提出建议，将避免使四川人遭受损失；因此，人们一定不要听信那些毫无根据的谣言，从而给自己带来灾难。第三个更简短的告示于9日发布：

“朝廷仅欲逮捕少数人，彼等均系首要分子。良民将不受骚扰，然如聚众闯入官署，即格杀勿论。”

总督又利用这个机会封闭了《西顾报》及《启智画报》^①等两家报馆，“因其违背报律”。自本月7日以来，唯一发行的报刊是官方的喉舌《成都日报》。

本月10日，经布政使与商会磋商之后，开放义仓平糶。不过，对城内缺乏粮食一事，并没有充足的抱怨理由。自7日以后，城门不时开放，以便做买卖的人出入；同时由于起事者逐渐被迫退去，所以进城的时间已经延长。今天（9月16日），东、南、北三城门的内外各两扇大门均已打开，自早晨八时起，至下午六时止，而满族将军控制下的西门，昨日第一次开放，自下午二时至六时止。另一方面，城墙的警卫更加严密，即使在白天也不许闲人登上城墙。

本月12日，有人企图替总督在城内募兵，据说此事已经失败，因为应募者不及所需数目的十分之一。谣传保路同志会在城内正在举行秘密会议，但迄今总督似乎控制着城内的局势，并且能够执行命令和纪律。

在城外，尤其是在西面、南面和东南面的各条道路上，官军与起事者之间发生一系列冲突。关于这些作战活动，很难做一连续的说明。据我判断，现在起事者在各条战线上已被迫退至双流、

① 两家报纸名称均系译音。

中和场及茶店子以外的地方。有人说，双流城内全遭破坏；传说知县已自杀，但未经证实。起事者曾经使用竹子制成的大炮，用切断的电线缠在周围，装上碎铁做弹药。他们用这些粗陋的武器杀死了一些人，但运至成都的官兵伤员不过几十人。另一方面，正象人们所预料到的那样，民团的损失很重。有一些人被俘，但总督释放了他们（至少是在某些情况下），为了表示他的宽厚，甚至把食物和银钱赏给他们。

沿双流一线溃退的起事者，似乎向北撤去，经温江前往郫县，在该处也曾发生战斗。向北路推进的那些起事者，不但没有与那些被派来阻挡他们的官军作战，反而同意谈判，终于放下他们的武器，解散回家。在东面的山区靠近龙泉驿一带，起事者进行的抵抗是最顽强的；而水路至江口一带，起事者仍拦截所有的船只。因此，据我判断，省城周围十五英里左右的农村已经扫清，但东、西、南三面的通道均被阻塞，只有北路仍然畅通。

但是，封锁行动是很离奇地具有间断性的。两天前，我收到重庆寄来的一批食物，毫无阻碍地通过了所谓起事者的防线，如果他们组成了这些防线的話；而总督的信差携带那些发出的电报，象我所说过的那样，则遭到抢劫。当我写这封信的时候，我收到了布朗先生于9月8日和9日通过电报局发来的电报，同时里奇先生收到了北京的一封电报，该电所注日期为9月11日。所有这些电报都是由信差从资州送来的。我已经利用两个机会（转运局和信差），力图把回信送给布朗先生，他将转交给您。

总督采取突然行动的那一天（9月7日）早晨，有一伙外国人乘船离开成都前往重庆，内有戴维森医生夫妇和三个孩子，西尔科克夫妇和一个孩子，希姆金夫人（以上都是教友会的成员），里奇夫人及其三个孩子，中国内地会的维尔夫妇和一个孩子，以及教会接待站的牧师福雷斯特先生。英美烟草公司的三名雇员，

即英格兰、朗特里和斯特里克三先生，已准备于该日下午离去；除了基尔博恩医生、尼夫先生及斯图尔特先生外，其余的英美传教士都准备于次日早晨启程。人们预料，穆那克医生夫妇及其孩子和法国女仆、特里佛先生和夫人（他的药剂师）以及他们的子女也将离去，而且高等学堂的三名美国教师也很可能动身。

逮捕首要分子以及关闭城门，妨碍了该项周密计划的实现，今天住在此地的外国人同三个星期以前一样，只有上面说过的戴维森医生一伙以及教会接待站的斯图尔特牧师是例外情况，斯图尔特牧师已于9月7日赴绵州照顾他在中坝的那个姐妹的安全（我可以补充说，他们是1895年在福建省古田被害的传教士的子女）。我的德国同僚菲舍尔先生已于本月3日返回成都；法国总领事安迪先生仍在打箭炉以北的荒凉地区，很可能不知道我们所处的困境。

我在本月7日以前并包括该日在内所发的电报，已告诉您关于我为了保护本地的以及我所辖其他地方的英国侨民而采取的那些步骤。8月28日，我根据本省洋务局的请求，发出一项通知，警告外国人应尽量少出门，而且不要骑马，宁可乘坐遮盖严密的中国轿子。9月1日，这一次是根据总督本人的请求，我发出另一项通知，建议外国人遇有紧急情况时，应迁往城东北的加拿大监理会大屋，该屋与朱庆澜统制的司令部所在地东校场毗连。实际上，总督于9月6日来信说，紧急情况已经出现，要求我告诉所有的英国人撤往加拿大教会。我立即把该信的副本送给菲舍尔先生和勒昆先生，同时把该信内容收录在第三项通知之中。

象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戴维森医生和十六名男女儿童于7日早晨乘船离去。大部分英美传教士已迁往加拿大教会的房屋，住在即将落成的医院内。在此处和他们住在一起的，有来自彭县的加拿大教士（巴特医生夫妇及子女二人、西布利夫妇和一个孩子、

艾里什夫妇等)。仍在城内居住的几名传教士很容易地而且很安全地于7日迁入医院；但是，美国传教士泰勒夫妇和威廉斯先生以及加拿大教士卡斯克伦先生等，已前往南门外的基督教联合大书院，他们不得不缒城而入。本省邮政司里奇先生前来和我同住，住在这里的还有贝茨先生，我对这位先生的工作是十分感谢的。总之，没有住在四善寺或本领事馆（相距十分钟路程）的英美侨民，仅有洛夫德女士和泰克曼先生。

我曾邀请洛夫德女士前往四善寺，但她答复说，她觉得她住的地方很安全。泰克曼先生因夏天困居在这座臭气熏天的城市中而患病，我已允许他请假赴理藩厅山区疗养，在9月13日以前他不会回来。现在，他住在灌县（在此处西面约三十五英里处），但总督并不认为，到目前为止，他前来成都是很安全的。

北门外的法国修女们，已应召迁入西城平安巷靠近教堂的孤儿院。上面已提到的未在教会任职的几名法国人，包括中国邮政局的乔登先生在内，都住在法国领事馆。德国人（代领事非舍尔先生，德国教习史柏伦先生，蜀赫洋行经理花必格先生，制造局雇用人员詹克斯、赞格、史毕慈斯基等三先生）都住在德国领事馆。

直到目前为止，无论什么人对此地的外国人都没有表示过任何恶意。危险并不在于官员们或鼓动闹事者的敌视态度，而在于起事者胜利闯入成都时随之而来的混乱或抢劫，或者是他们在城内的朋友发动的起事。此类起事和闯入成都的可能性日益减少，而且昨天由打箭炉来的约一千五百名富有作战经验的部队入城，更进一步加强了总督的力量。

关于各英美传教士设在偏远地方的教堂，凡位于成都西南及南部者（邛州、平山、嘉定、雅州、仁寿、荣县），我没有得到一点消息，也不能派信差前往。我已与灌县保持联系，但建议泰克

曼先生目前的房东赫特森先生，以及数日前在返国途中到达该处的米尔夫妇，暂时留在该城。在新都的汉密尔顿先生，似乎是很安全的。我最近收到的9月11日绵州来信及9月12日德阳来信，告诉我一切都很平静。潼川寄来了一份类似的报告。不过，我已建议传教士们不声不响地集中于绵州和潼川，因为该两处有水路与重庆直接相通，同时建议他们在局势变得更紧张的时候，尽可能不露声色地准备离去。他们将会把我的建议以及我附上的直到本月9日为止关于此处所发生事件的一份简要说明，转交给他们在保宁及更遥远地方的教堂的同事们。

我竭力设法把我这封信的一份副本通过潼川送往重庆，在邮政恢复以前保留其他副本。

务谨顺谨上 1911年9月16日于成都

再者：泰克曼先生、米尔夫妇和一个孩子、赫特森先生及其夫人和孩子，已由驻守灌县的一百名陆军护送至成都。

务谨顺 下午五时

第22件附件4 总领事务谨顺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简州中国邮政局的一名专差于昨天下午很晚的时候到达，带来了重庆税务司施特劳赫先生写给里奇先生的一封信，该信注明9月12日写于重庆。那名信差报告说，他在沿途没有遇到障碍；我们从该信的日期推测，从简州经资州至重庆的邮政照常办理。因此，我于今晨把这封短信以及我上封信的副本交给返回简州的那名信差寄上。

泰克曼先生、米尔夫妇及其孩子、赫特森夫妇及其孩子等，由一百名奉命调回成都的陆军护送，自灌县来到此地。由于他们绕道崇宁和新繁等地，所以经过郫县的那条直路当时显然被堵塞。

泰克曼先生报告说：

“我于9月11日从山区抵达灌县，该处流行着最荒诞无稽的谣言，其中有的说：省城已在起事者手中，赵尔丰总督的首级悬挂在城墙上。在灌县，我遇见米尔、赫特森等先生及其家属，他们住在中国内地会的房屋内，焦急地等待着事件的发展，因为若干天来他们已被切断同成都的一切联系。次日早晨，我拜会了知县，他是一个彬彬有礼而又和蔼可亲的人，很想尽一切力量保护外国人，但是，他同我们一样，对省城内所发生的事件真相一无所知。不过，他说：目前我们不可能试图前往成都，因为郫县附近正在发生战斗；灌县城现在很平静，有十八名土匪刚才在他的衙门内被斩首，该处驻有几天前自成都来的一百名陆军。第二天早晨天亮后不久，他来教会看我，告诉我说：刚才收到一件公文，命令将部队立即撤回成都，因为所有驻守偏远县城的士兵都正撤回省城；他们将由崇宁县和新繁县前往，以免与起事者发生冲突。他建议我们一伙利用这支部队护送返回成都，并请求我劝告中国内地会驻会教士赫特森先生离开灌县，因为部队撤走之后，他将没有力量保护他。此事决定之后，又有一个新的困难发生，因为似乎不可能以任何代价觅得轿夫和挑夫；避难者正从成都平原涌入山区，轿夫们每天所得不是三、四角钱，而是四、五、六元。然而，又承知县出面援救我们，觅得了挑夫和轿夫之类的人，因此我们终于在该日下午二时离开灌县，那些奉有严厉命令立即出发的部队，等候我们动身达六小时以上。由于最近下过雨，道路不好，所以该日下午在夜幕降临前仅能走十英里。

第二天，我们经过崇宁县行抵新繁县。这两座县城中的店铺，除了那些出售食物者外，大多已关闭，情况与灌县相同。陆军已撤回成都，知县仍住在他们的衙门里，但对所发生的事情毫无了解，城门和城墙由那些持有刀矛火绳枪等武器的地方团练或民团

防守；但是，他们与乡团不同，遵守法律和秩序，而且当我们经过的时候，他们没有对军队表现出敌视的迹象。是日途中，除了挑夫和轿夫们不断力图放下担子逃走之外，没有发生意外的事情。一位军官的仆役，掉在队伍的后面，被一些土匪击伤，虽然被救了回来，但因缺乏适当的治疗而于夜间死去。还有谣言说，两名士兵已被阻隔，但是，当起事者发现他们是四川人组成的陆军，而不是人们所仇视的巡防队（从安徽及其他各省招募而来的队伍）之后，便让他们通过。次日，我们到达成都北门外的凤凰山大兵营，受到统领和其他军官们的殷勤接待，他们从那里另派了一支部队护送我们前往省城。在我们的旅途中，我对陆军军官和士兵竭力照顾我们一伙的出色行动，以及所有地方官吏竭力给我们提供一切帮助的友好态度，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表面上，农村似乎是很平静的，正在收割稻子；人们看来很焦急和惊慌，而不是闷闷不乐或喜好闹事的。但是，我们的那位统带在途中接到三件公文，命令他加速前进，因为迫切需要他的士兵。在凤凰山，可以听到西面的炮火声。在省城外面，仍可看见很多有关光绪帝的招贴。”

召回灌县及其他地方驻军一事似乎表明，总督企图在民团和土匪对省城发动总攻击之前，在成都集中他的部队。它不可能意味着西部的一切危险已经消失，因为成都至灌县一线以南地方，在双流至新津之间通往雅州的路上，据说有激烈战斗，迟至昨天还将过山炮送往战斗地点。东南面通往简州的大道，由于官军在龙泉驿获得胜利，现在似乎已经廓清；但是，那些很容易被驱散的民团和土匪（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也是很容易重新组成的，今天畅通的道路或许明天又被堵塞。南面通往江口的路上，据说官军正在焚毁中和场，该处是成都的冬季口岸，而且是保路同志会的一个据点。

16日，有一千五百名士兵自打箭炉到达成都，他们大概是边境上的老兵。双方的伤亡人数是很难估量的，人们估计起事者方面的伤亡为三千人，官军的伤亡大约是该数目的十分之一。有几个人被囚禁起来，这样做的目的只不过是希望得到情报。

成都城内正采取更严密的预防措施，不许任何人登上城墙，该处日夜有人巡逻。敲锣打鼓和燃放鞭炮，都被禁止；制造爆竹的人，决不得把火药卖给任何人。

直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对外国人表示过敌意，但是，根据我的建议，在四善寺避难的人尽量留在他们目前居住的屋子里，那些房屋是很宽敞的，而且从各方面考虑，并不是不舒适的。即使是情况迫使他们在那里继续留住几个星期，他们也不会遭受很大的困苦。

务谨顺谨上 1911年9月18日于成都

第22件附件5 总领事务谨顺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昨天发行的半官方报纸《成都日报》，报道了官军于本月9日在东南路龙泉驿地方击退“土匪达万人以上”。起事者在被击败后重新组织起来，但在简州附近又遭到攻击，并被彻底打垮。“他们有好几名首领被俘，结果自省城至简州的道路现已畅通无阻。”

此事说明，在我上封信中所说的重庆税务司施特劳赫先生派往里奇先生处的那位信差，为什么能够到达此地。它促使我希望，成都至重庆之间的邮政不久可以重新建立起来。

那名信差给我带来了英王陛下驻重庆副领事布朗先生9月12日的一封信，但由于该信是托东门外天主教士白阳神父转交的，所以我没有及时收到，在我昨天的信中未提及它。布朗先生在该

信中告诉我说：“成都的一伙人正分批顺流而下前来此地”。我认为这是指戴维森医生等十七名男人、妇女和儿童组成的一伙人，现在看来这是对的。象我在9月16日信中所说的那样，他们于9月7日早晨离开成都。

不断有谣言说，这一伙人被起事者扣作人质，以要求保全罗纶及其同谋者的性命。我们得到的关于他们的最新消息是，他们已于8日早晨经过江口（该处是流过成都的锦江与岷江汇合的地方）。昨天中午，被朱庆澜统制派遣护送里奇夫人的那两名陆军差弁已经返回，带来了里奇夫人写给她丈夫的一封信以及戴维森医生写给希姆金先生的一封信，该两封信都注明9月10日写于叙府。

毫无疑问，布朗先生已把叙府的情况向您报告。正当戴维森医生一伙人乘坐的船只靠近英王陛下军舰“水鬼”号舷侧的时候，以学生们为首的一群起事者在叙府对知府衙门发动进攻。无论在里奇夫人或戴维森医生的信中，都没有对平山县的情况作任何叙述，该处驻有中国内地会的一位已结婚的教士（巴勒姆先生）。关于嘉定，他们所说的消息是含糊不清的：

“我们于9月9日下午二时左右到达嘉定，发现一切平静，但不能拍发至成都的电报，同时还听说重庆至成都的联系已被切断。我们可以与重庆联系，但没有利用它。……虽然我们在嘉定停留到六点钟为止，但没有得到关于加拿大人的消息。……嘉定邮局职员说，没有邮件寄到。”

因此，我不知道，嘉定的传教士们是否已经离开该城。他们中间有些是加拿大人；但是，我倾向于认为，戴维森医生所说的“没有消息”的那些加拿大人，是指随着他们自成都顺流而下的那一大伙人，而不是指住在嘉定的加拿大人。

关于我所管辖的成都以南地区的其他情况，我没有获得任何

消息。至于仁寿县，谣传该处民团决定支持知县并维持秩序，但我没有收到艾伦医生或住在该处的任何其他传教士的来信。不过，他们似乎很可能已经与嘉定而且通过嘉定与重庆保持联系。我相信，这个意见也适用于荣县，而紫牛城则位于电报线上。

我曾经报告彭县和灌县的所有新教传教士都已抵达成都一事。在彭县以北山区中何八站^①神学堂的天主教士，还没有迁来；就我所知，除了北门外那些很幸运的修女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天主教士前来此地。

在灌县以北岷江流域的眉州^②，有一座中国内地会的教堂，由科茨先生及其夫人和幼子居住。9月4日经过该地的泰克曼先生报告说：那时一切都很平静，如果反抗运动蔓延到岷江流域，科茨先生或许将向北撤往松潘厅，并继续前往甘肃，否则便在附近的一位藏族首领处避难，那位藏族首领是所有外国人都很信任的一位朋友，在他的山寨中，科茨先生将是十分安全的。

在近两周中，我收到了成都北面 and 东北面英国圣公会的某些教堂以及潼川府教友会的来信。我荣幸地附上泰克曼先生对那些信件所作的摘要。

我认为，怀特塞德先生在龙安府所受的攻击，同目前的骚乱无关，或仅有很间接的关系。此事发生在做礼拜的期间，发动攻击的人已被逮捕，他显然是一个疯子，或至少是一个迷信宗教的人。隆昌（位于重庆至紫牛城的途中）所发生的事情则不相同，美国圣公会的曼里先生于本月4日或4日前后在该处受到攻击。就我所知，此事是外国人受到骚扰的唯一事例，所以我提出我的根据（比奇先生9月18日在成都写给我的一封信）如下：

“我们的那位宣教师从简州前来，于星期六到达此地，报告

① 译音。

② 原文误作“威州”。

说，通往资州的道路已完全畅通无阻。他又说：曼里先生在经过隆昌城的时候，遭到一伙人的咒骂，他力图提出抗议，但由于那伙人变得更加蛮横无理，他在那些赶到街上来的警察和官吏们的帮助下逃走了。布雷索斯特女士于7日寄来的信中加上一条消息说：曼里先生受到攻击，已穿过僻道逃走。她没有补充任何其他细节。我判断，此事是4日或5日发生的。”

务谨顺谨上 1911年9月19日于成都

第22件附件6 附近各县来函摘要

9月2日新都来信：本地有势力的士绅会见了汉密尔顿先生，向他保证说，他没有危险。该城现由地方民团驻守。本地人大都是保路同志会的成员。首领们宣称，他们的意图是爱好和平的，可是，他们是否能够在发生骚乱时维持和平，这是令人怀疑的。

9月4日新都来信：刘某之子是本地保路同志会的首领，曾来看望汉密尔顿先生，向他保证说，他没有什么可惧怕的。

9月4日中江县来信：9月3日夜间，发生了一次小的骚乱，警局和税局在骚乱时遭到破坏，但教会房屋未受损害。次日，店铺和城门都关闭，所有警察都调入知县衙门。

9月4日潼川府来信：今天店铺仍然开门，然而鼓动闹事的人极力劝告他们关闭；知府和知县都很担心外国人的安全。

9月5日灌县来信：此地发生一次骚乱，巡警局、厘金局和茶务学堂都在骚乱期间遭到破坏，但教堂未受攻击，传教士把他的幸免归之于本地居民的善意。在一百名陆军到达和事情平息下去之后不久，逮捕了许多暴乱分子和坏人，并予以处决。很久以来，这附近一带是革命分子常常喜欢到达的地方，他们在成都平原进行宣传，当情况对他们不利的时候，他们便撤往山区。目前，学生们和商人们的态度是很忧虑而又坚定的，他们的揭帖显示出

抵抗到底的精神。

9月6日绵州来信：一切平静，地方上对政治事件不很关心。

9月6日绵竹县来信：店铺于9月3日关闭，但后来由于官吏的要求而开门营业。

9月6日德阳来信：店铺于9月2日关门，有很多排外的言论，本地官员说，他没有力量保护外国人。

9月6日中江县来信：9月3日发生骚乱，但未波及教会。

9月6日龙安府来信：一名传教士被一个狂暴分子所击伤，但未发生普遍的骚乱。

9月6日中坝来信：传教士已撤走，但无骚乱发生。

9月11日潼川府来信：同成都的联系已被切断；店铺仍关闭，有各种谣言，但无乱事。保路同志会统治该城，他们发布的公开声明是表示爱好和平的，但他们不允许店主缴付通常的捐税。知府和知县都很尽职。

9月12日德阳来信：商业在停顿了一天之后，于11日重新开市。城内人心极为动摇，有人主张开战。各种无稽的谣言很流行，比方说，官吏已将该省割让给英国人，作为铁路借款的抵押。

9月12日新都来信：该城仍很平静，知县的劲头很足；店铺仍然关门；有各种荒诞的谣言；据说邻近的县城汉州陷入混乱状态，已掌握在起事者手中。

9月16日新都来信：13日，城内突然发生骚动，据说汉州的起事者正前来惩罚新都人，因为新都人对他们态度冷淡。城门立即关闭，城墙上派驻警卫，人们准备了石灰篓，以便对前来进攻者的头部扔去；幸亏开始下大雨，进攻者没有到达。在城北十七里和十五里的唐家寺及向阳场地方，起事者和官军之间发生了小

规模的战斗，在战斗中有三十八名士兵阵亡，好几名负伤；有五名闹事首领被俘获，他们如提供活动情报，便可以保全性命，据说他们是哥老会的成员。

第 23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1年10月30日收到

阁下：

我在最近几天发出的那些电报，已使您了解到武昌情况的重大发展以及清政府为应付近几年间遇到的最严重危机所采取的措施。

过去若干时候以来，人们已经预见到汉口动乱的迹象。大家知道，驻在该处的清军第八镇纪律很差，而且士兵中存在着很大的不满情绪。大约由两千人组成的两标^①军队已被派往四川，而在其余的士兵中常有逃亡及不服从命令的举动。9月30日，英国代总领事根据武昌美国教会的情报，电告清军即将发生兵变，但这个谣言显然没有得到证实。然而，10月3日，葛福先生写信给驻上海的海军高级军官，申述他认为在今后若干时间内宜对汉口提供海军援助的理由。我知道，他的请求得到了总司令官的赞同。

据我从葛福先生处获悉的消息，本月9日下午在汉口俄租界内发现有革命党人进行活动，次晨在总督衙门前面处决了三、四名。接着，11日有消息说：武昌完全处于革命状态；衙门均被焚毁；总督在靠近英国炮舰停泊的一艘中国巡洋舰上避难，已通知各国领事说，他不能保护外国人，并要求英王陛下军舰提供帮助，阻止起义军渡江。

① “标”相当于“团”。

我收到此项消息后，立即请求海军总司令官对汉口尽量提供援助，总司令官阁下欣然同意了请求。

由于收到这些惊人的报告，从而在北京引起了很大的恐慌。北京方面发布了一系列的谕旨，反映朝廷在运动的各个发展阶段的情绪。我附上这些谕旨的副本。瑞澂是驻武昌的总督，也是担任地方官职的最能干的满族人，起初被嘉奖为行动敏捷，顺利地“将革命扼杀于萌芽之中”，仅一天之后便因为他疏忽大意和严重失职而受到严厉的申饬和革职处分。

北洋军队两镇奉命在陆军大臣蔺昌率领下开往湖北，蔺昌的军事经验是从德奥两国获得的。

与此同时，曾在英国海军中服役的水师提督萨镇冰，奉命率领他指挥下的全部海军力量，协同收复那座起义的城市。由于革命已蔓延到附近的城市汉阳和汉口，而且对兵工厂和铁厂的占领使起义军握有大量的军事物资供应，所以清军面临的任務日益困难，这一点很快就变得很明显了。运动进行的方式有条不紊以及对外国利益所表现出来的显著尊重，使得它同以前所有此类起事区别开来，并且在中国人中间获得了对它的一定程度的同情，而满清朝廷再也不能声称享有这种同情了。

据说，起义军统帅黎元洪是一位很聪明的人，他会说英语，并在国外有一些经历。他通知驻汉口的各国领事说：他已组成政府，该政府将尊重同列强缔订的现存条约和合同，只要列强不对满清政府提供帮助，便保证对所有外国人给予充分的保护。英国代总领事没有理睬这项通知，他奉命除了为保护英国人生命财产所绝对必需的情况之外，不得与起义者保持任何联系。

清政府指示萨镇冰提督炮轰武昌的训令，似乎在汉口引起了很大的不安，首席领事致电外交团建议说，应命令萨镇冰提督在采取军事行动时，必须把外国租界所遭受的危险减少到最低限

度。如果这一点不是切实可行的，唯一可供选择的办法则是撤出租界；果真如此，各国领事要求他事前应尽早通知。本月14日，在本使馆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我的同事们授权我就这个问题与外务部进行交涉，结果是：我从大臣们那里得到了各国领事所建议获得的一项保证。

我在10月14日的电报中，已经详尽地说明在拟对武昌进行炮击期间总司令官宜亲临汉口的理由。我很高兴地报告您：我已收到海军中将温思乐的一份电报说，他预计大约于明天（10月17日）中午抵达汉口。

在这期间，订于10月17日及以后三天内举行的秋操，一切准备工作均已完成，现已被取消，并为派遣两镇军队前往汉口匆忙作出安排。对其中之一第六镇，人们不是完全没有疑虑的，象盛宣怀这样的负责官员对该镇是否愿意参加内战一事，毫不犹豫地表示怀疑。接着，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事件，它说明摄政王及其政府已陷入绝境，并且把他们的弱点暴露给怀有不满情绪的全国人民。两年前很不体面地被革职而且几乎不得不逃命的袁世凯，重新恢复了职务，并接到挽救帝国的明确请求。我随信附上包含这项屈辱决定的谕旨。

我从外务部获悉：在采取此项措施之前，已得到袁世凯的同意，他大概相信他有能力实现授与他的这项吃力不讨好的任务。他的名声在清军中间，特别是在第六镇中，有很大的影响，该镇仍然珍藏着他的肖像。他的忠诚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清政府对任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准备很差。人们认为部队缺乏军火；在过去几天中，已尽一切努力为作战筹集款项。

作为对中国新军进行估价的一项重要评论，可以提及的是：在南京，受过洋操训练的部队已被收缴武器，由八千名旧武部队代替他们的职责。

一般的舆论认为，目前的乱事将被镇压下去，但满清王朝所面临的前景是黯淡的。它在本国人民中间，很不得人心；它最近处理的好几个涉及外国人的问题，表现出狭隘的观点以及对侵犯它的所谓主权的疑忌，从而阻碍了所有的事业。

谷物歉收威胁到大半个帝国，扬子江流域到处充满了无家可归和嗷嗷待哺的人群。

朱尔典谨上 1911年10月16日于北京

第24件 海军部致外交部函

1911年10月30日收到

先生：

我奉海军部各长官之命，送上驻华总司令官本月30日关于中国局势问题的一份电报的副本，供外交大臣参考。

格林谨上 1911年10月30日于海军部

第24件的附件 驻华总司令官致海军部电

1911年10月30日经上海转发

清军于今日下午二时进入汉口，在逐出起义军后，便纵火烧城。

今天，在英租界西端的华人居住区内，进行了激烈战斗。

第25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1年10月30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今晚发布的那些上谕，其主要内容将于明天见报，读起来好象是它们作孤注一掷的努力，以挽救皇位和朝廷；除非全国坚持驱逐满族人，它们的目的也许可以达到。它们对民族主义分子的要求彻底投降，并且完全赦免起义者，以致人们感到，它们是同

资政院中民族主义运动的首领们商议后草成的。在对履行谕旨提供适当担保的情况下，那些首领们可以促使各省接受那些谕旨。

如果那些谕旨未能实现，而且起义继续进行下去，结果很可能是朝廷的垮台。

第 26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1年10月31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关于革命。京津铁路问题。

为了保持与海上的联系畅通无阻，也许随时有必要保卫铁路，因为此地和天津的形势日益危急。我认为，我们有理由为了这个目的而使用英国军队，并且我相信您是赞成的。

第 27 件 格雷爵士致朱尔典爵士电

1911年11月1日发自外交部

关于您10月31日电报中所说的中国革命问题。

我同意您的意见，但我认为，您应同那些在华北驻有军队的各国同僚采取一致行动。

第 28 件 海军部致外交部函

1911年11月2日收到

先生：

我奉海军部各长官之命，送上驻华总司令官本月1日关于中国情况的一份电报的副本，供外交大臣参考。

格林谨上 1911年11月2日于海军部

第28件的附件 驻华总司令官致海军部电

1911年11月1日发^①，次日收到

今天没有发生任何重要的事情。

清方炮击汉阳，而且他们的军队在汉口城内进行扫荡。英国停泊在武昌及九江下游的船只，有时遭到起义军的袭击。那位奉命乘坐军舰去访问起义军首领的领事馆官员报告说：该首领曾经说明，他仅希望阻止载运煤炭、军火等物以供清方使用的中国船只通行；他又说，英国船只在夜间不应试图通过革命党人控制的地方。据说，清方拟炮轰汉阳炮台，但正等候较大的榴弹炮运到。据涑口兵营报道，新任总督已经到达。

第29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1年11月2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关于我10月29日的电报。

今晚，谕旨按照滦州哗变部队的要求，把起草宪法一事交给资政院办理。

袁世凯奉命立即前来北京。

第30件 外交部致陆军部函

先生：

我奉本部大臣格雷爵士之命，将英王陛下驻北京公使关于该处目前形势问题的一份电报^②的副本，随信送给您，以便提交陆军部。

陆军部将从审阅朱尔典爵士的电报中看出，中国京城的事态

① 原件未注明发报地点。

② 原编者注：本书第26件。

正在日趋恶化，而且很可能需要英国军队保卫北京与沿海之间的铁路线。格雷爵士感到抱歉的是，在局势稍有一些进展之前，他不可能说明皇家英尼司吉林明火枪团必须在华北停留多长的时间。

坎贝尔谨上 1911年11月2日于外交部

第 31 件 海军部致外交部函

1911年11月3日收到

先生：

我奉海军部各长官之命，送上驻华总司令官本月3日关于中国情况的一份电报的副本，供外交大臣参考。

格林谨上 1911年11月3日于海军部

第 31 件的附件 驻华总司令官致海军部电

1911年11月3日发^①

据说，上海的形势是很危急的。

我们不能从沿江其他口岸抽调船舰，以保护上海各国租界。无论发生什么情况，这些租界都太广阔，以致我们不可能派遣足以保护它们的部队登陆。如果该城遭到焚掠，那将是非常不幸的。

我建议，应与美、日、德、法等其他各有关国家政府就此问题进行磋商。各国政府派遣少量部队，便可以保证该城的安全。

如果此地的起义军被镇压下去，人们可以预料到，周围农村的骚乱将继续进行几个月。

建议每个国家派遣步兵一千五百人，携带若干小炮。

日本和德国的舰队司令正致电各该国政府，进行类似的联系。

^① 原件未注明发报地点。

第32件 海军部致外交部函

1911年11月4日收到

先生：

我奉海军部各长官之命，送上驻华总司令官本月3日关于中国局势的一份电报的副本，供外交大臣参考。

格林谨上 1911年11月4日于海军部

第32件的附件 驻华总司令官致海军部电

1911年11月3日经上海转发

汉口城仍在焚烧。好几天以来，没有发生值得提及的战斗。我知道，总督与起义军首领们互有信件往来。

第33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1年11月4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昨天，起义军政府通知英王陛下总领事说：他们已经占领上海，请求他在维持租界秩序方面给予合作。直到现在为止，没有发生骚乱，但今天下午，有三、四十名起义军进入沪宁路车站，该处与租界地区毗连，似将发生骚动。在该铁路总办的请求下，总领事已授权志愿兵占领车站。

我已经给他发出如下的电报：

“我批准您授权占领火车站的行动。

该路已经抵押给英国的债券持有者，所以我认为，您有理由采取您能够采取的一切办法，坚持该路必须作为一个纯粹的商业机构，按照中立的铁路进行经营管理。比方说，我认为，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得利用该路运送军队或军火。

根据我的请求，中英公司的经理人已指示该路总办暂时按照

您的命令行事；您应向双方说明：我们的行动完全是不偏不倚的，而且仅企图维护一个其中具有大量英国资本的企业，以及保护附近公共租界中英国人的生命财产。”

第34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1年11月5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关于我11月4日的电报。

昨天，上海总领事报告说：吴淞炮台和上海城已经和平地落入起义军手中，制造局经过一些抵抗后也已被他们占领。租界平静无事。当革命军首领们一旦提供一支显然有组织的队伍保护车站时，志愿兵便将撤出车站。他们保证，只要铁路不替任何一方运送军队及军火，便不干涉该路的营业和收入。谣传两江总督将派兵乘火车前往收复上海。

外务部根据我的请求，向两江总督发出紧急电令，要他不得利用铁路运输军队或采取任何可能在上海或其附近一带引起冲突的行动。驻南京领事已奉命按照这个意思向总督阁下提出紧急抗议。

我已经告诉总领事说：现在正考虑禁止在铁路全线运兵等问题，而为了达到此项目的，我们将不得不行使有效的监督；我认为，无论如何，在总督的意图宣布之前，火车站应由志愿兵或英国海军部队继续进行占领。

第35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1年11月6日收到

阁下：

关于我本月14日的电报，我荣幸地报告说：本月13日夜间，我收到汉口首席领事的一份电报，要求外交团向外务部提出紧急抗议，目的是要外务部指示驻汉口的中国海军统帅萨镇冰提督，

在炮轰武昌时设法避免使外国租界遭受一切危险。据说，当萨镇冰提督到达时，日本舰队司令将按照这个意思向他提出一项要求。如果这项要求遭到拒绝，领事团建议，作为最后的一项选择办法，他们应给予时间，以便撤出租界。

我于14日与我的同事们会商后，根据他们授予我的权力，向外务部大臣们提出了上述关于炮轰武昌行动的意见书。大臣们答复说，萨镇冰提督当然会尽量采取预防措施，但他们将要求海军部，按照外交团所希望的意思，向萨镇冰提督发出指示。我于10月17日获悉，那些指示已经及时地电告萨镇冰提督，但当他到达而未获得北京的指示时，便已向日本舰队司令保证说，他准备考虑领事团的愿望。

朱尔典谨上 1911年10月20日于北京

第36件 海军部致外交部函

1911年11月6日收到

先生：

我奉海军部各长官之命，送上驻华总司令官本月5日关于中国局势的一份电报的副本，以供外交大臣参考。

格林谨上 1911年11月6日于海军部

第36件的附件 驻华总司令官致海军部电

1911年11月5日经上海转发

上海总领事收到的信件说：起义军正在接管上海的行政机构；他们将保护外国人。该信接着询问说：由于租界如此广阔，总领事是否将为租界的安全采取措施。

据报道，上海城内于昨晚发生骚乱，警署已被焚烧。有人说，江南制造局已被占领。

起义军在汉口下游五英里处的长江南岸建立了炮台。他们还占领了九江和马当山炮台。他们对夜间沿江行驶的每艘船只开炮；一艘日本船曾经遭到炮击，因为它被怀疑载有中国官员。

我收到沿海各条约口岸的领事们提出派驻军舰的请求。然而，在汉口继续发生动乱期间，不可能同意这些请求。

第37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1年11月6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关于革命。

由于上海显然是起义军政府中央机构的总部所在地，所以对保护租界一事似乎提供了一项令人满意的保证。总部所设的办事处，已被好几位显要官员及有影响的中國居民所承认。这样，或许终于给列强提供了一个对运动施加影响的机会。

一座座城市不声不响地落入起义军手中；目前，举国似乎都不愿赞同资政院在朝廷与人民之间进行调解的企图。

交给袁世凯的任务，显然不是很有希望的。

第38件 格雷爵士致朱尔典爵士电

1911年11月6日发自外交部

关于您11月4日的电报。

如果您能够按照所拟议的方式，安排沪宁铁路的中立化，我将完全批准。

第39件 海军部致外交部函

1911年11月7日收到

先生：

我奉海军部各大臣之命，随信附上驻华总司令官今天拍发的

一份电报的副本，以供外交大臣参考。总司令官的电报是接着他本月3日关于拟派部队前往上海的那份电报发来的，那份电报当天便已送交给您。本部各大臣认为，鉴于总司令官的电报，部队应在香港奉命待发，并准备好运输船只，以便当发现有必要从舰队派兵登陆时，他们可以立即被派往上海，去替换那些士兵。因此，在部队到达以前，只有在迫切需要的情况下才派兵登陆。如果格雷爵士同意这项建议，本部各大臣将乐于获悉。

格林谨上 1911年11月7日于海军部

第39件的附件 驻华总司令官致海军部电

1911年11月7日发①

上海吴淞炮台已被起义军占领，他们把制造局的武器弹药分配给追随他们的人。此事肯定会引起麻烦。我相信，人们很快就会提出派兵登陆的请求；美国和法国军舰已派特遣部队登陆。如果从我们的巡洋舰上派兵登陆，舰队就将无法使用。我很乐于了解海军部关于此事的愿望；在收到答复之前，我已命令“孟茅斯”号军舰留驻吴淞。革命显然正在迅速蔓延。

第40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1年11月7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关于我11月5日的电报。

上海的形势问题。

火车站已经交还给起义军；如果重新占领并守住火车站，将需要一支超过现在所使用的部队。清政府很想保持该路的中立，但要求保证起义军不得利用该路运送军队或军火。保证不是切实

① 原件未注明发报地点。

可行的，但该路总办正尽力防止违反中立。

道台已离开他在上海城内的住所，希望在外国租界提供的保护下履行他的职责。我认为：现在，领事们必须把革命军当做实际控制局势的人来加以对待，但是，不得允许取代清政府的起义者以任何方式影响公共租界关于不受任何中国官员干预的地位；我们应规定，起义军政府不得动用任何款项，如海关岁入，它已被指定用来偿还外债。在外交团作出决定之前，我已把上述意思指示英王陛下总领事。

我个人认为，任何以武力改变目前租界管理办法的企图，都应遭到各国对租界的军事占领，尽管我希望不致发生采取这一步骤的情况。

第41件 格雷爵士致朱尔典爵士电

1911年11月7日发自外交部

由于总司令官在他的电报中显然考虑到，人们不久就将提出派兵在上海登陆的要求，同时由于从舰队派兵登陆将使舰队失去作用，所以海军部认为，应使部队在香港做好替换水兵的准备，那些水兵遇有紧急需要时将暂时登陆。鉴于此事十分急迫，我已经同意这项建议，但我将很高兴地获悉您的意见。

第42件 外交部致海军部函

先生：

我奉外交大臣格雷爵士之命，告诉您本月7日来信已收到，并且为了供海军部各大臣参考起见，说明他同意此项建议，即部队应在香港奉命待发，并准备好运输船只，以便当发现有必要从舰队派兵登陆时，他们可以立即被派往上海，去替换那些士兵，而在他们到达以前，只有在迫切需要的情况下才派兵登陆。

我已电告英王陛下驻北京公使说，由于情况急迫，格雷爵士已表示同意此事，但要求他提供意见。

坎贝尔谨上 1911年11月8日于外交部

第43件 格雷爵士致朱尔典爵士电

1911年11月8日发自外交部

上海的形势问题。

关于您11月7日的电报。

您的行动和政策，经我全部批准。

第44件 海军部致外交部函

1911年11月9日收到

先生：

我奉海军部各长官之命，送上驻华总司令官本月9日关于中国起义的一份电报的副本，以供外交大臣参考。

格林谨上 1911年11月9日于海军部

第44件的附件 驻华总司令官致海军部电

1911年11月9日发

革命党人到处获得胜利。清方已向他们的首领提出建议，按照他自己的条件进行议和及赦免。北京政府发出指示说：南京应向起义军投降。

由于最近十天内没有发生严重战斗，而且各店铺已重新营业，我似乎没有必要再继续留在此地。

因此，我建议，在征得朱尔典爵士的同意后，于11月11日离

① 原件未注明发报地点。

开这里。德国舰队司令也已经决定于那一天离去。

第45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1年11月9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南京发生的战斗，未分胜负；外国人均已离去。广州已宣布支持新政府。总督逃入总领事馆，乘英王陛下军舰“灵巧”号前往香港。没有发生战事。

福州经过激烈战斗后，已于今晨收复。

起义军占领了太原府与京汉铁路的交叉处，从而切断了袁世凯军与北京的联系。在太原府的所有外国人均平安无恙。

清军为了保卫天津城，已获准临时占领天津各国租界周围二十华里以内的地方。滦州叛兵的统帅张绍曾要求享有类似的特权，但已被领事团所拒绝。邮传部禁止铁路总办为张绍曾的部队提供列车；据说他们正向北京进发。

预料天津方面将随时倒向他们那一边。

第46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1年11月9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英、日、法三国驻天津指挥官为了保持封河以前北京与天津之间的交通，于本月7日商定了一项计划。鉴于天津事态的发展，三国使节于今天指示那些指挥官们：当他们一旦有理由相信有人显然企图破坏铁路时，便将该计划立即付诸实现。该计划并不包含各国的占领在内。我们曾经与俄、德、美、意等国公使磋商，并把情况通知他们。

第47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1年11月10日收到

阁下：

由于电报线路不经常畅通，邮政业务中断，以及由此造成的汉口代总领事的函电无法递到，所以我从本月16日写信后的一周内，对该处事态的发展很难形成一个明确的意见。直到今天为止，官方没有向公众发表关于军事行动的消息，但今晨的北京《每日新闻》上载有一段短讯，据该短讯说：在距汉口几英里的铁路线上，麇昌将军统率的清军与起义军之间于10月18日发生冲突；经过三天的小规模战斗，萨镇冰提督的炮舰似乎已参加作战，结果是所谓清军大捷。然而，这个报道被其他方面传来的消息打了很大的折扣。瑞澂总督和萨镇冰提督的一份电报说明：在战斗结束时，清军处于很不稳固的地位。象人们所知道的那样，他们于第二天被迫撤至铁路线北面很远的阵地，同时清朝的小舰队也退往下游。我通过无线电报从汉口收到的这个消息，在起义军方面自然产生了极为兴奋的情绪。该无线电报是温思乐爵士根据我的建议在汉口与九江之间建立的。局势中的一个严重因素是北方的军队拒绝作战，除非目前正在途中的援军士气超过前沿部队的士气，清军所面临的将不很轻松，而他们的优势兵力本来是会使这项任务变得轻松愉快的。

陆军上校⁽¹⁾韦乐沛和自日本来华作短期访问的海军上校布朗里格爵士，最近曾企图前往汉口，但行至离汉口约一百三十三英里铁路线上的河南信阳地方，便不能继续前进。现在，他们已取海道前往长江一带。

在这期间，来自其他各省的消息不是那么令人满意的。

在南京，由于完全解除了新军的武装，从而恰好关键时刻挽救了局势，但该地的情绪，正如中南部各省其他地方一样，是完全

(1) 有些文件作“陆军中校”，如《中国第三号(1912年)》第23件及附件。

倒向起义军方面的，这次起义被认为是反抗暴政和压迫的群众运动。

目前，安徽是平静的，但英王陛下驻芜湖领事报告说：本地担心逃荒的饥民闹事，而且地方官员对革命抱有同情，他们很可能正等待着事态的变化，以表明自己的态度。10月22日，葛福先生报告说，长沙和宜昌都已落入革命党人手中。此事已被通过清朝海关得到的消息所证实。该两个口岸都没有发生暴动，但我知道，如果发生骚乱，外国人上将集中在海关税务司的房屋内。葛福先生还很简略地提到革命军首领已将“战时违禁品通知各国领事”，并且询问他是否可以就这些事情与革命军首领进行联系。我回答说：据我看来，如果不注意该通知或许会危害英国臣民的安全或合法利益，那么，葛福先生便有理由向起义军首领提供这些保证，因为起义军首领在该城市建立的事实上的政府使他暂时能够强制实行。

皇帝的谕旨，以惊人的速度一个接着一个地发布出来，现附上其中的两个谕旨。但是，这些谕旨暴露出一种软弱和紧张的情绪，它不是企图激发人们对清政府的信任的。虽然袁世凯已被任命为湖广总督，而且长江地区的水陆军队都已暂时置于他的控制之下，但满族统治集团显然害怕把便宜行事的权力交给他，而只有这种权力才使他能够迅速应付局势。

我荣幸地送呈袁世凯上皇帝奏折的译文，他在奏折中恳求：在接受新的任命之前，给予时间以恢复他的健康。

朱尔典谨上 1911年10月23日于北京

再者：今天，我收到汉口代总领事的来信及其附件，现将该信附上。我没有把葛福先生所附的新闻报道送呈，但自称中华民国鄂军统帅的黎元洪所发布的那个通告，包含着对起义军的目的和政策所作的一个有趣的说明。

朱尔典又及 10月25日

第47件附件4 代总领事葛福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我发出的那些电报，想已使您获悉此间革命运动的进展；现将本地的几份报纸附上，它们对整个事件作了详尽的报道。我还把我收到的革命军首领来信的译文一并附上，该信通知我关于建立民国一事。

革命军正在武汉三镇维持秩序，但城外简直是暴民的统治。中国人惊恐万状，逃向各方；包租轮船前往上海的费用十分高昂；由于缺乏苦力，商业几乎陷于停顿；洋行感到的最大困难，在于诱劝中国雇员继续留在该处。由于外国银行从上海获得大量的银元供应，其中第一批运来的银元已经收到，所以最初极为严重的金融情况，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有所缓和。现在人们使用湖北军政府的纸币及大清银行钞票，但不能兑换白银；革命军首领还从武昌运来若干当十铜元。

革命军正在迅速地招募新兵，但我从可靠方面获悉，他们仅有五千名受过训练的士兵；有人告诉我，这些受过训练的士兵装备精良，而且有很好的军官。大约有四百名忠于清朝的军队同最近自长沙到达的一些士兵一起，在十公里处挖掘壕沟，他们在该处得到萨镇冰提督所率炮舰的某种程度的支持。统制张彪同这些士兵们在一起。据说，今天下午有大批忠于清朝的部队自河南到达；由于人们都知道革命军已自汉口出动，可以预计不久将在那里发生战事。

我们同那些携带武器进入租界的革命军发生许多纠纷，但此事正在与革命军首领间接进行商议，该首领在写给我的五、六封信中，相当详细地谈论到关于中立的问题。昨天，在靠近海关署的堤岸上，严格说来并非在租界内，革命军枪毙了一个人；今天，

革命军首领写给我一封信，对此事的发生表示歉意。

总督及其僚属驻在一艘炮舰上，泊于十公里处附近的地方。萨镇冰提督抱怨说：在他的军舰中，有一艘因此不能发挥作用。革命军占领了电报局，大部分报务员均已逃走；然而，外国监督为发送所有领事的电报作了安排，但他要求电文须尽量简短。同上海的电报联系已经中断，但军舰可通过无线电报与青岛和香港联系。

外国人没有受到骚扰，几乎所有的传教士都已迁入租界。有少数几个人坚持留在他们的职位上，以照料他们的财产，并且使那些中国人感到放心。

有下列军舰停泊在这个港口：

英国：英王陛下军舰“薊”号、“不列颠市场”号、“森林云雀”号、“山鹑”号、“夜莺”号。

美国：“黑勒那”号、“爱克洛”号、“威拉罗博司”号。

法国：“决心”号。

德国：“老虎”号、“祖国”号。

日本：“对马岛”号、“隅田”号。

“敏捷”号和“利普西”号可望于明日到达。

葛福谨上 1911年10月16日于汉口

第48件 海军部致外交部函

1911年11月10日收到

先生：

我奉海军部各大臣之命，将发给驻香港高级海军军官的一份电报的副本随信附上，以供外交大臣参考。该电也发给了驻华总司令官，是关于使部队在香港做好准备，以便必要时派往上海的。

格林谨上 1911年11月10日于海军部

第48件的附件 海军部致香港高级海军军官电

1911年11月9日发自海军部

陆军当局正在使下列部队在香港做好准备，以便当需要他们时立即派往上海：

工兵……………40人
炮兵……………80人
英国步兵……………350人
土著步兵^① ……150人

他们配备速射机关枪四挺及相同数量的过山炮。

须与陆军当局一起作好安排，以便在需要时，一接到通知便立即派部队出发，并提供必要的运输工具。

第49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1年11月10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保卫上海租界问题。

关于您11月7日的电报。

我已经同英王陛下驻上海总领事磋商，同意他在下述来电中所表示的意见：

“据我看来，革命军首领们蓄意干预租界之事是未必可能的。

外国派兵登陆占领租界一事对中国人的激怒，要比泊驻一艘或几艘军舰更大，它将起很大的恐吓作用。

我不认为采取派兵登陆的步骤是必要的，至少是没有立即采取这个步骤的必要，但马上派一艘最大的军舰或几艘军舰，是最合乎需要的。

^① 参阅本书第50件，“土著步兵”指印度籍步兵。

我已将此电发给舰队司令温思乐。”

第50件 格雷爵士致朱尔典爵士电

1911年11月10日发自外交部

关于我11月7日的电报。

下列部队正在香港做好准备，以便需要时立即派往上海：英国步兵350名，印度土著步兵150名，炮兵80名，工兵40名，配备四尊过山炮和四挺速射机关枪。

驻香港的舰队司令已获得训令，接到通知后立即安排运输船只。两连印度土著步兵在香港做好准备，以便需要时开赴广州。

第51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1年11月12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袁世凯可望于明天清晨到达一事，对此地的局势产生了令人感到放心的效果。然而，清朝在各省的权力几乎已失去作用，而且奉天省谘议局准备宣布赞成共和的消息，是对满族人的一个严重打击。现在，满族人的唯一希望，在于袁世凯和资政院能够使各省相信：与其出现许多没有任何共同联系的政治实体，不如保留满清王朝作为名义上的首领。我知道，资政院派往汉口、上海和其他革命中心的那些代表，没有受到热烈的欢迎。

满清王大臣向我保证，北京绝不会发生任何大屠杀，但鉴于南京已经发生的事件，对此项保证必须有保留的接受：我认为，遇有必要时，外交团有理由进行干涉，以防止此类悲惨的暴行。

第52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1年11月13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关于沪宁铁路问题。

昨天，上海总领事发来如下的电报：

“现在，革命军毫无疑问地占有沪宁铁路所经过的全部地区。那些在旧式军队的指挥官支配之下的清朝官员们被围困在南京。我冒昧地指出，继续禁止革命军利用该路运输军队和军火一事，将有利于清朝当局。由于清军在类似情况下将不会遵守禁令，难道不可以将该禁令限制在上海终点站？租界附近十英里以内地区的中立化既然足以避免发生纠纷，难道不可以允许在南翔以外地方用火车运载？要不然，如果革命军中的好战分子不遵守禁令，而此事是很有可能的，那或许会发生严重冲突。”

第 53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1 年 11 月 13 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沪宁铁路问题。

关于我今天的电报。

今天，我对法磊斯先生的来电作了如下的答复：

“由于革命军毫无疑问地占有铁路地区，我授权您同意他们使用该铁路，照我答复您的那份来电中所拟办法加以限制。不过，我认为，铁路总办在一份正式抗议书中载明他系迫不得已采取此种行动，那将是可取的。革命军所用的全部运输车辆应继续由他按照纯商务事件处理。

我知道，为了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已在汇丰银行开立了一个特别帐户，铁路进款均存入该银行。”

第 54 件 窦尔慈领事致格雷爵士电

1911 年 11 月 14 日发自汕头，同日收到

来自广州的革命军，于 11 月 10 日和 11 日分别占领了汕头和

潮州，没有遭到抵抗。

一位中国血统的美国公民是本地革命组织的首领，他作为中国共和政府的代表，已宣布承担汕头行政管理事宜。

第 55 件 格雷爵士致朱尔典爵士电

1911年11月15日发自外交部

您11月13日来电中谈及沪宁铁路问题。

我批准您给总领事的指示。

第 56 件 印度部致外交部函

1911年11月15日发自印度部，同日收到

印度部副大臣向外交部副大臣谨致问候，并将印度总督于1911年11月3日及14日发来的关于云南革命的那些电报的副本随信送上，供外交大臣参考。

第 56 件附件 1 印度政府致印度部大臣电

1911年11月3日发

关于中国革命。

我们抄录缅甸政府本月2日发来的下述电报，以供参考：

“云南府总领事报告说，革命军已占领腾越。八莫的中国商人证实了此项报告。驻腾越领事史密斯先生已经抵达肩苗，当他离开腾越的时候，他没有听说关于革命的消息，而且未预料到有骚乱发生。他将立即经八莫返回腾越。”

第 56 件附件 2 印度政府致印度部大臣电

1911年11月14日发

关于云南革命。

我们收到了缅甸政府于本月13日发来的下述两份电报：

1.“我们已经收到驻云南府总领事于本月7日经河内发来的两份电报。上月30日和本月3日自八莫发出的电报，他似乎没有收到。该总领事在他的第一份电报中说，临时政府已获得消息，普洱宣布效忠于该政府；他又说，革命军几乎控制了云南全省。他的第二份电报的措词如下：

‘此地盛传腾越领事馆已被抢劫和捣毁，英国军队正开往腾越。请说明此事是否属实。由于此地外国人的地位极不安全，所以了解此事是很重要的。新政府很想拘留从云南逃入缅甸的难民，无论他们是军人或是其他的人。’

我们通知总领事说：英国军队没有开往腾越；现在领事正从八莫返回腾越；腾越出现无政府状态；所有的外国人均已来到缅甸。”

2.“八莫得到消息说，革命军于上月30日和本月3日占领了龙陵及永川。腾越税务司豪厄尔于11月11日抵达八莫，打算立即返回腾越。他说：腾越处于无政府状态，数百名难民逃入八莫。据他报告，腾越的所有银行都已关闭，革命军的经费已经告罄。他们仅靠发行纸币支付军饷，而纸币是没有人愿意接受的。豪厄尔预料：不久将继续发生骚乱，掌权的人无力控制人民。”

第57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1年11月15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关于我11月12日的电报。

明天，外交团将就清军所犯暴行向清政府提出强烈抗议；驻上海和汉口的领事们也将接到训令，对革命军的所作所为提出类似的抗议。

袁世凯已经证实满族诸亲王提出的那些保证，即北京将不会

发生大屠杀事件。

第58件 格雷爵士致朱尔典电

1911年11月15日发自外交部

关于您11月12日的电报。

我们对袁世凯怀有很友好的感情和敬意。我们希望看到，作为革命的一个结果，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与各国公正交往，并维持内部秩序和有利条件，使在中国建立起来的贸易获得进展。这样一个政府将得到我们能够提供的一切外交上的支持。

第59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1年11月17日收到

阁下：

关于我本月26日的电报，我荣幸地随信奉摄政王将盛宣怀革职并永不叙用的一道谕旨的副本。资政院请求发布该谕旨的奏折，也一并附上；仔细阅读这个奏折，将使人很少怀疑那些撰稿人对清政府铁路政策所抱的态度。资政院声称，按照宪法的程序，此事应提交该院处理。毫无疑问，事情是应当如此办理的，但结果将会使目前的混乱状态继续存在下去。

该谕旨是由庆亲王、那桐和徐世昌签署的，他们在宣告将他们的同僚盛宣怀革职永不叙用的同时，给予他们自己交部议处的名义上的处分。大约从去年以来，盛宣怀宫保作为铁路政策的倡导者，在能力上大大超过了衰弱不堪的北京政府中的所有成员，他深思熟虑地采取该政策作为维护国家生存的一项重要条件。他以勇敢无畏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对待各省的反抗风潮，这种精神对任何国家中象他这样年老体弱的人都会带来荣誉。

盛宣怀似乎丝毫没有想到，成为资政院中吵吵嚷嚷而又不明真相的辩论主题的弹劾案，竟使他垮台，但他以东方人特有的镇静接受这个打击，并在夜间整理他的文件准备离去。然而，第二天，事态发生了更严重的变化。资政院中散发了一份书面决议，请求朝廷下令将那位年迈的大臣立即处决。美国代办促使我注意到此事。他说，盛宣怀希望四国公使在他需要的时刻提供保护；他并建议，我作为首席公使，应立即召集一次会议考虑这个问题。我不失时机地照此办理，结果我们一致决定去见庆亲王，并通知他说：我们对这件事情极为关注，不能够允许清政府对盛宣怀进行任何伤害。

庆亲王在阅读该决议后指出：那天早晨，有位御史递给朝廷一份奏折，提出了类似的要求，但摄政王认为对盛宣怀已经给予足够的处罚，所以拒绝考虑该项要求。他向我们保证，对盛宣怀不再施加更重的惩罚，并答应致函资政院总裁撤销该项决议。

在谈话过程中，庆亲王表现出很想给我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即清政府对铁路问题的政策继续保持不变，但他必定已经了解，这个说明很难使我们轻易相信。

我们告诉亲王殿下说：清政府既然愿意接受资政院提出的关于将盛宣怀革职的建议，所以使我们担心它或许同意处决盛宣怀的那个意见。当我们获悉清政府无意采取这一野蛮行动的时候，我们表示感到欣慰。

盛宣怀决定立即经青岛前往上海。因为他担心受到革命军的攻击，所以四国使馆各派两名士兵作为他的卫队，并由美英两国使馆的汉文秘书丁家立博士和巴尔敦先生陪同前往天津。

朱尔典谨上 1911年10月28日于北京

第60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1年11月17日收到

阁下：

关于我本月14日的电报，我荣幸地随信奉上本月27日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处理革命危机的那道谕旨的译文。同一天另有谕旨，将陆军大臣蔺昌召回北京，第一军的指挥权交给冯国璋将军，而第二军的指挥权则授予段祺瑞将军，他们两人在前些年都和袁世凯有密切的联系。

关于袁世凯的活动，此地不知道任何确切消息，但普遍的印象是他在近几天内将动身前往汉口。他的任务虽然带有军事的性质，但人们却认为是调解性质的。他的威信或许可能使他能够安排某种妥协，即将挽救朝廷，又将满足起义者的要求。运动已发展到如此广阔的范围，对袁世凯这样一个具有实际见识的人来说，任何以武力镇压运动的企图大概不会具有很大的成功希望。

在中国人民与满清王朝之间，没有任何人能够比袁世凯更适于充当调停者的角色，因为他是中国人民中最受信任的代表，而他和他的家族有好几代人为清朝效劳。

朱尔典谨上 1911年10月30日于北京

第61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1年11月17日收到

阁下：

关于我本月23日的那封信，我荣幸地随信奉上英国驻汉口代总领事来函的副本，该函对截至本月20日为止的革命运动作了说明，我没有必要对此加以详述。

清军撤离他们在十公里处的阵地以及萨镇冰提督率领他的小

舰队退往下游，使革命军精神振奋，并且无疑地有助于后来长江其他口岸的叛离。

20日以后，战争似乎已暂时停止下来。起义军驻守十公里处，而清军则占领漫口和七里沟的桥梁。武汉三镇秩序井然，而且平静无事；起义军招募了许多新兵。26日，清军方面有向前推进的某些迹象；第二天，他们重新占领了十公里处，并夺得该地守军所遗弃的大炮及露营装备。同时，萨镇冰提督也再度出现，并且宣布他打算于次日下午炮轰武昌和汉阳。这个威胁没有付诸实现，但是，正如我在10月29日的电报中所报告的那样，28日在租界附近发生了更激烈的战斗，结果大部份起义军被驱逐过江，退往武昌，没有受到清朝那支小舰队的干扰，因为该小舰队的炮火显然被南岸布署的炮台所制止了。

长沙方面原订于18日发动起事，但因官吏们采取了预防措施而陷于失败。官吏们收缴了部队的军火，认为他们对革命抱有同情。然而，该部队于25日以武力重新获得了军火，与革命党人携手合作，不费一枪一弹而控制了长沙城。曾经被认为是忠于清朝的防营，也参加了运动。直到目前为止，长沙是革命军干预海关工作的唯一口岸。他们通知海关税务司说，他可以在他们的命令下继续办公，但是，正如我10月26日的电报所说，他们已经受到警告，这个办法可能使 they 与各国发生冲突；我还建议他们，在目前的战斗结束之前，允许将海关税收置于海关总税务司或领事团的保管之下。我不知道这个警告是否有任何效果，因为我未能获得对发往长沙的那些电报的答复。

23日，九江归附革命。虽然道台本人已经逃跑，但道台衙门有一部份被火焚毁；同其他地方一样，革命军保持良好秩序，并且对租界不进行干扰。

直到28日为止，南京方面一切依然平静，那时英王陛下领事

报告说，局势日益摇摆不定。官吏们认为骚乱已迫在眉睫；满族人拚命挣扎，可能会加速动乱的爆发，而新军因担心遭到旧军的屠杀，叫嚷要发给弹药，但被总督拒绝，因此他们不服从总督发布的调往城外的命令。后来，有两标新军被劝诱出城，但传闻满族将军以炮轰南京城并杀死所有汉人相威胁，从而大大加重了恐慌程度，有许多人纷纷外逃。

在广州，有人于10月25日对新到任的满族将军^①扔了一颗炸弹。他被炸死，还有许多其他的人伤亡。英王陛下总领事报告说：该城和该省内的大多数人民是反对朝廷的，但等待着北方情况的发展。

同日下午，广州绅商举行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据说总督对这些决议已表示支持。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决议是：鉴于该省财政困难，广州不得以金钱、武器或部队帮助其他各省。

清政府承认，陕西西安府已落入起义军手中。在太原府，军队发生兵变，并沿铁路开往与京汉线交叉处，其意图显然是要切断磨昌将军统率的清军主力的交通线，除非那些仓促奉命自保定府出发的部队抢先加以阻止。

在山海关内外铁路线上的滦州，奉命开赴湖北的第二十镇的约五千名部队拒绝登上火车，后来向北京政府要求某些条件，作为他们开往前线的代价。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次兵变行动的结局如何。

宜昌大约于10月21日和平地落入革命军手中。我今天收到英王陛下驻重庆领事的一份电报说：该地无论哪一天都预料可能发生起事；人们认为成都已被包围。

上海在政治上仍然没有受到干扰，但我从法磊斯先生处获悉：

^① 凤山。

革命军能够在适合他们的任何时刻予以占领，官吏们承认他们无力进行任何抵抗。

驻长江各口岸的领事官员们已经向总司令官多次提出派遣炮舰前往的要求。舰队司令温思乐认为能够派一艘军舰前往宜昌，并由宜昌开赴长沙，但他于10月23日指出：在汉口的乱事结束之前，派遣军舰前往其他口岸不是切实可行的。他又说：当城市归附起义军方面时，对外国人来说，没有任何战斗或危险，而汉口则不然，在该城恢复秩序之前，如果清军发动进攻并迫使革命军后退，可能会有某种危险。

朱尔典谨上 1911年10月30日于北京

第61件的附件 代总领事葛福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继续谈我本月16日信中所说的事情，我荣幸地将本地革命运动的进展情况报告如下：

本月18日晨，革命军自汉口出动，向十公里处的清军进行攻击，但结果只发生了一些轻微的战斗。下午，攻击重新开始，萨镇冰提督的炮舰向起义军开火；双方都未获得任何优势，就人们所知道的最后结果而言，起义军遗弃野炮一尊。夜间，载运军队的火车自北方开到。次晨（19日），起义军再度出动，发起攻击，顺利地占领了十公里处的火车站。傍晚，清军全面退却，现在据说他们在十七公里处扎营。他们丢弃了所有的东西，起义军夺得大批弹药、枪械、食物和各种辎重。传闻有若干北军投入起义军方面，但此事未被任何权威人士所证实。双方的射击都很不高明。

人们不了解萨镇冰提督所率舰队离去的原因，但其中有一位曾经到过法国的军官告诉“决心”号军舰的舰长说：萨镇冰提督缺

乏弹药，并且对他手下的士兵很不放心。行驶长江的轮船报告说：那些炮舰停泊在此地与九江之间的各个地方，最近的泊于汉口下游十英里处。它们很可能正在等待煤炭，因为在此地是不能够获得任何煤炭的。

起义军的举止极为良好，对外国人的财产表示十分尊重。昨天，他们把赛马场作为军事活动的基地，但没有使财产遭受任何损失。此事与清军的举动形成了很鲜明的对照。清军于18日晚上进入亚细亚火油公司的房屋内，要求供给食物，在遭到拒绝之后，他们开枪打死了三名苦力。现在，起义士兵们甚至没有进入租界。我已授权租界工部局致函黎元洪都督，向他指出：租界章程不允许武装士兵进入界内。他在复函中送来十二张告示，指示他的士兵们尊重我们的章程。

我已经授权电报局的外国监督兰倍克先生在租界内设立一个分局，黎元洪都督已经同意这一项措施。我还允许清朝海关职员在租界内住宿，因为萨格登先生担心，如果不采取这个办法对他们提供保护，他们将会逃跑。我相信，我在这些事情上采取的行动，将获得您的批准。

贸易处于停顿状态，租界内的居民几乎逃走一空。城内常有大火，但仍维护着良好秩序，一切都很平静。

革命军想要检查清朝邮局发送的所有信件，邮政司倾向于停止营业。他前来看我，我劝他留下来履行他的职责，但提出抗议。今晨，他去拜访了黎元洪都督，双方议定：对邮局不得进行任何干涉，邮政司保证不允许清朝当局检查邮件。

起义军没有企图干预海关。由于缺乏现银，萨格登先生允许一些有相当地位的商号在保证纳税的条件下用轮船载运，他将把收到的这些款项存入汇丰银行特别帐户内。

黎元洪都督已致函首席领事，对各国领事保守中立一事表示

感谢；他还曾写信给各国领事，要求他们不向敌方供应军火、食物等。

由于在昨天的战斗中有些电线杆被火焚毁，所以现在一切电报联系均已中断，但人们期望通往北京的电报线将于明天恢复正常。

因为宜昌方面没有款项付给约一万五千名铁路工人，所以该处情况甚为不安。不过，该处泊有两艘炮舰以及一艘英国轮船。同宜昌的电报联系在前三天内已经中断。

同长沙方面没有电报联系，因为该电报线通过武昌；但据轮船报告，该处一切平静。我没有得到翟比南先生^①发来的任何消息。

德国舰队司令于昨晚到达。在本港口停泊的军舰如下：

“敏捷”号、“勇士”号、“蕻”号、“森林云雀”号、“山鹬”号、“夜莺”号、“黑勒那”号、“爱克洛”号、“威拉罗博司”号、“利普西”号、“鱼雷艇S 90”号、“伊尔梯司虎”号、“老虎”号、“决心”号、“对马岛”号、“隅田”号。

葛福谨上 1911年10月20日于汉口

再者：“森林云雀”号军舰将于明日开往宜昌。

葛福又及

第62件 海军部致外交部函

1911年11月18日收到

先生：

我奉海军部各长官之命，随信送上驻华总司令官今日来电的副本，以供外交大臣参考，并询问他是否同意自天津派兵四十名

^① 英国驻长沙领事。

前往汉口执行警察职务的建议。

该电的副本也已送给陆军部。

格林谨上 1911年11月17日于海军部

第62件的附件 驻华总司令官致海军部电

1911年11月17日发^①

我认为，目前驻在汉口的“蘅”号和“勇士”号军舰上的士兵应当调换，因为他们已登岸一个多月，以致军舰的情况日益不佳。英国租界由于靠近汉口城，在若干时间内将需要警察，因此，我建议，应自天津派兵四十名前往汉口，如有必要，便应当要他们准备留驻该地。

当然，还应有一艘军舰继续泊于该地。

第63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1年11月18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关于我11月15日的电报。

今天，我向袁世凯强硬地申述了清军在南京所犯的暴行，并且告诉他说，他应该尽力马上制止这些暴行。

他命令在座的外务部大臣对此事立即予以注意。

第64件 格雷爵士致朱尔典爵士电

1911年11月18日发自外交部

舰队司令温思乐建议说：应自天津派兵四十名前往汉口，以执行警察职务，从而替换那些水兵，他们登岸已有一个多月。

^① 原件未注明发报地点。

第65件 印度部致外交部函

1911年11月20日发自印度部，同日收到

印度部副大臣谨向外交部副大臣表示敬意，并随信附上印度总督11月19日发来的关于云南革命的一份电报的副本，以供外交大臣参考。

第65件的附件 印度政府致印度部大臣电

1911年11月19日发^①

关于云南革命。请参阅我本月14日所发的电报。

缅甸政府于本月18日来电如下：

第一份电报：“本月17日，我们收到驻云南府总领事于本月14日发来的电报，电文如下：

‘新政府为了维持秩序起见，正从大理派遣陆军前往腾越。云南府十分安全，在新制度下秩序井然。请告诉我，您是否收到关于腾越传教士色尔的任何消息。来电应由驻河内长官转交。’

现在，我们把以前曾经电告该总领事的那些消息，写信重新叙述一遍。”

第二份电报：“本月15日，驻八莫的代理专员收到那位已返腾越的史密斯领事的来电话，他正在把他那位文书的眷属送往缅甸。三塔^②掸族地方的清朝官员于本月15日抵达美特奇那^③。他说：该地已被年轻的首领洪升所占领。沙敦^④东南固原地方清朝驻军的统领马绍安已到达美特奇那，报告说：他的士兵们已加入革命军，并开往腾越。”

① 原件未注明发报地点。

②③④ 译音。

第 66 件 总领事额必廉致朱尔典爵士电

1911年11月20日发自云南府，外交部于同日收到

四川的一切情况都很混乱，不受管辖的罗罗族人和土匪已对汉人开战。宁远府有一名法国传教士被杀，而且在同一地区，10月25日又发生了对勒江德考察团的攻击。一名越南人被杀死。有两名法国军官受伤，另一名法国军官已前往成都。法国领事认为，他们都已死亡。

我担心，宁远城内的英美传教士们容易遭到最严重的危险。此外，还恐怕乱事将蔓延到云南。云南已宣布为独立的共和国，甚至企图派兵夺取四川的部份土地。云南为云南人所有的思想是占支配地位的，因此在领导者中间发生了意见分歧。云南政府的首领是一位湖南人^①，由于库存中缺少现银，他正在失去权力。纸币大概会贬值。抢劫日益盛行。法国领事和我本人极力劝告偏远地区的传教士们集中于云南府，以及此地凡是能够撤离的所有外国人逐渐撤往越南的东京。

第 67 件 海军部致外交部函

1911年11月22日收到

先生：

我奉海军部各长官之命，送上驻华总司令官本月22日关于中国起义的一份电报的副本，以供外交大臣参考。

格林谨上 1911年11月22日于海军部

第 67 件的附件 驻华总司令官致海军部电

1911年11月22日发自上海

起义军正在进攻南京。如果他们占领该地，目前这里没有发

^① 蔡锷。

生乱事的危险。但是，如果清军击败了起义军并向镇江和苏州推进，那肯定会有乱事发生，而且此地所有的革命领袖们将销声匿迹。上海平静无事，起义军保持着良好秩序。汉口的战斗仍在进行。长江内所有的中国船只上都升起了起义军的旗帜。

第68件 殖民部致外交部函

1911年11月23日收到

先生：

我奉殖民大臣之命，送上致威海卫专员关于中国起义问题的一份电报的副本。

安得生谨上 1911年11月22日于唐宁街

第68件的附件 哈考特先生致威海卫专员电

1911年11月20日发自唐宁街

只有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您才应与革命当局进行联系，并应避免采取任何含有正式承认革命政府的行动。

第69件 副领事布朗致格雷爵士电

1911年11月23日发自重庆，同日收到

此地已宣布革命。所有外国人均平安无恙。

第70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1年11月24日收到

阁下：

关于前几封信中所说的四川起义问题，我荣幸地报告：督办铁路大臣端方在抵达四川并有机会调查起事原因之后，已将此事电奏朝廷。

端方在该奏折中谴责署理总督赵尔丰，因为他最初对群众运动表示同情，后来又突然采取激烈措施，囚禁那些鼓动闹事的首要分子，其中有谘议局议长。接着，端方提出建议说：成都的某些地方官员应予革职；那些鼓动闹事的首要分子应予释放，因为他们同革命运动没有联系。

朝廷对该奏折作了答复，于10月26日发布一道上谕，对端方所奏参的各官员给予处分，并下令释放鼓动闹事的首要分子。赵尔丰和前护理总督王人文均奉命交内阁议处。不仅如此，赵尔丰和王人文已经感觉到皇帝对他们的举动所表示的不满，因为10月14日发布了一道上谕，将赵尔丰调回川滇边务大臣本任，命令撤去王人文的川滇边务大臣职务。同时，王人文还被革去侍郎衔。不过，赵尔丰在新任总督岑春煊到达之前，继续署理四川总督。

虽然10月28日的上谕命令岑春煊火速前往四川，但他还没有启程赴任。他获准除最初自广东所带两营军队外，再增募八营。为了供他的部队发饷，度支部还将拨银一百万两。

由于电报联系中断，北京很少得到关于四川局势的可靠消息。不过，全国其他地区所发生的事件，已经使四川局势黯然失色。

朱尔典谨上 1911年11月6日于北京

第71件 海军部致外交部函

1911年11月24日收到

先生：

我奉海军部各长官之命，为了供外交大臣参考起见，送上驻华总司令官于本月24日发来的一份电报的副本，该电是关于英军保护汉口英租界一事的。

格林谨上 1911年11月24日于海军部

第 71 件的附件 驻华总司令官致海军部电

1911 年 11 月 24 日发自上海

自 10 月 27 日以来，大约有六十名英国志愿兵于夜间值勤。他们请求派兵替换，我建议应派一百名军队前往汉口。英国人每夜值勤的缘故，是因为他们的租界与汉口城仅相隔一条狭窄的街道。其他各国租界由于距城较远，所以能够不需要志愿兵值勤。

第 72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1 年 11 月 24 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在昨天的各国使节会议上，大家议定：由于有些公使认为目前的形势极为严重，所以需要将使馆卫队的兵力增加到 1901 年所保持的人数。

第 73 件 奕纳乐爵士^①致格雷爵士电

1911 年 11 月 24 日发自东京，同日收到

由于本月 23 日在北京举行各国使节会议的结果，日本政府建议将使馆卫队增至三百人。目前，他们在华北仅有五百三十人，包括上述使馆卫队人数在内。如果他们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增加警卫部队，将立即通知英王陛下政府。部队准备接到通知后，便立即出发。

第 74 件 格雷爵士致柏梯爵士^②函

阁下：

关于英王陛下驻云南府总领事本月 20 日谈及云南革命动乱的那份电报，当天便已送上一份副本，如果您要求法国政府把他

① 英国驻日本大使。

② 英国驻法国大使。

们从中国获得的任何消息通知我们，我将十分高兴。

当您向法国政府提出此项要求的时候，您可以补充说：英王陛下政府的意图，是要把他们自己的行动限于保护英国臣民的生命财产以及那些未得到保护的外国臣民，而且不危害中国的完整，他们希望使中国的完整得到维护。

格雷谨上 1911年11月24日于外交部

第75件 印度部致外交部函

1911年11月25日收到

印度部副大臣谨向外交副大臣表示敬意，并随信附上印度总督于1911年11月24日发来的关于云南革命的一份电报的副本，以供外交大臣参考。

印度部 1911年11月25日

第75件的附件 印度政府致印度部大臣电

1911年11月24日发

参阅我们于本月19日发出的关于云南革命的电报。

我们收到缅甸政府本月21日的下述来电：

“八莫的代理专员收到腾越史密斯的来信说，腾越一切平静，据他所知，腾越周围的农村也很安宁。史密斯现不返回八莫。”

第76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1年11月25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英王陛下驻成都总领事11月18日的来电，于今天通过宜昌收到。该电说，端方可望于11月19日抵达成都。闹事的首领们已被释放。战斗在几英里外的地方继续进行。行政当局仍在城内

坚守。

第77件 奕纳乐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1年11月25日发自东京，同日收到

关于我11月24日的电报。

日本政府正在把他们在华北的全部兵力增加到一千二百五十人。援军定于12月2日前后抵达天津，由六挺机关枪和五百人组成。

第78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1年11月26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关于汉口的事件。

汉口代总领事于昨日来电如下：

“激烈的战斗仍在继续进行，但我不能够查明结果如何。增援革命的部队于昨日离开九江，人数达四千名之多，并有大炮十尊。革命军正在十公里处之下游强行登岸。

关于汉阳炮台发射的炮弹落入英俄两国租界一事，将由日本旗舰舰长及“勇士”号军舰舰长提出进一步的抗议，他们将于今天为该项目的前往武昌”。

我已于今天发出如下的复电：

“关于您昨天的电报。

今天，我会见了袁世凯，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即战事的继续进行，将使汉口的英国人士遭受危险并感到惶惶不安。

袁世凯回答说，清军所采取的态度完全是防御性的；为了证明他的诚意，他向我保证：如果能够根据双方都很满意的条款达成一项休战协定，他将乐于下令停战。他授权我通过您转达他的那个意思。

此事可以由您本人采取非正式的和口头转达的形式，将上述意思告诉黎元洪都督。您应尽力说明：大约六个星期以来英国人士所处的危险局势，不应再延续下去，而且应避免毫无价值的流血牺牲。”

第79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1年11月27日收到

阁下：

关于我上月30日的信，我荣幸地奉上有关目前中国革命运动进展的另一份报告。

在汉口英租界西边的中国住宅区内，战斗于10月30日重新开始。清军在驱逐起义军后，进入了汉口城，并纵火焚烧。自那一天以来，虽然汉口城仍在焚烧中，而且汉阳也有大火，但除了11月1日对汉阳进行一些无目的的炮击之外，清军很少做其他的事情。由于武昌附近以及九江下游的起义军对一艘英国船只开火的结果，一位领事馆官员奉命乘军舰前往武昌会见革命军首领。该首领解释说：他想要做的事情，只是阻止中国船舶载运煤炭、军火等，以供清军之用；他答应在武昌或九江将不对英国船舰开炮，但他说：从黄昏起到次晨七时止，英国船舰不得驶过革命军所据守的地方。人们于11月3日获悉，袁世凯与起义军首领之间交换了信件，但起义军首领表现出不乐于答复对他提出的建议。

长沙在宣布独立后的那一天，国民党内部便出现了意见分歧，从而引起了人们对长沙的很大忧虑，特别是由于有许多坏分子很可能利用内讧时所出现的权力松弛的机会。一艘德国炮舰于10月27日到达长沙，起了镇静人心的作用，并已做出安排，以便在必要时将外国人集中于一个岛屿^①上。31日，由于军队杀害了都督

^① 指长沙水陆洲，位于湘江内。

和副都督，形势又变得严重起来。11月2日，英王陛下领事报告说：由于预料到内部之间的战斗将随时爆发，临时政府已要求将所有外国侨民撤至岛上。

经德瑞先生^①自九江报告说：他得到可靠消息，起义军已占领南昌；起义军的炮台时常开炮轰击船只，其中包括日本的一艘水雷驱逐舰；有一千名士兵携带大炮六尊自武城抵达鄱阳湖，参加起义军。

南京仍在清军手中。英王陛下领事于10月30日报告，由于新军撤出城内，形势已有改善。我附上英王陛下领事的一封来信的副本，该信叙述了至10月27日为止他所驻地方的形势。

据昨天的报告，芜湖平静无事，但随时准备独立。

由于在我上述信件中所说的那次会议的结果，广州的商会、满族人和驻防旗兵已同意联合起来，维护法律和秩序。考虑到国内其他地区情况的发展变幻莫测，所以决定宣布广东为一个自治单位，否认同革命军有任何联系。总督的处境显然是很为难的，他似乎没有采取任何明确的态度。10月29日悬挂独立旗帜一事，引起了一些零星的骚乱，传闻有一支革命军在一个曾经做过土匪的人率领下，向广州进发。

30日晚上，英王陛下总领事报告说：曾经从船舶上降下的清朝旗帜，都重新悬挂起来；城内平静无事，而且他认为将继续保持平静。

英王陛下驻汕头领事10月30日来电报告说：该地的中国人曾举行会议，决定按照广州的模式成立独立政府的计划。他们为了财政收入的目的，还打算挪用关税收入和厘金，因此，我对赛尔慈先生做了指示，那些指示与发给英王陛下驻长沙领事的指示

^① 英国驻九江领事。

相同，因为以前在长沙曾出现过类似的情形（参阅我10月30日的信件）。

关于滦州和太原府的叛兵，很难获得可靠的情报，我冒昧地请您注意代理武官在所附报告中对此事所做的说明。

简单地说，从太原府出发的叛兵共有三千人，他们占领了井陘县附近某处的支线，该线在那里穿过长城⁽¹⁾，而清军则占领了支线与京汉干线相连接的石家庄地方。

滦州聚集了八千名军队，他们不受清朝政府的控制，也没有明确宣布同情革命事业。他们的目的显然是要迫使朝廷保证实行宪政改革；他们的活动被认为是获得了袁世凯的赞同，如果不是受袁世凯所煽动的话。袁世凯与他们有密切的联系。

上月30日，英王陛下驻云南府总领事电称，腾越已被起义军占领；两天后，史密斯先生从眉苗来电证实此事，但补充说：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他将立即返回他在腾越的任所。预料外国人不致遭到危险。

30日夜间，云南府发生了与腾越相类似的情况，但对它的占领并不是没有经过某些战斗的。叛变的新军加入了东城外面的部队，并对东西两城门同时发动进攻，两城门的城墙上架有大炮防守。他们击溃了抵抗，占领了衙门，接着搜寻逃亡的官吏，获得部份成功。在战斗中担任防守的将领被杀死。额必廉先生在11月4日的电报中声称：城内施行军事管制法，平静无事；起义军的组织始终都很完善；各国领事馆得到保护，而且外国人受到尊敬。

本月4日，烟台的一家报纸发表了黎元洪致山东人民的一封公开呼吁书，号召他们对湖北提供帮助，占领战略地点，以便向

(1) 原文如此，疑有错误。

京城进军。烟台方面迄今不是很活跃的，但革命军在上海获胜的消息引起了一些振奋。如果清政府丧失山东，除东三省外，河南将是剩下的唯一忠于清朝的省份，该省现由清军占领。

上海的事件以及天津所发生的特殊情况，将在另外的信件中说明。

朱尔典谨上 1911年11月5日于北京

第79件附件1 伟晋颂领事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我荣幸地报告说：人们估计，自从南京得到汉口发生动乱的消息以来，大约有四万人，其中大部份是学生、妇女和儿童，已离开这个口岸；首先逃走或把他们的眷属送走的，是南京的一些地位很高的官员。几乎只有总督、布政使、洋务委员、海关道台等几位高级官员的家眷仍然留在此地。

另一方面，由于南京银元局铸造清币五十万元，部份用来支付军饷，部份通过各钱庄发放，从而使南京流行的银根紧迫的现象得到某些缓和。因此，许多钱庄能够重新营业，并兑换纸币。它们由于缺乏现银，一度是不能够经营这些业务的，但是，它们仍拒绝支付存款，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它们不能够将资产变为现银。然而，它们答应，一旦形势重新恢复正常，即行照付。由于群众对清币的流通抱着某种怀疑的态度，所以银元局已暂时停止铸造，仍铸江南旧银元。

从军事的观点看来，可以报告的形势变化是很少的，但是，我已能够获得关于城内军队数目的确切情况。驻在此地的新军有步兵两标，共约三千人；骑兵六百人，炮兵九百人，工兵五百人，辎重兵约五百人，全部兵力为五千五百人。旧军共有十四营，每营的兵力平均为三、四百人。其中六营在起事前驻在城内，后来

有八营自浦口入城。此地的居民对前者似乎抱有恶感，但对最近自浦口调来的军队则感到恐惧，他们属于张勋提督指挥下的长江防营。人们认为他们的性情残暴，在发生骚乱时，他们根本不可能对他们的敌人或居民普遍加以宽恕。除了上述的军队之外，至少还有四百人守卫各炮台及其他地方，人们很少知道他们的倾向性；当然还有驻防旗兵，估计约一千五百人。

新军以怀有不满情绪著称。上星期，作为一项预防措施，他们的步枪被拆除了枪栓，而且他们的子弹也被拿走。现在，我获悉，经总督的许可，一定数量的枪栓已交还给每队士兵，而对每支完整的步枪给予子弹五十发，理由是：当士兵们想到南京一旦发生骚乱，他们将处于毫无防御的境地，而且可能被他们的敌人旧军所屠杀的时候，他们感到几乎难以容忍。该镇统制徐绍楨似已保证他的士兵们忠心耿耿，或者至少是保持中立。驻在此地的步兵两标现已奉命开赴城外，其中一标前往浦口，另一标前往南京以南的兵营。他们是否将遵从命令，似乎还是一个争论未决的问题。

就将来的情况来说，我仍然认为，这个口岸没有发生重大起事的危险，尽管无业游民也许可能制造某些麻烦。不过，我必须承认，我在此地的所有同事们都不同意我对形势的看法。

关于中国官员们的情况，总督对于本地的形势和汉口的形势，仍表示依旧乐观，但他的幕僚已感到普遍的惊慌，信心不足。有人告诉我说，由于总督的镇静以及拒绝相信送给他的许多报告，从而使他的僚属们大为恼火。我应当说，总督因为出席了本月22日谘议局的开幕式，所以造成了一个很好的印象。

美国轮船“新奥林斯”号和日本巡洋舰“秋津岛”号的到达，使停泊在此地的军舰有了增加。没有任何欧洲人离开这个口岸，此

事使那些不能迁移的中国人有了某些信心。

伟晋颂谨上 1911年10月27日于南京

第79件附件2 陆军上尉欧特白关于湖北起事的报告

从战略观点看来，目前清政府的地位显得几乎是令人绝望的，因为：

(一)第一军（南征的部队）完全忙于汉口方面的事情。

(二)驻在滦州、盛京、长春等地的第二军，有一部份处于哗变状态。

(三)那些最有可能对清朝保持忠诚的部队，都留着保卫北京。

(四)象长沙、武昌、汉阳、重庆、云南府、安庆、九江、南昌、宜昌、西安府、成都、太原府、腾越、广州、汕头等这样的城镇，不是发生公开的起义，便是处于极不安宁的状态，因此，那些地方的陆军不能调往他处维护秩序。

(五)驻太原府的混成协已经哗变，因此，第一军与北京之间的铁路交通线受到威胁。

(六)许多陆军是否忠于清朝，是难以确定的。

为了进一步详细说明各地的情况起见，毫无疑问，南征的部队（第一军）在遭到起义军方面的顽强抵抗之后，似乎在汉口获得了一次胜利，但这个胜利是经过严重的拖延之后才取得的，它给起义军提供了他们显然需要进行组织的某些时间，而且这种拖延也无疑地对其他城镇的起事起了点火的作用。起义军现已退至他们在汉阳和武昌必须据守的主要阵地以及在长江下游南岸的另一个阵地，面临汉水和长江。虽然现在传闻起义军已被逐出汉口，但清军的处境仍然不是很轻松的。他们确实拥有炮舰，但直到目前为止，这些炮舰似乎没有很大的用处。看来，由于清军没有控制铁路交通线，如果起义军对这些交通线怀有任何兴趣的话，他

们便能够使清朝第一军的全部兵力在若干时间内忙于应付。

沿铁路线往北，我们看到驻在太原府（在自京汉干线上的石家庄分出的支线的顶端）的混成协（由步兵两标、骑兵一营、炮兵一营、工兵一队、辎重兵一队组成）已公开起事。这件事本身也许不是很严重的，但从战术和士气的观点看来，它却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

（一）这些部队在铁路支线上的长城¹⁾占据了一个坚固的阵地，并威胁着驻汉口的第一军的铁路交通线。这一行动对驻汉口的第一军自然具有很大的精神上的影响，特别是当距离遥远有助于夸大关于军队后方遭到危险的任何谣言的情况下，影响更为重大。

（二）这支起事的军队正吸引着直隶等省的其他地区的清军，而这些清军是很难抽调出来与他们相对抗的。

（三）陆军起事的事实自然将考验邻近各部队正在动摇中的对清朝的忠诚。

驻太原府的这支军队，已经夺取铁路和车辆，而且封锁了太原府，这似乎是毫无疑问的。

此外，我们必须提到，留驻保定府的第六镇余部，现驻铁路交叉处的石家庄，他们对清朝的忠诚是很令人怀疑的，这又增加了另一个危险。

如果把注意力转向直隶北部的滦州和东三省的盛京，我们看到，第二十镇（而且有人还说驻长春的第二混成协和第三镇都同情他们）在同意乘火车南下之前，竟向清政府提出了一些条件。有人甚至说：这些部队的行动，是使清政府于10月30日夜间发布那道屈辱谕旨的终极原因。甚至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议定

1) 原文如此，疑有错误。

一项明确的解决办法。

根据昨夜发布的一道上谕，袁世凯现已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但他仍然控制派往湖北的水陆各军以及长江舰队，或许可能同起义军首领黎元洪等人顺利地进行谈判。但是，既然起义已如此普遍，而且从战略观点看来，支持起义军方面的人较多，起义军首领们是否会接受不废除满清王朝的条件，这似乎是令人怀疑的。

在今天的一道上谕中，廕昌将军已被任命为军谕大臣，并且暂时兼管陆军部；冯国璋将军已代替廕昌将军指挥第一军。

此时了解北方军队的各种情况，也许是饶有兴味的。这些情况自然只是接近于事实，但它们对于这次起义期间最近的调动等事将提供一些概念。

第一军（南征部队）

第六镇：据说不足三营的步兵驻在铁路交叉处的石家庄，以对抗太原府的起义军。

第二镇：除了驻保定府的分遣部队之外，约有半营驻在石家庄。

第四镇：除了驻在马厂的五百名步兵之外，有一百名骑兵和六百名步兵驻在小站，另有少数分遣部队留驻保定府。

第一镇：有两营在前线，另外派遣了一千五百人至二千人于本月 31 日乘坐三列火车出发，目的地或编制尚不了解。

第二十九混成协：大约由六营步兵、两营骑兵、两营炮兵等组成。

第二十一混成协：据报，第四十二标的一个半营及第四十一标的两个营，在武昌仍对清朝保持忠诚。

北 京

禁卫军：不足一营的炮兵已调往南方。

第一镇：步兵第三和第四两标以及第二标的两个营驻颐和园，一营驻北苑；工兵一队、辎重兵一队、军需一队驻丰台；还有第一标的少数士兵，比那些据说于31日乘三列火车出发的部队要少一些，编制不详。

巡警：名义上为七千人；估计实际可用的兵力为五千人。

步军：一千五百人。

护军卫队等：约一千人，但几乎难以估计。

通州地方部队：大约有步兵和骑兵三千六百人留驻通州。

天 津

第四镇：步兵五百人，驻马厂；骑兵一百人，步兵六百人，驻小州¹⁾；本省步兵五百人，驻韩家渠²⁾；淮军步兵一营；淮军骑兵一营。

滦 州³⁾

第七十七标的两营。

第七十八标的两营。

第七十九标。

第八十标。

第二十标的三营（骑兵）。

炮兵第二十标的一营。

1) 疑为小站之误。

2) 译音。

3) 原文误作滦濠。

第二十队工兵。

一队军需。

两队半辎重兵。

盛京和新民屯^①

第二十九镇的余部（淮军第三、第五、第六、第七、第二、第九、第十等营），奉命准备开往直隶南部。在这些淮军中，已能查明：有士兵二百八十人及马一百零八匹调往北戴河附近的一个车站；士兵二百六十人及马七十匹调往天津；士兵二百一十人及马一百一十匹调往津浦铁路；士兵一百五十人及马一百零九匹调往南方（目的地不明）。其余的淮军驻在盛京。

淮军最初是由前直隶总督李鸿章训练的一支军队。这些士兵的体质是很好的。据说，他们现在被调往直隶担任警卫任务。盛京传来的消息说：最近的意见是要组成巡防队驻守东三省，以代替那些将被调往直隶的陆军。

长 春

驻有第三镇，其中步兵第十一标已经过盛京前往南方。

济 南 府

驻有第五镇。

太 原 府

驻有上述混成协，该协现已哗变。

① 原文误作新宁屯。

据说，现已取消由海道调运军队的计划。

（代表外出巡视的武官）

皇家苏色克斯团陆军上尉 欧特白

1911年11月2日

第80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1年11月24日收到

阁下：

关于我10月30日和11月2日的电报，我荣幸地随信附上那几天内发布的几件更重要的谕旨的译文。这些谕旨体现了朝廷对群众压力的彻底屈服。从摄政开始以来，随着政府的日益衰弱，朝廷的意旨逐渐失去了权威，以致对人民不再具有很大的影响。在清朝兴盛的时代，甚至到前慈禧太后逝世为止，谕旨是不轻易发布的，而且所使用的语言极为庄重，因而受到人们的重视。谕旨不能撤销，这是一项惯例。现在，谕旨大批地发布出来，一个接着一个，紊乱不堪，而且措词常常是矛盾的。朝廷越是向人民泄露它的机密，它的建议所得到的反响就越冷淡。

10月30日的谕旨，也许是中国历代朝廷发布的谕旨中最为屈辱的，据说它哀婉动人的程度超过了明朝末代皇帝所发表的绝望的呼吁。朝廷在这道忏悔的谕旨中，把全国遭受的动乱归咎于它自己，紧接着又发布一道谕旨，革除皇族各亲王所担任的官职。在摄政王统治下，皇室成员获得了以前未曾获得的支配地位。道光皇帝的兄弟恭亲王在1860年的战争之后，诚然担任过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多年，而皇室的旁支庆亲王自那时起也一直担任同样的职务。但是，这些都是例外情况，只有在最近三年内，皇族的亲王和成员才专揽了政权。摄政王的两个兄弟载洵和载涛，分别管理海军和陆军。以前从未担任过任何重要职位的亲王毓朗，

被授为军諮大臣。贝勒溥伦兼任许多职务。自从袁世凯于1909年1月去职后，京城中几乎所有的最高级职位，都由满族人升任。

紧接着采取的步骤，是下令起草宪法交资政院审议，并赦免政治犯。

11月1日的谕旨，接受了全体国务大臣的辞职，并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授予组织新内阁的权力。在连续两天内发布的两道谕旨，表现出朝廷的宗旨摇摆不定，第一道谕旨命令袁世凯保留对长江各军的指挥权并暂时留驻该处，而第二道谕旨则指示他立即前来北京。

摄政王所作的下一个让步是要求资政院起草宪法。毫无疑问，在滦州哗变的新军第二十镇所控制的强大据点以及同该镇统制所进行的谈判，对政治形势具有十分重要的关系，并迫使朝廷把颁布宪法一事作为灵丹妙药。目前资政院所起草的宪法纲要^①，对君主权力所作的限制要比1908年的那个宪法更大得多。新宪法的结构系模仿英国的宪法，似乎是在一夜之间草成的；现在，对它在平息国内不满情绪和挽救朝廷方面的效用抱有很大的希望。在北京及其附近地区，它无疑地起了安定人心的作用，但是，有一些迹象表明，它或许不能够满足其他地区革命派内部较激进分子的愿望。朝廷希望袁世凯和资政院能够使全国相信：宁可保持满清王朝的地位，剥夺它的一切权力，而不要面临可能出现的混乱和骚动的前景。

袁世凯的任务是巨大的。中国人民群众通常的特性是固有的稳定以及不惜一切代价地渴望和平，而且这个国家没有其他的建设纲领，这些情况都是对袁世凯有利的。另一方面，运动的广泛性以及它到处获得胜利，使得以武力恢复国家原来面目的一切企

① 指宪法十九信条。

图难以实现；起义军也许宁可冒险建立他们自己的政府，他们在某些省会确实已经这样做了，而不肯相信满清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所提出的诺言。

朱尔典谨上 1911年11月6日于北京

第81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1年11月27日收到

阁下：

您从我10月23日的信中获悉，情况迫使汉口领事团不得不与起义军首领们保持某种程度的联系。

10月22日，汉口领事团来电说：起义军统帅已经把一张被认为是违禁物品的清单交给各领事，这些物品如经查获，将同运载物品的船只一起予以没收。领事们说：每天出现的这些问题，需要同革命当局进行讨论；虽然他们知道不应提出承认军政府的问题，但看来不可能避免同军政府进行正式联系。他们打算把黎元洪都督关于违禁物品的通知记录在案，并且说明他们已把该通知提交他们驻北京的公使。在传阅这份电报的时候，我向我的同事们表示我个人的意见说：起义军都督没有任何权力对运载这些物品的外国船只加以没收；条约没有禁止进口的所有货物，都可以由外国船只自由运往汉口。

在各国使节10月28日举行的会议上，普遍的看法是：领事团的首要职责在于保卫各国租界的安宁；如果领事团在考虑这个目的时，认为不得不同起义军进行联系，外交团肯定不会不同意该项行动。然而，只有领事们可以决定，该项行动是否不可避免的。因此，第二天便将此意电告首席领事。

后来，我收到了代总领事的一封来信，内有与起义军都督关于这个问题的来往信件的副本。起义军都督的信件，附有他认为

是战时违禁物品的一份内容颇为广泛的清单。就我所知，他假定各国领事已承认该军享有交战团体的地位一事，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我已通知葛福先生说：据我看来，目前不宜予以承认，因为这种承认将使清政府有理由提出抗议。

使人们感到某些忧虑的另一件事情，是当战事蔓延到汉口城区的时候，各国租界将处于什么地位。首席领事来电报告说：海军中将温思乐爵士认为，为了各国租界的安全起见，绝对有必要把这些租界扩展到铁路线，而且把那些居住在这个中间地带的中国人驱逐出去。他又说：领事团一致同意此项意见。在10月28日举行的外交团会议上，讨论了向外务部要求扩展租界的问题，但指出：由于清军已经收复汉口城，这个问题不再是一个急迫的问题。

当运动一旦发展为战争状态的时候，关于各缔约国臣民的权利问题将不可避免地发生纠葛。起义军的大炮很可能有意或无意地对外国船只进行过一些轰击。有一艘英国拖船拖带着两只为清军装载军事物资的驳船，遭到了干扰，但直到目前为止，我仅收到关于这些事件的十分简略的电报。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尽可能地保护外国轮船公司的正常贸易业务不受任何限制。由于考虑到这个目的，我们已经拒绝外务部提出的一项要求，即目前只允许外国船只访问沿江较大的口岸，这显然是为了对革命党人的活动可以更好地进行控制。现随信附上关于这个问题的来往信件的副本。

英王陛下驻上海总领事来信警告我说：某些英国臣民也许乘机满足对军事冒险方面的爱好，这不是不可能的。根据我的指示，已经在此地和天津发布一项通告，要求他们注意1904年枢密院敕令第71款的规定。

朱尔典谨上 1911年11月8日于北京

第81件附件1 代总领事葛福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我荣幸地随信附上我所收到的革命军都督关于违禁品问题的两封来信的译文。在今天下午举行的领事团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听说都督对于我们继续拒绝以任何方式承认他一事感到有点恼火，所以我们决定，应由首席领事代表领事团对这两封来信表示收到。我附上首席领事送去的那封信件的副本，该信是仅用英文写的，一并送去他的外文名片。

革命军首领正在使他的地位日益巩固：对他不予理会将变得日益困难。

葛福谨上 1911年10月21日于汉口

第81件附件4 汉口首席领事致革命军都督函

首席领事谨向武昌都督致意，并代表领事团对他于18日和20日关于违禁品问题的来信表示收到。我已把该信中所提出的那些要求通知各缔约国侨居汉口的臣民，而且将把此事提交各国驻北京公使考虑。

首席领事相信，武昌都督将尽最大努力恢复同北京和上海的电报联系，以便各缔约国领事能够同他们各本国政府通讯。

1911年10月21日

第81件附件6 朱尔典爵士致庆亲王函

殿下：

我荣幸地收到殿下10月28日的来函，该函要求：按照两江总督和江西巡抚所拟订的那些规则，应通知所有轮船公司，鉴于湖北乱事的蔓延，轮船只能在九江、芜湖、南京、镇江、上海等较

大的口岸停泊，不可在途中任何较小的口岸装载旅客或货物。殿下又说：正指示轮船招商局遵守这些规则。您要求我促请我的那些尊敬的同事们注意此事。

我荣幸地通知殿下：外交团已经仔细地考虑过上述要求。他们囑我答复说：各国使节感到遗憾，他们不能够禁止轮船公司派船访问条约承认它们有权访问的那些口岸，但是，他们愿意建议各公司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避免对实际冲突进行任何干预。

朱尔典谨上 1911年11月7日

第82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1年11月27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随信附上我所收到的英王陛下公使馆代理武官欧特白上尉今天写的一份报告的副本，该报告是关于清军的活动和目前部署的。

朱尔典谨上 1911年11月10日于北京

第82件的附件 陆军上尉欧特白关于中国革命的报告

自从我本月2日写了那份报告以来，事态的发展如此迅速，以致对清政府的对策几乎不可能得出任何逻辑的结论。

我们没有得到关于汉口战事的任何新消息。据推测，该地南征军和起义军的地位几乎仍保持原状。

驻山西太原府部队的哗变，在经过小规模的战斗后，结果在石家庄铁路交叉处发生了一起事件，当时吴禄贞将军（第六镇前任统制，奉命前往抚慰山西起义军）被害。

有好几份关于这个事件的报告，但目前我不能够作任何可靠的说明，因为那些报告在重要的细节方面有分歧。

这个事件的结果是暂时中断了铁路交通，因此，在这个期间，从战略观点看来，南征部队的交通线已暂时被切断。

该谋杀事件是7日发生的，直到10日交通才重新恢复，那时就战略上来说，形势似乎是对清军较有希望的。

从昨夜收到的报告看来，保定府似乎仍处于很不稳定的状态，同时在过去几天内，为了帮助应付石家庄一带的动荡形势，又派遣了第三镇、第一镇及该省淮军等部队前往。

我估计，在石家庄一带，现在大约有第六镇、第二镇、第四镇、第一镇及第五镇的士兵五千至六千人，但其中有些部队似乎分为几个派系，并且多少有些解体。

直到目前为止，驻滦州的第二十镇还没有离开该地，尽管他们提出的绝大部分条件已经实现；该镇及其统制张绍曾的举动使人们觉得，他们仍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而且他们几乎不能够被认为是忠诚的。

在滦州，该镇士兵大约有八千至九千人，其中大约有一千人被认为是满族人。

30日的谕旨发布后不久，张绍曾统制便奉命前往南方，承担对长江沿岸一些起义城市进行招抚的工作。他婉言拒绝前往。滦州事实上已被第二十镇士兵所“拦截”，那就是说，电报局处于统制的检查之下，而且他在很大的程度上控制了经过该地的火车，虽然除了两列运载军火的火车之外，他已允许所有的列车通过。

该统制要求派火车运送他的部队前往北京，军谕府借口铁路车辆短缺而予以拒绝。他被告知，该镇将仍然留驻滦州。我获悉，他已请准病假，该镇的指挥权已暂时移交潘统制。

该镇究竟将采取什么实际行动，似乎是难以确定的，该统制的政治主张虽系赞成立宪，然而目前似乎还没有走到起义军那么远的地步。

驻盛京的混成协似乎对该统制抱有同情，尽管他们迄今还没有表明他们的真实目的。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关于第二十镇启程的确切消息，但是，由一位强有力的人物领导的这支半已背叛的部队，处于他们目前的地位，从战略的观点看来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并且可以引起进一步的麻烦。

第三镇的第十一标以及炮兵一营和工兵队、辎重兵队等，已自长春乘火车至保定府，将前往石家庄（这些部队已包括在我上面估计的驻石家庄部队之内）。第三镇的第十标已于昨日沿大道自承德府至新民府。该标的最终目的地似乎是丰台，他们将在那里等待进一步的命令。

驻盛京的混成协不久也将乘火车南下。至于北京的兵力，同我在上次报告中所说的部队几乎没有什么变化（除了已经说过的第一镇两个营驻石家庄之外）。

姜桂题统率的驻通州部队，已增募了约二千名新兵，并且自梁格庄调来部份队伍，所以通州大约有六千人。

东三省现正招募一支新的巡防队（这些士兵的等级远在陆军之下），以代替自该处调走的陆军。

现在，淮军几乎已全部自东三省乘火车南下，前往直隶各据点。

现在召集入伍的陆军后备队达十营之多，其中有三营已经组成。但是，由于他们没有武器和制服，所以现在对他们几乎不能够加以认真考虑。

关于驻守天津的部队，我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消息。每天都有关于城镇落入起义军手中的报告传来。总之，清政府本身似乎已陷入重重危险的包围之中，虽然昨天和今天总的形势的严重程度似乎略有减轻。它发布调动军队的命令，看来是有些惊慌失措而且未经仔细考虑的。

袁世凯仍迟迟不返回北京。有些满族官员为了安全起见，已

把他们的家属迁出北京：其他一些官员正在为他们自己的安全或顺利逃跑进行安排。清军颇有意占领此地至保定府铁路线上的一个据点，这似乎是很可能的，但部队的忠诚很不可靠，使清政府处于一种危险的地位。整个革命运动中最令人感到惊讶的事情也许是：已花费很多金钱而且寄予很大信任的陆军，现已证明是部份倾覆清政府的工具。

（代表外出巡视的武官）

皇家苏色克斯团陆军上尉 欧特白

1911年11月11日

第83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1年11月27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报告：上月28日，我收到英王陛下驻天津总领事的一份电报说，直隶总督希望得到各国使节的同意，暂时撤销1902年解散天津临时政府^①时所达成的协议，该协议规定中国军队不得在距天津二十里的范围内驻扎。总督提出这项要求的理由，是遇有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时，他需要部队维持秩序；作为另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他建议各国部队对他提供帮助。

经此地各国使节同意，已对那位曾提出一份类似报告的首席领事发出训令说：在领事团认为有必要的期间内，可以同意撤销该协议。

11月2日，由于首席领事提出了疑问，所以领事团被授权就暂时占领各国租界周围地区的中国军队的人数和性质，以及使用这些军队的方式等问题，制订一些他们觉得是该地情况所必需的

① 天津临时政府是义和团运动期间帝国主义联军攻陷天津后设立的殖民统治机构，亦称天津都统衙门。

适当条件。

这些条件包含在首席领事致总督的信中，我荣幸地附上该信的副本。后来，在各使团首脑中传阅了这些条件，各方面对此均无不同意见。

朱尔典谨上 1911年11月10日于北京

第83件的附件 首席领事致总督函

总督阁下：

我荣幸地收到您上月30日的来信，该信要求领事团同意暂时将中国军队调进距天津二十里的范围之内，此事是与1902年协议的条款相抵触的。

我奉领事团之命答复您：经外交团批准，他们同意暂时撤销该协议，并授权中国军队依照下述条件进驻该范围之内：

一、不允许中国军队进入各国租界。

二、不调入炮兵或速射炮。

三、领事团得到洋务委员王先生的通知说，有两队淮军已进驻该范围之内；他们同意此事。不过，如果中国当局希望调入更多的军队，应首先获得领事团的允许；领事团将仅同意合理的人数。

领事团还指示我声明：双方有此了解，即如此调入的军队将仅供巡警之用，而且当领事团一旦认为不再有必要的时候，便将撤销关于暂时调进军队的授权。

谨致问候之意。

首席领事 1911年11月4日于天津

第84件 海军部致外交部函

1911年11月27日收到

先生：

为了供外交大臣参考起见，我奉海军部各长官之命通知您：奉命自澳大利亚停泊地驶往中国的英王陛下军舰“普罗米修斯”号和“飞马”号定于12月13日抵达香港。关于它们自澳大利亚水域启航一事，已在该处获得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同意。

格林谨上 1911年11月25日于海军部

第85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1年11月27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关于湖北革命。

请参阅我昨天的电报。

今天，汉口代总领事来电如下：

“清军已夺回汉阳。革命军逃往武昌，士气低落。黎元洪都督准备接受立宪政府，并照该意发出信息。

如果我能够获得黎元洪提出的停战条款，便将电告您。”

第86件 杰罗姆先生^①致格雷爵士函

1911年11月28日收到

阁下：

秘鲁有很多的中国侨民，估计大约为一万四千人或一万五千人，其中许多是基督教徒，而且和秘鲁人互相通婚。有人告诉我说：此地的商号，甚至包括英、美、德等国人的大商号在内，最重要的一家是中国商人和银行家开设的，它大概与四大商行之一有密切联系。

此地有一两种中文报纸发行。

近来中国革命的消息，在利马的中国人中间激起了很大的兴

① 英国驻秘鲁使馆官员，具体职务不详。

趣，许多赞成中国起义的宣传正在进行。例如：我的那位中国仆人已交出两个月的工资，作为他对运动的捐助。昨晚在中国剧院举行了一个规模很大而且激动人心的会议，李开本^①发表了演说。捐款由李荣南^②商号收存。

我附上这几天来《利马日报》上登载的一份广告的样本，供您参考。

我获悉：利马、伊基克及瓜亚基尔三地的数百名华侨捐款的实际数额为一百万镑，并且正在进行安排，立即电汇五十万镑交革命财政委员会处理，该会显然设立在檀香山。

此地的华侨革命委员会同在汉口作战的起义军有电报联系。

杰罗姆谨上 1911年10月20日于利马

第86件的附件 利马主要报纸登载的广告（译文）

华侨爱国会启事

下列签名人向他的同胞们宣布：自本日起，已在必灵汉街第三百三十一号开设事务所，接受捐款，以保护中国的国民党人士。

本事务所办公时间：上午八时至十一时，下午一时至五时，晚间七时至十一时。

爱国会干事

第87件 海军部致外交部函

1911年11月29日收到

先生：

我奉海军部各长官之命，送上驻华总司令官今天发来的一份

①② 译音。

电报，以供外交大臣参考。

格林谨上 1911年11月28日于海军部

第87件的附件 驻华总司令官致海军部电

1911年11月28日发^①

昨天，清军收复了汉阳；起义军遗弃了大炮等物，逃往武昌府。在南京，起义军已把清军驱入城内，占领了外围的所有炮台，现在大概由八艘军舰以及老虎山上架设的大炮发炮轰城。他们将于本周内占领南京，这看来似乎是很肯定的。如果情况是那样，目下汉口将不会有麻烦的事情。

俄国人派遣了一百名军队，德国人派遣了五十名士兵，以保卫他们在汉口的租界。

第88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1年11月28日发自北京，次日收到

汉口停战问题。

昨天，汉口代总领事来电如下：

“关于我11月27日的电报以及您11月26日的电报。

黎元洪都督提出下列条款：

一、停战十五天，在此期间内，目前各方所占领的领土应各自驻守。

二、已加入革命党的所有省份的代表在上海集会；他们将选出全权代表与袁世凯所指派的代表进行谈判。

三、如有必要，停战继续延长十五天。

我没有同冯国璋将军接触，但如果他奉命接受这些条款，将

^① 原件未注明发报地点。

可避免大量的流血牺牲。”

第89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1年11月29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西江上的海盗行为又盛行起来。

经我同意，驻广州总领事已与英国海军当局进行安排，派一艘水雷驱逐舰、三艘鱼雷艇以及通常行驶内河的小舰队在西江巡逻，从而使英国轮船机构能够重新恢复营业。

第90件 印度部致外交部函

1911年11月30日收到

印度部副大臣谨向外交部副大臣表示问候，并随信附上印度总督11月29日关于中国革命的一份电报的副本，以供外交大臣参考。

印度部 1911年11月30日

第90件的附件 印度政府致印度部大臣电

1911年11月29日发

我们收到缅甸政府本月27日的下列电报，并已转告北京：

“驻八莫代理专员已收到革命军张都督^①的信，他在该信中叙述了起义的经过。他要求我们维持中立，并提出保证说，有关边境的案件仍照以前的办法解决。张都督声称，他已命令掸族地方首领防止边境纠纷。他在信中还附来一份告各友邦书的副本，答应保护外国人，偿还借款，以及尊重条约，但对该声明发布之日以后满清政府所借款项及签订的条约概不承认。代理专员已发函

① 指驻云南腾越的“滇西军都督”张文光。

正式表示收到该信；我们一旦收到该信后，便将副本送交印度政府。据代理专员说，腾越邮政司已于24日返回腾越。海关税务司正在就回去重建海关一事与北京进行联系；商队又已开始往来。”

第91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1年11月30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英王陛下驻云南府总领事报告说：起义军在宁远府被击败，损失惨重；传教士们安然无恙，11月21日。

第92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1年12月1日收到

阁下：

革命运动在这么许多重要的省会中获得进展；关于天津即将独立的消息不断传来；如果滦州叛兵和京汉线上石家庄的叛兵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把他们的命运和革命军联在一起，北京便有陷于孤立的危险；北京城内汉人与满人之间显然存在着令人忧虑的紧张关系；中央政府极为屈辱不振。所有这些情况结合起来，使侨居此地的欧洲人感到不安，这并不是不自然的事情。

不到必要的时候，我不愿发出任何指示或警告，因为担心采取这样任何一个步骤，将加强而不是缓和人们的不安全感，而且有可能被误解为对每天流传的许多荒诞谣言加以证实。

与此同时，似宜做好某种应急的准备，以便把那些居住在使馆区外面的英国臣民集中于使馆区内。因此，我授权成立一个委员会，由陆军中校戈意和我的四名僚属组成，研究在必要时将使使馆区外的侨民迁入使馆区内、安排住宿、提供食物等问题。

该委员会仍忙于此项工作，组织事宜正迅速地接近完成。为了获得北京城内英国侨民的合作，并使他们了解我们正在做的事

情，对每位户主发出了一个通知，我荣幸地随信附上该通知的副本。据我判断，该通知很受欢迎，并顺利地达到了它的主要目的，即使那些接到通知的人确信，他们的利益得到英王陛下使馆的关怀。

朱尔典谨上 1911年11月12日于北京

第92件的附件 发给使馆区外英国侨民的通知

一、英王陛下公使收到了好几封信件，询问他关于北京发生动乱时应采取什么行动的意见，因此，根据朱尔典爵士的指示，成立了一个有使馆成员参加的委员会，考虑在紧急情况下可能发生的安排住宿、供应食物等问题。

二、必须明确了解：公使认为目前没有必要劝告侨民搬入使馆区；他现在建议所作的安排只不过是预防性质的。如果形势看来使侨民迁入使馆区一事成为可取的，那么，将另行通知。

三、如果侨民们在另行发布通知时，把他们打算前往的地方尽快地告诉下列签名人，那将对该委员会很有帮助。我们建议，侨民们如有可能，应自行安排迁入使馆区内友人的住宅或旅馆内。如果没有这种可能，我们将进行安排，利用使馆内有限的地方提供一些住宿处。对于那些使馆区外英国侨民所雇用的中国仆人等，无论如何将不提供这种住宿。

四、可携带的贵重物品，如珠宝、餐具、皮货等，如果愿意的话，现在便可以送入使馆，以便更安全地加以保管。这些物件必须在外面清楚注明送存物件者的姓名，可以送交英王陛下副领事伊斯特丝先生。

五、建议英国侨民将毛毯、被褥，亚麻织品、衣服以及足够大约两周之用的食物，收拾妥当，以便在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立即带走。

六、对发给本项通知的所有人士的住址，均已查明，并以被使馆所了解。如有紧急情况，该委员会将派出专差，并安排护送侨民迁入使馆区。此事只有在侨民自己的迅速配合下，才能够有效地完成。

七、要求有电话号码的侨民将该号码通知下列签名人。

八、凡收到此项通知的人，如果了解任何居住在使馆区外尚未收到通知的英国户主，请动员他立即至使馆申请领取一份通知，同时将他的详细住址通知使馆。

九、任何信件，特别是根据上述第三款所要求的那些信件，应寄交使馆二等秘书罗乃音先生，他是上述委员会的秘书。

罗乃音 1911年11月4日于北京

第93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1年12月1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简单报告一下，关于促使我发电报请您授权，根据1901年9月7日签订的辛丑条约第九款规定，当北京至沿海的铁路交通受到威胁时，使用英王陛下军队保持该路畅通的那些情况。作为初步的说明，我可以指出：为了实现保持该路畅通一事，这一点是我考虑的唯一目的，在联接天津与渤海湾的白河完全封冻以前，保护山海关内外铁路的北京至天津之间那一段就足够了，这也许是很明显的事情。

在我10月31日发那份电报给您的时候，我脑子里考虑到下述事实。统制张绍曾率领的第二十镇的一个混成协已经聚集在滦州，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参加直隶的秋操。当革命爆发时，清政府迟迟不让该军约五千人乘火车南下，因为该统制被怀疑具有革命倾向。因此，他们暂时被留在滦州，当时该镇另有部队增援他们，从而

使他们的人数达到九千人。这时候，长江的形势使清政府感到需要派他们前往支援第一军，但当命令下达的时候，他们拒绝登上火车。统制张绍曾被认为是一位有才干和影响的首领，他们通过张绍曾之手提出了某些政治要求：正如我在本月6日信中所说的那样，他们在道义上迫使朝廷答应早日完全实现立宪。

尽管有此放肆行为，该部队仍同他们的统制一起留驻滦州；现在，他们地位的巩固和独立性已变得加倍明显。如果他们决定把他们的命运公开地与革命军联在一起，祸福与共，那么，没有任何事物能够阻止他们向天津和北京进发，并切断他们背后的铁路线，以阻挠东三省部队的追击。清军也可以同样地破坏铁路，以拦阻他们自滦州进发。

11月4日，驻天津部队总指挥官来电告诉我：总工程师里基茨先生预料将收到直隶总督发布的切断铁路的命令。因此，我根据您在11月1日电报中所给予我的权力，不失时机地采取行动。我警告清政府应注意《辛丑条约》所给与列强的权利以及破坏铁路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并且训令英王陛下驻天津总领事对直隶总督以及通过里基茨先生对中国铁路总办说同样的话。与此同时，我与法国及日本的使节进行了磋商，因为除了我们自己之外，只有它们两国为此目的在天津驻有军队。

直隶总督否认具有人们归咎于他的任何此类意图，但我认为有必要采取预防措施。英、法、日三国驻津指挥官磋商后，制订了计划。我请求附上该计划的副本以及库柏将军11月7日对该计划的说明信。

最后，我可以补充说：铁路上的英国雇员已经得到指示，如果革命军接管了铁路，他们为了英国债券持有者的利益，将把该铁路当作一个商务企业而尽力继续工作。该铁路仍在自由经营，没有受到任何干涉；我们希望，我们准备保护该路的消息也许使

它能够在英国职员指导下继续经营下去。

朱尔典谨上 1911年11月13日于北京

第 93 件附件 1 驻天津部队总指挥官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我荣幸地通知阁下：遵照您的指示，我安排了一次与法、日两国指挥官磋商的会议。

为了维持白河封冻以前北京与天津之间的交通，我向他们提出了一份我所起草的计划。他们已向我口头表示完全同意。

我们打算侦察我们的驻地，以便了解我们所需要的房屋等，并且做好准备，在接到通知后立即出动部队，如果我们得到训令如此办理的话。

附上该计划的副本。

华北驻军总指挥官 陆军准将 库柏谨上

1911年11月7日于天津

第 93 件附件 2 白河封冻前维持京津交通的计划

英国人：占领自北京至万庄以南六公里处（共七十一公里）。

驻守丰台、黄村、安定、万庄等据点。

日本人：占领自廊坊以北五公里处至张庄以南五公里处（共三十五公里）。

驻守廊坊、落堡、张庄等据点。

法国人：占领自杨村以北六公里处至天津以东（共三十五公里）。

驻守杨村、塘沽等据点。

各国应安排对它所分管的那段铁路进行适当巡逻，并且保护桥梁。

英国人打算派二百人驻丰台，三十人驻黄村，三十人驻安定，三十人驻万庄，总共约三百人。他们还正在派遣一百二十人前往唐山。

第 94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1 年 12 月 1 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关于汉口停战谈判。

请参阅我上月 28 日的电报。

今天，我已给汉口代总领事发出下列电报：

“袁世凯提出的停战条款如下：

(一)双方各自驻守现已占领的土地。不得秘密地进行侦察活动。

(二)停战期限定为三天。

(三)在上述期间内，军舰不得利用停战的机会在武昌或汉口南北两岸停泊，从而获得一个更有利的地位。在停战期满以前，军舰必须退往武昌下游若干距离的地方。

(四)在停战期间内，任何一方不得增调援军，修建炮台，或在其它方面增加军事力量。

(五)为了防止对这些条件的违犯行为，英国总领事应作为证人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我相信最后的那项条款可以获得您的批准。关于此事，我来不及同您商量。

第 95 件 格雷爵士致朱尔典爵士电

1911 年 12 月 1 日发自外交部

您 12 月 1 日电报中所说的停战协定签字问题。

我完全同意您所采取的行动。

第96件 海军部致外交部函

1911年12月2日收到

先生：

我奉海军部各长官之命，送上驻华总司令官今天发来的一份电报的副本，以供外交大臣参考。

格林谨上 1911年12月2日于海军部

第96件的附件 驻华总司令官致海军部电

1911年12月2日发①

起义军已占领南京。他们说：他们将试图派遣军队，乘船溯江而上，前往汉口。

我将于12月4日前往南京，如有必要，可以在晚些时候前往汉口。

朱尔典爵士已同意这项建议。

第97件 格雷爵士致朱尔典爵士电

1911年12月2日发自外交部

关于我11月18日的电报。

为了替换防守租界的水兵和志愿兵，已于昨天电令香港立即派遣一百名步兵，如有可能，并携带两尊大炮，前往汉口，还将派遣工兵小分队、医疗队等。

第98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1年12月3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① 原件未注明发报地点。

关于停战及和平谈判。

我收到汉口代总领事今天发来的下述电报：

“通过我的调解，双方已同意无条件地停战三天。目前的情况几乎同袁世凯所要求的完全一致。

革命军从攻克南京一事中无疑地将获得信心，因此谈判的进行变得更加困难。”

我已经指示英王陛下总领事，从现在到12月6日晨八时停战终止的这段期间内，利用他的斡旋，在武昌召集各省代表会议讨论条款。袁世凯很想为这一会议作出安排。

第99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1年12月4日收到

阁下：

继续谈我在本月5日信中所记述的关于目前中国革命运动的进展情况，我荣幸地送上一份有关上海事态发展的报告。鉴于各国在该城市中聚集着多种多样的和极为巨大的利益，我冒昧地认为这个报告值得另行处理。

早在10月18日，我曾收到首席领事提出的一项要求，请批准发布一项声明，宣告上海中立。对于该要求，外交团不能够同意。

10月27日，英王陛下总领事来电报告他本人与道台之间的一次会晤，完全证实了其他方面提供给首席领事的消息。该道台承认：革命军准备在他们感到合适的时候，随时占领上海；由于缺乏人力和财力，他不能进行任何抵抗。他极力劝告法磊斯先生促使领事团宣布租界周围三十至五十里的地方为中立地区，因为任何骚乱都将危害该口岸的和平，而他对此是无力加以保证的。法磊斯先生说，此事应由外交团决定，但他对我表示他的意见：该口岸的中立化已成为可取的，因为他认为，在一个挤满了难民的

地方，而且又处于金融危机之中，发生任何动乱都将具有灾难性的后果。

因此，我又将此事提请我的同事们予以注意，并照下列意思发了一份电报给首席领事：

“我们认为，在上海周围三十英里半径的地区内保持有效的中立，完全是行不通的，而且认为我们的政府很可能不会同意这一建议。如果领事团所预料的事情终于实现，我们认为有理由按照形势的要求作出安排，以保护生命财产以及租界的安全。”

当时，道台的一位代表为中立化问题向领事团极力劝说，但他得到通知说：应由外务部向外交团提出一项明确的建议，同时，清朝当局不能够解除它保护外国人生命财产的责任。

11月3日，承蒙舰队司令温思乐把他致海军部的一份电报转告我，该电建议说：鉴于上海形势危急，同其他主要有关国家如德、美、法、日等国进行磋商也许是可取的；每个国家应派遣约一千五百名步兵并携带一些小口径大炮，以提供保护，因为海军兵力必须分布于长江各口岸，它是不足以提供这种保护的。该电还认为，采取这一步骤将对长江流域普遍发挥遏制作用。德国和日本的海军指挥官也发出了类似的电报。

我致电舰队司令，要求对他认为必须准备应付的紧急情况的性质以及所拟议的那些措施的范围，提供更详细的情况。该电报与英王陛下驻上海领事的电报互相错过了。法磊斯在他的电报中说：他没有理由相信，在上海城内发生革命起事之后，会接着发生对租界的进攻，因为当时上海城是平静的；也没有理由相信，警察和志愿兵，也许在驻守领事馆和银行的那些海军卫队的帮助下，不能够应付可能发生的任何麻烦。

该电报发出后一两个小时，一件盖有中华民国军政府关防的公文送到英王陛下总领事馆，声称上海已被他们接管，并要求总

领事在维护租界秩序方面进行合作。事实上，革命军已经和平地占领上海城和吴淞炮台，而且经过小的战斗之后占领了江南制造局。

然而，关于沪宁铁路发生了困难的事情。11月3日，有三、四十名起义军进入火车站，其中一人留在电话室内，他开始玩弄电话机，被总办朴柏先生捕获。根据朴柏先生的请求，并得到首席领事的同意，法磊斯先生授权志愿兵占领火车站，他这样做的理由是：火车站靠近一个具有动乱趋势的地区；虽然该路是中国政府的铁路，但它是英国资本修筑的，而且是在英国人的监督之下经营的。

英王陛下总领事在报告吴淞炮台、上海城及江南制造局被占领的时候说：当革命军首领们一旦抽调一支有组织的部队保护火车站时，志愿兵便立即撤退；该首领们已经保证，只要该路不被用来为任何一方运输军队和军火，他们便不干涉该路的经营和收入。他又说：谣传两江总督用火车运兵收复上海。我收到此项报告后，立即催促外务部对该总督迅速发出指示，不得利用该铁路运送军队，或采取任何可能在上海及其附近地区引起战事的行动；我并指示英王陛下驻南京领事按照同样的意思向总督阁下提出紧急抗议。我把我采取的行动通知法磊斯先生的时候说：在了解总督的意图以前，志愿兵延期撤出火车站，这也许是可取的。但他直到第二天早晨才收到我的电报，当时他通知我：火车站已经交给了一支身穿制服的革命军警卫部队，总办认为该卫队是令人极为满意的。总办也报告说，铁路沿线一切都很平静，而且他从苏州火车站站长那里获悉，有六名士兵已经到达，驻守火车站。本月6日，我收到英王陛下驻南京领事的-份电报说：总督已向他保证，由于涉及外国人的利益，他目前将不派兵收复上海，但如果上海变成为革命活动的基地，他不能保证不派兵前往收复。

当时，我已查明：虽然清政府很想维持该铁路的中立，但如果没有一项绝对的保证，使该路不致被起义军用来运送军队或军火，则清政府不能同意照此办理。为了保证做到这一点，清政府认为：上海火车站如不由各国占领，便须置于各国的有效监督之下。它已经得到消息说，未穿制服的起义军新兵已由铁路前往苏州。我电询英王陛下总领事，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提出清政府所希望的那些保证。他于本月7日答称：总办在回答革命军首领提出的一项类似要求的时候，已经说明，给各火车站站长发布了指示，不许他们接受承运军队或军火。然而，法磊斯先生指出：没有可供使用的部队执行这些指示；总办正尽力防止对中立的任何违犯，但提供所要求的那些保证不是切实可行的。上海发布了一个通告，宣布该铁路是一个纯商务企业，拒绝接受那些可疑的人员或物件。法磊斯先生又说：他有几位同事以及大部份各国人士不喜欢占领火车站；他们将反对重新占领该处，特别是因为起义军已准备于11月4日夜间攻击志愿兵，如果志愿兵不撤退的话。

法磊斯先生后来又于11月12日来电，我曾荣幸地在我第二天发出的电报中向您转述该电的内容。他在该电中指出：关于沪宁铁路的形势已发生实质上的变化，因为该路全线已为革命军所占有。他建议说：把禁止运输军队和军火的范围限制在距上海终点站十英里的地区，将足以阻止纠纷，并避免严重磨擦的危险，因为革命军中的好战分子如不遵守该禁令，他们毫无疑问地能够这样做，而不致遭到有效的反抗。

我在本月13日的电报中，已向您重述我对法磊斯先生所作的答复。我在该答复中授权法磊斯先生：只要起义军无可争辩地保持占有该地区，便可同意所拟议的那种限制办法。但是，我认为，总办应把他关于被迫采取行动一事所提出的正式抗议记录在案，

而且起义军的一切运输应继续在纯商务的基础上加以处理。我相信，为了债券持有人的利益，铁路收益已存入汇丰银行的特别帐目内。

本月14日，英王陛下总领事收到最近被任命为民国政府外交总长伍廷芳对于继续坚持禁运军队等所提出的正式抗议。法磊斯先生按照上述指示的意思作了答复。然而，总办极力申述距上海十英里的南翔地方对扩大火车装载业务很不方便，因此，法磊斯先生同意使用该铁路终点站，但须获得朴柏先生的同意，并发布适当的通告。

法磊斯先生在电告此事的时候，又说：该铁路的经营将不受影响，全部车票和运费均应预先交付，而且我所设想的关于铁路收益存入银行一事是正确的。

本月4日，法磊斯先生来电通知我说：道台已写信给首席领事，请求派巡捕保护设在公共租界内的洋务局，因为起义迫使他在该处办理海关监督事务；由于道台在租界内执行官方职责的问题将在本月6日召开的领事团会议上加以考虑，所以要求我对这个问题给予指示，同时还提到干扰会审公廨的可能性问题。我在本月5日的复电中通知法磊斯先生说：不能够允许道台在租界保护的掩蔽下，把租界内的洋务局变成一个衙门或行使任何官方的职能，因为不可能期望上海的各国人士为了隐藏那位已丧失地方控制权的清政府代表，而使他们自己容易遭到起义军报复的危险。

我的同事们已表明同意该项意见；四天后，致电首席领事，照上述意思作了指示。当然，有此明确了解，道台可以作为一个平民继续在租界内居住。

至于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廨及设立的其它机构，我相信，只要我们保持严格的不偏不倚的态度，起义军将会禁止一切干扰。我在把这个意见通知英王陛下总领事的时候说：就我个人来说，决

不愿接受对过去所施行的租界管理办法作任何修改，我准备建议由一支武装部队占领上海；我授权他在必要的时候，使一切有关人士了解这一点。

各国使节同意发出的那些指示，系命令严守不偏不倚的态度，并授权领事团同该地事实上的统治者起义军当局联系，处理保护外国人生命财产及维持公共租界地位所需要的一切事务。

本月8日，我收到外务部的一件照会说：它获得消息，国外的革命党人已经购买要塞炮和机关炮，这些大炮大约在五天后将经上海入口；它要求外交团立即致电上海领事团，指示他们如有任何此类军火运入上海，予以扣留。这项要求似乎在法律上是可以照办的；由于其他各国使节同意这个意见，所以致电领事团，授权他们会同海关当局，采取那些他们可以采取的步骤，以满足外务部的愿望。我把这些指示通知海关总税务司，他在复函中告诉我：已经给上海海关税务司发布命令，将运入该口岸的所有军火置于海关的控制之下，如有必要，可请求领事团给予支持。

朱尔典谨上 1911年11月15日于北京

第100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1年12月8日收到

阁下：

继续谈我本月5日信中所说的事，我荣幸地附上英国驻汉口代总领事关于该口岸形势的两封来信的副本。

我在通知葛福先生收到他上月26日来信的时候，表示我完全同意他收容满族难民的行动。

湖北：自从葛福先生10月29日来信的那一天以来，汉口的事情显然已经平静下来。海军中将温思乐爵士于11月7日电称：战事几乎已经停止，各国租界相当安全，汉口城内已无起义军部队。

两天后，海军中将阁下询问我说：我是否可以建议中央政府召回清军，因为继续战斗似乎是无用的，并且妨碍贸易的恢复。我以前见过庆亲王，他向我保证：就清政府所能够控制的局势来说，将停止继续战斗。虽然我毫不怀疑袁世凯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我希望有机会向他说明此事，因为维持长江一带军队的粮饷问题不久一定会使人们认识清楚。此外，如果部队没有获得适当的给养，他们似乎就有堕落成为一帮帮土匪的某种危险。

萨镇冰提督的舰队对清朝的事业似乎始终仅给予冷淡的支持；我承认，当我听说他率领的三艘巡洋舰于11月12日悬挂革命军旗帜驶向下游的时候，我并不感到十分惊讶。现在，它们停泊在九江附近。后来，炮舰接着下驶，但人们还不知道它们以什么为借口。

湖南：我附上英王陛下驻长沙领事写来的一封有趣的信件，它描述了长沙城归附革命的情况。实现这种转变，并不是没有引起相当大的惊慌，但外国人似乎没有遭受任何损失。直到11月7日，翟比南先生来电报告，该地有一艘日本炮舰和一艘美国炮舰停泊，以前还报告过有一艘德国炮舰停泊。翟比南先生还说：目前总的形势已经改善，大部份妇女和儿童已经离去，其他外国侨民留居在岛上。

江西：英王陛下驻九江领事来电报告说：南昌、饶州、武城、南康以及鄱阳湖畔的其他口岸均已在起义军手中。该省巡抚^①在九江吞鸦片烟自尽。

安徽：芜湖于11月9日静悄悄地落入革命军手中，但英王陛下领事报告说，随时可能发生派系斗争。他又说：该口岸有三艘外国军舰，他不担心侨民的安全。据说，安庆及皖北大部份地

^① 冯汝驥。

区也已脱离清朝。

广东(广州、汕头)：广州情况的变化很迅速。新任满族将军凤山于10月25日才到达，10月26日便被一颗炸弹炸得真正粉身碎骨。前一天，在绅商大会上曾经讨论该省的事情。11月9日，首席领事收到一个名叫胡汉民的人来信说：广东已宣布独立，受中华民国军政府的管辖；他本人被举为总督，用都督的称号。他答应由他自己负责保护外国人及其财产，并要求按照湖北所采用的方式进行交往。直到目前为止，广州城是平静无事的，但库藏空虚，因此，又有两连印度步兵在香港做好准备，以便在必要时派往广州。

在广州停止效忠于清朝的同一天，总督认识到抵抗是无济于事的，于是逃往沙面英国租界，他于当天较晚的时候由该处乘坐英王陛下军舰“汉德”号¹⁾前往香港。

11月11日，杰弥逊先生²⁾来电说：情况愈益恶化，因为武装匪徒约有七千人之多，在城内吵嚷索取银两，然而无银可付，有相当地位的中国人正纷纷迁徙。

外交团在11月13日举行的会议上，关于广州领事团与起义军政府的关系问题，决定对该领事团发出指示，那些指示同发给汉口领事们的指示相类似。

11月9日，有好几百名革命军自广州乘轮船抵达汕头，并占领了所有的政府机关以及电报局和火车站³⁾。11月11日，革命军占领了潮州。无论在汕头或潮州，都没有发生抵抗或骚乱。

福建(福州和厦门)：广东的事例，立即被邻近的福建省所仿效。英王陛下驻福州领事发来简短的电报说：该城经过激烈战斗

1) 疑为“灵巧”号之误。

2) 英国驻广州总领事。

3) 汕头没有火车站，此处原文有错误。

后已被革命军占领；总督^①自尽；满族将军^②被斩首。然后，革命军首领孙道仁掌握了控制权。在厦门，道台和其他官员们在一艘中国巡洋舰上避难，给革命军留下了一块没有障碍的地盘。

广西同时宣布独立，由巡抚^③担任军政府的首脑。谘议局变成了议会。关税和厘金照常征收；条约得到承认；外国商人和传教士受到严格保护。

浙江：浙江省以杭州、宁波和温州等地为代表，新旧交替，而没有发生动乱。在附上的赛斐敕先生的来信中，对杭州的经过情况作了叙述。

江苏：南京出现的形势对英国的利益甚为重要。我将就这个问题另写一封信给您^④。

在镇江，各炮台于11月6日悬挂起义军的白旗；11月8日，新军政府副都督把一封公函交给了皮茨标先生。虽然发生了短暂的惊慌，但形势绝不是很危急的，因为满族人未经斗争便交出了他们的枪械。皮茨标先生又报告说：自新政府就任以来，海关岁入已交付给该地汇丰银行的经理人。我可以说：这是安格联先生^⑤很明智地建立起来的一个程序，各地起义军政府都已对该程序表示同意。由于海关岁入已被作为外债和赔款的抵押，所以在它们最后被分配偿还外债和赔款之前，它们都存入安格联先生的帐内。这个问题也应同我写的关于革命运动的一般报告区别开来，另作讨论。

云南：没有得到云南府发来的进一步的消息，我们可以设想

① 松寿。

② 朴寿。

③ 沈秉堃。

④ 原编者注：参阅第120件。

⑤ 清政府的海关总税务司。

该处情况继续平静。当腾越出乎意外地宣布赞成革命事业的时候，英王陛下领事史密斯先生正在缅甸与官员们商讨边境问题。他得到此项消息后，于11月14日立即返回他的任所，发现一切事情都很平静。所有的外国人都已前往缅甸，他们的财产有人看守。然而，他来电说：他没有得到关于大理府传教士们的消息，该地仍受清朝管理。我已经授权给他，如果他认为有必要而且又很安全，便前往该地查明事情的真相。

四川：我没有收到四川最近发来的电讯，但我从务谨顺先生来信中获悉，成都的形势并不令人感到惊慌。那些走漏出来的消息虽然常常是不很可靠的，但说明战争仍在该省各地继续进行。各教堂均未受伤害。

山东：山东现已与大多数省份联合。11月2日，英王陛下驻济南府领事报告说：第五镇的两千名士兵被调往前线，另有两千人奉命做好准备。他们是否将前往该处，似乎是难以预料的。北京政府由于立即接受济南学生提出的许多革命要求，从而又一次公开显示了它的彻底衰弱。该省的答复是宣布独立，巡抚¹被推举为山东共和国总统，第五镇统制²被推举为副总统。军队被置于武昌革命军统帅黎元洪的节制之下。

烟台也成立了军政府。附在波特先生11月5日来信中的黎元洪告山东人民书，作为向各省革命舆论进行呼吁的一个样品，是很有兴味的。它们都提到了汉人在满族人入关后所遭受的痛苦以及近三百年来他们所受到的专制统治。波特先生的来信及其附件，均随信奉上。

第二十镇：关于直隶省的态度，人们仍然抱有希望。目前，皇帝的权力在京城和天津继续有效。著名的驻滦州第二十镇统制

¹ 孙宝琦

² 贾德懋，即贾宾卿。

张绍曾已抵达天津。该镇部队已离开滦州前往永平府。我获悉，已下令派火车将该镇运往黄河以南；据说郑州系目的地。

山西(太原府)：清政府已充分认识到起义军在山西铁路上所据地位的重要性，即使起义军未曾在京汉铁路上截断南方与北京的交通，但他们能够从所据有的地位进行威胁。事实上，有迹象表明，正在石家庄集中兵力驱逐起义军。11月8日，天津代总领事获得可靠消息说，太原府的所有外国人均安然无恙。

东三省：盛京代总领事说：无可怀疑，东三省学界意见对普遍希望在全国消除满族统治势力一事深表同情，尽管在其他地方使斗争如此激化的满汉种族之见，很少存在于东三省。吴理斯先生于11月11日来电报告说：过去几天内，革命派秘密派遣的人员在盛京积极活动，但总督赵尔巽和革命派都很想避免任何动乱，因为他们担心外国干涉。协统蓝天蔚所统率的第二混成协的态度，使人们有某种理由感到忧虑，但该军内部有意见分歧，奉天谘议局顺利地组成了以总督为首的保安会。

朱尔典谨上 1911年11月13日于北京

第100件附件1 代总领事葛福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自从本月21日我写上封信之日以来，关于革命运动很少发生值得记述的事情。

24日晨，清军向前推进，将起义军逐回十公里处，现在他们在那里挖壕沟设防；看来清军在继续发动进攻以前，正等待援军的到达。就我所知，铁路桥梁完整无缺，据起义军说，他们之所以保持那些桥梁的完整，是为了便于他们进军北京。传闻萨镇冰提督统率的一支具有十八艘炮舰的舰队，停泊在九江至汉口之间的各个地方。

昨天下午，太古洋行的经理人向我报告说：有些起义军士兵登上泊于租界外面该洋行码头的“大通”号轮船，目的是逮捕几名刚由荆州抵达此地搭乘轮船的满族人。我立即去见舰队司令，他派了一支武装卫队将那些满族人（一名男人和两名妇女）带至领事馆，他们在馆内过夜。今晨，他们乘坐一艘英国轮船前往上海，一支武装卫队护送他们上船，并留在船上，直到该船离开为止。

昨日傍晚，一名身穿洋服、形状下流的中国人来到我这里，开始谈到那几位被我留在领事馆大院内的“满族乱民”，但我拒绝听他谈话，并把他赶走了。由于此事，我请求舰队司令于昨夜增派领事馆卫队，他已照办。夜间十时，有人向我报告：看见一名起义军士兵在领事馆大院周围鬼鬼祟祟地活动，经查问后，他逃跑了。

今天，我通过间接的方式将此事提请黎元洪都督注意，并向他指出：他的部队不能够登上英国轮船，而且我们将不交出政治犯。同时，我对这种继续搜寻满族人的行动表示惊讶，这一政策不能不使外国人失去对革命党人及其事业的同情。

葛福谨上 1911年10月26日于汉口

第100件附件 2 代总领事葛福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总司令官的那些电报将会使您了解此地军事行动的过程；我将使我的叙述限于一般的形势。

近两天来，租界内有不少建筑物被炮弹和开花弹所击中，枪弹在街道附近噼噼作响。租界内有些人受伤，其中两三人性命垂危。此时（上午十一时），清军携带大炮在租界西部边界的湖北路，从该处对汉口城那边的起义军进行炮击。各国租界的边界由水兵和志愿兵坚守；他们有许多次险些被四处飞扬的枪弹所击

中。街道上都设有路障，双方都被置于租界之外。起义军大都是新兵，他们遭到的猛烈炮火抑制了他们的热情；在过去十六小时内，他们已尽快地逃往武昌。租界内各医院已住满起义军的伤员，专供此项目的之用的美国大教堂、邮政局及其他建筑物也是如此。据估计，租界内的伤员一定大大超过五百人，他们仍在蜂拥而来。

27日下午，萨镇冰提督通知海军中将温思乐爵士说：他将于次日下午三时开始炮轰武昌。因此，昨天中午，本口岸内所有的商船驶往下游约十英里处，它们现在仍泊于该处。各洋行曾经向它们的中国雇员们保证，如果发生严重动乱，便把他们置于趸船上，拖往安全的地方，这样才使那些雇员留下来而没有离散。当接到炮轰武昌的通知后，所有中国人都要求前往趸船，因而那些趸船统统被拖走了，现在没有一艘趸船泊于英国码头。许多人已没有一个仆人留在身旁，他们必须竭力照料他们自己。

起义军坚持把电报局迁入汉口城内，结果外国监督和所有报务员均已离去。此事意味着现在任何地方与汉口都没有电报联系。在炮轰武昌结束以前，我们大概不会有轮船来往。从昨天萨镇冰提督很不成功的活动看来，这种情况很可能将延续一些日子。

葛福谨上 1911年10月29日于汉口

第100件附件3 翟比南领事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我荣幸地把湖南革命运动的情况报告如下：

关于湖北乱事的第一个迹象，是当时他们派了三百名士兵于10月10日夜间乘“吉安”号轮船开往汉口，中国炮舰“楚泰”号于第二天载着另一支部队离去。

后来，我不得不对海关道台的一项通知提出抗议，因为他打

算派一队士兵在抵达长沙的英国轮船上搜查军火。然而，直到临时政府成立为止，不再有英国轮船到达此地，因当时所有的轮船都被汉口的中国人租用，运送他们前往上海。

10月16日，当我给您回电的时候，湖北的乱事显然没有在长沙唤起响应，虽然人民对汉口事件的发展十分激动。然而，当天晚上，有一艘日本轮船运载一千多名旅客到达，据说其中有一大批革命党首领，他们前来发动此地的运动；次日，便可觉察到形势的明显变化。谣传一名蒙古族的巡警道以及一名满族副将均不知去向。

人们都知道军队对运动抱有同情，他们的弹药已被收缴，并存放在附近的制造局内。另一方面，据说防营忠于清朝并被许以重赏，已全副武装起来。驻守外县的防营逐渐调入长沙，而军队则被分为若干小队派往他处，分布于全省。

10月17日下午，我获悉，革命党人策划于10月18日夜间起事；第二天早晨，我得到证实该项消息的报告。我随即向外籍人士发出一项通知，把信号告诉他们，因为经海关税务司允许，在认为他们必须离开长沙城的时候，便在海关发出那些信号。当天下午，信号便悬挂出来，大多数外国人渡江住在岛上，主要是住在税务司的房屋内，该处已提前准备粮食，而少数人留住在北门外本领事馆内。

那天夜间，军队确实企图进城，他们的营房位于东门外。他们放火焚烧贮藏在马棚内的稻草，期待着因运救火机而开放城门；但防营始终保持中立态度，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然而，军队在混乱中设法从制造局取回两万发子弹。次日，海关道台试图将这些子弹收回，但该军统领不愿交出来，并且进一步拒绝允许再将他的士兵调离长沙。

如上所述，此时没有英国轮船来往，但幸亏有两艘日本轮船

根据同它们的政府订立的邮件合同，保持此地与汉口的交通。此外，在我的要求下，日本领事同意留下其中的一艘轮船，直到另一艘轮船到达为止，所以始终有一艘轮船泊于本口岸。

10月20日，一切似乎都很平静，所以我允许外国人返回城内。10月22日星期日早晨八时半，我收到一份报告说，各处都极为平静。上午九时半，以前在本领事馆担任文书的李先生又跑来告诉我：有一批军队已进城，某些革命军代表与他们在城内会合，已前往巡抚衙门。该军萧统领^①看到不能够控制他们，干脆不再露面；防营坚持他们的中立政策，拒绝关闭城门；巡抚的亲兵已被他们争取过去，不进行抵抗。到下午二时，全城已落入革命军手中，未费一枪一弹；到处飘扬着白旗，袖子上带有白色徽章的卫队在街道上巡逻，以维持秩序。早上的那种激动情绪，迅速地平息下来，就象它曾经迅速地出现一样。运动一旦已成为既成事实，防营也戴上了白色的徽章，并且帮助维持秩序。

这时，作为一项预防措施，我发出了信号：城内的外国人再度过江前往该岛，而北门附近的那些外国人则聚集在本领事馆。

当天较晚的时候，我收到革命军的一封信，通知已成立临时政府，保证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及承认借款和赔款，并且要求英国臣民遵守中立。

我后来获悉：防营统领黄忠浩已被军队杀害，因为他在收缴他们的弹药中起了作用；劝业道道员和长沙知县也已被杀，因为他们拒绝交出关防和文件。该知县的首级悬挂在小西门城门上示众。这一行动在人民中间引起了不小的愤怒，因为该已故知县很受各阶层人士的欢迎。长沙知府、巡抚、布政使、巡警道及海关道台都已设法逃走。

① 湖南混成协协统萧良臣。

革命军所采取的首批措施之一，就是关闭各城门，向所有的主要绅士和其他富户征收捐税，不管是强制的还是自愿的。那些被特别指名勒捐的人，是过去曾为满清王朝明显效劳者的家庭，如曾国藩、左宗棠和其他人的后代。据说曾国藩的后代已被迫捐五十万两。的确，若干时候以来，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担心他们的生命安全，驻在该省的所有满族官员也是如此。然而，通过谭延闿的及时调停，他以死力争，终于避免了一次大屠杀。

10月24日，外交司长完全以非正式的方式来访问我，宣布他的职务，并重申临时政府来函中所提出的那些保证。我注意到保护外国人生命财产的那个保证，并抓住这个机会指控电报局阻碍我拍发密码电报。陈先生^①向我保证说，今后将不会有任何困难。

10月25日，我接受了陈先生的第二次访问，他要求我将所有的外国人留住在城外，作为一项临时的措施；但当我询问他提出这一要求的原因时，他没有给予满意的答复。然而，我后来从其他方面获悉，城内民党的两个派系之间存在着分歧意见，主要是由于副都督^②怀有阴谋诡计，它随时有爆发公开战斗的危险。因此，我认为立即执行关于外国人在未通知我之前一律不得入城的那项规定是可取的。

10月26日夜，纠纷达到了严重关头，当时士兵们预料到有战争发生，拔出了手枪，装上了刺刀。然而，在最后时刻，由于副都督获得一万两赏银的酬报而辞去职务，所以避免了危机的爆发。随后，形势大有改善，而德国炮舰“祖国”号的及时到达，进一步使外国侨民感到放心。

① 湖南临时军政府外交司长为粟戡时。此处所说的陈先生疑指湖南特派交涉员陈安良。

② 陈作新。

事实上，副总督最后没有履行他辞职的保证。另一方面，都督的举动似乎始终是温和的，他发布一项告示，进一步致力于平息纷争。该告示说：临时政府既已牢固地建立起来，他打算辞职；应采取步骤推举一位继任者。然而，10月31日，都督和副都督都被军队击毙，长沙城又一次陷入了混乱状态。谭延闿被军队推举为都督。不过，他没有军事方面的经验；人们获悉，防营统领赵春廷被任命为统帅。虽然传闻他受到他自己所率防营的爱戴，但他对军队的影响，如果有任何影响的话，大概不是很大的。

可以很公正地说，目前的形势是严重的。我还没有能够确切查明，两位都督为什么被军队所谋害，但是，认为谭延闿如果不能使军队感到满意，最后也许会遭到同样的命运，这个看法不是没有道理的。在那种情况下，结果必定会出现无政府状态。人们还预料那两位被害都督的追随者们将致力于报仇；由于预先估计到这一企图，所以现在城内到处布置了士兵。缺少军官的军队是使人不抱任何希望的；纪律日益松弛；已经在本地另募新兵约两万人，大部份是从无业游民中招募的，如果开始进行抢劫，他们将首先参与其事。清军收复汉口和汉阳两城并向长沙进发，也将足以加速动乱的爆发，在那种情况下，外国人士的地位肯定将是危险的。鉴于形势的很不稳定，而且很可能出现一个变幻莫测的冬季，所以我正在安排妇女和儿童离开长沙及湘潭，在河水降落和轮船停止航行以前前往汉口。至于那些居住在较远地方的外国人，我不可能说，较安全的地点是继续住在他们现在所住的地方还是前来长沙。因此，为了外国人的安全起见，我让各教堂主持人自行斟酌，按照他们认为是最好的办法行事。

情况无疑地日益恶化。临时政府的好几位成员已经不知去向；昨天，我收到新都督的一封来函，要求目前将外国人留居在岛上。此地泊有一艘日本炮舰，但发生动乱时，它将主要用来照

料日本人士，他们的人数同所有其他外国侨民加在一起相等。由于当时没有发生实际动乱，“祖国”号军舰根据原来收到的德国舰队司令的指示，在停泊四十八小时之后，已于10月29日离开此地。因此，我冒昧地表示这个意见：如果此地不泊有另一艘炮舰，外国人士就不能够有理由感到安全。

我已做好安排，如果我终于被迫离开领事馆，便迁往岛上。此事似乎不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现在人们普遍相信清军已收复汉口、汉阳两城的消息，而且本领事馆直接位于革命军撤退时将要经过的路线上，如果发生战事，又处于炮火线之内。

翟比南谨上 1911年11月2日于长沙

第100件附件4 赛斐敦领事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我荣幸地报告：杭州城已于昨天清晨二时被革命党所占领，没有发生任何战事，只是当天较晚的时候与满族人在满城内互相开枪射击，对双方所造成的损失似乎都很小。陆军于夜间从附近的营房被引入城内；巡抚增韞被俘，他的衙门中弹着火，全部被焚毁。

除了邮政局和海关之外，所有的政府机构立即被革命军占领，铁路、电报、电话等局以及清政府的银行等也是如此。

昨天，我两次试图向您电告这些事情，但我的密码电报均被退回，虽然我给英王陛下驻上海总领事的一份密码电报似乎已于下午被允许拍发。有许多地方的电话线已被切断，除了电话之外，其他方面的交通几乎没有中断。汽艇和火车于日间照常行驶。

星期六晚上，属于台州防营而于最近调至杭州的一队士兵，被派来保护领事馆和租界，由一名参将及一名游击率领，他们两人都是很漂亮的青年军官。星期日拂晓，这些士兵和军官，同地

方警察以及两艘武装汽艇上的人员一起，出现时都在左臂缠绕白带。

革命计划显然是精心制订的，实现时只遇到最小限度的抵抗。本地官员在几小时前很明显地得到警告。提法使启约被推举留在他的衙门内听天由命。他大概被一颗流弹击中，负了轻伤。海关道台锡嘏也是一名满族人，似已逃走。满族将军^①同满族人一起困守在满城内，最初拒绝投降，尽管他们已被允许获得赦免，如果交出武器的话。

洋务委员王丰镐利用一个似乎很有道理的借口，于该日下午离城。他前来通知我说：他认为，外国妇女和儿童应离开杭州城。那时已经太晚了，不能如此行动，因为各城门均已关闭；但我打电话通知梅恩医生，并发电报前往上海，向其他各有关领事提出警告。我以前曾经要求巡抚，当他一旦认为不再能够保证对城内的外国人给予保护的时候，便送信给我。

虽然若干时候以来本地中国人对革命党显然抱有同情，但直到最后时刻为止，没有泄露任何事情显示杭州的陷落已迫在眉睫。我自己的印象以及一些消息灵通的中国人的印象，都以为在决定武昌革命的命运以前，此地将不会发生任何明确的事情。

一些时候以来，荒诞的谣言和警报无疑是很多的。曾经发生的一次惊慌使得杭州城一半以上的居民遗弃他们的家园，去其他地方寻求安全。但是，现在普遍存在的忧虑似乎是没有重要根据的。

此地和其他地方一样，革命在表面上纯粹是军方干的；但从本地报纸看来，它是汤寿潜和諮议局扶助和组织的。陆军已被收缴弹药，其中大部分发给了满族人。但是，高级军官都感到不满，

^① 德济。

他们中间有一人曾经管理城内的弹药库和仓库。满族人所掌握的一尊机关炮，曾被一位聪明的汉族机械工人所损坏，他最近被请来修理该炮。一星期以前，法国传教士们致函海关税务司铁士兰先生说：防营每天询问他们的长官，配带白色徽章的时刻是否还没有到来。

事实上，杭州城居民中间的惊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担心满族人表示好战。已经发生的几起伤亡，大都是由于自满城乱放来福枪所造成的。满族人还击毙了第一个被派去同他们开始谈判的使者。于是，革命军在附近的山上架设大炮，白天对满城施放空弹，同时通过电话与满族将军建立了联系。他们以夜间进行真正的炮击相威胁，同时提出建议，如果满族人同意交出武器，便可以赦免他们的性命并对他们给予临时津贴，这些条件终于起了作用，一场可怕的大屠杀便这样避免了。

在上海的汤寿潜接到邀请的电报，于星期天傍晚抵达杭州。他最初拒绝接受管理各项事务，尽管已经用他的名义发布告示。但是，由于缺乏任何其他著名领袖，而且在那些担任行政各部门管理工作的谘议局成员中间已经明显表现不和，所以他暂时接受了该项任务。至于迄今已经被任命担任公职的人是否长期担任下去，那是很不确定的。

海关照常办公。税务司仍主管征收关税，但已议定大部分税款在上海交付。如果象人们所说起义军打算将所有厘金税予以废除，那么，此地海关的作用将不复存在。当然，这种情况适用于大多数内地口岸。

税务司拒绝悬挂白色旗帜或共和旗帜。他重新使用前任总税务司^①的绿色和黄色旗帜，并且向前来访问他讨论此事的革命军

① 赫德。

代表解释说：海关必须保持中立。

共和旗或“光复”旗是红色的，右上角有一白色方块，其中嵌入一个用蓝色勾画的太阳。

直到目前为止，革命军军官对外国人表现出极有礼貌。现在所施行的保护外国人的各项办法，较几天以前旧官吏所施行的办法要更好得多。秩序普遍较以前良好，人们正开始重新恢复信心。

赛斐救谨上 1911年11月6日于杭州

第100件附件5 代领事波特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我荣幸地附上黎元洪都督告山东人民书的译文，该书号召他们对湖北革命军提供帮助。

该书多少带有古典文学的体裁，显然意味着主要是向知识阶层而不是向广大群众呼吁。若干天以来，它在海军学堂的学员和水兵中流传；我力图获得一份，当时它已于上星期五在本地中文报纸上发表，这一轻率行为未曾引起中国官员的注意。

该报纸几乎在每个场合很天真地避免直接提及满族人，凡出现这些字样的地方，均用空白来代替它们。

人们收到该告山东人民书后，在烟台似乎迄今还没有产生任何效果，虽然传闻海军学员中的一些较激烈份子已经切断一两个手指，作为他们具有爱国心的表现。

那些最有资格做出判断的人认为，目前此地发生骚乱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但是，道台为了以防万一起见，请求从登州地区调来士兵五百人，以便当下层居民力图利用事态制造骚乱时，用来维持秩序。

他们中间有一队士兵已经到达，而且几天前从“克勒特克”号轮船上卸下了大批弹药，供他们使用。

昨天，在城内各显著地方的墙壁上张贴了告示，下面是该告示的译文：

“告我同胞，速举义旗，协助民军，驱逐满清。”

警察迅速地撕去了这些告示，没有人企图重新张贴它们。

昨天，道台写信给各国领事，要求他们通知各该国人民，在目前很不安定的情况下，不得输入任何武器或弹药，或将武器弹药卖给中国人。

由于现行各章程已经足以防止武器和弹药的输入，我感到所要做的事情只不过是正式表示收到该信。海关税务司告诉我，那就是道台所希望我做的全部事情。

今晨，有一项未经证实的谣言说，在谘议局的默许下，济南府发生兵变，结果占领了德州军械局，但是，在本口岸自由传播的许多谣言中，不可能核实某一项谣言。

波特谨上 1911年11月5日于烟台

第101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1年12月4日收到

阁下：

由于这个国家的前途可能受到财政问题的很大影响，所以注意到这件事是很有兴味的，即关于已故慈禧太后所积攒的内帑，人们听说过许多而真正知道的却很少，现在终于被用来支付清政府目前的费用。大约一个星期以前，有三十三箱金条，约合银三百万两或折合四十万英镑，已由内廷交给度支部，并由该部存入汇丰银行本地分行。约占全部金条的三分之一已经出售，并转交陆军部，以供购买军火和支付兵饷。

除了这个前所未有的将内帑用于政府所需的事例之外，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比它更有力地说明急迫的财政困难情况。大部份金

条所附印记表明，它已储存四十多年没有使用；庚子赔款和近年来任何其他紧急需要都从来没有动用过。人们认为，现在所拿出来的款额仅占已故太后所遗留下来的财产总额中的一个很小的比数，但是，从对此事所作的调查中不能得出任何准确的情报。

作为对北京方面处理财政办法的一种责难，可以允许人们将目前的情况同所有该款项已被用于适当投资，并产生比现在多三、四倍款额的情况进行对比。

外债暂时仍由清政府在伦敦的存款偿付。沪甬、沪宁两铁路借款于今天照此办法付还。我知道，沪宁铁路借款的付还，是由该路进款补拨的，但是，必须由外国人监督中国财政的日子已不太遥远了。

朱尔典谨上 1911年11月16日于北京

第102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1年12月4日收到

阁下：

过去若干时候以来，我们感到，外交团对于伴随这个国家目前的内战而来的悲惨暴行应给予某些注意。本月13日在本使馆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各使节普遍表示意见说：应当警告清政府，曾经在武昌、汉口和其他地方发生的那类暴行被文明世界认为是憎恶的事情；各国使节希望合法当局尽力防止这些暴行的重演。

我于本月16日代表我的同事们将此意照会外务部，现荣幸地附上该照会的副本。同一天，我向驻上海和汉口的首席领事发出一份内容相同的电报(附上该电报的副本)，把外交团所采取的行动通知他们，并指示他们采取类似的步骤，使那些地方的事实上

的主管当局深刻地认识到，如果重新发生这些大屠杀事件，他们将承担重大的责任。

人们担心，现在必须把南京补充列入满汉之间的斗争以残暴闻名的那些地方的名单中。

朱尔典谨上 1911年11月17日于北京

第102件附件1 朱尔典爵士致清政府的照会

促使发布本月11日谕旨的那种仁慈精神，是与宽容和博爱的理想完全协调一致的，这些理想是现代文明的光荣，因此，派驻北京的外交团认为，他们有责任利用这个机会表示对此感到满意。

各国使节抱有希望，中国政府和人民将认真地努力避免将来重新发生那些类似最近在武昌、汉口和太原府已经发生的大屠杀事件，那些事件所造成的恐怖引起了全世界的谴责。

在这种情况下，外交团有权利和义务促请合法当局注意，迫切需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防止类似暴行的重演。

外交团认为，如果当局方面不履行这项重要的职责，便将构成一项不可饶恕的过错。

1911年11月16日于北京

第102件附件2 朱尔典爵士致驻上海 和汉口首席领事电

1911年11月16日发自北京

外交团已经就中国各地正在发生的屠杀大批无辜人民一事，向清政府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并且警告清政府说：这些行为激起了文明世界的愤怒。由于这些屠杀事件无论是谁干的，都是很可恨的，所以外交团指示您用类似的词句，向上海掌权的当局提出一项通知，使他们想到他们可能承担的重大责任。

第103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1年12月4日收到

阁下：

袁世凯于13日抵京，不久便组成了新的内阁，因为摄政王于昨天发布了一道谕旨，任命新内阁总理于该日陛见时推荐任各部首脑的那些人为国务大臣。同时，又发布了另一道谕旨，任命各部副大臣。

我荣幸地附上一份内阁成员的全部名单，各部副大臣和临时代理副大臣的姓名也一并附上。在这份名单中，还补入了各大臣的原籍。

梁敦彦再度被任命为外务大臣。在他未到任之前，由那位在国外有长期经历的胡惟德署理。

赵秉钧是袁世凯的特殊伙伴之一，被批准为民政大臣，而任命杨士琦署理邮传部大臣一事，为唐绍仪返京担任实缺开辟了道路，因为在盛宣怀垮台后，唐绍仪最近已在公报上被公布授与骸实职。

关于严修被任命为度支部大臣一事，很可能引起某些批评，因为他迄今在行政工作方面的经验仅限于学部，曾任学部侍郎。然而，他将得到新任副大臣陈锦涛的有力协助，目前陈锦涛任大清银行副监督，最近曾经作为度支部的代表同四国银行团一起在柏林出席币制会议。他是由美返国的最著名的留学生之一，而且被认为是一个有真正才能的人。

前学部大臣唐景崇仍保留他的职位，而司法大臣一职已给予沈家本。沈家本是一位翰林，对中国律例享有很大的权威，也是资政院中的通儒硕学之一。在该院去年的第一届会议期间，他还担任副总裁。

新任陆军大臣王士珍是袁世凯所信任的一位朋友，在他被任命署理湖广总督的前几天，曾任江北提督。水师提督萨镇冰仍回海军部，将得到他以前的同僚、海军部副大臣谭学衡的协助。

一项很有趣的任命是张謇被授与农工商部大臣。他以前是清朝科举考试中的一名状元，现任中国教育会会长。他被选拔出来将受到各省的欢迎，因为他被认为是工业发展的开创者，但他是否接受这个职务是令人怀疑的。理藩部大臣达寿是一位满族人，以前曾充任该部侍郎之职。杨士琦仅被任命为署理邮传部大臣，他曾任上海南洋公学监督及轮船招商局督办，最近又曾充任南京劝业会审查长。邮传部副大臣梁如浩，人们大都称他为“M. T. 梁”^①，在美国受过教育，曾担任天津和上海两地海关道台的职务。

所有任命中最惊人的一项，也许是梁启超被任命为司法部副大臣。他是康有为的最著名的同事，1898年政变时勉强设法逃出国内。自从那时候以来，他主要是住在日本，写了很多书，特别是关于法律问题的著作。

另一位广东人如梁士诒作为署理邮传部副大臣而重新掌权。

朱尔典谨上 1911年11月17日于北京

第 103 件附件 1

清朝内阁大臣表

部 别	大 臣 姓 名	籍 贯
外 交 部	梁敦彦 胡惟德(署理)	广 东 浙 江

① 梁如浩，字梦亭，“M. T.”是“梦亭”二字英文拼音的字首。

续表

部 别	大 臣 姓 名	籍 贯
民 政 部	赵秉钧	河 南
度 支 部	严 修	直 隶
	绍 英(署理)	满 族
学 部	唐景崇	广 西
陆 军 部	王士珍	直 隶
	寿 勋(署理)	蒙 古 族
海 军 部	萨镇冰	福 建
	谭学衡(署理)	广 东
司 法 部	沈家本	浙 江
农工商部	张 謇	江 苏
	熙 彦(署理)	满 族
邮 传 部	杨士琦(署理)	安 徽
理 藩 部	达 寿	满 族

第103件附件2

各部副大臣表

部 别	副 大 臣 姓 名	籍 贯
外 交 部	胡惟德	浙 江
	曹汝霖(署理)	江 苏

续表

部 别	副 大 臣 姓 名	籍 贯
民 政 部	乌 珍	汉军旗
度 支 部	陈锦涛	广 东
学 部	杨 度	湖 南
陆 军 部	田文烈	(原缺)
海 军 部	谭学衡	广 东
司 法 部	梁启超	同 上
	定 成(署理)	满 族
农工商部	熙 彦	同 上
邮 传 部	梁如浩	广 东
	梁士诒(署理)	同 上
理 藩 部	荣 勋	满 族
	祝瀛元(署理)	直 隶

第104件 高慎爵士^①致格雷爵士函

1911年12月4日收到

阁下：

今晚，《北德意志环球报》宣布：胶州保护地政府已奉命立即派一支二百人的队伍前往天津。该报说：这些部队将首先构成直隶省内的一支后备兵，遇有紧急情况时，他们可供调遣。为了维持保护地的警卫力量，政府部队的全部编制人数将立即由海军陆

^① 英国驻德国大使。

战队主力营的士兵予以补充。他们将搭乘保护地炮兵连定期换班的运输船，于今天乘“戈本”号轮船离开汉堡。

高慎谨上 1911年11月30日于柏林

第105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1年12月4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关于议和谈判及袁世凯提出的条款。

今天，我已给汉口代总领事发出下列电报：

“袁世凯于今天同唐绍仪商量后，起草了下述议和大纲。我授权您尽力斡旋，保证使这些条款被接受。该条款已经电告冯国璋将军。

一、目前的停战期限届满后，延长十五天。

二、北军不得派兵南下；南军亦不得派兵北上（本条款打算同样适用于南京和武昌）。

三、由总理大臣指派目前在华北的各省人士，以便南军指派的各省代表可以同他们商讨大局。

四、总理大臣将指定唐绍仪作为他的代表，同黎元洪都督或他的代表讨论局势。

预料唐绍仪将于五天内到达汉口；我们诚挚地表示希望双方为了他们国家的利益，将认识到调解他们的分歧及获得一项和解的重要性。”

第106件 格雷爵士致朱尔典爵士电

1911年12月4日发自外交部

关于我12月2日的电报。

部队总共为一百六十人，将于明日自香港启程。

第 108 件 柏梯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1 年 12 月 7 日收到

阁下：

关于您上月 24 日的来信，我荣幸地随信奉上我上月 29 日留交塞尔伍斯先生的一份备忘录的副本，该备忘录要求他使英王陛下政府随时了解法国政府可能从中国收到的任何消息。

我收到法国外交部的一份备忘录说：云南的局势已有改善。我把该备忘录的副本随信附上。

柏梯谨上 1911 年 12 月 5 日于巴黎

第 108 件附件 1 致塞尔伍斯先生的备忘录

英王陛下驻云南府总领事已向英王陛下政府报告云南省内发生的动乱。

格雷爵士希望柏梯爵士要求塞尔伍斯先生惠允，使英王陛下政府随时了解法国政府可能收到来自中国的任何消息。

英王陛下政府的意图，是要把他们自己的行动限于保护英国臣民以及那些未受保护的外国臣民的生命财产，并且不危害中国的完整。他们希望看见中国的完整受到维护。

1911 年 11 月 29 日于巴黎

第 108 件附件 2 致柏梯爵士的备忘录

承蒙英王陛下大使馆于 11 月 29 日提出照会，使外交部了解云南的形势，并表示格雷爵士希望法国政府把从中国收到的报告通知他。

大使馆又说：英国政府很想维护中国的完整，打算把他们的行动限于保护英国臣民和财产以及那些孤立无援的外国人。

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同样希望保持中国的完整，使他们自己限于准备采取那些绝对必要的措施，以保证当法国利益受到威胁时给予保护。

法国政府对于云南的局势必须特别注意，因为铁路是在他们的主持下修筑的，该路如被破坏，除了带来物质上的损失之外，还将严重影响该省所有欧洲人的安全。

但是，法国驻云南府代表最近于11月27日寄来的报告，对局势作了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说明。看来日常生活已重新恢复，人们一度担心的兵变并未发生。

法国军队尚无需进入中国领土。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只有在别无他路可走的情况下才会采取这一措施。

第109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1年12月6日发自北京，次日收到

隆裕太后于今晚发布谕旨，准许醇亲王解除摄政职务的要求。总理大臣和各国务大臣将对政府的行动承担责任，而满族人世续和汉人徐世昌则被任命为皇帝的太保。隆裕太后和皇帝一起将接受百官的觐见，而所有的谕旨将盖上皇帝的御玺。

第110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1年12月8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随信附上英王陛下驻成都总领事关于四川起义的一封信的副本。我冒昧地认为，务谨顺先生的来信是很有兴味的，因为它广泛地说明了四川的形势，并且还预料，当湖北起义的消息一旦被人们普遍知道以后，将会在该地产生什么效果。

一些时候以来，我们很难获得关于四川运动的进程和发展的

可靠消息，该运动开始时采取了广泛鼓吹反对清政府铁路政策的形式；尽管英王陛下的领事官员们已把他们能够查明的所有情况作了报告，但几乎不可能证实他们的那些情报，因为那些情报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从中国人那里收集而来的，而他们自己则受到各中心地区交通情况的阻碍。自目前的动乱发生以来，交通始终不断受到干扰，而且总是很不安全的。

总之，该省的形势是：起义军和土匪横行于成都以南和以西地区，受过新式训练的军队在对付他们那方面已断断续续地取得一些进展；而在省城以北和以东，大致上说来，政府仍在行使权力。

我很愉快地补充说：务谨顺先生和驻重庆代理副领事布朗先生在努力保持与外县英国臣民的联系及尽量保证他们的安全方面，表现出精力充沛和富有才智，但他们的任务是很困难而又令人忧虑的。

朱尔典谨上 1911年11月18日于北京

第110件的附件 总领事务谨顺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本月13日晚上，名片上写着“川藏电报学堂监督、川藏电报局会办、四川总督外事秘书”的唐元书^①前来本领事馆，带来总督的一个口信。总督阁下不愿意在各领事收发电报方面设置任何障碍，但他很盼望各领事收到的任何消息不在官方人上之外传播，否则那些消息将终于传到起义者的耳里。

同一天晚上，我收到英国驻汉口代总领事的一份电报，他在该电中通知我说：汉口、汉阳和武昌已完全落入革命军手中，但外国人都安然无恙。

① 译音，原名待查。

13日唐元书前来访问以及他和赵制台^①表示忧虑的原因，现在已经很清楚了。那时候，总督阁下显然已经得到关于武昌革命的消息，而且由于他知道我已经接到一些电报，所以他派唐元书前来，了解我是否也已获悉该项消息而且是否能够提供任何细节。总督自然希望尽量隐瞒该项消息，以便赢得时间进行准备。我想，除了各领事馆的来往电报外，他扣留了所有的电报。然而，这个不幸的消息不久就必定会传遍整个四川，那时也许将出现一个极为严重的形势，它几乎不能不影响分散在各处的外国侨民。

只要革命运动由那些负责的首领们加以控制，我不认为外国人将受到威胁；但是，现在已经武装起来的大部分起义者是由土匪和其他亡命之徒组成的，他们很可能不受政治因素的约束。如果革命在湖北获得成功，四川将接着发生普遍的起事，这几乎是确定无疑的。此时应已进入本省境内的四千名湖广军队可能同起义军联合起来，或者是象四川陆军迄今所做的那样，可能继续忠于他们的职责。人们所希望的是，虽然四川的士绅可能对革命抱有同情，但他们应首先考虑到他们自己在无政府状态下将遭受什么损失，并且应成立地方保安会，以维持各地方的秩序。

我对这个希望很有信心，因为我看到他们在好几个城市特别是在川北实际上已经做到的事。在那些地方，有许多事例表明，群众控制下的民团，对那些试图利用目前的运动进行抢劫的捣乱份子作了有力的处理。这些城市的知县勉强被容许存在，实际权力已落入人民自己手中。

在成都，官吏仍由合法当局任命，只要军队的人数充足并保持忠诚，情况将继续如此。唐元书向我保证，警卫部队仍由三营组成，他估计共有一千五百人。端方（于本月14日抵达涪州，现

^① 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

应在重庆)带来了一标部队,共二千五百人。其中两营自万县开往顺庆,应于几天前抵达该处,它们是打算为川北提供警卫部队的。其他许多部队经过湖北西部的施南府,由陆路前往涪州;其余的部队与端方同行。

同时,巡防营已经一路由嘉定、另一路由重庆开往成都。其中有一些(据今日报载共有两营)已经到达;另一些正在途中。唐元书告诉我,来自贵州省的部队将分派至川南道的叙府和其他地方担任警卫任务。那些自陕西调来的部队将不越过四川边界,但在边境地方维持秩序。他说,新津于10月11日尚未陷落,但他向我保证,自那时起朱庆澜统制已占领该地。温江的起义军首领已经投降。

另一方面,里奇先生通知我说:昨天前往彭县的信差抵达新繁后,便不能够继续前进;本月14日送往绵竹县的邮件遭到起义军开枪射击。

因此,这里的形势在许多方面使人感到忧虑的原因几乎不少于一个月以前,而且我们随时可能再度发现我们自己处于与外界失去联系的状态。

务谨顺谨上 1911年10月15日于成都

第111件 海军部致外交部函

1911年12月8日收到

先生:

我奉海军部各长官之命,奉上驻华总司令官于本月7日发来的关于中国乱事的一份电报的副本,供外交大臣参考。

格林谨上 1911年12月8日于海军部

第111件的附件 驻华总司令官致海军部电

1911年12月7日发

停战安排到12月10日为止；在此期间内，将在武昌讨论议和的建议。

第112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1年12月8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关于拟议中的议和谈判。

今天，我已给汉口代总领事发出如下的电报：

“唐绍仪已动身前往汉口。他订于明天早晨在汉口与黎元洪都督或他的代表们进行会谈。”

第113件 格雷爵士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我收到了您上月12日的来信，该信谈到为保证那些住在北京使馆区外的英国侨民的安全而已经采取的措施。

我批准您采取上述来信中所说的那个行动。

格雷谨上 1911年12月8日于外交部

第115件 殖民部致外交部函

1911年12月9日收到

先生：

一、关于本部11月22日的信，我奉本部大臣哈考特先生之命，附上驻威海卫专员寄来的那些信件的副本，请交外交大臣格雷爵士。从该信可以看出：骆任廷爵士认为，有一艘军舰泊于中国该处是合乎需要的。

二、已向海军部写了一封措词相类似的信。

菲德斯谨上 1911年12月8日于唐宁街

第115件附件1 驻威海卫专员致哈考特先生函

阁下：

一、我荣幸地通知您：昨夜，我收到英国驻烟台代领事的一份电报，告诉我说，英王陛下驻山东省城济南府的领事电告他，该省已宣布独立。此事似乎意味着该省已声明它不再服从清朝皇帝的命令，并已与革命党联合起来。

二、自从中国爆发革命以来，威海卫地方及其附近地区并无发生动乱的迹象。代领事报告说，距威海卫有四十英里海路、六十英里陆路的烟台及其附近地区，目前是平静的，然而他希望在发生任何意外骚乱时有一艘军舰泊驻该口岸，所以提出了此项请求。

三、鉴于中国其他地区未费一枪一弹便已平静地归附革命党，所以预先设想山东全省特别是烟台归附革命党时将发生很严重性质的骚乱，这似乎是没有道理的。与此同时，我同意该代领事的意见，认为目前作为一项预防措施，在中国的这个地区泊驻一艘军舰是合乎需要的，尽管由于中国其他地方受革命的影响对军舰的需要更为迫切，现在也许不可能抽拨一艘军舰前来。

四、如果革命党在山东建立了一个政府，而且希望获得我国政府的承认，我将向您请示。

骆任廷谨上 1911年11月11日于威海卫

第115件附件2 驻威海卫专员致哈考特先生函

阁下：

一、关于我本月11日报告山东省已与革命党联合的信，我荣幸地通知您：昨天，我收到英国驻烟台代领事的一份电报说，革

命军已于本月12日午夜占领道台衙门及烟台东炮台，道台逃往一艘中国轮船，后来在海关税务司的房屋内暂时避难。

二、今天，我收到威海卫城署理知县的一封来信，现附上该信的译文。从该信可以看出：根据烟台民国军政分府的电令，威海卫城已与革命党联合。现在，该城知县衙门外面悬挂着一面白旗，上面写着“烟台民国军政分府委任知县”等字样。

三、我收到上述来信后，立即将该信内容电告您，并要求您对是否承认该城知县和山东省革命政府其他官员以及是否同他们保持正式关系等问题，给予指示。

四、我很高兴地能够向您报告：此地或烟台都没有发生任何性质的动乱。此地居民没有表现出不安的迹象，而且照常做他们的工作。唯一担心的事情，是可能有许多中国人从发生饥荒和其他动乱的地区涌入此地。我已调遣一队警察驻守边界上的一个据点，尽量防止不良分子来到此地。至于烟台，我从英国驻该处代领事那里获悉：有一艘日本巡洋舰已于昨日到达该口岸；另有一艘美国运输船可望于今日到达。

骆任廷谨上 1911年11月14日于威海卫

第116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1年12月9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关于西安府的传教士们。

今日，汉口代总领事来电如下：

“我今天收到西安府的英国传教士肖乐克先生11月11日的来信。该信说，史密斯夫妇已负重伤。在起事的第一天夜间，一群暴徒杀死了下面几个人：瓦特尼先生，贝克曼夫人，以及分别属于四个家庭的六名儿童。城内的英国臣民已获准受到保护，他们都安然无恙；由于旅途不安全，他们宁愿留在该地。西安府的满

族人几乎已被歼灭净尽。”

第117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1年12月10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十五天的停战协定已于12月9日在汉口签字。它规定各处均停止军事活动，但四川、陕西和山西不在此限，因为电报中断，无法将停战条款通知该数省。援军只能派往那些省份。唐绍仪被任命为袁世凯的代表，将于今天下午抵达汉口。

第118件 格雷爵士致朱尔典爵士电

1911年12月11日发自外交部

关于您12月9日的电报中所说的西安府大屠杀事件。

我让您酌定、关于指示汉口代总领事和他的同事们一起，促请起义军首领注意该屠杀事件的悲惨结果及防止重演的必要性一事，是否不妥当。

第119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1年12月12日收到

阁下：

关于我本月17日的信，我荣幸地附上外务部对外交团本月16日照会的复照的副本，该照会是关于清军在汉口和其他地方的胡作非为的。

朱尔典谨上 1911年12月12日于北京

第120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1年12月12日收到

阁下：

我在11月5日的信中说：南京城仍在清军手中；英王陛下领事于10月30日电告，由于新军撤出南京城，局势已有改善。伟晋颂先生10月29日的来信说明了那时候的形势，现附上该信的副本。

对和平解决问题所抱的任何希望，都迅速地被满族将军铁良采取的态度所粉碎了，他曾在磨昌之前担任过陆军大臣。他拒绝相信朝廷命令两江总督如革命军发动攻击不得进行抗拒的谕旨。他带着他的两千名旗兵盘踞在满城，在各入口处埋下了地雷，坐观事变。其余的各种军队，除已调往城外的五千五百名新军之外，截至11月7日约达七千五百人，人们预料他们都将协助起义军。伟晋颂先生11月7日的来信是很有兴味的，因为它说明了起事前夕的形势。我荣幸地附上该信的副本。

第二天，即11月8日，革命军试图夺取南京城，但他们遭到失败，主要是因为张勋提督所统率的旧军袖手旁观，从而使他们失去了人数上的优势。现在，显然面临着一场激烈的战斗。大部份妇女和儿童已经出城，留在城内的英国臣民大约只有十二人，其中包括两名妇女和三名儿童在内。然而，城内的其他各国人大约还有二百人，他们几乎全部是美国人或日本人，但两天后所有的妇女和儿童都已平安地离去。从英、德、日等国军舰登岸的水兵们驻守各国领事馆。伟晋颂先生11月8日的来信中，叙述了这个阶段的形势。

11月9日，新军自秣陵关出动，进攻南京城，已被击退，受到一些损失。张勋提督的坚强性格完全超过了两江总督和满族将军，此时他开始进行恐怖的统治。凡是被怀疑为起义者的人都被处死，有钱或剪辮就是充分的证据；总督的亲兵中有一百人被斩首。伟晋颂先生11月10日来信（现把副本附上）中所包含的上述情报，已被沪宁铁路的一位英国工程师所证实。该工程师在给总办朴柏先生的信中说：11月8日夜间，清军挨户搜查，对稍有可疑

之人，即予斩首，并把首级悬挂在各户大门上面，总共达四百个之多。邮政司看见了这种恐怖的景象。该工程师又说：他们奸污妇女，进行抢劫，并且犯了其他残酷的暴行。他们似乎在武器和弹药方面得到充分供应，但缺少食物，因此各城门于11月10日开放了一段很短的时间，有一万七千人被赶出了他们的家园。

象我在本月18日电报中所报告的那样，我向袁世凯强烈抗议这些暴行，并且劝告他竭尽全力加以制止。他似乎不了解真实情况，但命令署理外务大臣胡惟德立即注意此事。我担心，这些可怕的情景延续了好几天，这是无可怀疑的。

这时，双方都获得了增援。清军的人数已扩充到一万二千人；起义军增加的兵力则有最近驻守镇江的另外两标步兵，以及一些炮兵和骑兵，他们都属于第九镇。可以注意的是：起义军政府因为想尊重我们保持沪宁铁路中立性质的愿望，所以命令步兵自镇江步行，而不乘坐火车，如果没有铁路当局的抗议，他们是会乘火车的。起义军很可能从上游和上海继续获得增援。11月11日，据说他们在南面的城墙上打开了一个很小的缺口，但英王陛下领事于四、五天后来电说：除了继续进行抢劫及屠杀可疑分子外，若干天以来大概没有发生严重的战事。

11月15日，英王陛下驻上海总领事来电称：朴柏先生收到南京的信说，伯恩、赫恩、里奇威等工程师和他们的家眷被土匪及其他的人围困在津浦铁路上的滁州和临淮关。滁州似乎在浦口以北约二十英里的地方，而临淮关在浦口以北约七十英里的地方。法磊斯先生又说：铁路财产被捣毁，而且有一列火车严重出轨。他已要求起义军当局尽力保护它们，但担心各该处也许不在他们的控制之下。伟晋颂先生寄来一封信，显然与朴柏先生收到那封信的时间大约相同。该信说：一支革命军已抵达滁州，铁路被切断，工程师们已逃走。不可能从天津及时派人前往援助，我只能

希望他们已顺利地抵达一个安全的地方。

朱尔典谨上 1911年11月23日于北京

第120件附件1 伟晋颂领事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昨天，我曾荣幸地电告您：南京的形势愈益危急；人们担心，旗兵几乎带着焦虑的心情铤而走险，也许在惊慌失措中加速动乱的爆发。

自从我本月27日写信给您以来，我从可靠方面得到的情报表明：我在信中所作的某些说明，虽然我曾认为我有很充分的根据，但并不完全是正确的。首先，看来总督答应发给新军的子弹，实际上并没有照发，但打算在我写信的那一天给予他们。然而，我知道，满族将军在布政使的支持下，坚决反对这个打算，所以总督终于退让，没有把子弹发给他们。结果士兵们在当天晚上几乎哗变，但由于他们的统领和布政使的努力，终于使他们平息下来，并达成了一项妥协办法。根据该项办法，如果他们在最近两天内迁出城外，便把子弹在新的营地发给他们。因逃亡而严重减员的第三十三标和第三十四标剩余部队，于今晨开出了南京。看来，人们对满族人比对旧军更为恐惧。

有人告诉我，在满族将军能够说服总督之前，他们两人之间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在争论中，满族将军威胁说，如有起事的任何迹象，他将用他所有的几尊大炮轰城，尽量造成破坏。由于根据最近的报道，今晚八时是革命军确定他们起事的时间，满族将军提出的威胁已被夸大到包括对外国人以及中国人进行普遍的屠杀在内，从而引起了一次难以形容的大恐慌。昨天，特别是今天，确实有成千上万的人自城内逃走。形势已经彻底地改变过来，满族人现在将成为杀人者，汉人则是受害者。形势也许是真正危险

的，因为我认为，虽然不可能发生一次有组织的起事，但情绪极为紧张，以致几乎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鉴于这种情况，而且因为我的同事们和各国人士普遍认为起事迫在眉睫，所以我已经采取某些预防措施，尽可能保证居住在城内的英国臣民的安全。那些男人们已经得到警告，一见有动乱的迹象，便将他们的妻子和儿童送来领事馆；如果他们认为自己处于任何危险之中，便随后前来。我还有从英王陛下军舰“新城堡”号调来的两名信号兵，在领事馆日夜看守，遇到各城门关闭时，他们能够从领事馆附近的一座山上，直接与该军舰联系。我已同该军舰舰长议定，由一名军官率领十二名士兵登岸，作为领事馆的卫队，并在必要时护送妇女和儿童。城内的英国人，共有大约十二名男人和二十五名妇女儿童。

表明官员们显然感到忧虑的其他事情是：仅仅在四天前向我保证很不可能发生任何动乱的那位洋务委员，突然带着他的家眷逃往上海；上海道台特别租定的英国轮船“北清”号抵达此地，以供总督之用。

最后，我可以这样说：最近调入城内的旧军某营统带于昨日告诉我，旗兵近来已增至两千人，并且在铁良的率领下实力大有提高。他们已在满城内设防，该城各入口处埋有地雷。据该统带看来，在城内驻有十营（并非八营）的江防军，无疑是忠于清朝的，但他对其他旧军不是很有把握的。他似乎认为，旧军的战斗力微不足道。虽然他预料城内将发生骚乱，但他认为，如果没有满族人的任何帮助，江防军也将战胜新军和革命党人的联合力量。

伟晋颂谨上 1911年10月29日于南京

第120件附件2 伟晋颂领事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昨天，我曾荣幸地电告您：朝廷已命令两江总督，如果革命军进攻南京，他不得进行抵抗。我知道，总督阁下以前曾致电北京，说明该省的形势对清政府来说是没有希望的，并实际上建议采取该办法作为避免重大流血牺牲及防止对全城可能造成破坏的唯一手段。朝廷也无疑地受到担心毁灭的影响，因为这里如果爆发战事，那些居住在南京的满族人必将遭到毁灭。但是，假若情况果真如此，那么，清政府的动机便被满族将军铁良所误解了。铁良拒绝承认该谕旨的真实性，并且宣布他打算把反抗革命军事坚持到底。当然，这可能只是他那方面所做的吹嘘，企图保全他的面子而已。但是，如果是这种情况，南京城内的官吏和绅士却很认真地看待他的话，他们对形势的突然变化感到很大的惊慌。

昨天，实际上已经为在南京建立一个临时政府做了准备，谘议局议长张謇先生或布政使樊增祥阁下都曾被推举为该政府的首脑，他们都暂时拒绝接受此项职务。就我所知，只是由于革命派迄今没有派遣任何代表自上海前来，才使得南京实际移交革命派一事延缓下来。现在，普遍的印象是，由于一支革命军可望于未来二十四小时内到达，除非铁良在此期间内改变他的主意，则战事必将爆发；同时，因为除了满族人之外他不能够期待其他方面的帮助，所以不需要很长的时间便可消灭他的警卫部队。然而，我几乎不能相信，事情竟会发展到这一地步。

目前，南京的军事形势如下：

新军已于上周全部被调往城外，现在驻扎在南京西南约十五英里的秣陵关营地。当他们出城的时候，他们没有子弹；人们普遍认为，自那时以来未曾把子弹发给他们。在起事前，他们总共有五千五百人，但他们的士兵由于逃亡而已经大为减少。在南京城内，属于江防军的部队约三千五百人，这是一支很优良的部队，多半系山东、河南和直隶等省人；本省部队约一千五百人，多半

是湖南人；防营约五百人；还有从本省北部和安徽来的部队约二千人，他们是上星期调入南京的。人们以为，所有这些部队都将协助革命军攻击满族人。铁良能够调动两千名旗兵对抗他们，这些旗兵中精良者也许不超过一半以上，但是，他的士兵们团结在一起，而且他们的阵地防守坚固。

伟晋颂谨上 1911年11月7日于南京

第120件附件3 伟晋颂领事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自昨天我写信给您以后，南京的情况又发生了一个出乎意外的变化。城内旧军的统帅张勋提督，没有象人们所期望他做的那样，支持总督关于避免战斗并且将该城移交革命军的决定，而是与满族将军铁良共命运，同意协助他抵抗革命军方面夺取该地的任何企图。关于命令两江总督放下武器的谕旨是否果真有那个意思，如果确有那个意思，它是不是真正的谕旨，看来这是颇有疑问的。总督阁下显然不怀疑该谕旨，因为他通知镇江英领事皮茨标说，他已奉命不进行战斗；洋务委员也曾亲自告诉我，他已收到此类命令。无论如何，满族将军铁良和提督张勋以总督在这个问题上受骗上当为理由，替他们目前采取的态度进行辩解。

昨天下午二时，我从洋务委员那里得到关于一切事情都很不妙的第一个通知。他把铁良的决定告诉了我，但又说：他认为那是恐吓之词，即使他说话算数，他也不能够坚持很久。然而，当天下午，中国人感到极大的恐慌，所以形势已经突然变得十分严重，这是很明显的。在我的建议下，兼任首席领事的美国领事于下午五时拜访了总督，询问对外国妇女和儿童是否有任何危险。总督阁下在答复时建议他们迅速撤离南京城，并且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从军舰上调派武装卫队前来保护各领事馆。我立即警告所

有的英国臣民，准备于今晨将他们的妻子和家属撤走。我还向英王陛下军舰“新城堡”号舰长亨特发出信号，要他做好准备，在接到通知后马上派十二名卫队登岸，关于此事是我们以前商定的。当天晚上九时，洋务委员打来电话，告诉我局势非常危急；总督幕府内的一位成员杨晟先生给海关税务司送来类似的消息。战事于今日凌晨四时开始。实际发生的事情仍是难以确定的。一支革命军约二百人似乎已由南门进城，立即前往监狱释放囚犯，然后进攻总督衙门。无论如何，这次起事是完全失败的。旧军没有加入革命军；经过一些战斗，丧生者约有一百人，革命军纷纷散去，骚乱即告结束。今晨，关闭了所有的城门，无论是外国人或中国人，均不准以任何借口进出。到上午九时，几乎所有在南京的英国臣民都已集中于领事馆。由于局势似乎仍很严重，立即撤走妇女和儿童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打电话给张勋提督，请求准允他们出城。他接受了我的请求，派一名军官护送他们；到下午二时，所有撤走的人都已平安地出城。与此同时，从各国军舰派来的卫队，已由铁路穿过的城门进城，德国、日本和我们本国的卫队各由十二名士兵和一名军官组成，美国的卫队共有一百一十人，其中三十人后来已被调回他们的军舰。他们发现城门关闭，但经过某些商议之后，被允许入城，并前往各领事馆。目前在城内的英国臣民的人数，除卫队不计外，大约有十二人，包括两名妇女和三名儿童在内，其中有一半和我一起住在领事馆。仍然留在城内的其他各国人大约为二百人，几乎都是美国人和日本人。

现在城内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是不容易发现或准确揣测的。据一位能够了解情况的中国人告诉我：直到昨天早晨为止，一切事情似乎都表明将南京城和平移交革命党人，因为人们并没有认真地对待铁良的恐吓之词。总督和城内几乎所有的其他官员都赞成投降，唯一争论的问题是张勋提督对于自南京城撤军一事所要

求的代价。据说他坚持索银八十万两，而总督似乎代表南京士绅只愿付给他四十万两。这笔款额太少，所以张勋提督与铁良共命运。今天，总督是否仍然在任，甚至于是否还活着，看来都是令人怀疑的。南京城的统治者是张勋提督。我企图与总督进行联系，没有成功；我向他提出的要求已被转交给张勋提督。人们预料，今夜将再度发生战事，因为都知道有大批革命党人已在城内，而且许多旧军的忠诚被认为是摇摆不定的。今后的情况在很大的程度上似乎取决于张勋提督。他反对投降一事还是可以用金钱疏通的，在那种情况下，将不会发生更严重的战事。如果他坚决支持满族将军铁良，那么，南京将不得不经受一次包围，这似乎是肯定的，但令人感到怀疑的是，革命党人是否能够在未来两周内对南京城发动一次有效的进攻。他们似乎满怀信心，驻秣陵关和其他地方的第九镇全军将与他们联合试图夺取南京，在那种情况下，很有可能获得成功，因为他们在城内有许多朋友。

伟晋颂谨上 1911年11月8日于南京

第120件附件4 伟晋颂领事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我在本月8日信中所表示的希望，即通过张勋提督与革命军之间的协商，仍可以避免南京的冲突一事，看来不可能实现了。在我写信给您的那一天，有人向我报告，革命军的前锋正从秣陵关方面逼近南京，秣陵关是新军最近被驱逐出城后驻扎的地方。这个消息证明是确实的，因为第二天凌晨二时发动的对雨花台炮台的进攻，持续到破晓为止。雨花台炮台位于南门外约半英里处。这次进攻没有成功，革命军被迫撤退，在战场上留下的尸体和伤员大约有二百人，他们所穿的制服证明他们属于第九镇第三十四标。后来有一个外国人看见这些尸体在南门外排列成行，它们显

然已被运至该处，无疑是作为对清军中的那些动摇分子的一个警告的。从一名负伤的清军军官提供的消息看来，革命军之所以蒙受重大损失，是由于误信该炮台守军已经背叛清朝，因为他们向该炮台进发时，不是开火，而是挥动他们的手臂，号召守军和他们联合起来，因为彼此都是兄弟。只是在炮台守军连续施放排炮，表明他们犯了错误之后，剩下的少数幸存者才伏在地下，并开枪还击。清军的伤亡人数没有公布，但为数较小。昨夜，雨花台方面又发生猛烈的开火，传闻革命军已占领雨花台一事大概是没有根据的。无论如何，人们似乎预料在那附近地区又将有激烈战斗，因为今天有六营军队经南门开往雨花台炮台方面，而且今天下午有三艘悬挂龙旗的清朝炮舰轰击雨花台附近的小山。除了自秣陵关开来的各标军队之外，人们还看见有大批革命军由镇江前来南京；据说另一支人数很多的部队沿津浦铁路南下，所以在不久的将来南京很可能受到严重的攻击。

在城内，最近的三天对那些不幸的居民来说是恐怖的日子。根据张勋提督的命令，凡因抢劫被捕或因被怀疑为革命党的人，均被即时处决。有人估计，自星期三以来，被枪杀或处死的达五百人以上，其中大多数是无辜的。剪掉辫子或带有钱财，特别是后者，被认为是谋叛的确凿证据。我的一位同事看见有四十个首级被钉在张勋提督的衙门周围；在其他许多地方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景象。在受害者中，大约有一百人属于总督的亲兵，因为他们的忠诚被认为是可疑的。总督本人仍然活着，但自星期三发生暴乱事件之后，他搬出了他的衙门，同满族将军铁良一起迁往城东一座山上筑了工事的庙宇中居住，不过，他们已于昨夜由该处返回他们的衙门。他们两人和张勋提督都害怕炸弹。城内的其他各文职官员均已逃走，凡是能够通过仪凤门出城的居民也效法他们的榜样，仪凤门每天开放的时间很短而且是难以确定的。今

晨，在允许通行的一个小时内，有一万人出城；另有一万人排成一条两英里长的长队，被关在城内。

除了几名日本人将于明日动身之外，现在城内已没有外国妇女和儿童。男人们留下来保护他们的财产，因为街道上已完全没有警察，而他们的仆人也已经逃走。

从这里收到的一些报告看来，正在进攻南京或即将进攻南京的革命军，由不久前驻在南京城内的第九镇第三十二标和第三十四标，驻在镇江的第三十五标和第三十六标，以及该镇的炮兵、骑兵各标所组成。还有许多义勇军无疑地和他们在一起。全军由徐绍桢统制指挥。关于由北方南下的各军，还未获悉详细情况。在他们期望从镇江和江阴获得的一些大炮运到之前，大概不会对南京城发动猛烈的进攻。徐绍桢统制似乎把他获得胜利的希望，寄托于旧军内部的不和及城内子弹的缺乏，而非建立在对南京城进行轰击的结果之上。看来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城内的部队缺少弹药，因为他们请求自江南制造局获得大量供应，但由于该局已被革命军占领，所以他们从来没有收到任何弹药。自那时以来，本地制造局已开工制造，但该局的生产能力很小，而且它曾经关闭了很长的时间，以致机器的状况几乎不很正常。

张勋提督是城内各军的最高统帅。总督和满族将军对此事都没有任何发言权。他对他所率部队的忠诚似乎比其他的人具有更大的信心。虽然他个人很不受士兵们的欢迎，而且士兵们也并不讳言他们对他的意见，可是，他们同他一样很厌恶新军，这可以说明他们愿意战斗的原因。由于他是守旧派的勇士，完全通过宫廷的势力而上升到他目前的地位，由于他的妻子是已故慈禧太后宠爱的侍女，所以他对受过日本教育的徐绍桢统制表示极为蔑视。他本人是否具有任何才干，还必须由他的表现而定，但他无疑是一位性格坚强的人，并且善于控制他的士兵。在最近几天内，他

的部队又增加了两千名新兵，这些新兵由满族将军铁良供给粮饷，而且还增加了由浦口调来的六百名受过训练的部队。迄今还没有把武器发给新兵，但他们正在受训练，如果不是他们的外表给人以很大的假象，他们绝非南京城内所需要的部队，至少从居民的观点看来是如此。在外国人中间，他们的到达比革命军从城外轰城的可能性所引起的忧虑更大。据说，张勋提督能够收集起来以支付防务费用的总额为六十万两，其中包括在铸币局所发现的银元和银锭在内。大约有二百万银元已于本月5日从铸币局运往上海，我不能说总督是否了解此事；该局于7日夜间还遭到抢劫，所以局中所存银两很可能使该提督感到失望。

由于目前不可能从南京城发出电报，而且所获得的关于外面形势的可靠消息也很少，所以我已同英王陛下军舰“新城堡”号的舰长商定，每天送给他一份关于过去二十四小时内情况的简短报告，他将从中选择任何值得传送的新闻，通过无线电报发往上海，以便转递给您。他将把他自己能够获得的任何消息加入他的文电中。

伟晋颂谨上 1911年11月10日于南京

第121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1年12月12日收到

阁下：

从中国革命运动的进展所引起的一些附属问题中，一个已经吸引而且继续吸引我密切注意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各口岸所征收的海关岁入，以便保存它不被挪动，供偿还它所抵押的外债之用。

根据迄今施行的办法，该岁入均存入清政府各银行，并由各口岸的清朝海关监督处理，海关机构除将证明交税的银行收据加

以核实和归档之外，不负其他责任。在一座已辟为条约口岸的城市，行政管理权一旦由清政府手中转入革命军手中，所征收的税款便听任革命军支配；这些税款有被用来支持起义军政府的军事行动或满足其他紧急需要的严重危险。第一个被迫面临这种危险的地方是湖南省城长沙。我于10月26日获悉，该地海关税务司已接到起义军政府的通知，他可以在他们的命令下继续任职；于是，我同海关总税务司磋商，并给英王陛下领事发出电报，指示他同海关税务司合作，协助他竭力安排；作为一项临时措施，必须扣留该项岁入，听候海关总税务司或领事团的命令。我指出：应采用的论据是，该岁入确系各国债券持有人的财产，如果革命军擅自挪用，可能会引起同列强的纠纷。

汉口几乎同时发生了同样的问题。该地的清朝官员逃走后，起义者任命了他们自己一伙的人为海关监督。该两处的海关税务司在他们能够与起义军首领们进行的谈判中似乎很机智灵活，然而，至少在汉口，他们提出的抗议，无疑获得了当时泊驻在长江的各国强大海军力量的援助。甚至泊于长沙的德国小炮舰也起了心理上的作用，那些没有在中国内地居住过的人是很难评价此事的。结果终于达成了一项协议。根据该协议，把征收的关税用海关总税务司的名义存入汇丰银行；落入起义军手中的各口岸也都遵循该协议。

当上海于本月初归附革命的时候，海关税务司便同领事团商量这个问题，建议把该地征收的税款存入总税务司在汇丰银行的帐户内，并用来支付日常的费用及偿还外债。领事团答复说，他们不反对把此项办法作为一项临时措施，但建议该税务司电告总税务司，以便与外交团磋商此事。

本月7日，我以外交团首席公使的资格，收到上海首席领事于11月6日照上述意思发来的一份电报。我在把该电报通知各国

使节的时候，采纳了有关方面向我提出的一项建议，即应当以已经成立的银行家赔款委员会这个机构来代替汇丰银行，并把它用于保存海关岁入的目的。我提议：如果我的同事们赞同上海方面提出的但附有该项修改的建议，我将指示领事团要求起义军当局允许采用该办法作为一项临时的权宜之计，并请求安格联先生照此意思指示海关税务司予以合作。

外交团普遍赞同该项通知，但作了某些保留；鉴于这种情况，我认为最好同安格联先生磋商，以便查明，就此事与海关税务司的关系而言，他是否准备承担照所拟办法处理海关岁入的责任。

同海关总税务司这样进行交换意见的结果，显露出对所拟办法的某些异议。安格联先生对此问题起草了一份备忘录，说明在起事爆发前征税的制度，以及为了保证岁入起见，在清政府的同意下，发给海关各税务司的指示。安格联先生指出，这些岁入已明确地作为按先后顺序偿还某些借款的抵押，并且建议应由那些与借款有关的各银行家组成一个专门委员会，以接受所征收的全部岁入。

我认为我有责任把这些需要考虑的事情提交我的同事们；在本月11日发出的通知中，我提议：为了代替以前曾扼要叙述的各种安排，可以由那些与1900年前签订的各次借款有关的银行家们组成一个专门委员会，除了海关征税的费用之外，有权按照各次借款的条件和顺序所要求的时间及比率，从海关总税务司那里接受所征收的全部岁入。该委员会负责设法在款项许可的范围内，使借款的偿还如期支付，同时该委员会还决定应把移交的款项存入哪些银行。我指出：此项提议的好处，在于把海关岁入交给那些对债券持有人负责如期偿还借款的银行，因为那些借款是以海关岁入优先偿付作担保的；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它比以前所建议的将海关岁入交给银行家组成的赔款委员会的办法更好，该委员

会的工作大都已陷于停顿。我在该通知的末尾，邀请我的同事们出席 13 日的会议，讨论上述提议。

在这次会议上，我宣读了安格联先生的备忘录，并说明 1900 年以前各次借款及后来 1901 年赔款的情况。1900 年以前的借款金额在名义上达五千四百四十五万五千英镑，其中已偿还的本金仅约一千五百五十万英镑；虽然自 1900 年以来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已成为中国的债权人，但在那个年代以前，只有英、德、法、俄等国才与借款有关。于是，这四个国家对海关岁入享有第一次抵押权，而签字于辛丑条约的各国政府仅享有第二次抵押权。因此，银行家组成的赔款委员会自然不应当独自负责处理海关的收入。我认为，应任命一个专门委员会，保证偿还 1900 年以前的借款，并将余款移交该赔款委员会。

经过一些讨论之后，大家同意，应与各银行进行磋商，并于本月 21 日给那些与海关岁入所担保的债务有关的各银行驻上海经理发出一份回文电报。由于那些银行的经理们被认为是决定组成所拟设立的委员会的最适当人选，所以邀请他们共同商议，以便由该委员会提出一份联合计划交给北京外交团。

本月 20 日，汇丰银行驻北京代理人把该行上海分行来电的内容通知我。该电说：根据 1896 年清政府所借的五厘金镑借款，按月摊付的利息及还款共达八万零七百五十九英镑，于本日到期，尚未付给。该电又说：按照该借款合同第五款规定，上述款额的兑换定为上海银每两折合二先令五便士又八分之三，此系当日电汇伦敦的兑换率。

我立即向外务部提出一份备忘录，把拖欠付款一事通知他们，提醒他们该借款系以清朝海关岁入作担保，并且坚持要采取步骤，把全部海关岁入置于总税务司的控制之下，那些岁入不仅包括清政府已失各口岸的岁入，而且包括清政府仍然控制的各口岸岁入

在内。

可以在这里说明一下：仍在清政府控制之下的口岸仅有东三省各口、天津以及租借地的口岸胶州和大连。南京还没有脱离清朝，但可以不把它计算在内，因为道台已经逃跑了。人们认为税务司控制着该处的岁入。安格联先生曾向我解释说：在上述各口岸中，东三省的口岸，即哈尔滨、珲春、安东和牛庄，地位仍照旧不变。那就是说，海关征收的岁入受清朝海关监督的控制，他们能够处理那些岁入，而与税务司或总税务司无关。天津的海关岁入是依照总税务司的命令保存的，但由于该岁入的如此存放系根据清政府的明确要求，所以安格联先生本人对此事不能承担责任，并且认为，如果清政府要求他汇寄该岁入，他将必须照办。胶州和大连的海关岁入一直是以海关税务司的名义存入银行帐户的，但如果没有总税务司的指示，他们便不能动用该岁入，而这些指示迄今是根据外务部的命令发布的。

我于本月 21 日把上述备忘录递交外务部，并从答复中获悉：我所建议的关于仍在清政府手中的各口岸海关岁入处理办法，已经交袁世凯官保照办。我在今天举行的会议上，把我关于此事所采取的行动告诉了我的同事们。

为了便于参考，以及为了对偿还那些借款的情况提供一个明白的概念起见，我荣幸地随信附上两份关于以清朝海关岁入作担保的七次借款情况的表格。第一表说明借款属于哪个国家和其他详细情况，以及至 1911 年 11 月 20 日第一次欠付之日共欠的本金总额。第二表说明今后十二个月内按先后顺序应还借款的总额，并对过去四年内的海关平均岁入加以注释。由于兑换率的波动，这些计算是很不可靠的，但它们大致上表明，在过去四年的基础上，应有剩余可用来偿付一年一百二十四万英镑以下的赔款。当人们认为，按照辛丑条约的规定，偿还 1912 年的赔款（即假定 1911

年应付者已经照付) 所需款额为二百九十八万四千八百九十四英镑(包括分期偿还的本金和利息)时, 办理赔款的银行家们与海关岁入的关系显然只不过是微小的, 他们将不得不指望所规定的其他担保, 即常关和盐税。

宋尔典谨上 1911年11月23日于北京

第121件的附件 关于以海关为担保的中国 对外国所负债务的说明

第一表 海关岁入担保的中国所负外债表

号码	借款名称及详细情况	至1911年11月20日 欠付本银	付还日期
1	1894年清政府七厘息银借款: 10,900,000两(上海银两) 每两折合三先令, 共合1,635,000英镑(汇丰银行)	上海银2,181,000两, 每两约折合二先令六便士, 共合272,500英镑。	1914年11月
2	1895年清政府六厘息金借款: 2,000,000英镑。(汇丰银行)	800,000英镑	1914年12月
3	1895年4月清政府六厘息金借款(竞赛借款): 1,000,000英镑。(麦加利银行)	266,700英镑	1915年7月
4	1895年清政府五厘息借款(瑞记洋行南京借款): 1,000,000英镑。(三家德国银行)	266,700英镑	1915年6月
5	1895年清政府四厘息金借款(1895年俄国借款): 400,000,000法郎, 合15,280,000英镑。 (由巴黎法国银团发行, 俄国政府担保)	11,367,473英镑	1931年
6	1896年清政府五厘息金借款(1896年英德借款): 13,000,000英镑。(由英德两国平分)	12,397,425英镑	1932年
7	1898年清政府四厘半息金借款(1898年英德借款): 16,000,000英镑。(汇丰银行和德华银行)	11,922,625英镑	1933年
	(大约) 共计	39,393,423英镑	

第二表 自1911年11月20日起十二个月内按先后顺序应
还以海关岁入为担保的债务表

号码	分期付款的款额	利息	共 计	十二个月总计	应 付 日 期
1	76,300元	76,300元	1912年5月1日
	1,090,000元	76,300元	1,166,300元	1912年11月1日
				1,242,600元	
				约合155,325英镑	
2	200,000英镑	24,000英镑	241,000英镑	1911年12月10日
		18,000英镑	18,000英镑	1912年3月10日
				242,000英镑	
3	8,001英镑	8,001英镑	1912年1月1日
	66,700英镑	8,001英镑	74,701英镑	1912年7月1日
				82,700英镑	
4	66,700英镑	8,001英镑	74,701英镑	1912年1月2日
	6,001英镑	6,001英镑	1912年7月1日
				80,700英镑	
5	227,350英镑	227,350英镑	1912年1月1日
	381,671英镑	227,350英镑	609,321英镑	1912年7月1日
				836,671英镑	
6	每月利息和偿款 80,579 英镑, 以十二个月计			966,948 英镑	每月20日
7	每月利息和偿款 69,603 英镑, 以十二个月计			835,236 英镑	每月20日
十二个月总数 (约计)				3,199,583 英镑	

(注一) 自1907年至1910年的四年间,海关岁入平均为一亿三千七百八十七万五千零三十六海关两,或每年平均折合四百八十二万六千五百五十四英镑。所规定的征税费用为三百万海关两。

(注二) 每个国家在今后十二个月内应付总额中所占百分比

大约如下：英国占百分之四十二；德国占百分之三十一；法国和俄国（上表内第五项借款）占百分之二十六。

第122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1年12月12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关于议和谈判。

昨天，上海总领事发来如下的电报：

“伍廷芳今日来信说：

‘我曾经奉告，黎元洪都督与十一省代表已推举我代表他们同唐绍仪进行谈判，我十分愿意承担此项任务。但首先是因为上海的许多朋友不希望我启程他往，其次是因为此间许多公务需要我关心，我认为几乎没有前往武昌的可能。我知道，贵同事葛福先生已与黎元洪都督及在汉口的十一省代表为在该地举行会议作了安排。这些代表中有许多人后来已离开武昌，他们都同意我的意见，即鉴于上海更为适宜，所以在目前情况下以上海为会议地点是可取的。

如果您惠允致电贵国公使，促请他要求袁世凯指示唐绍仪前来上海同我们磋商，我将极为感激。’”

今天，我发出下列电报答复法磊斯先生说：

“已对唐绍仪发出指示，要他前往上海会谈，而且对北方各省将领发出了紧急命令，要他们严格遵守停战协定。”

第123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1年12月12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关于您12月11日的电报。

在对此事作了仔细考虑之后，日、美、德、法四国使节和我本人于12月10日同袁世凯会晤，竭力商定派遣援救人员在安全护

送下前往西安府。袁世凯正与驻大同关的军事统领进行电报联系，并将通知我们该计划是否可行。

第124件 格雷爵士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我已收到您上月16日报告中国革命运动进展的来信。

如果您通知英王陛下驻长沙和汉口的领事官员们，我批准该信中所报告的他们已经采取的那些行动，并对他们为保证各该口岸英国臣民的安全所作的努力表示赞赏，那么，我将感到高兴。

格雷谨上 1911年12月14日于外交部

第125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1年12月15日收到

阁下：

中国目前的革命运动，使人们对内地特别是对那些较偏远省份如山西、陕西、河南、四川等省农村地区的传教士和其他各国侨民的安全，感到很大的忧虑，因为在那些地区普遍存在着无政府状态，而且法纪已暂时失去作用。虽然革命党人直到目前为止注意避免妨碍和干扰外国人，但革命本身驱使许多持有武器的人们，利用目前无法无天的情况，在国内实行恐怖统治，并抢劫和掠夺整个农村地区。外国人没有豁免不受他们的攻击，因为有一伙与中国内地会有联系的瑞典传教士，发现他们在山西省西南部永城的驻地附近情况非常危险，便于本月8日离开该地，动身前往河南省的河南府城^①及汴洛（开封至河南府）铁路目前西端的终点站。他们抵达距河南府城几英里内的地方时，受到一些骑马

① 今洛阳

持械人员的攻击和抢劫，不仅被夺走了他们的钱财和贵重物品，而且使布卢姆夫妇受了重伤，布卢姆夫人是一位英国出生的妇女。他们一伙人在河南府休息了三天，布卢姆夫妇所受的伤害在该处得到医治，然后有河南府的其他瑞典传教士加入他们一伙，全部共十九人，乘火车动身前往北京和天津，于本月22日夜间抵达此地。

昨夜，另一伙瑞典传教士共十二人，也从山西省南部的同州府经北京前往天津。

上月23日，太原府城陷落，当时革命党人前往巡抚陆钟琦的官邸，陆钟琦回答那些质问他的人们说，他拒绝停止他对清朝的效忠；他还告诉那些攻击他的人们，他宁死不降。因此，他被枪毙。有一位从太原府给我提供情报的人，后来察看了巡抚的尸体，发现他的胸部有两处弹伤。他的妻子和儿子遭到同样的命运，后来他的官邸被焚毁，于是城内大部分地方遭到抢劫和焚烧，人们被任意屠杀。然而，革命党人注意不使外国人受到伤害，并且在他们被迫不能外出期间，向他们供应食物。

本月21日，我收到英王陛下驻云南府总领事的一份电报说：四川省处于混乱状态；土匪和独立的傜族人已对汉人开战；一名法国传教士在该省南部的宁远府被杀，该地区还有一座法国教堂于10月25日受到攻击，当时有一名越南人被杀，两名法国军官受伤。额必廉先生又说：在云南府的革命派首领们中间出现了分歧意见；他和法国领事极力劝告外县的传教士们集中于省城；所有能够撤离的外国人都应撤往越南的东京。

同一天，我收到额必廉先生的另一份电报说：云南府城处于恐慌状态；革命派首领已经与铁路公司商议，为逃走进行准备；所有的妇女和儿童都已奉命撤离；前云贵总督已抵达河内。本月22日，他又通知我说：城内部队策划于11月18日发动的兵变，因

革命派首领的戒备而被挫败。

我们已经从邮传部获得乘坐火车通行的许可证，并把那些许可证送交那些认为有必要离开他们驻地的英国传教士及其他的人。我向英王陛下各领事发出了一项通知，指示他们同那些在其管辖范围内的传教士们保持密切接触，在考虑当地情况及旅途安全之后，警告他们特别是妇女和儿童们宜前往最近的口岸或其他中心地点，因为在那些地区能够更容易地提供保护。

朱尔典谨上 1911年11月24日于北京

第126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1年12月15日收到

阁下：

我在本月8日的信中，除提及英国臣民的权利和财产因此次革命而遇到的其他问题之外，还谈到革命军方面对英国船只曾进行干预的事情。

现附上英王陛下驻九江和汉口领事官们的来信，其中关于这个问题的情报已经引起我的注意。您将看到，怡和洋行所有的“泰生”号轮船受到九江炮台的空弹射击。该船是在黑夜中驶过的，没有注意到信号，终于抵达它的目的地。属于该洋行的另一艘轮船“洞庭”号在汉口受到长江两岸起义军的实弹射击。葛福先生派副领事去见起义军都督，该都督很有礼貌地接待了他，并通知他说：如果各船仅在日间驶过炮台，此类事件将不会重演。我没有获得英国各船主的申诉，所以断定他们普遍认为起义军政府采取这种态度不是没有道理的。在目前不正常的情况下，我认为，我们应承认起义军享有采取温和的预防措施所需要的那种自由，例如完全根据绝对公正的原则制定的以及执行时对英国贸易干扰最小的那些措施。

葛福先生在11月9日的来信中，附有九江起义军统领的一封信，该信说：为了防止外国轮船为清军偷运军火起见，特派一名军官对各船查验后放行，并且只允许各船于日间驶过。葛福先生同总司令官磋商后，发布一项通告，仅说明他已收到这样一信件。我认为，这是处理交通问题的适当态度。当然，不能够指示英国臣民服从该命令，但他们应了解违背该命令时所冒的风险。然而，我应补充说：就我所知，尽管各国政府对战事所抱的中立态度固然是众所周知的，但驻汉口的各国领事从来没有发表过象黎元洪都督于10月31日致葛福先生函(附件三)中所说的那种中立声明。

朱尔典谨上 1911年11月28日于北京

第126件附件1 经德瑞领事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我荣幸地报告说：革命军现已占领九江城一个星期，在这期间，他们不断维持秩序，并有效地保护本地居民以及那些目前住在该城的外国传教士们的生命财产。

下面是一份各国传教士的名单：

英国：庄士敦女士和约翰斯顿女士。

美国：库普飞医生、库普飞夫人、库普飞小姐、特蕾西女士、贝格女士、伍德拉夫女士、沃利夫人、史通医生、布朗牧师、古德温牧师。

瑞典：林斯特龙牧师。

还有一些罗马天主教士，其中包括好几名修女在内。

革命军首领马氏¹不断给我送来公函和信件，我已通过我的文书答复了其中的几件。

1 疑指九江都督马毓宝。

马氏的主要顾虑似乎是担心：各炮台对夜间驶过的那些商船可能错误地开火，并造成损失。他要求我指示所有的这些商船不要在夜间航行。我已经答复说，我当然不能应允他的要求，並极力劝告他，如果他希望避免同各国发生纠纷，必须十分小心谨慎。

然而，与此同时，我向驻汉口和大通的我国海军当局建议，对那些在长江来往行驶的英国船只提出警告是可取的。

前两天夜间，炮台曾经两次发射若干发空弹，促使商船停航。

第一艘轮船“泰生”号系属怡和洋行所有，对炮台的射击没有理会，而驶来九江，并向我报告。

不过，昨夜有一艘轮船，据说是悬挂中国旗帜，认为在开炮时停航而且天明前不继续行驶是可取的。

起义军已在此地召募许多新兵，但目前他们没有足够的来福枪把新兵全部武装起来。

经德瑞谨上 1911年10月31日于九江

第126号附件2 代总领事葛福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上月31日晨，太古洋行轮船“洞庭”号自宜昌到达后，船长向海军当局和我本人报告说：他的船只驶过武昌时，曾经遭到长江两岸的射击。我同总司令官商议后，派副领事柯克先生乘坐英王陛下军舰“夜莺”号前往武昌，向都督递交一封抗议信。柯克先生穿着全套军服，并有两名海军军官陪同，受到了很有礼貌的接待；黎元洪都督对此事表示遗憾，并且答应：如果船只仅在白天的时间内驶过炮台，此事将不会重演。他表示打算给我写一封回信，该信于本月1日晚及时地送给了我。我附上该信的一份译文。

自那天以来，有一两艘英国船只遭到来福枪弹的射击，红十字会的汽艇也被轰击；但革命军现正受到清军的紧紧追逼，这些

事件大概是由于起义军士兵处于这样一种激动状态，以致不受他们长官的约束。

葛福谨上 1911年11月3日于汉口

第126件附件4 代总领事葛福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我荣幸地随信附上我昨天收到的九江革命军都督的一封信的译文。该信通知我，该处将对所有为清军运送军火和给养的船只进行搜查。我向总司令官商议后，已发布一项通告，仅仅说明我收到了这样一封信。

葛福谨上 1911年11月9日于汉口

第127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1年12月15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武昌革命军政府向唐绍仪提出的建议如下：

- 一、推翻满清王朝。
- 二、优待皇室。
- 三、对满族人一律予以体恤。
- 四、统一中国。

唐绍仪将于12月17日抵达上海；那时将需要极认真地考虑局势。

第128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1年12月15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在今天举行的会议上，日、美、德、法、俄、英等国使节决定，要求各该国政府同意通过他们驻上海领事向该地议和专使同时提出下列通知：

“英国驻北京使馆等已奉其本国政府的指示，向负有任务商谈恢复中国和平条件的专使作下列非正式的说明。

英国政府等认为，中国目前的战事如继续进行，不仅使该国本身，而且也使外国人的重要利益和安全，容易遭到严重的危险。

英国政府等坚持它迄今所采取的绝对中立的态度，认为它有义务非正式地吁请双方代表团注意，必须尽快达成一项协议，以便停止目前的冲突，因为它相信这个意见是符合有关双方的愿望的。”

会议订于12月18日在上海举行。各使节认为，为了使该通知产生效果起见，应在会议正式开始前提出该通知。

各使节还商定，除非各国政府都表示同意，不得提出该通知。

第129件 格雷爵士致朱尔典爵士电

1911年12月16日发自外交部

关于您12月15日来电中所说的上海和谈会议问题。

当您的同事们一旦收到类似的指示时，您便应当采取所拟议的行动。

第130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1年12月18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随信附上广东革命军政府发来的一份电报的副本，该电把建立“广东军政府”一事通知北京外交团。

该电又说：外国人受到保护，地方象平时一样安宁。它表示真诚希望加强友好关系，并在结尾时要求把该电内容提请各国政府注意。

广州和西江的情况没有证实关于该地区平静的保证，因为盗匪在那里非常猖獗，以致必须暂时停止来自香港的轮船航行，并

且派英王陛下军舰在西江上巡逻（参阅我11月29日的电报）。

朱尔典谨上 1911年11月30日于北京

第131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1年12月18日收到

阁下：

关于我上月23日提及南京局势的信，我曾荣幸地于11月27日将伟晋颂先生平安离开该城一事电告您。这个消息是通过英王陛下军舰“新城堡”号与上海之间的无线电报收到的。自那时以来，通讯联系较以前甚至更不稳定。昨天，英王陛下总领事来电说：他已有两天未收到南京英国官员的任何消息，因为各趸船和军舰都已根据革命军都督的要求而开走，以便于起义的舰队炮轰南京城。我应补充说：我相信伟晋颂先生在一艘趸船上。

法磊斯先生又说：有一位于11月29日离开南京的英国臣民报告，该城已有三面被革命军包围；伍廷芳证实了这个说法，即张勋提督在城内所占战略据点狮子山的驻军中，有一半已宣誓加入革命军，所以他们发射的炮火是不会造成损害的。伍廷芳博士说：起义军希望尽量少造成损失，所以他们的军事行动迟缓；但他们期望不久占领南京城，显然是要经过下关发动突击。据说总督和满族将军在日本领事处避难，他是目前留在南京的唯一领事。

这里对南京的命运感到最强烈的兴趣，因为它很可能是政治形势中决定性的因素之一。

朱尔典谨上 1911年12月1日于北京

第132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1年12月18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关于您12月16日的电报。

所有六个国家既然都已同意，所以今天对上海各领事发出指示，要他们尽快提出该项通知。

第133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1年12月20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关于我12月18日的电报。

今天，我收到英王陛下驻上海总领事的下列电报：

“按照您的指示，六国领事于今晨用英文和中文向议和专使提出了回文照会。

唐绍仪答复说：今天下午将举行第二次会议，并已严令停战。

伍廷芳发表演说称：由于此次战斗系为自由而战，所以必须按照正确的方针建立永久和平；敷衍了事的和平将导致一次更痛苦的革命。他本人是赞成和平的。

他希望记者出席会议，但我们对此提出了异议。

唐绍仪和伍廷芳都请求向各国转达他们的谢意。”

第134件 殖民部致外交部函

1911年12月21日收到

先生：

关于本部12月8日的信，我奉本部大臣之命，送上关于中国革命问题与驻威海卫专员往来信件的副本。

安得生谨上 1911年12月20日于唐宁街

第134件附件1 驻威海卫专员致哈考特先生函

先生：

一、关于我本月11日及14日的信，我荣幸地随信附上我于本月19日收到的山东巡抚孙宝琦阁下的一封来信的译文。

二、我在本月11日的信中通知您：英王陛下驻济南领事曾电告英国驻烟台代领事说，山东省已宣布独立。我现已收到的该省巡抚的那封信，原文措词如此巧妙，以致对读了该信而不熟悉情况的任何人来说，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也很难了解该信是从已经宣布独立的政府首脑发出来的。该信除了使用模棱两可的词句之外，盖有山东巡抚在该省宣布独立前致函我国政府时所用的关防，而且所注年代系目前清朝皇帝的年号，即宣统三年。在这些方面，它不同于中国其他地区革命党的官方文件，那些文件所盖关防清楚地表明，发出文件的官员属于革命党，而且所注年代为黄帝四千六百零九年。但是，该信在许多方面也不同于该巡抚给他下属人员的函电，因为从我附上的英国驻烟台代领事转送该地临时政府行政长官王管带^①来函的译文中，便将看到这种情况。您将从该译文中看出：王管带提及“总统”字样，而且该信所注年代为黄帝纪元第四千六百零九年，而巡抚本人署名为“总统”，尽管他在给我的信中自称为“巡抚”。因此，该巡抚在致函外国人时所用的头衔和行文款式，与他写信给那些受他管辖的革命党官员时所使用者似乎并不相同。

三、我在收到指示之前，不打算发函表示收到该巡抚的来信。

四、目前，此地及附近地区一切都很平静和安宁。威海卫城内大部分店铺前面都已悬挂白旗，这是已经与革命党联合的一个象征。与此地交界的文登和荣成两县知县没有收到关于山东省宣布独立的任何指示，并且照常与本地政府联系办事。

骆任廷谨上 1911年11月20日

于威海卫爱德华港政府大楼

① 指清朝海军“舞凤”号军舰管带（舰长）王传炯。烟台光复后，成立军政分府，王传炯一度被举为总司令官。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七），第320、331页。

第134件附件5 驻威海卫专员致哈考特先生函

先生：

一、关于我本月20日的信，今天我荣幸地收到您本月20日的电报。您在该电中通知我：只有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我才应当与革命当局进行联系，并应避免采取含有正式承认革命军政府的任何行动。

二、遵照您的指示，我不打算发出任何正式信件，表示收到威海卫城知县和山东省巡抚的函电。那些函电已在我本月14日和20日的信中附上。

骆任廷谨上 1911年11月20日

于威海卫爱德华港政府大楼

第135件 格雷爵士致朱尔典爵士电

1911年12月23日发自外交部

已发布命令自香港派八十名英国步兵，替换驻广州的海军卫队。

第136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1年12月24日发自北京，次日收到

今天，庆亲王和袁世凯要求见我。他们提出一份拟发给唐绍仪的电报草稿，授权他把今后的政体问题留待国民大会决定，该大会按照事前双方互相商定的条件，在今后三个月内由全国各省选举的代表组成。

第137件 格雷爵士致朱尔典爵士电

1911年12月26日发自外交部

关于您12月24日的电报。

我们希望看到，在中国人民愿意采取的无论什么政体下，有一个强大的和统一的中国。

第 138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1年12月29日收到

阁下：

继续谈我上月18日信中所说的事，我荣幸地报告：从我收到的英王陛下驻成都和重庆领事官员们的来信看来，四川的乱事似乎表现了明确的增长迹象，而且运动正在迅速地改变性质。鼓动反对铁路政策的人们，迫使清政府把邻省的军队抽调一空，从而给武昌革命党人提供了他们所等待的机会，而现在，武昌起义已使四川的反抗变成一次坦率的反对朝廷的起义，人们所谓的英军逼近的无稽之谈以及说英王陛下使馆已向清政府提出进行干涉的威胁，使起义更加严重了。

只有通过间接的和不确定的路线，才有可能同重庆以及成都进行电报联系，但布朗先生经过云南府发来一份电报说：重庆已于11月22日发生革命；所有外国人都平安无恙；城内很平静。

务谨顺先生通知我：成都以北各教堂现在处于骚乱最激烈的地区，但直到目前为止，各教会及其任职者几乎奇迹般地未受骚扰。然而，布朗先生报告说：中国内地会的格兰威尔夫妇在自贵阳至重庆途中遭到一群武装匪徒的抢劫。

朱尔典谨上 1911年12月6日于北京

第 139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1年12月27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随信奉上外务部的一份照会的副本，其中附有隆裕

太后发布的一道谕旨的抄件。该谕旨宣布摄政王的正式退职，并任命两位高级官员为清帝太保，其中一位是满族人，另一位是汉人。政府工作将由内阁总理大臣及各部大臣办理，而降裕太后和皇帝将主持召见及礼仪事宜。

这个步骤是否将使全国同意接受已被削弱的满族统治下的立宪政府，或者南方的急进派是否认为它是软弱无力的又一迹象，坚持废除清朝及建立共和政体，这仍有待于继续观察。

朱尔典谨上 1911年12月8日于北京

第140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1年12月28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在皇族的赞同下，今晚将发布一道谕旨，命令召集国民大会，以决定今后的政体，并且建议全面停战，直到该问题获得解决为止。该谕旨说：此事极为重要，对中国的内政外交具有密切影响；它必须不由朝廷或国内任何特殊阶层而由全国的集体意见作出决定。

该谕旨的措词是庄严而又调和的。

第141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1年12月29日收到

阁下：

继续谈我11月16日信中所说的事情，我荣幸地报告：汉口的战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断断续续进行的，于11月19日又重新猛烈地开始。葛福先生来电说：汉阳起义军大炮发射的许多炮弹曾落入租界内；萨镇冰提督所率巡洋舰悬挂着革命军旗帜驶了回来，对铁路桥梁进行炮击，结果使美孚油公司的油库着火。除此之外，各国租界似乎没有蒙受重大损失。11月27日，战事在距汉水相当

远的地方激烈进行，最后以清军攻克汉阳而告结束。起义军溃逃过江，丢弃了他们的大炮及各种物件。

黎元洪都督又曾试图说服各国领事承认他的政府，但这当然是办不到的。他的地位由于最近被战败而大为削弱，他本人已被上海起义军当局降职为黄兴之下的副统帅，该当局自命为“中华联邦临时政府”。

宜昌的形势并非没有危险，这主要是由于它附近有大批铁路工人的缘故。我已就此问题向清政府提出建议，并获悉后来有成批工人由轮船运往北方。总司令官已安排一艘炮舰每隔不久的时间访问宜昌和长沙。

湖南全省已落入革命军手中；军队与绅士之间的不和，看来很可能导致另一次动乱。我已特别促请总司令官注意长沙方面的要求，因为长沙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冬季应有一艘炮舰保护。

萨镇冰提督所率领的全部舰队现已明确地拥护革命事业。提督本人仍继续忠于清朝，因此他的地位颇有危险。他被允许在英王陛下的一艘军舰上避难，并在英王陛下驻九江领事馆过夜。他化装成商人离开九江，已平安抵达上海。

广州城内虽有好战分子，但它本身仍保持平静。它由著名匪首陆兰清率领的约三万名歹徒维持治安。前政府官员中，只有提督龙济光和水师提督李准继续留在该处，他们已答应与新政府共同维护和平。财政问题是对和平的主要危险。另一方面，盗匪遍布全省各地，如同我在11月29日电报中所报告的那样，西江上的抢劫活动已如此严重，所以必须派英王陛下军舰在江面巡逻，以便使英国轮船公司能够重新恢复已暂时中断的业务。

为了便于派遣军队前往骚乱地区起见，在邮传部的要求下，香港总督同意自11月7日起停止广九铁路上普通列车的行驶。邮传部的要求系根据该路行车草合同而提出的，并保证赔偿英国路

段所减少的收入。该省行政当局既已提供一支适当的卫队，所以中国路段自广州至石龙之间的列车已于11月28日重新开始行驶。

自从我上次写报告那一天以来，厦门海盜及氏族械斗非常盛行；租界实际上由英王陛下军舰“盖茅斯”号维持秩序。官员们之间互相争吵，其中没有一个人是由福州当局委任的。该省内地也没有避免发生骚乱，但凡是出现政府交替的地方，甚至伴随着发生动乱的时候，他们都极为小心谨慎地注意不干扰外国人或教民。

12月5日从云南府传来的最新消息表明，城内恐有大乱。蒙自的库藏和关税均被抢劫；有一家德国和希腊洋行的房屋遭到攻击和掠夺。铁路沿线其他地方也发生了骚乱，但显然没有造成任何外国人的死亡。

在云南西部，回民和土司也发动了一次起义。

贵州省安顺地区的教堂已被焚毁，传教士们都已离去。

承印度总督的好意，把他所收到的英国驻江孜和亚东商务代表以及驻锡金政治官员的电报转告我。那些电报表明：西藏爆发的起义和中国各地一样，蔓延很广。现在预言由谁主持最后重建权力机构，也许为时过早，但是，驻藏大臣的逃走和后来的被俘，以及传闻叛兵想返回中国的意图，成为对中国宗主权的一个具有毁灭性的打击，而且似乎暂时粉碎了对赵尔丰出征所抱的希望。

英王陛下驻济南府领事报告说：山东起初获得满清政府统治下的自治权，后来又完全脱离满清政府，而且自11月13日起加入中华共和国。这个结果是由特别组成的代表大会中的革命分子所造成的，而且第五镇部分官兵采取的不积极反对的态度对它也提供了帮助。12月1日，戴比德先生来电说，该省已重归清朝管理，但我没有获得说明此事如何发生的详细情节。无论如何，它似乎得到了军队的默许，因为第五镇有一千人于12月5日前往该省西

南部的曹州府镇压盗匪。在津浦铁路线上山东南部边境的城市徐州府，据说即将发生抢劫；英国工程师伯恩和赫恩及其家属实际上均已被阻。然而，一列专车于11月28日将他们的家属送往济南。那两位工程师本人显然仍留在徐州府，传闻该地于12月6日一切都已平静。

铁路当局已收到清朝中央政府的最紧急命令，要尽一切努力建立通往浦口的交通，这无疑是为了派遣军队协助防守南京，但是，使两军会师已为时太晚，难以挽救该城，而且在我的要求下，袁世凯已同意不把该铁路用于军事上的目的。我们希望起义军首领也将同样地不利用该铁路，但如果即将开始的谈判失败而使目前汉口的停战协定终止，那么，很难期望使军事方面需要考虑的事情服从于该铁路的商业利益，而且保持该铁路不再遭受损失一事又将成为十分困难的问题。

我没有听说烟台是如何对待山东重新效忠于清朝一事的，但我毫不怀疑烟台将默认省城所作的任何安排。该口岸仍继续保持秩序。

关于山西的情况，没有发生任何可以报告的变化。起义军据有太原府及山西铁路；清军仍占领石家庄，该地靠近与通往汉口的铁路干线相连的交叉点。

关于陕西省城西安府所演悲剧的可靠消息，终于传到了北京。所有满族人都会被杀害，满城全遭破坏。贝克曼夫人、瓦特尼先生和六名儿童都是附属美国教会的瑞典臣民，在起事的第一天便被暴徒杀死。三位英国臣民，即史密斯夫妇和曼勒斯先生，都已受伤，但据说所有其他英国臣民未受伤害，而且均继续留在西安府，该地夺取了政权的起义者已答应他们给予保护。

驻哈尔滨代领事报告说：东三省北部没有发生动乱；吉林已组成类似沈阳的保安会。

乐民乐¹先生报告说：牛庄的情况同样平静，该口岸对维护秩序比对革命宣传更为关注。

朱尔典谨上 1911年12月8日于北京

第142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1年12月30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12月29日，英王陛下驻上海总领事发来如下的电报：

“伍廷芳与唐绍仪之间在今天下午的会议上商定，停战延至1月5日为止。城内由宪兵队维持秩序。清军撤出汉口及其他地方，退至一百华里处。革命军不得占领清军撤出的地方，他们将仍驻守他们现在的阵地。明天下午将讨论国民大会的组成及选举事宜。在国民大会召开之前，不得议借外债”。

第143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1年12月31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我收到上海12月30日发来的下述电报：

“国民大会组织法已于今日议定，分二十四个区：新疆、东三省、蒙古、西藏及十八省。十八个区构成法定人数。每区享有三票，投票代表不得超过三人。由北京将这些协议通知直隶、新疆、东三省及蒙古；由北京和南京共同通知山东、河南及西藏。发出通知以前，将确定大会的日期。明天将再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及选举办法。”

¹ 英国驻牛庄领事

二、 关于中国事件的补充函电： 中国第三号（1912年）

第1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1年12月27日收到

阁下：

我在上月23日关于清朝海关岁入及其担负偿还外债问题的信^①中，曾经报告说：驻北京的各国使节已向上海的各国银行家发出一份同文电报，要求他们进行磋商，议定组成一个银行家委员会，按照海关岁入所抵押的债务，接受和处理那些海关岁入。

现在，我荣幸地奉上各银行家应此项邀请而通过的各项决议的一份副本。您将注意到，由于议定把保管海关税款一事仅委托给那些对该税款享有优先索还的银行，所以我曾向我的同事们指出过对恢复银行家赔款委员会的那些反对意见，已完全消除了。

我收到各银行家的电报后，立即把他们的建议通知各国使节。现在，各国使节已同意把该建议提交各该国政府批准。

我还荣幸地随信附上外务部送来的一份备忘录的译本。正如我在上述信件中所报告的那样，该备忘录是答复我上月21日向他们提出的关于欠付1896年清政府五厘息金借款问题的备忘录的。外务部在该备忘录中正式说明，所有各口的海关岁入现已完全置

^① 原编者注：参阅《中国第一号（1912年）》，第121件。

于海关总税务司的控制之下，供偿付外债和赔款之用；他们在另一件来文（副本一并随信附上）中，把根据总税务司的建议所做的安排通知我，以便将这项政策付诸实施。我已把这两份文件的副本通知其他各国使节。

朱尔典谨上 1913年12月5日于北京

第1件附件1 银行家们通过的决议

11月23日，星期四，下午四时半，各国银行经理在麦加利银行举行会议，考虑各该国领事提交他们的问题，即北京外交团的一份电报，建议在中国目前的动乱期间组成一个国际委员会，对海关岁入的保管和分配实行监督，该岁入是保证首先用来偿还1900年前签订的对外借款，其次是支付辛丑条约中所规定的赔款。现作出下列决议：

一、通过各该国领事向外交团建议，国际委员会应由那些与1900年前签订的以海关岁入作担保而尚未偿清的各次借款有关的各银行经理，以及（或者是）与支付赔款有关的各银行经理组成。

二、有主要关系的银行，即汇丰银行、德华银行和华俄道胜银行，应当是海关税款的保管者。

三、要求海关总税务司提出一项保证：他必须向该被任命的委员会说明海关净入的用途，直到中国政府能够重新偿付借款和赔款的时候为止。

四、海关总税务司应安排把各征税地点所得的净入每周一次汇往上海。

五、为了偿付有关的借款和赔款起见，总税务司应安排把上海所积聚的净入，每周一次分为尽可能大约相等的三笔款额，存入汇丰银行、德华银行和华俄道胜银行，同时授权海关税务司按照这些借款的先后顺序，支付已到期的借款。

六、如果到1912年底还没有恢复正常情况，那时便应把可供支付赔款的剩余款项另立帐目，并将这种帐目送给外交团，以便他们决定如何处理。

第 1 件附件 4 海关总税务司拟订的方案

总税务司建议：

一、应对那些关税收入不受总税务司控制的各口岸（如哈尔滨、琿春、牛庄、安东、大东沟等地）海关监督发出指示，要他们立即将手中的关税结余交给当地的各海关税务司，以便汇交总税务司在上海汇丰银行的岁入帐户，供偿还外债之用；今后上述各口岸的关税收入，应按照发生动乱的各开放口岸所采取的方式，置于各海关税务司的控制之下；除了从胶州海关岁入中付给青岛政府的津贴费之外，总税务司应把胶州和大连的海关岁入汇往上海，以偿付外债。

二、九龙和那霸的海关岁入迄今均系汇给两广总督，为了偿付外债起见，应自1911年10月起同样由总税务司汇往上海。

三、要求外交团任命一个各国银行家委员会，决定偿付外债要求的先后顺序问题，起草有关这方面应付各款的计划表，并根据该表，当应付款项到期的时候，从总税务司处领取支付这些款项所需要的岁入款额。

四、要求银行家委员会商定暂时停止偿还应付的借款本金，在目前而且在积聚充足的岁入之前，仅偿付到期的利息。

1911年12月2日

第 2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1月1日收到

阁下：

继续谈我本月1日信中所说的事情^①，我荣幸地随信附上后来收到的英王陛下驻南京领事的几份报告，它们生动地描述了事态的发展，最后于12月2日以南京城投降革命军而告结束。革命军获得的这个胜利，抵销了他们最近在汉阳所遭受的挫败，无疑地使他们有了新的勇气；现在他们的首领对于即使是保留满清朝廷作为国家的傀儡一事所采取的不妥协态度，也可以追溯到该胜利的影响。

虽然自那时以来南京仍保持平静，但张勋提督带着一批士兵，估计为一千五百人至二千人，逃往长江北岸，从而造成了一种令人感到颇为忧虑的局势。

12月1日，我得到的消息表明，清朝中央政府方面有意试图援救南京。关内外铁路当局已奉命派火车自滦州运送七千名部队前往济南府；人们推测南京是他们的最后目的地，这似乎是有道理的，因为山东已归附清朝，大概排除了增加省城兵力的任何必要性。然而，我询问英王陛下驻济南府领事，驻守该地的第五镇军队中是否有些已乘车南下。12月2日，戴比德先生作了否定的回答，但他于5日来电说：大约有两千名军队从南京抵达山东南部边界，北京已下令阻止他们继续前进，还有第五镇的一千名士兵已被派往该省西南部的曹州府，去镇压盗匪。

12月6日，英王陛下驻上海总领事把南京的一份电报转告我：传闻张勋提督与革命军之间的战事在南京以北约一百英里的地方进行，但电报联系中断，该消息不可能得到证实。南京的革命军统帅声称，浦口的铁路全部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如果该路被用来运送北方的军队，他威胁要破坏它。他希望该路照常营业，但由于缺乏现款，该路总工程师预料有可能不得不放弃它。

^① 原编者注：参阅《中国第一号（1912年）》，第131件。

当敌对双方的代表似乎很有希望举行会议商谈的时候，我极为深切地感到，对清政府来说，从事于收复南京这样危险的一项任务，除了继续发生无益的流血事件之外，可能无可挽回地危害和平解决的事业，而和平解决是各有关方面的利益如此迫切地要求的。因此，我把我对形势的看法向袁世凯作了阐述，希望他对张勋提督发出停止继续冲突的命令。我于12月7日把我采取的行动通知英王陛下驻南京领事，授权他向革命军首领提出我的保证，铁路将不会被用来运送北方的军队，并且指出：为了中国的完整和独立，毫不迟延地进行和平解决，关系是多么重大。我不知道袁世凯是否按照上述意思真正发出了命令，但鉴于该地区的军事活动属于本月9日晚所商定的普遍停战的范围之内，所以我认为没有必要坚持这一点。今天，我收到英王陛下驻济南府领事发来的电讯说：第五镇的一千名士兵已前往山东南部边境的韩庄车站。然而，似乎没有什么疑问，这个调动是在停战协定签订前进行的。

今天，我又收到英王陛下驻南京领事的另一封信，谈及津浦铁路所出现的困难局势，并要求我关于他对革命当局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给予指示。我荣幸地附上该信以及我的复函的副本。关于他对革命当局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我对伟晋颂先生所作的指示，是同给予英王陛下驻汉口总领事的指示相类似的，因为那些情况非常相似。关于津浦铁路，我建议采取沪宁铁路所采取的那种政策，但是，我指出：在已经很不明确而且容易发生突然变化的形势下，只可能采取聪明的见机行事的方针。

我冒昧地认为，伟晋颂先生所采取的行动，正如附上的那些报告中所表明的那样，是值得称赞的。我已向他作了总的表示，热烈赞同他在困难和烦恼的整个时期中的行动，以及他在坚守岗位时所表现的决心和勇气，直到他不再可能或适宜驻在南京为止。

现附上我写给他的那封信的副本。

朱尔典谨上 1911年12月12日于北京

第2件附件1 伟晋颂领事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我荣幸地报告如下：

昨晚，我接到英国驻本口岸高级海军军官、英王陛下军舰“克莱奥”号的威尔中校的电话，通知我：他收到英王陛下驻上海总领事的一份无线电报说，对南京的进攻迫在眉睫，并建议所有的英国臣民离开该城。我立即把该消息通知那四位仍然留在此地的英国侨民，再一次警告他们说，不可能对他们提供保护。

今晨，我陪同威尔中校对总督和张勋提督进行礼节性的拜访，因为关于此地发生的某些问题我曾经有机会见过他们。总督独自接待我们，通常在这种场合下协助他招待来访者的那些道台们统统不见了。我觉得总督阁下是很沮丧的。他说：所有这些麻烦的事情出乎意外地突然向他袭来，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健康。在他看来，现在，事情已经发展到不再可能妥协的阶段。虽然他深信目前起义军对南京的进攻将遭到失败，但不幸的是，他们的挫败并不是事情的结束。他最近抱怨的事情，似乎是他不能够发电报前往北京，尽管此时电报线路畅通无阻。他说，上海拒绝发送所有的官方电报。虽然他的想法无疑是错误的，但据他所说，革命党人破坏了此地的无线电台。正如我曾提醒他的那样，该无线电台在此次危机中是会很有用处的。

我们紧接着访问了张勋提督，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但很少讲究礼节。他穿着破旧的普通中国服装。他的衙门及其周围是同他的容貌很协调一致的，而且象旧式官僚中间通常出现的情况一样，有一群看起来很不体面的士兵和苦力聚集在门窗的附近，

听我们谈话。我后来获悉，张勋提督有这样一个印象，即我们象李德医生一样，是作为议和谈判者来拜访他的；很可能由于这个原因，而且为了其他那些听他谈话的人们起见，他在谈话开始时用很轻蔑的态度提到起义军。他告诉我们说：你很希望与起义军会战，而且打算很快就击败他们。我们谈话的总的结果是令人感到不满意的，因为我们对他的意图一无所知。据说，他的意图是：如果他遭到挫败，他将渡江前往浦口，并沿铁路线开入山东。然而，他说：他想要在城外打仗，城内的外国人丝毫没有惊慌的理由，因为他完全能够保护他们。他还迅速地同意了我不得不向他提出的几项小的要求，其中之一是应专开放西门，允许属于英美烟草公司所有的某些货物运出城外。为了支持该项请求，我向他提出英王陛下驻上海总领事关于该问题的一封信；从他感到不知所措的情况看来，他不能够阅读该信，那是十分明显的。总的说来，我对张勋提督的印象并不坏，他无疑是一位精力充沛的人，对他的职业具有实际知识。

南京城内的局势在表面上仍未发生变化。据说，有一支革命军已经进入距城七英里以内的地方，但如果这个消息属实，南京的居民一定还不了解此事，因为迁移出城的人们正在减少。据张勋提督说，今晨革命军的主力部队还没有到达龙潭，但他显然期待他们很快地到达，因为他已经派遣约五千名士兵开出东门，在紫金山下等候他们，该处显然将发生第一次大的战斗。派出城外的士兵包括大部分新兵和三、四营该省军队在内。该提督自己专辖的长江防营仍驻在城内，因此他明显地打算让他那些质量较差的部队在革命军进攻面前首当其冲。然而，革命军在企图攻城之前，很可能将试图夺取长江沿岸的炮台，其中至少有三座炮台在南京与镇江之间。从位于长江南岸下关下游约两英里处的最后那座炮台上，已撤去了大炮的炮闩，据说是为了当革命军占领该炮

台时，防止大炮被用来轰击他那些渡江前往浦口的部队。当然，他也可能是怀疑炮台守军是否忠诚。无论如何，撤去这些炮台，以及该提督刚刚把他的宠妾送往上海一事，表明他并不完全象他声称的那样，对胜利怀有信心。

因为我仍然认为，对外国人来说，城内的局势迄今还不是很危险的，所以我打算在攻城开始之前，无论如何继续留在领事馆。在必要时，我可以在日本领事馆避难。如果我被关闭在城内，高级海军军官将照管我们在下关的利益。

伟晋颂谨上 1911年11月23日于南京

第2件附件2 伟晋颂领事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继续谈我本月23日信中所说的南京形势问题，我荣幸地报告如下：

本月25日，星期六，虽然南京城内一切事情表面上都是很安宁的，但各城门仍整天对公众关闭。由于刮着大风，尘土飞扬，人们不可能看出城外发生的事情，但从大批军队的频繁活动看来，显而易见，战事不是已经开始便是即将爆发。下午四时半左右，镇江皮茨标先生写的一封信，放在篮子里越过了城墙，送给了我，转来徐绍桢统制的信，极力劝我立即离城。几乎刚收到这封信之后，德国领事给我打来电话，他住在下关他的一位侨胞家里，通知我说：老虎山炮台已被革命军占领或已归附革命军。该炮台就是我在信中曾提到过恰好位于南京下游的一座炮台，它的大炮已被撤去了炮台。德国领事又说：总指挥官^①希望我得到紧急劝告离开南京，因为他打算第二天轰城。

① 指徐绍桢，当时任江浙等省联军总指挥官。

这些信件，以及那位仍留在城内照料住院伤员的领事馆内科医生麦克林大约在同时给我送来消息说，有一支清军在城外遭到革命军的突然袭击，几乎完全瓦解，在被杀者中间有张勋提督的副指挥官王有宏统领，所有这一切使我深信，现在是把我的办公室迁出城外的时候了，除非我愿意完全被关在城内，并经受围困。经过许多麻烦之后，我能够获得张勋提督的一张许可证，允许于该夜特地开放下关城门让我出城。晚上八时，我离开领事馆，陪同我的人有我的警官以及英美烟草公司驻本口岸的代理人，他曾和我住在一起为把他的货物迁出城外而进行安排。我留下了三名英国臣民，两名是从事红十字会工作的麦克林医生和德拉蒙德医生，以及一名印度人，因为我无法和他联系。在我离城期间，我把领事馆交给我的僚属中没有离去的文书和其他三名成员看管。他们将住在领事馆的房屋内，尽力防止偷盗，或避免发生火灾，如果那些房屋被炮弹击中的话。当然，我带走了现款和较重要的档案。我还把我打算离开一事通知了总督和张勋提督，并请求专派一支卫队保护领事馆。

虽然我仍认为我可以继续住在领事馆而没有严重危险，但革命军首领们的一再警告使我感到很满意，因为除了其他原因之外，如果我继续拖延不走，就我这方面来说，将是不礼貌的。因此，我冒昧地希望：鉴于这些情况，当我离去的时候，您将认为我离去的行动是正当的，而且该行动将获得您的批准。昨天，无论对外国人和中国人都是一样，只有一个办法出城，那就是悄悄地用一根绳子越过城墙。我的新住处在太古洋行的趸船上，该洋行的经理人威尔斯先生盛情地接待了我和我的警官，给他个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不便。

战斗从进攻张勋提督的部队开始，此后几乎毫不间断地一直继续进行。就我所知，革命军似乎是始终获得胜利，这也许是不足

为怪的，因为张勋提督的最精锐部队中没有人参加战斗，或者至少是很少有人参加战斗。他把这些部队同他一起留在城内，因为只有这些部队的忠诚是他能够绝对信赖的。直到目前为止，战斗的总的结果，是清军几乎放弃了他们在城外占有的每一个有利据点，现在实际上被围困在城内。迄今发生的最激烈战斗是在城东紫金山附近，清军以很大的兵力驻守该地。一位外国目击者曾见到清军大半系新兵，在该地参加战斗后返回城内，他告诉我说：他们极为混乱地穿过城门涌入城内，而且在到达约三英里外他们在阅兵场的驻地之前，从未停止奔跑。即使是大约说明双方至今所受的损失，也没有可用的数字。

直到目前为止，我亲眼见到的战斗，仅限于观看昨天整个上午和今天下午约半小时内在被占领的老虎山炮台与城内俯瞰下关的狮子山炮台之间的交火。双方的射击比人们所预料的要好得多，因为尽管没有击毁任何一方炮台中的大炮，但是，只有很少的炮弹完全没有击中目标。然而，有一发炮弹打中了下关的一幢外国人住宅，幸亏该住宅内的居民已在前一天撤走了；另一发炮弹落在很靠近德国临时领事馆的地方，有好几名中国人伤亡。该日老虎山发射的一枚炮弹命中北极阁，北极阁系城内的一座山，总督、满族将军和张勋提督都住在山顶。虽然那两座山之间的距离超过五英里，炮弹竟在他们三人居住的庙宇内爆炸，击毁了两尊小炮，使那几位高级官员本身感到胆战心惊，他们惊慌失措地逃入附近的日本领事馆避难。张勋提督很快便恢复了镇静，并返回他的工作岗位，但昨晚总督和满族将军仍在该领事馆。今天下午的炮击没有造成损害，但已宣布老虎山炮台和革命军舰队将于明天联合发动对狮子山炮台的进攻。由于下关将处于炮火线之内，所以在老虎山的革命军总指挥官的要求下，外国巡船于今天移至上游约七英里的地方。当然，炮击对外国人在下关的财产而且很可能对

领事馆带来的危险是很大的，但驻在此地的海军指挥官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做任何事情保护外国人在受威胁地区的利益。我应当说，属于该舰队的大约六艘舰只于今天上午十时曾一度驶至现场，可是没有参加开火。它们的大炮很可能是口径太小，对狮子山炮台的重型武器没有很大的用处。

我曾提及在老虎山担任指挥的那位革命军将领，是一位名叫黎天才的云南人。除了老虎山炮台的守军之外，他还率领一支由中国南方人组成的混合部队¹⁾，大约有一千五百人。此地的几位外国人曾去见他，受到很有礼貌的接待。他和他的部队都给他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据黎天才协统说：他的专职是防止张勋提督本人或带着他的军队渡江逃窜。他认为，革命军不久便将通过南面或东面的一座城门入城，防守该城门的卫队将对革命军开放城门。在那种情况下，张勋提督将试图前往浦口，他在该处约有一千五百名最精锐的部队，然后开往北方。由于这个原因，黎天才协统希望江面上没有船只往来，以便当清军试图渡江时，没有任何障碍物阻止他对清军开火。

当然，不可能说明将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攻陷南京；但看来仍象是革命军依靠清军士兵的变节，如同依靠他们努力攻占该城一样。因此，这个问题似乎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张勋提督的军队是否仍保持对他的忠诚。

在同其他口岸没有电报联系的情况下，我继续采用我以前的做法，收集我能获得的全部消息，并把它送给高级海军军官，以便他从中选择一些消息通过无线电报发往上海。我知道，所有这些消息将通知英王陛下总领事，并由该总领事通知您。

今晚，从能见到的闪光看来，南京城显然正受到来自南面的

1) 李燮和在上海组织光复军，黎天才任该军第一协协统。见《辛亥革命》（七），第51页。

炮击，无疑是用野战炮轰击的。海军的炮击订于明日下午四时进行。

现在，泊于南京的英国军舰有英王陛下的“克莱奥”号和两艘驱逐舰。

伟晋颂谨上 1911年11月27日于南京

第2件附件3 伟晋颂领事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继续谈我本月27日信中所说的事情，我荣幸地报告如下：

黎天才协统宣布的昨天对南京进行的总轰击，于刚刚天黑后开始，并持续了大半夜，激烈的程度有所不同。今天凌晨，炮火十分猛烈，看来南京城好象正遭到围攻，虽然在下关和南门附近喧闹声最大。今天上午，我参观了下关，它虽经历炮击，看来却没有什么变化。靠近城墙的几间房屋被炮弹击中，但都没有受到严重损失。自海关至税务司住宅的私人电话仍然畅通，该税务司住宅就在领事馆的隔壁，所以我能够通过电话同我的那位文书谈话。他告诉我说：领事馆及其附近的其他各国建筑物都未遭损坏，而且就他所知，城内的外国人均未受伤害。不幸的是，他不能够告诉我，而且我也不能够从任何其他方面查明，南门外战斗的结果究竟如何。城外的一切情况都很平静。

我在下关遇见了《纽约先驱报》派驻革命军的记者，他刚从尧化门车站抵达下关。前一天夜间，他是在该车站渡过的。他对昨夜战斗的结果一无所知，但他能够证实麦克林医生关于星期六革命军获胜的报告，因为他在第二天参观过现场。清军受了重创，虽然他们主要是由新兵组成，但其中老兵的影响很大，可是这些老兵不能够阻止惊慌情绪。那位记者看见了清军的好几堆尸体，数了一下其中最大的一堆尸体达一百具以上，所以他们的损失一

定是很惨重的。他只有钦佩他所见到的革命军的战斗成果，但很少考虑到革命军首领们的指挥才能，他们中间的总参谋顾将军¹，是在任何方面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唯一的人物。徐绍桢统制和林述庆都督²彼此互相嫉妒，他们之间的对立严重地妨碍了军事行动。虽然革命军在紫金山下附近的战斗中获得胜利，但却未能赶走驻守在山顶上的一支约二百人的清军队伍，他们今天早晨仍在该处。

从昨天革命军进攻下关的完全失败看来，尽管这当然可能是为了吸引南门的清军而发动的佯攻，但他们在打哑狮子山炮台之前，似乎没有任何机会从北门入城。为了砸开城门或打穿此地的城墙，便需要有舰队的协助；只要他们的舰只容易遭到炮台的重炮轰击，那些舰只便不能够驶近下关。人们认为，有一两艘炮舰在黑夜的掩护下参加了昨夜的轰击，但相距太远，以致几乎没有什么用处。据我看来，为了打哑狮子山炮台，必须从上游对它进行轰击，因为它只有一两门口径较小的大炮朝着那个方向。这件事可以由现在停泊在汉口的那些巡洋舰来完成，但直到目前为止，没有一艘巡洋舰曾在此地出现。老虎山上指向南京城的大炮，口径仅为四·七英寸，而狮子山上有六英寸及八英寸口径的大炮。我在上封信中没有说明：为了安全保管起见，张勋提督把从老虎山大炮上撤去的炮闩放在一艘炮舰上，后来该炮舰归附革命军；当老虎山炮台落入革命军手中的时候，他们自然把那些炮闩送还炮台。

我已把我的办公室迁入太古洋行趸船，现停泊在下关上游九英里的地方。为了查明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从津浦铁路仓库监督那

1. 疑为顾忠深，当时任江浙联军总参谋。见《辛亥革命》（七），第52页。

2. 当时林述庆任镇江军政分府都督。

里借用了他的一艘汽艇，以便每天把我送往下关。虽然这里可以很容易地听到炮火声（我们离南门的直线距离仅七英里），但不可能获得任何消息。然而，昨天，我看见在距趸船两英里左右的地方，有一批清军约三四百人遭到革命军追击，向西面逃去。

伟晋颂谨上 1911年11月29日于南京

第2件附件4 伟晋颂领事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自从上月29日我写信给您以来，南京周围的战事没有停止过，虽然根据射击的数量判断，夜间的战事比白天更激烈得多。在我昨天参观下关期间，老虎山和狮子山的大炮又正在交火；当我给城内的领事馆挂电话时，因为下游约两英里处存放水雷的弹药仓库发生爆炸，我所在的那幢建筑物受到了严重震动，该爆炸事件大概是狮子山发射的一枚炮弹引起的。那座仓库在革命军手中，已片瓦无存，但我不能够说，革命军是否使用过它。昨天晚些时候以及整个夜间和今天早晨，浦口方面也发生猛烈射击，该处正受到扬州和清江浦两地革命军的进攻，守军的兵力大约有两千人，其中有五百人已于最近被派往临淮关，但阵地是很坚固的，需要用很大力气才能攻下。

进攻浦口的目的，正如进攻狮子山炮台的目的——一样，似乎是为了当革命军入城时，切断张勋提督及其部队的唯一逃路。革命军无疑地把他们的主攻方向对准城南和城东；他们正在大力进逼，因此他们的努力很快就将获得胜利。迄今还没有被逐入城内的清军，只有我上封信中提到的驻守在紫金山顶的部队。南门外的雨花台炮台已被革命军占领，它的大炮已转向南京城。甚至张勋提督本人也必定丧失了信心，因为据目前仍在城内的传教士们说，张勋提督询问过他们，万一该地被革命军占领，他是否可以和他

们一起避难。我应当说明，这些传教士们预料南京将在最近两三天内陷落。

送给我的关于城内形势的报告，仍继续令人感到十分放心。所有的外国人都很好：据人们所知，外国人的房屋没有遭到抢劫或焚烧。已经发生的好几起大火，统统在中国人的居住区内。

伟晋颂谨上 1911年12月1日于南京

第2件附件5 伟晋颂领事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继续谈我本月1日信中所说的事情，我荣幸地报告：南京已于今晨投降革命军。

我得到关于投降的第一个暗示，是看见狮子山炮台上悬挂着白旗。这是我今天下午前往下关询问围困进展情况的消息时注意到的。我立即从我乘坐的汽艇上登岸，穿过城门前往领事馆，城门虽有重兵防守，却是开放着的。到处是许多白旗，人们笑容满面，使人很明显地了解南京的陷落已经是既成事实。原来防守南京的士兵们都在手臂上缠着白带，其中许多人四处活动；革命军结成两第三批开入城内。从一片平静气氛以及原来守城士兵与革命军之间的明显友好关系看来，也很显然，投降一事是友好地完成的，而没有发生战斗，至少在南京城北区是如此。领事馆安然无恙，外国人或外国人的房屋在围城期间都未受损害。我从领事馆前往市中心传教士居住的地方，在该处见到了麦克林医生，他正忙于照料住院的伤员，他们大约有一百五十人。我从他那里获悉：投降实际上是前一天下午决定的，因为革命军占领紫金山顶并从该处轰城，使守军完全丧失信心，除了张勋提督的直属部队（他们不及守军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之外，他们都感到不满。

就我所能搜集到的情报来说，投降一事是由一个姓左的人安

排的，他是革命军的使者，但又与张勋提督有私交。他已在城内住了一些时候，试图商谈一项解决办法。他在几名传教士的陪同下，于昨天早晨见到了城外的革命军指挥官林述庆都督，并从他那里获得了清军投降时的十分圆满的条件。左先生把这些条件交给了张勋提督，虽然张勋提督予以拒绝，但他的大部分官兵显然认为这些条件是可以接受的，所以人们猜测，该提督决定投降的时刻已经到了。总之，人们认为，他在总督和满族将军的陪同下，于昨夜或今晨离开南京城，渡江前往浦口，后来他的大批部队逃出西门，在下关上游约十二英里处渡过长江，跟着他前往该地。人们一旦知道他已逃走之后，便立即为革命军打开城门。

防守南京的土崩瓦解是如此突然和出乎意外，所以人们很难不怀疑：张勋提督是被收买的；他拒绝林述庆都督的条件，只不过是欺骗局外人而且很可能是欺骗他自己的士兵的一个障眼物。尽管南京城内各处遭到猛烈的炮击，但对它的防御工事所造成的损失却是微不足道的。城内有许多大炮被打哑，但城墙本身没有被打穿；有人告诉我，唯一受到沉重打击的城门是太平门。除非张勋提督不信任他自己的士兵，或者是他的粮食供应不足，他是没有理由象他所做的那样逃走的。还值得注意的是：革命军没有认真企图阻止他渡过长江；昨天早晨才进攻浦口而且几乎已包围浦口的部队，下午便统统撤了回来。

现在还不知道伴随张勋提督逃走的部队究竟有多少人，但连他在浦口的部队加在一起，他至少有一支二千五百人的队伍在他的指挥之下。

当我今天早晨参观的时候，城内是平静的，但夜间曾发生大肆抢劫的情况；因为如发现任何人被认为藏有赃物，便立即予以处决，所以我不愿意亲眼看到许多可怕的事件。城门上悬挂着一个首级；当我到达领事馆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被枪毙，他证明

是张勋提督手下的一名军官，在他身上发现有二百元现金。不幸的是，打死他的那颗子弹跳了出去，击中了站在旁边的一个小男孩，穿过他的颈部。由于他还活着，于是我把他送到医院，他在那里得到了治疗。我还见到一支革命军巡逻队与一些已投降的旧军之间由于误会而发生的一次战斗，在说明误会之前已有好些人伤亡。然而，最不愉快的景象是躺在路旁的无头尸体，那些尸体显然是无业游民的。革命军正在强制维持秩序，这是无可怀疑的。我知道，林述庆都督是城内的高级指挥官。

我打算明天迁回领事馆。林述庆都督写信给我说，他将于一点钟在码头上为我派一支警卫队。这是一个不必要的荣誉。

伟晋颂谨上 1911年12月2日于南京

第2件附件6 伟晋颂领事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继续谈我本月2日信中所说的事情，我荣幸地报告：津浦铁路总工程师塔克先生于今晨前来告诉我，现在占领浦口的革命军总指挥官已经通知他，由于革命军已控制津浦铁路的整个南段，所以该铁路不得用来运送清军，据说大批清军奉命自北方南下。该总指挥官又说：如果铁路用于此项目的，他除了破坏该路之外，别无其他选择，但与此同时，如果铁路能够照常营业，他将感到很高兴。

由于张勋提督所率溃退的军队与滁州、临淮关、蚌埠等地革命军之间发生战斗的结果，铁路沿线的电报联系已经中断。昨天早晨，张勋的部队约有二千五百人驻在滁州，但该提督本人于星期天夜间（本月3日）在他的部队之前乘火车离开滁州车站。由于革命军在临淮关与蚌埠之间驻有一支近三千人的部队，他是否能顺利地通过这些地方，这是很可怀疑的。然而，张勋提督的精锐

部队不下三千人实际占有浦口至蚌埠间至少一半的铁路，从而使人们对浦口总指挥官所说的革命军控制铁路全线一事产生了某些怀疑。我应当说明：张勋提督告诉一位曾在滁州与他见面的传教士，他之所以放弃南京，只是因为他奉北京政府之命要他这样做的，北京政府希望他与一支自北方南下的部队会师。现在还不知道总督和满族将军是否同张勋提督在一起。

革命军现已完成对南京的占领，虽然他们多杀了许多人，而且盲目地破坏了一些财产，但总的说来，革命军有理由对他们已经表现出来的克制感到自豪。有人给我谈了一些关于屠杀满族男人、妇女和儿童的情况，但经过调查，几乎所有这些情况证明是没有根据的，尽管发生过几起显然不愉快的事件。象已经发生的对财产的破坏，都在满族人居住区内。

目前的一切情况都是很安宁的；南京城正在迅速地恢复正常状态。局势中的唯一动乱因素，是徐绍桢统制与林述庆都督以及他们各自部队之间的对立。林述庆都督最先进入南京城，立即占用了总督衙门，自称都督，并且在徐绍桢统制未及入城之前将此事通知领事团，而徐绍桢统制在名义上是他的上级。因此，徐绍桢统制不得不使自己满足于占用谘议局的房屋。大家都知道，苏州的程德全巡抚将于一两天内到达此地，并将被任命为都督。那时，徐绍桢统制和林述庆都督将分别被任命为指挥官，其中一个为开往汉口部队的指挥官，另一个为北伐军指挥官。

除了林述庆都督之外，徐绍桢统制和湖北革命军政府驻地的一位代表苏先生^①，都通知我他们已到达此地，并很想保护外国人的利益。他们至今都还没有来见我，但林述庆都督拜会了各国泊驻南京军舰的舰长。

伟晋颂谨上 1911年12月5日于南京

① 原名待查。

第 2 件附件 7 朱尔典爵士致伟晋颂领事函

先生：

我必须说明已经收到您 11 月 23 日、27 日、29 日以及 12 月 1 日和 2 日的来信，这些来信报告了革命军终于占领南京的情况。我抱着很大的兴趣阅读了这些信件，并把它们的副本送给了外交大臣。我感谢您在把那个困难而又烦恼的局势通知英王陛下使馆时所采取的令人钦佩的态度，同时希望向您笼统地表示我热烈赞同您在信中所报告的那些做法，您在离开领事馆时所说的那些情况下采取的行动，以及您在坚守岗位时所表现的决心和勇气，直到您不再可能而且也不适宜继续留驻领事馆的时刻到来为止。

我将把这封信的副本寄给英王陛下的外交大臣。

朱尔典谨上，1911 年 12 月 12 日于北京

第 2 件附件 8 朱尔典爵士致伟晋颂领事函

先生：

我必须说明已经收到您本月 5 日的来信。

关于津浦铁路问题，由于局势很可能发生突然的变化，所以对您作明确的指示是不容易的。然而，您应当尽可能按照我们力图在沪宁铁路推行的原则办事。目的是要把该铁路作为一个商务企业来经营，不受任何一方的干涉，但是，您对其余的事情必须自行判断。只要目前的停战继续下去（即至 12 月 24 日为止），据我判断，北军未必会作任何调动，而南军也将在原地不动。在那以后，除非停战协定展期，究竟可能发生什么事情是没有保证的。如果塔克先生同我商量，我将劝告他屈服于不可抗拒的压力，作为最后的办法。如果任何一方的军队决定把该铁路用于军事上的

目的，我们便不能够希望维护该铁路的中立和商业性质。

我已经对英王陛下领事官员们发布了一般的指示，要他们在必要时尽可能把他们与起义军政府的关系，限于那些影响英国人生命财产安全的迫切问题上。我告诉汉口领事团说：如果他们认为所发生的情况迫使他们同起义军发生实际关系，外交团将不能不批准这一行动。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如果南京成为军政府总部所在地，我不知道领事团如何可能保持按照国际法的严格解释所必须采取的疏远态度，而不危害他们在解决那些必将发生涉及外国人利益的各种问题时应起的作用。

朱尔典谨上 1911年12月12日于北京

第3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1月1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随信附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译本，该大纲是黎元洪都督正式送交英国驻汉口代总领事的。

朱尔典谨上 1911年12月14日于北京

第3件的附件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

〔该大纲的原文，见《辛亥革命》（八），第5--8页。〕

上述组织大纲是黄帝纪元第四千六百零九年十月十三日（1911年12月3日）的会议上由代表们起草通过的。下列各省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安徽……………有三名代表出席
浙江……………有四名代表出席
福建……………有一名代表出席
湖南……………有两名代表出席

湖北……………有四名代表出席

江苏……………有四名代表出席

广西……………有一名代表出席

山东……………有两名代表出席

下列各省有代理人出席：

江西、广东、贵州

直隶和河南各派了一名代表，但由于这两省还没有宣布独立，所以他们的代表只许有发言权而没有表决权。

第 4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 年 1 月 1 日收到

阁下：

英国驻汉口代总领事给我转来了三份关于西安府事件的说明。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份包含在英国浸礼会肖乐克先生的信中，已经把它的主要内容电告您。它证实了贝克曼夫人、瓦特尼先生和六名儿童在起事的第一天夜间死于一群暴徒手中的消息；但它说：当局是友好的，城内已恢复秩序。肖乐克先生还提到外出旅行的危险；我可以补充说，北京的一位侨民于 12 月 8 日收到陕西东北部绥德州的一名传教士 11 月 8 日的一封信，那位写信人写道：“陕西的哥老会只是土匪的一个很大的结社，他们在此地与西安府之间拦路抢劫，因此试图外出旅行几乎肯定是要冒生命的危险。”

西安府的另外两封信于本月 8 日送给了我。其中一封是被拆开过的信，大概是罗马天主教士斯卡伦神父写给英国的一位亲戚的；另一封是一位美国传教士写给美国公使的。这两封信所注日期分别为 11 月 25 日和 26 日，它们对局势的看法较肖乐克先生早些时候的信中所说的要差得多。担心城内的动乱因素也许又占上

风，而且交通困难将增长焦虑情绪，这是颇有道理的。

鉴于这些顾虑，对陕西省内外国侨民感到关切的日、美、法、德、英等国使节于本月9日举行了一次会议，考虑究竟能够采取什么步骤，同我们那些孤立无援的本国同胞取得联系。结果是我与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商定于第二天会晤。在会晤中，我的同事们和我阐明了我们对外国人在西安府的处境感到忧虑，并且说，我们前来查明，为了同他们联系，究竟能够做些什么。总理大臣在答复中表示，清政府对于外国人在该处所受的虐待感到极为抱歉，而且提到最近发布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谕旨，它命令陕甘总督长庚和新任陕西巡抚^①率军前往该处平息骚乱。然而，他承认，目前清军不能够越过陕西边界潼关，同西安府的电报联系已完全被切断。接着讨论了为派去一批人发放护照的问题。袁世凯答应发电报给潼关的军事当局，查明是否可能同起义军商定护送这一批人自潼关前往西安府。

朱尔典谨上 1911年12月14日于北京

第5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1月1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随信附上一份同文备忘录（作了必要的改动）的副本，该备忘录是法、德两国公使和我本人根据三家银行的要求送交外务部的，把江宁藩库欠付本月11日到期的关于两江总督1910年12月11日签订的三百万上海银两借款本息一事通知他们，并且根据借款合同的担保条款，要求清政府准备立即付还。

该备忘录中提及的江宁藩库给那三家银行的通知，是汇丰银

^① 升允。

行于本月4日收到的。通知说，款项已用于军事目的；又说盐厘因革命而没有上缴。

朱尔典谨上 1911年12月15日于北京

第5件的附件 致外务部的同文备忘录

英王陛下公使荣幸地提及他于1910年11月10日收到的外务部的一件通知。他从该通知中获悉：朝廷已批准两江总督订立的向汇丰银行、德华银行和东方汇理银行举借一笔三百万两的贷款。

根据借款合同的条款，每隔半年，即每年的6月11日和12月11日，按年息七厘付给利息，而且自1911年12月11日开始，每年摊还本金五十万两；因此，本月11日应付给该三家银行的款额为六十万上海银两。

该合同第八款又规定：由总督代表清政府担保按期偿还这笔借款的本金和利息。

鉴于江宁藩库已通知汇丰银行上海分行，要求延期付息十二个月，所以朱尔典爵士荣幸地要求清政府按照上述担保条款，立即准备向汇丰银行偿付它那一份应得的款额。

1911年12月14日于北京

第6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2年1月1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今天下午，我拜访了袁世凯，他似乎有病，而且很沮丧。

他说：只有这样做才是适当的，即他必须向我坦白地承认，他现在已对局势失去了控制。他为实现和平解决竭尽一切努力，但都失败了。唐绍仪已经辞职；上海革命派在整个谈判中是绝不妥协的。

另一方面，各将领已吁请满族亲王和贵族们出钱继续打仗；北方各省和军队谴责他为实现和平所作的让步，并且不允许他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前进；看来即将重新开战。他不能继续保证北方的和平，此事现已成为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因此，他打算明天递上他的辞呈。

第 7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2年1月2日于北京，同日收到

汉口起义军都督向英王陛下总领事建议：应在九江对所有船只进行检查；英王陛下总领事说：如果同意此事，便应当不再对船只开火。

我答复说：英王陛下政府和其他各国不承认起义军享有交战团体的地位；据我看来，目前的时机很不适宜作这种承认；只有当他因反对检查船只而危及英国人生命或财产时，他才应允许检查。

第 8 件 宜昌英国侨民致格雷爵士电

1911年1月2日发自上海，同日收到

对此地不泊驻英国炮舰一事表示抗议。请求给予适当保护。
宜昌英国侨民谨上。

第 9 件 格雷爵士致朱尔典爵士电

1912年1月2日发自外交部

将自香港派遣援军前往广州。

陆军部将很高兴地知道，您是否认为目前驻华北可供应付其他地区紧急需要的五百名军队可以增至一千人，否则很可能必须增援香港。

第10件 格雷爵士致朱尔典爵士电

1912年1月2日发自外交部

宜昌的英国侨民对该地不泊驻英国炮舰一事提出抗议，并请求给予适当保护。

请您同舰队司令商议应采取什么步骤，如果将采取任何步骤的话。

第11件 布坎南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1月3日收到

阁下：

今天的《官方信使报》发表了外交部的一项公报，否认人们所说北京《官报》刊载的一份声明的真实性。该声明说：沙索诺夫先生^①已对中国驻此地公使宣称，派往蒙古的俄军无意占领该地区，而只不过是派去保护俄国在该地区的利益的。公报简要地说明：沙索诺夫先生没有同中国公使进行详细的谈话；俄国军队没有开入蒙古。

与此同时，彼得堡报刊对蒙古的前途表现出很感兴趣；顺便说一下，它对西藏的前途也是如此。

今天的《新时代》报把中国在蒙古的统治说成是暴政，它奴役蒙古人，并且使享有特权的中国公司能够垄断该地区的全部贸易。另一方面，俄国对蒙古的经济发展很感兴趣，欢迎蒙古王公们为解放他们的土地所作的努力。那位作者极力劝告俄国政府立即承认蒙古的自治。如果蒙古王公们顺利地建立自治，那时，他们将能够同俄国缔结商务条约。

① 俄国外交大臣。

该报纸还发表了一篇关于西藏的文章，为达赖喇嘛有希望早日返回西藏而欢呼。它说：从今以后，达赖喇嘛将成为西藏的实际统治者以及精神上的领袖。它把这一结果在很大的程度上归功于俄国的多尔吉耶夫，他曾不断地为他的主人而工作。

在讨论蒙古问题的时候，《证券交易所公报》比《新时代》报甚至说得更为直率。它力陈在俄国与中国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国对俄国的好处，该缓冲国虽然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但对中国保持独立并处于俄国的影响之下。文章说：“由于各种原因，蒙古总是对俄国抱有好感；俄国影响的增长，将是建立一个独立的蒙古所产生的自然结果。蒙古独立后，一定更紧密地靠拢俄国。它没有其他的道路可走。蒙古宣布独立是否诱使西藏效法它的榜样，或是促使日本采取行动，都不能够对实际情况有任何影响。蒙古将转向俄国；俄国不能够放弃由此强加给它的任务。”文章的结尾提出一项警告说：俄国一定不要积极干涉蒙古的内部事务，但为了保持它的远东政策的一致性，必须使自己满足于提供良好的建议。

布坎南谨上 1911年12月29日彼得堡

第12件 陆军部致外交部函

1912年1月3日收到

陆军部大臣谨向外交部副大臣致意，并奉陆军委员会之命，随信附上关于增援广州的英国步兵分遣队的某些文件的副本。

1912年1月2日于白厅

第12件附件1 陆军部致殖民部函

先生：

我奉陆军委员会之命通知您：已收到香港部队总指挥官的一份海底电报，他在该电中建议，派一百五十名印度土著步兵、两

门发射十五磅重炮弹的大炮及四挺速射机关枪，增援广州的英国步兵分遣队：海军部根据驻香港高级海军军官的请求，赞同此项建议。

因此，我要求，只要殖民大臣同意，便可以向驻香港的总督和总司令官发出指示，授权部队总指挥官派遣这些援军。

如果路戛德爵士赞同，将命令安得生将军会同海军当局，准备立即运送他们。

布雷德谨上 1912年1月2日于白厅

第12件附件 2 陆军大臣致驻香港的华南总指挥官电

1912年1月2日发

只要香港总督赞同，便会同海军派遣一百五十名印度上著步兵、两门发射十五磅重炮弹的大炮及四挺速射机关枪前往广州。

海军部已通知总司令官：驻汉口和广州的分遣队由他指挥；他负责在必要时对他们提供支援或将他们撤回。

第13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2年1月4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驻滦州的一千名部队已宣布赞成共和；驻唐河的二千四百名部队大概将仿效他们。鉴于清军有可能采取切断铁路的权宜办法，而且对情况的重大发展捉摸不定，所以驻天津各将领一致建议立即占领铁路线上的各重要据点，作为一项预防措施。

第14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2年1月4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我同总指挥官商量后认为，目前可以有把握抽调出来的部队不超过五百人。大约两星期后，当美国部队到达，肩负起他们分

担的防守铁路任务时，如果不继续发生麻烦，我们还可以再抽调三百名士兵，但局势看来更趋严重。

第15件 格雷爵士致朱尔典爵士电

1912年1月4日发自外交部

关于您1月2日的电报。

我同意您发给总领事的那些指示。关于对船只进行检查一事，他应尽可能地同他的同事们采取一致行动。

第16件 殖民部致外交部函

1912年1月5日收到

先生：

我奉殖民大臣之命，把发给香港总督关于自该地派兵前往广州问题的一份电报的副本转交给您。

安得生谨上 1912年1月4日于唐宁街

第16件的附件 哈考特先生致路夏德爵士电

1912年1月3日发自唐宁街

陆军部和海军部希望派遣一百五十名印度土著步兵、两门发射十五磅重炮弹的大炮及四挺速射机关枪增援驻广州的部队。总指挥官已经收到陆军部的指示，如果您相信剩下的部队足以在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下保证维护秩序，请您同他作出相应安排。

第17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2年1月5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宜昌来信说：所有外国人，包括各国领事在内，于12月13日

从水路离开成都；据说打算将所有外国人撤出重庆。

第 18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2 年 1 月 5 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伍廷芳向那些于 12 月 20 日递交同文照会的各国驻上海领事提出一项照会。他在该照会中认为，满清政府应对召回唐绍仪及否认他的活动一事可能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责任¹。

第 19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2 年 1 月 5 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关于我 1 月 4 日的电报。

今天向英、法、德、日、俄等国驻天津指挥官发出同文指示，要他们按照辛丑条约的条款，立即采取步骤保持北京至沿海之间的交通畅通无阻。在美国军队到达以前，英军将保护美国分担的那段铁路。

第 20 件 外交部致陆军部函

先生：

我奉外交大臣格雷爵士之命，随信附上昨天收到的朱尔典爵士关于中国军事形势问题的两份来电²的副本，请交陆军委员会。

您将从这两份电报中看出：他认为必需使用英军保护北京至沿海之间的铁路交通；除了现已做好准备的五百名部队之外，在其他地区发生紧急情况时，目前不能够从华北抽调更多的军队。

在这种情况下，而且鉴于朱尔典爵士所表示的局势似乎更趋

1. 原编者注：参阅第 63 件。

2. 原编者注：第 13 件和第 11 件。

严重的意见，我建议陆军委员会应考虑是否需要立即派兵增援香港的警卫部队。

兰利谨上 1912年1月5日于外交部

第21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1月6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扼要报告关于导致清方与中国革命派之间缔订目前停战协定的谈判经过。

我在11月26日同袁世凯会晤时，使他记住汉口英国人士因战事继续进行所面临的忧虑和危险。他答复时向我保证说：如果双方能够按照互相满意的条款商定一项停战协定，他将很高兴地下令停战。于是，在袁世凯的赞同下，我指示英国驻汉口代总领事将该意非正式地转告黎元洪都督。

葛福先生于11月27日答复时，寄来了黎元洪都督所建议的条款。袁世凯认为这些条款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他说：在他更好地了解黎元洪都督的权力范围以前，他不能够最后接受这些条款。袁世凯又说：自从攻陷汉阳以来，谣传黎元洪都督的地位已大为动摇。在这个时候，我乘机向总理大臣指出：清军进攻武昌将迫使他继续发生的流血事件承担责任。这个警告并不是没有作用的，因为袁世凯于12月1日电告冯国璋将军停止清军渡江进攻武昌。与此同时，他命令黄道台^①与葛福先生磋商初步安排停战三天。

接着，双方由葛福先生居间调停进行谈判。象我在本月3日电报中所报告的那样^②，双方商定了至12月6日上午八时期满的

① 原名待查。

② 原编者注：参阅《中国第一号（1912年）》第98件。

三天停战协定。由于这时袁世凯很想安排武昌的各省代表会议讨论那些条款，所以我指示英国代总领事为此目的进行斡旋。

袁世凯立即试图安排延长停战，于12月4日把他同唐绍仪和我本人磋商后起草的某些条款电告冯国璋将军。这些条款包括把目前的停战协定延长十五天，以及任命唐绍仪为总理大臣代表同黎元洪都督讨论局势等在内。

12月9日，英国驻汉口代总领事来电说，那天上午已签订了展期的停战协定。我荣幸地附上那些条款的副本^①。看来，武昌的黎元洪都督实际上采纳了袁世凯所建议的条款。

关于选择什么地方作为和谈会议地点的问题，引起了不少困难。唐绍仪于本月9日乘专车离开北京，11日抵达汉口。他到达后发现，革命派坚持以上海作为会议地点。袁世凯一直愿意选择汉口，但在唐绍仪的劝告下做了让步。因此，唐绍仪乘英国“洞庭”号轮船前往上海。他订于今天到达，预料和谈将于明日开始。

主管革命派外交事务的伍廷芳，已被任命为他们的和谈代表；他坚持会议在上海举行。

自从缔订目前为期十五天的停战协定以来，每一方都指责对方破坏了协定的条款，特别是关于调动军队的条款。例如，革命派已从广州派三千名部队乘船前往上海。袁世凯还抱怨说，据他从上海收到的电报，有五千名部队乘招商局的轮船自南京调往汉口。此外，还有起义军自浦口北上，并在临淮关架设了大炮。另一方面，清军被指控占领了河南太和县^②；他们驳斥了这个指控，声称：该地区发生土匪闹事，所以他们不得不派遣武装部队前往

① 本件所附的停战条款为三条，中文原件则列为四条，但内容完全相同。见《辛亥革命》（八），第98—99页。

② 河南省无太和县，疑为太康县之误。

镇压。此外，清军还被指控在签订停战协定后向山西起义军进攻。所发生的情况是：起义军首先采取行动，接着被清军驱逐回去，清军占领了起义军在山西边境上的据点娘子关。然而，自发生这些事件以来，总理大臣已严令各将领停战。上面所说的破坏停战行为，十分恰当地说明了关于停战协定所产生的困难。

事实上，伍廷芳和唐绍仪之间的议和谈判订于明天开始。我已指示英王陛下总领事尽可能同唐绍仪保持密切接触。我还向法磊斯先生指出：我们急于希望同其他国家合作促成一项迅速解决的办法；他应尽最大努力协助双方达成协议。

朱尔典谨上 1911年12月17日于北京

第22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1月6日收到

阁下：

关于我11月15日的信^①，我荣幸地就以前由上海道台正式保管的保证金移交首席领事的问题，提出下面的报告。那些保证金的绝大部分是被指定供偿还外债之用的。

11月8日，英王陛下总领事来电通知我说：道台知道，最近在革命军政府下面担任浙江和江苏两省民政总长职务的李平书^②，不久将提出移交这些保证金以及其他官方财产的要求，所以征询他关于此事的意见。法磊斯先生建议说：应把该保证金已被抵押的意义通知李平书；在新政府获得各国的承认之前，不能够把保证金移交新政府；道台可以把各种物品存入汇丰银行听候首席领事的命令，给予李平书一张物品清单。我赞同法磊斯先生的答复，并且说：在清政府重新坚持它的权力或新政府获得列强的承认之

① 原编者注：参阅《中国第一号（1912年）》，第99件。

② 李平书当时任上海革命军政府民政总长，此处原文有误。

前，不能够接受移交公共租界内的居民或财产的任何要求。

11月10日，革命军都督送给道台一份对保证金的书面要求，如不照办即按军法处理，但英王陛下总领事采取步骤，把他的态度间接地通知伍廷芳。他于13日从伍廷芳处得到一项口头保证说：革命派将满足于得到保证金清单的通知，但为自己保留同保管人讨论他们认为有权要求其中任何一项的权利。

11月20日，我电告英王陛下总领事说：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首席领事完全有理由掌管这些保证金；如果领事团允许那些打算用来偿付外债的现款落入革命军手中，他们将承担重大责任。我又说：清政府已被阻止使用任何一部分海关岁入，因为该岁入已抵押给各国的债券持有人；革命军也同样不得干涉所有被指定用来偿付外债的现款。

后来，上海首席领事把送交革命军的一份保证金清单通知我，检查和翻译这份清单需要付出很大的劳力。它的主要内容系那些以附属担保品作抵押垫付给钱庄的款项，目前该附属担保品是难以变为现银的。法磊斯先生感到很怀疑，那些钱庄即使能够付还垫款，是否将不受那些掌握实际权力的统治者的恐吓，拒绝付款。

朱尔典谨上 1911年12月17日于北京

第23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1月6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附上英王陛下公使馆陆军武官今天送给我的一份报告的副本，供您参考，并请转交陆军部。

韦乐沛中校的报告说明了各国在直隶省的兵力，以及在必要时为保护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所作的安排。

他还提供了一些关于保护汉口各国租界的有趣情况，我以前

没有注意到这些情况的细节。

朱尔典谨上 1911年12月19日于北京

第23件的附件 韦乐沛中校关于各国驻直隶省部队的人数和分布、使馆卫队、为保护北京至沿海铁路交通所作安排等情况的报告，以及对保护汉口一事所作的一些一般说明

下面的附表说明：

- (一) 各国驻直隶分遣部队的人数和分布；
- (二) 驻北京的使馆卫队；
- (三) 为保卫京奉铁路北京至山海关段所作的安排。

关于第一表，您将注意到，现在驻直隶的所有各国官兵总数达到七千零二十一人的可观数字，其中大部分驻在天津。我认为，无可怀疑的是，他们驻在天津起了稳定形势的作用，并且直到目前为止，很可能防止了天津发生内战。

革命运动的爆发与英国驻华北警卫部队的换防恰好偶然发生在同一时间，从而有机会向该处另外增派一营部队；目前英国驻直隶的军队共有官兵二千八百四十人，大大超过其他任何国家部队的人数。

这些各国分遣部队共有四十五门野战炮和六十门机关炮，其中英法两国驻天津的分遣部队各有两门和十门野战炮，英、奥、德、日、俄等国驻津分遣部队各有两门、七门、四门、八门和两门机关炮。驻北京使馆卫队所有大炮的详细情况，在第二表中作了说明。

上述各分遣部队从俄、日、德三国分别驻北满、南满和青岛的部队中，能够最容易获得增援。例如，日本能够在二十四小时内自旅顺口派兵至秦皇岛登陆。

援军的第二个来源是西伯利亚、菲律宾、香港和印度。（我可以这样说：1900年，对“义和团”的首批远征部队于6月25日离开加尔各答，7月17日抵达大沽；总部人员于7月3日离开加尔各答，7月25日抵达大沽。）

关于第三表。11月初，当驻在滦州（在天津至山海关的铁路线上）附近的清军第二十镇拒绝乘火车前往湖北，明白表示不愿对革命军采取行动的时候，该铁路的安全问题便成为一个很急迫的问题（因为任何一方都可以切断铁路以阻止另一方的活动）。在驻京公使们的建议下，各国驻天津分遣部队指挥官为保护北京至天津之间的铁路，起草了一份计划，见第三表第一部分，但他们得到明确的指示，在他们发现“任何公然切断铁路的企图”之前，不得将该计划付诸实施。

由于冬季来临和白河封冻停航的前景，所以必需把保护铁路的计划伸延到秦皇岛这个冬季的港口（几乎是不冻港），事实上，再继续伸延几英里至山海关长城地方。第三表第二部分说明了这个进一步伸延后的计划的细节。

在这份报告中，对汉口的防务安排作一些说明也许不是不恰当的。

10月底，当汉口及其附近地方成为军事行动的场所时，保护这个重要贸易中心的各国租界中立的工作转移到各国海军部队身上，而由当地的志愿兵和巡捕予以协助。

10月12日，经各国一致同意，联合防务安排置于高级海军军官川岛海军少将的指挥之下，到10月17日海军中将温思乐爵士抵达前，情况始终如此。

海军登陆部队的人数随着泊驻本口岸军舰的多少和大小而变化。当我于10月底到达汉口的时候，可以用来保卫各国租界的人数，有从海军各分遣舰队派来的八百九十人以及志愿兵二百六十

人。实际值勤的有各舰只派来的二百五十人以及志愿兵一百二十人。各租界安排它自己的防务，但当临时发生紧急情况需要支援的时候，彼此互相提供援助。例如：危险的地点最初是在北端，即日本和德国租界处，当时战事在十公里处车站和赛马场附近进行，日本设在他本国租界北部出口处各工事的哨所得到了其他国家的增援，以堵塞起义军的大批逃兵和追赶他们的清军进入租界。可是，在清军占领大智门火车站和歆生路之后，英国租界由于靠近汉口城，成为各国租界中最危险的地方；几天后，该处得到了其他国家水兵和志愿兵的合作。

各国租界朝着陆地的那一面，在出口处建立了一些工事（它们在性质上和力量上都有很大的不同，最有效的几处工事是用芝麻子袋筑成的）；各工事都布置了海军分遣部队或志愿兵。他们安排了志愿兵昼夜巡逻队和骑摩托车传达命令的机构，并在合适的高地设置了信号站。英租界的防御总部设在汉口俱乐部，它处于一个很好的中心位置，靠近工部局，警钟就是在那里敲响的。时常进行“警报”演习，并采取了各种详尽的改进措施。

英国志愿兵干得很好，许多星期以来他们在各个工事愉快地执行令人疲倦的昼夜值勤任务，并巡逻街道。

鉴于起义军炮台发射的许多炮弹落入英国租界内的街道和房屋，而且时常有流弹在附近飞过，以致有相当多的中国人在租界内伤亡（我亲眼见到好几个），外国人相对地免于伤亡，这确实是引人注目的。就我所知，在租界内值勤时，只有一名英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和一名德国水兵负伤；被子弹击中的外国人似乎总共不超过四、五人，其中只有一人死亡（日本人）。

关于英租界工部局的巡捕，当外籍雇员有权选择随趸船一起离去的时候，华籍巡捕已统统离开汉口。萨镇冰提督宣布他打算炮轰武昌之际，那些趸船驶往下游的阳罗地方。只有印度籍巡捕

三十五名锡克教教徒)留在租界内,始终继续值勤;法国租界内的外籍(越南籍)巡捕三十人也是如此。几天后,当那些趸船又开回来的时候,大部分华籍巡捕均已返回。

到11月中旬,汉口的各国人士(英国人和法国人)强烈要求派一支武装卫队前往该口岸。英国海军总司令官也极力建议需要派一支陆军去替换他的海军分遣部队,因为该分遣部队已有许多星期在岸上值勤。

因此,12月5日,从香港警卫部队中派出一支由一百六十名官兵组成的小分遣队,携带两门大炮前往汉口。一连俄国分遣部队,大约有四名军官和二百七十名士兵,携带两门机关炮,也已从西伯利亚第六步兵团派往汉口。

自10月以来,意大利人已有一支由一名军官和三十名水兵组成的领事馆卫队(系从意大利驻北京使馆卫队中抽调的)驻在汉口;德国人最近已派去一支小的租界卫队,有五十人。

陆军武官韦乐沛 1911年12月15日于北京

第一表 各国驻直隶部队的人数和分布

(至1911年12月14日止查核无误)

国 籍	北 京	天 津	塘 沽	唐 山	秦 皇 岛	山 海 关	总 人 数
法 国							
军 官	11						11
普通士兵	310						310
意 大 利							
军 官	4	1					5
普通士兵	82	36	2				120
日 本							
军 官	1						1
普通士兵	20						20
英 国							
军 官(英国人)	10	74		3	1		88

续表

国籍	北京	天津	塘沽	唐山	秦皇岛	山海关	总人数
军官(印度人)		12		2	1	1	16
普通士兵(英国人)	320	1,568					1,888
普通士兵(印度人)	2	878		111	33	24	848
法国							
军官	6	34			1	2	43
普通士兵	295	865	28		28	56	1,272
德国							
军官	6	7					13
普通士兵	115	226*	2				343
意大利							
军官	7						7
普通士兵	171	10	3			4	187
日本							
军官	12	50				1	63
普通士兵	280	806	5		14	48	1,153
荷兰							
军官	3						3
普通士兵	42						45
俄国							
军官	0	4					10
普通士兵	393	182					575
合计	2,098	4,553	40	116	78	136	7,021

陆军武官 韦乐沛

* 其中有两人被派往北戴河。

第二表 驻北京使馆卫队

国 籍	军官	普通士兵	野 战 炮	机 关 炮
美 国 (海军陆战队)	11	310	2 门 3 英吋口径海军炮	2 门 2.3 英吋口径格林炮 6 门 6.3 英吋口径柯尔特炮
奥 匈 (海军)	4	82	4 门 7 厘米口径速射炮	6 门 8 毫米口径机关炮
比 利 时	1	20		
英 国	10	322	2 门 5 英吋口径榴弹炮	6 门 6.303 英吋口径速射机关炮
法 国	6	295	2 门 80 毫米口径过山炮 2 门 37 毫米口径速射炮	
德 国	6	115	3 门 15 厘米口径榴弹炮 3 门 7.7 厘米口径野战炮	10 门
意大利 (海军)	7	170	3 门 37 毫米口径速射炮	5 门 昆勒—蒙梯尼式炮
日 本	12	280	4 门 75 毫米口径野战炮 4 门 57 毫米口径野战炮	
荷 兰	3	45		
俄 国	6	393	2 门 12 厘米口径榴弹炮	2 门速射机关炮
合 计	66	2,032	33 门	37 门

陆军武官 韦乐沛

第三表 保护京奉铁路北京至山海关段的安排

(一)

北京至天津段(白河封冻前)

(11月7日的计划)

英国部队守卫自北京至万庄以南六公里处的铁路(共七十一公里),派兵驻守丰台(二百人)、黄村(三十人)、安定(三十人)、万庄(三十人),并派一支约一百二十人的分遣部队前往唐山。

日本部队守卫自廊坊以北五公里处至张庄以南五公里处的铁

路(共三十五公里)。派兵驻守廊坊、落堡和张庄。

法国部队守卫自杨村以北六公里处至天津(东面),共三十五公里。派兵驻守杨村和塘沽。

每个国家安排对它所守卫的那段铁路进行适当的巡逻,并保护桥梁。

(二)

北京至山海关段(白河封冻后)

(11月25日的计划)

自北京至山海关的铁路(共二百六十二英里)分为几段,由英、法、德、美、日等国部队保护。俄国不能够参加这项计划,因为在制定这项计划时它缺乏部队。

每个国家应作出它自己的安排,以保护分派给它的那段铁路,即:

英国:自北京至杨村铁路桥(西端),共六十八英里半。

法国:自杨村铁路桥至北塘车站以北四英里的青龙王河铁路桥(北端),共五十七英里半。

德国:自青龙王河铁路桥至唐山车站(西面远距离信号处),共四十一英里半。

美国:自唐山车站至滦州车站(西面远距离信号处),共三十三英里半。

日本:自滦州车站至山海关车站东面的长城,共六十一英里。全长共二百六十二英里。

陆军武官 韦乐沛

第24件 殖民部致外交部函

1912年1月6日收到

先生:

关于本部 1911 年 12 月 20 日的信^①，我奉本部大臣之命，送上驻威海卫专员关于中国革命运动问题来信的副本。

安得生谨上 1912 年 1 月 5 日于唐宁街

第 24 件附件 1 专员骆任廷爵士致哈考特先生函

先生：

一、关于我本月 20 日的信，我荣幸地随信附上我所收到的孙宝琦阁下第二封来信的译文。

二、您将从该信中看到：孙宝琦阁下自称为“中华民国山东省保安会大都督”，并且说，他被该省人民一致公举担任该职，因为“北京政府的命令不可能在遥远地区具有任何效力。”

三、鉴于您在本月 20 日来电中所作的指示^②，我不写信表示收到该信。

骆任廷谨上 1911 年 11 月 24 日于威海卫

第 24 件附件 3 专员骆任廷爵士致哈考特先生函

先生：

一、关于我上月 24 日的信，我荣幸地随信附上我所收到的山东巡抚孙宝琦阁下第三封来信的副本。该信通知我说：“山东省临时政府及其宣布独立之事均已取消。”

二、尽管巡抚来信中谈到了这个消息，烟台革命当局仍然继续存在。一两天前，该当局首领非正式地通知英国驻该口岸代领事说：烟台革命派无意放弃目前的革命政体，直到它被迫放弃时为止。

三、就我所知，威海卫城知县也继续服从烟台革命军政府的

① 原编者注：参阅《中国第一号(1912年)》，第 134 件。

② 原编者注：《中国第一号(1912年)》，第 68 件。

命令。

四、本地方仍然是很安宁的；虽然各种谣言盛行，但目前似乎没有理由预料本地方将发生任何动乱。

骆任廷谨上 1911年12月7日于威海卫

第25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2年1月6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关于我1月5日的电报。

后来的报告说：各国领事仍然留在成都。

目前预料重庆不会发生动乱。

第26件 代领事史密斯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1月8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把我写给英王陛下驻北京公使的一封信及其附件的副本送呈。

史密斯谨上 1911年11月20日于腾越

第26件附件1 代领事史密斯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我荣幸地奉上关于本地区革命军起事的最近情况的一份报告。

史密斯谨上 1911年11月20日于腾越

第26件附件2 关于腾越革命军起事的报告

自从腾越设立永久性的领事馆以来，领事的惯例是，如果他沒有受到本职工作繁忙的影响，便对缅甸进行一年一次的以及其

他临时的访问，以便同该国政府保持私人接触，因为它的边界利益是他关心的主要事情。当我今年4月前来任职的时候，我直接穿过缅甸，而没有绕道去访问当时缅甸政府的所在地眉苗，在我更好地了解属于这个边境职位的专门工作之前，宁可推迟我的第一次访问，等待以后一有适当机会访问缅甸时弥补这件被省略的事情。

事务的繁忙使我不可能按照原来的打算尽早离开腾越，直到10月中旬我才有空闲的时间。于是，在我离开腾越期间，发生了我所要叙述的那些事情。象我曾经电告您的那样，我打算16日离开腾越，但由于下雨的耽误，直到18日才真正动身。我要走的路线是经西马至密芝那，然后再往眉苗，归途经八莫返回腾越。可是，10月20日至23日下了大雨，使去西马的道路难以通行，我不得不经八莫前往密芝那，多走了两天。因此，我尽量缩短在密芝那停留的时间，于10月31日抵达眉苗。

我是在正常的平静情况下离开腾越的，看不见一点动乱的预兆。的确，人们知道有一个名叫德华社^①的结社，它在名义上是“秘密”的，从而是非法的，但是，它在名义上的秘密状态并不妨碍地方当局了解它的组织和意图。在我离开的前几天，腾越厅当局向我保证说，他掌握了有关该社的全部情况。该社的主要目的似乎是向它的成员募集现款，供它的首领们庆贺节日之用；地方当局虽然知道它同情革命，但不认为此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这是地平线上的一块乌云，它也不会大于一个人的手掌。在所有其他方面，这时的社会秩序比我到达以来的任何时刻都更为安宁。耿道台^②离开腾越，不仅对我个人而且对所有具有声望的

① 译音。

② 腾越海关道耿葆奎。

人们来说，都是一种宽慰。

我通过报纸以及腾越清朝当局所得到的情报，获悉四川起义的一般过程，但当我前往缅甸的时候，起义仍然只限于四川。虽然我到达八莫后获悉起义扩展到武昌，但没有理由猜测它已蔓延到云南，特别是由于它似乎沿着长江发展，就更加令人不如此设想。

因此，我在眉苗下火车时得到腾越落入起义军手中的消息，是完全出乎意外的。这个消息是从发给缅甸政府的两份电报中得知的。其中一份系海关税务司在革命军首领张文光的要求下自腾越发出，说明腾越已在革命军手中，他们答应对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和贸易给予保护，当时预料不会继续发生动乱；另一份电报系英王陛下驻云南府总领事发出，仅说明该事供我参考，如果我仍在缅甸的话。

次日，我发给您一份电报，将该事通知您，并声明我将立即返回腾越。我还把我立即赶回腾越一事电告额必廉先生，但发给腾越海关税务司蒙厄尔先生的一份电报，由于线路中断而未能拍发。

我于11月2日晨离开眉苗，11月4日抵达八莫。我在八莫停留到第二天，从该地中国侨民那里搜集关于腾越局势的情报。谣言繁多，不是令人十分放心的。据说：道台、镇台和新军管带均已被杀^①，同知逃走后又被俘获^②，七名外国人中有三名向八莫逃跑，走了一天的路程后又返回来；同知衙门已被焚烧，所有的衙门都遭到抢劫；到处是一片惊慌，大批难民逃往缅甸；干崖土

① 护西道宋联奎、总兵(镇台)张嘉钰、管带张桐三人中，仅张桐被杀，张嘉钰系存余自毙，宋联奎被俘后获得释放。见《辛亥革命》(六)，第233页。

② 腾越厅同知系温良彝，后来被释放。

司带着大量枪枝加入革命军，而南田土司则不是那么坚定地欢迎他们。最使人感到安慰的传闻是起义后的第二天，发现有一个人抢劫，立即予以处决。没有理由认为外国人是不安全的，豪厄尔先生电报中所说的他们受到保护一事，已被路透社电报中对其他地区革命派的态度所作的报道证实了。然而，关于革命派内部不和的谣言令人忧虑，这种不和可能导致继续发生动乱。

我于11月5日从八莫动身，同行的有一位订约在这个季节向密芝那地区供应骡子的代理人。次日早晨，在开始第二段旅程之前，我被八莫的一名信差追上了，他告诉我：道台确已于前一天夜间到达，几乎没有随从人员，而且处于过度恐怖的状态。虽然我很想聆听道台对情况的叙述，但我不认为返回八莫是可取的，特别是由于有人说他因受惊而语无伦次，就更不想回去。因此，我满足于写一封草率的短信给代理专员，请求他在其权力范围内做点事情协助道台，并且表示愿意尽我的力量帮助他的家属，如果他们仍在腾越的话，因为有人说他离开时没有携带家属，尽管我后来了解他们已分别逃走。

在走完了很长的行程于6日到达古浪卡的时候，我获悉从腾越出发的三名外国人正在途中：不久之后，建筑工程部的格罗夫斯先生（他是为修建领事馆而到腾越作初步调查和安排的）、腾越海关的外勤人员克雷格先生和夫人（她是在腾越的唯一外国妇女）到达了班戛罗。我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关于所发生事件的第一个有连续性的说明。他们说：目前腾越的情况很平静，但不认为克雷格夫人留在该处是可取的。格罗夫斯先生建议他和我一起返回腾越；我认为如果他能够实现他来腾越的目的，因为看来这是很可能的，在我国领事馆主持下继续进行工作一事将有助于促进安宁和增强公众的信心，所以我同意他和我一起返回腾越。可是，在下一段行程中，我收到豪厄尔先生的一封短信，告诉我说：留在

腾越的外国侨民都已离开，并到达了曼县^①，该地是边界上中国境内的最后一站。因此，第二天，即11月8日，我前往会见豪厄尔先生，并和他一起返回我前一天夜间所住的地方。

豪厄尔先生报告说：腾越处于无政府状态，现银短缺，各种社会渣滓正根据似乎无法实现的许诺应募当兵，因为革命军首领们显然不能够支付每月八两的饷银，于是抢劫开始了。我所说过因抢劫而被处决的那个人，是受到这种待遇的唯一的人，而且很可能是因为他所抢劫的银行被革命军首领们自己认为藏有金银。

对情况的这个说明所引起的问题是，我继续前往腾越是否还有任何目的。只要还有外国侨民住在腾越，我的行动方向是没有疑问的，但现在他们都已离去，而且似乎有理由预料领事馆和其他外国人的房屋都已遭到抢劫，我返回腾越是否还有用处，甚至是否安全，这就不是很有把握了。最后，我决定不管怎样向前走到曼县为止，尽量搜集进一步的消息。在曼县，我还能够同保山营前任统领莫管带^②商定，在必要时把可靠消息给我送至八莫以及与腾越联系的方式。豪厄尔先生慨然同意在他下一站经过屯洪^③时，从电报局发电给腾越革命军首领（如果线路已经修复），通知他们说，我要他们对大理府的传教士和腾越所有外国人财产的安全承担责任。我还把格罗夫斯先生送回去，因为做任何事情的希望都已减少到微不足道的程度。

我于11月9日抵达曼县，在途中曾遇见好几个我所认识的中国人，他们正在缅甸避难。从他们对我所作的叙述以及莫管带在曼县对我的谈话中，我得出结论：腾越的情况也许不象我所设想

① 译音。

② 原名待查。

③ 译音。

的那样坏。如果前往腾越是安全的，我有好几个理由要这样做。我十分急于获得关于大理府传教士的消息；由于通往云南府的电报线路均已中断，我只能够希望从腾越得到情报。如果我在腾越，外国人财产的安全所得到的照料，大概比我在其他地方要更仔细得多；即使当我到达后发现留在该处不很安全，我也许至少能够保护领事馆的档案。由于这些考虑，我决定继续前往腾越。

曼县没有一点动乱的迹象：莫管带向我保证说：沿途很安全，喀钦族人很平静，腾越没有乱事。在曼县可以察觉出来的关于最近事件的唯一迹象，是干崖上司发布的一项告示，他所用的头衔系滇军都督。该告示用中文以及译成所谓的英文张贴出来，通知所有的人们说：革命军政府已占领云南的主要城市，将推翻满清政府；本省的秩序已完全恢复，人民现处于安宁的状态；外国人将受到最善意的保护。

我电告缅甸说：我正继续前进，来到腾越；外国人的财产必须得到保护。

我于11月11日到达丘镇^①，那里正在迅速地招兵。该地几乎每一个人都用大刀武装起来，但没有不友好的表现。镇上张贴着一张很长的告示，宣布革命军的一般宗旨。我没有时间把该告示抄写下来，但它大致上是说：中国遭受满族人的压迫已有二百六十年，被他们置于灾难和耻辱的地位，现在革命党已经起来反对他们，并组成军政府，以便最终建立在总统和民选议会领导下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国家。没有贵贱和贫富的区别。核定地价（我以为这是作为征税的基础；他们几乎不期望能够确定地价供市场买卖之用）；鸦片、缠足和看风水一概被认为是满族压迫所带来的，应在两年内统统予以废除；六年后，一部完全共和的宪法将付诸实施。

① 译音。

我把自浙岛^①至腾越的最后那段很长的路程分为两段，在离腾越约十英里的一个村庄停留，因为我不认为在黑夜中赶路是可取的。因此，直到11月14日上午，我才抵达腾越。我发现我的房屋在门窗上都封上了纸条。对海关税务司和他的助手乔利的房屋也都采取了同样的预防措施。纸条上都载有11月7日这个日期，是我的电报自屯洪发出的前一天。我自己的房屋、海关外勤人员宿舍和教会房屋都发生过几起小的盗窃事件。

从我所询问的外国侨民和许多中国人的叙述中连串起来的腾越革命事件如下：

10月27日晚八时半左右，巡防队发生兵变，杀死了他们的管带。关于兵变的起源，我仅知道人们认为是干崖土司煽动的，他在日本居住期间便已吸收了革命派的思想感情，此后无疑地同革命派首领们一直保持接触。过去，汉人指控他通过缅甸把武器偷偷运入他所管辖的地方；从我看到的此地军队所有的一些步枪来判断，不论怎样就其木质部分而言，它们大概是本地制造的，而金属部分则很可能是分为若干零件进口的。

新军立即仿效旧军的榜样，但有一点不很重要的差异，即他们首先请求他们的管带领导他们，只有当他拒绝并劝告他们保持安宁的时候，他们才把他杀死。

起义军立即对道台和同知的衙门采取行动，据我了解，这主要是巡防队干的。然而，这些官吏曾及时地得到警告，并且都已逃走。同知后来被捕获，但由于新军中的广东人对这位同乡^②抱有同情，所以又把他释放了。的确，似乎有理由认为，他们无意

① 译音。

② 同知温良萍系广东鹤山人。

杀死民政官员，然而也许同样有理由认为，在起事最初几小时的情绪激昂期间，民政官员没有被他们寻获。

总兵不是这么幸运的。我在八莫以及在途中获悉，他已服毒，但自从我到达腾越以来，我从最可靠方面听说，他是被部队枪毙的。

各衙门遭到士兵的抢劫，损失了几万两银子，这个损失给革命军首领们带来了很大的不便。该厅监狱中的囚犯已被释放，监狱本身被火焚烧。

次日上午，一切又平静下来。从凌晨二时开始，枪声已经缓和，在九时左右便完全停止。留在腾越的外国人，即海关外勤人员，能够安全地步行穿过该城；为他们的安全而发布的告示已经张贴出来。他们甚至被邀请参加 28 日上午举行的已故新军管带的葬礼。

外国侨民通常为七人，这是当时的实际人数，在我离开腾越期间由于格罗夫斯先生的到达而填补了。由豪厄尔先生和乔利先生组成的海关办公人员住在东门外靠近领事馆的两座房屋内；医务官员住在领事馆向南去不远的街道上一座房屋内。外勤人员住在海关建筑物里，那是由南门向南去一条长街末端的一个大院。它的成员有尼斯柏特先生和克雷格先生，后者已结婚。剩下的另一位侨民是中国内地会的成员弗雷泽先生，他住的院子位于南门外大街向西岔开的一条街道上。由于外国人士这么少，而彼此之间又相隔这么远，所以在发生排外事件时他们不可能互相援助，幸亏目前的暴乱不是排外的。

然而，它是使人十分惊慌的。

格罗夫斯先生于 10 月 27 日晚上抵达腾越，在我回来以前，他同豪厄尔先生住在一起。他对中国发生的乱事具有很不寻常的广泛经验。义和团起事时，他在重庆；长沙闹事时，他在长沙。

他抵达腾越后几乎不超过一个小时，他和豪厄尔先生刚吃完晚饭，乔利先生带来消息说：士兵们杀死了他们的管带，并公开起事。豪厄尔先生最初是不相信的，但经过调查证实了这个报告：他匆忙写了一个便条给外勤人员，要他们准备在必要时立即撤离，因为他担心城内可能发生严重动乱。

一阵阵步枪射击声似乎愈益逼近，其中交错着喧嚣声和尖叫声，使人毫不怀疑正在发生严重的乱事。他们那伙人决定立即前往通向八莫的那条路。可是，写给海关外勤人员的另一个便条没有送到目的地；豪厄尔、乔利、格罗夫斯等先生在几名中国仆人的陪同下，走出豪厄尔先生住宅的后门，前往城南的空阔高地，直到他们抵达八莫路与海关相距最近的那个地方。他们从那里派了一名信差去海关召集外勤人员，但信差未能抵达该处。他们呆了一个多小时等候信差回来，直到最后他们以为，熊熊火光表明海关房屋已经着火，那些房屋象腾越所有其他房屋一样，都是用木板盖成的。事实上，着火的是监狱而不是海关房屋，但由于方向几乎相同，所以很容易发生错误。

继续试图派人前往海关似乎是无用的。他们那伙人只能够希望，海关外勤人员已由另一条路逃往南田。他们自己沿着他们所走的那条路继续前进，在野外走了一夜之后，于第二天抵达吉水潭^①，这是前往南田途中超过了一半路程的一个村庄。

这时，海关外勤人员仍然留在海关宿舍内。十时半左右，即起火后一个小时，他们收到了豪厄尔先生的便条，并写了一封回信(该信从未送到)说，一切都已准备妥当。他们的处境是令人惊恐的，因为起事在距海关不过一百多码的一座庙宇内爆发。他们大约在凌晨三时半获悉，税务司已同乔利和格罗夫斯两先生一起

^① 译音。

离去，但是，枪声在前两小时内已经缓和，起义军占领了城内，几小时后便将天亮，所以他们决定等待事情的结局。

时起时落的枪声一直持续到上午九时为止。八时半，海关文书带来革命军首领给税务司的一封信，保证他的安全，并邀请他回来。该信由骑马的听差递送，在吉水潭追上了他。

28日上午，一切平静。海关的一名外勤人员步行穿过该城，看到张贴出来的告示，保证对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给予保护。

晚上，布置了一支有十六名士兵的卫队，保证对海关房屋的保护，并且驻守到次日早晨七时为止，夜间没有发生骚乱。豪厄尔先生及其一行于该日（10月29日）午后不久抵达腾越。

虽然他们已经推翻了清朝地方当局，而且没有继续发生乱事，可是，象人们可能想象的那样，公众的信心受到了严重的震动。现银短缺，革命军打算通过发行纸币进行补救。小偷很普遍。革命军首领张文光似乎完全无能为力。居民中最坏的份子应募入伍；由于信用贷款已经停止，似乎不可能对这些人发饷，因此很有可能证明他们是危险的。在驻守腾越的五百名陆军中，大部分人已去帮助对永昌府施加压力，因为该处有受过训练的武装匪徒反对革命军。同外界的联系已被切断；总的说来，情况似乎有可能愈益恶化。至少是克雷格夫人的撤离，被认为是可取的，所以她于11月2日获得革命军当局的通行证之后，动身前往八莫，由她的丈夫和格罗夫斯先生护送。格罗夫斯先生因为不能够实现他访问腾越的目的，所以没有理由继续留下去。其他外国侨民多住了三天，希望局势得到改善，但由于没有明显的好转，他们便于11月4日跟着撤离。

他们在离开腾越途中，遇见干崖土司前来腾越。他跟他的同事张文光不同，具有一些行政管理经验。我猜想，也许部分是由于他的到达，才使得豪厄尔先生对我所说的情况，不同于他离

开后十天我到达腾越时所发现的情况。除了常常看见士兵操练之外，目前的情况与我动身前往缅甸时所得到的情况，差别是很小的。物价当然上涨了很多，但本地的生意在很大程度上仍照常进行；我发现我从钱庄中取款并不比以前更困难。

掌权的主要人物有张文光、干崖土司刁安仁和一位名叫李汉兴^①的军官。边界委员赵氏^②也被说服担任同知的职务；我毫不怀疑，主要是由于他的缘故，才这么顺利地恢复了普遍的安宁。这些官员，特别是张文光、刁安仁两先生，尽力使我记住他们对于一切有关外国人的事务抱着善良的意图，而且他们诚挚地希望同缅甸政府保持友好关系。

我可以很简要地说明我所辖地区内起义的进展。整个地区现已在革命党人手中。永昌府于11月初接受他们的管辖（我未能获悉确切日期）；不久之后，大理府也接受了。同这些地方的电报联系迄今尚未恢复，但我得到通知说，修复工作正在进行。大理府附近的农村地区和龙陵一带仍然存在着某种混乱。

关于迤北地区，没有得到任何消息，但对大理的占领决定了整个迤西道的命运，不需要采取任何规模的军事行动。我没有获得关于云南府的情报。

关于目前云南省这个地区军队的布署情况，是不容易查明的。以前驻守腾越的五百名新军中，只有五十人左右还留在腾越，这些人被用来训练新兵。我以为，巡防队的人数大约为一千八百人，包括新兵在内，有三百人最近被派往龙陵，镇压该地发生的骚乱。永昌无疑驻有一支警卫部队；大理府大概有很多军队，除非是需要他们在迤东地区采取军事行动。起义前大约有一千名陆军驻在大理府。目前，有些官员沉默寡言，另一些官员漫不经心，所以

① 译音。

② 原名待查。

不可能获得可靠的情报；流传的一些报道只不过说明老子的名言：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除了海关关闭之外，海关税务司在所有外籍海关雇员和大部分中国职员的同时下撤走，使得邮政局发生瓦解。邮政局虽然最近已与海关分离，但还不习惯于独立地发展；人们特别是那些下级雇员仍然把税务司视为它的首领。信差们不能够领到工资，已全部离去。我在途中遇见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以及长期驻腾越的大部分职员。结果是自本月初以来，停止了邮件收发工作；虽然当我到达时邮政局表示要开展工作并已接受发送的信件，但除了那些留交给我的信件外，没有其他信件送来。海关仍然关闭，尽管已命令一名中国人征收关税。

除了在腾越城的侨民之外，我所知道的在我所辖地区内的英国臣民，仅有大理府中国内地会的成员以及植物学家华德先生，他在阿电子^①附近采集植物。直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得到关于这些人的任何消息。大理的教会有安伯里牧师夫妇和两个孩子（不过，他们也许以前便已离去，因为他们在十月份某个时候休假，经过云南府）、桑德斯牧师、辛普生女士、摩尔根女士、克勒彻女士等。当我抵达腾越时，据说大理府仍坚持反抗革命军；由于看来将发生战事，所以我发电报给您，请求允许我前往该处，将他们撤走。我认为，我大概能够办理此事，不至于有严重危险，因为双方都极想不危害外国人的生命，然而鉴于进行战斗时也许发生意外事件，所以他们住在该处是很不可取的。可是，一两天后，我从可靠方面获悉，大理府已经投降，而没有发生战事；虽然电报线还没有接通，我不能够与他们取得联系，但我对他们的安全抱有极大的希望。

① 译音。

华德先生大约于10月20日离开阿屯子回国。我不知道他打算走哪条路来。主要的道路是经过大理府，但他似乎不打算走这条路。因此，我不可能猜测他的下落。如果他在上述日期启程，当腾越起事时，他几乎不可能越过卫西厅^①。

除了上述英国臣民之外，有一名法国商人在本地区西北部，总店设在阿屯子；还有一名法国传教士在卫西。

就腾越所能见到的情况来说，公众舆论对革命是冷淡的。人们没有任何热情，虽然首领们试图使我相信，人们兴高采烈地为他们的武装政变而欢呼。剪掉象征满族征服的辫子，远远不是很普遍的，所以在街上很少见到剪了辫子的人。当然，由于下层群众中盛行戴头巾，从而在许多场合下使人们不可能看见他们是否还留着辫子。但是，人们预料恰恰是下层群众将坚持他们所熟悉的那些习惯；当大多数高贵的人仍留着辫子的时候，他们是不大可能剪掉辫子的。苦力阶层愿意应募入伍，只不过是准备接受许给他们的每月六两饷银^②，而我担心饷银是靠不住的。实际情况是：改变统治者对大多数人是毫无意义的，而从君主制变为共和制，对大多数人来说只不过是改变统治者而已。关于皇帝和议会，除了作为名称之外，老百姓们是一无所知的。他们所熟悉的政府机构中的那部分主要是衙门差役，而已经发生的事情并未包含对该部门进行根本改革的希望。最近事件将对他们产生的最明显的效果，是所有必需品价格的猛烈上涨。

与此同时，必须承认：在富裕阶层中，很久以来便对革命派的计划抱有相当程度的同情；的确，如果没有这种同情，最近的武装政变是不可能发生的。仰光和曼德勒的中国人普遍被认为是反对满清王朝的；在距腾越几英里、人口稠密的和顺乡，主要居

① 译音。

② 第223页作“每月八两饷银”。

住着那些曾经在缅甸生活并吸取了先进思想的中国人。

关于最近事件对边境上半独立的掸族上司可能产生什么效果，我现在还不可能作出判断。革命军首领们以为，前清朝当局关于土司问题所处的地位现已转移到他们身上，但我还不知道上司们对这个说法的反应程度如何。我打算尽快地对边界进行一次巡视，除了做一些可能做的事情以解决悬而未决的边界案件之外，还要使土司们记住，在建立英国政府所承认的主管当局之前，他们应自行负责维持边界秩序和解决边界案件。

第 27 件 代领事史密斯致格雷爵士函

1912 年 1 月 8 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随信附上我写给英王陛下驻北京公使关于腾越革命军起事的一封信的副本。

史密斯谨上 1911 年 11 月 30 日于腾越

第 27 件的附件 代领事史密斯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关于我本月 20 日的信，我荣幸地报告自那一天以来继续发生的进展情况。

我报告大理府和平投降的电报发出后几天收到的情报，大大减轻了我对住在该处的传教士们的忧虑。您 11 月 15 日的来电授权我去大理府，如果我确实认为是必要的和安全的。直到 11 月 24 日，我才收到该电。由于我接到大理府的消息后已经决定，原来计划的大理之行现已无此必要，所以我没有趁您许可之便前往大理。然而，我认为，目前任何英国臣民继续住在遥远的内地都是很不妥当的。当通往大理府的电报线一旦恢复后，我便立即要求该地

的传教士们按照他们的选择，尽快地撤往腾越或云南府，因为大理府至该两处的距离几乎相等，而且就安全来说无论哪条道路都没有提供任何优越条件。象我所预料的那样，他们选择前往云南府，因为走那条路要容易得多。11月25日，他们来电告诉我，将于该日离开大理府。我已把这个消息电告英王陛下总领事。

当我根据一般的理由认为他们不宜继续住在大理府的时候，缅甸收到云南府的一份要求他们撤退的电报，并把它转给了我，从而给我提供了另一条理由。该电报虽然已被弄得残缺不全，但还可以看懂，足以使人明白英王陛下总领事有理由担心：由于四川的罗罗族已起来反对汉人，该省存在的无政府状态可能蔓延到云南。

腾越的局势表面上仍然没有变化。可是，由于张文光缺乏能力以及他与刁安仁之间出现的不和，城内有一股强烈的不安全感。刁安仁从干崖前来取代张文光管理这个地区。然而，腾越和附近一带有声望的人们不准备服从土司的统治，因此允许张文光继续留在该处，指示刁安仁返回干崖。此时轮到刁安仁提出反对意见，他断然拒绝让位给张文光。结果发生了争吵，如果不是那位年老的提督^①进行调解，使争吵平息下来，它可能具有严重的后果。该提督拒绝积极参加政治事务，但不反对利用他年长及其地位的影响，以维持和平。

云南府的革命军当局似乎认识到必须对云南西部的管理作出令人更满意的安排。我今天获悉：要撤换张文光和刁安仁两人，他们的位置由前甘肃省布政使而最近隐居在邓川州的赵藩接任^②。预料他在未来三周左右将不会到达此地，因为他要在大理府等候

① 据本书《关于中国事件的补充函电：中国第三号（1912年）》第58件的附件，此人姓张，但名字不详。

② 赵藩系前四川按察使，此处原文有错误。

李根源（今年夏天清朝远征部队曾把“李根源监督”^①的银质纪念品送给迈卡流域的玛鲁首领^②），李根源现正从云南府前来腾越。刁安仁将继续担任他的干崖土司的职务，张文光则继续担任他在起义前所担任的非官方的职务。

据说，上月招募入伍的新兵人数大约有三千人，其中约一千人留驻腾越。有许多部队被派往曼允、龙陵、明广^③、古永等地；有人通知我说，所有的边界哨所都已得到加强。从八莫来的人们报告说，有相当多的部队正沿着通往边界的道路移动。据说，有二百五十名士兵将布署在边界上的古里卡。至于派去的部队是不是这些新招募的上兵，我没有得到明确的消息；如果是新兵，则对他们无需重视。关于派往龙陵和明广的部队，告诉我的人数是各三百人；如果这些人数是正确的，他们肯定不是由陆军组成的。

有人说，在龙陵曾与当地匪徒发生战斗，但我还没有获得详细情况。我从密芝那方面听说：有一支队伍已前往片马，并杀死了该地的首领。

关于军队的饷银，据一位通常消息灵通的中国熟人告诉我，已从革命军总部获得一笔三、四十万两的款项，但这笔款项还没有提取，地方首领宁愿首先使用他们通过名义上自愿捐献从附近地区得到的以及从钱庄借来的款项。

关税已委托崇允记商号征收。现仅使用海关大院（考棚便设在其中）的后院，外籍职员办公室尚无人占用。贸易在一定程度上继续进行，虽然贸易量已大为减少。

邮政局已重新开始工作，但邮件的发送每周仅两次，而不是

① 李根源曾任云南讲武堂监督。

② “迈卡”、“玛鲁”均系译音。

③ 译音，疑为明朗。

象前五个月内照例每周三次。自从我到达此地以来，送来的第一次邮件于27日收到，距以前送来的邮件相隔三个星期。

史密斯谨上 1911年11月29日于腾越

第28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1月8日收到

阁下：

隆裕太后本月6日发布谕旨，宣布摄政王正式辞职，我在本月8日的信^①中曾荣幸地附上该谕旨的译文。该谕旨表面上的意义是朝廷为实现立宪政治而采取的另一项措施的通知，但它没有被公众舆论按照这个意思加以接受，相反，它引起了一定程度的猜疑，人们以为它真正表明太后至一派对摄政王一派的胜利，并预示太后至一派企图恢复已故慈禧太后多年来控制朝廷和人民的那种统治制度。

这些猜疑已在中文报纸的专栏中表达出来，甚至外务部的半官方报纸《北京日报》发表的有关该谕旨的社论，在结尾时认为有必要加上下面的话：

“也许不必担心醇亲王一派在他们的首领下台时，可能在京城制造乱事。关于宫廷人士内部是否有分歧意见，我们并不自认为是了解的，但谕旨极力要求各亲王忠心耿耿而且要有良心。我们相信，前摄政王的支持者们将接受不可避免的命运，而不采取任何措施，致使他们自己的目标与国家的事业继续混在一起。”

该报本月9日的社论重述这件事情，并提出下列三个问题：

- 一、根据目前的安排，是否有摄政王？
- 二、如果有的话，谁是摄政王？

^① 原编者注：参阅《中国第一号（1912年）》，第139件。

三、摄政王是否享有任何实际权力？

它对第一个问题作了肯定的答复之后指出：必须把太后当作合法的摄政王，但她没有实际权力，因为根据新订宪法十九信条，她只能行使保留给皇帝的极为有限的职权。

摄政王退位后一两天内，谣传禁卫军可能闹事，但已在某种程度上对此事作了防范，因为12月2日的谕旨任命了徐世昌担任禁卫军练兵处督办（不久又担任皇帝的太保），以前这个职务是由贝勒载涛担任的。继这个步骤之后，本月9日又把该练兵处并入一般的陆军机构，并且将两个混成协编为一个普通的军，置于冯国璋将军的指挥之下，他是军谕府的汉族大臣，也是总理大臣袁世凯的著名的党羽。

不久，对摄政王退位动机的这种误解，通过吉林巡抚和该省官员电告朝廷的奏折而正式表现出来。这个奏折没有在《官报》上发表，我荣幸附上的这份译文是从中文报纸转载的奏折原文译出的。该奏折引起了本月9日谕旨的发布，我也把谕旨的译文随信附上。隆裕太后在这道谕旨中愤怒地否认了那些上折人的意见，他们认为，摄政王的退位，如果不是意味着朝廷方面过早地希望改变现状，造成了政府权力的混乱状态，便是意味着宫廷内缺乏协调一致。

甚至除了这道谕旨的发布之外，摄政王退位是否将继续引起全国的注意，这是令人怀疑的，但隆裕太后所作的否认结束了对这一事件的讨论，因为目前全国所面临的关于和战问题的更重要的争论完全掩盖了该事件。

朱尔典谨上 1911年12月20日于北京

第29件 格雷爵士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我已收到您上月12日的来信，其中附有英王陛下驻南京领事的几份报告，说明导致该城向革命军投降的事情经过。

我抱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了伟晋颂先生的报告，并且同意您对他的行动所表示的赞赏。

格雷谨上 1912年1月8日于外交部

第30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2年1月9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关于我12月30日的电报^①。

停战已进一步延后至1月15日。

第31件 陆军部致外交部函

1912年1月10日收到

先生：

一、我奉陆军委员会之命，表示收到外交部1月5日的来信，该信建议需要立即增援驻香港的警卫部队。

二、陆军委员会考虑了这个问题，经过与印度部非正式磋商以及与华南总指挥官联系之后，打算请求印度政府派遣下列部队商往香港：两营印度步兵，一连印度过山炮队。

三、我想询问：据外交大臣看来，这些援军同目前可从华北和华南指挥部调遣的部队一起（总共约八百人和一支皇家工兵分遣队），是否足以在最近的将来满足一切可能的需要，以保护英国在华利益。

布雷德谨上 1912年1月9日于白厅

① 原编者注：《中国第一号（1912年）》，第142件。

第 32件 格雷爵士致朱尔典爵士电

1912年1月10日发自外交部

陆军部打算请求印度政府派遣两营印度步兵和一连印度过山炮队前往香港。

他们询问：这些援军同目前可从华北和华南指挥部派遣的部队一起，是否足以在最近的将来满足一切可能的需要，以保护英国在华的利益。

您的意见怎样？

第 33件 布赖斯先生¹⁾致格雷爵士电

1912年1月10日发自华盛顿，次日收到

美国政府今天发表下列半官方声明：

“美国政府得到它驻北京公使馆的通知说：关于保持铁路畅通问题，列强驻北京使节认为美国最好是派出一团部队约一千二百人，而清政府已对此事默然同意。因此，美国政府准备遵照该项协议采取必要的步骤。

然而，现在美国公使馆通知说，关于铁路的情况已不象以前那么严重，而且清政府期望保持铁路的畅通，所以美国政府了解，仅派遣五百名部队便可满足目前的需要，它已照此发布命令。”

我获悉，美国政府将从马尼拉派出部队。

第 34件 布坎南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2年1月11日发自彼得堡，同日收到

关于俄国与蒙古问题。

1) 英国驻美大使。

下面是今天发表的一项官方公报的摘要：

蒙古人已宣布独立，吁请俄国给予支持。俄国政府劝告他们表现克制态度，并努力谋求同中国达成协议的基础。后来，被任命与蒙古人进行谈判的清朝全权代表^①请求俄国驻库伦领事进行友好调停，而且蒙古人也同时请求调停。俄国政府考虑有可能接受此项要求，但认为必须保证蒙古人的自治，因此，为了达到该项目的，应以下列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

在蒙古不得设立中国行政机构，不得编练中国军队，而且在蒙古领土内不得有中国人定居。

与此同时，俄国政府承认，只有蒙古人认识到为该国的发展而采取的措施应获得俄中两国的同意，蒙古才能够实现永久的安宁。因此，俄国政府表示愿意在蒙古采取行政、经济、文化等一切必要措施时提供友好的合作。在把上述内容通知清政府时，俄国政府又补充说：他们将努力诱劝蒙古人不要断绝他们同中国的联系，并且履行他们的义务。

接受或拒绝根据这些条款进行的调停，将取决于中国方面的善意。不过，俄国虽然不愿干预中国所进行的斗争，而且对蒙古不怀有侵略企图，但它不能不参与在它具有重大商业利益而且与西伯利亚毗连的那个地区建立持久的秩序。

如果蒙古断绝它同中国的联系，俄国将由于环境而不得不同蒙古政府发生商务关系。

第 35 件 格雷爵士致朱尔典爵士电

1912 年 1 月 11 日发自外交部

内地的欧洲人问题。

① 奎芬。参阅本书《关于中国事件的补充函电：中国第三号（1912 年）》第 50 件的附件。

关于您本月 6 日的电报。

四川省偏远地区各教堂的传教士们是否将同其他欧洲人一起撤离？

第 36 件 陆军部致外交部函

1912 年 1 月 12 日收到

先生：

我奉陆军委员会之命，送上 1912 年 1 月 10 日关于增援华南指挥部警卫部队问题写给印度部的一封信的副本，以供外交大臣参考。

布雷德谨上 1912 年 1 月 11 日于陆军部

第 36 件的附件 陆军部致印度部函

先生：

一、我奉陆军委员会之命，写信告诉您关于驻华部队的某些调动和布署，由于该国悬而未决的情况，使得这些调动和布署成为必要的。

二、在最近收到的外交部的一封信中，外交大臣提出一项建议说：鉴于华北和华南指挥部只有少量部队，可用来满足为保护英国在华利益而可能出现的进一步的要求，所以立即增援华南警卫部队是可取的。

三、因此，我要求：如果印度部大臣同意，便通过海底电报询问印度政府，他们是否能够暂时抽调下述部队增援香港卫队，假如他们赞成此事，便立即派这些部队前往：两营印度步兵，一连印度过山炮队。

四、我建议：因为营房中不可能容纳这些部队中的大多数人，所以应给他们准备全部行李和帐篷，以便使他们能够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兵营。

布雷德谨上 1912 年 1 月 10 日于白厅

第38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2年1月12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形势日益紧张。昨天，袁世凯的一位亲密朋友前来私下和我商议。

他说：现在，各方面都同意，除非事前皇帝退位和朝廷下台，问题就不可能获得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困难，是要决定代替满清王朝的政体。

问题在于：如果朝廷愿意让位给袁世凯，或者是授权给他建立临时政府，各国是否将承认他。此外，如果在南京建立了政府的革命党人拒绝同北方联合，中国便有分裂的危险。

我在明白表示我对这个问题必须持保留态度的时候，指出：袁世凯博得了各国的信任；他和南方首领们的争吵既然是中国内部的事情，他们相互之间应当能够达成协议。

第39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2年1月12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关于您1月11日的电报。

12月17日，英王陛下驻重庆领事已警告四川内地的所有英国臣民撤退。无法同成都联系，从各方面的报道看来，该地的形势是严重的。

第40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2年1月13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关于我1月4日的去电和您1月10日的来电。

我已同驻天津总指挥官进行私人的讨论。鉴于北方的形势更加严重，而且美国分遣部队的人数仅五百人，而不是一千二百人，

所以我们怀疑是否可以从华北指挥部抽拨任何部队，但我们认为，打算派往香港的援军将足以满足中国今后的需要。

第 41 件 布坎南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2 年 1 月 14 日发自彼得堡，同日收到

关于蒙古问题。请查阅我 1 月 11 日的电报。

昨天，在与沙索诺夫先生谈话时，我提到了这个问题。他告诉我：中国驻此地公使曾经询问他，俄国政府发表那项公报的意思是不是企图吞并蒙古。对这个问题，沙索诺夫先生的答复是：对俄国来说，吞并这么广大的一片领土的想法肯定是发疯。蒙古人和蒙古的中国人都已同俄国政府联系，俄国政府在回答时表示愿意在双方之间进行调停，目的是要防止蒙古宣布独立，并且保证由中国允许蒙古自治，所采取的方式是使蒙古能够管理它自己的内部事务。

当我询问俄国是否建立对蒙古的保护关系时，沙索诺夫先生回答说：这不是俄国的意图，因为它不想接管行政职责。关于俄国声明它准备提供友好支援一事，沙索诺夫阁下向我解释说：蒙古人已经建议，俄国为他们希望组织的军队提供教官。不过，目前似乎不存在可以在其周围建立一支军队的任何核心；但如果以后要求俄国派遣军事教官，俄国政府大概将派他们前往。中国的一位官员将驻在俄国领事官所在的某个城市，也许是库伦。可是，他怀疑，如果北京的中央政府采取共和的形式，蒙古人是否仍将承认中国的宗主权；如果蒙古宣布独立，俄国将不得不予以承认。

关于伊犁，沙索诺夫阁下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说：那个地区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该地的满族人正在被杀害。有很多俄国人在那里居住，但迄今没有对他们造成任何伤害。只要是情况如此，俄国将不进行干涉。

第 42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2 年 1 月 14 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昨天，外务大臣送给我一份电报。该电是外国商人团体上海商会理事会发给前摄政王、庆亲王和袁世凯的，实际上建议皇上退位作为和平解决的一项预备措施。该电又说：他们将吁请民党首领们抱着和解的态度对待向他们提出的任何建议。

第 43 件 总领事务谨顺致格雷爵士函

1912 年 1 月 15 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随信附上我今天写给英王陛下驻北京公使的一封信的副本，该信是报告四川省宣布独立的。

务谨顺谨上 1911 年 11 月 29 日于成都

第 43 件附件 1 总领事务谨顺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中国革命起源于四川，但四川似乎是起义最晚的一省。它表面上迟迟不仿效其他省份的榜样宣布独立，显然使其他地区革命党首领们感到很不愉快。贵州是一个贫穷的和较小的省份，它得到的支持中有一部分是四川协饷，现在它傲慢地表示愿意提供帮助。11 月 22 日，以黎元洪都督的名义自宜昌发来一份电报，提出威胁说：如果四川人不采取协调一致的步骤，便将按照对待满族人的办法对待他们。

在成都，正式脱离大清政府所遭遇的困难，甚至比在广州或南京已经证明的还要大。例如，此地的总督是一位汉军旗人，即站在满族征服者一边的汉人的后代，因此他和满族人几乎没有区

别。此外，他是一个具有经过考验的勇气和杰出能力的人物。他在他的周围聚集了几百名雇佣军，常常率领他们在边境地区打胜仗。他的左右还有统率一千名受过训练的旗兵的满族将军，这些旗兵装备优良，而且不怕牺牲。新军指挥官朱庆澜统制是受他的同事庇护的人，并且已经证明他对他的士兵们具有很大的影响，足以诱使他们同该省同胞作战。

那时，如果最近被释放的铁路股东会首领们与赵尔丰阁下之间不能就和平变革问题达成协议，成都不久便可能不得不经受该省不满分子和革命党联合部队的围攻。革命党的特派员戴天仇^①，成都府汉州^②人，正从武昌出发，入四川指挥军事行动。在灌县和省城以西及以南的其他地方，有成群结队的土匪、会党分子和土著居民，势将袭击省城。对端方不抱有任何希望，他不能信任他所带来的湖北部队的忠诚，即使那时在距省城四天路程的资州，他已处于绝望的境地。如果赵尔丰象他曾经威胁的那样将要自杀，那么，巡防队（即上述雇佣军）失去了首领，很可能着手洗劫省城。

另一方面，如果赵尔丰率领巡防队返回打箭炉，朱庆澜可能同保护他的那位同事共命运；旗兵驻防地和汉人居住区内有钱的人将受到城外土匪和会党分子的蹂躏。那些土匪和会党分子常常抱怨说：虽然他们自己忍受一切艰苦，但成都人却过着奢侈的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蒲殿俊、罗纶和其他首领与赵尔丰达成一项协议，该协议的详细内容后来以十九项条款和十一项让步的形式公布出来。我附上这些文件的译文^③。

简单地说来，赵尔丰制台（以后称他为赵帅或大帅）把四川的

① 即戴季陶。

② 今广汉县。

③ 中文原件见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503—506页。

行政交给谘议局议长蒲殿俊。他本人就任川滇边务大臣的职务，我们知道这个职务是大清政府最近的谕旨重新任命他担任的。应对他提供白银一百二十万两，而且除了他原来的边防军之外，还要提供新军八营。四川所有其他的部队应合并起来，置于朱庆澜的指挥之下。应允对所有各方人员实行全面大赦；满、蒙、回、汉等族人民应受到同样的待遇。满族将军、提督、都统均将解除职务，但他们作为尊敬的公民可以继续住在成都，或前往其他地方，而由四川负担费用。外国人和教堂均应受到保护。

赵尔丰按照这项协议，于11月27日晨发布了告别书，通知四川人民说：根据该省当局与成都士绅的一致意见，“以四川全省事务暂交四川谘议局议长蒲殿俊，设法自治，先求救急定乱之方，徐图良善共和政治。”^①他说：他本人将部署军旅，待一切就绪之后，他将遵照谕旨前往边境地区。

这个告别书是夸大其词的，但其中有向成都人民吁请同情的语气。我想，成都人民现在终于感到他们对赵尔丰的看法是错误的。对那些能够了解此事的人来说，该告别书还有讽刺性的语气：难道这些生手希望超过一位曾经服官十七省的人物的工作吗？加上警告的语气应当是很清楚的：四川将必须防范来自外部的支配。他担心“外来的压力”；“外侮”可能到来；正如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一位美国南部邦联主义者所说，邦的权利可能受到危害。

与此同时，驻成都的四国领事官员于26日晚各自收到谘议局的一件照会，它通知我们说：四川“在本国（即中国）目前情况的压力下”，已决定明天宣布独立。谘议局将派一名代表于明日上午前来，而且以后将交给我们一项正式的通知。

我答复此项照会说：我将很愉快地在所说的时间内接待那位

① 原文见《辛亥革命》（四），第387页。

代表。到了那个时间（27日上午十时），一位名叫沈宗元的青年人前来。他懂得一些英文，并且在北京住过几年，但他显然宁愿说四川方言的“官话”。他开始谈话时明显地是用一份准备好的讲稿，而在讲话过程中，他详细说明了即将成立的政府希望在它所有的行动中符合现代文明的精神。我听他谈完之后说：如果政体的变化不损害外国人的权利，那是由人民决定的事情。然而，关于对那些变化正式承认的问题，领事本人无权采取行动，必须报告本国政府并等候指示。既然前一天我已经获悉士绅与赵大帅之间达成的协议或协约，或不管它叫什么名称，我便立即尽力通过明码电报报告我的上级。于是我把该电报的副本交给他阅读。像他所了解的那样，电报局拒绝拍发该电报，声称：资州至泸州之间的电报线已遭损坏，而且通往重庆的道路已被封锁。因此，我被置于颇为困难的地位。在我收到我本国政府的训令之前，我不便同四川新政府进行直接联系。如果赵大帅正式通知我，他已把主管权交给蒲大人，那么，事情将较容易办理。难道不能这样安排吗？

沈宗元先生说：他将报告谘议局，但不能肯定赵大帅是否愿意写信（那时赵大帅的告别书尚未发表）。我答复说：如果真是那种情况，那么，我所想到的唯一解决办法是：在目前以及在我收到上级的指示之前，我同蒲大人通信时，不把他当作新政府的首脑，而把他当作谘议局的议长。蒲大人将会理解，我建议的这项通融办法，不是想要给他制造任何困难，而是因为此地所有领事官员对我们的职责采取了这样的看法。接着，沈宗元先生告辞而去。

中午前不久，宣布新政府成立的典礼在众所周知的皇城内举行，皇城是成都市中心内为明朝的一位亲王修建的一所有围墙的大院。

本地报纸已发表一些对该典礼大肆渲染的报道，这些报道日益增多。不过，庆典似乎是简短而又朴素的。他们宣布采用大汉四川军政府的名称。“汉”是该国一个伟大的王朝的称号，它的统治是从公元前二百零六年至公元二百二十年。中国人经常自称为汉人；“汉族”、“汉人”通常是和“满族”、“满人”相对称的。政府即“行政当局”，但“军”字，严格地说来系“军事的”，其确切意义是什么，现在还不清楚，甚至四川人自己也可能不明白。看来，军政府的意思与其说是军事专政，不如说是一个管理机构，它同单纯的市政当局不同，有权使用军队。同时，军政府是一个方便的术语，以便把新政府同旧的（大清）政府区别开来。

宣布成立军政府之后，接着升起了新的旗帜。那面旗帜（我想目前中国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是白色的，上面有红字（汉），周围有十八颗星绕成的一个黑圈，形状象是太阳，但颜色是黑的。新当选的都督或长官蒲殿俊发表了简短的演说，新政府中的其他某些成员也是如此。所有演说的人都已剪掉他们的辫子；事实上，前一天《商报》的号外已经宣布：参加典礼的人都将是没有辫子的，并且身穿军服；如果他们没有这种制服，那么，便着短上衣，戴高帽子，并穿皮靴。

11月27日那一天，新政府发布了三项告示。第一项告示简单地说明：该政府发布的所有官方文件都将盖印，刻有“大汉四川军政府之关防”字样。这里，我可以说：这个关防的大小和形状与旧制度下总督的关防相同，而且盖印时也同总督关防一样，用紫红色印油。第二项告示的开头列举了禁止违犯事项表，对其中三项违法行为可处以死刑。官吏、外国人、旗人及公共建筑物均应同样受到保护；杀人、放火、抢劫及奸淫都将处以死罪。然后，接着宣布政府的更迭，其中重申对外国人、教堂、该省行政官吏及驻防旗兵答应给予保护。由于铁路同志会现已达到目的，该告

示要求它解散，并且保证减少或废除“前不良政府之苛捐杂税”，以及对骚乱的受害者予以赔偿。

第三项告示是给各部门和各地区的一项通知，告诉道台以下各级在职官员：他们目前可以继续任职，或是在预先提出通知并有人替换之后离职。各处的厘金关卡将予以撤除，官盐每斤加价四文将不继续征收。法律诉讼的费用将予减少一半。清朝的法律、条例和礼仪，未经现政府明确废除或修订者，仍应遵守；但所有的政治犯应被释放。在职官员应负责照料所有的政府财产，并对那些未经明白允许免征的田赋负责按期交付。为了查明这种免征要求是否确实，官员们应同每个镇区的“团体”（或者可以随便称之为“教区委员会”）进行商议。关于当地要求压制或鼓励的一切事情，也必须同他们磋商。

协议的各项条款和所作的让步（附件二及附件三）规定了满族人的安全，正如我所报告过的那样，他们在成都的人数大约为一万人。蒲殿俊作为新独立省份的都督，按照同样的精神对旗人（满族人、蒙古人和汉军旗人）发布一项通知，答应他们给予保护以及目前继续提供大米补助。28日的《商报》发表了该通知的译文。它肯定地说：旗人本身将由于政府的更迭而得到好处，因为他们将不再限于内城居住，而且在选择职业方面不受约束。

该通知开头的一段话中提到“上帝的意志”（因为“上帝”几乎不可能有其他的译法）也许是很有意义的，它似乎是表明革命团体中有一些基督教徒。事实上，成都基督教青年会会长杨少荃同蒲殿俊保持很友好的关系，即使他本人实际上不是该政府中的一名成员。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措词，是把新成立的这个国家说成是“联邦共和国”（合众民国）。同一天，即11月28日，“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送给我这位“英国领事”的通知中说：

“关于大清政府同各国缔订的条约，其中有关我们整个国家者，必须等待联邦的讨论；有关四川者，本政府准备予以承认。”

这里，中国普遍实行的新制度被说成是一个“联邦”。沈宗元先生在同我会晤时解释说：他们所要采取的模式不是美国，而是德国的联邦制。

这份《四川独立宣言》通知附有三个文件，其中一个写道：

“我们正在制订一部联合宪法，以加强和巩固汉联邦帝国。”

这一声明似乎证实了沈宗元先生的说法，并且预示将为汉联邦推选一位军阀。

旗帜上“星”的数目是十八颗，而不是二十一颗或二十三颗，这个情况表明把东三省、蒙古和新疆（喀什噶尔）排斥在联邦之外。从协议条款的第十九款和所作让步的第四款看来，西藏将保留在内。

在收到都督的上述通知后，我曾经与我的同事们商量，并议定：我们应各自按照备忘录的意思而作必要的改动提出答复。我附上该备忘录的副本（附件四）。我于11月26日力图发给英国驻重庆代领事转交给您的那份电报，正如我报告的那样，当天被电报局拒绝拍发，但次日下午已被它接受。象沈宗元先生所说，该电报只能够发至资州为止（至重庆大约一半路程的地方），因为端方在资州要检查所有的函电。如果通过了该项检查，电报便能够由邮局或专差送去。

现在，据说端方已经死亡，但他究竟是自杀还是被他人所杀，还不清楚。鉴于1900年他任陕西巡抚时很乐于保护外国人，所以我最衷心地希望这个报道是不确实的。当我同沈宗元先生会晤时，我冒昧地表示强烈希望对他不要加以伤害；沈宗元先生在答复中向我保证，他们无此打算。该代表说：端方可以和前任满族将军一起住在这里，要不然，如果他们宁愿离开四川，他们两人

都将很受尊重地而且绝对安全地被护送出省。

我将在以后的信中说明新的机构，并送上一份担任官职者的名单，这里仅满足于报告朱庆澜统制已接受副都督的职务。

务谨顺谨上 1911年11月29日于成都

第43件附件4 备忘录

英王陛下总领事收到一封来函，所注日期为黄帝即位第四千六百零九年十月八日，即公元1911年11月28日。该函通知他说：大汉四川军政府已经成立，并宣布四川独立，大清王朝的权力现已消灭；同各国缔订的有关整个中国的那些条约必须由联邦会议讨论，但四川现政府准备承认那些有关四川的条约，并继续慎重对待各国领事及在该省居住的各该国国民，将对他们的安全承担责任。

无论是公使、总领事或领事，都无权对政府的更迭给予正式承认。沈宗元先生于11月27日代表谘议局前来看望务谨顺先生，在谈话过程中，务谨顺先生对于领事权力有限所产生的困难作了口头上的解释，并且说明：他必须电告英王陛下外交大臣，并等候发布指示，供他作为行动指南。

谘议局将会理解，总领事不能采取独立行动的理由是根据全世界适用的那些原则，而不是由于总领事方面想要制造麻烦所产生的。然而，目前电报联系中断，不可能保证迅速传递电报。因此，务谨顺先生建议：为了符合赵尔丰阁下11月27日的通知起见，他应与谘议局议长蒲殿俊先生进行通信联系，直到他收到外交大臣指示的时候为止。这是一项临时的和短暂的权宜办法，总领事相信它将证明是可以接受的。

1911年11月29日于成都

第 44 件 总领事务谨顺致格雷爵士函

1912 年 1 月 15 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随信附上我今天写给英王陛下驻北京公使报告陕西省情况的一封信的副本。

务谨顺谨上 1911 年 12 月 5 日于成都

第 44 件的附件 总领事务谨顺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我刚才收到盖士利主教 11 月 29 日自宝林的来信，其中附有伊斯登牧师 11 月 20 日自陕西省汉中府写给他的一封信的摘要。从该摘要看来，似乎西安府的邮政局已被焚烧，而且德籍邮政司已被杀害。

若干天以来，此地盛传陕西省杀死了一些外国人（或一名外国人）。《商报》提及此事时曾加以谴责，表示希望四川将表现得不那么残暴。这次暴行的受害者亨先生把他的妻子和孩子遗弃在西安府，如果他事前未把他们送往安全地方的话。

看来毫无疑问，前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正从陕西返回成都途中，因为昨天的报纸宣布，成都已派遣一支四百人的卫队去欢迎他。该报没有说明：他是否将留在此地，以及在复杂的四川共和政治中他将扮演什么角色。很可能他只不过是前往他的原籍云南省途中重游成都而已。

盖士利主教来函中的一份中文附件说：西安的革命是由陆军（新军）中一位名叫张凤翔的管带在他的两名参谋的帮助下煽动起来的。满城遭到攻击，所有的满族人除了六名在四川陆军部队中服役者外，几乎统统被屠杀。起义的士兵（通信人把他们说成

是新军，字面上的意义是“新的军队”）到咸阳追赶上了署理巡抚钱能训，请求他再继续担任他的职务。钱能训阁下予以拒绝，并企图自杀。他的伤势证明是不严重的，士兵们没有忘记过去在他手下得到的好处，所以把他置于一位外国外科医生的照料之下。

巡警道、知县和咸阳（省城以西不远的一个市镇）县令都倒向了起义军一边，并继续履行他们各自的职责。汉人没有妄遭杀戮的，但知府胡薇元（浙江人）被杀，因为他拒绝投降。新军分兵三支：一支往北防范蒙古人；一支为了某种不明确的目的而占领南面的山地；第三支则开往湖北，与湖北革命军保持联系。

汉中道台^①同赵尔丰一样，是一名汉军旗人，汉中将由一营起义军驻守。凤翔府显然已于10月26日被起义军攻克；无数的城镇，其中有武功、凤县^②、三原、千阳等地，均已归附。该省十之八、九的地方已在起义军手中，但土匪成群结队，到处抢劫。

那位通信人听说，革命军（革军）已派遣一支侦察部队进入四川，主力部队将立即接着前往。另一方面，成都有谣言说：已故的义和团著名首领董福祥的一个儿子任甘肃一大支回民军的统领，已宣布1900年被贬黜的大阿哥溥儀为皇帝，并准备侵犯陕西和四川。

兰州分局邮政司罗斯先生11月15日写给里奇先生的信中说：

“自本月1日以来，西安府便已在革新派手中。此地传闻，我们在该处的办公机构已被焚烧，亨先生遭到伤害。秦州至西安府的路线已被废弃，因为沿途充满了起义军和不良分子。目前，我把我们的邮件经迪化府和俄国转发。”

务谨顺谨上 1911年12月5日于成都

① 疑指陕安道黄浩。

② 译音。

第45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1月15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随信附上英王陛下驻成都府总领事论述四川局势的另外五份报告。

您将从这些报告中看出，由于拖延已久而且看来不很连贯的一系列军事行动的结果，清政府军队已重新控制省城以南和西南地区。您将很满意地获悉：在发生激烈战事的城镇，外国侨民所遭受的痛苦，不过是个人的某些不方便和忧虑；交战双方对外国侨民的态度似乎是无可挑剔的。

总督赵尔丰由于对起义军的这些胜利而增强了他的实力，同时由于释放他9月间逮捕的铁路风潮首领而使他的声望在四川爱国者的心目中有所恢复，所以能够与保路同志会达成和平协议，虽然该协议的条款显然是根据保路同志会提出者较多，而根据他自己提出者较少。该省当局至少在表面上尚能有效地重新维护它的权威，但是，总督与成都各界士绅所创导的改革范围很广（参阅务谨顺先生11月25日的第二封信），多少表明赵尔丰行政当局须服从那些不负责任的当地士绅的支配。

上星期，本地报纸详细报导了端方在资州被他自己的部队杀死的情况，但我对这个说法未能获得证实。然而，务谨顺先生提及端方被关押在资州的谣言，多少表明已经产生的某些麻烦。

朱尔典谨上 1911年12月25日于北京

第45件附件1 总领事务谨顺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我荣幸地附上居住在雅州的美国传教士奥本肖先生的一封来

信的副本，它是自起义开始以来我从该城收到的第一封信件。雅州被起义军围困已久，由一支很小的“巡防”队坚决防守，最后清军攻克邛州后自该地出发终于解围。附近的城镇如大邑县和崇庆州，也赶走了起义军；最近清军在西南部的军事行动似乎获得普遍的胜利。

雅州的解围终于为调回驻守边境的五个“巡防营”扫清了道路，他们曾经等待通过雅州前来成都。现在，我知道，总督打算把这些部队逐渐集中于省城，因为他对这些部队的忠诚是可以绝对信赖的，目的是当湖北和四川的“陆军”发动起义时，他也许还能够保住他的地位。在这五个巡防营中，一营已到达新津，距成都不过一天的路程；据说还有两营已向嘉定进发，该城已有很久由起义军和平占领。

尽管目前自雅州至邛州以及自邛州经新津至成都的道路至少暂时被认为是畅通的，但还没有得到我的法国同事安迪先生的信息，他被阻止在打箭炉已有两个多月。

昨天，总督的外文秘书唐师爷^①通知我说：大约三个星期以前，已发了一份电报给驻巴塘的代理边务大臣傅嵩林，命令当时驻德格的两营边防军经打箭炉前往驱逐清溪县附近的起义军。该电系发至云南的理昌^②，由该处派信差转送。估计这样转送电报需时九天，而且部队在途中至少要走二十天，所以在这些部队抵达打箭炉并可能护送我的同事之前，必须还要经过一周的时间。

本月8日，一名法国陆军军官、勒江德考察团的成员诺勒上尉抵达成都，途中经过最动乱的地区，除了很难找到轿夫和挑夫之外，没有遇到任何麻烦。诺勒上尉于9月23日离开建昌山谷中的宁远府，那一天关于起义的消息还没有传到那个与世隔绝的地

① 原名待查。

② 译音。

区。直到他抵达塘河沿岸的一个小镇、嘉定以西相距几天路程的富林时，他才发现道路已被阻塞，而且该地区发生骚乱。由于交通工具的困难而在该地附近耽误几天之后，他设法抵达了嘉定。他在嘉定得到了起义军的一张“路票”或沿途通行证，在路上走了七星期之后终于抵达成都。现在，他告诉我，他不久将前往宝林府，打算继续进行他的科学考察工作；他似乎一点也没有受到本省骚乱状态和今后难以捉摸的局势的阻碍。

关于四川其他地方，省城以北地区的局势很少发生变化，该处的各起义队伍继续任意游荡。但是，他们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合作或组织；由少数正规军组成的一支警卫部队似乎便足以保护一座城市不受攻击。

在南部，威远县已落入起义者手中，知县遭到了残酷杀害。由龙泉驿经简州前往乐至县的哗变部队，据说已被击败，并且被那些派往追击的部队在乐至县附近驱散。

四川东部迄今是平静无事的，但我最近得到该处发生动乱的消息。在万县至重庆陆路途中的垫江县，似乎爆发了起义，该地的衙门和公共机构均遭破坏，而且电报线已被切断。人们预料乱事将自该地蔓延到万县至成都途中的大竹，但我至今还没得到消息证实此事。垫江的情况似乎仅仅是当地的一次起事，同真正的革命运动并无正式联系。革命运动自宜昌向长江上游扩展之缓慢，似乎是无法解释的。最近的来信表明，万县下游的城市巫山和夔州府于本月8日仍在现政府手中，虽然据说湖北最边缘地区施南府的利川已在革命党人的控制之下。如果此事属实，那么，湖北起义军似乎正沿陆路向忠州进发，而不是沿江而上前往万县。

关于中国其他地区情况的消息，很少传来此地。人们似乎相当普遍地知道，长江流域的许多省份同云南、贵州两省一起，已在反对朝廷的革命党人手中，尽管本地报纸尽力劝告人民不要听

信那些没有根据的含糊报道。然而，没有来自北京的任何消息，使官绅们大为惊讶，并引起了最耸人听闻的谣言。但是，这座大城市的二十万居民在这样一种必须被认为是很严重的局势面前，似乎表现出奇怪的冷淡态度。

现在，端方正在资州至成都途中的某个地方，很快便将到达此地。说他打算试图逃往北方而不前来省城的谣言，似乎是没有根据的。总督衙门隔壁的兵备处已准备接待端方阁下，在南门外的武侯祠准备供他所率领的鄂军住宿。

务谨顺谨上 1911年11月14日于成都

第45件附件2 1911年11月4日雅州传教士 奥本肖先生来函摘要

自西藏来的军官刘同林^①在这里为我们打了胜仗，他将试图发信出去，所以我也写一封短信。雅州经历了一个可怕的时期；我们被围困了几个星期；郊区周围的农舍已成为废墟。在两次小规模战斗、两次实际会战和几十次夜间出击中，清军获得了胜利，起义军被杀死数百人。最大的一次战斗发生在8月15日，那时清军突然冲出南门，出其不意地逮捕了起义军，并把他们杀死，俘获了各种火器，除了几十具梯子之外，还在城墙旁边夺得一些本国制造的大炮。在各营房和衙门前面，大约有五十个首级。许多人从城内逃走，在乡下渡过了一个艰苦的时期。在最初几天内，为了这座城市的安全，似乎很费力气，但习惯于作战的藏军及时到达，获得了胜利。清军阵亡的总共约有十人或十二人，还有一两名本地团勇被杀。许多人受伤并惨遭不幸。我不得不积极行动而且尽力去干，从而赢得了很大的声誉。……现在，通往三、四个

① 译音。

方向的道路都已畅通。那是不可思议的。直到上星期天，我们还被几千人紧紧地包围着，而且预料肯定将有一场苦战才能结束此事，可是，你瞧！上星期一早晨，起义军便统统不见了。……现在仅开放东门，但那只是暂时的。……

第45件附件3 总领事务谨顺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9月7日逮捕十一名首领是目前四川起义的信号。到上月底，他们中间有三人（叶秉诚、胡燏和彭兰芬^①）已被悄悄地释放，另有两人（蒙裁成和王铭新）也分别于11月7日及11日获释。其余的六人，即著名的罗纶、蒲殿俊（谘议局议长）、颜楷、邓孝可、张澜和江三乘，于本月14日晚上“在隆重仪式下被请了出去”。16日的《商会公报》上发表了一封告四川人民书，声称是由八十多岁的翰林吴兆麟和成都其他绅士执笔写的，说明总督已释放这些著名人士，希望他们给予合作，使这个动乱的省份恢复和平。

赵尔丰似乎已得出结论：端方到达成都后（预料他将于明日到达），将坚持释放那些被囚禁的首领；因此，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尊严，事先与他们达成一项协议，并请求他们离开总督监狱内的住处。他不仅这样做，而且还在第二天设宴招待他们。

赵尔丰正尽力表明（实际情况确系如此）：北京政府的紧急命令强迫他逮捕这些人，而他本人是反对采取严厉措施的。人们普遍认为，端方已自重庆上折参劾赵尔丰阁下。似乎没有什么疑问，他的四名僚属已经受到指责，他们是分别担任兵备处和营务处总办的周善培、王棧、田征葵以及总督的一位幕客饶凤藻^②。

^① 中文资料中亦作“彭紫”。

^② 当时周善培任署提法使兼劝业道，田征葵署松潘镇总兵兼营务处总办，王棧和饶凤藻均为候补道。端方参劾赵尔丰原折，见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445—448页。

署劝业道周善培（由于某种原因他从来未被授与实职）在四川行政当局的所谓对内和对外政策中起着明显的作用。最近几个月来，他署理提法使。他和其他三名官员在激起保路同志会的愤怒这方面究竟干了些什么，是完全不清楚的，但起义军于上月悬赏拿获他们和赵尔丰总督的首级。即使是对周善培怀有深仇大恨的敌人也承认他有才能，虽然他们喜欢把他的才能说成是狡诈。

当周善培获悉钦差大臣端方指责他干的许多事情中有欺诈和谋取私利行为的时候，他立即致函总督，要求总督阁下说明：他（周善培）是象人们所说曾策划于9月7日逮捕罗纶及其同伙，还是此事从来没有同他商议过。当赵制台答复他本人对该行动承担全部责任之后，周善培给端方大臣写了一封冗长的辩护书，此外，他还把这封辩护书印刷出来并广为散发。他在该辩护书中把驱使四川人进行反抗的指控推到端方本人身上，并且声称在端方和盛宣怀6月1日发自北京的一份电报中找到了动乱的根源。该电报通知护理总督王人文说：对铁路公司的现金余额以及该公司实际支出的款额，一律发给铁路股票，而不发给现款。他的主要论点是：他（周善培）一贯主张采取温和措施，而端方一开始就主张采取严厉措施，只是由于发现不值得采取严厉措施之后，才改变他的调子。

他写了该辩护书之后，接着向总督正式申请辞去提法使的职务。总督接受了此项要求，15日的《商会公报》发表了该申请书和会议记录的原文。他所提出的理由是：他（周善培）曾经同其他行政官员一起向公众宣布，如果中央政府在铁路问题争论中所采取的措施不能使人满意，他将辞职。端方大臣仅致力于释放那些被逮捕的人并指责官吏；关于如何满足四川人的要求，他并没有发表任何公开声明。周善培说：由于受到钦差大臣的肆意诽谤，而且不能鼓舞人民的信心，他除了辞职之外，别无其他选择。然

而，他已经辞职，同时对钦差大臣毫无顾虑地加以抨击，这件事情表明，据他这位在四川人中间渡过了一生的随波逐流的人看来，四川人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如果端方不再改变主意，他将于明天到达成都；我们很快便应当能够对本省事态发展的方向作出一个更明确的估计。目前，看来好象以总督为首的清方已同保路同志会达成一项协议，以防止匪徒破坏秩序，在其他方面则是要拖延时间，直到大家知道武昌和北京的结局为止。我们得到关于武昌的最近消息说，11月4日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无论任何人，甚至是总督，都有一个多月未获得北京的消息。英国驻宜昌代领事许立德先生于13日来电告诉我说：民党首领们已经告诉他，从保定府出发的起义军已占有北京；隆裕太后和皇帝已逃往天津，满族诸王公已乘火车逃往俄国。如果这个消息在这里被认为是真实的，那么，四川不是与民党共命运，便是宣布独立。

务谨顺谨上 1911年11月18日于成都

第45件附件4 总领事务谨顺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我曾经报告：保路同志会（铁路股东会）的主要首领，即罗纶和他的同事们，于9月7日被捕，11月14日获得释放。在昨天的《商报》上，以他们九人的名义发表了告四川人民的一份呼吁书^①。

该呼吁书主张停止内战，理由是成立铁路股东会的目的现已达到。那些目的是收回铁路及取消铁路借款。作者们认为，根据借款合同本身的条款，政治动乱自动地使该合同失去效力并且作

^① 原件题为《哀告全川叔伯兄弟》，全文见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489-491页。

废。这显然是指第十六款而言，可是他们曲解了原文，这几乎是无需说明的。他们把该条款解释为好象只有其中的几个字才具有效力，即“若有政治上之变动，则此约作废。”^①

作者们代表“官府”（从上下文来考虑，“官府”只可能是指总督赵尔丰），答应对以前的犯法行为不予追究。他们还保证促使当局免除：（一）“苛捐杂税之剥削”；（二）兵勇土匪之劫掠勒索；（三）食盐之加价。他们将建议减轻或暂时免除遭乱地方的钱粮，对家破人亡者给予抚恤，将被盗财产归还原主。他们保证不为他们自己计较个人恩怨。

他们指出：播种春季作物的季节已经到来（主要是指播种小麦）；如果不进行播种，则明年继内战之后又将产生饥荒。因此，他们请求人民重操和平生涯。

当时，据说这些人与总督之间每天举行会议。有消息说，将另召集一次川汉铁路股东大会，但关于此事我还未得到证实。唐师爷告诉我说：赵制台在保路同志会首领们的帮助下，正在制定一套章程，将尽力没收起义军中土匪分子的财产。

然而，人人都显然等待着关于北京情况的可靠消息。直到目前为止，我们仅听到宜昌和云南府起义军所说的皇室已逃往天津、山海关或俄国。昨夜，许立德先生自宜昌来电说：清政府已完全瘫痪。他又说：广州已宣布它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在南京，满族人正在屠杀汉人。正象我从武昌商会写给宜昌商会的一封信中所获悉的那样，南京的满族人首先缴去了汉人的武器。

如果所有这些报告属实，它们可能在成都产生最严重的后果。可是，我们已经知道，总督显然正在与保路同志会议和；同时，他正从雅州分批调回三个月以前派去的边防部队；大约有八百人

^① 《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490页。

已经抵达成都，而有人告诉我，上周抵达此地的一营鄂军已被调回资州，因为端方仍在该处逗留。

如果赵尔丰的老边防军仍然保持忠心耿耿，他还得到旗兵的支持（因为他肯定是能得到的），而且有城墙的保护，看来他也许是一个很难对付的敌手，不会轻易遭到攻击，并可能顺利地按照他自己的条件同革命军达成协议。

务谨顺谨上 1911年11月21日于成都

第45件附件5 总领事务谨顺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关于我本月14日的信，我荣幸地随信附上奥本肖先生另一封来信的副本，该信对雅州被围情况作了更详细的说明。六个多星期以来，即自9月14日至10月30日，该城被起义军严密包围，而由自边境调回的一队巡防营防守。尽管它时常遭到攻击，但由于这些久经锻炼的部队到达，他们于9月19日入城，此后该城似乎没有陷落的任何紧急危险；起义军大概发现他们的木制大炮和用煤油罐做的盔甲对付清军的新式步枪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奥本肖先生认为，起义军的撤退是由于自西藏经清溪县而来的增援部队的到达；可是，此地的官方报纸把这座被围困城市的解围归功于陆军，因为他们攻克了邛州；而第三种说法则是起义军被他们的首领们调往嘉定附近地区，因为最近起义军都在那里集结。雅州城外进行的战事，具有以前中国人起义的极端残忍的一切特征；我们听说清政府的密探被起义军活活地剥皮，作为对清军大规模屠杀起义军俘虏的报复。

虽然根据奥本肖先生来信所说，清政府的援军于10月底自西藏到达雅州（大概是经过打箭炉），但我没有听到关于我的法国同事安迪先生的什么消息。据一个月以前此地得到的一个口信，

安迪先生自9月中旬以来便被拦阻在打箭炉城内。既然法国旅行者在宁远府附近遇害的消息实际上已被云南府的一份来电所证实，对安迪先生的安全自然感到很大的忧虑。

自起义开始以来，便没有得到宁远府美国浸礼会的韦尔乌德先生和汉弗莱先生的消息。但由于法国旅行者的被害据说是发生在该城以南相当远的地方，所以有一切理由希望在城墙之内的这些传教士安然无恙。

最近从西部地区前来成都的中国宣教师们报告说：在清军近来采取行动的那些地方，现已平静下来，可是到处充满了土匪。其中有一位宣教师系来自崇庆州城，该城在成都正西相距一天的路程，最近已肃清了起义军。该城很久以前就因为它的居民不奉公守法和好争吵不休而享有坏名声，那里起义军的所作所为似乎特别野蛮和残忍。因此，巡警的首领和知州均被斩首；他们的尸体被支解，并弃之于郊外。另有二百多人因被怀疑为清政府的密探而遭到砍头，他们中间有许多人的肝脏被吃掉了，舌头被割下来，晒干后压成粉末，作为防止枪伤和刀伤的一种特效药。该宣教师们还报告：这部份起义军中间有相当大的排外情绪，许多罗马天主教徒和一名新教徒被当作密探斩首；还有谣言流传说，邛州的传教士们（他们后来都已撤离）均系为清政府效劳的密探。我觉得，这种反对外国人的情绪，只不过是起义军主力部队撤退后，留下的少数匪徒中间遭到瓦解和挫折的自然结果，因为我们有许多证据表明，驻守嘉定附近岷江沿岸的真正保路同志会或革命军，仍在尽最大努力保护外国人。

郫县和灌县之间的地区仍然处于十分动乱的状态。灌县县城仍在起义军手中，对清军来说，起义军在这一带已证明是很强大的。目前，人们对灌县灌溉工程感到很大的忧虑，因为整个成都平原的肥沃和丰产依靠这个工程。准备修建拦河坝切断水源的时

刻很快就要到来了，为了下个季节的灌溉，可能要清扫和修理堤岸及沟渠。据今天的《商报》所说，成都的士绅和显要人物现已说服总督，允许派他们之中的两名成员同灌县的起义军进行谈判，该处起义军似乎更象是土匪，而不象是革命军。据该报所载，这两位代表将被授权建议停战，并代表总督宣布大赦。然而，这两位绅士是否有勇气作为总督的使者深入起义军地区，这是很不可能的；但如果他们将作为共和政府的代表前往，他们也许可能获得某些成功。

过去一些时候以来，有谣言流传说，成都以西地区各土著部落已经武装起来，不过不明白的是：他们是在保路同志会的旗帜下作战，还是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袭击平原地区。现在，告示已经证明各部落地区一切都不安宁，该告示的译文列为这封信的附件二。告示是最近端方阁下自资州发布的，他这位钦差大臣现住在资州，或者是象某些人所说，他现在被围困在资州。在该告示中，端方阁下号召松潘、理番、茂州、汶川一带的各土著首领和头人以及岷江附近各军屯的汉族移民维持和平。他提醒他们，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皇帝的恩惠所赐；并且指出：在目前的危机中进行武装起事，不过是以怨报德而已。

我最近获悉，由史密斯、欧文、华莱士等先生组成的一支英国探险和体育运动远征队目前正在甘肃。我知道，这些先生们打算穿过库库诺尔湖^①，并由那里经过部落地区进入四川。我已经写信给该远征队队长史密斯博士，极力劝告他放弃拟议中的旅行，迅速前往俄国领土或中国沿海。边境各部落一旦发动起事，人们就不知道它将发展到什么程度；锦江流域传来的消息倾向于表明：他们将不象汉族革命军迄今所做的那样，对外国人保持中立态度。

① 即青海湖。

我没有得到巴塘和打箭炉的中国内地各教堂的任何消息，而且也不可能同它们进行联系。然而，所希望的是：如果边境发生动乱，那些传教士们同周围藏族各部落建立的友好关系将避免使他们遭到任何伤害。

务谨顺谨上 1911年11月25日于成都

第45件附件6 奥本肖先生9月23日至11月13日
自雅州来函摘要

各城门于9月14日关闭。自那时以来，我们便处于被围困状态。敌人控制了通向此城的各条道路，并且有效地切断了我们的大米供应。幸亏手头还有相当多的粮食存放在公仓、商店和私人家庭中。

江对岸的歹徒们使这座城市陷入相当困难的境地。他们获得了渡船，有些代表已在东门外。17日，星期日，到处流传着最荒唐的谣言。商店关闭，人民大为恐慌。有许多人迁出城外，从城墙上用绳子吊下来。一支有十四名士兵的卫队被派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收拾了一些被褥、食物和必需品，并且准备在接到通知后立即迁往一位低级官员的住处。第二天下雨，双方开始进行一些谈判，人们希望通过谈判收买起义军。一些议和代表确已渡江，但他们受到了虐待。有些人逃走了，而且至今还躲藏着。

19日，一大队士兵自西藏到达；从那时起，情况开始好转。这些援军不得不沿途杀出一条血路，在距此地大约五十里的地方有两人阵亡及三人负伤。有些起义军穿戴着用煤油罐做的盔甲。清军士兵都是很热情的人，他们曾经在西藏服役。在这些援军到达后，官吏和人民都鼓起了勇气。第二天，隔江互相开火，对双方都没有造成任何损失。21日，开放了东门，士兵们在该附近地区进行了扫荡，并试图驱逐江对岸的那些人。有许多人被杀死；

他们还带回了两名俘虏。知县立即砍下他们的脑袋，并把它们悬挂在城墙外面作为一项警告。次日，士兵们再度出动，进行了一场正规的激战，我在城墙上观看了这场战斗。敌人被击溃，并有六、七幢房屋被焚。据说有许多人被杀死；士兵们带回了六个首级和许多左耳，还有一些大炮和四名俘虏。后来这些俘虏被斩首。

22日，星期五，道台请求我去照料一些住在中学堂的伤兵。我很高兴地做这件事。……

23日，星期六，我们遭受一次明显的地震。自星期四以来，没有发生战事。……穷人遭受很大的痛苦，公仓已经开放。每天有五、六名士兵前来看病，我很喜欢为他们治疗。我们可以在城周围自由走动；商店仍然关门，大街上看来好象过新年一样。

10月10日 我们仍然被围困，并经历了一些可怕的事情。在清军方面有两个星期不甚活跃，而且道台方面为收买起义军所作的努力失败之后，又策划发动进攻。10月6日，中国人的中秋节，士兵们冲出南门和东门，对敌人进行突击并把他们打败，而且在郊区放火。这是一个火与血的日子。有五、六名士兵阵亡，许多士兵负伤。没有人知道究竟杀死了多少敌人，但清军说有几百人。他们活捉了好几名敌人；当清军回来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可怜的家伙走在清军前面，他脖子上挂着四个首级。根据实际的统计，中学堂的营房前面有十八具无头尸体；县学堂的营房前面有八具；县衙门前面有八具，而道台衙门前面则躺着二十具。我被请去护理伤兵，白天必须两次走过这一场所。他们雇人把这些尸体扔出城墙，每人一百文钱。士兵们缴获了许多梯子，一副大梯子能够容纳六、七人并肩爬上去。还缴获了各种枪炮及两门本国制造的大炮。

这些大炮系用挖空了的橡树做成，缠以铁条和电报线圈。它

们带着很重的炮弹，而且在被俘获时装上了火药。毫无疑问，他们曾经计划于5日夜间攻城，但由于倾盆大雨，引线无法点燃，所以才推迟发动攻击。此时两个最乱的郊区已经扫清，雅州城的地位较以前更安全得多。我们处在一次真正的叛乱之中。叛乱者大都是恶棍，大部分人无以为生，所以叛乱将造成极大的痛苦。他们中间有好几千人，但对于一座有城墙的城市以及我们的一千名受过训练的军队，他们是不能获得任何进展的。许多志愿兵已被招收入伍，在城墙上帮助巡逻。

10月16日 从江对岸发射过来许多子弹。官员派了五人于夜间乘一只小船渡江，试图放火焚烧敌人用来作为总部的房屋。他们点着了火，但五人中有三人被逮捕，并且被活活地剥了皮。道台宣布悬赏三千银两缉拿起义军首领罗老巴^①。……从西藏来的士兵因气候变化而感到不适，有许多人患疟疾。

10月23日 食物越来越稀少和昂贵。城内不再杀猪。……敌人已加强他们的阵地；人们肯定地预料本周将另有一次战斗。知府派往总督处的一位秘密信差，在回程中直接穿过起义军防线之后，于20日抵达此地。我和他在我的书房中闲谈。他说：起义军人数很多，而且很凶狠。有几天夜间，他们曾企图爬上城墙。他们把草人钉在柱子上，并且把它们举起来，以便了解卫兵是否在睡觉，因此经常互相射击，有一些梯子被掳获。

10月30日 这是多事的一周。24日，南门外发生了一场决定性的战斗，士兵们占领了那座设防的山头，它处于完整状态。他们仅捉住几个人，并带回一个首级，但他们掳获了大炮、枪枝、旗帜及战利品。25日，紧靠城墙东北角外的一座大庙被焚毁。敌人曾利用该庙作为营房。……29日，动乱爆发前便已外出巡回传

^① 译音。

教的那位天主教士，由于得到起义军首领的保护，通过敌人防线回到此地。30日，起义军撤营，沿江而下，事前并无预兆。士兵们出城，在乡下搜寻。

11月6日 虽然运动的首领们公开宣布他们不搜寻外国人或教会成员，但各支流氓队伍为所欲为，任意进行抢劫或迫害。……我越过城墙，出去看索尔吉斯特的房屋。南门外一带已完全遭到破坏。乞丐们仍在掩埋尸体。他们说：他们已埋葬了一百具以上，但还有更多的死尸。我们从恶臭中认为此事属实。在10月6日的战斗中，总共一定有六百人左右被杀。我发现索尔吉斯特的房产已被毁坏。

11月13日 起义军撤离雅州后，顺流而下，沿途掠夺了一些地方，并轻易地占领了洪雅。官吏外出逃命，装成乞丐抵达此地。士兵们前往援救洪雅。据说，当士兵们逼近时，起义军前往嘉定，有人报告嘉定的情况很混乱。两名法国旅行者和知县在宁远府被杀，但我们知道，知府已控制了局势。我们希望韦尔乌德一家和汉弗莱一家都安然无恙。

一名军官带着一队士兵被迫投奔起义军。他们在起义军队伍中呆了一个多月之后，起义军以为他们已被争取过去，打算要他们去攻打清军，当时清军正从清溪县来到关口。起义军已在山上的大关加强了防务，决定阻止这批部队前去会师。按照同士兵们事先商定的计划，他们排成一列，开枪打死了操纵大炮的人，击中了其他的人，俘获或杀死了五名首领。他们把该主要首领带过山去交给统领，统领立即把他斩首。这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这次挫败的消息是起义军自雅州迅速撤退的直接原因。……

第45件附件8 总领事务谨顺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关于我本月21日的信，我荣幸地附上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司道和成都各界（绅商学界）某些代表人物给四川官绅的一项电报通告的译文，该通告已在22日的《成都日报》上发表^①。

在该通告中，总督阁下对于“自路潮震撼，不幸而出于过激之行动”一事被迫表示深切的悔恨。他肯定地说：现在只不过是“始图补救”，但“全体官绅，联络一气，协力同志，共维大局。”

当然，这意味着赵制台虽然还没有交出他的权力，但已经把他要采取的行动方案交给成都上绅控制。此时他同意作出很大让步而未提及中央政府一事是很有意义的；的确，如果不是在唯一的一处地方提及皇帝（原文是“君父”），该文件可能是由一个独立国家的内阁发布的。

由此产生的或至少是许诺的最显著的变化，是完全取消“新”、“旧”厘金及该省票捐。盐斤价格（此地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食盐是由政府垄断的）与诉讼费一起将予以减少；至于其他捐税，如税契和糖捐、肉厘等，也将考虑核减。“盐斤加钱四文”，如变换为英国计量单位，该项必需品每一又三分之一磅大约增加一便士的十二分之一；取消它似乎是一项微不足道的而且几乎是嘲弄性的恩惠。然而，该电报通告声称：这项捐税每年总共有二百二十万两的收入。诉讼费每案“收钱十千文”，相当于十八先令左右，同英国的诉讼费比较起来，确实是公道的。税契无疑是很糟糕的，需要修订。

免征目前受害地方的田赋（最近半年）并给予抚恤，是在类似情况下常有的事情，但直到现在为止，此事是皇帝方面的恩惠，而不是地方当局给予的。关于“团保”或地方团练的适当职责问题，总督也许可以根据自己的倡议和权力加以处理，而不提交朝廷。

① 原件题为《署督部堂与四司两道及各界绅耆致全省官绅电》，全文见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486—488页。

可是，他在上折奏报此事时肯定会说明他的意图。在目前情况下，丝毫没有提及这种意图。相反，作为“目前弭乱标本兼治之策”的两项条款，被说成是经本省高级官员和地方士绅联合会议“公同认可的。”

总之，由四川人治理四川的思想已露端倪。仍待了解的是：四川不满现状分子一方面与赵尔丰之间，另一方面与武昌革命党人之间，所必须达成的协议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性质。

务谨顺谨上 1911年11月25日于成都

第46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1月15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附上英王陛下驻上海总领事的一封来信的副本。该信报告本月20日法、德、英、日、俄、美等国向唐绍仪阁下和伍廷芳阁下提出同文照会，并且说明他们接受该照会时所采取的态度。

朱尔典谨上 1911年12月28日于北京

第46件附件1 总领事法磊斯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我荣幸地报告：昨天收到您的电报后，本领事馆职员立即着手为向议和代表唐绍仪阁下和伍廷芳阁下递交同文照会的六国总领事各准备三份副本。

中文译本是宝上德先生草译的，并承我的日本同事盛情前来提供帮助。在有吉明先生的要求下，我校订了他们那篇很困难的译作，并试图使译文除绝对必要外不背离原义。

四时，六国领事们在首席领事卜利先生^①的办公室会面，都得到了英文本的副本；中文译本是晚些时候送给他们的。大家商定：我们应于本日上午在议和代表们住处最近的俄国领事馆集合，共同前往递交各自的照会，首先递交给唐绍仪先生，然后递交给伍廷芳先生。

我们按时执行了这项安排。

唐绍仪先生简单地答复说：他将把这项友好关心的行动通知他的政府，肯定该行动将得到很高的评价。他将同伍廷芳博士商量关于提出一项同文的书面复照。

伍廷芳博士询问，正在等候的那些记者是否可以出席。我们表示了反对意见。后来，他表示感谢六国的良好愿望；他本人主张和平，是好几个和平团体的成员。对于他希望避免战争一事，我们不需要任何保证。但是，不管他怎样倾向于和平，他也必须不忽视他本国人民的意志，因为他们正在为争取获得自由和一个较好的政府而奋斗，这些目的是任何匆忙拼凑起来的解决办法永远不能实现的。因此，如果双方商定和约，它必须建立在可靠的和坚实的基础之上，以便保证今后不再引起革命。

法磊斯谨上 1911年12月20日于上海

第46件附件2 同文照会

〔一〕驻北京公使馆奉本国政府的指示，向议和代表作下列非正式的陈述，因为议和代表的任务是要为恢复中国的和平商定条款。

〔二〕政府认为，目前中国战事的继续进行，不仅使该国本身，而且也使外国人的重大利益和安全，将遭受严重危险。

① 德国驻上海总领事。

政府继续在采取它迄今所采取的绝对中立态度的同时，认为有责任非正式地吁请双方代表的注意，需要尽快达成一项旨在结束目前冲突的协议，因为它相信此项意见是符合有关双方的愿望的。

第47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1月15日收到

阁下：

关于我12月8日的信¹，我荣幸地报告：清军于11月27日攻克汉阳后，立即开始停战谈判，并已顺利结束。三天的停战期限，已另延期十五天，现又再度延长至12月31日为止。他们打算使该停战协定适用于电报能够到达的全国所有地区，但令人怀疑的是，在所有的战争史上，此类协定的精神和文字是否很少受到交战双方的尊重。双方每天都向本使馆申述该协定遭到破坏。然而，可以说，该协定已产生了两项有用的结果：它使会议能够在上海召开，并且防止了目前在汉口继续发生任何战事。我已尽力劝阻双方在该口岸重新恢复敌对行动。的确，起义军仍占有该省的首府，但长江大致上可以说是代表了立宪的北方和共和的南方之间的分界线，它现在把互相敌对的势力隔离开来；荣誉也是相当公平地由双方分享。如果不是一方对另一方怀有严重的猜疑，在上海会议获得结果之前，指挥官们似乎没有充足的理由说明为什么不暂时住手。然而，由于我不愿出面预先判断谈判代表们所作的努力，我现在还没有向袁世凯提出使汉口中立化的明确建议。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写下我对葛福先生所做工作的意见：他所进行的及时的和有用的斡旋，大大地有助于停止冲突。

¹ 原编者注：参阅《中国第一号（1912年）》，第141件。

七百名日本军队大约订于1月1日到达汉口。

英王陛下驻长沙领事翟比南先生报告说：邮政司阿灵顿先生顶住了革命军政府接管该局的企图。像清朝海关的情况一样，我认为，对外籍人员管理下的清朝邮政自由正常工作的任何干涉，都必须予以坚决反对；我已经指示英王陛下各领事官员，在遇有必要的一切情况下，为实现此项目的提供帮助。

翟比南先生告诉我，用他那强有力的但很确切的话来说，当地政府受一群武装暴徒的支配。革命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之一，就是使所有的军事纪律遭到破坏；军队已迅速实现他们新获得的权力。只有在他们获得大为增加的军饷和预付款项之后，奉命开往湖北的五万名军队才同意出发，从而避免了一场激烈的武装暴动。人们可以相信，留下的两三名军队在今后若干时间内将使官员们提心吊胆。自从发生这些事件以来，已有一艘英国炮舰驶往长沙，它目前将在该处停泊。

英王陛下领事又说：该省其他地方是比较平静的，虽然有几个地区土匪猖獗。

在江西的省城南昌，局势不是完全令人满意的，因为当地首领软弱无能，而且存在着一个称为“洪江会”（或红江会）的无政府主义的结社。据英王陛下驻九江领事所说，该会仅仅在等候时机，不问青红皂白地进行抢劫和破坏。马毓宝都督已自九江前往调查；他有可能顺利地把事情纳入正轨。外国妇女和儿童已被撤至九江。

芜湖仍然是平静的，这大概是由于该口岸泊有三艘以上的外国军舰。另一方面，由于革命军内部各敌对派别之间时常争夺最高权力，省城安庆已成为劫掠、焚烧和各种恐怖行为的场所。据说，该城有一半已被焚烧，十分之九的居民已经离去。在大部分腹地，骚扰教堂之事正在酝酿，或者是已经爆发，但还没有人报

告对外国人或财产所造成的实际损害。

鉴于广州处在以前的土匪头目控制之下，奇怪的是，该处普遍以维持秩序为借口。刘永福的重新出现是令人很感兴趣的，他是1884年在越南东京抵抗法国人的黑旗军著名首领，年龄已七十五岁。都督把最近招募的所有部队的指挥权交给他，但陆兰清和其他两名以前的土匪对他要求这项任命提出异议。他们拒绝承认刘永福，因为他年龄太大，办事方法陈旧，而且有吸鸦片烟的习惯。由于刘永福大约有四万名旧部下，广州似乎很可能为了它本身的缘故而发生一场内战。旧制度的代表龙济光提督对局势所作的概括是“非常险恶的”。他说，全省都遭到土匪的蹂躏；宣称：他能够制止骚乱，但如果他离开广州，骚乱就将爆发。

自广西省于11月7日在桂林宣布独立以来，省城没有发生骚乱。梧州和南宁这两个西江口岸的贸易由于海盗行为复活而完全陷于混乱状态，但梧州代领事科尔斯先生报告说：该省没有排外情绪的迹象。

德为门先生报告说：镇江人民重新恢复了他们正常的职业。程德全都督和林述庆都督之间存在着不小的猜忌，现已显然平息了他们的分歧，共同倡议任命郑权为镇江军政分府都督。如果战事重新开始，他们已选择镇江作为一支北伐军的基地。根据英王陛下领事照我的通知提出的建议，江苏北部的传教士大都已经撤退。少数几名传教士决定由他们自己判断是否撤离；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打算继续施加压力。在各个地方，混乱的程度有很大的差异；只要是人们所担心的危险仅来自土匪方面，就象是目前的情况一样，而且只要是没有普遍的排外运动发生，据我看来，当地的消息似乎是最可靠的依据。

自11月14日以来，云南的情况似乎愈益恶化。12月10日，思茅税务司来电说：局势是无法忍受的，他将于该日离开那里。第

二个消息是：最近招募的一标新兵从蒙自开往云南府途中，感到极为不满；省城正在加强防务，做好准备以对付人们所预料的一次攻击。12月16日，省城内发生武装起事。一些士兵试图夺取军械库，但经过短暂的战斗之后被镇压下去。他们显然是属于所谓“哥老会”的结社，该会多年来在煽动中国的乱事方面起了显著作用。在西安府大屠杀事件期间，这个组织表现得极为活跃。由于喜好杀人和盗窃而已声名狼藉的组织重新出现在偏远的云南和贵州两省，对全国来说是一个不好的预兆。

四川已于11月27日宣布独立。总督同意交出他的关防，并重新担任他的边务大臣职务，但在离去之前，将留在成都向新政府提供建议。总督阁下与夺权者签订的协议规定：目前将照常补贴驻防旗兵的大米；行政和司法官员可随意继续留任或离职；保护所有的官员不受侵犯；对满、蒙、汉、回各族人一律不加区别。

几天以后，有消息传来说，端方阁下在资州被他自己所部士兵处死。我们有非常充分的理由担心这个消息是真实的。显然，这个卑怯胆小的行动主要是由于贪婪而引起的。他们肯定不可能找到以政治上的需要作为任何借口，因为自从端方开始奉命执行特殊任务以来，他完全致力于安抚四川人，而且除了想安全逃回北方之外，他似乎已放弃一切主意。

四川省最西部的巴塘，也被卷入了起义之中。传教士们均已逃走，其中有些人逃往云南府，有些人则逃往阿萨姆^①。人们没有报告他们的伤亡。

恰好在停战协定签订前，清军向山西境内推进，占领了起义军在山西铁路线上娘子关的阵地。起义军作了微弱的抵抗，向四方逃散。后来，北京方面由于考虑到停战协定的条款，下令停止

① 在印度境内。

拟议中的收复太原府的进军。在该附近地区的一名英国军官于12月15日报告说：铁路线上的所有车站又飘扬着龙旗；太原府是平静的，街道上的警察已经抛弃了他们的革命徽章。起义军主力部队已向南退往平遥，目的可能是同那些在陕西活动的起义军携手联合。

山西北部遭到土匪的蹂躏。

山东重新效忠于清朝一事，是通过吴鼎元的影响实现的。吴鼎元是清王朝的有力支持者，最近被任命为第五镇统制，他同该镇的长期联系使他很受人们的欢迎。这个变化又一次是很平静地实现的；各界代表大会已销声匿迹；在这次不很有启发性的显示地方政治的整个期间，孙宝琦巡抚顺利地保住了他的职位。他甚至默许烟台方面目前保留它自己的独立地位的愿望。烟台这个口岸因缺乏现银而处于十分窘迫的境地，但除了12月17日夜间出现过一次小的争吵之外，还没有爆发骚乱。德国、美国或日本军舰经常泊驻烟台，是保护外国人的一个保证。

驻盛京代总领事报告说：虽然在一两处地方发生过一些骚动，但没有任何事情证明报纸上关于广泛发生骚乱的报道是正确的。已经发生的乱事业已平息或被镇压下去。

朱尔典谨上 1911年12月27日于北京

第48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1月15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随信奉上今晚发布的一道谕旨的副本^①。该谕旨

^① 原件见《宣统政纪》，卷42，第6页。

说：关于实行君主立宪或共和的问题，对中国外交和内政的影响极为重要，它不能够由朝廷或人民中的任何特殊集团作出决定，而只能取决于国民所表示的意志。它劝告完全停止敌对行动，并建议为准备召开一次国民大会作出安排。

该谕旨所用的词句是和解的；虽然它所包含的建议也许多少有些不切合东方国家的实际，可是，它似乎提供了唯一可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我担心，该问题是几乎不能通过和平方法解决的。

朱尔典谨上 1911年12月28日于北京

第49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2年1月15日收到

阁下：

我在本月14日的信中，曾荣幸地报告为了同陕西省的传教士和其他外国人取得联系而采取的步骤。

潼关军事当局现已通知总理大臣说：对于沿该路线前往的任何援救人员安排一次有效的护送，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刚从东京抵达北京的瑞典公使倭伦白先生，对于那些在陕西和更远地方的许多瑞典传教士的处境感到特别关心。昨天，我邀请他参加日、美两国公使也出席的一次会议，在会议上对整个问题作了充分讨论。我向倭伦白先生说明了我的同事们和我与袁世凯阁下会晤的结果，并且建议说：由于考虑到河南和陕西交界地区的局势很可能现已有所改善，所以当他拜访总理大臣时，他应当再一次提出这个问题。我还把索尔比先生所率援救人员的最新消息通知了我的同事们。

我昨晚获悉曼勒斯先生刚从西安府抵达此地，今晨便请他前来，并邀请我的一些同事们来听他谈所经历的事情。曼勒斯先生是年轻的邮政官员，最初有人说他已在西安府被杀。

曼勒斯先生说：他离开西安府的日期是11月30日，即起义后的一个月零九天。他在起义军统领的劝告下，没有携带行李或粮食（只带了一条睡觉用的麻袋），除了该统领提供的两名士兵作为护卫人员外，没有人伴随他。在陕西东南的龙驹寨，他乘船沿丹江而下，他的护卫人员换了两名地方团练。这两名团练在河南边境附近离开了他；不久之后，当夜间在浅溪中间停泊的时候，他携带的银子统统被抢走了，这些银子是起义军首领们给他供旅途之用的。他所经过的地方极为混乱，并亲眼看见到处流窜的匪徒们进行抢劫的许多场面。在越过边界进入河南之后，他发现地方较为安宁，但自浙川厅开始，他要翻山越岭，有一段艰苦的旅程，因为他在浙川离船上岸，经过南阳府，直到抵达京汉铁路线上的许州，然后乘火车前往北京。在他经过河南的这段旅途中，他有荆紫关清军当局提供的两名护卫人员。

至于西安府的情况，曼勒斯先生证实了我们已经收到的关于在头两三天内屠杀满族人的报道。他估计普通的满族居民有两万人，并确证了肖乐克先生所说的大约有一万人被杀一事。他认为，大约有五千人已经逃走，其余的已经自杀。他不相信有一百多名汉人阵亡，因为满族人的抵抗不是很坚决的。然而，他把屠杀事件的产生归之于满族人在同意投降后，仍继续进行零星的抵抗。他获悉，贝克曼夫人、瓦特尼先生和六名儿童的被杀是十四名四川轿夫干的，因为这些轿夫认为，口号仍是以前义和团所高呼的“扶清灭洋”。在干完了他们的血腥行动之后，这群暴徒请求领赏，但他们都被立即斩首，这样便暗示应保护外国人。

当秩序相对地说来得到恢复之后，立即派出十五名骑兵组成的一支队伍，护送附近地区的传教士们进入城内；在周围约二十英里以内的传教士都已安全地进城。在最初两三天内，得不到任何供应，但后来所有附近村庄把许多车蔬菜等食物送进城内，自

愿交给新的行政当局，而不要报酬。秩序绝没有完全恢复：商店都已关门，起义后一个月才开始营业，因为违者予以没收。城内的外国人如果没有警卫人员，从来不离开他们的住宅。此外，因为有人报告说回族将领马安良将率领一万人前来攻城，他们由于惊慌而经常担心爆发另一次起事。

曼勒斯先生又说：一大伙外国人约六十人，包括二十名日本人在内，将于12月3日离开西安府，试图到达汉口。他们将沿着他已走过的那条路线，直到荆紫关为止，而从该处向南前往汉水沿岸的湖北老河口。他们将由四十名骑兵护送到龙驹寨，并携带武器和粮食，而曼勒斯先生表示担心，这将在途中激起上匪的贪心，并使他们有遭到攻击的危险。他认为，为了那一伙中的妇女和儿童，他们将至少需要三十顶轿子，每顶轿子由三人抬着。那一伙人总共将有二百人左右，在他们必须过夜的陕西那些可怜的小旅店中，住宿将有很大的困难。据美国公使最近收到汉口的一份电报说，预料该伙人将于本月22日抵达老河口，但曼勒斯先生认为，由于水浅，旅途将需要更长的时间。曼勒斯先生说：除了杨格医生和夫人将同那伙人一起离开陕西外，肖乐克夫妇和其他的英国浸礼会成员仍留在西安府。

朱尔典谨上 1911年12月29日于北京

第50件 布坎南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1月15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附上俄国外交部在今天《官方信使报》上发表的关于蒙古的公报的译文。

布坎南谨上 1912年1月11日于彼得堡

第 50 件的附件 俄历1911年12月29日
(公历1912年1月11日)
《官方信使报》发表的俄
国外交部正式公报

蒙古人已在库伦宣布独立，并推举他们的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为汗，吁请俄国给予支持。俄国政府在答复这项要求时，建议蒙古人采取克制行动，并努力谋求同中国达成协议的基础。俄国驻库伦领事馆通过它的劝告，阻止了对伊犁至恰克图电报线的破坏以及对库伦大清银行分行的抢劫，并且帮助了清朝办事大臣三多，使他能够离开蒙古时自由经过俄国领土。

后来，被北京政府任命同蒙古人进行谈判的高级官员奎芬，询问俄国驻北京代办，他在这些谈判中是否可以依靠俄国驻库伦领事馆的友好调停。与此同时，蒙古人请求俄国政府在他们与中国人之间进行调停。

俄国政府认为有可能满足这些要求。由于认识到只有保证蒙古人的自治制度，中国人与蒙古人之间才可能达成一项协议，所以俄国政府认为，应将这项协议包含在中国人保证不侵犯该制度的某项法令中。众所周知，蒙古人认为清政府在蒙古采取的下列三项措施是侵犯该制度的，即：在该处设立中国的行政机构；成立中国的正规军队；以及中国人在蒙古领土内定居。因此，在答复北京政府通过它的代表奎芬提出的调停要求时，俄国政府指出上述三点作为中国人与蒙古人之间可能达成协议的基础。

同时，俄国政府承认：只有蒙古人清楚地认识到，该国采取的发展措施能获得俄、中两国政府的同意，而且俄中两国之间关于蒙古事务不存在任何分歧意见，蒙古才能够实现真正的安宁。

由于这个原因，俄国政府认为，对于蒙古实行的一切必要措

施，无论其性质是行政的、经济的还是文化的，表示它都愿意提供友好支持，这是符合俄中两国和蒙古人的利益的。

俄国同意按照有关各方要求在中国人与蒙古人之间进行调停的上述基础，已由俄国驻北京代办通知清朝政府，另外还补充说明：如果清朝政府同意在上述特定的基础上建立中蒙关系，俄国外交将致力于促使蒙古人不断绝他们同中国的联系，并遵守他们所承担的义务。

俄国根据这些条件进行的调停是被接受还是被拒绝，将取决于清朝政府的善意。

俄国不想干涉中国发生的战事，而且对蒙古不怀有侵略阴谋，可是，它对于在邻近西伯利亚的该地区内建立持久秩序一事不能不感到关切，并且它在该地区内还享有很大的商业利益。蒙古人与中国人之间的武装冲突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因为我们的利益将不可避免地因此受到损失。由于考虑到这个问题，从而首先促使俄国政府表示愿意在中国人与蒙古人之间承担困难的调停任务。蒙古人对中国人是深怀敌意的。

另一方面，俄国在蒙古的这些重大利益，不允许俄国政府忽视该地区实际上已经建立的政府。如果蒙古断绝它同中国的联系，俄国政府完全希望看到中蒙之间停止争端，但它将被情况所迫，不得不同蒙古政府发生商务上的关系。

第 51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2年1月15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关于我昨天的电报。

袁世凯的私人秘书告诉我说：中国大部分地区既然都已宣布赞成共和，所以决定立即接受这个不可避免的命运，因为召开国民大会决定该问题将会拖延时间及带来危险。他说：隆裕太后不久将发布一道谕旨，宣布满清王朝退位，并授权袁世凯处理临时

政府工作，直到选举共和国总统时为止。

同时，自今天起，停战协定又重新延长两星期。

第 52 件 总领事额必廉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1月17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随信奉上我写给英王陛下驻北京公使的一封信的副本，该信记载了云南省直到11月底为止的事态发展。

额必廉谨上 1911年12月6日于云南府

第 52 件的附件 总领事额必廉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我荣幸地报告本省直到11月底为止的下述情况。

11月5日，云南府贴出了一张告示，命令人民在五天的期限内剪掉他们的辫子。可是，人民普遍没有理睬它，因为它没有说明不遵守命令时应给予什么处罚。

但是，期限届满后，各主要街道上布置了士兵，用大剪刀剪去那些仍然留发的所有市民的辫子。结果是不可思议的。在十二小时内，城内看不见一条辫子，现在甚至在附近的村庄内，大多数人已经没有辫子。那些不遵守新规章制度的人们，当有事前往城郊的时候，在他们也许碰巧经过的最近那个警察哨所内，有人替他们剪去发辫。

一般说来，新政府已维持良好的秩序，如发现人们犯有抢劫或勒索他人钱粮时，立即予以枪决，然后斩首示众，作为对其他的人的一个警告。有一定数目的士兵不时逃亡。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携带武器，大概加入大路上的土匪，这些土匪在本省各地日益活跃。在另一些情况下，当他们不愿侵害他人性命时，他们则把他们

的步枪扔入池塘和沟渠中。政府已悬赏收回这些步枪以及许多惊跑或被盗的马匹。新政府请人捐赠大米和现银；人们一度担心它将派兵至城内各富户收集这些东西，但这种担心证明是没有根据的。

11月13日，前总督李经羲获准动身前往越南东京，由学生志愿兵护送至边境的河口地方。可是，他对于那些护送人员的意图感到十分担心，因为他们似乎对他很不尊敬；他指望得到两位法国领事官员的保护，韦礼德先生^①伴送他至盘溪，而伯伟先生^②伴送他直到边境。人们都很清楚地知道，李经羲是一个很有钱的人。这里普遍的印象是，他以很高的代价换得了他的自由，这笔赎金将填满已经枯竭的地方库藏。夏先生和曾先生^③于16日晚上被偷偷地带出城外，并于次日早晨乘头班火车动身前往越南东京。

大约从十日起，开始收到关于本省普遍不安全的令人忧虑的报告，而且我得到警告说：外国人外出旅行时，应当有一支强大的陆军护卫队，以保护他们，防止大路上的土匪。他们已对中国人发动多次袭击，但直到目前为止，外国人还没有受到骚扰。有一次，当邮件在铁路的一处岔道上从一列火车搬运至另一列火车时，遭到了土匪的袭击，但二十名卫兵轻易地击退了那些土匪，其中有两人被击毙。13日，有消息传来说，一名法国传教士在四川会理州遇害，该地在云南府以北大约相距十二天的路程。后来，我们听说：勒江德考察团在宁远府附近遭到攻击；四川（至少是距云南府最近的那部分地区）普遍处于混乱状态，清军和革命军一起战斗，独立地区的傣族对双方任意发动进攻。由于这些乱事似乎可能蔓延到云南，而且考虑到不遵守法律的风气普遍滋长，我的法国同事韦礼德先生和我认为，最好劝告所有那些不是因为商务上的

① 法国驻昆明（云南府）总领事。

② 法国驻蒙自领事。

③ 指交涉使夏偕复和粮道曾广铨（曾国藩的孙子），他们在云南起义时躲入法国领事馆。见《辛亥革命》（六），第245页。

原因而绝对需要留在本省的人们撤离，这样仅留下较少的人在最后时刻逃走，如果有必要采取这一行动的话。我们建议所有住在内地的人至少应前来云南府，做好可能要逃走的准备。由于我这项建议的结果，有两名将返回安宁州附近的工厂从事电灯安装的德国人，决定撤至香港；将要休假的一些传教士以及将前往上海电报局的赫尔斯冈先生和夫人，都提前动身。到11月17日，城内各种令人不安的谣言变成为一项传说：一部份士兵打算发动兵变，杀死政府的成员，普遍进行抢劫，然后解散。时间可能就在该日夜间，但更可能是次日夜间。我同韦礼德先生进行了一次谈话；我们同意，欧洲各国的所有妇女和儿童尽快离开本省是可取的。

18日晨，我写信给中国内地会驻此地的秘书，对他发布一道正式命令，即英国妇女和儿童必须撤离（本省没有同该教会无关系的英国妇女）；我极力劝告美国人庄士敦女士装作一名英国臣民，她也得到了撤离的命令。同时，由于有可能发生起事，我还极力建议在我照管下的每一个人于次日夜间住在城外。韦礼德先生和我就即将发生起事的问题拜访了蔡锷都督，劝他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都督假装不相信有可能发生任何事情，并向我们保证说：城内和附近一带一切都很平静；关于法国军队在前来云南府途中已抵达蒙自的谣言（这个谣言在士兵和市民中间几乎引起惊慌），已遭到人们普遍的怀疑。按照我对其他的人提出的建议，甘蒙先生和我住在城外的法国饭店，第二天返回领事馆，发现它完好无恙。表面上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但我们后来听说：起事实际上已经爆发，但由于都督的警惕性而立即被镇压下去。都督命令一大批可靠的部队整夜处于戒备状态，并准备在他的都督府内抵抗围攻。后来，又有人两次企图发动兵变，但不是遭到蔡锷都督的阻止，便是被他迅速镇压下去。怀有不满情绪的士兵主要是属于从前第七十三标的，他们认为，在发动革

命那天夜间洗劫各衙门所得的战利品中，他们没有获得公平的份额。他们还有一个想法，即革命的结果仅仅是由蔡锷都督代替李经羲总督——由斯托克国王代替洛格国王¹⁾。关于那些可以被认为是对他们采取革命行动的奖赏，我听说许多士兵所获得的掠夺物的价值，每人不少于四百两。我不知道第七十三标的士兵怎么会一无所获。最近，蔡锷都督已发给该标士兵每人四十两。

11月19日，蔡锷都督把四十支步枪和六千发子弹送至法国领事馆，此事在当时看来，似乎是他肯定期望外国人进行自卫，而不要依靠他的保护。尽管王先生²⁾向我保证说，革命军政府的成员们都是很好的朋友，在行政工作中绝对团结一致，但是，我有一切理由相信，事实是相反的。有一次，由于激烈争吵的结果，湖南籍的都督蔡锷坚持把主管职责交给云南籍的二号人物李根源³⁾。李根源尽力主持政府工作只有三天的时间，后来便请求蔡锷卸去他的重任。

侨民中的最后一批妇女于11月24日离开云南府。

我曾经提及此地收到四川宁远府的坏消息，现在看来那项消息被过于夸大了。直到11月中旬前后为止，所有欧洲人都平安无恙。下面是写给中国内地会秘书关于宁远消息的信件的两段摘要：

“11月10日 经过使人激动的围困之后，我们都活着而且很好。10月26日，有二百人进城，杀死了知州，然后他们被士兵们赶出了知府衙门。那时，他们大约在离城三英里处扎营。10月29日晨，起义军进攻城门，但很轻易地便被击退。从那时起，我

1) 在《伊索寓言》中，斯托克是一位暴君，而洛格则是一位有名无实的君主。这句话是比喻蔡锷和李经羲的。

2) 此人原名及职务不详。

3) 李根源的正式职务为云南军政府军政部长，但昆明光复时所出告示中他署名为副司令。见《辛亥革命》（六），第228页。

们感到较为安全；援军提供的力量足以于11月4日对起义军的营地发动一次攻击。他们很轻易地被打败了，首领们逃跑，但不久便被俘获。有四名俘虏被处以绞刑，一百五十多人被斩首。阵亡的有一千多人。在黄水塘^①受到袭击的两名法国旅行者（他们是勒江德考察团的成员）住在城内，状况良好；他们丢失了所有的东西，并且受了些刀伤，但他们的伤口现已几乎治好。 汉弗里斯”

“11月11日 我们处于安全的地位，可是妇女们感到相当震惊。象您可以想象到的那样，我们很高兴地再度处于平静状态。就我们所能搜集到的情况来说，宁远至雅州之间的道路仍然不通，然而我认为，士兵们将很快地驱散该处的起义军。商业停滞，大约两个月来没有邮件送到，我们很想再度得到外界的消息。 韦尔乌德”

11月16日，一千五百名士兵，其中有许多人属于怀有不满情绪的第七十三标，动身经过昭通前往四川，很可能是去参加该省民军的战斗，虽然当时蔡锷都督及其参谋人员明确地说，该军远征的目的是要征服和兼并四川省的南部地区，从而使云南这样一个著名的穷省并照例从富省得到大批协饷的省份，将克复妨害它成为一个绝对独立共和国的主要障碍，并把它北部邻省的大量财富运入云南府库。这支部队将是先头部队，还有更多的部队将接着前往。

11月29日，翻译王先生通知我说：由于回民联合一些部落的首领发动反对新政府的起事，所以自腾越至大理府的整个地区陷入无政府状态；在汉族军队与起事者之间，于11月26日在大理府地区的下关附近发生了一次战斗，汉族军队获胜。此地的二号人物李根源率领三千名部队于11月30日动身去增援本省西部的驻军。

① 译音。

参加在上海召开的各省代表会议的云南代表，已于11月30日离开云南府。代表团由蔡锷都督的主任秘书吕志伊先生^①、军政府参议、前任检察厅长张一鹏先生，以及其他三、四人组成。

额必廉谨上 1911年12月4日于云南府

第53件 海军部致外交部函

1912年1月17日收到

先生：

我奉海军部各长官之命，送上驻华总司令官本月17日关于中国起义的一份来电的副本，供外交大臣参考。

格林谨上 1912年1月17日于海军部

第53件的附件 驻华总司令官致海军部电

1912年1月17日发

起义军正由海道运送部队前往北方，有一队军舰护送。我命令英王陛下军舰“肯特”号驶往烟台监视它们的活动，如果它们离开烟台赴任何其他口岸，“肯特”号应跟踪前往。朱尔典爵士同意采取这个行动。

第55件 外交部致陆军部函

先生：

关于您本月11日的来信，我奉外交大臣格雷爵士之命，随信附上我们收到的英王陛下驻北京公使的一份电报的副本，该电报是关于为保护英国在华利益进行军事准备问题的。^②

陆军委员会将看到；朱尔典爵士认为，严重的前景也许使我

^① 当时云南都督府中设有秘书处，处长为周鍾岳，吕志伊任秘书。此处记载疑有错误。

^② 原编者注：见第40件。

们不可能从华北指挥部抽调部队供华南之用。

兰利谨上 1912年1月17日于外交部

第56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2年1月18日发自北京，次日收到

今天，我前往祝贺袁世凯幸免于难^①。

他表示自己很高兴能有机会和我讨论局势。他已经建议两项解决办法：

(一)发布一道谕旨，授权他在那些已聚集在南京和北京的各省代表选举共和国总统之前（选举大约在一周后进行），按照共和的原则处理临时政府工作。

(二)由一道类似的谕旨授权他，在特别召集的国民大会选举共和国总统之前，处理临时的共和政体问题。

第一项建议的好处，是使新政府能够立即着手进行恢复秩序和平息全国的工作，因此被认为是更可取的。他表示：关于这一点，已经同南方的领袖们达成一项谅解；他打算把政府的地址迁往天津几个月。对于这个迁移，他有两个理由：第一，必须完全断绝旧制度的影响；第二，民党首领们不会因为此时前来北京而危及他们的生命。

他说：朝廷承认，国民意志必将获胜。他向我保证，他办事始终是严格服从国民愿望的。

我猜测该谕旨将于一周内发布。

第58件 代领事史密斯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1月20日收到

阁下：

^① 指1912年1月16日北京革命党人谋暗杀袁世凯失败一事。

我荣幸地随信附上我写给英王陛下驻北京公使关于腾越局势的一封信的副本。

史密斯谨上 1911年12月13日于腾越

第58件的附件 代领事史密斯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继续谈我12月4日信中所说的事情，我荣幸地报告：由于张文光的愚蠢野心所引起的腾越与大理府之间的纠纷，已经到了严重关头，然而此事仍有希望可以获得解决，而不至于在本地造成动乱。

正如上面提到的我那封信中所报告的那样，自腾越派兵前往大理府，结果引起了一场冲突，腾越的部队遭到挫败并被逐回。后来宣布此次事件中的伤亡人数为二百人；据报告说：在大理府至永昌途中的黄林铺^①，又发生了一次冲突，腾越部队再度被击溃，损失约一百人。伴随着这项消息而来的，还有另一项报道：由于赵藩不愿担任迤西道的职务，由云龙被任命主持该道事宜，并奉命处理张文光的活动问题，将率领一千人向腾越进发。

张文光对这项消息感到惊慌失措，派人去请边务委员赵藩，含泪恳求他提供意见。赵藩从一开始便曾经对张文光以极大的勇气和毅力采取的愚蠢行动提出警告，但他的建议未被理睬。他草拟了一份电报，由张文光拍发给云南府的革命当局，请求召回向腾越派遣的部队，可以任命一位道台和一位同知驻在腾越，张文光等他们到达后便将隐退，腾越的情况可能重新恢复正常状态。龙陵同知这时恰好在腾越，奉命前往大理府向由云龙说项，因为

^① 译音。

他同由云龙的关系很友好，并力图召回派往腾越的部队。

对于按照这些办法求得解决并使张文光去职所抱的希望，注定了立即受到严重的打击。在龙陵同知动身赴大理府之前，张文光获悉他以前曾经给云南府方面发过一份电报，说明腾越的真实情况，而且在谈及张文光时说了一些指责他的话，这也许是理所应当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却几乎是不慎重的。这时，张文光的惊慌变成了愤怒，他逮捕了龙陵同知，并用最残暴的方式立即予以斩首，而不顾前提督和赵藩的反对，他们竭力劝阻他不要采取这个野蛮行动。

由于这个残酷的谋杀事件，和平的前景即使没有消失，也已经大为减少。据说，张文光打算对于人们预料从大理府派出的部队进行武装抵抗。他在抵抗中获胜的机会是很小的，不值得考虑；他也许很可能改变他的主意，因为他以前常常这样做，特别是因为可供他的部队使用的弹药是很少的。

不过，局势是不平静的。当然，对那些有头脑的人来说，关于张文光的暴行问题用电报同省城当局进行联系是不切实际的；同时，张文光通过他的独断专行不断激怒公众的情绪。他对好几种情况处以苛重的罚款；至少对一种情况，除了罚款之外，还处以严厉的刑罚，人们普遍认为，这是由于个人怨恨的结果。虽然此地的人民一般都是很驯服的，但如果大理派出的部队继续逼进，对部队侵犯的担心以及受张文光所作所为的激怒，也许会引起骚乱，这不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当上个月草率匆忙招募起来的士兵对许给他们的饷银感到不满的时候（因为看来是很有可能的），情况就更是如此。

避免发生严重动乱的主要希望，寄托在边务委员赵藩和已退职的张提督身上。赵藩的能力和正直是得到普遍承认的，他在好几个场合下顺利地制止了张文光的狂暴而又愚蠢的冲动，而张提

督的年龄、地位和长期居住在腾越使他在本地绅士中处于领导地位。这两个人正在努力防止一次大灾难；人们抱有希望，他们可能顺利地商定一项妥协办法。

史密斯谨上 1911年12月13日于腾越

第59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1月22日收到

阁下：

关于我上月5日的信，我荣幸地随信附上我按照汇丰银行的要求，写给外务部的一份备忘录的副本，该备忘录记载了关于偿还清政府1895年六厘息金借款及1896年五厘息金借款应于12月摊付的那部份款项没有付还，并且说明了上海税务司根据总税务司的指示为付还这些款项所确定的兑换率。

我的备忘录中所提到的外务部11月20日的通知，是关于上述两笔借款中第一笔借款应分期摊还的款项问题的一件照会。为了使档案材料完整无缺起见，现随信附上该照会的译文以及我11月12日照会的副本，该照会是对我的照会所作的答复。我所提到的外务部11月27日的通知，是关于第二笔借款的备忘录，它已列为前面说过的我上月5日信中的附件之一。

关于将海关岁入现在存入总税务司帐内供偿还外债之用的问题，在未收到某些国家政府对上海各银行家建议的答复之前，已经拖延了一些时日，但明天将举行外交团会议讨论该问题；我相信，我不久将能够报告拟议中的银行家委员会已开始行使它的职权。

朱尔典谨上 1912年1月2日于北京

第 59 件附件 1 朱尔典爵士致庆亲王函

殿下：

1909年4月16日，我曾荣幸地收到殿下关于确定偿还清政府借款的兑换率问题的一封信，其中还特别提到关于清政府1895年六厘息金借款。

该信的译文由北京汇丰银行转交该行上海分行；由于该行经理与上海道台之间接着进行通信的结果，双方商定：上海道台应确定偿还上述借款的兑换率，把前五周内按周摊还的款项订明每期付款的日期。

在关于1911年12月10日应付的分期摊还款项和利息的说明书中，双方商定了下列款项和日期：

11月6日至12日内应支付四万四千八百英镑；

11月13日至19日内应支付四万四千八百英镑；

11月20日至26日内应支付四万四千八百英镑；

11月27日至12月3日内应支付四万四千八百英镑；

12月4日至10日内应支付四万四千八百英镑；

1911年12月10日应付的分期摊还款项总共为二十二万四千英镑。

关于上述事情，我荣幸地通知殿下：我收到北京汇丰银行经理的一封信说，他接到上海分行的电报通知，上海道台声称，由于他没有入款，他不能够为上述款额确定兑换率。

在这些情况下，我将很高兴地了解，清政府关于此事打算采取什么步骤；关于确定兑换率以及随后偿付1911年12月10日到期的分期还款和利息的问题，我荣幸地要求清政府发出指示。

等候赐复。

朱尔典谨上 1911年11月12日

第 59 件附件 3 朱尔典爵士致外务部备忘录

关于外务部上月 20 日及 27 日的函件，汇丰银行现在通知英王陛下公使说：清政府为偿还借款而应支付的下列款额没有在适当的日期支付，即因 1895 年清政府六厘息金借款而应于 1911 年 12 月 10 日偿还的二十二万四千英镑；因 1896 年清政府五厘息金借款而应于 1911 年 12 月 20 日偿还的八万零五百七十九英镑六先令八便士。

上述款额的兑换率，已由汇丰银行同根据海关总税务司指示行事的上海税务司一起，确定如下：

12 月 6 日：四万四千八百英镑，确定每银两折合二先令五又八分之五便士。

12 月 7 日：四万四千八百英镑，确定每银两折合二先令五又十六分之九便士。

12 月 8 日：四万四千八百英镑，确定每银两折合二先令五又八分之五便士。

12 月 9 日：八万九千六百英镑，确定每银两折合二先令五又十六分之十一便士。

12 月 20 日：四万零二百八十九英镑十三先令四便士（这是应付给汇丰银行的半份分期摊还的款项），确定每银两折合二先令五又十六分之九便士。

因此，朱尔典爵士荣幸地通知外务部，以便将此事记录在案；他请求外务部就早日偿还应付款额一事发出指示。

1911 年 12 月 30 日

第 60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 年 1 月 22 日收到

阁下：

我在12月28日的信中，曾荣幸地奉上一道谕旨的副本，该谕旨把实行君主立宪或共和的问题提交国民会议决定。现在，我谨附上两个补充文件^①，它们说明了导致采取此项步骤的情况。

第一个文件是唐绍仪拍发给袁世凯的一份电报。他在电报中说：他个人所作的调查使他深信，东南各省的民情完全赞成共和；满足公众要求的唯一方法将是召集一次代表大会，考虑今后的政体问题。

第二个附件是内阁的一件奏折，叙述了促使派遣唐绍仪前往上海的各项理由，对我本人和其他各国使节的斡旋表示感谢，并且通过摘录唐绍仪电报中的几段话，详述了上海谈判的经过。上折人的结论是：由于革命党人的不妥协态度，加以清朝方面缺乏餉械，使他们除了奏请对唐绍仪提出的召集国民大会的建议由皇族成员予以考虑并获得朝廷的正式批准外，别无其他选择办法。

朱尔典谨上 1912年1月2日于北京

第61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1月22日收到

关于我上月6日的信^②，我荣幸地附上我所收到的英国驻重庆代领事的一封来信的副本，该信对贵阳至重庆之间那个地区的动乱状态又提供了一个事例。那伙传教士，即贵州省中国内地会的温泽夫妇、皮尔逊女士及肖森女士，已于12月3日平安抵达重庆，该信对他们的冒险活动作了叙述。

朱尔典谨上 1912年1月3日于北京

① 原件见《辛亥革命》（八），第222—223、224—226页。

② 原编者注：参阅《中国第一号（1912年）》，第138件。

第 61 件的附件 代领事布朗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我荣幸地报告：11月29日，我收到贵州省中国内地会成员温泽先生要求帮助的紧急呼吁。温泽先生于27日自贵州、四川两省边界的松坎寄来的信说：他在他的夫人和皮尔逊、肖森等女士的陪同下，自遵义府前来重庆途中抵达该地，但现在他们那伙人既不能返回遵义，又不能前来重庆，因为匪徒们切断了那两个方向的交通；他请求我弄到一支卫队，护送他们前来重庆。

我收到该信后，立即写了一封信给綦江县知县，请求他马上派一支适当的护卫队前往松坎。由于邮政处于瓦解状态，所以我于当天派了两名领事馆仆人去送信，指示他们把信送至知县衙门，然后继续前往松坎会见温泽先生。此外，我给了他们一份中文的文件，说明他们这次旅行的目的，并请求允许他们自由通过。这份文件的措词是含糊的，目的是使政府当局和革命党人都可以对他们提供保护。同时，通过教友会的戴维森先生，我把温泽先生所处的困境通知了重庆新政府；他们于11月30日也派了信差前往綦江县。

那两名仆人及时地到达了綦江，并递交信件，但官员拒绝接受，因为该城即将倒向保路同志会一边。于是，我的那两名信差动身前往松坎，但他们没有走多远，便遭到匪徒们的攻击，被抢走了银钱和大部分衣服。他们终于到达了松坎附近的一个村庄陈池街^①，并和温泽那伙人一起回来。在抵达綦江前，匪徒们对那伙人发动了一次袭击，但被温泽先生的遵义府护卫队所击败，匪徒们有二、三人死亡，四、五人受伤。

^① 译音。

在到达綦江后，那封信幸亏被我的信差留给了一位朋友，于是递交给官员；经过一些困难之后，提供了一支二、三十人的护送队。温泽先生及其一伙于12月3日抵达重庆。

布朗谨上 1911年12月6日于重庆

第62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1月22日收到

阁下：

关于我上月12日的信，我荣幸地附上我收到的英王陛下驻南京领事的另外四份报告的副本。

伟晋颂先生来信中所说的事情属于三个题目：南京城的情况；关于各省代表会议的事项；津浦铁路南段所出现的局势。

关于第一个问题，在占领南京城之后，新占领者为重建秩序所作的努力是很果断的，即使不是完全有效的。革命派首领们的嫉妒和个人野心（在这方面，南京经历的事情绝不是唯一的），很有可能引起严重的动乱。这个威胁暂时得到缓和，因为林述庆都督已经不知去向，并带走了拨给他的部队的一大批饷银；在他的心目中，这一行动同他所扮演的把他的同胞从腐化堕落的专制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的角色，显然不是不一致的。

关于召开各省代表会议以及接着讨论今后政体问题的报道，即使有些令人迷惑不解，却是有启发性的。我冒昧地特别请您注意这封信最后一份附件中的结尾部分。它谈到一项解决目前危机的办法，据我判断，这个办法在中国舆论界获得不少人的赞同。这项拟议中的方案是共和联邦制与名义上的君主制共存的一种特殊结合，君主制在表面上被保存下来，作为中国边远地区各藩属的一个团聚点，但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和特权。在西方人看来，这个想法过于离奇，但负有相当责任的人士认真抱有这个想法，这个事实

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并且使外国观察家们给中国开政治药方的危险明白地显示出来，而不论这些观察家们的意图如何善良。

使衍圣公登极的建议不会获得很多人的支持；认为他的姓名对恢复和维持国家统一没有很大影响的想法很可能是正确的。我个人与孔公^①相识，他有五十多岁，是保守阶级的代表。他一辈子生活在山东，不受外国的影响，几乎不适宜作经过改革的和进步的中国的皇帝。

我不清楚，这个各省代表会议在革命派方面的组织结构中占有什么地位。12月23日，我发电报询问英王陛下驻南京领事：伍廷芳博士和黄兴对该机构采取什么立场；他们在当时上海举行的议和谈判中是否根据该机构的命令行事。伟晋颂先生答复说：伍廷芳直接从革命派首领们那里接受他作为议和代表的任命，而不是根据该会议的命令，虽然该会议将批准他缔订的任何协定。他又说：该会议已任命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我认为，一般可以推断，该代表会议要求享有的权力，比通常认为是审议机构所有的权力更加广泛得多。

英王陛下领事12月26日的另一份电报通知我说：虽然温和派人士在保存皇帝的问题上未能赢得革命派的赞同，但前江苏巡抚程德全已在南京接受革命派领导下的一项类似职务，对和平仍然是抱有希望的。程德全认为，在这方面，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孙中山的意见，因为这些意见肯定是有很大份量的；他坚持这种看法，即袁世凯如果对他个人的安全感到放心，将赞成共和。鉴于总理大臣再三坚决否认他具有任何此种意图，该看法获得显著的传播是令人费解的。

12月29日，代表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

① 指孔令貽。

于1月1日抵达南京，并于当天晚上正式就职。

关于津浦铁路的局势，我没有得到较伟晋颂先生报告中所包含的更新的消息。在该处，正象在其它地方一样，敌对的部队相互之间距离太近，甚至不容易保证对停战协定的明白无误的遵守。双方互相任意反复进行指责；这个地方的真实消息是很难获得的，清军指挥官坚决爱好打仗，而他那些革命军方面的对手是否遵守停战协定又是可疑的，这二者结合在一起，使局势加倍地动荡不定。因此，津浦铁路以及它所代表的外国利益处于两面受到夹攻的地位；在缺乏比言词更有力的任何论据以维护铁路中立的情况下，它们在不是不可能重新发生的冲突中的前景是黯淡的。然而，我认为，只有在最后迫不得已的时候，才应撤退铁路上的英国雇员，因为他们留在那里，对纪律败坏的军队所具有的破坏本能构成唯一仅存的精神上的约束。

朱尔典谨上 1912年1月4日于北京

第62件附件1 领事伟晋颂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关于南京的形势，我荣幸地报告如下：

今晨，我的文书通知我：署理江宁布政使李瑞清先生已在他家中避难，似乎是由于担心被林述庆都督所暗杀。据李瑞清先生说，都督要求他交银二十万两，这不仅超过了藩库中的所有余款，而且是一种征用，他无论如何是不能同意的，因为他作为清政府任命的一名官员，他只能把交给他管理的银钱移交地方绅士委员会，他们可以随意决定是否把银钱交给都督。可是，林述庆都督已对他说清楚，他想要银钱，必要时将使用武力，已派了一支卫队前往布政使衙门执行他的要求。这支卫队到达后，李瑞清先生认为慎重的办法是藏匿起来。

程德全都督于昨天早晨抵达南京：在把林述庆都督逐出总督衙门的企图失败之后，他便和徐绍桢将军住在一起。这两位官员显然共同认为，他们自己的力量足以向林述庆挑战，因为他们已经通知他：如果他试图抢劫藩库，他便将用他的脑袋为他的鲁莽行为付出代价；好象是为了消除人们对他们的意图的严肃性所抱有的任何怀疑，他们于昨夜把黎元洪的所谓代表许先生当做一个例子，因为他被发现犯有欺骗、盗窃以及诱拐妇女等罪行，而且被处决。据说，在他的房屋内发现了十五名年轻的妇女和四万两现银。今天下午，我听说，林述庆已从藩库撤回他的卫队，并服从程德全都督的权威。

程德全都督于今天中午前来看我：由于他向我说明他的拜访是非正式的，所以我在我的办公室内接待他时没有任何礼仪。他告诉我，林述庆都督将立即前往前线，那时候他（程德全）将是南京唯一的都督，虽然黄兴可望于两三天后到达，作为革命军的最高司令官，将成为他的上级。目前，南京将是共和国的首都，但最后首都将在北京。陪同程德全先生而来的，有一支很强大的武装卫队。象目前在南京的每个其他重要官员一样，人们认为他也害怕被林述庆所暗杀，林述庆具有一个很可怕的名声，但这个名声可能是他不应当得到的。

关于张勋提督的最新消息是，他已经到达徐州府。他在沿铁路线北上途中所遇到的抵抗，似乎是毫无效果的：从他停留的地方到处见到许多首级一事看来，他必定是迅速击溃了抵抗。他率领约一千人同他一起乘火车到达徐州，留下两三千人在后面步行。唯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临淮关与蚌埠之间的地区。革命军破坏的那座桥梁，大约在浦口以北铁路线上十一英里的地方，它似乎表明，破坏该桥梁的目的是防止张勋提督回来，而不是阻挠他离去。我从李瑞清先生处获悉，两江总督和江宁将军没有和张勋提督在

一起，而是当南京投降的时候他们分别逃出了南京。

南京城是平静的，但林述庆都督的举动正在引起很大的不安。据说，在付给他二十万银两之前，他拒绝离开南京。仍继续发生一些抢劫事件，主要是抢劫那些属于所谓支持清方的人们的房屋，但这方面的情况并不比张勋统治下更坏。

伟晋颂谨上 1911年12月7日于南京

第62件附件2 伟晋颂领事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继续谈我本月7日信中所说的事情，我荣幸地报告如下：

我于本月8日对程德全都督进行了私人的回访。程先生接待我的那间屋子充满了其他的客人和随从，他们挤在我们的桌子周围，听我们谈话。然而，当程先生一旦了解到我将对他谈及议和谈判一事时，他便立即请我走进隔壁的房间，即他的卧室，我们在那里能够不受干扰地继续我们的谈话。他向我解释说：他和革命派的其他大多数首领们已充分认识到，毫不拖延地商定一项和平解决办法，对中国的利益是极为重要的；他们打算尽最大努力促其实现。可是，他们不敢公开这么说，因为在参加这次运动的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们中间，对达成任何妥协具有最强烈的反对意见。伍廷芳先生将是他们在可能举行的任何谈判中的代表。他向我保证，伍廷芳先生和黄兴先生都同意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程德全先生于次日早晨动身前往上海；预料他将于今天在黄兴先生陪同下由上海回来。

本月9日，我接待了马相伯先生^①的来访。他通知我说：他已被任命为当地外交司长，并将料理我可能不得不致函地方政府

^① 即马良。

的有关任何事情。马先生从前是李鸿章的幕客之一，现在是江苏谘议局的一名成员，能说很流利的法语，而且有很好的声誉。我从他那里获悉：预料除甘肃外，中国所有各省谘议局的代表都将于十天内到达南京，并将举行会议；除了其他事项之外，会议上将投票决定今后中国的政府究竟是共和还是君主立宪。他知道，革命派代表伍廷芳与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和梁敦彦之间，也将在此地举行议和谈判。马相伯先生对于双方达成一项使满清政府感到满意的解决办法一事，不抱任何希望；因为即使决定政府的形式采取君主立宪，革命派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同意延续目前的王朝。如果他们必须要有一个皇帝，他们的选择很可能是孔子的后代衍圣公孔令贻。他认为，摄政王的辞职对满清的事业害多利少，因为它意味着现在朝廷幕后的掌权人物是隆裕太后，而摄政王是远比隆裕太后更可取得多。他认为摄政王的垮台是由于宫廷的阴谋所造成的，而不是因为具有对革命派进行安抚的任何愿望。

目前在南京的官员中，唯一的另一个前来本领事馆访问的是黎天才协统，我曾经说过他指挥部队占领老虎山炮台。他告诉我说，打算派两支军队前往北京，一支从汉口出发，一支从浦口出发。大约有一万人已开往武昌去协助黎元洪都督；他们现已开始组织浦口的部队。这支部队将过些时候开走，因为他们必须训练新兵。

我听塔克先生说：张勋提督仍在徐州府，他和他的部队住在该处的列车上，这显然要使铁路主管人的利益蒙受损失。我应当说明，该主管人系徐州府籍，而且是该城中最有钱的公民。人们普遍了解，张勋提督已下令停战，并前往济南府，但他大概正在等候他留在滁州的部队同他会合。

南京的情况相当平静，但缺乏现银发放军饷使官员们颇感忧虑。昨天，浙军几乎发生兵变，因为他们没有得到饷银；只是由

于答应今天补发欠饷，才使他们平息下来。这支部队和苏军共同享有在战场上最勇敢、离开战场后最无纪律的名声。林述庆都督终于搬出了总督衙门，该处将由黄兴居住，但是，在他提出的关于银钱和供应方面的所有要求得到满足之前，他拒绝开赴前线。

贸易正在缓慢地恢复。现已发生的抢劫事件，特别是对当铺和空屋的抢劫，似乎大大地超过了人们最初的预料，但这些抢劫发生在围困期间还是发生在解围之后，是可疑的事情。

伟晋颂谨上 1911年12月11日于南京

第 62 件附件 3 领事伟晋颂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昨天，我曾发电报告诉您：革命军违背他们驻浦口将领对塔克先生所作的许诺，征用了津浦铁路上一列装载碎石的火车，运送部队前往临淮关。

塔克先生通知我说：该列火车共有十七节车厢，得到张勋提督的许可，专从徐州府开来供修复铁路之用的。一名革命军军官在滁州拦劫它，派它载运士兵驶回临淮关。

我拍发那份电报后不久，便收到您在同一天发来的电报，指示我试图使程德全都督停止沿津浦铁路调动军队，直到汉口停战协定期满为止。

我按照您的指示，于今天拜访了程德全都督，他是昨夜返回南京的。不幸的是，都督因患腰部风湿痛而卧床，不能够接待我，但我见到了他的秘书马先生，他向我保证说：在停战协定继续有效期间，该铁路将不再用于军事的目的。他觉得有把握，拦劫列车的那名军官一定是未经他的上司的许可而这样做的，他的上司具有这种印象，认为劫车的行动是不可能的，因为该铁路的全部车辆都在张勋提督控制下的北段。

今天傍晚，塔克先生写信告诉我：有一位军官拜访他，对驻浦口将领拦劫火车的行为表示歉意，并向他保证这一行动将不再发生。塔克先生又说：由于他的铁路主管人大约在同一天将张勋提督的部队二千五百人左右自淮河运往徐州府，所以任何一方都没有充分的理由抱怨对方。

停战协定期满后，如果议和谈判失败，革命派很可能坚持使用该铁路。在那种情况下，除非革命派支付使用该路通车的全部费用，塔克先生打算撤退所有的雇员，因为可使用的车辆很有限，经营日常业务是不合算的。我冒昧地建议，应明确指示塔克先生，关于在那种情况下他应采取什么行动。该铁路只有在最后迫不得已时才应予以放弃。即使是不收运费，也是可取的，而且最后付出的代价可能较少。

我认为，塔克先生信中所提及的已运往徐州府的部队，必定是张勋提督留在滁州的那些军队。如果是那样，关于那些军队已经解散的报道是不真实的。那些军队中的大部分人很可能确已散去；提供给塔克先生的数字很可能超过了实际人数。无论如何，它意味着，张勋提督的部队从南方及北方获得了很大的补充，现在他指挥的部队必定不少于五千人。革命派在临淮关正在集中一支一万人的部队，从已经渡江的人数来判断，其中大部分人现在一定已经抵达该处或正在途中。他们配备了大炮，包括四·七英寸口径的大炮在内。

我在今天发出的电报中，补充了程德全都督的秘书提供给我的关于即将在南京举行会议的某些消息。该会议似乎和最初的打算不同，不是所有各省谘议局代表的会议，而只是革命各省都督所派代表的会议。这个改变被认为是必要的，首先是为了调和军方人士，其次是为了保证团结一致以及避免以后的争议。由于这个改变缘故，除甘肃外，所有未发生革命省份的代表虽在南京，

但将不允许他们参加会议。人们已经知道，会议将决定赞成共和政体，尽快地宣布临时政府的成立。政府适当地组成之后，便将立即选举袁世凯为共和国总统。会议将在最近三天内开幕。

在此地的革命派首领们中间，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意见。林述庆都督已被压服下去，但浙军军官现正制造许多纠纷。我不能肯定他们究竟抱怨什么，但他们对处理军事问题的方法，特别是对冬季作战的意见，似乎感到不满。招募和训练新兵正在稳步地进行。革命派也许缺乏现银，但这并没有使他们放松对战争的准备。

伟晋颂谨上 1911年12月17日于南京

第62件附件4 伟晋颂领事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继续谈我本月17日信中所说的事情，我荣幸地报告：昨天，我收到塔克先生的一封来信，告诉我张勋提督正派他的部队乘火车从他设在徐州府的总部前往宿州，宿州是津浦铁路线上的一个车站，在徐州府以南四十七英里处。塔克先生说：该提督率领着他自己的四、五千名部队，此外，他可以依靠从北方乘火车前来增援他的大批部队的支持，这些援军现驻扎在他周围的地区；还可以依靠河南部队的支持，估计这些部队大约有五千人，他们最近曾在安徽北部作战，现在被认为驻在宿州正南约五十英里的怀远附近某地。因此，在他指挥下的部队是相当多的。今天，塔克先生来信告诉我：该提督的部队又继续向南走了三十英里，行抵固镇，该地距淮河仅二十六英里。他表示意见说：革命派现将被迫采取自卫行动，破坏淮河的铁路大桥，那是津浦铁路线上最大的工程。

人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张勋提督选择目前的时机，即当议和

谈判刚刚开始的时候，采取一次似乎是他这方面发动的鲁莽行动。当然，革命派确已派兵渡过淮河采取攻势，而这只不过是张勋提督采取的对抗行动，或者是因革命军在临淮关集结而采取的预防措施，这不是不可能的事情。无论如何，正如塔克先生所说，如果在津浦铁路的这一端继续发生任何劫夺列车的事件，现在是很难加以解释的。事实上，我听说，革命军驻浦口将领于今晨要求一列火车，而且他们已把火车交给了他。我担心，这些破坏停战协定的行动必定有害于议和谈判的成功，而且如果接着发生战事，可能导致议和谈判的突然终止。

革命各省代表会议已经开始开会，但直到目前为止，它所审议的问题仅表明各代表所抱观点具有很大的分歧。人们预料他们将投票一致赞成共和政体，但对其它问题他们都不能够取得一致意见。在还没有作出决议的一些问题中，有选择首都和临时总统的问题，一方面在武昌和南京之间以及另一方面在黄兴和黎元洪之间的对立主张，都得到各自支持者的热烈拥护。也许他们所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乃进军北京是否可取的问题。争论表明：代表们充分认识到，由于不同省份之间的对立以及它们互相冲突的利害关系使他们在敌人面前显示出一个联合阵线，从而使他们的事业蒙受很大的损害。会议的情绪显然是赞成谈判的。他们强调这个事实：他们的财政状况不允许他们延缓进军北京；冬季作战将完全有利于北军。赞成妥协的另一项理由是：如果战事继续进行很长的时间，全国将陷入无政府状态，而且外国干涉肯定会接踵而来。

昨天早晨，我拜访了程德全都督的外事秘书马先生，去听一听关于他亲自参加的那个会议他有什么可说。他告诉我，会议没有作出任何决定，然后接着谈到上海的议和谈判。他向我保证，该谈判将达成一项双方都很满意的解决办法而告结束。将给予清

帝年俸，但为了中国边远地区各藩属如西藏、蒙古等地起见，允许他保留他的名号。不过，政府将是一个共和政府，皇帝作为一个挂名的首脑，而没有任何权力。为了尽量摆脱满清的一切影响，首都很可能从北京迁往武昌。革命派的首领黄兴、黎元洪、程德全及其他的人都赞成这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此地的会议代表都是文人学士，因此都是有头脑的人，他们肯定不会反对该办法。革命派的普通成员们，特别是军方人士，可能会感到一些不安，但他们将终于被说服而表示同意。

伟晋颂谨上 1911年12月21日于南京

第63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1月22日收到

阁下：

关于我上月17日的第一封信，我荣幸地说明唐绍仪与伍廷芳之间在上海进行议和谈判的经过，日期是自12月18日会议开始时起，至本月2日唐绍仪被解任为止。

我应当在开头便说明：给予唐绍仪的全权，是作为议和代表讨论局势，而不是不顾北京方面的意见缔订协定。

谈判的初期阶段，被双方用来互相指控所谓破坏应于12月24日期满的停战协定的行为。然而，幸好双方都愿意接受延长停战期限；12月20日，唐绍仪来电报告延长到12月31日为止。后来，唐绍仪于12月23日同伍廷芳达成了关于停战协定的意义的一项协议，它规定不得发动任何进攻，不允许调动军队或军火。

唐绍仪从一开始便发现，对方决心坚持他们关于建立共和及推翻满清王朝的要求；他似乎受了他周围环境的影响，以至表示他同情共和的理想。

他多次致电总理大臣，详细申述他绝不可能说服伍廷芳接受

君主立宪；他建议发布一道谕旨，授权将争论的主要问题，即今后中国的政府应采取君主制或共和制的问题，提交国民会议。为了说明他处境困难起见，唐绍仪试图把上海领事团说成是赞成共和的；他还强调这件事情，即革命派认为六国向会议双方提出的同文照会，意味着列强承认他们所成立的政府。

正如您从我12月28日信中所了解的那样，将今后中国政府采取什么形式的问题提交国民会议的建议，已由朝廷于该日的谕旨中批准。接着，唐绍仪继续采取行动；他事前未请示袁世凯，便于12月29日接受和签订了四项条款（附件一）^①，至少可以这样说，这些条款是单方面的，而且对清方是不公正的。通过这些条款，他同意：满清政府不得举借任何外债；自12月31日起，所有在山西、陕西、湖北、安徽、江苏等省的清军，应于五天内从现驻阵地退至一百里以外的地方。

在当天的另一份电报中，唐绍仪递交了民党提出的七项要求（附件二）^②，其中包括已经签订的四项条款。他没有接受的三项要求是：

- （一）代表总人数的三分之二构成法定人数；
- （二）开会地点在上海城；
- （三）会议于1月8日开始。

12月30日，唐绍仪又递上他与伍廷芳于该日签订的第二个四项条款的原文（附件三）^③。这些条款规定国民会议的组成。

① 原件见《辛亥革命》（八），第84页。

② 原件见《辛亥革命》（八），第97—98页。按：中文原件仅六项要求，英译文则为七项，其中“讨论时由多数票作出决议，双方均应遵守会议的决议”一项，为中文原件所未载。

③ 原件见《辛亥革命》（八），第98页。按：英译文的条款，不仅在先后顺序方面与原件不同，而且在内容上也有些出入，如原件中“到会省数有三分之二即可开议”一款，英译文将其中的“三分之二”改为“四分之三”。

每省将成为一区，内外蒙古共同成为一区，前后藏共同成为一区。此外，每区将派三名代表，每名代表享有一票。第四款规定：南方各省代表由民党发电召集，北方各省代表由清政府发电召集。这四项条款的制订，事前也没有同总理大臣商议。

关于签订的第一个四项条款，袁世凯于12月30日迅速答复唐绍仪说：第一、二两款可以维持原状，但关于借款和撤军的第三、四两款必须对双方一律适用。那天，袁世凯在随后的一份电报中提醒唐绍仪说，他的权力仅限于讨论，并且说明他不能批准12月30日签订的第二个四项条款。因此，他要求取消这些条款，并催促唐绍仪按照内阁多次电示的意思，同伍廷芳重新进行讨论。

总理大臣于12月31日又发出电报，指出：他力图实现的原则是要获得全国的公论，因此每州县应各选一名代表。他还把内阁起草的国民会议选举法通知唐绍仪（附件四）。

唐绍仪对这些电报的答复，是提出他被任命为议和代表的辞呈，因为他的行动没有得到北方的同意，而且因为总理大臣拒绝批准第二个四项条款，他说这些条款是经过许多天的讨论之后才精心制订出来的。因此，内阁于1月2日接受了他的辞职，并于同日发出电报，把唐绍仪解职一事通知伍廷芳。此外，总理大臣还建议说：鉴于很难找到一个有能力的人接任唐绍仪的职务，目前所有的谈判应由伍廷芳和他本人之间通过电报继续进行。

我在获悉谈判陷入僵局以及出现的危急局势后，于1月1日拜访了袁世凯，使他记住对决裂所应承担的重大责任。正如我在1月1日的电报中所报告的那样，我发现总理大臣感到极为忧虑和沮丧，以致有时候他似乎很难领会谈话的内容。

使谈判终于破裂的问题，显然是关于国民会议的组成以及开

会的日期和地点问题。在所有这些问题上，袁世凯这方面是较合情理的。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召集中国各省各三名代表的会议，那只不过是一幕滑稽戏。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大会不能够声称具有任何代表性。袁世凯说，按照这一方式达成的任何解决办法都不可能是长久的，他的话是正确的。另一方面，他自己关于选举所作的安排似乎过于繁琐，很可能证明是行不通的，但这些安排至少为讨论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基础。关于开会地点，双方似乎都同样是不讲道理的。参加上海议和会议的清方代表返回此地后报告说：气氛太倾向于共和，不允许自由讨论。不过，尽管袁世凯提出赞成在北京开会的动听的理由，但如果认为南方代表会前来此地，在满清军队和一大批满族居民中间鼓吹他们的共和理论，那是很不合乎情理的。

唐绍仪建议在烟台开会是很受人们欢迎的。山东是一个动摇不定的省份，既不倒向清方，也不赞成共和。烟台于1876年曾经是举行重要谈判的场所^①，它的位置可能有助于鼓励双方采取克制态度。它附近的威海卫和青岛是最近瓜分行动的例证，而渤海湾对岸的朝鲜、大连、旅顺口和满洲可以告诫双方的过激分子，使他们迅速对他们的分歧达成一项解决办法，以避免进一步的分裂。

朱尔典谨上 1912年1月6日于北京

第64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1月22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随信附上英国驻重庆代领事报告该地于11月22日

^① 指李鸿章与英国公使欧格讷就“马嘉理案”在烟台举行的谈判。

加入革命的一封来信的副本。由于一支哗变部队的逼近，迫使局势达到了高潮，那支部队在不久以前曾经是四川的一支地方警卫部队。在城内那些用炸弹武装起来的反清人士的进一步恫吓下，地方官员们交出了他们的关防；在十分激动但未发生骚乱的气氛中，重庆宣布它拥护民国军政府。然而，附近的郊区不免遭到匪徒们的劫掠，这种劫掠行为日益成为人们所熟知的各地区的特点，而在重庆，每当发生动乱时总是要浮现的那些社会渣滓立即暴露出来。事实上，临时政府对捣乱分子和怀有不满情绪的军队很少加以控制，所以正象布朗先生11月30日的信中所报告的那样（该信一并附上），各国领事决定他们有责任撤走妇女和儿童。

我还荣幸地附上英国代领事的另一封信的副本，他在该信中令人无可怀疑地证实了这项报道，即端方同他的弟弟①一起，被他统率的士兵所杀害。

我在12月27日的报告中曾把四川宣布独立一事告诉您。自从写了那份报告以来，关于后来的发展情况，我听到许多互相矛盾的传闻，所以除了公认的全省处于混乱状态外，我不可能对形势作出正确的估计。据宁远府的法国主教报告说：总督已被派去安抚四川西部地区 and 西藏；两天以后，成都的军队哗变，杀死了新就任的都督②，并在该城进行劫掠。他还说，四川起义军把云南和贵州的部队围困在叙府。

1月4日，我收到汉口总领事的一份电报说：英王陛下驻宜昌领事来信报告，驻成都的所有外国人，包括各国领事在内，已于12月13日乘船离去。许立德先生又报告说：外国人打算撤出重庆。次日，宜昌来电对此事作了更正，据该电说：有人报告驻成都各国领事于12月24日仍安然无恙，并且仍留在成都，但据

① 指正品衔河南候补知府端锦，他随端方一同入川。

② 当时蒲殿俊已藏匿起来，并未被杀。

说赵尔丰已被处决。目前，预料重庆不会发生乱事。我1月5日和6日的电报包含了上述报告的主要内容。

朱尔典谨上 1912年1月6日于北京

第64件附件1 代领事布朗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我荣幸地报告，这座城市已于11月22日宣布革命。在以前的几封信中，我曾经提到上个月在本地商人和绅士方面增长着煽动性的情绪。这个期间，市民中的知名人士已暗中感觉到他们正走向公开起义的道路。他们为破坏部队对清政府的效忠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并采取步骤夺取官吏们的权力，一旦有机可乘时便立即宣布该城的独立。它是名副其实的“内部革命”；我认为，构成运动的一般思想基础是希望避免当外部力量把革命强加于该城时，本地居民将必然遭到的敲诈勒索。

12月19日，人们得到消息说，一支哗变的军队已到达距重庆二十英里的某个地方。这些部队以前驻守在成都附近的龙泉驿，已经经过乐至、安岳等县地区，此时打算进入重庆城。

团练局立即召开会议讨论局势，并邀请道台、知府和知县参加，但他们不顾多次邀请，拒绝到会。在这个会议上，决定乘这些部队到达提供的机会，在城内宣布革命。由于对此项计划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他们派代表前往起义军那里，极力劝告他们接受粮饷，和平地撤离重庆城。如果他们拒绝这样做，城内驻军将开出来攻击他们。星期一，重庆城的代表们回来，他们的建议遭到拒绝。当团练局正在讨论局势的时候，一批曾经在城内进行秘密工作的真正反清的人士带着炸弹赶来了。这批人具有比城内那些软弱无力的革命党人更为激烈的特点，他们威胁团练局宣布革命，并迫使团练局同意让起义部队入城。接着，他们通知官吏们，必

须在十二点钟以前交出他们的关防。道台和知县都照着办了，但知府仅在受到炸弹的威胁时才交了出来。道台交出关防的消息象野火一般地蔓延到全城，城内立即挂满了白旗，旗帜上面写着“汉”字。许多伙城防队和绅士们急忙跑来跑去，接管所有的民政和军事机构。人人喜气洋洋：尽管情绪极为激昂和情况十分混乱，但丝毫没有发生暴力行动。下午五时，各城门开放，有一百四十名士兵的一支队伍入城，携带一挺机关枪。跟在他们后面进城的有好几百名没有武器的人群。据说这些人是保路同志会的成员。

晚间，我收到四川军政府的一封信，通知我说：重庆城已被他们占领，所有外国臣民都将受到保护。由于我在没有得到您本人的指示之前，不能够承认清政府官员之外的任何官员，所以我对该信未作答复。

由于所有的巡警都已不知去向，所以绅士们命令城防队巡逻街道并维持秩序。夜间，城内没有发生任何骚乱。江北厅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它是嘉陵江对岸的一座有城墙的大城，构成重庆的郊区。此地有一群匪徒攻击并抢劫衙门和盐务、税务机关。直到11月23日凌晨三时为止，不断听到枪声。我获悉，大约有四十名上匪在城墙外被杀，三十一名土匪被俘。昨天下午，两名为首的上匪被押至领事馆近旁的一小块土地上，并在一大批群众面前遭到枪击。他们两人没有当场被击毙，但是，在与那些完全无法控制的群众乱打了一阵之后，他们仍被装进了棺材。今晨，有人发现：在这两个倒霉的人中，有一个竟破棺而出，在地上爬行，死在停放棺材几码远的地方。

虽然为占领重庆城所作的安排已十分圆满地实现，但不久就很明显，他们没有为管理和防御该城制订任何计划，结果是昨天发生了一场可怕的混乱。当各派为要求参与政府而进行争吵的时候，大批武装暴徒从四面八方进入城内，而没有遇到阻碍。幸亏

当时城防队的人数足以压服他们；当城外发生抢劫的时候，城内没有发生任何实际动乱。今天，我有机会穿过城内，看见一群群只能称之为凶手的人们，进入并穿过城内。他们大都是用刀、矛和本国制造的最粗糙的火绳枪武装起来的。他们中间有一支二百一十人的队伍，刚刚夺去了城防队占用的庙宇，它位于距本领事馆一百码的地方。绅士们告诉我：这些人是土匪，但城防队无力反对他们。现在，城内存在着恐怖统治；绅商们对于招引到自己头上来的这场风暴感到极为遗憾。

关于新政府，仅有几个有名望的人参加。权力掌握在有文化的人们手中，有几个会说英语的秘书帮助他们，这些秘书的经历大都是可疑的。我不认为这个政府对暴徒或甚至是对它自己的部队能够长期行使控制权。城内的现银很少，而且没有入款。士兵们对于他们所得到的工作报酬已经感到不满。人们还进一步预料，目前各革命派系之间的分歧将以武装冲突而告终。如果发生巷战，外国侨民的地位将是十分危险的。重庆没有外国居留地之类的地方，外国人的住宅散布全城；如果发生动乱，它们几乎不可能幸免。因此，我正把所有的妇女和儿童迁出城内，并且极力劝告他们乘船顺流而下，因为他们仍可以沿着这条道路逃走。

布朗谨上 1911年11月24日于重庆

第64件附件2 代领事布朗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我荣幸地报告：11月25日举行了领事团和法、德、英三国炮舰舰长的会议，讨论本地的局势，大家认为，只要外国人士仍分散居住在重庆城内，便不能够保证对他们提供适当的保护。会议的一致意见是，所有的妇女和儿童应当要未过江去，在炮舰附近可供居住的船上避难；要未顺流而下，前往上海。美、德、日三

国领事官员和我本人照此起草并签署了一个通告，我荣幸地附上它的副本。

由于“沙通”号轮船于11月28日启碇开往宜昌，所以剩下的妇女和儿童大都乘坐该船下驶，没有必要派遣一艘炮舰护送他们至万县。

采取送妇女儿童过江的预防措施，已于11月28日证明是一项明智的举动，当时怀有不满情绪的士兵和水道巡警企图攻击各国领事馆和教堂，从而使新政府信誉扫地的阴谋活动，已被揭发出来并遭到挫败。我们于晚上十时获得攻击即将到来的消息，发现那些仍然住在城内的传教士不可能逃出城外或前往各国领事馆。如果军事当局没有及时地得到警告，市中心地区的外国人的处境必定是最危险的。

布朗谨上 1911年11月30日于重庆

第64件附件3 领事馆通告

领事团认为，重庆随时可能发生严重的骚乱。

没有一个获得承认的当局能够保护外国人的生命。因此，这个责任被转移到各国炮舰舰长们的身上。该舰长们声明：只要外国人士（共一百八十一人）散居在重庆城内，便不可能保护他们。此外，大约有三百名难民必将从成都和本省其他地区以及邻近的贵州省前来此地，从而会使局势更加复杂起来。

因此，我们坚决催促所有外国人应毫不迟延地动身前往上海。一艘炮舰将于11月28日启碇护送他们去万县。长江的水位不允许该炮舰驶至万县以远的地方，而我们有理由认为万县至宜昌的水道对他们那伙没有护航的人来说是安全的。各国舰长们认为，所有外国人唯一可行的办法是把他们自己置于各炮舰大炮的保护之下。

在下面签名的各领事同意这个意见，并且认为有必要立即把所有的男人、妇女和儿童（除了那些获得各该国领事明白许可而留下的人们之外）送过江去。

对任何拒绝遵守这项指示的人，特此警告：如果继续留在此地；只能由他自己承担风险和责任。

由于各炮舰上甚至不可能接纳少数各国人士，所以各人应立即雇船停泊在紧靠各炮舰旁边。这个计划能够使各国人士在必要时，以最大程度的安全撤退。

各炮舰舰长们讨论了将各国人士集中在麦金兹洋行房屋内或长江对岸其它地方的问题，认为它不是切实可行而予以撤销。

美 国 领 事 潘士恩

德 国 领 事 魏 斯

英 国 代 领 事 布 朗

日本领事馆负责人 葛 西

1911年11月25日于重庆

第64件附件4 代领事布朗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我荣幸地报告：三百名四川巡防营于12月5日抵达距重庆几英里的浮图关。管带于培^①是个满族人，当他的士兵哗变时已逃往资州；目前，这些士兵由一个名叫余大鸿的首领统率。虽然他们表面上是巡防营，但对他们所经过地区人民进行的一系列奸淫掳掠，预示了他们即将到达重庆，所以有理由怀疑他们是一群土匪。在他们到达的时候，重庆方面立即派代表通知他们说：他们在获准入城之前，必须交出他们的武器。为了使他们的要求加重

^① 译音。

份量起见，重庆当局在浮图关附近布署了一支五百人的队伍，备配了哈乞开斯重机关枪，而另一支有二千名步兵的部队已做好准备，如果这些新来者坚持试图入城，便对他们发动攻击。与此同时，关闭各城门，架设大炮，并准备防守城墙。在这种炫耀武力的恫吓下，巡防营首领余大鸿现已宣布他打算返回他的原籍安徽省，并要求重庆当局收编他的士兵。新政府对此已经表示同意，而那三百名仍然拒绝交出枪支的士兵现已驻在长江对岸的铸钱局内。重庆当局希望通过把这些巡防队各小队编入他们自己的部队，并派遣他们去驻守各边远地区，以解除该城现在所受到的威胁。

12月7日至9日，从前由端方指挥的鄂军一标(一千五百人)抵达此地，带着钦差大臣端方和他的弟弟端锦的首级，装在一个煤油罐内。昨日，在城内为这些可怕战利品拍了一张照片。据这些士兵们说，端方听到重庆被占领的消息后，贿赂第三十二标的士兵们护送他前往北方的安全地带。当此事传入第三十一标士兵耳中的时候，他们也向他要求现银，但一无所获，因为他没有现银可付，于是发生了一场争吵，部队不许他动身。此事发生后不久，重庆派出的专差带来消息说，满清政府下令焚烧了汉口。士兵们想起自己家乡所受的损失而感到愤怒，于是决定要杀死端方。当他力图乘坐一顶小轿离开资州城的时候，他被俘获，人们把他拖入一座庙内。当时，一群士兵以死来威胁他，并命令他跪在他们面前。由于他坚决不肯跪下，他被一名士兵打倒在地，当时他的脑袋被砍了下来。他的弟弟在士兵们的追逐下，逃往军官们的住处；他被他们拒绝接纳，在门外被处死。

人们对这些鄂军立即表示欢迎，让他们随意进城，到处欢呼他们是消除四川祸害(端方)的救星。他们手中现有的步枪和四门过山炮将由新政府购买，供地方警卫部队使用。新政府将寻找

船只把这些士兵运往湖北。

布朗谨上 1911年12月9日于重庆

第 65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1月22日收到

阁下：

在上海议和谈判期间，当可能举借一笔外债的想法已迫不得已而明确予以放弃的时候，库藏的状况似乎是令人绝望的。中国农历的下一个月^①系从公历12月20日开始；在该月的头四天内，至少必须有七十万两（约合八万七千五百镑）的款项，供立即支付军饷及军事装备之用，而满足这笔需要，从天津铸钱局得到的现款中，仅有二十八万两的结余可以使用。此外，这个估计不包括其他或多或少的极为必需的费用在内；有人计算，按照已经缩减的标准，维持总理大臣行政当局两个月内的最低款额为三百万两（约合三十七万五千镑）。

在这种窘迫情况下，总理大臣必须设法从清朝皇室的支持者中凑集银钱，因为他正在保卫他们的事业。本信所附自12月20日《北京日报》上剪下的参考资料，说明了发行所谓“爱国公债”的详细情况，它是若干时候以前批准的一项计划，但现在已成为对官吏阶层的一种强制性的征税。发行这项公债似乎并不含有明智稳妥的财政措施的因素，但作为一项临时的权宜之计，它是相当成功的；有报告说，它已获得一百万两左右。

据说，从皇族成员的捐献中，另获得了二百万两。

第三个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个财源，是贮藏在皇宫内的金银财宝，正如我在11月16日的信中所说^②，总理大臣已经求助于它。

^① 指十一月。

^② 原编者注：参阅《中国第一号（1912年）》，第101件。

我从可靠方面获悉：三天前，袁世凯阁下从宫廷得到八千根金条，每条重十两，大约等于二百八十万银两，此外还有许多白银，足以使总数达到三百万两（约合三十七万五千镑），他立即兑换所有的金银，供政府使用。正象我从前所说的那样，宫廷内究竟还有多少金银财宝，那是不可能查明的，但是，可以指出：北京报纸最近吁请人们注意，通过及时地贱卖在此地宫廷内找到的珠宝、瓷器和古玩，可能得到几百万两。他们已经向一些外国人提出建议，目的在于变卖盛京皇宫内收集的瓷器和古玩，并把这些收入作为皇族侍从和较贫困成员的补助金。

不管朝廷掌握的财力是否可以指望达到公众所想象的程度，目前已有的现款无疑地大大增强了总理大臣处理危机的实力。它也消除了人们担心北京在今后三、四个月内因政府缺乏现款而垮台所产生的无政府状态。

朱尔典谨上 1911年1月6日于北京

第66件 布坎南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1月22日收到

阁下：

关于我1月11日的信，我荣幸地报告：直到目前为止，彼得堡报纸对外交部关于蒙古局势的正式公报所发表的评论，并不赞成俄国政府宣布的对该地区的政策。

1月12日反对党的《论坛》报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嘲笑官方发表的关于俄国对蒙古不怀有任何企图的声明。欧洲各国档案馆已经充满了关于维护对某个亚洲或非洲国家的正式宗主权之类的声明；这些声明的价值多么微小，现在是不需要任何官方公报加以说明的。

接着，那篇文章抓住该公报中所说的俄国愿意在蒙古的“行

政、经济和文化发展”方面帮助蒙古那段话，断言这是完全不能允许的。如果蒙古获得独立，俄国应当支持它，以便在俄国自己与中国之间构成一个独立的缓冲国。如果超越了这一点而且建立任何类型的保护关系，便将危害远东的现状，并违反不仅同中国缔订的而且同英日两国缔订的各项协定，英日两国将立即要求补偿。这样，远东的极为错综复杂的问题又将重新展开。

1月16日的《新时代》报采取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线，指责俄国政府尽力说服蒙古人满足于保持中国宗主权之下的自治。它声称：清政府通过同库伦新建立的政府进行谈判，已正式承认该政府；俄国不鼓励蒙古企图获得独立，现正把它重新投入中国的怀抱。

关于蒙古一般情况的消息仍然是很含糊的；电报似乎有时报道蒙古王公某个集团的背叛，而今天的《新时代》报发表一份耸人听闻的北京来电说：清政府建议把蒙古让给俄国，以换取一笔一亿卢布的借款。

关于中国新疆局势的消息也同样是很含糊的。最近的电报表明：革命党在进行大量的屠杀之后，现已在伊犁占了上风，并正在同俄国领事馆一起管理该城镇的事情。

布坎南谨上 1912年1月17日于彼得堡

第67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2年1月22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局势已发生相当大的变化。南方首领们的要求，显然将使得在清帝退位与民国获得承认之间这段期间此地不可能有任何政府，似乎在成立南北联合政府方面将造成很大的困难。

第68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2年1月23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今天，袁世凯的秘书告诉我说：他的地位正变得很不稳固；满族王公在前陆军大臣铁良的影响下正在活动撤换他。局势是很紧张的；如果象该秘书所说，袁世凯辞职或离开北京，局势也许可能变得严重起来，但人们很难得到真实情况。

第69件 格雷爵士致布赖斯先生函

先生：

今天，我告诉美国代办说：由于诺克斯先生^①表示过一两次希望就中国问题保持联系，所以我很想把我的看法作一简短的说明。那些最了解中国的人们认为，某种类型的君主制最适合于该国；但我感到在敌对双方之间采取不干涉政策是唯一明智的政策。支持赞成君主制的北方，可能促使南方以共和国的形式分裂出去；如果可能的话，避免这样一种分裂是可取的。其次，外国人迄今没有受到损害。英国臣民，我想还有美国人，散布于中国。如果对他们发动攻击，我们不可能保护他们所有的人；如果我们支持中国的一部分地区，将导致对我们在另一部份地区的臣民的攻击。因此，据我看来，为了中国的统一和我们本国臣民的安全，我们必须避免干涉，这一点象过去一样仍然是正确的。

格雷谨上 1912年1月23日于外交部

① 美国国务卿。

第70件 代领事史密斯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1月27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随信附上我写给英王陛下驻北京公使关于腾越局势问题的一封信的副本。

史密斯谨上 1911年12月20日于腾越

第70件的附件 代领事史密斯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继续谈我12月13日信中所说的事情，我荣幸地报告：此地的局势多少有些改善；关于同大理府方面的争端，很有和平解决希望。

大理府和腾越的部队都已撤退；云南府的革命派首领之一李根源于几天前抵达大理府，将前来腾越为今后作出安排。据了解，张文光将保留地方警卫部队统领的职位；赵藩从前的职务并非象我早些时候所获悉的那样曾任甘肃布政使，但他曾任四川道台一职，将被任命为此地的道台。

腾越城内的情况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除了几天前当局对于一般老百姓表现对自由如此缺乏热情感到愤慨，所以决定至少应强迫他们抛弃受满族人奴役的标志。因此，凡是在街上被发现蓄着辫子的人都被警察捉住，并被迫剪掉这个引起反感的附属品。我自己的一名仆人就是这样被捉住的，但在说明他是什么人之后，没去剪发便被释放了，并且还向他道歉。这项措施的主要结果，是辫子不再明显地留着了，而是把辫子缠在头上，戴上一顶帽子或一块头巾。警察对自由的热忱，常常促使他们去攫取那些没有恶意的过路人的帽子，以便查明在这个自由的领域内，这些过路

人是否在内心仍然是满清的奴隶。

一个姓李的人显然没有得到该省革命组织的许可，却采用民政司的头衔。他是干崖土司手下的人，大概是在张文光的同意下进行活动，但他写给赵藩的指示信，被傲慢地撕成两半退还给他，此事证明他的地位具有可疑的性质。

邮政局现已正常工作，电报局也是如此，对使用密码所作的限制已经撤消或听任它失效。

海关仍由革命派任命的一名中国人管理；虽然我已经几次强烈建议他们邀请税务司回来，将海关再一次置于正规的基础之上，但他们目前没有打算这样做的任何迹象。税务司现仍住在八莫，总税务司已指示他留在该处，直到他奉命回来为止。

史密斯谨上 1911年12月20日于腾越

第71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1月27日收到

阁下：

我在1月4日和5日的电报中，曾荣幸地通知您：各国驻天津部队指挥官按照1901年9月7日签订的和约的条款，为维持北京至沿海之间的交通而商定的那些措施，决定立即付诸实现。需要作出这个决定的情况是：驻滦州的步兵第七十九标第一营和第二营发生兵变，驻秦皇岛附近的第四十协有不满情绪，铁路交通和电报联系被切断，以及那时人们认为，当清军和革命军之间发生冲突时，任何一方都将破坏铁路，这种紧急情况不是不可能出现的。

本月5日，我会见了日、美、法、俄等国的同事们，并向他们说明我的意见：只要有可能，我们的行动应严格地限于和约的条款。我解释那些条款的意思是：国际部队将不占有或管理铁路

和电报线，而只不过是加以保护，目的是防止它们被切断，并保证正常地运送旅客、货物、邮件以及发送电报。我的同事们同意这个意见，而且也赞成日本公使的建议：按照我在12月19日的信中已把副本送给您的那份计划，山海关应包括在该计划之内。自从作出那些安排以来，俄国驻天津部队已得到很多增援，足以使他们能够参与该计划。美国分管的那段铁路，暂时由英国军队保护，美军由马尼拉开到后将予以接管。

附上总参谋长1月8日的报告，它说明了各国指挥官为执行该项计划而采取的步骤。

朱尔典谨上 1912年1月10日于北京

第71件的附件 海军上校特纳致英王陛下
公使馆武官函

先生：

我荣幸地附上各有关国家指挥官商定的保护铁路计划的副本。

在1月4日举行的会议上，大家决定：保护铁路的时刻已经到来，并且通知北京外交团。各国指挥官在获得他本国公使的同意后，接着采取措施，以保证他所分管的那段铁路的安全。

本月6日，俄、日、法、英等国指挥官之间进行了各种联系，其结果是法国人同意将天津租界的火车站交给俄国人保护。

各国指挥官为执行保护铁路的计划作出了下列安排：

英国分管的路段

丰台：莎美西轻步兵一连半。现在尚未出动。

安定：第一百二十四巴鲁奇斯坦^①步兵连的一名印度军官和三十五名士兵。于1月7日开往。

落堡：第一百二十四巴鲁奇斯坦步兵连的一名英国军官和四十名士兵。十二名军士和士兵于1月8日开往。

张庄：第一百二十四巴鲁奇斯坦步兵连的一名印度军官和二十名士兵。现在尚未出动。

张庄至杨村之间的五处碉堡：第一百二十四巴鲁奇斯坦步兵连的五十名士兵。现在尚未出动。

法国分管的路段

杨村桥：三十名士兵。1月6日开往。

北塘火车站北面的运河：三十名士兵。1月6日开往。

俄国分管的路段

1月7日在天津租界火车站派驻了一支警卫部队。

德国分管的路段

汉沽桥梁和火车站：一名军官，二十五名士兵。已于1月6日动身。

芦台桥梁和火车站：一名军士，二十名士兵。已于1月6日动身。

塘坊火车站：一名军士，二十名士兵。已于1月6日动身。

胥各庄火车站：一名军官，二十五名士兵。已于1月6日动身。

① 英属印度的一个地名。

美国分管的路段（暂时由英军占领）

开平：莎美西轻步兵连的一名军官和三十名士兵。

洼里：莎美西轻步兵连的二十名士兵。

古冶：莎美西轻步兵连的两名军官和七十名士兵。

雷庄：莎美西轻步兵连的一名军官和四十名士兵。

（至1月7日，所有这些官兵都已动身。为了保护林西^①矿，四十名士兵于1月5日前往古冶。）

日本分管的路段

滦州火车站和桥梁：四名军官，一百二十名士兵，两挺机关枪。

昌黎：一名军官和四十名士兵。

唐河火车站和桥梁：二十六名士兵。

山海关火车站和桥梁：一名军官和四十名士兵。

除上述各地外，还有下列据点从前由英军驻守：

唐山：第一百二十四巴鲁奇斯坦步兵连的两名英国军官、两名印度军官和一百一十一名士兵。

秦皇岛：第一百二十四巴鲁奇斯坦步兵连的一名英国军官、一名印度军官和三十三名士兵。

山海关：第一百二十四巴鲁奇斯坦步兵连的二十四名士兵。

请惠允相应通知英王陛下公使。

华北指挥部总参谋长 特纳谨上

1912年1月8日

① 原文误为林海。

第 72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2 年 1 月 29 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英王陛下驻盛京总领事不认为目前的局势是严重的。土匪头目的敲诈勒索也许超出控制之外，这是很可能的；在其他方面，人们预料总督将顺利地维持秩序，除非革命党人派遣一支远征军前往满洲。

第 73 件 总领事务谨顺致格雷爵士函

1912 年 1 月 30 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随信附上我今天写给英王陛下驻北京公使的一封信的副本，该信是关于本省边远地区传教士的境况的。

务谨顺谨上 1911 年 12 月 8 日于成都

第 73 件的附件 总领事务谨顺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关于我本月 5 日报告陕西省外国人被杀一事的信，我荣幸地说明：我已收到汉中伊斯顿牧师的几封信，从那些信看来，德籍邮政司并没有象报告中所说已被起义士兵杀死，而仅受到土匪的轻微伤害。然而，正如以前一样，由于最近的这个消息系来自中国方面，所以很难说它究竟有多少真实性。

我刚才收到宁远府美国浸礼会韦尔乌德牧师的一封信，该信对锦江流域最近发生的动乱作了说明。在该信发出的那一天，即 11 月 21 日，宁远府的官员们似乎已经重新控制了局势，但人们担心，当成都革命的消息传到锦江的时候，将再发生动乱。

韦尔乌德先生在他的那封信的结尾，要求我关于他应当做些

什么提出建议。我将努力设法送一封信给他，极力劝他沿着他可以通过的任何路线，立即撤退到沿海地方。

务谨顺谨上 1911年12月8日于成都

再者：当我结束这封信的时候，人们早已预料到的陆军与巡防队之间的纠纷已经爆发。今晨发生了战事，现在全城的钱庄正在遭到抢劫。

务谨顺又及

第74件 总领事务谨顺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1月30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随信奉上我今天写给英王陛下驻北京公使的一封信的副本，该信是报告昨夜军队对成都城的洗劫一事的。

务谨顺谨上 1911年12月9日于成都

第74件的附件 总领事务谨顺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我很遗憾地必须报告：昨天早晨，巡防队与陆军发生了公开的骚乱；他们和暴徒抢劫了藏有二十多万银两的藩库、所有的钱庄和大多数当铺，此外还有许多商店和私人住宅。

继抢劫之后，又进行纵火。当我写信的时候，即12月9日凌晨二时，藩库仍在熊熊燃烧，而从四面八方听到断断续续的枪声。早晨，成都有被农村地区的保路同志会员闯入的危险。我几乎不相信此信将送到您手中。

从11月27日宣布独立以来，所有的情况都有助于造成这场大灾难。那些被释放的保路同志会员组成了一个临时政府，不久就被人们发现他们不止与一派发生不和，而他们内部则为地位和

职务进行争吵。据我判断，都督蒲殿俊是赞成君主立宪的，而罗纶没有接受他的政府中的任何职务，但主张按照美国的方式建立共和国。

构成成都大部分居民的其他各省人认为，他们将被剥夺一切权力，于是联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团体，以便获得承认和被雇用。严格意义上的革命者，在其他地方以革命党著称，组成了另一个团体同盟会，它在两天前举行了一次会议，用孙文（孙逸仙）的名义召集，而由董修武^①代表他出席会议。董修武开会时说：人民对蒲殿俊行政当局极为不满，必须密切注意他的行动。如果该行政当局没有进展，将必须进行二次革命。

在会议上第二个发言的是一个中国人的日本妻子，然后是一名中国青年妇女，接着是一个七、八岁的男孩^②，后来是高等学堂中的一位美国教员。

那时，政府已决定派遣六营巡防军保卫自成都至万县的大道，分别驻守在赵家图^③、蓬溪、顺庆、太和镇、大竹和万县。他们中间有一位姓荣的管带，于12月7日邀请军官们吃午饭，军官们在席间表示愿意劝说士兵们服从这些命令。巡防营和陆军都订于昨天上午在东校场举行阅兵、游行或点名。

昨天上午十一时半左右，突然发生连续的射击，随之而来的是观众和一些巡防军的东逃西窜，有些巡防军在附近的法国领事馆避难。至于什么事情引起这场骚乱，我不能够准确地说明。最可能的情况是：巡防营对于仅发给他们一个月的恩饷一事感到愤怒，因为陆军已发了三个月的恩饷。一些巡防军出于气愤，对巡防军和陆军的总统领、大汉四川军政府副都督朱庆澜发动攻击。

① 原文误作董修生。

② 原文如此。

③ 译音。

无论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巡防军立即前往攻击并抢劫大清银行及商场（外国人称之为拱廊街道）。陆军似乎同他们携手合作，并且得到了暴徒们的协助，现正在劫掠和焚烧成都。蒲殿俊和朱庆澜已不知去向；军队推举了一位新的都督。

我一开始就担心，蒲殿俊软弱无力的和不得人心的统治，不久便会使成都外侨的不稳固的地位更加危险。的确，他和他的政府一再保证对我们提供保护；我对他们的诚意没有任何怀疑。使我同样感到不放心的事情，是他们执行那个保证的能力。我极力催促那些仍住在此地的英美两国传教士利用骚乱的暂时平息逃往重庆。

有三十一名男人、妇女和儿童的一伙人，他们都是加拿大人，已于2日由水路启程，但我十分担心，其余的人已把他们的行期拖延到了很晚的时候。他们将力图于明晨（我应当说，更确切地说来是今天早晨）动身，但我只能够猜测天亮后可能发生的事情。

只要他们的军官能够控制部队，而部队又能够控制暴徒，我相信而且认为我们将是安全的。但是，如果部队和暴徒都超出控制之外（正象他们目前几乎很可怕地超出了控制），我们的安全就没有希望了。

直到目前为止，我可以通过电话联系的外国人的大院都没有受到攻击。有某个人，我相信是个掌权的人，派人给各国领事馆和穆那克医生（大概还给天主教和加拿大各教会，但这些教会不通电话）送去一个大的白色灯笼，上面写着“正”字，悬挂在大门口。我从电话中听说：虽然德国领事馆邻近的中国人住宅遭到抢劫，但直到晚上十二时为止（那时电话停止通话），没有对我的那位同事的大院发动攻击。迄今（凌晨三时）也没有对我自己的大院进行袭击，虽然大火在四面八方熊熊燃烧，而且流弹纷纷落

下来。我从法国领事馆、穆那克医生及西普威先生等处获得了类似的报告。西普威先生是那座位于成都城中心的盖士利主教寄宿舍的建筑师，他带着他的夫人和一对孪生子从四僧寺^①返回该寄宿舍，我希望他们的行动不是轻率的。

在这个危急的时刻，而且由于不可能同您联系，我自行负责命令所有的英国臣民，当他们一旦能够离开成都而且有理由希望获得安全的时候，立即撤离成都。我的德国同事魏斯先生现住在重庆，已对他本国的四位国民发布这样的命令；我相信，勒昆先生将顺利地说服天主教会的成员们撤离。我担心：无论如何，有些女教士将感到她们有责任同她们所照管的中国孤儿们住在一起。菲舍尔先生和勒昆先生，还有泰克曼先生，都不愿离开此地，除非我陪同他们一起。

总之，我们的传教士们、领事们和其他的人，也许都不能顺利地撤走，但我匆匆忙忙地写这封信，希望它可能终于通过他们中间某人之手送给您。

务谨顺谨上 1911年12月9日于成都

再者：晚上九时。没有人企图闯进我的“公馆”。菲舍尔先生的“公馆”，也许是因为他在外面没有悬挂领事馆的灯笼，今晨被十名士兵和一些衣衫褴褛的人闯了进去。当告诉他们这是德国领事馆的时候，他们没有越过第一个庭院，未造成任何损害便撤退了。然而，领事馆两旁的大院都遭到了抢劫。

贝茨先生的“公馆”也有类似的经历。周围的住宅都遭到劫掠，小巷对面的藩台衙门被洗劫和焚烧，但他的大门甚至都没有被人敲打。（因为我已经说过，他本人和我在一起过夜。）托伦斯先生没有前往四僧寺，也提出了同样的报告。基尔博恩医生刚从

① 译音。

四僧寺来信说：

“除了缺乏睡眠和夜间多少有些不安之外，我们在这些大院内都很好。在我们的各大门口，没有发生惊慌的事情。”

卡斯托先生的“公馆”于今晨被人闯入，但闯入者见到外国人之后，便撤退了。我知道：穆那克医生和他的家庭没有受到侵害；城西南部的美国人是安然无恙的。看来有很少几名中国人被杀，因为闹事者故意向空中开枪。全部行动显然是按照明确的计划进行的：昨天在东校场发生的争吵只不过装模作样而已。

有人告诉我，赵尔丰已于今晨拂晓时离开成都，由巡防军和陆军的一支混合分遣部队护送。然后，有一批所谓同志会的群众入城，他们在城内要求每个店铺付出五元钱，虽然这些店铺已经遭到抢劫。今夜将重新进行闹事，这是完全可能的。我不能够发现成都尚有任何政府，并最强烈地认为所有外国人应立即撤离。

现在，我预料任何英国人或美国人的撤离都没有困难，但我担心，慈善团体的女教士们将拒绝离开她们的孤儿院。

务谨顺又及

第 75 件 总领事务谨顺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1月30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随信附上我今天写给英王陛下驻北京公使的一封信的副本，该信是报告为安全撤离成都各国人士所作的安排的。

务谨顺谨上 1911月12月10日于成都

第 75 件的附件 总领事务谨顺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我希望，但现在还不能肯定：所有的英国臣民，除了泰克曼

先生和我本人之外，都将于明天顺利地离开成都。

正如我在上封信中向您报告的那样，我们已经有了最令人烦恼的经历，而且现在仍处于十分不安的状态中。在对照昨天早晨写的那些信件的时候，我们发现，因骚乱而遭到损失的外国人，只有日本领事馆的助理三蒲先生以及他本国的一些国民，他们大都是某个公立学堂的教员。这些人申诉，他们个人的几乎全部财物不是被抢去，便是遭到毁坏。在四僧寺，虽然可数的大火一度不下十五处，而且满载着掠夺物的叛乱部队在他们的大门前面不断走过，但他们的房屋是受到尊重的。的确，菲舍尔先生的房屋（德国领事馆）于早晨五时被人闯了进去，但正如我已经报告过的那样，闯入者在发觉那是外国人的住宅后，便退出去了。

成都已有一天的时间不存在任何一个政府；有许多谣言说，黄昏时将因此而发生更为严重的骚乱。上午十时左右，那位在四川宣布独立时已辞去成都知县职务的史某^①前来看我，询问各国领事能不能采取某些步骤，保证使成都组成某种类型的政府。他暗示说，人民可能邀请赵尔丰再度主持工作。我说：我们必须不干预中国的内政；我们所有的要求是我们的国民不受干扰。只要是我们的条约权利受到尊重，我们欢迎中国人自己建立的任何政府。

事实上，赵尔丰于那天早晨确实发布了一个简短的韵文告示：

“陆防两军，火速回营；
昨事既逝，毋须再论。”^②

这个告示的标题是“总督部堂示”。另外还贴出了两个有韵的告示：一个是用军政府的名义发布的；另一个是各地联合会会长

① 史久龙。

② 未查到中文原件，此处系据英译文回译。

李^①发表的。

军政府的告示一般被认为是赵尔丰会同田道台一起发布的，内容如下：

“昨夜之乱，罪责归诸政府。伤我人民，使彼遭受痛苦。现调军队，制订紧急方案，以期恢复秩序。暂时关闭城门，集中各支部队。密切注视街道，严禁抢劫行为。违者将予重惩，使人获得安宁。尔等毋须惊恐，各自安居乐业。”

告示的其余部分是更值得注意的。它这样写道：

“奉命召回军队，不分陆军防营。彼等虽已逃散，迅将重归丁好。往事已不可追，今后照章付饷。两湖铁路股东，招募上兵防御。总督特此命令，务使军队足额。”

这些告示读起来必定象是许多放出去的试探气球，以了解民众是否将使赵尔丰恢复总督的职权。假若情况果真如此，它们显然没有达到目的，因为昨夜已宣布由一位四川人、陆军统领尹昌衡任大汉军政府都督，罗纶任副都督。

那些打着保路同志会的旗帜，曾经在新津、灌县以及成都外围其他许多地方与清军进行战斗的人们，整天不断地涌入城内。现在，我们听说他们与巡防队之间发生冲突，并且担心成都将发生巷战。然而，不久就已很清楚，同志军在人数上超过了巡防队，他们控制了局势。那天前半夜只偶然发生射击，在许多情况下开枪射击似乎只是向那些怀有恶意的人表明，卫队正在进行戒备。不过，凌晨二时，发生了卡嗒卡嗒的排枪射击，步枪子弹打倒了那些构成英国领事馆背部的大树。这究竟是同志军与巡防队之间的冲突，还是巡防队企图更进一步地恫吓市民，我现在尚未查明。无论如何，它没有再度发生，至少在这附近地区是如此。

① 原名待查。

次日早晨，我获悉：以“袍哥”著称的互助性质的秘密结社已经说服或强迫人民同意把成都城划分为几个集会地点（中文中用“码头”字样），并且正在招募可以称之为临时警察的人们入伍。新政府发布了一个简短的告示，号召人们重新开店营业，并再度悬挂“汉”字旗。接着，又于下午发布了一个较长的文件，新都督在该文件中宣称：他正作为武装部队的首领巡逻街道，对任何被发现进行抢劫的非法分子将当场处决。

事实上，相当多的巡防队因抢劫而被逮捕，已经在街上特别是在大东街被枪毙。

我听说，局势的转变主要是通过两位保路同志会员实现的。其中一个以“吴二大王”的绰号著称，曾经在温江和灌县与清军作战，得到地方绅士捐款赞助。在宣布实行共和之后，绅士们的认捐停止了；如果吴二大王没有获得起事的消息，他必定已经解散他的部队，据说该部队有四千人。他急忙赶到成都，把他的部队交给民众指挥。另一位首领孙泽沛正率领他的两千名士兵驻守双流附近的地方，据说曾应罗纶的邀请前来，当八日的骚乱开始后，他立即因此离开成都。

这些骚乱系事前进行策划，我认为这是无可怀疑的。外国人的财产（除了我所说过的日本人的财产之外）未受损害，以及把保护性的灯笼送给各国领事馆、穆那克医生和四僧寺等处，仅仅这个事实便提供了足够的证据。实际上，新政府也毫不犹豫地承认，骚乱是旧制度下的官员们煽动起来的。

我不知道，该项暗示是不是指赵尔丰而言。既然赵尔丰阁下因大清银行的被毁而几乎丧失了他在成都的所有现款，所以无论他希望通过揭示蒲殿俊政府的软弱无力获得多少好处，看来他很不象是骚乱的发动者。

本月9日夜間，在流传的许多谣言中，有个谣言说：“满族人

在外面杀人”。该谣言的来源似乎是这样的：那天早晨，孙泽沛率领的同志军偶然遇见一批巡防队从南门带走掠夺的东西。他们立即开枪，打死了好几名抢劫犯，其余的人在满城内避难。后来，同志军与满族将军议定：收缴这些避难者的掠夺品和武器，然后驱逐他们。除了在一个场合之外，满族人自己的举动始终是极为小心谨慎的，因此成都没有象西安和武昌那样因汉人屠杀满人，或象南京那样因满人屠杀汉人，而蒙受耻辱。

大部分外国侨民仍继续雇用船只，并于9日上午和下午登船。他们中间有四川省邮政司里奇先生，他的那艘船当即起锚，并顺江而下。今晨，他和他的助理乔登先生回来了，使我感到极为惊讶。在离出发地点几英里的地方，他们曾经受到截拦，尽管他们那艘船的桅杆上飘扬着一面很大的英国国旗，步枪子弹仍在他们前面和顶上掠过。里奇先生付了一百元，但不久又被拦阻，并被迫再交出一百元。当他第三次受阻的时候，他离弃了他的船只，并以每人四元的价钱，雇人把他的行李运回其他供住宿的船只仍然停泊的新军械局对岸的地方（我可以这样说，那些船只仍泊于该处）。他估计他的全部损失为八百元，而乔登先生除了衣服之外完全被抢光了。

这次袭击使我们所有的人都感到极为震惊，因为直到目前为止，欧洲人及其财产还没有遭受过损失。事情很清楚，除非新政府能够而且愿意提供一支护卫队，顺江而下的企图是毫无希望的；而返回一座刚刚遭到劫掠而且部分被焚毁的城市，又不是这些避难的人们所能接受的。在同我的德国同事商量之后，我决定尝试一下，新政府是否将就下列条款同我们达成一项协议：

（一）护送在成都的所有外国人以及他们的行李和仆人由水路前往重庆。

（二）军政府应保护他们留在成都的房屋及其他财产。

(三)全部费用，如雇用船只和给予护卫队的赏金，应由避难的外国人承担。

因此，我写信给军政府，要求会见他们。我可以说，我的那名信差在明蜀藩皇城外面，接着又在军政府官署外面，受到一名岗哨的挑衅，他用一支装有子弹的步枪对准该信差的脑袋。该信差说，另一个人确已被枪毙，那显然是出于胡闹；但我几乎不相信此事。

我送去那封信之后，接着又打电话给军政府。我从电话中获悉，他们将派一位代表于下午四时左右前来本领事馆。该代表就是那个曾于11月27日来见我的沈宗元。当他到达的时候，菲舍尔先生在座；在谈话过程中，三浦先生也来了。勒昆先生留在他本国领事馆内，等候从打箭炉带来信件的一名信差，而他本人正在天主教堂做礼拜。然而，他通过电话表示，完全同意我所建议的那项协议。

该代表也赞成这个协议，但他说，他必须把它提交给都督；他乘机对发生骚乱一事表示歉意，正象我所说过的那样，他把骚乱的罪责归咎于前任官吏。他答应我于明天早晨提出答复。

与此同时，我要求所有住在船上的英美两国人士把穆那克医生视为他们的船长，因为他不仅是成都的老侨民和军人，而且由于他说英语和法语，能够很容易地同所有避难的人进行联系。穆那克医生于下午四时半向我报告说，一切都很平静；下午五时又报告说，抢劫里奇先生的那些人已被逮捕。

这个消息使我大为欣慰，因为同它联系在一起的还有另一个证据，表明新政府正在对侵犯外国人的案件采取有力的行动。大主教盖士利寄宿舍的建筑师西普威先生把他的行李提前送出城去。这些行李在东大街被某些同志军扣押，他们把它带入那条街上正作为同志会分部的一家旅馆。西普威先生向这家旅馆提出请

求，但不能获得满意的结果。然而，当新政府一旦了解这个事件之后，他们立即促使同志军把行李交了出来。

如果新政府继续采取这个方针，并能够使各城乡地区服从命令，那么，避难者们前往重庆的航行将会平安地完成，并且各国领事可以留在成都，而不会有什么危险。然而，在目前，各城镇似乎将建立它自己的共和制；我不能肯定，在嘉定或其他地方对新政府的护照究竟尊重到什么程度。我力图送一封信给布朗先生，请求他安排我国的一艘炮舰沿江上驶至叙府，去迎接这些避难的人；但我又无法肯定，这封信是否将送到他手中。三周来，电报线已经不通，而邮政工作至少暂时也已停止。

您将认为，此地各领事馆代表已经决定，在他们被召回或他们的生命处于更急迫的危险状态之前，他们必定会留在成都。泰克曼先生已经拒绝离开我；勒昆先生不能够说服天主教士们撤离。新政府也许将宣布，它不能保证外国人在成都城以外的安全，但另一方面，如果它对那些前往重庆的避难者的生命财产承担责任，那么，在今后几天内留在此地的外侨将仅有菲舍尔先生、勒昆先生、泰克曼先生、天主教的传教士和修女们以及我本人。

务谨顺谨上 1911年12月10日于成都

二、关于中国事件的补充函电： 中国第三号（1912年）

第 76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1月30日收到

阁下：

关于我11月29日的电报^①，我荣幸地说明：我收到英王陛下驻广州总领事来信报告说，根据他的建议，英国轮船公司已决定在英王陛下军舰提供的防止海盗侵扰的保护下，重新恢复珠江三角洲和西江的航运业务。

从事此项巡逻任务的军舰有：三艘鱼雷艇往返于三水、江门与龙门之间；炮舰“母松鸡”号、“矾鹈”号及“知更鸟”号巡逻于三水与梧州之间；还有正从香港派往的驱逐舰“敏捷”号。

朱尔典谨上 1912年1月11日于北京

第 77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1月30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报告：在外交团11月23日的会议上，此事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在最近成立的内阁中，以梁敦彦为大臣的外务部的组成是不符合1901年的条约的，该约规定由皇族的一位亲王担任

^① 原编者注：参阅《中国第三号（1912年）》，第89件。

该项职务。大家感到，在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也许不可能要求履行此项规定，但清政府在未获得缔约国的同意前无权废除它。大家一致同意采取这一建议：提醒清政府注意此项国际准则，并请它通过它自己的代表同有关各国联系；按照这个意思写成的一份联合照会于12月16日送交外务部，现随信附上该照会的副本。大家还进一步商定：在这些要求未获得结果之前，各国公使将以口头通知的方式与外务部进行联系。

我荣幸地另附上外务部分别于12月2日和12月21日送来的关于这个问题的两份照会的译文。前一份照会显然是与清朝驻伦敦公使12月4日送交尊处的照会^①完全相似的，它带着一些傲慢的语气声明，外务部已经进行了改组，并且很少表示愿意考虑参加缔订辛丑条约的其他各方，而目前的做法是以该条约为依据的。然而，后一份照会系从较适当的立场处理此事，这无疑是我们的那份联合照会所产生的结果。该照会在详细说明外务部最近改组的原因之后，力图表明改组实质上是符合辛丑条约的，并谋求各缔约国的同意。

人们知道，这份照会中提到了宪法大纲以及为遵守该大纲所作的誓言，这是因为它希望使各缔约国记住朝廷认真地打算遵守它对人民的诺言，并把这些诺言当做一种声明，列强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接受它们作为一项保证。然而，事态的发展掩盖了这个说明可能具有的任何重要意义。

根据宪法大纲的条款，亲王不得再担任国家职务一事，显然迫使我们作出某种改变：在外交团本月3日的另一次会议上，我促请我的同事们注意该项文件，并且建议立即表示他们的看法将有助于各国政府决定它们对此事的态度。于是，各国使节表示同意

① 原编者注：参阅《中国第一号（1912年）》，第107件。

接受因中国制订宪法大纲而必需作出的改变，而且决定各自把来往照会提交他本国政府，并建议他们同意所拟定的外务部的改组。

朱尔典谨上 1912年1月13日于北京

第 77 件附件 2 致外务部照会

在下面签名的外交团首脑们，各自收到了外务部关于该部最近人事调动的正式通知，不得不指出：清政府对 1901 年 9 月 7 日签订的条约第十二款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该款在提及 1901 年 7 月 24 日谕旨的同时，记载了各国使节所提出的条件，即清朝外务大臣今后将是“一位王公大臣，因而是皇族的一位成员。”

在下面签名的外交团首脑们，虽然考虑了促使清政府最近任命外务部人选的各项理由，但认为他们有严格的责任使中国和各国之间现行有效的各项国际协定完全受到尊重；因此他们荣幸地建议：为了要求各国同意清朝外务部组成方面所作的变动，外务部立即与辛丑条约的签字国政府或它们驻北京的使节进行联系。

如果要使目前组成的外务部与各国公使馆之间纯粹正式的关系完全正规化，各国的这种同意是必不可少的。

1911年12月16日于北京

第 78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2年1月30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孙逸仙通知英王陛下驻南京领事说：和平的前景是良好的。由于各将领之间的谅解，汉口将不会重新发生战争。

第 79 件 格雷爵士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我收到了英王陛下驻成都总领事去年 11 月 29 日关于四川省

革命运动发展的一封信。

如果您向务谨顺先生转达我表示同意他在上述信件中所报告的行动，我将感到高兴。

格雷谨上 1912年1月31日于外交部

第 80 件 印度部致外交部函

1912年2月2日收到

印度部副大臣向外交部副大臣致意，并随信附上外事秘书1912年1月11日关于乌鲁木齐革命致印度政府的信中所附电报的副本，供外交大臣参考。

1912年2月1日于印度部

第 80 件的附件 总领事马继业致印度政府电

1912年1月6日发自喀什噶尔

12月28日，乌鲁木齐发生了一次小规模革命。四名汉人领袖被斩首之后，骚乱立即被镇压下去。

有一名官员负伤。现已显然恢复宁静。东大营的部队和土著居民没有积极参与其事。

请通知驻克什米尔的官员。

第 81 件 艾迪斯先生致兰利先生函

1912年2月2日收到

亲爱的兰利先生：

我附上海关总税务司和我本人之间来往电报的副本，这些电报是关于存入上海各国银行供偿还中国在欧洲举借的外债之用的那些海关岁入款额的。

您将注意到，我已经要求并得到总税务司的许可，公布他的

电报原文。我认为，该电报原文对那些中国债券持有人不能不具有安定人心的作用。

艾迪斯谨上

1912年2月1日于伦敦

朗巴街31号汇丰银行

第 81 件附件 1 1912 年 1 月 30 日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致海关总税务司电报的副本

汇丰银行认为，为了减轻债券持有人的忧虑以及对市场起安定人心的作用，您发表一项官方或半官方声明的时刻已经到来，宣布：存入上海各国银行供偿还外债之用的关税已征收达若干银两，征收的此项关税今后将继续于每周存入这些银行，以及经清政府同意由各国指定的国际银行家委员会将按借款偿还的先后顺序分配这些现款。自9月以来每月的税收减少了百分之多少？

第 81 件附件 2 1912 年 1 月 31 日伦敦汇丰银行收到海关总税务司自北京来的副本

供汇丰银行发表之用。人们没有理由感到惊慌。11月和12月存入上海各银行偿还借款帐户内的海关净收入为三百三十万两。1月份的税收尚未获悉，但将使总数超过四百万两。银行家委员会准备每周将净税收转入偿还借款帐户内的安排现已实际完成；借款的偿还将早日开始。11月和12月内每月减少的税收大约分别为百分之三十一和百分之二十四。

第 82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2月3日收到

阁下：

关于以前的信中所说清政府未能按期履行因偿还外债所承担的义务一事，我荣幸地报告：北京外交团正在采取步骤，以便为偿还赔款而取偿于辛丑条约中所规定的第三项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项担保物，即盐税收入。

这个问题是我的一位同事提出来的，他建议将盐税的管理置于清朝海关的控制之下。在本月3日举行的各国使节会议上，讨论了这个建议；在对一位外国人士控制下改组盐税的可能性作了一些考虑之后，决定：外交团的行动目前应限于保证使盐税除以前已拨付偿还其他外债的那部分之外，置于海关行政当局的控制之下。由日本、奥匈帝国、俄国等三国使节和我本人组成的一个委员会，被指定按照这个意思向清政府提出要求。

因此，我于本月12日邀请我的那三位同事举行一次会议；在初步交换意见之后，我们前往外务部，向该部提出了此项建议。署理外务大臣答应对我们的方案作仔细的考虑，并保证将与度支部及总税务司就此事进行磋商。

这个问题自然产生：每年从中国盐税管理中得到的总收入究竟有多少？前任总税务司于1901年在要求对中国盐税问题提供一切可得到的情报的通知中，向各条约口岸的税务司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收到的答复此问题的报告，后来印刷出来供海关人员使用。税务司们回答该问题时所提出的差别极为悬殊的估计数字表明：在缺乏官方统计的情况下，甚至猜测一个近似的总数也是多么困难。据一个估计，实际征税总额为八千六百四十万两，而上报的岁入为九百万两。税务司们大都同意哲美森先生在他的《关于中华帝国的岁入和支出报告》中所作的估计，按照该项估计，每年的盐税总收入达一千三百六十五万九千两。后来，另一位权威人士马士先生在他的《中朝制度考》一书（1908年开发公司出版）中，曾经估计说：“中国人民为食盐支付八千一百万银两，其中六千四

百万两以上是交纳某种形式的税，而按照正式公布的税则标准，盐税为三千九百万两；上报清政府的盐税收入为一千三百零五万两。”在1911年初提交北京资政院的预算中，估计“茶税和盐税”的岁入为四千六百三十一万二千两，或象资政院所修订的，为四千七百六十二万二千三百两。不幸的是，这项说明没有区分茶税岁入和盐税岁入；但由于盐税岁入必定大大超过茶税岁入，所以根据更新的情报，以前所报告的对盐税岁入的估计数显然必须大为增加。上述数字大约可以按照八银两等于一镑的比率折合为英镑。

无论盐税所得的岁入是多少，毫无疑问，如果能够把该税的征收委托给一个象清朝海关一样的机构管理，它便可以大量增加，而不致额外加重纳税人的负担。然而，参考一下上面引用的哲美森先生的报告，便将说明：由于官和商的代理人混合在一起征收该税，管理制度是多么复杂，而且涉及的既得利益是多么巨大。除非革命的进展完全推翻目前的制度，对清朝海关所能抱有的合理期望，是它们应扩大1898年所采用的那种制度，当时根据英德借款合同的规定，在某些地区派驻外国官员，以控制担保偿还该借款的厘金和盐厘岁入。实际上，行使这种控制权不过是查核各税区对已收税款所报的数额。可能被纳入中国整个盐政机构的这种控制权的范围，将取决于许多我们目前还不能预见的情况，但我们至少可以期望：由于外交团现在提出要求的结果，某些部分的盐税岁入将明确地被指定用来偿付赔款。

朱尔典谨上 1912年1月15日于北京

第83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2月3日收到

阁下：

过去几天来，关于皇帝退位的问题，已在此地的官方人士中

间随意谈论：他们采用了好几个办法使朝廷清楚地认识到，必须不再拖延听从公众的意志。谣言不断地传播说：革命军正在从海道北上；随时可以期望他们在烟台或秦皇岛登陆；本地报纸毫不犹豫地劝告朝廷体面地下台，而不要等到被迫退位。他们曾敦促各国舆论为此项活动服务，并且通知各条约口岸的商会说：如果他们申述目前的不稳定状态正在使贸易蒙受损失，并且告诉朝廷采取那些可能满足大部分群众愿望的和解措施是可取的，那么，将促进事态的发展。

根据这个意见，上海商会理事会于本月12日给前任摄政王、庆亲王和袁世凯拍发了本信所附上那份电报。外务大臣胡惟德于该日下午把那份电报交给我，要求我向英王陛下驻上海总领事查明该电是不是真实的；如果该电是真实的，它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该口岸各国商界人士的意见。法磊斯先生的答复使我能够及时地通知胡惟德阁下说：该电系商会理事会拍发，人们相信它获得该团体大多数人的赞同。我在本月14日的电报中向您简要地报告了商会的行动。

所有的报道都说明，在解决今后的政体问题（它很可能将建立共和制）以前，皇帝将早日退位并由袁世凯建立临时政府。但是，这个转变可能带来严重的困难；有迹象表明，蒙古人和北方各省都不愿意心平气和地接受这项解决办法。昨天，那些主张继续实行君主制的资政院议员的代表前来访问我；他们表示的意见，正如本信所附巴顿先生的备忘录中收录的那样，相当准确地代表了北方大部分群众的潜在的态度。

然而，没有什么疑问，袁世凯已经同南方的领袖们达成了某种谅解；满族人依靠他为他们获得宽大的待遇。据说有一位为孙逸仙所信任的姓向^①的先生，人们知道他已拜访了总理大臣好几

^① 译音，其人其事不详。

次，并且认为唐绍仪虽然不再是袁世凯所委派的代表，但他通过梁士诒仍然与袁世凯保持秘密通信。梁士诒也是一位广东人，他在这幕企图以和平驱逐统治中国将近三个世纪的一个家族而告终的奇怪戏剧中扮演主要角色。

朱尔典谨上 1912年1月16日于北京

第 83 件附件 1 上海商会致前摄政王、庆亲王及总理大臣袁世凯电

1912年1月12日发自上海

一、鉴于大清王朝的权力在整个南部、中部和西部各省已失去效力，而且该王朝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已不再能够提供条约所保证的对外国人生命财产的保护；

二、鉴于在那些即使现在尚未放弃对清王朝效忠的省份，各谘议局的代表已前来上海，自称有权宣布赞成共和政体；

三、鉴于目前斗争的继续必定使中外商人破产，扰乱贸易的正常进行，不能履行对外义务，危及外国和中国和平居民的生命财产，因缺乏控制如许多地区已经鼓励各类罪犯公然反抗法纪而必然出现的无政府状态；

四、鉴于清王朝的支持者与民国临时政府的支持者之间关于组成国民大会决定政体问题的意见分歧如此巨大，以致无法在短期内解决目前的斗争；

五、鉴于进一步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除非双方能够商定某种临时的行政管理机构；

六、鉴于就目前的情况看来，为了使全国大部分地区能够接受起见，这种临时的行政管理机构必须是民主性质的，而且事前必须废弃专制权；

七、因此，兹决定：本商会通过理事会吁请庆亲王和前摄政

醇亲王劝诱朝廷和皇族，在代表大会就中国今后政体问题作出最后决定之前，尽快筹划采取那些适当满足全国大多数人的明显愿望并使和平和秩序能够恢复的和解措施；同时又决定吁请国民党领导人方面抱着和解的精神对待向他们提出的任何建议，把全中国的利益作为他们的首要目的。

第 83 件附件 2 巴顿先生关于与资政院议员们会谈的 备忘录

下列人士作为“同志联合会”的代表团于下午二时拜访了朱尔典爵士：

于邦华，直隶省^①议员。

郑汝成，海军部副提督。

朱崇宁^②，学部。

张权，前礼部郎中，已故大学士张之洞的儿子。

冯绶^③，海军部。

张权解释说：该会有双重目的，即当地方发生骚乱时获得对生命财产的保护以及促进中国的君主立宪事业。该会成员包括所有北方各省的代表，但他们在南方也有许多同情者。他们知道朱尔典爵士关心中国的前途，并对他为促进和平解决所作的努力表示赞赏，所以冒昧地征询他对该会及其目的的意见。

朱尔典爵士回答说：关于保护生命财产的目的是值得称赞的，尽管他认为清军将承担此项责任；关于尽力促成中国的一种特定政体问题，他不能表示任何意见。

郑汝成提督解释说：如果前线需要所有的清军，则保卫生命

^① 于邦华系浙江省议员，此处原文有误。

^{②③} 译音。

财产一事将留待地方上的努力；该会已招募民团约四千人，作为防止北方发生骚乱的警卫部队。

朱尔典爵士希望：没有发生这样一种骚乱的可能性；双方仍将达成一项协议。各国所盼望的是一个使中国保持和平和统一的稳定的政府。许多外国人最初曾经认为，君主立宪最适合中国的需要，但鉴于南方的坚决反对，实现君主立宪是否可以不发生战争或不使中国分裂为两个国家，看来这是令人怀疑的。

于邦华说：因为他们深信共和制不能够带来和平稳定的政府，而且南方的多数人并不真正赞成共和制，所以他们成立该会，打算使真正的多数人有机会通过国民大会表明他们的意见。

朱尔典爵士同意关于中国大多数人只希望和平和秩序的意见，但他们打算怎样克服目前掌权的南方少数人的反对，特别是那些人显然决定废除现在的王朝？

于邦华回答说：如果能够保全革命派首领们的面子，他们的激烈反对便将消除。该会认为，拟议中的国民大会将为革命派首领们节制他们的要求提供所需要的机会，而不会丧失面子。至于清王朝，该会准备接受国民会议的意见；他们不需要坚持保留满族人。

接着，朱崇宁说：他作为北京地区的该会会长，很想了解，通过各国使节的斡旋，是否有任何可能保证该城的中立化。

朱尔典爵士说：他担心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如果该会同其他公使们联系，而且其他公使们想对此事采取行动，他将很高兴地参加他们认为可能提出的任何请求。

该代表团声称：他们打算访问其他各国使馆，并把他们的意见向所有各国公使提出类似的申述。

1912年1月15日于北京

第 84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2月3日收到

阁下：

关于我本月 10 日的信，我荣幸地报告：本月 13 日，六国使节在本使馆会晤，考虑应采取的行动方针，以应付各国指挥官可能感到将面临的几种意外事件中的任何一种。使节们对某些问题稍有分歧意见，但我们普遍同意考虑：由于目的在于保证北京至沿海之间的交通，所以六国指挥官们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使铁路线处于畅通状态。对铁路、车站、仓库、桥梁、路堤、车辆等进行长期毁坏的任何企图，都应尽可能地予以反对。另一方面，我们认为，不能够反对中国军队登陆以及他们用火车进行运输。外交使节们制订了总的行动纲领之后，认为把该问题提交各国驻天津指挥官，要求他们共同考虑并就执行所阐明的那些原则提出详细建议是可取的。

外交使节们进一步认为，自秦皇岛至唐河之间约五英里长的铁路^①系开平矿务局的财产，应包含在维持通往沿海交通的总计划之内，但由于该路线系英国人所有，所以应谋求该矿务局对此项行动的赞同。内森少校对此已欣然同意；库柏将军通知我，他正在与日本将领磋商，以便提供共同的保护。

我已经把我们考虑的结果通知库柏将军。

第 85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2年2月3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今天清晨，山海关外十英里处的京奉铁路桥梁被炸毁，因

① 此处原文疑有错误。

此一系列东行的火车失事，有很多人死亡。人们希望两天后重新通车。

第 86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2年2月3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12月20日向和谈会议提出同文照会的六国公使，于今天获得正式通知说：袁世凯于今晨接奉一道密旨，授予他同革命党人商谈条款的全权。

第 87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2月5日收到

阁下：

关于我上月29日的信，我荣幸地报告：索尔比先生和凯特先生率领的一伙人于12月4日自太原府动身，前往营救西安府的传教士和陕西省内其他教堂，昨天已返回北京，胜利地达到了此行的目的。

他们安全地救出了三十二人，都是传教士及其家属，其中有十九名英国人，十名瑞典人，以及三名（他们是一家人）归化的美国人。获救的英国臣民的姓名如下：

从绥德州救出的有：沃森夫妇和两个孩子；科麦福德先生。

从延安府救出的有：博斯特-史密斯夫妇和一个孩子。

从西安府救出的有：史密斯夫妇，查特医生和夫人，瓦特女士，贝京色尔女士，托马斯女士，特纳女士，埃利森先生，希尔茨先生，以及斯坦利先生。

获救的瑞典人和美国人那些家庭都是从西安府救出的；该伙人自西安府护送出来的英国臣民都是英国浸礼会的成员；西安府的其他各国人已于12月3日撤离，正如我在上面提到的那封信中

所说的那样。

几天前，我很欣慰地获悉，上述那一大伙人已经平安地抵达汉口，但我还没有得到关于他们此行的详细情况。

我很遗憾地说：属于英国浸礼会的三个家庭未能设法利用这个机会逃出来，现在仍然留在西安府。他们是资历较深的教士：肖乐克夫妇和一个女儿，杨格医生、夫人和一个婴儿，以及罗伯逊医生。这两名医务人员积极从事红十字会的工作；索尔比先生和他的同伴们都认为，对他们两人来说，离开他们的岗位是不符合他们的职责的。然而，那伙营救的人曾尽力说服肖乐克先生送走他的家属；本信所附上的他们在会议上通过的一份决议的副本表明，他们的意见曾明确地向他表示过。我附上我所收到的肖乐克先生说明西安府局势的两封信件的副本。他在第二封信中，解释了他留在西安府的原因。我可以补充说：索尔比先生承认，革命当局可能在所有外国人撤离途中设置一些困难，因为他们很想使某些人特别是肖乐克先生继续留在该地，据说肖乐克先生在中国人中间的影响是很罕见的。

只要革命派继续占有西安城，这些人也许是很安全的，但当那伙营救的人于本月4日离开的时候，陕西巡抚升允率领的一支甘肃部队已自西面逼近，到达离城约五十英里的地方，而在他们前面，河南的清军自东面正把起义军逐往潼关，除了缺乏纪律的一群土匪之外，没有任何人阻止清军抵达西安府。因此，西安城的被围是完全可能的，结果是该城被攻克，而且对屠杀驻防旗兵一事进行血腥的报复，那时外国人的地位将是极为危险的。

索尔比先生率领他的那伙人在归途中，走直路穿过潼关前往河南府，每人似乎都已同意的这条道路由于发生战事而不能通行。应当说明，为了让他们那伙人安全地通过战线，河南清军的向前推进延缓了一整天，这是目前的革命中双方负责官员们对外国人

所采取的态度特点。

我希望把我对他们这次远行的机智勇敢态度的赞赏记录在案。

朱尔典谨上 1912年1月18日于北京

再者：我荣幸地随信附上西安府都督写给我的一封信的译文，该信是他请索尔比先生转交给我的。

朱尔典又及

第 87 件附件 1 1911 年 12 月 29 日陕西 营救队一致通过的决议

鉴于陕西的政治形势象原来促使我们所料想的一样，是非常严重的，我们这些赴陕营救队的成员感到有义务表示这样的意见：让任何妇女和儿童继续留在西安府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仍在城内的所有外国人应按照英王陛下公使的建议行事，立即动身前往沿海。

此项意见获得营救队的一致通过。赞成此项意见的决议曾在西安府的外侨会议上提出，并以十四票对十票通过。

第 87 件附件 2 肖乐克先生致朱尔典爵士函

亲爱的约翰^①爵士：

我已经把我们在此地的状况向汉口领事作了一些报道，但我完全没有把握，那些报道是否将送到目的地，因为沿途仍有大批歹徒出没。

一伙美国传教士和本省邮政司亨先生在一支卫队护送下，将于一两天内动身；这就提供了送信给您的机会。电报线有几十英里遭到毁坏；我们将在今后几个月中同外界没有电报联系。邮政

^① 约翰系朱尔典的教名

已经瓦解，亨先生离去后，情况将更趋严重。一切重要的联系都必须通过私人的信差。本省的革命是很残酷的。满族人措手不及地被俘获，而且在三天之后几乎全被消灭。他们听天由命。他们的武器陈旧不堪，而革命军是用速射枪炮武装起来的。在满族居民中留下了许多年老的男人和妇女，但必定有近两万人被处死。最初，我认为一万人是最低的估计数字，但现在，经过仔细调查之后，我判断被处死的人数更接近两万，而不是一万。在发生战事的头两天内，我们这些在西安府的人可能统统被消灭。我们中间没有任何人得到他们策划起事的通知。城南的一个美国教会受到攻击，有八人被杀死，其中包括六名儿童。所有其他地方都处于急迫的危险之中。我们被那些嚎叫的企图抢劫和杀人的暴徒们所包围，但本地绅士和一些改革者的行动是极令人满意的，他们使我们平安地渡过了危险。在农村，许多盗贼和杀人的凶手到处横行。直到经历了相当大的危险之后，本教会的两伙成员才由装备精良的护卫人员伴送前来。

在延安府和绥德州，还有本教会的一些成员。沿途太不安全，因而他们不能离开那些地方。在经历了一些很难熬的日子之后，他们现在还是平安无事的。他们大概将尽快地被送到此地来。由于这里有大批“哥老会”，从而使那些改革者大受妨碍，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他们联合起来反对满族人，然后不得不设法联合组成政府。此事正如您可以想象到的那样，已经证明是更加困难得多。若干天以来，他们以洪汉军与复汉军的名义互相区别开来，改革者采用复汉军的名义，哥老会则采用洪汉军的名义。直到目前为止，他们已联合一致采用同样的名义，现都统一在复汉军之内。这绝不是证明分歧已经得到调和，或双方的目的和手段今后将趋于一致。情况远远不是这样。洪汉军的方针完全是扩张自己的势力；复汉军的方针则是爱国的。据许多聪明的中国人看来，他们

的团结似乎是不可能的。据我看来，也确系如此。然而，双方都同样地很想对我们提供保护；看来好象我们目前在此地有了这种保护比在途中容易遭受各种难以预测的危险更为安全。一个很大的危险是回民自西部的入侵。最近许多天来，西安城因惧怕这个威胁而处于非常骚动的状态。此地的前任抚台、后来又任陕甘两省总督的升允，确已逃往甘肃并招募一支部队，企图对复汉军屠杀满族人进行报复。这支部队是否将前来此地，仍有待了解。这里的当权人物很可能对回民进行贿赂，要他们留住在他们目前所在的地方。西安府已经大遭洗劫。各钱庄损失了四百万银两，主要是受到城内的士兵和回民的劫掠。现银奇缺，但粮食很充足。本教会在其中存有款项的一些钱庄已趋于彻底破产，但官员们说，他们将赔偿我们的损失。我们以后将会明白的。他们已借给我一千银两。我们的处境是很特殊的。现在我们是否享有任何条约权利？目前各省是怎样联系起来的？我们对外界的事情一无所知。是否有任何中央机构？如果有这种机构，它在何处？此地的当权人物希望我们继续留下来；除非我们认为不可能继续留在这里，我们这些英国传教士（即浸礼会教士，因为我们是英国在西安府仅有的代表）大都将不离去。我们有权继续进行我们的工作，并且正得到很好的照料。如果您能够把您的意见告诉我，根据您对整个中国情况的较广泛的知识看来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我将感到高兴。此地掌权的大多数人（我可以说不所有的人）都很年轻而且没有经验；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他们对待一切事情多么轻松。

致以衷心的问候。

肖乐克谨上 1911年12月1日于西安府

第 87 件附件 3 肖乐克先生致朱尔典爵士函

我亲爱的约翰爵士：

一周前，由凯特、索尔比、奈斯特龙等先生组成的一伙人已抵达这里。我们衷心高兴地见到他们；对这些人的勇敢和献身精神，我们无法充分表达我们的钦佩心情。他们将把关于西安府的所有消息告诉您，所以我不必详细叙述。然而，我必须说明，我们有些人为什么留了下来。这里有两位医生，即杨格和罗伯逊，他们都受到革命军的热烈欢迎。杨格目前在西面五十英里的地方，医治该处许许多多的伤员，因为在陕西部队与甘肃部队之间正在进行激烈战斗。罗伯逊在这里有家医院，住满了伤兵，其中人都是在东面被河南部队击伤的。这两位医生感到，在这些伤病员极为困难的时候，他们不能离开他们的病人，也不能舍弃那些士兵和首领们。我留下来支持他们，并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我对革命党人有某些影响，他们很想使我留在此地。他们已经答应尽力保护我们，并把我们所需要的现款给予我们。我留在这里还有另一个原因。甘肃仍然有许多传教士，都是英国人和美国人。我感到，为了前来此地的那些朋友的安全和舒适，似乎必需有人留在西安府。有些人很可能到达此地时非常穷困；我的妻子和我开着我们家里的大门，能够对那些过路的人大有帮助，特别是对妇女和儿童们。现在住在西安府的唯一的一名妇女是杨格夫人，她因为她的孩子而不能离开此地，那个孩子有病，绝对不能挪动，除非冒最大的危险。我诚挚地希望，我们留在此地的举动将绝不干扰或妨碍您的计划。如果认为派遣一支外国军队深入内地镇抚农村地区是可取的，我绝不认为我们的安全将因此受到危害。双方的首领们都很聪明，能够理解如果在这样一个时刻对我们采取敌对行动，他们将遭到极大的损失。这两天来，此地掌权的人们大都对我们作了很友好的访问。他们想要得到我们所代表的国家的好感。对南郊所发生的悲惨的和卑怯的事件，他们再三表示歉意和惭愧。在那个事件中，有八人丧命，其中包括六名儿童在

内。如果以为这场灾难表明了（或现在表明）首领方面的任何既定政策，那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在起事的头几天内，当缺乏权力机构而且各方面的暴徒都得到纵容的时候，此地所发生的所有涉及外国人的事件，不仅落在我们身上，而且也落在中国人自己身上。令人惊讶的是，我们中间只有这么几个人遭到严重灾难。我知道，当我们留在此地的时候，您将尽力为我们办事。如果您直接写信给“张统领”^①，那将产生很大的影响，并会使我们的地位更加安全。但我没有把握，您是否能够这样做。只要革命派首领掌权，他们当然不理睬袁世凯的权力。然而，如果北京方面发生变化，我相信，只要有任何可能，您将直接与此地的统领联系。假若您能够立即这样做，那将对我们大有帮助。如果我能够在帮助美国公使的联系方面起些作用，我将感到高兴。我无需说明，我将多么高兴地收到您的信，并仔细听取您发布的任何指示。现银缺乏，贸易停止；陕西部队主要是由新兵组成的，他们正受到前任陕西抚台升允率领的甘肃部队的强大压力。但是，我们受到此地首领们很好的关怀和照料。虽然士兵们仍然非常缺乏纪律，但我认为，他们正开始受到更多的控制。

致以衷心的问候。

肖乐克谨上 1912年1月3日于西安府

再者：我们的女儿玛利（十岁）同我们在一起，但我们希望不久便把她送走。如果中国仍继续很不安定，当甘肃的朋友们一旦离境后，我们将立即南行，前往汉口。

再者：目前，甘肃的传教士们似乎不可能沿大道前来西安府。当战事正在进行的时候，没有一个中国人同意在甘肃边界上来往

① 张凤翔。

递送任何信件。

肖乐克义及

第 88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 年 2 月 5 日收到

阁下：

关于我本月 16 日的信，我荣幸地附上汉口商会发给我一份电报的副本。电报说：该团体非常坚决地赞成上海商会 1 月 12 日电报中所表示的意见，并且相信外交团对这些请求将给予支持。

我正把这两份电报的副本在我的同事们中进行传阅。

朱尔典谨上 1912 年 1 月 19 日于北京

第 88 件的附件 汉口商会致朱尔典爵士电

1912 年 1 月 16 日发

关于上海商会 1 月 12 日发给庆亲王和醇亲王的电报，汉口商会非常坚决地赞成该电中所表示的意见，并且相信外交团将给予支持。

第 89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2 年 2 月 5 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关于我 1 月 12 日的电报。

到 1 月 20 日，驻成都的各国领事都安然无恙。四川总的形势逐渐有所改善。

第 90 件 格雷爵士致朱尔典爵士电

1912 年 2 月 6 日发自外交部

请您报告，为偿还以海关岁入为担保的借款而建立银行家委

员会一事所做的安排，是否已经完成。

我知道，事实就是如此。

参看您1月2日的信。

第91件 格雷爵士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我收到您1月13日的来信，该信谈到外务部的改组以及外交团采取步骤使清政府记住他们根据辛丑条约所承担的义务。

我必须通知您，英王陛下政府不反对外务部大臣今后不由亲王担任的建议。我授权您把此项决定通知清政府，但始终是以其他缔约国表示类似意见为条件。

格雷谨上 1912年2月6日于外交部

第92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2年2月7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关于您2月6日的电报。

所作的安排已经完成，并于1月30日对银行家委员会发出了指示。

我1月30日经西伯利亚发出的信中，对此事作了详细报告。

第93件 总领事务谨顺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2月9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随信附上我今天写给英王陛下驻北京公使的一封信的副本，报告成都发布了一份诽谤英国在印度统治的传单。

务谨顺谨上 1911年12月20日于成都

第 93 件的附件 总领事务谨顺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我荣幸地报告：一份印刷的匿名传单于 12 月 18 日在成都公布和散发。这份文件的大意是呼吁所有善良的公民联合起来支持新的军政府，目的在于使四川免遭破坏，这个目的在各方面都是值得称赞的。然而，不幸的是，作者引证了印度的灭亡作为威胁四川的各种危险的一个事例，而且接着叙述了通常关于英国人如何压迫印度人的一些无耻谎言。

这份传单引起我的注意后，我立即给都督写了一封短信，指出：虽然该匿名作者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护和平，这无疑是值得表扬的，但他提到另一个国家，而且其中包含有无耻的谎言，企图煽动居民起来闹事，并有损于国际之间的礼让。

第二天，该传单发表在一家中文报纸上，用“他国”代替“英国”字样。由于这时我还没有得到都督的答复，我马上再度写信给他，催促立即采取步骤，停止那份引起反对的传单的散发和刊行。

今晨，最近设立的洋务部（即外务部，以前称之为洋务局）副部长杨少荃对本领事馆进行了正式的访问。杨先生是基督教青年会成都分会中一位有影响的成员，我想他是会长，会说很好的英语，这一事实自然有助于对他的外交活动提供很大的便利。他立即提到传单的事件，说明他刚刚从都督那里收到我的两封信，请求我对他延期答复一事予以宽容，并向我保证说，他已经派出侦探，制止该传单的散发和刊行。

然后，杨先生接着向我提出下列事情。他说：都督已经设立各部，授予他们在各自范围内的全权。因此，他请求我今后不要写信给都督，而写给外务部。我回答说：我希望不进一步使新政

府感到为难，但是，根据以往的制度，我们各国总领事照例就所有重大问题与巡抚或总督直接进行联系。如果此时四川将构成中华民国的一部分，那么，我认为，在英王陛下公使作了相反的指示之前，我有责任继续维护与都督直接通信的权利，因为都督是代表以前总督的权力的。然而，如果象情况所显示的那样四川将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当然，我把我的信件寄交外务部是妥当的。接着，我继续向杨先生直接提出这个问题：四川将被认为是一个独立国家，还是中华联邦共和国的一部分？多少有点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他回答说，他的政府现在还不能够说明此事。但是，他补充说：鉴于在这个紧急时刻交给都督的工作极为繁重，他希望我能设法至少暂时默然同意他的要求。我对此表示同意，指出：我们始终希望尽可能为新政府使事情变得轻松一些。后来，我的法、德两国同事通知我说：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将仿效我的榜样。

杨先生告辞后不久，我收到外务部的一封信说：他们正在采取步骤，查明该传单的作者，并制止它的进一步发行。

务谨顺谨上 1911年12月20日于成都

第94件 总领事务谨顺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2月9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报告：前任总督赵尔丰已于昨日被成都革命军政府处死。

务谨顺谨上 1911年12月23日于成都

第95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2月9日收到

阁下：

我曾荣幸地于本月18日拍发电报，把我那天同总理大臣谈话的主要内容简要地通知您。

那时，袁世凯感到深信他有能力与南方共和运动的首领们达成一项协议，在清帝退位与国民大会议员们在南京和北京选举总统的这段期间内，组成一个临时政府负责进行全国的行政工作。他的主意是：发布一道谕旨，授权他在一周或十天内组成一个临时政府，因为他需要这些天进行选举，使得他自己被任命为总统。

正如您将从我今天的电报中所了解的那样，这项计划已经失败；本信所附袁世凯与上海、南京的革命派首领们之间来往电报的摘要，将最好地说明该计划是怎样失败的。仔细阅读1月14日和15日的头三份电报，有助于证明：袁世凯在和我会晤的那一天（1月18日），完全有理由认为伍廷芳已默然同意拟议中的步骤。但是，孙文本本人1月20日的两份电报唱着大不相同的调子，并且明确地说明：北方不得设立临时政府；袁世凯必须接受民国方面对他的任命，而不能从满族人那里取得任何权力。

人们很难理解，按照孙文在这些电报中制订的条款，在清帝退位与成立政府的这段期间内，北方将怎样过渡。民党的目的无疑是要表明，胜利是属于他们的，但如何实现这个目的而不在此地造成危险局势，则不是很清楚的。

由此产生的意外障碍，已经在北京重新引起了一种不安的情绪，并且鼓励了满族人中的极端分子反对清帝退位。前任陆军大臣、袁世凯的对手铁良返回北京，大大加重了局势的困难，而且在一些较大胆的人物中，倾向于使铁良担任禁卫军的首领，与民军一决胜负。所有这一切很可能延长目前的紧张形势，并延缓问题的解决。

朱尔典谨上 1912年1月22日于北京

第 96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 年 2 月 9 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附上新任中华民国外交部长伍廷芳博士写给英王陛下驻上海总领事的一封信的副本，该信送来孙逸仙总统发布的一份告各友邦书，并要求将它转交英王陛下政府。

朱尔典谨上 1912 年 1 月 23 日于北京

第 97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2 年 2 月 9 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昨天，日本军队在盛京进行了严密的巡逻，因为各国领事收到了一封信，要求他们立即将其本国国民撤入各国租界。该信诡称系蓝天蔚将军写的，但后来查明是假的。

蓝天蔚以前曾在盛京担任协统，但已离职，现住在烟台。

第 98 件 总领事务谨顺致格雷爵士函

1912 年 2 月 12 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随信附上我今天写给英王陛下驻北京公使的一封信的副本，报告成都的各国人士由水路动身前往重庆。

务谨顺谨上 1911 年 12 月 13 日于成都

第 98 件的附件 总领事务谨顺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成都的欧美各国侨民已于本月 10 日登上可供住宿的船只，终于在昨天下午四时半启程前往重庆。

军政府曾答应我，对领事团给该政府的信将通过电话给我一个答复。我在本月10日的信中曾经提到这件事情。11日的整个上午，我等待答复，但终无结果。最后，彬彬有礼的但却很急迫的信差带来一封短信说：该日上午已派了姓杨和姓梁的两位先生同我亲自安排一些事情。

我立即答复说，没有人到我这里来过，并表示不赞成再拖延下去。下午四时，我收到第二封显然是匆忙写成的短信说，他们已派人去保护各国住在船上的那一伙人，并邀请我本人前往皇城（新政府机关所在地），讨论护送他们沿江下驶的问题。

由于都督和副都督都没有来看望我，而仅派他们的代表或委员来过，所以我派泰克曼先生代表我前去，由贝茨先生陪同。

泰克曼先生后来的报告如下：

“我们在下午五时左右抵达皇城。附近的街道上挤满了武装上兵，他们携带着各种武器，从大刀和旧式步枪到马梯尼枪和毛瑟枪。人群散开了，极有礼貌地为两名外国人让路。

耽误了一阵之后，我们被引进一间小的接待室，在那里会见了尹昌衡都督。都督显然等待着我们前来，在对问题作了简短的讨论之后，他便走了，说他必须征询‘罗大人’（罗纶，副都督）对此事的意见。

十分钟之后，一位老年人，即9月7日被捕的另一位保路同志会首领颜楷大爷，露面了，并且说，他奉军政府的委派商议问题。经过一些讨论后，他告诉我说，完全不可能照我恳切要求的那样在黎明时提供护卫队，但他给予我一个最明确的保证，即至少应有一百名上兵在江边，准备于下午三时出发。

据我看来，军政府似乎极想尽一切力量保护外国人。但是，为了获得一张于那天夜间通过东门的护照，我去军政府机关的业务部门看了一下，显示出一切事情都处于令人感到绝望的混乱状

态，他们甚至解释迟迟不派出护卫队的原因。当询问他们关于自成都被洗劫以来取得的进展情况时，他们说：他们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困难，即财政方面的困难，这是由于藩库被抢劫的结果。他们还声称：目前的政府虽然是由同志会（保路同志会）扶植上台的，但现由革命党主持工作。护卫队将由他们双方提供的士兵组成。

缺乏纪律的兵勇涌入皇城的庭院，助长了混乱和喧嚣的情景，但尹昌衡都督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的年龄大约为三十岁，瘦高个儿，留着短发，行动敏捷。他在日本受过一段教育，担任陆军军官预备学堂的监督。”

12月11日那天下午，一度担任基督教青年会会长的杨开甲（他的号或人们熟悉的名字“少荃”更为著名）在电话中警告我说：成都可能再度发生严重的骚乱；如果不仅是各国国民而且还有各国领事都动身前往重庆，那就更好了。他承认，他曾于8日下午派人送来上面写有“正”字的白色灯笼；他说，他已于那天早晨到船上去商议关于护卫队的问题。我不能够完全理解，威胁成都的确切危险究竟是什么，但我猜想革命党对军政府仍不完全满意，同时他们担心与陆军发生冲突。不过，关于此事，我也许有机会在下一封信中谈到。

在我们经历了本月8日的事件之后，我不能对该项警告等闲视之。但因为天主教士绝不同意撤走，而且勒昆先生几乎每天期待着安迪先生的到达，所以他说他必须继续留在成都。那时，菲舍尔先生和我本人不能够考虑撤离，而泰克曼先生请求我让他和我作伴，我表扬了他的勇气。不过，我感到应利用这个机会送走我的那位文书的家属（他是1902年被霍希先生带到此地来的，霍希先生现在是亚历山大爵士）。他们的家于8日夜间接被暴徒们毁坏；我想，我们在道德上（即使不是在法律上）有义务设法使他们得到赔偿，并把他们置于安全的地方。我把我个人的较贵重财物交

给贝茨先生照管，同他们一起送往重庆。

我以代首席领事的资格，在非舍尔先生和勒昆先生的完全同意下，要求穆那克医生担任乘船的那伙人的首领。他是法国陆军的一名军官，会讲英文和中文，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外人士的欢迎。我已建议他请贝茨先生担任他的副手。贝茨先生是一位有造诣的语言学家，沉着镇静，头脑清楚，并有勇气。乘船的一伙人，不包括日本人那一伙在内，共有一百零七名男人、妇女和儿童，分散在二十九只船上。它包括英、法、美、德、俄等国的臣民或公民。

日本人那一伙共有四十二人，分散在六只船上。由于驻重庆领事葛西先生的助理三浦先生是那伙人中的一员，所以我留待给他与穆那克先生作出安排。

此外，日本人那一伙直到今晨才能动身，而该船队的其余船只象我已经报告过的那样，已于昨天下午四时半启航。然而，日本人的船只比较小巧轻快，将迅速赶上其余的船只；由于岷江上游水位很浅，其余那些船只只能够缓慢地行驶。那时，联合船队将共有三十五只客船，还有运送护卫队的船只。

部分护卫队是由吴二大王提供的，他至今是一支流动部队的首领，但现在与军政府采取一致行动。该部队大约有一百二十人，士兵们穿着整齐的黑色制服，配备着很好的新式步枪。他们派了一艘巡逻艇在前面开路，警告沿途不得进行干扰。昨天深夜，杨开甲给我送来了两份护照。其中一份是军政府发布的，并盖有它的关防（我想，军政府的军字是打算译成“君”字，而非“军”字的）；另一份是杨维以通知书的形式致革命党人的。杨维是四年前被赵尔丰逮捕的五名学生之一。这五个青年中有两人不久便被释放，但其余三人，包括杨维在内，被关在监狱里，直到成都宣布独立的前一天为止。现在，杨维是革命党即同盟会成都支部的

领导成员之一(就我所知,这或许是新任命的)。

无论如何,他对保护外国人的政策所提出的那些理由是很正当的,而且据我观察,它们会被此地的所有负责人士所接受,而不管他们是哪个派系。今晨,我派骑马的信差把这两份护照送给穆那克医生。有了这两份护照,我相信该船队将不会遇到任何阻碍。

我在穆那克医生的请求下,于今晨致函军政府(形势迫使我们不得不承认它),感谢他们提供一支护卫队,并且说:虽然对这些士兵的旅途费用已经作了安排,但由此得到保护的外国人想要了解,军政府将允许该护卫队接受多少赏银。

军政府的答复建议说,每人一元钱就够了,但提议由我付给护送船队的报酬,不仅是包括赏银,而且包括全部费用在内。这是一个特别令人愉快的和心胸宽大的建议,但我相信:乘船的那伙人虽然表示他们理解该建议的慷慨大方,但将坚持由他们自己支付赏银。

务谨顺谨上 1911年12月13日于成都

第99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2月12日收到

阁下:

过去十天内,此地事态的发展并没有使得目前关于清帝的退位一事比本月16日我写信的时候更接近于实现。我们不能说,目前的迹象表明以袁世凯扮演调停人的清帝与人民之间进行的斗争将早日获得解决。

我们完全不可能了解袁世凯与上海民党首领们之间进行的曲折的谈判过程,或是从双方对于不能达成一项解决办法各自指责对方的许多互相冲突的说明中分辨出真实情况。部分原因也许是

由于显然同时进行着两起谈判：一起是袁世凯与伍廷芳之间通过电报直接进行的；另一起是梁士诒与唐绍仪之间进行的。

如果完全撇开谈判时所使用的某些冗词赘语，最后结果似乎是以铁良为首的北京反动派已经顺利地诱使朝廷放弃退位的意图，袁世凯不得不退回到原来提出的吁请国民大会决定该问题的那项建议。

1月25日发布的一道谕旨把他们改变态度一事通知了人民，同时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由于正在进行召开国民大会的安排，所以关于退位的谣言在北京所造成的惊慌是没有理由的。

袁世凯在他昨天发给伍廷芳的一份电报中，对他以前提出的关于国民大会选举的建议作了很大的修改，目的在于使它成为一个更容易驾驭的团体。革命派准备当袁世凯一旦宣布赞成他们的事业的时候，便立即接受他为民国的总统。

人们不可能想象出一种比最近北京存在的更为复杂的情况：现在已经开始的恐怖主义统治只可能是更严重动乱的前奏。继企图炸死袁世凯之后，昨夜又发生了对良弼的一次类似袭击，良弼是能干的军谘府大臣，在反对退位的活动中起了显著的作用。城内主要官员居住的那部分地区实际上已处于军事占领状态。政府机构已完全瓦解；使馆区和天津各国租界住满了象那桐和其他官员之类的避难者，他们在掌权的日子对于诋毁这些外国人享有特权的方面是绝不感到厌倦的。目前中国所有各派的显著特点是互不信任，使得收回主权的叫嚷暂时沉寂下来；当考验的日子到来的时候，除了受到许多诋毁的各国租界之外，在所有这片广阔的国土上，没有一块这样的地方，敌对各方能够在那里会晤，调解他们之间的分歧，或是过去统治这个国家的人们，认为他们的生命财产在那里不受他们自己的暴政所引起的暴力行为的侵犯。

1911年12月9日在汉口通过英国调停所商定的停战，或更严格地说暂时中止冲突，经过几次延长期限之后，将于本月29日早晨届满；就人们目前的判断来说，它未必可能继续展期。战事已经在津浦铁路线上开始，令人畏惧的张勋在那里已经击退了一大批革命军。过去几天内，发表了许多小册子和传单，一些写匿名信的人已经送给我若干份，它们主张必须把国家的问题留给战争裁决。但是，如果这些声明的意思主要是保全体面，而且任何一方对继续作战都没有表现很大的热情，那将不会使我感到惊讶。

局势中的一个喜剧性的因素，是袁世凯被晋升为侯爵。朝廷意味深长地告诉袁世凯，他一定不要拒绝这个爵位，因为袁世凯大概感到接受该爵位不适于被推荐担任民国总统的职务。

朱尔典谨上 1912年1月27日于北京

第100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2月12日收到

阁下：

关于我分别于本月16日和19日写的信，其中附有上海和汉口两地商会发至北京赞成清帝退位的那些电报的副本，我荣幸地说：上海商会把他们提出申述的原文电告香港，并强烈建议香港商会理事会电请庆亲王和醇亲王同意他们的呼吁。

香港商会采纳了这项建议，通过此地的汇丰银行经理发来电报，并且还采取步骤把他们所持的意见通知上海的革命派首领们。

朱尔典谨上 1912年1月28日于北京

第101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2年2月12日发自北京，次日收到

关于清帝退位问题。

今晚已发布三道谕旨。

第一道谕旨授予袁世凯全权，组织一个临时政府，并且与民党首领们进行谈判，以便制订一个联合方案，将南北双方团结在共和国之内，共和将是既定的政体。

第二道谕旨列举了皇室所接受的优待条款，双方将把这些条款通知各国使节，以便转交各该国政府。

第三道谕旨劝告官吏和人民执行新政府所规定的各项职责，并下令采取维持和平的措施。

第102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2年2月12日发自北京，次日收到

关于我今天的电报。

我收到下列三份正式通知，要求我将它们转交英王陛下政府：

一、旧制度下的外务大臣的照会，传达关于清帝退位的谕旨。

二、作为现存制度下外务部首脑的外务大臣的照会，它说：根据他收到的作为建立临时共和政府的全权大臣袁世凯的指示，在组成临时政府以前，他将按照现存条约办理国际事务。

三、袁世凯以上述全权大臣资格送来的照会，传达关于今后优待皇室问题所商定的条款。

第104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2年2月14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关于我2月12日的电报。

外务部在给各使馆的一项通知中，要求各国公使通知各该国政府说：中国驻外使节的称号暂时改为“临时外交代表”。

第 105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2 年 2 月 14 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关于我 2 月 12 日的电报。

在昨天举行的外交团会议上商定：我们对那些照会不提出答复；同外务部的必要联系将通过会晤或非正式函件进行。

第 106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2 年 2 月 14 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关于清帝退位问题。

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没有因南京临时政府对退位谕旨的态度而有所增进。

孙逸仙已电邀袁世凯立即前往南京，并声称：共和不能由满族皇帝发布命令建立起来。他说：如果北方因袁世凯不在那里而有发生任何混乱的危险，袁世凯可提名某人，而由临时政府授予他维持和平的全权。

这项建议造成了僵局，看来它似乎是行不通的。

第 107 件 总领事务谨顺致格雷爵士函

1912 年 2 月 16 日收到

阁下：

关于我本月 23 日的信，我荣幸地随信附上我今天写给英王陛下驻北京公使的一封信的副本，报告赵尔丰被处决以及预料民军与清军之间在雅州附近可能发生的冲突。

务谨顺 谨上 1912 年 2 月 29 日于成都

第107件的附件 总领事事务谨顺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我荣幸地报告成都军政府对捕杀赵尔丰一事所提出的理由。

本月23日，四川（或者更确切地说，成都军政府）外务部司长兼代部长杨少荃面告德国代领事非舍尔先生说：成都军政府已发现赵尔丰不仅对12月8日的乱事负有责任，而且和傅嵩焘（代理川滇边务大臣）一起策划阴谋，傅嵩焘现率领一支边防军驻在雅州。

这次谈话后不久（谈话是在外务部进行的），杨少荃打电话给我。他用英语询问说：“您是否已听说我们处决了总督？”我回答：“为什么原因？”他接着说：已经查明，赵尔丰于12月5日发给每名士兵一元钱、每名军官十元钱，进行收买。此外，军政府截获了总督写给驻在雅州的傅嵩焘的一封信。他又说：军政府正写信命令傅嵩焘返回打箭炉，代表他们担任边务大臣；但他承认，这项举动的真实目的是不让他闹事。一两天后，将派一支有一百名士兵的护卫队前往邛州，去迎接和护送安迪先生前来成都。

26日，我到外务部回访了杨少荃，但他没有提及处决赵尔丰之类的话，而我认为不便提出这个问题。

当时，傅嵩焘在雅州似乎正遭到变兵的围困，那些变兵曾于本月10日劫掠嘉定。

昨天，此地人们普遍的印象是，在雅州的不仅有傅嵩焘，而且还有巴塘的西军（“川西部队”）统领凤山；他们两人都很热衷于为他们的庇护人赵尔丰之死复仇。然而，今天的《四川公报》根据凤山的妻子所提出的信件说：凤山现仍在巴塘；由于他的左腿患风湿病，他已于11月9日辞去统领的职务。12月26日从雅州带信前来此地的信差报告说：在他动身的时候，凤山不在该城。

不过，在游击部队首领孙泽沛^①率领下的一支强大的远征部队已离开成都前往新津、邛州和雅州。今天发布的一项告示宣称：五千名滇军现驻叙府，重庆军政府派遣的四千五百名军队将予以合作。在雅州附近可能发生的复杂斗争中，我担心，对我的那位法国同事及其同伴在旅途中的安全不能抱很大的希望。

务谨顺谨上 1911年12月29日于成都

第108件 总领事务谨顺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2月16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随信寄上我今天写给英王陛下驻北京公使的一封信的副本，其中附有一份到1911年12月31日为止的季度情报报告。

务谨顺谨上 1912年1月1日于成都

第108件附件1 总领事务谨顺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我荣幸地随信附上泰克曼先生编辑的一份到1911年12月31日为止的季度情报报告。

务谨顺谨上 1912年1月1日于成都

第108件附件2 成都至1911年12月31日为止的 季度情报报告

本季度政治形势的回顾

自从上次写情报报告的那一天以来，可以说成都的政治形势

① 按：孙泽沛系四川西路同志军统领。

经历了三个显著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到11月27日为止，是赵尔丰总督统治下清政府制度的延续时期；第二阶段，自11月27日至12月8日，是首届共和政府的统治时期；第三阶段，是革命党与保路同志会建立目前的军政府的时期。在赵尔丰统治的延续时期内，成都城内保持着极好的秩序，但居民中逐渐传播关于革命在其他省份蔓延的消息，从而使得这种状况不可能继续存在下去。在这个紧急时刻，总督的政策最初似乎是抵制的，因为他采取措施把陆军调出城外，他们的忠诚始终是可疑的；同时集中巡防队士兵，他们作为从其他各省募来的雇佣兵，可以被指望向城内出价最高的人出卖他们的劳力。然而，在最后时刻，他改变了主意；人们几乎可以说，11月27日成立的共和政府，是在这位前任总督的主持下和平宣布的。

从一开始就很明显，新政府是不稳定的，未必可能继续存在下去。在它掌权的十天内，成都出现了使和平居民感到惊讶和恐慌的情景。巡防队的勇丁脱下了遵守纪律的一切伪装，涌上了街头，欺诈和抢劫店铺、茶栈和妓院，而不受惩罚；土匪头目则率领他们的武装弟兄蜂拥进城，表面上是为了庆祝新政府的成立，但实际上却是设法了解他们从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究竟能够获得什么。这些麇集在主要街道上身穿奇装异服的勇丁和土匪，由于把头发梳成新式的顶髻并戴上银首饰，从而使他们的外貌更加生动了；他们采用这种头发式样是为了反对剪辫子的运动，基本想法是：虽然蓄发者不再是满族人的奴隶，但他们不想通过剪发而模仿外国人。

12月8日，发生了人们所预料的剧烈变化，首届共和政府垮台了。经过两天的混乱之后，同志会和革命党联合组成了一个新的而且较稳固的政府；城内的情况迅速得到改善。人们对这两支力量的联合普遍感到满意，因为曾经表示过担心，唯恐他们之间

发生冲突。12月22日，由于新政府处决了赵尔丰，从而又发生了混乱和骚动。在一两天内，出现了恐怖统治，因为这期间没有人知道下一个被砍头的人是谁。但是，公众很快便恢复了对新政府的信心；成都城现已重新呈现出它的正常面貌。

目前，大家关心的事情是，如今成都军政府的势力几乎没有超越成都平原的范围；四川其他各个独立的政府是否愿意将它们置于该省省会成都的指挥之下，仍有待于观察。成都军政府自然认为它自己是四川省的政府，并已派代表劝说其他各政府接受它的控制；它还宣布：已派成都的首届共和政府都督蒲殿俊作为现在军政府的代表，参加武昌的各省代表会议。据说，前任政府的副都督朱庆澜统制仍躲藏在成都城内。来自雅州方面的危险也可能降临，傅嵩林率领一千名久经锻炼的来自西藏的军队在该处掌权，他迄今还没有同革命派的任何一方联合起来。由于12月10日劫掠过嘉定的一千五百名军队现正进攻雅州，他们不是为了某一特殊派别的利益，而仅仅是为了进行抢劫，所以该附近地区的形势更加复杂了。

与此同时，到处抢劫成风；除了衣衫褴褛的过路人之外，旅途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安全的。然而，在成都近郊，农民们在整个动乱期间都在田地上干活；如果本省其他地方的情况也是如此，穷人的痛苦将不会象人们在其他情况下可能预料的那么大。

可以注意的是，满族人对汉族人以及汉族人对满族人的举动始终是惩戒性的。在总督赵尔丰被斩首之后，人们抱着严重的忧虑，担心满族将军玉昆及其追随者将是下一批被处死刑的人。12月24日，民军包围了满城，并要求满族人交出他们的武器。他们平静地交出来了，现在看来似乎将允许他们悄悄地融合在汉族居民之中，而满族将军在一旦能够安全出走的时候，大概将立即离开此城。

教会事务

象以前的信件中所报告的那样，所有新教传教士已于12月13日乘船离开成都，在一支有一百名革命军士兵的卫队护送下前往重庆。12月27日、28日和29日，外务部的一位代表在泰克曼先生陪同下，到英美教会的和其他的所有大院走了一遭，用新政府的封条封闭各房屋。这当然仅仅是一个形式，表明新政府对其中所藏的东西承担全部责任，因为如果这些房屋遭到抢劫的话，通过其他地方而不通过大门是能够很容易地进入屋内的。

英王陛下总领事已经多次催促所有留在本省内地各教堂的传教士，要他们动身前往重庆或沿海。由于同他们联系极为困难，而且有些情况是由于他们本来不愿意离开他们的岗位，所以到目前为止还不能够说所有的传教士是否已经这样做了或打算这样做。我们认为：目前，在省城以西地区，奥本肖先生仍在雅州；坎宁安先生仍在打箭炉；韦尔乌德先生仍在宁远。我们屡次企图同这几位先生进行联系，但由于农村处于骚乱状态，信差们在经过这些地区时生活方面有极大的困难。

在成都以北和以东地区，下列传教士直到最近仍拒绝撤离：中坝的斯图尔特先生和莱普先生；绵州的考德威尔先生；潼川的韦格汉先生；保宁的盖士利主教及许多助理人员，其中包括妇女在内；顺庆的伊万斯先生及其他的人。自从外国人离开成都以来，我们已经同所有这些传教士联系，并且又一次催促他们迅速撤离。我们曾向他们指出：如果各国在下游进行任何干涉，或甚至是有进行这种干涉的谣言，他们的地位将是极为危险的，而他们在这个十分危急的时刻继续留在内地，远远不能得到可能提供的任何帮助，这不仅使中国官员而且也使他们本国的官员感到为难。

我们现收到保宁府的来信说：盖士利主教和该附近地区的大

部分传教士(我们担心不是全部)已乘船动身前往重庆^①。我们希望，他在顺庆搭载伊万斯先生及其他的人。顺庆一带的农村因各派之间的冲突而处于最混乱状态，所以人们对他们在旅途中的安全自然感到某些忧虑。

商 业

在成都最近三个月的政治动乱期间，最大的受害者无疑是商人，他们在12月8日和9日成都城被洗劫中所受的损失是巨大的。许多最大的商店老板在洗劫时自杀；即使是在三个星期之后的今天，仍只有几家大商店开门营业。

三名外国的商务代理人，即天鹰环球钢铁公司的贝茨先生、蜀赫洋行的花必格先生和英美烟草公司的英格兰先生，都已经离开成都。贝茨先生为了使新政府管理下的机构承担他从旧政府手中缔订的合同，尽可能长久地留在成都；但当首届共和政府于12月8日垮台之后，他认为再继续等待下去是浪费时间，所以同其他避难者一起动身前往下游。

成都城的治安

自从8日发生骚乱以来，街道上看不见身穿制服的警察。这是因为他们跟着巡防队在对成都城的洗劫中起了最主要的作用。新政府已经设立了巡警总厅，在该处有一队强大的勇士处于戒备状态，随时准备调往城内任何地方镇压骚乱。但当他们企图象从前一样在街道上布置警察岗哨的时候，人民大声地抗议说：一旦有发生动乱的迹象时，这些警察将象他们以前所做的那样，抓住机会进行焚掠。

① 原文误为离开重庆。

目前，每条街道上由公众捐款提供的卫队维持秩序。人们以为，一条街道有二十名卫队，他们每天仅得到一百五十文的微薄津贴，配备的武器是很美观的，但却显得是无用的，类似“蒙茅斯叛乱”^①时期英国农民所携带的那些武器。居民们正在用那笔捐款，在每条街道的两端设置木制栅栏，这些栅栏即使不是很令人生畏的，但仍有助于达到把进行抢劫的暴徒们转移到另一个没有障碍物的方向去的目的。这些地方自卫的安排得到了新政府的赞同，并且看来是很有效的。几乎每天都有所谓的坏人被处决。

军队和制造局

最近几周以来，新政府忙于招募士兵和组织军队。他们声称已成立了两镇军队，每镇一万人。一镇称为陆军，它的核心是洗劫成都后重返部队的那些正规军士兵；另一镇称为同志军，包括“民团”（受过训练的农民队伍）的成员，他们构成同志会（最初起义的保路会）的战斗力量。当然，这些士兵的外表同旧制度下的部队比较起来给人的印象较好，而同志军的勇丁特别显示出有点冷酷无情的样子；但所有这些士兵的纪律仍是极值得称赞的。他们配备的武器一律是毛瑟枪、马梯尼枪、日本卡宾枪以及新设制造局在去年或前年制造的新式小口径步枪。子弹盒已被子弹带所代替，这也许是由于子弹带的形状更威武一些的缘故。如果看见一名勇丁在身上交叉缠着三、四条子弹带，装满了与他所携带的步枪口径不完全一致的各种弹药，这并不是罕见的情景。这种轻武器弹药的过剩（旧制造局大量生产出来的），造成了任意放枪的现象，幸亏通常是向空中放的，它伴随着每一次政治示威运动。

关于发放所有这些部队的饷银，新政府发觉自己处于财政困

① 1685年，英王查理二世逝世，他的弟弟詹姆士二世继位。查理二世的儿子蒙茅斯公爵发动叛乱，被政府军队镇压。

难的境地，这不是不自然的事情。他们正在采取许多计划克服困难。一个计划是发行纸币，不用白银储备而用从俘获的抢劫者手中收回的丝绸和皮毛仓库做担保。官方报纸上宣布的另一个计划，是建立接受自愿捐款的机构，以支付军队的费用。

据说，建立这支庞大军队的理由如下：第一，制止抢劫以及恢复农村地区的法律和秩序；第二，如有必要，对四川其他独立政府施加军事压力，诱劝他们同成都军政府联合一致；第三，对付那些孤立的部队，如雅州傅嵩焘率领下的部队，他迄今还没有投奔到共和的旗帜下面。

新设制造局的德国工头们所订合同于12月初满期，他们都已离开成都，在四川宣布独立前便从清政府手中得到了他们应得的全部款项。制造局本身遭到了徒工们的抢劫，当然已停止生产步枪。人们担心，那些贵重的德国机器，曾花了很大力气和很多费用运至成都，现在搁置在那里生锈，无人照料。然而，在这方面，可以注意的是：即使是当该制造局处于最好的情况下进行生产的时候，成都制造一支步枪的费用要比从欧洲购买并输入同样武器所支出的费用高得多，而此项费用还没有把购买、运输和安装机器的费用计算在内。一名欧洲工人在他本国一定时间内所完成的劳动生产量相当于好几名中国工人，这个事实部分地说明了其中的原因。

当8日发生的动乱使得那位巴伐利亚^①的化学家兼工头赞格先生同其他避难者一起撤离的时候，新设无烟火药厂生产的第一批无烟火药即将竣事。人们不知道那批火药的命运如何，尽管它已经处于很危险的状态，但该工厂同新制造局一样，已遭到徒工们的抢劫。赞格先生应得的大笔款项拖欠未付，他的合同还有一

① 德国南部的州名。

年半到期，所以目前将在重庆等候，希望被叫回去。

旧制造局没有雇用外国人，正在加紧开工，制造子弹（用黑色火药）和其他军火。

“蛮子”部落

在四川起义的最初阶段，汉人听说“蛮子”部落已从灌县北面下山并劫掠成都平原的消息，曾表示极为忧虑。到11月底，成都宣布独立的前夕，清军强行攻占灌县，该部落的人被逐回他们的山寨。我们没有得到关于那一带后来发生什么事情的消息，但希望没有消息便是好消息，而且成都平原现在没有遭受这些上著部落侵袭的危险。

赫特森牧师很谦恭地向本总领事馆提供了一位亲眼见到灌县一带最近战事的人所作的下列说明；它显示了这些“蛮子”部落的可怕性格以及他们多少有些奇怪的进行战争的方法：

“自11月12日至26日，战事几乎每天在灌县境内或其边境附近进行。由于出动的部队人数很少，这些部队有好几次被‘蛮子’所击败，‘蛮子’是应邀前来帮助反对清政府的。他们是神枪手，大都从分散隐蔽的地点进行射击，绝不露面吸引清军的火力。他们（‘蛮子’）身穿铜铁的铠甲，头戴盔帽，腿裹护胫，还有胸铠和其他物品。他们撤退时翻筋斗，从不逃跑。他们中间大约有五百人属于佉族（一个土著部落，成都的许多外国人都很熟悉它的首领），另五百人来自岷江汉族军屯的东坪^①，还有五百人是由岷江的一位姓李的回民率领的，其中部分是‘蛮子’，部分是回民。清军得到增援后，于11月24日占领了前沿阵地，并于26日上午十一时左右进攻该城。他们自三个不同的据点向前推进。起

^① 译音。

义军放火焚烧东门外的大桥，但清军顺利地救护了部分桥梁。接着，他们把大炮安放在阵地上，不久便将该城东门打得粉碎，堆积在城门后面的大块铺路石到处飞滚。在四个小时内，他们占领了该城，把起义军驱逐到西门外竹索桥。各类‘蛮子’被逐回山中，损失很重。”

对本季度内地方报纸的回顾

在本季度内，本地报纸经历了许多变化。当总督赵尔丰仍然掌权的时候，仅有经过严格检查后发行的两三种政府报纸。随着11月27日宣告独立，宣布了出版自由，可是，每当那些缺乏纪律的军队认为某篇文章诽谤了军事机构的时候，他们便经常捣毁新闻机关，从而限制了出版自由。当第二个革命军政府成立，而且城内某种程度上恢复了法律和秩序之后，报纸纷纷出现，现在每天出版六种报纸。不过，除了《公报》之外，它们都是短命的；出版、停刊、再出版，情况很不正常。

自从写了上面的报告以来，我们已经收到一些信件，从那些信看来，中坝、绵州和潼川等地的所有传教士似乎都已动身前往重庆和沿海。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么，留在本省的新教传教士仅有上面曾提及的坎宁安、韦尔乌德和奥本肖等先生；所说的前两人是英国臣民，后一人是美国公民。

泰克曼

第 109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2年2月16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英王陛下驻南京领事于2月15日来电如下：

“今天下午，大会一致选举袁世凯为民国总统，并且还决定南京为临时首都。”

第 110 件 代领事史密斯致格雷爵士函

1912 年 2 月 17 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随信附上我写给英王陛下驻北京公使关于腾越局势问题的一封信的副本。

史密斯谨上 1912 年 1 月 14 日于腾越

第 110 件的附件 代领事史密斯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我荣幸地报告：李根源和赵藩已终于离开大理府前来腾越，估计他们将在永昌住几天解决该地的事情，大约可望于三个星期后到达这里，那时我希望将在此地建立一个文明政府。

最近事态的发展是令人不满意的。到 12 月底，派去进攻大理府的士兵们已返回腾越，人数大为减少。

他们返回腾越后，对改善本地形势没有任何帮助。首先，甚至对张文光来说，事情也已经很明显，在政变之后盲目招兵时，他没有考虑到财政方面的问题，现在这些问题开始压在他的身上，所以有必要在每五个人中裁去一人。这就使得街道上充满了许多缺乏生计的坏人，并引起犯罪事件的增多，人们甚至一度担心闹事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其次，率军进攻大理府的指挥官与张文光不和。我没有见过此人，他的姓名叫陈天星^①，但就我所听到关于他的情况来说，他是颇为无能的。幸亏他们还没有发生公开的决裂，但他们之间不和产生的一个令人遗憾的结果是那位老提督退往缅甸，他对维护秩序一事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他说明离去

①：陈天星，又名云龙。

的原因是他的妻子患病，他曾于11月初把他的妻子和大部分家属送往八莫，但我私下了解，他对张文光的好感激起了陈天星的严重敌意，人们认为他个人确有受到陈天星谋害的危险。

史密斯谨上 1912年1月14日于腾越

第111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2月19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随信附上上海首席领事于1911年12月22日写给我（因为我是首席公使）的一封信的副本。该信说明了领事团在缺乏任何公认的中国政府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的正常工作而采取的各项权宜措施。

外交团已经批准至少作为暂时权宜之计的会审公廨工作的那些变化，在性质上是非常广泛的：它们包括该公廨程序的改革以及对囚犯的照料，这些都是许多陪审员所提倡的。

朱尔典谨上 1912年1月27日于北京

第111件的附件 上海首席领事致外交团首席公使 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关于在缺乏任何公认的中国政府的情况下，领事团为了保证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的正常工作而采取的几项权宜措施，我荣幸地报告如下：

一、领事团已确定三位法官的职责是在外国陪审员的指导下并与外国陪审员一起采取行动。

二、会审公廨所属监狱现已由租界巡捕当局管理。

三、传票和逮捕证均由租界巡捕当局签署后生效。

四、审讯由会审公廨法官和一名外国陪审员负责进行。

五、会审公廨审理租界内发生的一切刑事犯罪，其中包括应处以五年以上监禁的那些案件在内。

六、租界工部局代表领事团承担对会审公廨的财政进行监督；它接受所有的罚金收入，支付全部费用和薪金，但不包括法官的薪金在内。

七、法官的薪金由领事团从现在掌握在首席领事手中的中国政府款项内支付。

八、外国陪审员将观察关于纯属中国民事案件的审讯；这项改革很可能于下周付诸实施。

薛福德谨上 1911年12月22日于上海

第 112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2月19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报告：自从我12月27日写信的那一天以来，停战期限已连续安排延长两次，每次各十四天，直到今天届满；就汉口对峙的双方军队而言，停战很可能无限期地延长，因为有很充足的理由认为，段祺瑞将军的部队受了民军的影响，从精神上迫使他同黎元洪都督达成协议。然而，这绝没有防止部队的调动以及在其他地方发生战事，本月份的主要特点是大约有三千五百名革命军自南方运往山东。

英国驻烟台代领事于1月16日报告，中国巡洋舰“海琛”、“海扬”^①、“海星”^②等号载有一千名部队抵达该口岸；又于1月20日报告，中国轮船招商局的四艘轮船另载有二千五百名士兵到

^{①②} 译音。据池仲佑《海军实纪》，当时中国的巡洋舰仅有“海天”、“海圻”、“海筹”、“海容”、“海琛”等五艘。

达。与此同时，该省再度宣布赞成革命，各地行政官员均被驱逐。1月22日夜间，一队革命军袭击了威海卫城，强行接管了知县衙门，知县逃往英国租借地。不过，革命军方面出兵山东似乎更主要是为了将对方的注意力转移到张勋提督所率部队的后方，而革命军的主力部队正在集中准备沿京汉和津浦铁路向北京方面推进。事实上，敌对双方的先头部队于1月26日在津浦铁路线上徐州以南地方发生了一次小规模战斗，结果暂时制止了革命军前进。据报，在该附近地区后来发生了激烈的战事；毫无疑问，起义军不顾停战协定，正向北方推进。

伍廷芳已电告袁世凯说：除非迅速达成一项解决办法，他将不能够继续抑制革命军的热情。可是，据中国报纸的一项报道说，有好几名南方士兵因为拒绝在天气寒冷期间向北进军北京，已在最近被枪决。但是，由于伍廷芳已向英王驻上海总领事承认，到1月底以后，革命派无钱支付军饷，所以他们很想使那些事情立即获得一项结果，并且多次要求各国给予承认，这是不足为怪的。

同时，各省的情况表明尚无改善的迹象。我荣幸地随信附上英王陛下驻镇江领事寄来的两封有趣的信件的副本，那两封信是报告该地区事态发展的（附件一及附件二）。

本信所附英王陛下驻长沙领事12月20日的来信（附件三），也反映了普遍存在的混乱状态，然而，可以满意地指出，该地如同其他地方一样，运动迄今尚未具有排外的趋向。

自从翟比南先生来信的那一天以来，我收到舰队司令温思乐爵士的一份电报说：英王陛下军舰“森林云雀”号订于12月29日到达长沙，并将长期泊驻该处。此外，英王陛下军舰“夜莺”号已于12月24日抵达那里；“祖国”号和“隅田”号等军舰能够延长它们泊驻该处的时间。我已批准翟比南先生关于太古洋行轮船“吉安”号买办所受凌辱一事向革命军当局提出的抗议。

我还荣幸地附上翟比南先生 12 月 29 日的一封来信的副本（附件四），该信对新政权统治下的湖南形势作了有益的说明；他后来于 1 月 13 日的一封来信（附件五），就该省盛行的抢劫以及红十字会的活动说明了详细情况。

中国内地会的莱克先生在 1 月 3 日写给汉口代总领事的一封信中，反驳了报纸上刊载的关于河南形势的那些颇为惊人的报道。“仁义会”（拳民）在几周前曾经企图在太康、扶沟地区制造骚乱，已被地方当局在军队帮助下镇压下去。1 月 11 日，舰队司令温思乐爵士报告说：汉口各国租界已恢复正常状态，并独自控制了租界的防务。

北海领事馆的助理领事莫斯先生在三封来信中，对南方较小的口岸普遍存在的情况作了有趣的说明。我荣幸地随信附上这三封信的副本（附件六、七、八）。

自琼州、广州、潮州、厦门等地寄来的报告谈了许多同样的情况，并且证实那些地方没有任何严肃认真的政府。

英国驻广州分遣部队已经从香港获得增援；两个印度步兵营以及一个印度过山炮连正从印度开往香港。11 月 6 日停驶的广九铁路直达列车，已于 12 月 14 日恢复。

满洲简直没有受到革命的影响。英国驻哈尔滨代领事于 12 月 20 日报告说：在东三省北部的汉人中间，仍继续普遍保持平静；贸易似乎沿着正常的方向继续进行。这个情况同中国其他地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为在那些地方生意已完全停顿。

斯莱先生于 1 月 17 日报告说：海拉尔的汉城已于 1 月 15 日被蒙古人占领。海拉尔道台逃往俄国铁路地带，并由那里去齐齐哈尔。蒙古人随即宣布喀尔喀部领土的独立，它包括海拉尔至满洲火车站之间与满洲接壤的所有那部分蒙古领土。然而，满洲总督在他所辖省份内正严厉镇压革命精神的任何表现，并表示愿意

用武力保卫满清王朝的权利。

朱尔典谨上 1912年1月29日于北京

第 112 件附件 1 德为门领事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上海议和谈判没有妨碍革命军方面调动部队。看来，当张勳提督巩固他在徐州府的地位的时候，革命军正在准备沿运河一线发动进击，甚至在进击中获得了实际进展。自从我写上一份报告之日以来，已得到消息说，林述庆都督驻在扬州，据称率领一万人左右，其中多数人在革命前属于南京和镇江的陆军各标（第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和三十六标），大约有六千人。其余的是新兵，并非都有武器。

扬州还驻有徐宝山统率的约七千名士兵，徐宝山是江北查缉私盐的统带，现任扬州军政分府的首领。这些部队的装备都很好，其中受过一些训练的有两千人，其余的则很少训练，但参加过进攻南京的军事行动。现已对清江浦发动一次进攻，有两千人前往增援，所以该地约有三千二百名革命军。

上个月内，武装的革命军官兵多次进入本口岸的英国租界，他们有时候是单独的，有时候则是成群结队的，人数多少不等。我每次都向可以进行联系的有关当局提出抗议，但由于这种侵扰仍继续不停，所以我写了一封信给伍廷芳博士提出申诉，并要求他采取步骤制止这种行为。伍廷芳博士迄今尚未答复，但这时，我最近向军政分府郑权^①先生提出的申诉已获得结果，他答应采取某些明确的措施，以达到所希望的目的。他派了他那位会说流利英语的秘书王宪华^②先生前来表示歉意，并解释说：我所申诉

① 林述庆离开镇江后，郑权代理军政分府都督。

② 译音。

的侵扰行为总是那些新来此地的无知士兵及其军官们干的，而他对他们没有直接的控制权；现在他答应书面警告那些士兵及其首领们不得再有此种侵扰行为，并且采取其他必要的措施。

在同王宪华先生谈话时，我力图从他那里得到关于目前此地行政机构情况的一些说明。他不能够讲得很确切。例如，他说，目前镇江军政分府的权力范围迄今还没有确定下来，但他肯定它伸展到了全城和口岸之外。他解释说：在军政府与地方行政当局之间存在着区别。他说：军政府是因为革命的需要而存在的，并且为了革命的利益而考虑占有该地——它基本上是它的名称所含有的那个意思。据我推断，就这些安排而言，它们是相当令人满意的。地方警卫部队处于很好的控制之下；有一个能够处理士兵犯罪的法庭。然而，都督对那些偶然过境的部队没有实际控制权；由于这些部队的军官们并不是始终完全掌握他们的士兵，所以这些士兵可能是危害秩序的一个根源。地方行政当局是打算对中央当局尽量保持差不多独立的地位，然而，王宪华先生说，必然有些事情同时涉及军政分府和地方行政当局，在这种情况下，军政分府享有最高权力。所有民政事件，至少首先是由地方当局控制的；象目前的这些法庭是由独立任命的人员主持，尽管他们要得到军政分府的默认或明白批准。王宪华先生又说：他开始认识到，革命后的重建工作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无法获悉，目前是否有任何法庭能够处理老百姓所犯的严重罪行或关系重大的民事案件。警察由地方控制，从他们的外表看来，绝不是新政权的光荣。

这里的一切事情都处于停顿状态；逃亡的镇江居民没有象人们所预料的那样，迅速地回来。因此，行政管理制度中的空隙没有造成它可能造成的严重损害；然而，它是居民们迟迟不回来的一个原因。人们还没有恢复信心。整个教育机构陷于停顿；除了

外国洋行的买办（大都是广州人）外，商界的首领们仍在外地。不过，本地报纸报道了缫丝业的再度兴起，这是一个很有希望的迹象。

德为门谨上 1911年12月29日于镇江

第 112 件附件 2 德为门领事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军政分府都督郑权于 1 月 1 日前来看望我，并通知我说：正象他已经写信告诉我的那样，在南京的各省代表已选举孙逸仙为民国临时总统；现在他的政府希望与各国建立关系。我对即将召开的国民大会提出一些询问，作为对他的答复。郑权先生还通知我说：他的政府现已采用公历。我可以说，此地除夕才采取这项措施，当然使得中国商人们没有时间进行通常在新年期间采取的财务方面的调整。我注意到，坚决赞成革命的本地报纸仍用旧历注明日期。

上星期，在镇江城内各街道上和郊区，正式推行剪掉辫子，使那些安宁的和平静的居民感到极为愤怒。当革命军代表被问及此事的时候，他们声称，这是无业游民和不良分子干的，但据我看来，此事无疑地获得了军队首领们的赞同，而且很可能是他们下命令这样做的。我见到一个人在城内一条拥挤的街道上活动，他带着一把大剪刀，采取久经训练的衙门仆役的态度回答我的问题，并且说，他奉上级长官“朱大人”之命剪辫子。有时来看望我的那位和蔼的青年文职官员王宪华先生明确地向我声称：本地掌权者中没有姓朱的那个人物。同一天，我看见“浙军司令官朱^①”贴出的一张告示（关于某项无关紧要的事情）。

① 朱瑞。

一位警官为了对民众的普遍要求作出反应，惩罚了一名罪犯，但他受到都督的严重谴责，“因为他超出了他的权力范围”。事实是，军方人士是至高无上的；他们掌握着局势，并且正在组织政府。必须承认，那些驯服的平民，不管贫富都是一样，很少努力坚持他们自己的权利，他们似乎应该感谢新政府，而且在得到它的好处的同时，必须耐心忍受军方人士在兴奋激昂情绪中对他们进行的侮辱，直到报复的机会到来为止。与此同时，人们的不满情绪无疑是很真实的；我们不能说，镇江的居民对民国抱有很大的热忱。我相信，农村的人们是极为漠不关心的；有人告诉我：已下令征收旧赋，但迄今尚未发布告示。

军政府对剪辮热潮的态度是：如果发生任何危机或麻烦，不鼓励人们相信它会采取坚定措施。它发布了几个告示，用软弱而又含糊的词句谴责使用暴力，但宣布即将完全废除蓄辮；最近发布的一个告示是呼吁所有的人剪掉辮子，但商人们除外，他们是由于自己提出申请而得到豁免的。与此同时，对许多此类使用暴力的事件，没有施加一次惩罚（除了上述那种情况之外）。

我收到都督的一封信，宣布任命王宪华先生为外务司长。我对此信没有答复；王宪华先生告诉我，他曾经请求郑权先生不要写信将此事正式通知我。从我所了解的王宪华先生的情况看来，我认为他是民国青年官员中的一个好榜样。

扬州仍驻有七千名军队（徐宝山的部队），清江浦驻有六千人，此地驻有四千人。在这里的四千人中，大都是旧巡防队的士兵，他们同增募的新兵一起，成为在此地建立的一个混成协的核心，目前该协仅有步队，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招募的新兵每月饷银八元五角。主管建立该协的军官张正发^①，似乎对军事学只

① 译音。

有很原始的概念；他告诉我：战略没有什么重要性，士兵的正义精神是获得胜利的一个充分保证。

德为门谨上 1912年1月9日于镇江

第 112 件附件 3 翟比南领事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我荣幸地报告：军队的骚乱和不法行为在外国人士和中国人中间造成了更大的忧虑，虽然直到目前为止，排外的情绪不是很明显的。

当汉阳失守后湖南士兵开始纷纷撤回本省，到处进行抢劫的时候，长沙当局感到很大的惊慌。一批约二百名士兵于12月3日到达此地时，城门已经关闭；他们在获准入城之前，被解除了武装。后来，开往前线的五千名军队被留阻在岳州，以防止士兵继续涌入长沙。征用前轮船招商局的轮船“贵利”号的约六百名士兵，也这样停留在岳州，并被迫登岸。这些士兵在到达时都被收缴了武器，目前总人数达两万以上，但那些希望重返部队的士兵获准保留他们的武器。现在，他们已重新整顿就绪，一有机会便派往前线。这些士兵在遇见他们的长官时是很顺从的；但自汉口至岳州途中，没有任何首领管理他们，他们似乎完全失去控制，任意进行抢劫，而在江中来往行驶的大多数轮船必须遭受他们从两岸或中国船只上进行的夹击。

12月15日，一大队士兵，据各种不同的估计为三千人至六千人，同他们的统领一起，自岳州返回长沙。此地普遍感到极为惊慌：第四十九标被调来阻止他们入城，一般预料似乎将发生战斗。然而，回来的那些部队并不是受了反抗精神的驱使，他们同意让自己被解除武装。那位统领解释说，他把他们带回长沙进行改编。他的辩解没有被人们接受；他在他的士兵面前遭到处决。

后来那些士兵被解散了。

前广西巡抚沈秉堃率领另一批桂军八千人并带有马克沁机枪抵达长沙。他不是回广西去，而是将住在岳州，在该处担任军事代表之类的职务，监督和指挥军队的调动，并为岳州的工事和防务进行安排。他在此地病倒了，声称他不能够继续前进。可是，士兵们坚决认为他是装病，并提出威胁说，如果他踌躇不前，“将用子弹催他起身”。于是，有人说，他毕竟希望能够前往岳州。这是目前军队中普遍缺乏纪律的一个良好的例证。

长沙正在继续发生争吵，不是在士兵们相互之间，便是在他们与老百姓之间。在后面的这种情况下，争吵时常是因士兵的不法行为而引起的，那些士兵最近驻守在各城门口和主要街道上，用刀子和剪子做武器，对过路的行人采取粗暴的行动，强迫剪掉他们的辫子。都督禁止这种做法，但关于这个问题发布的告示委婉地承认了他的软弱无力，因为它要所有的人在五天内剪去辫子，以便消除这种混乱场面。另一方面，士兵们对该告示丝毫不予理会，继续推行剪辫运动，直到12月15日，当太古洋行轮船“吉安”号买办在该洋行码头登岸的时候，士兵们对他采取了凶暴行动，在他进行反抗时又虐待他，最后不顾他的请求，终于剪掉了他的辫子。

我对这个暴行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并且还补充说：我不认为当局默许或甚至赞同这种高压行动，但一个政府的首要职责之一是要维护公共的安宁；如果他们允许士兵们大规模地采取强暴行动而不受惩罚，那么，他们便不能够继续要求享有政府的称号，而只不过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集团。最后，我要求对犯了该暴行的人给予严厉的惩罚。

上述事件并不是最近我有理由提出申诉的唯一的。12月3日清晨，外务司副司长带着几名随从登上“吉安”号轮船，在船

上从头到尾搜查偷运的大米。当有人提请我注意此事的时候，我抗议对一艘英国轮船进行的侵犯，并且指出：海关雇员是适于进行搜查的人，任何其他的人在事先未获得我的同意之前无权这样做。该外务司在答复时提出辩解说，由于该轮船即将启航，所以事情很急迫，但他们答应这类事件将不再发生。可是，12月15日，当“吉安”号轮船驶抵长沙时，它在长沙城下游约半英里处被六名士兵所阻止，他们没有任何形式的证件，甚至没有一位主管官员，登上轮船，声称他们打算搜查清军奸细或被雇用的暗杀者，检查了所有的中国旅客之后，才允许该船继续行驶。

有人向我报告此事后，我立即对这些任意的行动提出了抗议。我进一步通知革命军当局说：我已经指示英国各轮船的船长，今后要求那些无论以什么理由打算搜查轮船的人们提供证件；不允许那些未能提出我的书面许可证的人登上轮船。

后来，外务司来信对那两个事件表示歉意，并保证采取措施防止这些事件的重演。关于前一事件，他们答应追查并惩罚那些犯了该暴行的人们，虽然我不认为事实上他们有力量能够这样做。关于后一事件，他们不承认士兵们的行动，声称：他们的统领在汉阳陷落后撤退，不能够支配他们，以致他们完全失去了控制；该统领已被公开处决，今后将使士兵们遵守秩序。人们希望这一良好愿望可以获得实现。

外国人既然同中国人一样关心维持一个某种形式的稳定的政府，所以对于乘帆船或轮船抵达此地的所有旅客进行仔细监视，那肯定是可取的。有人已经几次试图暗杀长沙的领导人，如果获得成功的话，便将使全城陷入无政府状态。现在，所有中国人及其行李在入城时都被彻底搜查；这种搜查已不止一次地使得人们发现某种形式的炸弹或炸药。那些被发现带有炸弹或炸药的人遭到处决，除非他们设法逃跑，就象一度发生过的那种情况一样。

有一个人据说是满清奸细，在街道上被士兵们砍成几截；接着，他的脑袋被砍了下来，并送至都督衙门。另一个人在日本轮船公司码头被绑在一种三戟刑具上，遍身被子弹打得尽是窟窿。当然，这些处理所谓奸细或叛徒的野蛮手段，是企图用来作为惩戒的。

关于本省其他地方，农村地区（特别是浏阳县）的抢劫事件似乎不断增加，尽管根据政府的特别指示各处都在召集和训练民团。不过，城镇仍象往常一样的平静，虽然在永州府和宝庆府发生过骚乱。这两处骚乱都是新招募的士兵引起的，但似乎很快便恢复了秩序。无论在何处骚乱中，都没有干扰该处外国侨民的任何企图。辰州府的情况十分混乱，该地的道台仍坚持反抗革命军。最近，当局请求我自那部分地区撤出所有的外国人，并把他们集中于常德，在该地将对他们提供保护。可是，没有任何外国人留在那些地区。

几天以后，将只有三名英国妇女留在湖南内地，都是属于美以美会的，其中两名在宝庆府，一名在益阳县。然而，在那两座城市中，情况似乎是平静的，目前不必担心对外国人有任何危险。在长沙城内，仅有三名英国妇女，没有儿童留在此地；其中有一名妇女将在湘江完全停航前离去，就轮船而言，它可望于约两周后停航。

由于冬季没有英国炮舰可以泊驻长沙，所以本口岸大约在两、三周后将得不到海军的保护，那时“祖国”号和“隅川”号军舰将必须开走，而英王陛下军舰“森林云雀”号目前正在这里进行第二次为期一周的访问，已奉命于12月24日前后离去。由于这封信和以前各信中关于这个问题所叙述的情况，特别是由于军队的不法行为，我对局势的前景不能不感到严重的关切。各国炮舰泊驻此地无疑是遏制军队的一个因素。中国绅士和商人阶级中的显要人士承认这个事实，并常常急于询问各国炮舰停泊此地的时间有多久。

因此，我觉得必须提出我的意见说：军队方面不法行为的增多，很可能将标志着海军保护力量自本口岸的撤离。那些军队刚开始认识到他们的力量，湖南似乎没有一位官员能够使他们遵守秩序。关于有一艘炮舰将不时访问长沙的那项保证，似乎没有考虑到这段期间，即河水低落，以致使得炮舰不能通航或取决于河水偶然临时的上涨。事实上，只是由于今年出现的前所未有的情况，才使得炮舰即使现在还确实可以驶抵此地。

如果撇开长沙当局无力控制军队，他们似乎很想在贸易方面满足我的要求。尽管他们把大豆和小麦当作战时违禁品而禁止输出，但他们在我的要求下欣然允许怡和洋行装运大豆出口，只要该洋行议定不将那批货物运至汉口上岸。我时常极力要求他们注意的涉及英国利益的其他事件，总是迅速得到他们的关心。

翟比南谨上 1911年12月20日于长沙

对上述信件的说明

关于湖南军队的不法行为以及不负责任的士兵们登上英国轮船等问题，我也向黎元洪都督提出了抗议。我使他记住，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从一艘英国轮船上逮捕非战斗人员，同时我提醒他关于此地“大通”号轮船上发生的事件。黎元洪都督对我所申诉的事件表示极为抱歉，并且通知我说：他已发了一份电报至长沙，严令该地当局立即采取步骤制止此类行动。自那时以来，我没有继续提出申诉的理由；两天前到达此地的太古洋行轮船“吉安”号的船主报告说，他的船只没有受到任何干扰。

英王陛下军舰“夜莺”号已于几天前离开此地驶往长沙，不久之后将由英王陛下军舰“鹞”号换防。“森林云雀”号正开往宜昌，我知道它目前将泊驻该地。

代总领事 葛福 1911年12月27日于汉口

第112件附件4 翟比南领事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我荣幸地对财政状况以及新政权所采取的行政和其他方面的改革提出一些说明。

新政府的财政需要是极为迫切的。有人最近计算：到中国旧历年底，向财政司提出的拨款请求将近达七百万两，其中各项开支如下：军饷（我见到对军饷的各种估计数字为每月自五十万两至一百万两）二百二十万两至二百三十万两；与军队有关的其他支出至少为二百万两；分摊清朝对外赔款和借款五十万两；修理堤防和赈济饥荒的费用一百万两；分期摊还本省所借横滨正金银行和礼和洋行的款项四十万两至五十万两；行政费用十五万两；供意外需要的备用金十万两。

军队是最沉重的负担，但官员们因害怕闹事而不敢拖欠士兵们的饷银。一切可以使用的款项似乎都已用来满足军队；在全部付清他们的饷银之前，所余款项不得用于其他的目的。过去若干时间内，文职官员没有领到薪金，因为抽不出款项来，而各地知县通常据为己有的多余岁入，现在必须交给本省财政部门，而不得有任何扣除。最近发布的一项命令说：所有各府、州、县地方官员一律按每月二百元领取薪金，但我推测，直到现在为止，这些薪金均未发给。

军政府正在把水口矿的锌矿石按每吨十八两半现银的价格出卖给各洋行，以尽力满足对现款的需要。它还把锌矿石供应给日本人，而把铜留给几天后即将复工的铸钱局。为了制止利益外流起见，它现在正考虑以铤币代替铜钱的建议，因为湖南的铤是很丰富的。军政府已宣布它打算请人们认购五百万元的公债，年息六厘，五年以后开始偿还，十年内还清。有理由肯定，按照这

样的条款，几乎不能吸引中国人的资金。

其他的财务安排包括拟废除厘金在内：运入或运出本省的货物将仅交付一次进口税或出口税。进口货物运至终点时还另交一次税，在本省各地销售的货物也是如此。烟、酒、糖及类似奢侈品可以按价征收百分之十的税；对其他物品的征税自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不等。由于湖南到目前为止的做法是把厘金合在一起一次交纳，所以上述变化不象听起来那么剧烈。

土地转让税和土地抵押税，已各减至预付买价的百分之四和百分之二，直到下一个旧历春节为止。为了鼓励白契持有人进行登记，该项安排是有追溯效力的。春节后，费用将各增至百分之五和百分之二点五。这些费用以及田赋和漕粮的征收，将交给各县地方自治机构管理，该机构的活动范围在革命军政府的领导下已大为扩充。

所有从清政府手中承包各种税收的人们，必须领取新的许可证；许可证的费用按照“承包”的价值自三百元至五百元不等。

增加现款的另一个计划，是委派代表在全省诱劝人们自愿捐献。它明白规定不得使用强制的手段。这个命令无疑是会任意加以解释的，否则人们可以有把握地认为，成果将是很少的。

征收新鸦片税的计划也已经制订出来，可是，它公开声称是一项禁止鸦片的措施，而不是一项增加税收的措施。

另一方面，主要的岁入估价如下：田赋，一百一十多万两；漕米，四十万两；厘金，一百四十万两至一百五十万两；常关税，三万两至四万两；海关税，三十万两至五十万两；杂税（包括土地转让税，印花税，烟酒税，以及从特许“包税”、典当、采矿等所得的报效），七十万两。这就使得总数略超过四百万两——比估计的支出少得多。事实上，只要维持目前庞大的而且很费钱的军队，本省便不可能使收支平衡。因此，如果要避免破产，迅速

停止冲突和恢复正常状态是很重要的。

最后，我可以这样说，审计部门的建立表明了一项新的方针。

各首县的职位（即居住在府城的各知县）已经取消，部分是作为节约的一项措施，部分是由于地方自治的扩大，从而没有必要继续保留他们。只有长沙城内的长沙和善化两位知县还暂时保留，但他们不久也将撤销。

在司法部门，已经公布一系列新的章程，企图首先打击满清统治下所盛行的那些陋习。他们规定清理那些悬而未决的案件，颁布了收费的标准；成为陋习重要来源的捕役帮手被宣布为非法的；禁止敲诈勒索。除了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之外，废除在法庭中下跪。关于刑讯，宣布所有文明国家一致反对使用它，因此完全予以取消，除非在那些刑事案件中所犯罪行极为严重。由于这个问题大概将由首席法官作出决定，所以观察该项规则的应用情况将是很有趣味的。

最近，已公布进行一次大赦，除了那些严重罪行如谋杀、武装行凶抢劫及其他案件之外，对所施刑罚予以全部或部分减免。

代替前咨议局的省参议院，已于上月选举产生，各县按照人口多少分配一至三名参议员。它已由谭延闿都督于12月11日召开。谭延闿都督在一次颇为冗长的演说中声称：在满族专制制度统治下，人民的生命财产听任异族摆布，这种制度必须废除。前几年所实行的伪立宪也必须放弃，让路给真正的民主。在新政权下必须注意的主要问题如下：

一、财政处于危险状态；

二、取消个人特权；

三、废除厘金，采用生产和消费税；

四、恢复信用，以便使本省能够承担它自己的债务，从而防止举借外债的必要。

参议院新任议长熊兆周在答词中提到这个事实：法国和美国在获得独立前都不得不奋斗多年，而湖南未费一枪一弹便实行了革命。他继续说，现在，省参议院是立法团体，而不仅是一个咨询机构。然后，他接着指出：共和政体本身不一定是好的；有好的共和国，也有坏的共和国。他分别引用北美和中美各国作为例证，并认为这种差别是由于中美各国缺乏秩序和纪律所造成的。他祈求中国整顿好内部，以便它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共和国出现在世界上。

目前的参议院仅具有临时议院的性质，当宪法制订后，它便将立即解散，让位给按照宪法规定选举出来的议院。同时，它的权力是很广泛的。只有它享有一切立法权，还有在内政或外交方面进行改革的权力。在未经它同意之前，不得增加田赋和漕粮。它还必须讨论和通过预算，并决定有关本省借款的一切事宜。它选派人员对主管财政收支的各部门进行监督，接受人民的请愿，必要时对行政或司法官员提出弹劾，可以委派代表调查与政府有关的各项问题，能够要求任何官员准备并提出申述，说明他采取行政措施的理由。

关于参议院与都督的关系，所有议案都必须征得都督的同意。他不同意的任何议案，必须交回参议院复议。如果该议案以不少于三分之二的多数第二次获得通过，它便成为法律。都督可以亲自或委派代表到参议院说明他的意见，但他当然没有表决权。

很奇怪的是，会期仅规定为二十天，但必要时可以延长。都督会同参议院议长一起，还可以召开特别会议。

参议员享有的特权之一，是在会议期间，如未经全院同意，不得逮捕他们；他们还可以要求享有在辩论过程中申述任何事情的特权。他们在参加参议院会议期间的各项费用应得到补偿，款额由都督酌定。

参议院自开会以来，工作十分忙碌，最近采取的各项改革在公布前都曾由该院讨论通过。根据该院的规则，各项辩论的记录，除了已特别声明为机密的那部分内容之外，最后都将发表。

官方的下列活动是可以注意的：已任命安徽知名人士陈润霖为教育司长，常宁著名人士仇毅为交通司长。仇毅最初曾企图获得邮政局的控制权，在遭到失败后，又打算在革命军政府之下建立一个对立的邮政局。这个计划被认为是行不通的，所以放弃了。同时，我曾警告英国各轮船公司不得接受他们的邮件。

军务部长是宁乡的一位著名人士，名叫向瑞琮，而肖良臣被任命为总参谋长。肖良臣是前湖南混成协的协统，但在革命派占领长沙的那一天销声匿迹。可是，他被人送了回来；由于他表示愿意参加革命军，所以革命军乐于利用他的军事经验。

有人建议任命一位实业司长主管农工商矿等业。本地的知名人士张之光^①被推荐担任该项职务，但这项任命迄今尚未得到证实。

湘潭知县余屏垣已被任命为长沙知府，他同长沙知县一样，在长沙暴动时期曾经是深受人们爱戴的英雄。但是，在湘潭人士的特别要求下，他目前将不就任新的职务。虽然他以排外的偏见著称，但据说他是一位精力特别充沛和有才干的官员。

翟比南谨上 1911年12月29日于长沙

第112件附件5 翟比南领事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继续谈我在1911年12月20日的信中所说的事情，我荣幸地报告：英王陛下军舰“夜莺”号于12月24日，即“森林云雀”号开

^① 译音。

走的那一天，驶抵此地。该舰舰长通知我说：他奉命驻在这里，直到“鹞”号前来换班为止，“鹞”号大概将在今年冬季的其余日子里泊驻长沙。湘江继续处于不正常的高水位状态，轮船仍往返于汉口，这个情况完全是前所未有的。现在，它们显然有可能在整个冬季毫不间断地行驶。

自从我12月20日写信的那一天以来，长沙城已经平静得多。士兵们不再从事不法行动；从我上次提出抗议后，他们不再企图登上英国轮船。

尽管延长了停战协定以及和平谈判的趋向一般是好的，但对袁世凯的不信任依然是那么严重和根深蒂固。此地中国人的普遍看法是战事终将重新开始，因此湘桂两省部队继续开赴前线。我估计，过去三周内开赴前线的部队人数不少于八千人。沈秉堃很不愿意前往岳州就任湘桂联军总司令官的职务。

关于涉及滥用红十字会旗帜的问题，我只得促请当局予以注意。去年10月中旬以后，一群绅士打算建立一个本地的红十字会，并吁请各国人士帮助组织该会。一些英国人和挪威人同我商量关于他们参与该项活动是否可取的问题，我为了弄清楚该会系英国臣民可以合法加入的组织，要求那些有关绅士提供一份书面的说明书，解释该会的范围和目的。我从他们的答复中得到一个很满意的说明，其中声称：该会仅限于援助双方的伤病员；它将保持最严格的中立，既不帮助清军，也不帮助革命军。因此，我于10月21日写信给前任巡抚余诚格说：由于我已经得到保证，我认为没有理由反对英国臣民加入该会，并按照所制定的方针尽力在各方面予以合作。

于是，他们成立了该会，我的日本同事和我（长沙仅有的领事官员）参加了大会。它一开始在本领事馆医务官员永医生的主持下做了有益的工作，虽然它费了相当的力气使中国人了解，红

十字符号不是非战斗人员佩戴以求避免干扰的徽章。可是，当人们于12月21日看见一艘悬挂着红十字会旗帜的汽艇，满载士兵驶往前线，并且拖带着许多同样装载士兵的帆船时，我向革命军当局提出了抗议。我指出：只是在他们提出保持最严格中立的保证后，我才同意英国臣民参与该项活动；虽然我决不认为政府当局曾批准使用该旗帜的这一错误举动，可是，除非立即制止滥用该旗帜，外国人将不得不退出该会。

外务司在答复中虽然否认对该事件有所了解，但完全同意我的观点，并答应对该事件进行仔细调查以及处理违犯者。后来，都督发布了一个告示，禁止滥用红十字会的旗帜，此后我们没有继续提出申诉的理由。

与长沙情况的改善相对照，在本省其他地区，抢劫与混乱不断增加，这主要是由于农村处于骚乱状态，但也部分由于政府当局的自杀政策，它因财政困难而就地解散所招募的军队，不付给军饷。的确，在辰州府，道台^①曾如此长久地支持清王朝，终于同意放下武器，而且得到出境的护照。由于他的离去，全省现已归附革命军。据说，他长期采取这种立场，是因为他的兄弟在北京朝廷中任高级官员，他担心，由于他自己的变节行为，可能迫使朝廷进行报复。但是，关于全省出现抢劫行为的传说与日俱增：几乎没有一个地区不说是发生某种形式的骚乱。在湘乡县，一天至少有十个村庄遭到袭击和劫掠。邮局信差常常遭到抢劫，通往内地好几个地方的邮政业务不得不完全放弃。对那些外出旅行的人们来说，出城后几乎毫无保障。一般地说，我已经建议所有那些仍在内地的传教士们继续住在他们目前所在的地方。甚至在一些城镇内，军队已经制造骚乱，并犯有向商店老板们勒索的罪行，

① 朱益藩。

但外国人未受骚扰。从派往各地为本省作战经费募捐的代表们所提出的要求中，或从冒充这种代表并通过欺骗手段攫取钱财的许多骗子所提出的要求中，也不断发生一些较小的争论。

最严重的乱事于12月底发生在长沙以东的浏阳县，该县始终是一个动乱的地区。已被杀害的都督焦达峰的一位支持者在那里募集了一支千余人的队伍，名义上是为了帮助革命军政府。据说，他们的计划中至少有一部分是要对那些帮助镇压1906年浏阳起义以及后来参与残酷报复的人进行惩罚。可是，这支军队终于分裂为一些小的队伍；该计划似乎变成一系列的劫掠活动，它们虽把混乱扩大到了全县，但对全省的和平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在特别困难的情况下，当局正在尽力应付局势。他们除了派遣部队前往人们所报告的地区镇压骚乱外，最近已开始在各县进行挨户搜查，以便清除省内的坏人，从而制止混乱。但是，只要军政府的财力主要用于维持它自己以对抗清军，任何措施都未必有很大的用处。在明确地恢复和平，而且当局能够再度把全部注意力转移到内部情况上来之前，期望他们在对付普遍的混乱方面获得很大进展，那是会落空的。

翟比南谨上 1912年1月13日于长沙

第112件附件6 莫斯先生致总领事杰弥逊函

先生：

我荣幸地通知您：承现驻本港的德皇陛下军舰“美洲虎”号舰长的好意，我今天通过英王陛下军舰“特马”号指挥官发了一份无线电报给您，要求您询问广州的民军政府，谁是他们派驻北海及该地区的负责官员。德国领事麦令豪发了一份意思相同的电报给胡汉民都督。

这些电报是在中国商会的要求下发出的，该会请我们帮助他们努力促请广州民军当局注意，由于缺乏任何有能力而又负责任的政府，此地已经出现严重的和危急的局势。

简单地说，本地的局势如下：

自从中国爆发革命运动以来，北海地区依靠从香港报纸上获得消息。在对它向广州方面紧急要求派兵保护的答复中，中国商会仅收到胡汉民都督的两封信，其中一封是宣布广州实行共和，并附有广州所发告示的副本，另一封则是通知商会，目前北海必须照料它自己。

大约在11月中旬，所有的清朝官员都已逃离北海，有一个星期左右北海没有任何官员。钦（州）廉（州）道台郭人漳在钦州宣布共和，该处系清朝西南巡防营总部所在地^①，有配备精良的部队约五千人。他命令照常征收清政府在北海的全部税款，每十天一次解交给他。

在北海西北十八英里处的廉州，当人们在高州宣布广州实行共和的时候，旧知府在郭人漳道台的指示下，作为新成立的军政分府继续主持行政工作，并得到知县的协助。廉州北海镇台^②是郭人漳的私人仇敌，对于郭人漳所发公文中删去他的姓名一事感到惊慌，弃职逃走。郭人漳派了他自己的一些军官去指挥镇台的部队。这些士兵（都是旧式军队）已有五个月未发军饷。由于得不到欠付的饷银，他们发动兵变，杀死了郭人漳的军官，捣毁了衙署，释放了狱中的七百名囚犯，并任意进行抢劫。知府是一位很受爱戴的诚实官员，于第二天化装为一个苦力而且剪掉了辫子来到本领事馆。我把他隐藏在海关内，他直到那时为止任海关监督。他乘下一班轮船动身前往香港。经过持续两天的恐怖统治之

① 原文如此，疑有错误。

② 指署北海镇总兵陆建章。

后，陈梧¹在廉州宣布广州已实行共和，他是廉州人，又是高州民军首领的兄弟。他不承认同钦州的郭人漳有任何联系。这次革命似乎已准备了一些时候，因为事情立即变得很明显，郭人漳统率的地方部队同情廉州的活动，而且他们不被郭人漳所信任。陈梧本人是一位很受尊敬的中国中年绅士，没有显著的才能，但他的副官和得力助手王志士²，曾在东京学习法律，年仅二十五岁，表现出惊人的干劲和管理能力。他通过强制征税的办法支付军饷，招募了所有那些表示积极同情的人以及郭人漳部队中的许多逃兵，组成一批警察，表面上在城内强迫维持法律和秩序，同时积极地和顺利地开展谈判，在郭人漳的部队中进行分化官兵的工作。陈梧派人张贴告示，散布所谓胡汉民都督发来的电报消息说：一支装备精良的大军（后来据说有六千人，由黄士龙率领），正由广州前来宣布实行共和并绥抚地方。我有各种理由认为，这份电报是陈梧与他在高州的那位兄弟布置的一个骗局。廉州民军还指示把北海的税收交给他们。

可是，由于对钦州、廉州、高州各地民军首领身份的真实性有很大的怀疑，而且由于有人报告城内发生了许多非法事件（旧警官被私自处死以及第二十一哨士兵杀害了他们的长官），所以北海商会明确地对局势加以控制，在整个混乱期间，商会自行负责进行治安维持会之类的工作；在广州方面没有给予书面正式承认之前（迄今尚未承认），商会现在拒绝接受该三地民军中任何一方的命令。它组织了一支约一千人的警察部队，其中五百四十三人配备了步枪，每月饷金为一万二千元。因此，他们感到有力量对少数几个人处以死刑（处死后，“警察”吃掉死者的肝脏），并开始在夜间实行通行证³的制度，结果暂时制止了混乱。他们为保护城市免遭抢劫所作的努力，由于英王陛下军舰“阿特拉斯”号于上月27日及时到达而大为加强，商会主席对该舰的到达表示感

¹ 以译音。

谢。德皇陛下军舰“美洲虎”号于29日抵达后，“阿特拉斯”号于次日离去。法国驱逐舰“弹弓”号已于本月1日驶抵此地。

与此同时，郭人漳是个性格坚强的人，虽然人民痛恨他，决不饶恕他镇压1908年三那起义的残酷暴行，但他决定在他所有的部队叛变以前首先采取行动。因此，他把所有的广东部队（据说有三、四千人）调往城外进行行军训练，邀请钦州所有的主要绅士和他一起“喝酒”，通知他们说，他们已经成为他的俘虏，而且是保证市民服从命令的人质。他带着约三百名他的同乡而又效忠于他个人的湖南士兵在城内保卫他自己。那些被关在城外的部队发了半月左右的军饷，带着步枪和很少的子弹。许多士兵立即逃往廉州，但主力部队显然在某种程度上由一位在秘密谈判中起重要作用的廉州军官所控制，他们得到在廉州匆忙募集的一万元的贿金，停留在他们目前所驻的地方。廉州方面听到他们前往该地“帮助民军政府”的消息后，普遍感到极为不安。北海方面也很害怕他们有前来的可能。

这是迄今从钦州获得的最新可靠消息，尽管有许多谣言和猜测。一种猜测认为：郭人漳（据广州的一家报纸报道，他已建议率军北上与清军作战）正在为他本人和他那些忠心耿耿的湖南部队的体面撤退进行谈判（大概是退往越南东京边境上的同兴），把钦州局势交给广西龙州前道台冯祥荣^①掌握，据说此人是绅士和军队选定的。另一种猜测认为：郭人漳现正逐渐重新维护他对那些被关在城外的部队以及对绅士的权力，根据廉州传来的最新消息说，他们开始深信他们和该地区需要一位强有力的人物。郭人漳虽很残忍，但却是一位很能干和野心勃勃的人物，除非有必要，未必会在中国的这个偏远角落里留住更长久时间，他在该

① 译音。

是受到人民强烈的厌恶和恐惧，而他的精力可以在北方找到更广阔的活动范围。然而，他是当地局势中必须受到人们仔细观察的一个因素。显然，谁有力量足以保持对那些训练有素的巡防营的控制权，他就将是整个该地区的真正主宰。同样也很明显，由于平时来自广州的协饷已暂时停止，在目前的情况下，控制这支部队的人必须考虑某种特殊方法来支付军饷。因为没有确切的消息，关于这个关键问题的最后结果，现在还不能够有把握地作任何预测。

关于廉州，有一些明确的但同时是令人不安的消息。本月3—4日夜，该地发生了严重骚乱，主要肇事者是警察和士兵。许多地方起火，全城约有八分之一的房屋被焚，其中包括一百四十家主要商店。当铺首先遭到抢劫，然后是城内外几乎所有的商店。外国教会的房屋安然无恙。发生枪击多起，有少数人丧命；许多妇女遭到强奸和绑架。主要受害者是广东人；那些抵达北海的难民的境况（她们中间有很多人在途中被抢劫和奸污）确实是令人怜悯的。

尽管北海商会对士兵的忠诚提供了很多赏金，但人们感到本地征募的士兵是完全不可靠的。如果没有外国军舰泊驻这个口岸，北海城很可能已经遭到同廉州一样的命运。据说已发生抢劫案多起：昨夜，警察自己从一艘帆船上劫掠了一百四十三包生丝和布匹。没有逮捕任何人。城内充满了坏人；商会似乎已经失去对“警察”的控制权。人民感到很惊慌，充分预料到全城不久便将遭到焚掠。所有的帆船都停泊在港湾内，它们在那里没有失火的危险。商店老板们似乎已吓得目瞪口呆，不能够保卫他们自己，尽管只要他们那方面稍有决心便足以制止坏人的行动。自昨天以来，法国和德国领事馆各布置了由十名水兵组成的卫队；从“美洲虎”号军舰派出的一艘武装汽艇正停泊在海关外面，以便在各国妇女

和儿童可能登船时进行掩护。“美洲虎”号舰长向我提供一支领事馆卫队，但我辞谢了。不过，我告诉他说：遇有危险的时候，我将愉快地利用他为英国人士提供的友好援助，但是，由于在本领事馆近旁的德国领事馆内驻有一支卫队，我不认为在这里专驻一支卫队是必要的。

就外国人而言，居民们似乎没有表现出任何敌意；看来没有理由担心对我们的房屋或生命进行任何袭击，除非北海城彻底遭到洗劫，当然那时候总是有可能遭到中国暴徒袭击的危险。我们不担心有来自革命军方面的这种危险，他们多次向我们保证，他们很想尽最大努力保护我们的生命财产；商会也很想这样做。

城内的惊慌状态是令人感到最遗憾的；商店老板们似乎完全无能为力，全靠那些雇来的流氓，他们承认那些人是不可信任的。全城遭受焚掠的危险是很现实的：对一次很有领导而又勇敢的海盗和匪徒们的坚决袭击，将不会进行名副其实的抵抗。坏人们每天蜂拥进城；没有人企图驱逐那些显然为了海盗目的前来此地的可疑的帆船。鉴于保持北海作为一个商业中心对于各国贸易特别是香港贸易具有重要意义，泊驻外国军舰是绝对必要的。由于“美洲虎”号即将离去，我们希望有一艘英国军舰前来替换它。如果允许英国军舰舰长酌情决定派一支武装部队登陆，在内陆的那一边进行巡逻（有五、六十名士兵大概便足够了）并且清除港湾内的“海盗”帆船，那么，全城便能够很容易获得保全。

我把此信的副本送给英王陛下军舰“特马”号指挥官和香港总督阁下。

英王陛下领事馆助理领事 莫斯谨上

1911年12月5日于北海

第112件附件7 莫斯先生致代领事美哲^①函

先生：

虽然我们有理由对北海地区的总的前景采取较乐观的看法，但目前的情况仍然是很坏的。附近一带的散兵游勇和不法分子似乎已放弃他们公开表示过的劫掠北海的意图，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受到临时行政当局和商会的拦阻，但主要是由于泊有外国军舰。现在，他们忙于“保护”那些较远的村庄，因为那里对他们的要求通常不进行任何反抗。有些“保护者”被激怒了的农民所杀死，但他们后来对这些农民进行报复，以致使任何普遍的反抗失去信心。许多牲畜被他们赶走；常常有人报告敲诈、抢劫、杀害、强奸等事件。城外一两英里远的道路上很不安全，乡下人无疑地极为痛苦，尽管情况显然不完全象城内的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样坏。不法分子似乎已分裂成为几个独立的抢劫集团；除非他们联合起来，北海将没有任何严重的危险。在我能够进行实际调查的历次报告的抢劫案件中，情况虽然是很恶劣的，但却被人们严重地夸大了。市民的惊慌状态，主要是由于他们散布和轻易相信那些荒谬的谣言所造成的。在那些有钱去香港的人中，大多数人仍继续纷纷前往，并且生动地谈及中国人对革命军政府和对他们自己感到缺乏信心。城内的抢劫愈益盛行，已经发生好几起“警察”进行敲诈的案件，他们有时毫无顾虑地使用他们的武器（今天早晨在大街上发生的一次打架中，步枪子弹打死了三人，重伤九人），但直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生十分严重的骚乱。商会以值得人们称赞的方式继续控制局势，尽管有许多著名人物背信弃义地逃往香港或广州。该会主席李先生和前任主席严先生已被选为民军的临时行

^① 英国驻原州代领事。

政官员，对那些惊慌失措的人表现出勇敢的坚定的态度，并且完全信任城内善良的人们。有迹象表明，他们的行动对一般居民具有镇定人心的作用，居民们表示对他们的能力增强了信心。毫无疑问，英王陛下军舰“阿特拉斯”号及其后来“美洲虎”号和“弹弓”号的及时到达，对商会坚决保卫北海城的态度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如果没有泊驻外国军舰，北海会遭到与廉州一样的命运。李先生和严先生几乎每天都来看望我，和我讨论关于组织“军事警察”、失业问题等许多事情。没有任何疑问，他们将尽力保护外国人及其财产。慈善团体对许多失业苦力免费给予饭食，但是，这项办法现已改变，根据英国圣公会汤普森医生和我本人所设计的方案，那些苦力必须为清扫和改进城市的排水沟做点工作，以换取食物。两年前，布雷德利医生曾自愿承担改进排水道的费用，但他的慷慨建议因一些绅士的反对而被拒绝，理由是他的计划将对城市的风水产生不利的影晌。除非认真处理排水问题，便没有希望消除每年春季侵袭北海的淋巴腺鼠疫的灾害。

与农村地区的悲惨状况相对照，有确切消息说：前道台郭人漳根据他的中国钦廉地区民军临时行政长官的新称号，现正忙于向前道台冯祥荣正式办理移交手续，并将率领他的湖南部队经梧州前往广州。他似乎要用很长的时间移交职务，但关于他即将动身的消息，可以从他派人去叫一名因病住在教会医院的湖南上兵一事得到证实。人们将对他的离去普遍感到高兴，因为他是很不受欢迎，不被信任，而且遭到人们畏惧的。

不过，令人感到最放心的消息是通过无线电报收到的，即龙济光提督可望于明天率领陆军约二千人自广州到达此地。我很高兴地说：商会倾向于把这个可喜的发展主要归之于英王陛下驻广州总领事的斡旋，因为对他们以前屡次提出而未得到支持的要求充分保护的呼吁，广州方面没有提供援助。

德皇陛下军舰“美洲虎”号将等候这些部队到达，然后启航驶往香港，因为它认为，在有能力的中国行政当局就职以前，使外国人士得不到外国海军的保护是不安全的（“弹弓”号已去支援在卫州岛¹受到威胁的法国教会）。

当北海成立正式的行政当局之后，控制海关和邮局的问题很可能又会重新提出来。直到目前为止，已经顺利地避免了对这些机构进行干预的任何企图。

北海的英国人士对德国官员们考虑周到的举动十分感谢，因为当其他口岸要求德皇陛下军舰“美洲虎”号泊驻的时候，他们允许该舰延长停泊此地的时间，该舰系德国在中国南部海岸唯一适于远洋航行的军舰。最大的诚挚与合作成为我们与德国军舰、德国领事及德国人士之间关系的特点。

英王陛下领事馆助理领事 莫斯谨上

1911年12月16日于北海

第112件附件 8 莫斯先生致代领事美哲函

先生：

我荣幸地报告：黄济光²统领于本月17日率领民军两千人抵达此地，受到市民们兴高彩烈地欢迎。龙济光提督不久将率领更多的军队接踵而来，据说有三千人。

粤军于今晨登岸，立即摆脱了控制，参加市民对第二十一哨士兵发动的漫无组织的攻击，该哨士兵迄今在城内“维持秩序”，很象是人们可以预料到的豺狼牧羊一样。在海关东面的海滩上，发生了一次野蛮的行动，军官们没有来到肇事地点，该行动持续了二十分钟左右，结果第二十一哨被逐出了他们设在新法庭的营

1. 译音。

2. 译音。

房，流弹打死了三名旁观者。

水兵警卫队于下午十二时半自德国领事馆撤退。下午十二时五十分，位于本领事馆近旁由二十二名可恨的第二十一哨士兵占用的警卫队住房，遭到了一次突然的袭击。这些士兵如此轻率，以致没有随同他们的伙伴一起于今晨逃走。这次袭击是一些市民怂恿约三百名民军的一伙人从两旁发动的，干得很笨拙，因此被袭击的士兵可以越过本领事馆的庭园并沿着英德两国领事馆之间的小巷撤退。经过短暂的抵抗后，守兵在很迅速而又猛烈的步枪火力下逃跑，他们中间约有一半人沿着他们可以撤退的唯一路线逃去。子弹大量地飞过德国领事馆庭园的一角及本领事馆，在本领事馆主楼紧靠我观战的屋顶平台的下面有两次被子弹击中。在越过本领事馆庭园的那些逃兵中，有两人来到我的办公室，跪在地上，不肯离去。这时，大院已被那些激动的士兵所包围，他们从矮墙上观察，势将进来搜寻逃兵。逃兵中有一人藏在马棚内；我刚刚把另一名逃兵锁在禁闭室里，便去驱逐进入大门的第一名士兵。除了跟着我的那名为首的信差和我的“马夫”之外，领事馆的仆役及其家属都感到极为惊慌。幸亏我找到一名会讲官话的云南籍班长，他站在我的身边，警告他的同伴们不得进入英国领事馆。那位班长告诉我，他的队长正在城内；我立即派了一名信差去见统领，要求他担任指挥或派一位军官承担此事。茫无目的的开枪和越野追击持续到两点半钟，本地方在这些方面的见闻一般是很多的。下午三时，那些激动的士兵撤走了。下午三时半，两名逃兵刚刚顺利地逃去，黄济光统领便派来了一位队长为此事件表示歉意。我告诉队长说，我很高兴地见到他，但他迟到了三个小时左右。我强烈地申诉士兵们的不法行为以及允许他们不受军官控制的可耻方式，而且还抱怨关于对靠近本领事馆的一所房屋进行袭击一事没有预先正式通知我。我出示两枚击中紧邻英国国旗的那幢办

公楼的子弹，从而能够增强我的谈话的份量。那位队长表示极为抱歉。我告诉他：我希望他的统领写封信来或亲自前来访问。傍晚，该统领为本领事馆派来了一队卫兵，并答应前来访问。

第二天，英王陛下军舰“阿特拉斯”号驶抵此地；当那位统领带着许多随员于下午前来访问的时候，皇家海军的指挥官唐纳森和他的两名军官在场。

他对前一天发生的事件表示遗憾之后，通知我们说：他的部队现已处于严格控制之下；他预料不久便将与龙济光提督率领的三千名部队相会合。北海恢复秩序后，他打算前往廉州、高州和钦州，并预料很可能除了廉州之外，不会遇到任何反抗。他说：郭人漳道台正率领他的湖南部队离开钦州，前往湖南和武昌。

黄济光统领声称：在本地区建立共和制度后，他和他的部队将于中国农历二月底北上。他说：南方部队在冬季不能够在北方进行军事活动。他使我领会，他认为目前在长江流域的停战谈判是使南军能够巩固其阵地的一种掩饰，他们将在春季实现驱逐满清王朝。他似乎不认为关于长江流域的谈判能够产生任何持久的和平。

次日早晨，我们对该统领作了非正式的回访；在我们离去的时候，他为我们提供了一支护卫队和军乐队穿过北海城。

该统领的关注以及到处张贴告示命令人民保护外国人特别是保护教会之事，使我相信紧张时期现已结束，外国人及北海城不再需要担心暴徒和土匪的袭击。德皇陛下军舰“美洲虎”号一驶去，英王陛下军舰“阿特拉斯”号立即到达，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无疑地起了很有益的作用。各国人士对中国地方当局和香港政府提供的考虑周到的保护极为感激。

粤军进入廉州后没有发生严重的动乱。

粤军的到达无疑地挽救了局势，他们受到民众的热情欢迎。

所有的商店已重新开张营业，人们已普遍恢复信心。部队领到了预付的四个月军饷。

黄济光统领及其参谋人员没有给人们留下具有显著能力的印象；人们将很关切地注视着重建工作。现在作任何预测都为时过早，但他们得到民众的友好亲善和良好祝愿，因为民众对摆脱过去几周内无法无天的暴乱感到非常高兴。

英王陛下领事馆助理领事 莫斯谨上

1911年12月21日于北海

第113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2月19日收到

阁下：

我在上月5日的信中，曾荣幸地报告说：其他各国使节已经同意，把上海银行家们所起草的成立一个银行家委员会接受和处理海关岁入以偿还外债的建议，提交各该国政府。

各国政府答复迟缓，直到本月3日，外交团才能够讨论应采取的进一步措施。这时，我们已经收到所有各国政府批准该建议的答复。于是，在那天举行的会议上，我们还对外务部去年12月2日的照会作了考虑，该照会附有总税务司为把海关岁入用于偿还外债而提出的建议。该照会及其附件的副本已在我上述12月5日的信中奉呈。

在安格联先生所建议的四项条款中，第一款和第二款是打算把我们与外务部已经达成的关于处理所有各条约口岸海关岁入的协议付诸实现，而第三款则符合各国所接受的关于成立一个银行家委员会的建议。因此，这三项条款是大家一致接受的，但关于第四款发生了分歧意见。该款规定：应要求银行家委员会商定暂时停止偿还应付的借款本金，在目前而且在积聚充足的岁入之前，

仅偿付到期的利息。我的一位同事表示意见说：外交团无权更改按照各合同条款规定分期偿还的清朝借款。经过一些讨论后，大家商定把这个问题提交我们各本国政府。

我们还商定，应要求各银行每季度向外交团提出一份报告，说明它们所收到的海关岁入的拨款情况。

我荣幸地随信附上我本月15日致外务部照会的副本。在我的同事们的同意下，该照会把外交团作出的决议通知外务部。我还附上外务部本月21日复照的副本，它包含一份备忘录，其中把所拟议的涉及银行家委员会的内容订为八项条款。这些条款包括银行家们提出的建议以及外交团另增加的两项条款，而且还附有下列词句：“该委员会应决定关于要求偿还外债的先后顺序的所有问题，并起草一份有关这方面应付各款的计划，供上海海关税务司遵照执行。”所引词句实际上体现了我们收到的外务部去年12月2日最初提出的第三款建议。在我的同事们中间传阅外务部复照的副本时，我建议说：由于这些建议的第一、二、三款已为外交团原则上所接受，所以对有关该委员会的条款中所包含的这些词句没有反对的理由。

现在已经得到各国使节的同意，所以各使团首脑于今天写了一封同文信件（附上其副本），通过各国领事，送交各该国驻上海的银行经理，说明第一项至第八项规定的有关条款已经获得外交团的批准，并指示他们作为该委员会的成员应遵照这些条款办事。同时，要求外务部按照同样的意思发布指示，通过总税务司下达上海海关税务司。

我在前面已经说明，各国使节对暂时停止偿还到期的借款本金问题作了保留，听候各有关国家政府作出决定。因此，我荣幸地要求您对这个问题给了指示。我应当说明：根据汇丰银行所作的一项估计，直到今年3月底为止，所征收的现款足以偿还义和

团运动前签订的所有借款的本金及支付利息，但很可能不足以偿还那一天以后分期摊还的本金。据我看来，作为一个法律上的权利问题，分期摊还的本金，同应付的利息款额一样，应严格按照各项借款的先后顺序偿还；但是，作为一项权宜办法，而且为了债券持有人的利益起见，我认为，各银行应当同意，在积聚充足的税收之前，最好是更改分期摊还计划，以便维持对历次借款息票的偿付。因此，我冒昧地提出这项建议，请您考虑批准，即英王陛下政府应与其他各有关政府协同一致，以便授权银行家委员会作出相应的安排。

朱尔典谨上 1912年1月30日于北京

第113件附件1 外交团首席公使致外务部 照会的副本

各国使节仔细考虑了所收到的外务部去年12月2日的照会，其中包含海关总税务司为把所有口岸的海关岁入用来偿还外债和赔款而提出的四项建议。他们责成首席公使答复如下：

对上述方案中第一、二、三款所建议的安排，外交团满意地予以接受。至于第四款中的建议，即要求银行家委员会商定暂时停止偿还应付的借款本金，在目前而且在积聚充足的岁入之前，仅偿付到期的利息一事，外交团感到无权作出决定；此项建议留待各有关政府考虑。

此外，关于第三款，首席公使还必须说明：各国使节已要求上海各国银行经理为成立一个委员会起草计划，该委员会将自总税务司那里接受海关岁入，并按照这些岁入所抵押的债务就处理它们的最好方式提出建议。因此，银行家会议于去年11月23日在上海举行；为了供外务部参考起见，首席公使荣幸地一并附上这次会议记录的副本，该记录说明银行家们根据上述要求所提出的

六项建议。

外交团已同意银行家们的建议，并且认为应另增加下列各款：

（一）该委员会应通过上海各国领事，每季度向北京外交团提出一份报告，说明对所收到的税款的拨付情况。

（二）将来可以对这项安排进行修改，如果情况有此需要的话。

在获悉外务部同意上述建议后，外交团将立即对上海方面发出指示，任命银行家委员会并执行所建议的安排。

1912年1月15日于北京

第113件附件2 银行家会议记录

11月23日星期四下午四时半，在麦加利银行举行各国银行经理会议，考虑各该国领事提交他们的问题，即北京外交团来电，建议在目前中国动乱期间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以监督海关岁入的保管和分配，首先保证用来偿还1900年以前缔订的各项外债，其次用来支付辛丑条约中所规定的赔款。兹决议如下：

（一）通过各该国领事向外交团建议，该国际委员会应由那些与偿还1900年前签订的以海关岁入作担保而尚未还清的各次借款有关，以及（或者）与支付赔款有关的各银行经理组成。

（二）各主要有关银行，即汇丰银行、德华银行和俄华道胜银行，应当是海关专款的保管者。

（三）要求海关总税务司提出保证，他将向该指派的委员会说明净海关岁入情况，直到中国政府能够再继续偿付借款和赔款之日为止。

（四）海关总税务司应安排每周将所有征税地点的净税收汇至上海。

(五) 海关总税务司应进行安排，每周将上海所积聚的净税收在汇丰银行、德华银行和俄华道胜银行中间尽可能接近平均地分配款额，记入各有关借款和支付赔款的帐目上，并授权海关税务司开出帐目，以支付按这些借款的先后顺序到期的借款。

(六) 如果到1912年底还没有恢复正常情况，那么，届时将把可结余的款项记入赔款帐内；此项帐目将送交外交团，由它决定其处理办法。

第113件附件5 致上海各银行家的同文信件

先生：

关于我去年11月21日的电报通知，该通知谈及拟成立国际银行家委员会，以监督海关岁入的保管和分配，保证用来偿还中国对外债务问题，同时还关于去年11月23日在上海举行的各国银行经理会议上通过的决议，请允许我通知您，外交团已同意关于国际银行家委员会的下列条款：

(一) 国际银行家委员会应由那些与偿还1900前签订的以海关岁入作担保而尚未还清的各次借款有关，以及（或者）与支付赔款有关的各银行经理组成。该委员会应决定关于要求偿还外债的先后顺序的所有问题，并起草一份有关这方面应付各款的计划，供上海海关税务司遵照执行。

(二) 各主要有关银行，即汇丰银行、德华银行和华俄道胜银行，应当是上海海关专款的保管者。

(三) 海关总税务司应向该指派的委员会说明净海关岁入的情况，直到中国政府能够再继续偿付借款和赔款之日为止。

(四) 海关总税务司应安排每周将所有征税地点的净税收汇至上海。

(五) 海关总税务司应进行安排，每周将上海所积聚的净税

收在汇丰银行、德华银行和俄华道胜银行中间尽可能接近平均地分配款额，记入各有关借款和支付赔款的帐目上；应授权海关税务司按照第一款内所载由银行家委员会决定的这些借款的先后顺序开出帐目，以支付到期的借款。

(六)如果到 1912 年底还没有恢复正常情况，那么，届时将把可供偿还赔款之用的结余款项立一帐目；此项帐目将送交外交团，由它决定其处理办法。

(七)该委员会将通过上海各国领事，每季度向北京外交团提出一份报告，说明对所收到的税款的拨付情况。

(八)将来可以对这项安排进行修改，如果情况有此需要的话。

清朝政府已同意上述条款，我们正要求它对上海海关税务司发出相应的指示。

我要求您作为该委员会的成员将遵照上述指示办事；当第一款内所提到的计划拟定后，请惠允给我一份副本，供我参考。

第 115 件 总领事额必廉致格雷爵士函

1912 年 2 月 20 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随信附上我写给英王陛下驻北京公使关于云南、贵州及四川部分地区情况的一份报告的副本。

额必廉谨上 1912 年 1 月 13 日于云南府

第 115 件的附件 关于 12 月份云南、贵州及四川部分地区情况的报告

这个月一开始就不吉利，因为在蒙自附近地区发生了多次对中外财产的袭击，其中一次是士兵们发动的，其余的则是土匪发

动的。

3日晚上八时，蒙自驻军闹事，洗劫了蒙自城，他们仅在该地财库一处就获得了大约二十万银两，并且把注意力集中在城外外国人居住区内的几幢房屋。卡波比安可旅馆和百货商店（意大利人的）、斯百多公司的房屋、一般商人（德国人）以及法国铁路公司都遭到抢劫。在法国铁路公司，存放在保险箱内的海关税款二万五千两被夺走，开罗斯兄弟百货商店（希腊人的）遭到抢劫后，又被焚毁。多次发生胡乱开枪的情况，开罗斯百货商店的三名希腊人受伤，当时另一名希腊人不知去向，人们担心他惨遭不幸，后来终于被找到了，未遭伤害。据说，这次闹事的原因是欠付部队的饷银。次日夜间，一位名叫阿里托的意大利承包商的住宅和作坊，位于法国铁路线上腊图^①车站附近二百零九公里的地方，遭到了袭击和劫掠，有一名法国人受伤，一名苦力被杀。阿里托乘坐一辆手推车沿铁路线行走的时候，遭到一伙匪徒的射击，他的一名苦力负伤。5日夜间，一伙匪徒袭击了一百五十二公里处浙宗^②（芷村）的外国人住宅和类似外国人的房屋。接着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一小批外国人在一所房屋中避难，顺利地驱走了匪徒，但属于一位中国人所有的西式旅馆以及意大利承包商瓦格略的住宅遭到抢劫，一车鸦片（贵重的奖赏）被运走了。在听到第一声枪响的时候，有三个人一伙，其中包括一名妇女在内，匆忙登上一辆恰好升火待发的机车，以最快的速度南行，听任其他外国人尽力去做他们所能够做到的事情。然而，关于每夜发生的事没有继续记录下去。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袭击大约发生在本月中旬，当时在二百九十六公里处的宝溪^③佩利尼旅馆（意

① 译音。

② 译音。

③ 译音。

大利人的)遭到抢劫。

由于士兵的态度以及附近地区具有成群结队的匪徒，蒙自的形势似乎是很不稳定的，以致在该处居住的外国非官方人士已撤往越南东京，而且法国领事认为，全部撤退将终于是必要的。然而，由于从云南府派遣了约五百名可靠的士兵前往该处，以及经过很大的困难之后撤走了以前那些哗变的驻军，所以该口岸已恢复平静。这些哗变的士兵最初公开拒绝服从命令，但枪毙他们的两名军官之后，他们闷闷不乐地屈服了。到本月底，他们都已抵达云南府。这次闹事中的十二名首领已在此地被公开处决。他们中间有些人终于放下了武器，其余的后来甘愿被送往四川，所有这些人以前都曾经声称，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他们将宁肯战斗，而不愿屈服。都督没有预料到这么轻易地获得胜利，因为外务司司长在谈话中曾经说过：如果我们听到城外战斗的声音，没有理由感到惊慌，因为那意味着哗变的士兵正受到“压制”。

为了保护铁路起见，十二名法国宪兵以及二十名左右的“越南辅助部队”已分布于各主要车站，事前蔡锷将军对此完全了解，他后来对这些军队的驻扎向法国领事提出了形式上的抗议。

我不认为这样说是过其其词的：蒙自遭到洗劫的消息在云南府引起了极大的惊慌。蒙自的士兵们这么容易地在几个小时内获得了等于许多月饷银的东西，人们几乎难以指望，他们在此地的伙伴，其中有许多人是心怀不满的，将不遵循他们所树立的坏榜样。大家都知道：他们已经为一次总的起事作了准备：那些心怀不满的士兵藏有一张一百一十七名富裕居民的名单，这些居民的住址将首先受到他们的注意。此外，人们还看到许多状貌可恶的异乡人每天乘火车到达，在南郊游荡，显然是等待开始行动的信号，而同民们是急躁不安的，准备利用部队中间任何骚动。但是，蔡锷将军以他独特的严肃认真精神进行工作。城墙每天夜间有人

守卫：南门象以前一样每天开放到半夜，驻有重兵防守，准备对付来自城外的攻击，而强大的巡逻兵巡查城内和郊区的各个地方。他们逮捕了許多人，紧接着对其中大多数人立即处决。据说，炮兵象步兵第七十二标一样感到不满；两名炮兵军官于12月5日被枪毙，其中一名是因为他被发现藏有秘密结社的某种徽章或标志。另一名军官于12月9日被枪毙，二十四名士兵于10日被处死。临安驻军的一名参将因私事前来云南府，该事确实证明是与秘密结社有关的，大约在同一时间被处决。最后，于16日竟然发生了一次暴乱，但被迅速镇压下去。该日午后不久，许多迄今尚未武装起来的新兵试图冲进军械局，看来似乎是希望找到存放在该处立即可用的枪支弹药，借以武装他们自己。附近营房以及设在前师范学堂的陆军总部的士兵们立即对他们进行猛攻，经过一场很短的战斗，有七名叛兵在战斗中被枪杀，一百二十人被俘。俘虏中有五人于次日被斩首，其余的接着被处决。这伙叛兵的首领没有被捕获。人们发现，所有这些士兵都属于哥老会，他们试图夺取军械局是预定计划的一部分。如果他们获得成功，两千多名哥老会员将发动起事并洗劫全城，然后将建立一个新政府，他们已指派官吏主管各衙门。我们很有兴趣地了解到，他们将对外国人及其财产给予最充分的保护。

18日，大概是根据从俘虏中获得的情报，他们逮捕了哥老会的十一名首领，其中有三名被立即斩首，其余的监禁在狱中。由于总头目已顺利地逃走，而且哥老会仍显然很有力量，所以人们担心他们将策划另一次起事，但蔡锷将军的精力似乎已挫败所有那些将要破坏和平的人，因为尽管有好几次谣传即将发生动乱，云南府城自那时以来一直是很平静的。

由于人们没有企图减少那些促使蔡锷将军考虑建立一支“商团”的人的影响，所以有可能引起麻烦。大约有两千人已应募入

伍，每人每月得到六元饷银。商店老板们接到要求，或者出一个人，或者每月出六元钱，由都督寻找代替人。这些人中间绝大部分都是代替人，人们了解这一点是不会感到惊讶的。现在，城内各街道每夜由商团进行巡逻，夜间布置在城墙上的卫兵已经撤走。

云南的陆军现已改编，并且增加到六标。以前的陆军番号均已取消；步兵各标的番号从一起到六为止，中外文数字的号码已缝在制服的衣领上。有人告诉我说：几乎所有的前陆军士兵都已离开云南府；城内的那些士兵大都是新兵。云南军队的总人数大约为二万四千人，其中约有六千人驻在云南府和本省南部，西部也同样驻有六千人，大约有一万二千人已分期分批前往四川。

前师范学堂有一幢大建筑物或许多房屋，已普遍改为陆军总部、营房和政府机关的所在地，它用围墙与约两百码远的军械局连接在一起，其间相隔不远修筑了一些工事，以便把这些连接的房屋变成一座强大的城堡。同时，城墙上有损坏的地方正在修复，特别是西北角附近，因为去年夏季下了大雨，使该处城墙的外层脱落，露出了土质。

目前，军政府感到焦虑的一大根源是现款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缺乏现款。以前的劝业道台、现任军政府参议^①在不久前告诉该省邮政司考夫曼先生说：省库中的现款仅够用到即将来临的农历二月初，大约是公历三月中旬。他们发布告示，要求人民向政府提供捐款，结果得到了两万元。现在，他们打算发行总额为五十万元的纸币，而且还谈论到按照外国方式发行公债以及政府举办彩票。

由于一再传来消息说，铁路沿线的外国人财产遭到袭击，云南西部发生骚乱，以及派往四川的部队目前似乎有可能被清军逐

^① 袁玉扬。

回，所以我认为，所有居住在内地而尚未离开其教堂的人们，无论是男人和妇女，一律撤退是可取的；中国内地会驻本地的秘书根据我的要求按照那个意思发出了电报通知。我的意见是，留在云南府没有急迫必要的任何人应撤至越南东京，或至少撤至铁路被破坏处以南的某个地方；由于云南府至越南东京之间的直接联系已于最近恢复，所以我公开宣布，我对英国臣民留住在云南府至东京之间铁路沿线的任何地点感到满意。

12月12日，新任外务司司长向我保证说：云南全省都很平静，其中包括开化、思茅和大理在内。然而，他承认，由于有许多土匪，现银短缺，以及军队很少，所以高州的情况很糟糕。后来，此事从其他方面已得到证实。12月11日，我收到思茅海关税务司的一份电报，通知我说：因为他发现局势是难以容忍的，所以他将立即离去。后来若干天内，人们知道发至思茅的电报都没有收到复电，从而引起了他们的推测，以为该处正在发生骚乱；但是，最后传来消息说，一切都很平静。该税务司的撤离似乎是作为一种谨慎措施，因为他收到蒙自税务司措词激烈的电报，极力劝告他这样做。

12月7日，军政府收到一份电报说：大理闹事者的首领是一位前任知县，已被某地村民杀死，因为他的部下在该地进行抢劫。人们认为，本省西部的形势将因此大为改善。大理附近地区仍驻有大批警卫部队，对回民方面的任何企图进行威吓。

4日，贵州西部安顺府的传教士们发来一份电报说：各教堂均被焚烧，传教士们将动身前往云南府。我立即致电贵州军政府，极力劝告他们采取措施保护基督教徒及其财产。我收到了一份令人感到放心的复电。安顺府的那伙传教士于22日抵达此地，那时我获悉：送给我的那个消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被夸大了的：仅有一所用来作为教堂的土砖房屋被拆毁。那些传教士报告说，沿

途土匪充斥，不过，他们没有受到骚扰，因为他们的旅行队是很庞大的，这是由于有好几名贵州的前任官吏同他们一道走，而且还有一支特别强大的护卫队。他们预先派往前面安排住宿的一名仆人遭到了袭击和抢劫。来自安顺府的亚当先生告诉我：目前的贵州政府处于哥老会的掌握之下，或至少是该会在处理事务中享有绝对的权力。安顺府知府和该地哥老会首领曾共同商议关于向传教士们提供护卫队的人数问题。由于沿途的情况不安全，贵阳的外国人已决定继续留住城内。他们鉴于一切似乎都很平静，认为留在该处是更为谨慎的。

当贵州政府对它所应当采取的政策犹豫不决的时候，云南府和长沙发来的威胁性的电报加速了它的行动。它答复说，贵州已经起义。

有两伙传教士自云南东北部的昭通和东川抵达此地。他们曾见到大批开赴四川的士兵，并发现这些士兵总的说来举止极为端正和友好。然而，有一次，一批士兵显然是怀有敌意的，特别是一名士兵高声叫喊：“现在我们容忍你们这些外国人，但我们的机会将要到来”；另一名士兵对他们这伙中某人的五岁小女孩直吐唾沫。我把这些士兵的详细举动告诉了蔡愕将军；他表示遗憾，并且答应：如果能够查出他们，将予以适当的惩罚。

派往四川的云南部队，有一路刚刚越过边境，伸入到金沙江流域的会理州，几天以后便撤退了。该地知州向指挥官保证说：他已声明赞成共和，但他完全能够管理他所辖地方，而不需要任何形式的外援。其他的云南部队向东北方向前进。据说，长江沿岸的叙府由几百名云南和贵州部队驻守，被一万名川军所包围。体操教官（日本大佐，他自称姓李）随部队前往四川；我最近听说，他已在途中被杀。据我所知，当他动身的时候，人们预料他将不会回来。

宁远府的传教士们来信报告，一切都很好；最后一封信的日期是12月13日。后来，此地的法国主教得到他在宁远府的同事的消息说，该城现已宣布共和；该同事还提供关于成都革命、接着发生兵变以及新都督被杀的消息。有好几名传教士从巴塘和四川藏族区经过维西和大理于7日抵达此地。他们把旅途情况向我作了一个很有趣的说明。四川西部似乎处于无政府状态，藏族平民、喇嘛、汉人以及各土著部落都互相打仗，只有喇嘛对外国人是友好的。他们还谈到其他外国人特别是法国驻成都总领事安迪先生的行动，当他们最后一次听到关于安迪先生的消息时，他带领着一伙法国神父和修女即将到达理塘。后来，我通过宁远府方面获悉，这伙人在藏民的护送和友好接待下已平安地抵达打箭炉；最近（1月3日）的消息说：他们所有的人以及那些修建跨越雅鲁藏布江的桥梁的法国工程师们都被困于雅州，不能前进。

我不止一次地提到蔡锷将军在应付他所管辖的那些不安份的军事人员和其他人员方面的能力。他在许多方面是一位卓越的人物；如果他幸存下来，目前的革命在未来几年中很可能获得显著成就。有许多人憎恨他，更多的人敬慕他。我知道，此地的许多绅士和学生，以及许多士兵和临安、开化、广南等东南三府，都是强烈反对他的，但是，由于他的朋友们的帮助以及他本人的无容置疑的才干，他迄今终于设法坚持下来。我毫不怀疑，只要他继续掌权，云南府将是平静的。他仍然很年轻，现在仅三十岁。

第 116 件 代领事布朗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2月24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随信附上我今天写给英王陛下驻北京公使的一封信的副本，该信报告重庆方面为合并四川两个互相对峙的行政当局

所提出的建议。根据总领事务谨顺先生的要求，我还附上他 1 月 5 日写的那封信的副本，因为该信中所说的情况对他提供的消息作了补充。

布朗谨上 1912 年 1 月 19 日于重庆

第 116 件附件 1 总领事务谨顺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我荣幸地附上成都军政府于去年 12 月 29 日拍发给重庆军政府的一份电报的译文，其中包含关于合并该两个军政府的建议。

该电建议说：成都应当是四川共和政府的所在地，但应派一名高级官员以镇抚使的名义驻在重庆，担任该地一镇或一万名驻军的首领。目前此地的都督尹昌衡应被承认为四川全省的都督。现今重庆方面的都督张培爵应成为四川统一后的副都督，而罗纶和他的同辈重庆副都督将被任命为镇抚使，或枢密院长，或军事参议院长。各部部长及副部长应由两地的人材中秉公选拔。

看来似乎是重庆方面首先发动合并的。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两地军政府的合并既然是人们为了这个混乱省份的和平而极为向往的，也许会获得良好的结果。

我应当补充说：目前的通讯被人们称之为电报，但事实上，资阳至泸州之间的电报线已经中断，仍然畅通的线路只有成都至资阳段以及泸州至重庆段。

务谨顺谨上 1912 年 1 月 5 日于成都

第 116 件附件 3 代领事布朗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我荣幸地报告：现在，关于成都和重庆两军政府合并的谈判在最友好的气氛中进行。成都行政当局已表示他们愿意让位给重

庆方面；重庆军政府为了在礼节上不致落后，表示愿意屈居成都方面之下。

对成都提出的那些建议（已在成都 1 月 5 日的信中说明），重庆方面的反建议如下：

- （一）成都仍作为省会。
- （二）重庆作为都督的驻地。
- （三）目前重庆行政当局的首领张培爵担任都督。
- （四）尹昌衡担任副都督。
- （五）重庆的副都督夏之时担任增设的副都督。
- （六）罗纶担任枢密院长或总顾问。

为了支持第三款和第四款起见，重庆方面极力声称：张培爵作为以前留学日本学习军事的学生和著名的学者，比尹昌衡更适于担任军政府都督的位置和行政管理职务；尹昌衡作为军队首领的专长可以由新政府更好地用来担任副都督的职位，他将在该职位上主管陆军及军事活动。

如果这两个互相对峙的行政当局在它们和解的声明中都是诚挚的（这是容许怀疑的），那么，无疑地将在双方都感到满意的基础上迅速商定一项妥协办法；但如果双方都不撤回它们提出的候选人，那么，通过推举前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为都督，很可能将找到一项摆脱困难的办法。这位绅士于昨日自成都抵达此地。据说他的事情很重要，其性质尚不了解，但大概与目前的谈判有关。

布朗谨上 1912 年 1 月 19 日于重庆

第 117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阁下：

我荣幸地随信附上英王陛下公使馆武官写给我的一份报告的

副本，该报告是关于军队调动以及和平解决的可能性问题的。

朱尔典谨上 1912年2月5日于北京

第 117 件的附件 韦乐沛中校的报告

在过去几天内，即自1月27日至29日，总理大臣袁世凯所信任的清军继续进行重要的调动：步兵第九标（三个营），炮兵第三标的一个营（三个队），骑兵的两个队，第三工程营的三个队，以及各种分遣部队。总人数达三千三百人左右，经京奉铁路由滦州和北戴河一带运至北京。

河南新军的三个营也于此时自正定府（直隶南部）运抵此地。他们已发出命令并准备火车，自张家口西边的阳高调回三列车的“武卫左军”（旧式部队）。不过，直到1月31日为止，“武卫左军”尚未到达。

1月31日，京奉铁路当局奉命准备车辆，运送第三镇的另两千人自北戴河、留守营和滦州至丰台铁路交叉站（就在北京城外）；2月1日和2日，这些部队到达，即步兵第十二标，炮兵第三标的六百人（带有八门野战炮和六门机关炮），以及各分遣队。

2月1日和2日夜间，还有两列载兵的火车经过丰台开往永定门车站（就在北京外城正中的南门外面）。今天下午，我在丰台车站见到更多的部队（步兵第十二标），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住在附近的村子里，一部分留在车厢中。这些士兵很肮脏而且不整齐，但看来情绪很好而且感到满意。他们穿着很暖和的羊皮大衣，戴着有皮边的军便帽。他们的粮食供应很充足，许多载着粮食的敞车停在车站的旁轨上。

1月27日至29日间在永定门下车的那些部队，最初驻扎在先农坛东面的空地上，但现已迁入内城，分散住在各居民区。

据说，最近从直隶南部和河南招募的“武卫右军”中，总共有五营也已到达北京。

1月23日，还有第六骑兵团自保定府抵达此地。

由于上述调动以及估计以前驻在此地的部队，现在看来在北京及其周围的部队如下：

	大约人数
禁卫军。该军大部分（据说除去驻西陵的两营之外）驻在海淀（在北京西北约四英里处）：	
步兵一标.....	} 8,000人
紫禁城内骑兵一队.....	
第一镇（满族人）。驻北苑者：	
步兵一标.....	} 3,000人
炮兵七队.....	
骑兵一（？）队.....	
工程队两队.....	
辎重队两队.....	
（该镇其余部分已调走，或在“第一军”的交通沿线，或已同派往张家口及其以西地区的部队相会合。）	
第二镇：	
步兵第八标的一营.....	300人
第三镇：	
步兵第九标.....	} 7,300人
步兵第十标.....	
步兵第十二标.....	
炮兵第三标的两营.....	
骑兵第三标的两队.....	
第三工程营的三队.....	
第二辎重营的一部分.....	
第六镇：	
骑兵第六标的一队.....	200人

旧式军队和警察

	大约人数
“武卫左军”：	
驻北京者：	}
步兵六营.....	
驻南苑者：	

步兵两营.....	
炮兵第一营的两哨.....	
新炮队一营（但尚未配备大炮）.....	6,000人
新马队半个哨.....	
驻通州者：	
步兵四营（亲兵）.....	
炮兵两哨（其中一哨属炮兵第一营，一哨属炮兵第二营）.....	
骑兵一哨.....	
“武卫右军”：	
（新式）步兵五营.....	2,000人
“淮军”（直隶练军）：驻南苑者一哨.....	200人
“步军”（满族人）三营.....	1,200人
警察（满族人）.....（约）	5,000人
共计	33,400人

在这三万三千多名部队中，大约有一万九千人是汉人，仅一万四千人是满人。这些满族部队包括禁卫军中的仅约五千人（禁卫军步兵第四标的全部、工程营和辎重营的大部分以及禁卫军炮兵的一部分均系汉人），第一镇，“步军”，以及警察等在内。

因此，在北京及其附近地区，满族部队的人数已大大地被汉族部队所超过了。

值得注意的是，前一两天，街道上散发一份传单，显然是禁卫军印发的。该传单说：最近一些居心不良的人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散布谣言，说禁卫军士兵对汉族部队怀有敌对情绪，这完全是不真实的；满汉部队都是武装的伙伴；鉴于内战给中部各省带来的苦难，禁卫军决定，就他们的责任而言，京城的和平不应遭到扰乱；等等。

“第一军”的所有报告倾向于说明：由于他们受到北京方面的嘲弄，他们的战斗情绪已完全被破坏。使他们退出经过苦战所争得的阵地，以及听从他们的敌方背信弃义（不顾协议）重新占领他们所放弃的那段铁路，这个强加给他们的严峻考验足以破坏几乎所有部队的士气。因此，如果他们拒绝为这么不关心他们的当

局继续作战，那是不足奇怪的。

除了上述调往北京的部队之外，还有其他部队自湖北和河南向北京方向移动，即“第一军”的两个机关枪队于1月25日开至保定府。

1月24日，一大批新兵自正定府抵达保定府。

在保定府为警卫军新招募一个营，但他们目前将不前来北京。

因此，关于直隶省，有迹象表明很可能和平解决，而且据说隆裕太后对此事已作出决定。人们仍可能预料将产生麻烦的那些不妥协分子，是张勋提督驻徐州府（在江北）的部队以及前土匪头目张作霖和冯德麟所率领的满洲“巡防队”（地方部队），他们已宣称：如果皇帝退位和建立共和，他们便打算进军北京。总督赵尔巽最近也似乎对革命党人变得冷酷无情，很可能是因为他们不久前杀死了他的兄弟、四川总督赵尔丰而使他感到愤怒。

武官 韦乐沛 1912年2月2日于北京

第 118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2月27日收到

阁下：

自从我写了1月6日的信以来，已经收到英国驻重庆代领事报告四川南部和西部情况的另外几封来信。

可以说四川自9月初发生铁路事件以来，情况极为混乱，现在由于建立了三、四个独立的政府，特别是成都、泸州、重庆等地的政府，从而使该省的局势更加复杂起来。农村地区因秘密结社和土匪的劫掠而处于恐怖状态，他们不是在保路同志会的外衣下进行活动，便是扔掉一切伪装，组成自十人至一千人不等的队伍任意抢劫。除了所有这种骚乱之外，成都军政府与云南府军政府

之间还存在着战争状态。

人们经常预料重庆将发生骚乱，但直到目前为止，重庆城仍是很平静的，布朗先生能够对那些来自上游各地的难民的过境提供有益的帮助。由英美烟草公司的斯特里克、朗特里等先生组成的这样一伙逃难者，于11月27日离开成都，在合江受到清政府军队的袭击，大概是因为他们悬挂着革命军旗帜的缘故。他们在沿江其他几处地方，也受到查问和阻拦，但终于平安地抵达重庆。他们报告说：虽然革命军据有叙府、嘉定和泸州，但他们不能够在周围地区行使任何权利。

在这些情况下，为一伙加拿大传教士尽可能争取提供一支护卫队似乎是可取的，因为人们知道他们正要走那条相同的路线。在布朗先生的要求下，马利阿特海军少校冒着某种危险前往叙府下游约二十英里处的李庄镇，这是由于这个季节长江上游水浅、航行困难的缘故。他在李庄镇使那伙人登上英王陛下军舰“水鸭”号，并和他们一起于12月15日返回重庆。这伙人的首领是一位名叫尼夫的先生，但没有谈到其他人的姓名。英国驻重庆代领事说：难民的处境无疑是很危险的；对马利阿特海军少校经过一段几乎难以行驶的航程前往营救他们的行动，他无论怎样赞许也不会过份。我已把这份称赞他的报告通知总司令官。

12月12日，布朗先生收到英王陛下驻成都总领事于12月5日写的一封信，说明该城的形势极为危险。巡防队（地方部队）与陆军（正规部队）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街道上到处都是武装士兵游荡，没有一点遵守纪律的样子。蒲殿俊都督主持下的军政府已开始经受内部的分裂。革命党对军政府感到不满。许多土匪头目，即所谓同志会的首领们，带着武装的党羽住在城内，为他们对革命事业所做的贡献谋求报酬；城北的混乱与抢劫极为普遍。

因此，务谨顺先生打算把所有的妇女、儿童和那些没有经验的传教士们送出成都，并且表示希望高级海军军官能够派一艘炮舰前往叙府，等候那伙人的到达。然而，江水不断下落。马利阿特海军少校报告说，炮舰甚至不可能驶抵泸州。因此，布朗先生向重庆革命军政府请求支援：他们欣然同意尽力相助。他们说：“蜀通”号轮船将运载部队前往合江和泸州，镇压那些地区的匪帮；如果当那些逃难者到达泸州时，该船仍停在该处，那么，它将接到命令把他们运来重庆。务谨顺先生已设法使这一大批总共一百四十九人于12月12日和13日离开成都。此信所附布朗先生12月28日的来信，报告他们已抵达重庆。

该省不断增加的混乱终于迫使布朗先生于12月17日发出通知，建议所有那些不再与英王陛下驻成都总领事取得联系的英国臣民立即动身前往沿海，并且再一次警告所有住在重庆城内的英国臣民说，他不能够对他们所在的地方承担保护他们的责任。

我荣幸地附上英国代领事的两封来信，它们表明，无论在重庆或该省其他地区，到年底都没有任何改善。务谨顺先生直接向您报告的省城最近情况是否将最后有助于恢复秩序，那是很难说的。赵尔丰在西藏和边境地区所取得的军事成就，只不过在短短的几个月前还是他的同胞的骄傲。对他的处决，据我看来，似乎不可能对调和争夺四川控制权的各派具有很大的作用。

大约在四个星期的时间内，我通过宜昌由信差传递的发给英王陛下驻成都总领事的那些电报，都未能获得复电。我很高兴地说，这个不祥的沉寂终于被打破了。今天，我收到务谨顺先生的一份电报，所注日期为1月27日，说成都很平静，而且一切良好。

朱尔典谨上 1912年2月8日于北京

第 118 件附件 1 代领事布朗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我荣幸地报告关于本省混乱的继续发展情况。

我刚才收到绥定府的消息说：虽然该地传教士们未受伤害，但教会在山上的房屋遭到破坏，而且新的女子学堂被焚毁。

鉴于局势的严重性，我昨天发出一项通知，警告那些居住在川东道内地的英国臣民说：他们应立即动身前往沿海；必须把所有的妇女和儿童由最安全的路线毫不迟延地送走。如果在英王陛下驻成都总领事管辖下的英国臣民没有与务谨顺先生直接联系，我也把这项通知发给他们。

尽管务谨顺先生提出警告，不许未婚妇女独自留在内地，但似乎仍有一些未婚妇女居住在南部、广元、巴州和营山等地的英国圣公会各教堂内，没有男子的保护。正如我以前曾指出过的那样，目前每一条陆路都受到土匪的骚扰，只有通往重庆的水路仍然是比较安全的。现在无法说明这些水路的畅通将维持多久，但我希望那些妇女将到达此地，而不致太晚。

重庆城处于骚乱状态。军政府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倾轧：人们预料随时将爆发战事。昨天发布一道告示，警告人民当城内发生战事时不要上街。本地的士兵想要枪炮；贵州部队要求银钱，正在为此吵闹。水上巡防队的长官最近被军事当局背信弃义地处决，但该队仍然存在，只不过是等待机会进行报复。

哥老会（秘密结社）成员的人数大大地超过以前，并与士兵们握手言欢。现在充当土匪的三百名前巡防队士兵仍携带着武器驻在铸钱局内，大约有两百名“敢死”队在该处加入他们之中，据说所有这些人都是其他地区的土匪。四名阴谋反对军政府的军队

首领于今天被捕，并当即被枪决。由于此事而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暂时安宁，但前景是很严峻的。我再一次警告那些居住在重庆的英国臣民说：只要他们继续住在城内，炮舰便不能够对他们提供适当的保护；因此，他们应前往下游，或雇船停泊在各炮舰的近邻。我向他们指出：对那些蓄意决定不顾这项指示的人们，本领事馆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布朗谨上 1911年12月18日于重庆

第118件附件2 代领事布朗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我很遗憾地报告：本地的形势没有显示出改善的迹象。在接到成都暴乱的消息后，他们立即准备派遣一支部队前往省城，表面上是为了恢复该城及其附近地区的秩序，但实际上则是为了所谓重庆蜀军政府的利益而占领省城，该军政府的年轻都督张培爵怀有成为四川最高统治者的野心。

昨天，警察局首领告诉我说：副都督夏之时将于今天动身前往成都，率领一支一万人的部队，由贵州、云南和湖南等省的分遣队组成，此外还有本地部队。我不能够证实这个人数，但这次远征的规模无疑是很大的。最近抵达此地的贵州陆军约一、二千人，已向成都方面进发，将在途中与一支二、三千人的云南陆军相会合。这批云南陆军已抵达叙府，占据该城，准备参加那个对省城采取的一致行动。湖南部队的三百名前锋于上周抵达重庆，立即沿着通往成都的道路向前推进。

不过，我于今天傍晚获悉，那些奉命于今晨动身的本地土兵拒绝启程。当局不接受本地巡防队提出的发放三个月军饷津贴的要求；现在，巡防队接近于发动兵变。人们认为，这些土兵同那些闹事的成都巡防队具有联系，据说成都巡防队中有些人已抵达

本城。

保路同志会的几艘货船现在泊于城外，从而使局势更进一步地复杂起来；人们十分怀疑城内有上匪头目。本地招募的士兵中充满了哥老会或秘密结社的成员，所有这些人对目前的军政府感到愤恨，因为该会的一位著名成员、他们的队长被阴谋处死；他们准备参加任何反对军政府的示威。我们希望，此种示威因为想要使军政府在外国人心目中信誉扫地，将不采取袭击各国领事馆和教堂的形式。人们将记得，几个星期前，水上巡防队方面对我们发动的诸如此类的敌对活动，因军事当局采取迅速行动而遭到失败。

12月12日离开成都的那伙外国难民，于26日平安地抵达此地。他们曾遭到被围困在合江县的清政府军队的开火，但他们幸运地设法经受了两岸的射击而仅有一名中国船夫受伤。如果我们一旦能够安排他们动身，他们那伙中的大部分英国人士将立即启程前往沿海。当沿江还比较安全而没有什么危险的时候，我坚决劝告他们采取这条航线，因为我担心，重庆爆发的任何动乱，结果都将在通往宜昌的沿江一带产生海盗行为和普遍混乱。如果在任何时候出现这种情况，那些无人护送的外国人将不可能前往沿海；由于冬季航行困难，英王陛下炮舰不能够对他们提供任何援助。

商人们预料城内将发生严重动乱一事，已在今日举行的本地商会会议上表现出来，当时通过的决议宣布：每家商店的老板应立即自备四筐生石灰，供对付抢劫者之用；在发生动乱时，为了阻碍士兵们前进，应在各条街道上用家具建立路障。

本省其他地区的情况也并不好些。潼川府的教友会报告说：该城已被成都派来的大批巡防队所包围，他们正向居民索取现银。妇女和女孩们被任意绑架，恐怖统治笼罩着该地区。

盖七利主教在一伙妇女和儿童的陪同下，于今天由保宁府抵达此地。他那伙人中的一位成员报告说：当地驻军于最近哗变，并对该城开火。许多成都部队携带着大批步枪、子弹和白银进入保宁地区。他们的大量财产对当地的士兵是一个直接的引诱，并产生很坏的效果。成群结队的土匪正在各处活动。

以前曾经护理四川总督的王藩台^①，正前来保宁府，他在该处将被推举为川北的统治者。

布朗谨上 1911年12月28日于重庆

第 119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2年3月1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关于北京的骚乱。

昨晚八时左右，袁世凯本人的第三镇士兵突然闹事，肆意焚掠内城的大部分地区，该处现已成为废墟。断断续续的开火整夜未停，其目的是恫吓居民，从而便利于他们进行抢劫；看来似乎很少有人死亡。据说，闹事的起因是由于减发军饷。

外国人没有遭受伤害；英国臣民在使馆区内安然无恙。袁世凯平安无事，今晨城内已恢复平静。

第 120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2年3月1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北京的骚乱问题。

关于我今天的电报。

根据进一步的调查，北京内城所受损失的证明比人们最初所设想的要小得多。

^① 布政使王人文。

第 121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2年3月1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北京的骚乱问题。

关于我今天的电报。

袁世凯说：闹事的部队实际上仅限于第三镇的两个标，他希望能够用他认为可靠的其余部队控制局势。

第 122 件 代领事史密斯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3月2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随信附上我写给英王陛下驻北京公使的一封信的副本，该信是关于腾越局势问题的。

史密斯谨上 1912年1月31日于腾越

第 122 件的附件 代领事史密斯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我曾荣幸地发电报向您报告：地方当局决定阻止省当局任命的道台^①前来腾越主管迤西道一事已造成严重局势，它可能在这附近地区引起实际冲突。

对于这种情况，陈天星^②负有主要责任，他是率军远征大理府的首领，这次远征的后果如此严重。省当局似已决定应由他而不是由张文光对大理府的情况承担责任；据说，已命令张文光将他处决。执行这些命令超出了张文光力所能及的范围，因为陈天星仍然是他从大理带回来的那些部队的首领，并且在他所占用的

① 指赵藩。

② 即陈云龙。

衙门内保有一支三百人的卫队。因此，陈天星得到了关于上级官员们对他本人所怀有的意图的充分警告，并采取措施反对他们进入腾越。他从永昌调回大批部队，并把他们布署在广安桥^①，它是朝着大理府方向距形成腾越平原边界的那些大山几英里远的一个村庄。李根源对此项行动的答复是从大理府率领一支两千人的队伍前来，两天后赵藩道台另率领一千人接踵而来。

尽管陈天星具有在早些时候与大理部队作战的经验，而且他所指挥的部队的人数和装备与即将到来的那些部队极不相称，但他继续打算进行抵抗，直到李根源确已到达永昌府为止。直到27日晨，冲突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在那一天，使我感到宽慰的是，我接待了边界委员赵某^②的来访，以前我曾经和他谈过这个问题，现在他告诉我说，陈天星终于同意接受劝告离开腾越。他已决定赴湖北；由于很明显的理由不能沿陆路前往，他要求给予护照，使他能够经过缅甸走海路去。我很乐于接受这项要求，因为他继续留住腾越必将引起严重的动乱，而他的离去除了使那些想要他充任首领的人们感到失望之外，不会造成更大的不便，同时将使大批部队的向前推进成为不必要的事情。

然而，我感到不完全相信，在陈天星确实离开腾越之前，危险已经过去。因此，在1月29日他动身前往缅甸以前，我没有把局势的变化通知您。

同一天，张文光动身前往永昌途中的索温桥，迎接李根源和赵藩。他们到达后，张文光将解除民政职务。

海关税务司曾通知我，总税务司已授权他前来，与新的有关当局磋商关于将海关重新置于适当的基础之上的问题，要求我告诉他什么时候局势将允许他这样做。因此，我于1月28日请他

① 译者。

② 据本书《中国第三号（1912年）》第14件的附件，此人名赵开勋（译音）。

前来，相信他如今正在途中。虽然我曾经不失时机地催促召回税务司，但在张文光统治时期那是白费唇舌，因为我听说，张文光甚至说过他打算永久维持当前的安排。我相信，赵藩对海关职能的看法将不会那么狭隘，而且对国际义务的性质不那么完全忽视。

史密斯谨上 1912年1月30日于腾越

第 123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2年3月2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今晨，唐绍仪写信给我说，局势正变得极为严重，建议我召开一次外交团会议，计划保护京城的措施。

今天下午举行的会议上决定：与大沽建立无线电报联系；从天津抽调一千人前来增强使馆卫队；从各国部队中派出强大的分遣队每天在各主要街道上游行。大家认为，最后这项措施将受到人们的欢迎，可能具有安定人心的作用。

2月28日劫掠北京的那些叛兵已前往保定府，在该处犯下了类似的暴行，据说包括对外国财产的破坏。为了阻止他们返回此地，已下令破坏铁路。

第 124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2年3月3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天津来电如下：

“昨夜，士兵和暴徒们进行焚掠，造成很大的损失。今晨已平静，但局势很严重。出动了警察，但难以控制。德国医生希利耶乘车经过肇事地点时被击毙。”

第 125 件 总领事务谨顺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3月4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随信附上我写给英王陛下驻北京公使的一封信的副本，该信报告目前成都军政府为避免与现驻四川的滇、黔部队发出冲突所作的努力。

务谨顺谨上 1912年1月20日于成都

第 125 件的附件 总领事务谨顺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成都军政府在本月初所面临的困难主要有四项：重庆军政府的对立；预计代理边务大臣自雅州向成都进军；可能来自甘肃清军方面的危险；云南和贵州部队占领自流井、叙府和犍为。

这些困难中的第一项似乎已在解决的过程中；第二项由于攻克雅州和傅嵩林的逃跑（有人说已被逮捕）而获得有力的解决。关于第三项困难，有人说将任命一名高级军官去攻击北方，换句话说，派兵远征甘肃。现在，对第四项困难显然将会同重庆军政府一起予以解决。

布朗先生于本月8日来信说：

“都督张列五¹⁾将于今天或明天动身前往叙府，因为在应邀前来参加进军成都的云南部队与同志会之间已在该处发生纠纷。张列五将去那里对此事进行调解。此后他还将前往自流井及其附近地区，那一带深受土匪的骚扰。”

1) 张培爵，字列五。

今天的《鹃声报》载有川南道宣慰使洪平儒¹写给成都都督的一份报告。他发现（似乎是在嘉定）关于云南分遣部队的谣言很盛行。有些人相信他们策划吞并四川的某些部分领土，特别是南溪和屏山（在叙府的上游和下游）；另一些人则认为他们反对大汉军政府。但是，所有这些谣言都来源于那些被云南部队击败的保路同志会的成员。

1月7日，宣慰使抵达犍为，他在该处会晤了云南分遣部队指挥官张开儒。张开儒说：云南部队打算促成四川的独立，直到他们抵达叙府后，他们才了解到，事情已经获得解决。他们在叙府发现有自称同志会的大批暴徒，这些人正在扰乱公共的安宁。他们驱逐这些人，并下令予以解散。该指挥官说：整个川南道遭到所谓保路同志会和土匪的蹂躏，必须对他们加以镇压，否则将危及总的形势。孙文（孙逸仙）不是曾经宣称，除非六个月内恢复和平，中国可能被列强瓜分吗？此外，蜀军政府曾经两次发电报，请求帮助四川；居住在云南的四川人曾捐献银钱，并且紧急呼吁云南军政府提供支援。十八省均已得到通知：如果云南真正抱有兼并领土的残暴野心，难道那些省份不用武力干涉吗？四川的问题一旦获得解决，他便将率领他的部队返回家乡。

宣慰使在评论这次谈话的时候说：情绪是很好的，但没有完全澄清云南部队首领为什么任命一位名叫潘和书²的人充任叙府的地方官吏。任命地方官吏的权利应由军政府享有；他建议现在派某位能干的官吏接管此项职务。犍为地方行政官的职位也是空缺的，宣慰使推荐王淮宣³担任。的确，云南部队仍然守卫该城，但他们不干涉地方行政。

1 译音。

2 译音。

3 译音。

他还谈到关于云南分遣部队人数的详细情况，估计他们在五、六千人之间。该部队分为两个纵队，由总司令官韩国朝¹率领。派至犍为的分遣队由携带过山炮和机关炮各两门的九营步兵以及两营工程兵组成，总共一千二百人。他们在犍为休息几天之后，打算继续前往嘉定，也许由该处赴成都。宣慰使极力劝告成都军政府立即派一位特使与他们的总司令官谈判，以便阻止他的前进。该宣慰使希望，军政府将同时派一支部队沿各条道路清除农村的土匪，以便消除其他人进行干涉的所有借口。对那些已经携带枪枝前来成都的保路同志会员可以加以使用；对那些没有完全武装起来的会员应当解散，但不许他们回去骚扰地方。

他注意到，在川南道的南部地方（大概是自流井），必定有好几百人在保路同志会的名义下，干着完全不正当的行为。对这些人也必须采取一些镇压措施，使人民不再遭受蹂躏。

本省邮政司里奇先生沿大道自重庆经资州前来成都途中（1月7日至17日），遇见一大批南下的部队。他获悉，这些部队打算支持成都军政府对云南和贵州部队北进的抗议。如果云南和贵州部队满足于那些据说是他们向自流井和叙府的知名人士及商人所勒索的款额，而且满足于继续从四川获得津贴的诺言，那么，他们也许接受劝告返回家乡，否则继续发生战事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务谨顺谨上 1912年1月20日于成都

第126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3月4日收到

阁下：

关于我上月4日的信，我随信附上英王陛下驻南京领事关于

译音。

该口岸革命运动问题的另外几封来信的副本。这些有趣的报告继续叙述了那个白命为新共和国的临时首都每天经历的许多事情，并将成为可供参考的有用档案。

现在这封信中所要加以评论的那些报告，系说明以前几封信中提到的十三个革命省份代表会议结束的情况，他们最后通过的决议是任命黎元洪为革命军元帅，并任命黄兴为副元帅，从而把以前上海那伙代表的决议颠倒了过来，因为上海那伙代表把更高的职位给予了黄兴。我顺便可以说：黎元洪在这个国家所享有的名声，在个性和果断方面仅次于袁世凯；如果袁世凯遭到任何不幸的事情，人们认为黎元洪很可能被请来接受袁世凯的衣钵。

对任命黎元洪为元帅一事所提出的正式理由，是因为目前袁世凯已经同他进行和平谈判，暂时绝不可以把任何人置于他的地位之上。黎元洪都督继续留在武昌指挥湖北军队，黄兴则担任指挥南京的部队。

由于孙逸仙博士于1月1日抵达南京，革命派的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象我以前所说的那样，在已结束的革命各省代表会议的一次特别会议上，孙逸仙博士于去年12月29日以十二票对一票当选为这个革命的共和国的临时总统。

据说，他在宣誓就职时郑重保证：他将在中国推翻满清王朝；当一旦组成完全共和的政府并获得列强的承认之后，他便立即辞去总统的职务。后来，他多次建议将总统的职位让给袁世凯；毫无疑问，当正式宣布满族退位后，袁世凯将马上接受该建议。

庆祝孙逸仙博士当选总统仪式的特点，是浙军所采取的专横行动，他们未提出正式的或以其他方式的通知，带着剪刀作为武器在南京各街道上游行，剪掉所有那些仍然蓄发的中国人的辫子。他们不分老幼贫富，所有人的辫子都遭到同样的命运。

研究中国史的学者认为，蓄辫的风俗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匈奴

人（公元前二百年至公元二百年）及其嫡系子孙突厥人（公元五百年至八百年），他们都留着发辫。不过，越是到了近代，蓄辫就越直接溯源于满族人，他们在驱逐明朝之后，没有办法明白区别那些曾用各种方式帮助他们的“忠实”的或归顺的汉人，只好使那些汉人采用满族的服装和辫子，以代替明朝人那种复杂的“顶髻”以及大袖子、裙子，等等。1644年，负责照料满清幼年皇帝的摄政王下令说：当时所有的汉族“臣民”必须蓄满族的辫子，而且除守制期间外，还要把头盖前部完全剃光，违者处死。

南京人民对浙军的暴行感到非常愤恨，浙军还挨户搜查那些已躲避他们监视的人们，从而增加了他们的罪行。在前些时候，华南所有的汉人都已剪去辫子，作为支持革命派的标志；南京居民对于没有机会避免公开遭受侮辱一事有理由感到愤怒。他们迄今对革命军政府的体验已经极为不满；采取向商人们强制借款和强迫征税以募集资金的专横方法，使所有的人们都受到影响，同时又进行剪辫运动，从而大大增强了革命事业在该城内已经引起的厌恶情绪。广大群众开始认识到，豁免一切捐税以及关于新太平盛世将带来繁荣昌盛的其他一些普遍幻想的前景，事实上是没有根据的。在许多场合下，他们开始对他们所给予革命运动的同情和支持感到后悔。

孙逸仙博士在就职典礼上宣读的声明，说明了共和国的目的和政策，它将把革命各省联合在一个共同的中央政府的领导之下，从而保证统一管理军政事务。该声明还列举了打算采取的各项改革，在结尾时表示感谢列强在中国发生危机期间所抱的中立态度以及对革命事业的同情，并宣布新政府具有履行它的义务的诚挚意图，以便迅速赢得一个文明国家所享有的权利。

他们特别选定1月1日为总统就职日的目的，在于使共和国开始的日期同各国每年开始的日子一致起来，为政府采用阳历提

供一个正当的借口。这个改变正如伟晋颂先生所了解的那样，虽然是可取的，但却与中国人的感情相冲突，必定不会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

吸引总统所任命的内阁的注意力，而且后来为革命各省代表会议所批准的首批问题，是如何获得现款以进行政府工作以及维持象南京一样的各城市秩序的问题，这些城市中的军队已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控制。总统主持了所有的内阁会议，但在其他方面他的主要工作似乎是发表各种声明和宣言，其主要目的无疑是尽量使外界广泛了解新政府的建立和他本人的职位。

现在人们还不知道内阁考虑的结果怎样，但了解到他们已按照美国的模式起草某种形式的宪法。同时，由于缺乏现款，使得国内行政方面的改组工作不能获得任何进展：看来很可能在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政府之前，军事法规将继续在中华民国全境内施行。

伟晋颂先生的来信说明，临时总统如何邀请袁世凯在满清政府退位后前往南京接任总统职位，以及对这项建议有时所附加的各种不同条件。看来很明显，内阁总理大臣最后担任总统职位，是使中国能够恢复和平和秩序的唯一可能的办法。

1月28日，孙逸仙博士正式召开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首届会议。中国本部十九省中，有十七省代表出席，例外的两省是山东和甘肃。不过，只是因为除了所说的两个例外省份之外，每省都有代表参加，这样该会似乎才是全国性的。但由于那些代表不是由各省都督所任命，便是在没有代表的省份由南京政府所指定，所以不能够说该会是代表人民的。新的会议召开之前，解散了那个选举孙逸仙博士为总统的旧的各省代表会议。然而，这两个会议的差别不是很大的；大家知道，革命派打算由新的会议决定中国所应采取的政体问题。

朱尔典谨上 1912年2月9日于北京

第 126 件附件 1 伟晋颂领事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关于我本月 21 日的信，我荣幸地报告：十三个革命省份的代表会议已经结束它的会期。它最后通过的决议是任命黎元洪为革命军元帅，并任命黄兴为副元帅，从而把上海那伙代表关于首脑人物的决议颠倒了过来，因为他们不久前把更高的职位给予了黄兴。关于对黎元洪的任命一事所提出的正式理由，是因为目前袁世凯已经同他进行和平谈判，而且伍廷芳是他的谈判代表，所以此时绝不可以把其他任何人置于他的地位之上。就我所知，这些任命是该会议顺利通过的唯一事项。

革命派正在进行的大规模的战争准备，不是一个令人感到愉快的和平征兆。奉调自南京北上而且现在集中在临淮关和蚌埠的部队人数，必定已大大超过一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宣布停战以后离开此地的。这些部队中只有少数人乘火车北上；有些人是步行的，但大多数似乎是乘帆船通过运河运至蚌埠的。由于张勋提督也不断获得增援，已有八百人左右于本月 25 日自北方抵达徐州府，所以敌对双方的部队人数大概是不相上下的，但就纪律和一般状貌而言，革命军士兵同张勋提督所带走的部队相比较是十分不利的。

黄兴于昨日抵达这里担任南京革命军的最高指挥官，黎元洪都督继续留在武昌指挥湖北部队。人们预料黄兴将不会亲自去前线，而将担任陆军总长的职务，把对战场部队的指挥交给徐绍楨统制。有人告诉我，南京的部队共有三镇，每镇各七千人。浙军拒绝在寒冷天气打仗，同他们的纠葛已得到圆满解决。他们将守卫各交通线。

上星期内，通过向南京商人强迫征收二十万两的税款，本地

的军费已得到补充。它引起了人们情绪上的很大变化，对旧制度怀有好感。

伟晋颂谨上 1911年12月27日于南京

第 126 件附件 2 伟晋颂领事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我在上月 27 日的信中，曾经通知您：前两周内在此地开会的革命各省代表会议已经解散。可是，上星期五，即上月 29 日，召集该会成员举行一次特别会议，任命革命共和国的临时总统。正式候选人是孙文博士，他以十二票对一票当选担任该项职务，那张唯一的反对票是浙江代表投的，他通过投票支持黄兴，使选举活动产生了一些变化。孙文博士于昨天下午乘专车抵达南京，下榻于总督衙门。人们为欢迎他而做了很多准备，部队排列在自火车站至总督衙门全程为六英里的道路两旁，但新总统没有下火车改乘汽车，而是把他的车厢调到通往城内的铁轨上，坐火车前往总督衙门。对计划的这项改变是在最后时刻作出的，因为有某种理由担心，有人可能对他扔炸弹。昨晚，为他举行了就任临时总统的庆祝仪式。据说，他在就职的誓词中，郑重表示要使中国摆脱满清王朝的统治，而且当一旦组成正式的民国政府并获得列强的承认后，他便辞去总统职务。这似乎证实了普遍的看法，即他只不过是使袁世凯感到为难。今天，新总统将发表一项公告，宣布他的就任及其政府的政策。

驻在南京的浙江部队用很特殊的方式庆祝孙文博士当选为临时总统。白天，他们的队伍带着剪刀做武器在各主要街道上游行，对他们所遇到的所有那些仍然蓄辫的中国人，一律用剪刀剪去辫子。他们不分老幼贫富，所有人的辫子都遭到同样的命运。此地的人民对这个暴行确实感到非常愤恨。正象他们提出的正当申诉

那样，没有给予他们正式的或以其他方式的剪辫通知，所以他们完全是遭到突然袭击，没有机会避免士兵们在旁观者的嘲笑声中当众强迫剪辫所带给受害人的那种侮辱。有人告诉我说：军方象所有其他的人一样，对浙军的行动感到愤慨，但他们不敢制止这些罪犯，更不敢加以惩罚。现在，浙军正挨户搜查那些已躲避他们监视的人们，从而在人民面前增加了他们的罪行。不过，到现在，南京必定只有很少的人仍然保留着他们的辫子，因为为了避免遭到当众剪辫的侮辱，这里几乎所有的男人现在都已经剪发。甚至年轻的姑娘们也把头发卷成小面包形，盘绕在头顶上，而不象以前那样梳成辫子垂在背后。

在我上一份报告中提到的向南京商界强制征收二十万两税款的成功，鼓励军方图谋继续采取灵活办法向公众募集银钱。现在，他们已发布命令说：这座城市内所有租赁房产的人应向军方预付今后三个月的租金，当农村重新恢复秩序而且他们的财政状况允许的时候，军方将把该款偿还房东。这项强制性的借款如果可能实施的话，比向商人强迫征税甚至更加不受欢迎，因为所有的人都受到它的影响，同时还进行剪辫运动，所以它大大增强了革命事业在这座城市内已经引起的厌恶情绪。最近，我曾经与好几位南京的商人和绅士谈话，没有从他们任何人中间听到对目前的制度说一句好话。他们对于已经给予革命运动的同情和支持一致表示后悔。

毫无疑问，目前南京的情况从每一个观点看来都是令人感到不满意的。人们对程德全巡抚抱有很大的期望，但自一个月前革命军占领此地以来，他在他担任“都督”的这座城市内停留的时间不过三、四天。据说，他为建立某种形式的民政管理机构所作的努力受到了军方的阻挠，所以他带着厌恶的情绪离开了此地；如果他能够避免的话，他将不会回来。在过去三个星期内，曾任命

三人为全省的财政司长，但他们都已辞职。事实上，南京仍施行军事法规，士兵们完全象他们的长官一样享有控制权。我在以前的几份报告中，已经提到浙军和粤军的骚乱行为。虽然苏军没有上述浙军或粤军那么明显，但有人告诉我，他们对居民来说甚至是一个更大的祸害，因为他们全都是盗贼；在城内发生的许多抢劫案件中，几乎每一件都已追溯到他们那里。这些士兵抢劫的地方中，有些是张勋提督的士兵所没有抢劫过的官办学堂。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军初到此地时显示出某些复苏迹象的贸易已几乎完全趋于停顿，而且离开此地的人超过了前来此地的人，这是不足奇怪的。我可以这样说，城内没有一所学校已经开学。

前几天内，大约有四千名粤军自上海抵达南京，驻扎在城内。由于营房都已住满，为了给他们腾出地方来，同样数目的苏军和浙军已调出南京，浙军开往浦口，我知道苏军系返回苏州。从新总统本人的原籍调来这么多的部队，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加强他的地位。

在津浦铁路沿线，一切似乎都很平静。塔克先生刚从临淮关旅行归来，告诉我该处有七、八千名部队。蚌埠至固镇之间有几英里的铁路遭到破坏，但桥梁没有被炸毁，虽然曾经有人为此目的在淮河大桥埋了地雷。据说，由一名法国人指挥的约五百名革命军企图破坏固镇的桥梁，已经遭到失败。现在，维修列车在浦口至临淮关之间定期行驶，塔克先生已顺利地获得了另外几节车厢。最近，铁路被用来自临淮关运兵南下，但没有载兵北上。

伟晋颂谨上 1912年1月2日于南京

第 126 件附件 3 伟晋颂领事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我得到了孙文博士在此地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总统时宣读的那

份声明的副本。昨天在南京发表并张贴出来的这份文件，说明了中华民国的目的和政策，它将把革命各省联合在一个共同的中央政府的领导之下，从而保证统一管理军政事务。该文件列举了它打算采取的各种改革，在结尾时表示感谢列强在中国发生危机期间所抱的中立态度以及对革命事业的同情，并宣布新政府具有履行它的义务的诚挚意图，以便迅速赢得一个文明国家所享有的权利。

上海报纸详细报道了新总统到达和就职时所举行的庆祝仪式。这些仪式是由军方安排的；正象我以前说过的那样，南京人民迄今对革命军政府的体验是绝不满意的，他们没有参加这些仪式，也显然没有任何兴趣。值得说明的是，此地的下层人中，通常谈到孙文博士是新皇帝，他们不了解总统这个专门名词，认为它只不过是更高头衔的一个委婉的说法。

他们特别选定1月1日为总统的就职日，所以民国开始的日期将同各国每年开始的日子相一致，为政府采用阳历提供一个正当的借口。这一改变虽然是可取的，但却与中国人的感情相冲突，因此一定不会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

由总统提名后来为革命各省代表会议所同意的内阁阁员的姓名，于昨天公布。这份名单于前一天交给了我，但代表会议没有批准这些任命之前，我没有把它电告您。新阁员的姓名如下：

副总统	黎元洪
陆军总长	黄 兴
外交总长	王宠惠
海军总长	黄鍾英
司法总长	伍廷芳
财政总长	陈锦涛

实业总长^① 张 謇
内务总长 程德全
教育总长 蔡元培
交通总长 汤寿潜

当然，黄兴、伍廷芳、程德全、张謇、汤寿潜等先生的名字是您所熟悉的。王宠惠先生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作为一个法律专家而享有很高的声誉。他在和平谈判中担任伍廷芳先生的助理代表。陈锦涛先生也是一位归国的留美学生，曾任袁世凯内阁中的度支部副大臣，他和王宠惠先生都是广东人。担任海军总长的黄钟英舰长是一位福建人，他曾经在北洋舰队的一艘较小的巡洋舰上担任几年指挥官。

南京的公众舆论还没有表达出来，我不能说此地人们是怎样看待这些任命的。不过，总的说来，除了大多数新阁员们当然完全没有行政管理经验之外，对总统提出的人选似乎是没有什可挑剔的。

继续进行的战争准备迄今很少表现出松弛的迹象。的确，最近没有新的部队抵达此地，但几乎每天都从本地驻军中选派部队北上，据估计人数已接近一万五千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粤军没有被调出城外；向我说明的理由是他们缺乏冬季作战所必需的装备，虽然我自己的印象是他们不打算进行这样的战斗。我听说：从杭州铁路上借来的火车车厢正在用船自上海运至浦口；虽然没有使用这些车厢，但把它们运至该处似乎表明，在停战期限届满之后，革命军很想充分利用津浦铁路。很难得到关于张勋提督的任何消息，他控制着徐州府的电报局，但无论如何，他的主力部队已由那里退入山东边境。

①：原文作农业总长。

在南京，有钱的公民仍继续受到敲诈，要为军费提供捐款；通常所用的方法是封闭他们的房屋，并以没收相威胁，除非他们立即交出一定的款项。

伟晋颂谨上 1922年3月5日于南京

第 126 件附件 4 伟晋颂领事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由于任命了下列官员为各部的次长，所以民国临时内阁现已组成：

陆军部次长	蒋作宾，湖北人。
海军部次长	汤芎铭，湖北人。
司法部次长	吕志伊，云南人。
财政部次长	王鸿猷，湖北人。
外交部次长	魏宸组，福建人。
内务部次长	居正，湖北人。
教育部次长	景耀月，山西人。
实业部次长	马和，广西人。
交通部次长	于右任，山西人。

宣布的另一项任命为庄蕴宽继程德全任江苏都督，因为程德全现任内务总长。我以前在梧州的时候，便和新都督十分熟悉，他于1905年在那里任知府并署理道台。他是一位性格特别坚强的人物。内阁中没有温宗尧先生的名字，他直到最近还是伍廷芳在外交方面的副手。他曾被任命为内阁中的藩属部总长，但该项职位被各省代表会议取消了，理由是新中国没有藩属，只是各省的联合。

① 原文件农业部。

除了程德全先生因在上海患重病之外，所有的新总长们都来到了南京，并已经努力工作。引起内阁注意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获得现款以进行政府工作的问题。目前革命派的税收仅勉强足以应付他们的军事需要，没有钱可节省下来用于其他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内阁在不很长的时间内便认识到：如果要组织一个有效的行政当局，并从目前革命各省普遍存在的混乱状态中建立秩序，必须在其他方面立即寻找新的财源。由于大家认为举借外债是办不到的，所以总长们作出的决定是发行一亿元的内债，利息八厘。据宣布，这笔公债的收入除满足政府的急迫需要外，将用来建立一种金本位的新货币。他们发表这项通告的目的，无疑是要使那些可能认购公债的人具有信心，因为如果这些人认为这笔款项将花费在战备方面，那么，对购买公债将采取极审慎的态度。我认为，发表这项通告的目的，还在于使外国人对新政府进行全面改革的决心具有深刻的印象。无论如何，人们很难相信，总长们会真正认为认购公债的款额还足以满足行政当局的紧急费用，虽然有人告诉我，他们满怀信心，在中国南部和海外华侨中间将热烈认购公债。

据我所知，内阁已经讨论有关国内行政的唯一其他问题，是维持象南京一样的各城市秩序问题，因为这些城市中的士兵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失去了控制。为了协助警察执行他们的职责特别是处理军队中的罪犯，将组成一支宪兵队。

总统主持了所召开的历次内阁会议，但在其他方面他的主要工作是发表各种声明和宣言，其主要目的无疑是尽量使外界广泛了解新政府的建立和他本人的职位。

伟晋颂谨上 1912年1月11日于南京

第 126 件附件 5 伟晋颂领事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自从我上一次于本月 11 日写信给您以来，没有什么事情可向您报告。上周内，内阁同革命各省代表一起共同开会，讨论这个新共和国的宪法。现在还不知道他们考虑的结果如何，但人们知道，他们起草了一部共有四十项条款的宪法，并且是以美国的宪法为模式的。与此同时，由于缺乏现款，无论在这个首都或各省，使他们在内政方面的改组不能获得任何进展；现在，很可能在建立永久性的政府之前，继续在中华民国全境内施行军事法规。作为临时政府处境窘迫的一个例证，有人告诉我说：可供行政管理费用的税收甚至不够支付各部总长的薪金，他们中间大多数人的职责完全是有名无实的，所以直到目前为止没有给他们提供办公室或办事人员。

募集款项以满足行政当局急迫需要的重大任务，已经交给了财政总长陈锦涛先生，他目前正在上海试图谈判一笔对外借款。陈锦涛先生对借款必须提供的最宝贵的担保品是杭州至宁波的铁路。我在本月 11 日信中所提到的内债，迄今还没有在市场上出售，但据说已经从华南和马六甲海峡得到大量认购的许诺。不过，很难相信他们指望从这方面得到的入款会是很多的，或者是在海外募集款项不会那么令人焦急。

最近，总统主要是忙于进行和平谈判。他似乎对达成一项有利的解决办法持乐观态度；有人告诉我，他为了达到该项目的，准备作出较他那一派所完全同意的更大让步。根据各方面的报道，他的处境决不是称心如意的，有人已开始阴谋策划把他从总统的职位上赶下台。

南京的情况差不多同往常一样。使居民们感到十分宽慰的是，

主要属于浙军和苏军的五、六千名部队已被调出城外，开往长江对岸的浦口，由该处分批乘火车北上，前往临淮关。人们希望，由于他们已经离去，抢劫行为将不那么盛行。不幸的是，最近抵达此地留驻城内的一些粤军，由于他们窥测方向，仿效他们的浙军伙伴的榜样行事，使他们自己成为人人极为厌恶的对象。这些士兵的行动已经成为领事团向有关当局共同申诉的主题，部分是由于他们在几件事例中对外国人有侮辱行为，部分是因为他们有朝天开枪的那种令人讨厌的习惯，给公众造成很大的危险。前一情况的那些罪犯一般当然是喝醉了酒的士兵。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中国士兵中饮酒的人要比以前多得多，这无疑禁止鸦片后果之一。

此地于本月15日正式庆祝新年。那天宣布为公定假日。为了庆祝这个日子，各街道用那些发给各户主的旗帜鲜艳地装饰起来。下午，总统举行了一次招待会，据我所知，民国官员都参加了该会，虽然外国人没有出席。公众一般都不注意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商店都继续营业；人民完全象平时一样进行他们的工作。

直到一两天前，和平的前景是极美好的，但已突然变得不那么明朗。只不过在上一个星期，袁世凯还接到总统的邀请，在满清政府退位后前往南京接任总统职务。现在，这项建议已被撤回，内阁总理大臣获得通知说：在民国得到列强的承认以及各省重新恢复和平和安宁之前，他不能够参加民国政府。这好象是对他进行无限期的拖延。革命派还十分强烈地反对在北京成立任何临时政府，声称：如果袁世凯接管该处的事情，那就必须是根据他们的命令。

伟晋颂谨上 1912年1月20日于南京

第126件附件6 伟晋颂领事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我在本月20日的信中曾经说过：由于此地总统方面的态度突然发生变化，和平的前景已变得不那么明朗；总统曾邀请袁世凯在清朝退位后接任他的职务，后来显然撤回了他的建议，并拟订了一套新的条款，它不仅禁止在北京设立临时政府或副摄政职位，而且不许内阁总理大臣和满族人参加南京的临时政府。不过，在今晨的《华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经孙文博士授权的声明，从该声明看来，那些新条款似乎绝不是企图把袁世凯排斥在政府之外，而只不过是推迟任命他担任总统，直到民国获得列强的承认为止。人们预料，如果不在北京设立副摄政职位，对他的任命只不过是拖延几天时间的问题，否则便可能延迟相当长的时间，而在这个期间内，袁世凯如不真正接受共和政体，可以有机会“选定他自己的代表或不按照暂时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安排的计划行事。”该报还发表了孙文博士本月22日拍给伍廷芳的一份电报的译文。他在电报中说明了清帝退位后他把总统职务交给袁世凯的那些条件，其目的是要保证内阁总理大臣断绝同满清政府的联系，并成为民国的忠实公民。当然，假定清帝自愿退位的话，那么，孙文博士制定的那些条件绝不是袁世凯所不可能接受的。内阁总理大臣担任总统职务，似乎是中国能够迅速恢复和平和秩序的唯一可能的办法。

由于谈判中的最后这个障碍，人们对总统提出了许多指责，我不能不认为这些指责是完全不应当的。象我以前说过的那样，他的处境是极为困难的。革命派中的军界人士和极端分子（孙文博士确实应把他目前的地位归功于这些极端分子），几乎一致赞成继续进行战争，他们认为从战争中可以赢得一切，而毫无所失，

因为他们对胜利是满怀信心的。因此，这两种人始终反对同满族人或袁世凯进行任何性质的妥协。他们认为满族人是不得予以考虑的，而对袁世凯则怀疑他试图欺骗他们并为他自己追求清朝的爵位。正如人们完全可以想象到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对总统来说，在他们以及他那一派中较温和分子之间保持平衡的任务不是很容易的。可以这样说：他的影响几乎总是在赞成和平解决的那些人一边，这是值得称赞的。

最近，沪军的到达已表明有所减少，但仍有大批部队继续奉调沿津浦铁路北上。革命派估计，到现在，他们在战场上有五万人，如果和平谈判破裂，这些部队将从目前所集中的三个基地——皖北的正阳关、临淮关和清江浦向北推进。驻临淮关部队的指挥官系柏文蔚将军，他是以前第九镇的军官。他很年轻，曾在当地军事学堂受训，看起来特别英俊。

上星期内，由于南京驻军至少有一半已经离开，显然使当局有勇气试图对士兵们的暴行加以某种控制。现在，他们已任命徐绍桢统制为城防总监（我想这是一个很新的官衔），指示他立即组织军事保安队，将协助警察执行他们的职责。新总监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他刚处决了指挥某标部队的标统，该标因不服从命令和普遍胡作非为而声名狼藉；他在士兵中也惩罚了几个人作为儆戒。他还企图在城内建立某种民政机构，因为直到目前为止南京城仍处于军法的管制之下。新民政当局的首领将是马良先生，他目前任外务司长，已被授予知府的官衔，其职责相当于北京“顺天府”的职责。直接在他下面的是一位被称为“民政长”的官员，他把以前由两城^①知县所行使的职权结合在一起。对这些改变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它们是由新政府中一个被称为法制

^① 在清代，南京分为江宁和上元两县。

局的部门提出的。该局首领的官衔是局长，由宋教仁先生担任，他以前是“革命党”的成员；前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任副局长。显然，该局将对各省的政治区划进行改组，今后各省仅划分为“县”，取消所有其他的区划。地方“审判厅”或法院也将重新开庭，如同许多初等学堂开学一样；有人告诉我，将成立一所新的军事学堂。中等学堂仍继续关闭。

现在，已把衙署分配给各部，只有财政部和外交部例外，为了方便起见，目前那两个部设在总统府，即前总督衙门。南京总是有特别宽敞的地方供各衙门之用，所以在供给各总长住房方面的困难比对他们提供办事人员要小一些，现在总长们大都仍缺乏办事人员。据说，每一位新总长都在考虑对各该部门进行十分彻底的改革，但这些改革当然仍停留在纸面上。我注意到，教育总长已经宣布，今后各初等学堂将采取混合制，即对男女儿童一律开放，中国人认为这是一项很激进的改革。进入这些学堂的儿童年龄为十一岁至十六岁。他进一步宣布，所有颂扬满清王朝的词句应从学堂课本中删去。实业总长张謇先生主管下的盐务当局也预示要进行一些很激烈的改革。这个消息使盐商们感到惊慌，所以他们向总统提出了一项抗议。总统已向他们保证，在未同他们商量之前，将不作任何变动。目前所打算做的事情，是把盐务管理当局由扬州迁至南京。

伟晋颂谨上 1912年1月24日于南京

第 126 件附件 8 伟晋颂领事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正象我曾荣幸地于本月 26 日和昨天再度电告您的那样，在革命军与张勋提督的部队之间重新发生了战斗。革命军于上星期听说张勋正调兵自徐州府沿津浦铁路南下，所以派遣一支小部队自

临淮关沿铁路北上进行侦察。本月25日，他们在徐州府以南七十六英里和临淮关以北四十一英里的固镇车站附近与清军发生遭遇战。现在还不清楚究竟哪一方首先发动攻击，但结果是革命军被逐回朝这个方向的下一个车站新桥，并有些伤亡。他们从临淮关立即派遣强大的援军北上，于本月27日发生了另一次战斗。清军在战斗中显然被击败，因为他们已经撤退，遗弃了一辆已遭破坏的机车。现在，革命军正跟踪北上，昨天据说已抵达固镇以北三十六英里的南宿州。有人报告说，清军在这一仗中打得很糟糕，大大提前了所必需的撤退时间。他们的撤退同他们南下时一样，系乘坐火车。这里的政府声称此次战斗系一次很大的胜利，并对此感到极受鼓舞，这不是不自然的事情。人们不知道革命军在战场上究竟有多少人，也不了解双方各自有多少伤亡。

由于停战协定于昨日满期以及战斗已经开始，使我感到相当忧虑，唯恐和平谈判可能终于产生不利的结局。因此，我于昨天下午访问了总统府，询问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孙文博士很忙，不能接见我，但他通过他的一位秘书，给了我一封信。该信的大意是：虽然停战协定已经满期，但和平的前景仍是很好的。段祺瑞将军与黎元洪都督之间在汉口已经达成一项谅解，它将防止在那部分战场上重新爆发冲突。总统认为，现在不需要很长的时间，清军所有其他将领都将效法段祺瑞将军的榜样，它将使朝廷除退位外别无其他选择。明显表现出想要打仗的唯一将领是张勋，他似乎是不可调和的；不要很久便可解决他。鉴于上海报纸对局势的看法是很悲观的，它也许可能在北京反映出来，所以我于昨天把此信电告您，据我看来此信是颇为重要的。

除了和平谈判之外，上星期内发生的主要事件是孙总统于本月28日正式召开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首届会议。中国十九省中，有十七省代表出席了会议，例外的两省是山东和甘肃。不过，只

是因为除了所说的两个例外省份之外，每省都有代表参加，这样那个会议才是全国性的。但由于那些代表不是由各省“都督”所任命，便是在没有代表的省份由此地的政府所指定，所以绝不能幻想把该会称为人民的代表。然而，我知道，革命派正是打算通过这个会议决定中国所应采取的政体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他们强烈反对这样的建议，即清帝退位后，在北京成立一个临时政府，由袁世凯担任副摄政。我毫不怀疑，内阁总理大臣能够召集一个会议，不敏感的人也知道它不是什么全国性或代表人民的，它将投票一致赞成他所希望的政体，正象目前的参议院会议将投票赞成共和一样。

在新的参议院召开之前，上星期已解散了那个选举孙文博士为总统的旧的革命各省代表会议，我在历次信件中曾经常提到那些代表们的活动。这两个会议的差别不是很大的。各省代表会议也是由各省“都督”和革命派其他首领所指派的人组成的，这些人表达他们的意见。几乎所有旧的代表也在新的参议院中得到了席位。但是，在旧的各省代表会议中，代表的人数不是固定的，有些省份有三、四名代表，其他省份则只有一名代表或没有代表，而在目前的参议院中，每省有相同数目的代表或有权派相同数目的代表，即三人；人们猜想所有各省都已有代表出席，可是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山东和甘肃迄今还没有代表参加。我曾就此问题询问一位次长，据他说，虽然外国报纸把新的会议称为国民会议，但它实际上是民国临时政府的众议院或立法会议。

现在，内阁每周集会两次，仍忙于财政问题，而未顾及几乎所有其他的事情。毫无疑问，政府十分缺乏现款，因为它以中国轮船招商局的财产作抵押募集款项的计划已经显示出这个情况。它在国外借款所作的努力显然是不成功的，所联系的那些外国金融家们提出的条件是民国必须首先获得列强的承认。它已经欠付军队

的大批饷银；除非它能够迅速得到现款或实现和平，军队的士气肯定将受到很坏的影响。不过，由于和平谈判处于危急状态以及张勋提督采取肆无忌惮的态度，从而使军事活动完全不可能有任何松弛。前几天内，每天都有一千人左右离开浦口前往临淮关；从送给我的那些报告看来，我估计，目前在前线的部队人数不会比二万五千人少多少。在战场上的各省部队中，粤军无疑是最好的，比其他部队的装备好得多，而且特别敏锐，这是其他部队所望尘莫及的。革命派有了大军在握，在处理张勋提督的问题上将没有什么困难。我毫不怀疑，当张勋提督一旦认为局势危险时，他便将立即退入山东。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最近在固镇发生战斗期间，是否对津浦铁路造成了任何损害，但清军很可能破坏了若干部分的铁路，以尽量阻止革命军北进。

本地的局势在继续改善中。留在南京的那些士兵，现在所受的训练管理要比以前好得多；大约上星期以来，没有记录关于对他们的指控。由于领事团提出抗议的结果，徐绍桢统制已发布告示，禁止士兵除值勤外携带武器，这一命令有效地制止了随意放枪的行动，因为随意放枪使南京城变得象战场一样危险。该告示还警告士兵们不得对外国人有无礼行动，这种行动不仅有害于他们自己的好名誉，而且使革命事业声名扫地。

伟晋颂谨上 1912年1月30日于南京

第127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3月4日收到

阁下：

我在1月27日的信中，曾表示意见说：当时即将满期的停战协定即使不重新展期，清军与民军之间也未必会继续发生冲突。

这个预言在很大的程度上实现了。几天后，报纸上发表了那个很值得注意的奏折，现附上该奏折的副本^①。对这份大约由四十四名将领和指挥官签名的声明，人们最初是有些不相信的，并且公开怀疑它的真实性，直到事情已变得很明显，必须把它当作对铁良和少数几位满族亲王在北京展开的反动活动的一项答复，那些活动一度威胁着要把京城变成满汉之间种族斗争的场所。该声明明白地通知朝廷说：它不能够继续指望在把人民所反对的政体强加于人民时获得军队的支持；它最好是打定主意接受全国的意见，宣布赞成共和。这个声明几乎只有一半是正确的。不能够说全国都想要实行共和或对政府作任何改变，但目前可以发表意见的那部分地区将不再要满族人，共和是唯一可以代替满族继续统治的制度。

军队的背弃产生了所希望的效果。恭亲王^②、载泽公爵及其不妥协的伙伴们感到，他们在北京没有继续活动的余地，现在大都已前往盛京，了解在他们满族的家乡是否有复兴清朝被推翻命运的任何机会。与此同时，袁世凯按照允许满族人光荣引退的条款，为解除他们在全国的统治做好一切准备。这些条款已成为反复讨价还价的主题，它有时候因中国所特有的一些幽默的事情而使人感到并不乏味。民党打算把优待清帝的岁俸由四百万银两减为四百万银元，理由是银元将成为今后唯一的货币。当隆裕太后极力要求皇帝继续统率禁卫军的时候，袁世凯建议说：在皇帝陛下达到成年之前，这个问题不必予以考虑。清帝所保持的尊号引起了没完没了的讨论；关于满清王朝的最后一个法令是否应当称为“辞退”、“引退”或“退位”的问题，在那些敏感的政治家们手中得到了极为认真的考虑，他们多年来在解释外国人的条约权利时

^① 中文原件见《辛亥革命》（八），第173—175页。

^② 奕訢死后，他的孙子溥伟袭恭亲王。

曾经运用类似的机智。

袁世凯在同那个三年前把他逐出社会生活并迫使他溜之大吉的朝廷进行微妙谈判的同时，还从事下一项更加困难的任务，即努力诱劝南方的首领们同他携手合作，成立一个统一的政府，以接收满族人的遗产。他与孙逸仙博士之间来往的那些电报，大部分已为人们所共知，所以除了指出他们观点中的显著分歧之外，没有必要再说更多的话。

袁世凯所关心的主要事情，是要尽量缩短清帝退位与建立南北联合政府之间的间隔时间。为了这个目的，他打算把许多引人注目的事情挤在一天之内进行。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以前从来没有任何一天发生过这么多的事情。颁布清帝退位的谕旨，孙逸仙辞去临时总统的职务，南京的民国参议院选举他本人为总统，以及南北混合内阁就职等事，都将在一天的时间内进行；新政府将从这位多才多艺的政治家的头脑中立即产生，他为了完成乱中求治的伟大任务作了充分准备。

孙逸仙的政治见解似乎含有对袁世凯的某种猜忌，他对这项全面的建议不是很欢迎的。他建议，作为一项更可取的办法，袁世凯本人应前来南京，并在该处被选为民国总统，这是公众舆论已经热烈赞成的。袁世凯自然感到不愿意离开他的部队，并且把他自己当作一个平民任凭新的民国加以摆布。经过冗长的讨论而一无所获之后，他不得不采取唯一可行的办法。

人们知道：清帝退位的谕旨将于最近几天内颁布；袁世凯将被授权组成一个全中国的临时共和政府，希望他能够更好地同南方商谈联合事宜。他本人似乎有把握，在使他自己摆脱满族人的累赘之后，他将很快同他在南方的同胞达成协议。

朱尔典谨上 1912年2月10日于北京

第 128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3月4日收到

阁下：

关于我上月 15 日报告外交团采取行动将盐税收入置于清朝海关控制之下以偿还赔款的信，我荣幸地随信附上最近与外务部关于这个问题的来往信件。

您将看到，这个问题仍由度支部考虑中；在目前的情况下，我怀疑是否可以采取任何有效措施，以促使早日作出决定。

朱尔典谨上 1912年2月13日于北京

第 128 件附件 1 外交团首席公使致外务部的照会

外交团首席公使曾同外务部商谈关于清政府是否准备将盐税置于海关控制下以用来偿还赔款的问题，署理外务大臣已向朱尔典爵士上声称：接受这项要求将有实际困难。首席公使已将此项通知的大意报告他的同事们，现被授权以外交团的名义询问，清政府关于利用盐税收入履行它根据辛丑条约第六款所承担的义务方面，准备提出什么建议。

1912年2月3日

第 129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3月4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随信奉上外务大臣的一份照会的副本，该照会附有隆裕太后代表幼年皇帝于昨天发布的一道谕旨的副件。那道谕旨正式向全国宣布朝廷退位以及为建立共和政体所作的安排。

作为统治中国二百六十七年，而且它早期的皇帝们曾使中国达到空前兴旺发达状态的一个王朝的最后法令，这道告别谕旨是具有某些历史兴味的。不过，虽然为准备这个谕旨尽了很大的努力，但很显然，该谕旨的起草人在宣布把古老的帝国变为新生的共和国时，感到了某些困难。

该谕旨列举了由于人民起义而使混乱遍及全国的那些事件，并且说明他们曾经企图把政体交付国民会议决定，从而使问题获得解决。最初由南方各省发出的实行共和的呼吁，在北方各将领的奏折中得到了反响，直到最后它终于成为全国的普遍要求。朝廷不想从自私自利的动机出发，阻挠国民的意愿；隆裕太后遵循古圣先贤关于天下为公的遗训，将统治权交还国家，并且正式宣布赞成共和。在新旧交替的时期，重要的是应当寻求恢复南北统一的办法；袁世凯由于被资政院选为总理大臣而受到群众的委托，现被授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代表协商实现统一的良策，把满、汉、蒙、回、藏五族合为一个同类民族的国家。

北京对待谕旨的态度显然是冷淡的；人民没有受到政治变化的影响，继续进行他们的日常工作。一位满族人到处询问：在新的制度下，他的津贴是否仍可领到。世界上这个最新的和最大的共和国的公民们迄今还不能够理解这件事：统治是可以没有皇帝的。今后将会表明，那个想法是否会消失或不久将重新表现出来。

朱尔典谨上 1912年2月13日于北京

第130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3月4日收到

阁下：

关于我上月27日的信，我荣幸地附上英王陛下公使馆三等秘

书黑德爵士的一份备忘录，它记述了这段期间各口岸所发生的一些较有趣的事件。

朱尔典谨上 1912年2月14日于北京

第130件的附件 黑德爵士的备忘录

自从朱尔典爵士1月27日写信那一天以来，所收到的报告似乎表明，各省开始对他们那种没有约束的混乱制度感到厌倦，并且对于接受使他们能够安然重操旧业的任何政体将不会感到惋惜。英国驻芜湖代领事在1月6日的信中报告说：清朝和民国的地方当局都表现出急于获得所有外国人的友谊，无论这些外国人是官员、商人或传教士。

革命派首领们进行军事的和政治的斗争的主要困难是款项问题。他们在一些条约口岸又企图接管常关以及邮政局的行政管理；英王陛下驻南京、福州和芜湖的领事必须和他们的同事们一起，向临时当局提出非正式的抗议，以防止对这些重要机构的现状有任何损害。

革命派在这方面遭到失败后，加倍努力从一切可能的方面获得借款及强制性的捐款。除了其他人的财产之外，前清朝驻伦敦公使李经方侯爵的财产被芜湖临时当局所占有，他们正在征收租金及占用那些祖传的财产，直到原物主被说服向革命派支付大量捐款为止。

关于军事当局的活动，皮尔逊先生报告如下：

“12月23日，我接到怡和洋行和太古洋行经理的控告说：革命军多次登上他们的轮船，逮捕那些被怀疑为清方代理人的旅客，或以违禁品为借口拿走他们的私人财物。有一起关于拿走私人财物的案件是罪恶昭彰的。“南京”号轮船船长申诉说：他的一名中国旅客被人强行拿走了四百五十银两，该旅客本人由于轮船的官

员出面干预才幸免被捕。我得到这个申诉后，立即会见李葆林^①，结果他向我告辞，直接前往司令部，两小时内便把那笔钱退还了该旅客。随后在同吴某^②会晤时，我与他商定：遇有怀疑为战时违禁品的情况，应邀请我上船，如果该船系英国船的话；在未经我同意时，不得没收任何物品。后来，他们还就怡和洋行在岸上租用的行栈进行了两次突然搜查，第一次搜查的借口是买办偷运武器。此人似乎享有一个不值得羡慕的名声。我得到吴指挥官对搜查一事的道歉，他说不知道那幢房屋系外国人的财产。我指示怡和洋行经理在他们的房屋上面悬挂英国国旗。他这样做了，但12月31日开始流行剪辫的风气时，尽管行栈的房屋上挂着两面外国旗帜，它还是被强行闯入，怡和洋行的一大批雇员的辫子被刘星五^③的士兵粗暴地剪掉了。我专门对他的行动以及笼统地对全部措施提出了抗议，因为那是违反公共和平和秩序的，于是他们迅速发布告示，禁止实行强制性的剪辫；同时，在我写这份备忘录的时候，他们不允许蓄辫的中国人进入军事机关。

关于外国炮舰给予芜湖的保护，是没有理由提出抱怨的。总有一艘某种类型的英国炮舰经常泊驻此地。在我的建议下，总司令官显然已与美国舰队司令商量，在完全恢复平静以前，本口岸必须泊有两国的军舰。至于军舰的实际大小，同必须经常驻泊两国舰只能够至少派遣四、五十人登岸一事比较起来，那是次要的。遇有地方骚乱时，需要从两艘军舰上各派一支约二十人的登陆部队。其中一支保护集中在本领事馆的外国人，主要是英国人；另一支保护集中在弋矶山的传教士，主要是美国人。芜湖似乎将不大可能需要任何部队登陆，至少目前是如此。”

① 芜湖驻军司令。

② 疑为芜湖军政分府负责人吴振黄。

③ 译音。

然而，皮尔逊先生又说：“芜湖人正变得难以控制；如果象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将旧式军队调往前线，而只留下‘敢死队’，那么，骚乱即将来临。旧式军队至少是服从他们的旧统领李葆林的纪律的。刘星五主管新招募新的士兵；他的人品及其部队的性质，对和平显然是一种威胁，而不是一个保障，并且成为芜湖普遍存在的主要不安情绪的根源。”在安徽的偏远地区，可以说几乎没有一个地方处于正常的和平状态；成群结队的新兵和歹徒到处抢劫。有许多关于这种流窜的冒险活动的报道，使人回想起柯波尼克地方著名鞋匠的事迹^①。在泾县，有一名无能的青年人穿着军官制服，带着一支由六名苦力组成的卫队，出现在衙门前面，索取关防和银钱，人们未经进一步询问便把这些东西给他了。

江苏普遍存在的饥饉状态，使得许多被召至镇江的传教士急于返回他们原来的地区，以帮助进行救济工作。美国工程师詹姆森先生在组织救荒方面表现得颇为活跃，为募款发出公开的呼吁。英王陛下驻镇江领事认为，如果英国传教士象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前往清江浦，那将是不安全的，若越过清江浦便肯定有危险了；因为那个地方目前虽然平静无事，但运送大批稻米前往该处的任何企图，对上匪们来说，将证明是一个不可抵抗的引诱。因此，德为门先生拒绝批准英国传教士返回他们原来的地区继续从事长期性的工作，但在朱尔典爵士的赞同下，同意他们为救荒的目的前往清江浦，作为一项临时的和紧急的工作，同时警告他们说：他们这样做应自担风险。

从所收到的英王陛下驻梧州代领事的一份报告看来，西江似乎仍继续受到所谓海盗的侵扰，这些海盗只不过是把活动范围扩大到航行于西江的那些船只的土匪而已。英王陛下驻广州总领事

① 柯波尼克是柏林东南的一座小城，该地著名鞋匠沃特是一名越狱犯，1906年他在一些人的协助下，冒称近卫军上尉，占领了柯波尼克市长办公室，逮捕市长，抢走市府库存金钱。

也报告说：12月23日，英国汽艇“四雅”号在江门附近遭到抢劫；2月9日，当英王陛下军舰“矾鹞”号准备保护西江上的一艘美国船只时，遭到了来自帆船和岸上两方面的射击。“矾鹞”号军舰进行了还击，驱散了那些海盗。

除了为此项目的而派遣的英王陛下军舰之外，还有一些中国炮艇在西江进行巡逻，但不幸的是，它们只证明完全没有能力完成该项任务。

在山东，混乱情况继续普遍存在。英国驻济南代领事于1月18日来信报告说：统治权的松弛，使桀骜不驯之徒能够掠夺他们的较安份守己的同胞，并对人们仍可以调来镇压他们的那些战斗力很弱的部队公然进行反抗。夏季的特大洪水造成了广泛的饥荒，山东南部 and 西南部都属于受灾最重的地区。饥饿的痛苦驱使那些悲惨的居民沦为盗匪，从而扩大了强盗的人数，他们结成自五十人至一千人不等的流动队伍，袭击各小城镇和村庄，征收他们所选择的捐税，而不受惩罚。这些袭击时常伴随着最野蛮的残暴行动。

烟台南面的莱阳和海阳两县，总是象往常一样，土匪横行，而沿海地区则受到海盗的骚扰。因为几乎所有的渔民实质上都是海盗，所以季节不佳时便促使许多渔民扔掉他们的伪装，从那些与世隔绝的荒凉岛屿对沿海村庄进行袭击。烟台的前景一度令人感到非常惊慌，所以外国人通过各该国领事致电询问：如果清军与民军之间在紧邻烟台的地区发生冲突，是否可以采取措施保障烟台的中立，但我们认为，接受此项要求是不切合实际的。然而，当骚乱的影响扩大到威海卫附近的时候，在专员骆任廷爵士的要求下，决定自天津派遣一百名英军去协助维持该地秩序的工作。海军中将温思乐爵士已安排英王陛下军舰“肯特”号泊驻北部水域，直到局势较平静的时候为止。目前，该舰停泊在烟

台。

驻天津代总领事报告说：在法国租界内，捕获了一群制造炸弹的人。这些人已被送往上海，以便在会审公廨内审讯。人们希望，一度好象很受双方极端分子所喜好的扔炸弹的行动，现在将被抛弃，以利于采取较和平的说服方法。

1912年2月14日

第131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3月4日收到

阁下：

继续谈我1月16日信中所说的事情，我荣幸地附上关于保护京榆铁路的详细安排的副本，库柏将军颁发给派往执行该项任务的各国分遣部队指挥官的那些命令也一并附上。

那些安排不需要做什么说明。由于考虑到我们不是占领而只是保护该铁路，所以为了防止任何误解起见，必须宣布：双方都可以随意使用铁路和电报线，但长期损坏该路重要组成部分的任何企图，将受到六国联合部队的抵抗。

关于第三款和第五款中所提到的在天津和山海关保持维修列车以及足以迅速运送部队的车辆问题，库柏将军正与铁路当局磋商。

美国援军已经从菲律宾到达，并已接管他们的那段铁路，该段曾由英军暂时予以保护。

我已发电报向您报告：山海关以东十英里处铁路上的的一座桥梁于2月3日被破坏。就我所知，从来没有泄露这个破坏行动是谁干的。

朱尔典谨上 1912年2月15日

第 131 件附件 1 关于保护京榆铁路的安排

一、铁路沿线的重要车站、桥梁等地方应派驻军队。

二、清军和革命军为了运输、上下旅客或装载货物的目的，都可以随意使用该铁路线及附近的码头和运输设备，不应受到干涉。

三、应通知双方避免对铁路进行任何干预，并不得以任何方式损坏铁路。应要求华北铁路总局在山海关和天津停放一列维修火车，装载适于修复损坏的材料。

四、对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车站、仓库、机器、桥梁等加以长期损坏的任何企图，将受到共同保护该铁路的六国联合部队的抵抗。

五、应要求华北铁路总局在山海关和天津始终准备好足以运送二百五十名步兵的车辆，以便可以迅速派遣援军。

六、应保护各电报局及维持电报联系。中国任何一方的部队都可以使用该电报线。

七、应将第二、三、四、六等节所规定的条件通知各哨所及各巡逻队的指挥官，并告诉他们用所指挥的部队尽力予以实现。

第 131 件附件 2 关于保护京榆铁路给各国分遣部队指挥官的命令

一、该铁路应予以保护，不允许有任何损坏。

二、清军和革命军为了运输、上下旅客或装载货物的目的，都可以随意使用该铁路线及附近的码头和运输设备，不应受到干涉。

三、交战的任何一方将不得占领各电报局，但可以允许双方发送电报。

四、如果开始损坏铁路的那些军队的人数很多，致使我们的

分遣队不可能阻止他们实现其意图时，指挥我们分遣队的军官应提出抗议，并通知他们的指挥官说：这种损坏铁路的行为将使保卫该铁路的六个国家采取军事行动。无论如何，应当告诉他：不得拆毁任何特定地方的铁轨，也不得损坏任何桥梁。还应当立即向总部提出报告。

第 132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3月4日收到

阁下：

您将记得，袁世凯与伍廷芳之间商定的关于优待皇室条款附有一项条件，即双方应把该协议的副本送交各国驻北京使节。袁世凯于本月12日以他的组织中国临时共和政府全权代表的新资格写的一份照会（我荣幸地附上它的译文副本）中，把该协议的条款送给了我，并要求将这些条款通知英王陛下政府。

朱尔典谨上 1912年2月15日于北京

第 133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3月12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随信奉上新政权中外务部首领的一份照会的副本。他在该照会中通知我说：根据他所收到的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全权代表袁世凯的指示，北京各部大臣暂时均将继续留任，但他们的称号都改为“首领”，外交事务将象以往一样，由外务部首领严格按照条约进行。

他已答应，当临时政府一旦组成后，立即另行通知。

本月13日在本使馆举行的外交团会议上，考虑了这份照会，并决定：鉴于目前普遍存在的不正常状况，我们最好的办法是通

过私人会晤或通过以第三者名义写的非正式函件，同外务部进行一切必要的联系。这将避免关于承认该部大臣名称变化的问题，并且表明，象我在1月13日信中所报告的那样，自从皇室王公不再担任该部大臣职务以来，我们已经采取的同外务部进行联系的步骤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朱尔典谨上 1912年2月15日于北京

第134件 窦纳乐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2年3月5日发自东京，同日收到

一千二百名日本军队自旅顺口开往天津。这将使日本驻华北的部队增至二千四百人。义和团事件后所商定的人数为二千六百人。

第135件 布坎南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2年3月5日发自彼得堡，同日收到

俄国政府正在从哈尔滨派兵前往天津或北京，因为据俄国代办看来，这也许是最合乎需要的。他们已派遣六百人，但如有必要，人数可另增加四百人。俄国外交大臣已把此项消息告诉我。

第136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2年3月6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我很遗憾地通知您：传播福音会的教士戴氏于星期一夜间在保定府以南的祁州被杀。

第137件 高慎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3月7日收到

阁下：

昨天由柏林发给《科隆^①报》的一份电报宣称：为了保护在华的德国人，青岛的德国驻军中已有一百人奉命前往北京；据德国公使看来，目前这个数目的部队是够用的。

高 慎 谨 上 1912年3月5日于柏林

第 138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2年3月7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驻华北总指挥官曾向我建议说：他所指挥的部队应得到香港的一个营以及一个印度过山炮连的增援。我仔细考虑了这个问题，并得出结论：英国现驻华北的分遣部队足以应付目前可能发生的任何事变。它仍比任何其他国家分遣部队更强大一些；我倾向于认为，最好是使香港部队尽量保持机动性，因此在必要时可以立即派它前往华中地区或天津。

第 139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2年3月8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因为驻华北总指挥官提出了我昨天的电报中所报告的那项建议，其他国家已答应另派五营部队。在这些增派的部队中，有些已经到达。

我报告此事，系为了说明形势。

第 140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2年3月8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他们已经商定：袁世凯将于下星期日在此地宣誓就任临时总统；然后他将任命他的内阁，他们将在南京集合并接管该地的临

^① 莱茵河沿岸的一座德国城市。

时政府；那时，孙逸仙将辞职；内阁将前来北京，建立民国临时政府。预料此项准备工作将在两周内完成。

关于星期日的就职典礼，将通知各国使节，但不正式邀请他们出席。

第141件 代领事史密斯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3月9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随信附上我写给英王陛下驻北京公使关于腾越局势问题的一封信的副本。

史密斯谨上 1912年2月10日于腾越

第141件的附件 代领事史密斯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继续谈我1月30日信中所说的事情，我荣幸地报告：本地区的形势现在已有显著的改善，确实可以说它已接近正常状态。

赵藩道台和李根源于2月1日抵达此地。第二天，赵藩道台给我一件公函，宣布他已接任，并且用异乎寻常的友好词句写给我一封信，建议于2月4日前来看望我。因此，在那一天我同他会晤时，他用最热情的态度表达他自己的意见，并声称他打算立即将腾越的事务置于正常的基础之上。他特别是想要马上请海关税务司恢复对海关的管理。次日，我接待了李根源的来访，他也是同样友好的。

赵藩道台大约有六十岁，本省大理府以北的丽江府剑川州人。他曾任四川两个道的道台，并一度担任该省按察使。他在重庆任道台时，具有某些外交经验；如果他对公务的处理证明在适当的程度上符合他那些很友好的声明，那么，他将是一位令人最满意

的道台。

李根源系南甸人，他的父亲仍然住在该地。他曾经在日本留学七年，无疑地在那里产生了革命的倾向。他在云南府担任讲武堂监督，直到革命爆发的时候为止。他的年龄在四十岁左右。

随同这两人前来腾越的部队约两三千人。不过，李根源通知我，他在腾越大约仅停留两个星期，然后将把大部分部队带回大理府。此时，张文光指挥下的部队已被解散；张文光本人虽然仍继续住在总兵衙门，但已完全没有权力。

赵藩道台的第一项正式行动是宣布将腾越厅改为府，称腾冲府，有人告诉我这个名称是明朝统治下的名称。边务委员赵开勋^①被任命担任知府，以腾越厅为正式驻地。这项任命在各方面都是令人感到最满意的。在过去三个月中，他在此地的处境非常困难，而且甚至是危险的。他被迫为革命派效劳，但从来没有完全受到信任；他勇于提出不受欢迎的建议和批评，有好几次使他受到张文光的嫌弃。如果不是他的能力以及绅民对他的信赖使他成为不可缺少的人物，他从张文光的统治下幸存下来将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的确，他的朋友们时常劝告他不要那么坦率，而应更谨慎些。他目前的任命是新的当局承认他的能力的一个可喜的迹象，同时将使他能够对边界事务发挥作用，他作为边务委员的活动以及在缅甸边务官员中赢得的尊敬足以证明他的作用是很有价值的。

新政权打算进行的另一项变动，是把土司的行政职务移交给汉族官员。对这个计划迄今还没有作出决定；在执行以前将把它提交该省高级当局。我现在尚未得到该拟议中的计划的细节，但我了解到，他们打算把南甸、干崖、盏达、陇川等地改为县，大

①. 译音。

概将户撒和腊撒两地置入陇川或干崖之内，因为那两个地方太小，不便各自设县。在实行这项变动的时候，他们不打算以任何方式干涉土司的财产。

赵藩道台到达后，我已经电邀海关税务司前来腾越，他预料到我所期待的政策方面的变化，于2月1日离开八莫，昨天下午抵达此地。由张文光安排主管海关的代替人，已接到赵藩道台的指示，作好移交的一切准备。然而，由于当时对新的当局所采取的态度仍然存在着疑虑，税务司手下的职员都留在缅甸，所以他不可能立即接管。在重新主持海关之前，他还很想安排一些事情，使总办事处和各个分办事处能够同时接管，以查明中国人管理海关三个月以来所造成的情况，并对将来的工作同道台达成一项全面的协议。今天，他已电告他的那些职员接踵前来：预料两个星期内将恢复外国人对海关的控制。

由于腾越政府已经恢复，我提出的就边界问题同土司直接交涉的建议已无此必要，而且也确实是不切合实际的。那项建议的根据是由于不可能同张文光这样的人打交道，他不仅无能、无知、摇摆不定和完全没有文化，而且同本省其余地方的那一派人发生冲突，他声称已在此地完成了他们那一派人的事业。现在还不能肯定，在雨季前，是否有可能安排一次已延误了的边界会议。在今后若干时间内，整顿工作必然使中国官员们十分忙碌，他们也许不可能很快离开腾越。我正在询问缅甸政府关于它对此事的愿望，当然将尽最大努力作出相应的安排。

史密斯谨上 1912年2月9日于腾越

第142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3月12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随信送上我收到外务部的一份照会的译文，该照会通知我：今后中国将采用各国通用的历法，即阳历。

朱尔典谨上 1912年2月20日于北京

第143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3月12日收到

阁下：

我在2月15日的信中，曾荣幸地奉上六国联合部队为保护京榆铁路所作安排的详细情况，并且补充说：库柏将军正与铁路当局商谈关于在天津和山海关停放维修列车及足够的车辆，以供我上述信件附件一中第三款和第五款所说的需要。

现在，我荣幸地送上库柏将军所收到的华北铁路总办复信的副本，该信说明他能够满足这些需要的程度，而不干扰该路的经营。各国指挥官一致认为，这些建议将满足此事的需要。

朱尔典谨上 1912年2月22日于北京

第143件附件1 里基茨先生致库柏准将函

先生：

我荣幸地收到您本月2日的信。

我已把该问题提交我们的各董事。关于第三款和第五款，请允许我向您提出下列建议，我希望这些建议将满足您的需要，同时不过分干扰这条铁路的经营。

第三款：我们已经在丰台、天津、塘沽、唐山、山海关等地停放有篷顶的而且上了锁的救护车，装载着必要的器械。这些车辆在接到通知后，可以立即开往任何出事地点。我们在这些车站的车场上，还存放着可供重大维修工程之用的笨重材料，并且可以按照任何特殊事件的需要迅速装车，但把铁轨、枕木、长木料

等物资装车存放，那是不方便的。我们所有的每节车厢都急需用来完成运输任务以及赢得铁路收入；此外，把那些材料长期装车存放，对车厢来说也是有害的。

第五款：这个问题已提交北京总局，但在他们答复之前，请允许我指出：我们是非常缺乏车厢的，因为我们刚刚被迫向京汉铁路提供了二百五十节车厢，用于军事上的目的；我们有大批车厢在军事行动期间遭到了损坏，正在唐山工厂进行修理。这样，如果没有别的选择办法，我们反对按照您的建议将任何车辆停驶待用。

因此，我提出如下的建议，即：我们保证依照第五款所说，当各国部队提出要求的时候，给予他们优先运输权，而且届时将在他们提出要求的那段铁路上，将所有客车、货车或车辆交给他们立即使用，以供迅速运送援军。

应特别提到的是：尽快修复铁路所受的损坏，对我们的利益以及护路部队的利益来说，是同样重要的。

总工程师兼总办 里基茨谨上 1912年2月5日于唐山

第144件 布坎南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3月12日收到

阁下：

关于我1月17日的信，我荣幸地报告：3月8日的《新时代》报发表了另一篇文章，极力劝告俄国在蒙古和中国新疆立即采取行动。

那篇文章说：中国本部的混乱虽然没有直接影响俄国的利益，但蒙古和新疆的骚动威胁到整个边界。过去，中国在这些地区至少维持某种秩序，但现在，它的事情太多，不能把注意力集中于它自己的边境地区。

那篇文章的结尾如下：

“蒙古和新疆需要政治顾问，我们必须派去。他们需要军事教官，我们必须提供。他们如果没有金钱，就不能够组织一个行政管理机构或建立一支军队，我们必须贷款。这两个地区都很富庶，足以对所借款项提供充分的担保。时间很紧迫。俄国外交在创造有利于它自己的条件方面缺乏技巧。既然如此，那些条件已经自己出现，我们还需要做的一切事情就是利用这些条件。”

布坎南谨上 1912年3月9日于彼得堡

第145件 总领事务谨顺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3月15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随信送上我写给英王陛下驻北京公使的一封信的副本，该信报告成都军政府正式发表它已收到关于宣布成立以孙中山为大总统的中华民国的消息。

务谨顺谨上 1912年1月20日于成都

第145件附件1 总领事务谨顺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今晨九时，人们在成都各街道上游行，敲着锣鼓，并散发传单。我荣幸地附上该传单的译文。根据成都军政府的命令，要求各户主在今后三天内悬挂国旗，庆祝中华民国的成立。

四川省邮政司里奇先生（他于本月17日和他的助手乔登先生一起自重庆回来）告诉我：他已经收到成都军政府关于上述意思的通知。但是，直到目前为止，没有通知给领事团。

务谨顺谨上 1912年1月20日于成都

第146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3月15日收到

阁下：

本信所附英王陛下驻上海总领事来信的副本是很有趣味的，因为它提供了清朝权力结束与民国统治建立之间的这段期间，在公共租界日常事务方面所造成的某些混乱迹象。法磊斯先生的来信，是在朝廷退位与袁世凯当选为民国临时总统的前夕写的。我希望，在新政府主持下南北的逐渐统一，将有助于使事情正常化，并消除法磊斯先生所抱怨的那些不正常状态。

另一方面，从伍廷芳博士给各省都督的通知看来是十分清楚的：在新政权的计划中，正如旧政权的计划一样，收复主权将是一个显著的特点，然而，不同的是，新人物对进行此项活动所带来的关于西方国家处理事务方法的知识 and 经验要多得多。

朱尔典谨上 1912年2月23日于北京

第146件附件1 总领事法磊斯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我荣幸地报告，由于民国临时政府在本地区未能建立一个正常的行政管理制度，从而产生了一些困难。

革命开始后不久，伍廷芳便把新行政当局的官员们通知我们，其中包括一名沪军都督在内，但没有代替道台的官员。11月19日，该都督致函首席领事说：他已经任命前意大利律师穆索的译员徐先生以及一位蔡先生为国际交涉委员。这两个人试图干预会审公廨的事务。1月16日，温宗尧先生通知我们，他已被孙总统任命为通商和外交委员；在谈话中，他向我保证说：他是唯一经过这样正式任命的地方官员，已预先通知徐某离职。然而，徐某仍住

在城内那个自封为都督的衙署内，最近派遣一艘汽艇扣押了一艘英国货船，该货船系为俄国驻汉口的炮舰“兰焦尔”号装载军火运给一艘日本的内河轮船。只过了一个星期，温宗尧先生为归还该被扣船只所作的努力获得成功。甚至在此事获得成功之前，我便曾私下请求伟晋颂先生促使总统将此地民国官员的职权置于适当的基础之上。

不过，各个当局都没有部属，而且也没有人们可以向他提出有效的上诉以纠正违法行为的首领，例如在租界内劫持有声望的华人勒索赎金之事。都督是完全多余的，因为部队由他们自己的统领指挥，卫队由一名前罪犯指挥，而吴淞炮台则是一个独立的指挥系统。

银钱是通过强迫认捐的办法募集的，并从国外的捐献中得到补充，因为南京参议院迄今没有时间规定税收。因此，贸易很稀少，商人阶级中对共和的热情正在消逝。

孙总统的私人秘书马素先生于本月3日前来看望我，向我保证说：我请英王陛下驻南京领事通知总统的许多申诉，已经引起注意。

由于没有任何正式获得承认的中国当局使我们能够同它保持正式关系，自然引起了很大的不便，特别是关于会审公廨以及租界内外土地转让的问题。

11月底，都督的外交委员提议建立关于引渡罪犯以及提供会审公廨和租界外革命法庭所需证人的制度，但由于领事团某些成员的犹豫不决，从而阻碍了达成任何协议。

由此产生的尴尬局面给首席法官邝某提供了一个借口，为他自己及其两名助手向新统治者申请并接受任命和关防；但是，在领事团的建议下，他取消了这个步骤。

最近，会审公廨受理民事案件中的上诉问题已经发生。意大

利代总领事认为，根据该国条约所包含的与我国天津条约第十七款完全相同的一项条款，只能上诉到他本人那里，由中国当局予以协助。其他领事建议成立领事法庭，或由有关国家总领事及其他两个国家领事担任陪审员，或由中国商会主席代替道台。但是，所有这些建议都不能克服明显的困难：在享有治外法权的地方，除了诉讼一方的本国官员之外，任何人都不能对该方执行判决：民党人士不大可能让案件越过他们的外交委员，以博得一个充其量不过是半官方机构首脑的好感。会审公廨中的诉讼当事人不一定放弃上诉的权利，接受它的几名法官代替上诉进行复审。结果即使不是不公正的，也必定是迟缓的，直到温宗尧先生被承认取代道台的地位时为止。

关于土地问题，民党人士不反对领事团在租界内所作的安排，但在租界范围之外，他们要求地契应由他们的委员盖章，该委员还将决定“升科”以及超过地契范围的土地税的缴纳。

我认为，任何直接有关的人都不会反对民党的建议，如果他们深信，即使目前事实上存在的行政当局被推翻，人们不能怀疑他们根据关防取得的所有权的合法性。

如果我们让新政府任命会审公廨的法官，唯一的而且是一项重大的反对理由将会产生，因为将使得那些中国居民由此而容易遭到强制性的向民党捐助款项。不过，我认为，至少在延缓对目前有关会审公廨的临时安排进行任何干涉方面（各阶层的中国人对它已改进的工作是满意的），或在防止已被解雇的那些巡捕的重新出现方面（他们以前是而且将会是对中国居民施加不正当压力的工具），现在不会有任何困难。

然而，伍廷芳发给各都督的通知表明，新统治者也许不会满足我们的特权地位。现附上该通知的摘要。

法磊斯谨上 1912年2月10日于上海

第 147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 3月 15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附上英王陛下驻南京领事的一封来信的副本，该信报告那里已收到关于宣布朝廷退位和任命袁世凯组织共和政府的谕旨。

伟晋颂先生来信中所包含的许多消息，已经由本使馆向您报告，但民国外交总长关于可能把首都迁至南京的看法也许是很有趣味的。

我完全不同意那个似乎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意见，即如果清军在攻克汉阳后乘胜前进，而不缔订停战协定，那么，革命可能已被镇压下去。大批省份已经独立，因此，据我看来，认为运动在那时尚处于初起阶段的说法是不确切的。我认为，无可怀疑的是，如果不商定停战条款，充其量将继续进行一场长期的和流血的战争。

以蔡元培和唐绍仪为首的南方代表团预定于明天到达此地。

朱尔典谨上 1912年2月21日于北京

第 147 件的附件 伟晋颂领事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此地的政府于本月 12 日傍晚得到关于北京已发布退位谕旨的消息。该日下午，内阁和参议院曾举行联席会议，会上作出决定，向袁世凯发出最后通牒说：除非在三天内宣布皇帝退位，所有的谈判均将停止。这份最后通牒发出后半小时内，便收到了袁世凯宣告发布谕旨的电报，所以这两份电报必定是互相错过了。第二天早晨，我因邮政局的困难问题见到了总统，当时他把这项

消息告诉我，并且说：虽然他现在尚未收到谕旨的原文，但从电告的谕旨摘要看来，它显然是令人满意的。关于临时首都的地址是可能引起某些麻烦的唯一问题，因为他的政府当然希望南京成为政府所在地，而袁世凯则希望政府设在北京。由于谕旨的全文于那天晚上到达，我于第二天拜会了外交总长王宠惠先生，询问他的政府的意见是否仍象起初那样乐观。王宠惠先生向我保证说：他们对谕旨感到很满意，而且对袁世凯继谕旨之后发来的私人电报特别感到如此。他们在细读谕旨时不得不指出的唯一缺点，是袁世凯被任命为共和政府的首脑。共和政府的首脑只能由人民选举；满清皇帝命令袁世凯担任这项职务，是与人民自己选举首脑的权利相抵触的。因此，他们曾致电袁世凯，建议说：作为一个纯粹的手续问题，当参议院一旦选举他为民国总统，他便应立即辞去他的职务。由于袁世凯似乎误解了这份电报，所以我应当说明，该电发出后才收到他致此地政府的私人电报，否则我确信他们绝不会进行挑剔。

然后，我询问王宠惠先生，关于临时首都问题是否可以达成任何协议，因为各国公使对这个问题深为关切。邀请各国公使同他们的全体办事人员一起南迁，搬到那个可能只住几个月的地方，看来似乎是要要求过高了，因为参议院是否最后选定南京作为首都，这是绝无把握的事情。此外，还有一个反对理由，即这座城市中没有可供各国使馆用的住房。王宠惠先生回答说：他的政府完全承认这个困难，但是，除了其他的原因之外，据他们看来，目前不应把首都迁出南京，这对该国的和平是极为重要的。我当然了解，对他们来说，即使在现在，要把他们那一派中的极端分子特别是军队置于控制之下，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这个关键时刻，把权力中心移至北方，将导致在所有南方各省爆发新的混乱，而且很可能发生新的叛乱。另一方面，袁世凯可以前来南京，

对北方的和平并无实际危险；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很盼望袁世凯在此地接任总统职务，而不迫使他们前往北京。他可以把北京政府交给他愿意指定的任何人手中。为了应付外交团起见，将必须作出某种特殊安排，使各国公使能够继续留住北京，直到最后决定新首都的所在地为止。例如，外交总长可以在北京办公。很难说究竟是南京还是武昌将终于被选择作为首都，但如果南京继续作为临时首都，它比武昌大概将获得被优先选择的机会。接着，王宠惠先生继续说：总统和内阁已把他们的辞职书交到参议院手中，参议院将考虑那些谕旨，并决定所要采取的下一个步骤。

我认为，王宠惠先生提出关于目前把首都自南京迁往北方可能在南方各省引起严重动乱的论点，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马良先生虽然本人赞成把北京作为临时首都，但也有这个意见，而且他绝不是具有悲观性格的人。舍弃北京而把南京作为首都是否将对北方产生同样的恶果，这大概是此地的政府不能够判断的一个问题，但我认为，他们十分真诚地相信，它引起动乱的危险比把政府迁离此地要小得多。

本月13日晚上，唐绍仪先生和伍廷芳先生前来南京，出席内阁的特别会议，会上决定立即派遣以唐绍仪先生为首的代表团前往北京，与袁世凯进行商谈，努力说服他前来南京接任总统职务。代表团中除了其他官员外，包括此地的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在内。

那天下午，参议院也开会考虑总统和内阁的辞职以及任命一位新总统的问题，会议一直进行到昨天晚上，那时宣布孙文博士及其内阁的辞职已被接受，但要求他们继续留任，直到袁世凯能够接任他的职务时为止，袁世凯已经被一致任命接替孙文博士担任总统。参议院还决定赞成以南京作为临时首都，虽然这项决定只是经过很多讨论而且显然以微弱多数才获得通过的。孙文博士

在提出辞职的咨文中，极力推荐任命袁世凯作为他的继任人，但据说所附条件是袁世凯前来南京接任总统职务。不过，我知道，参议院对袁世凯的任命是没有附加条件的，虽然由于把南京作为临时首都，他们就使得袁世凯必须前来南京就职，如果袁世凯接受此项职务的话。

对南京政府得到清帝退位消息时所表示的真正满意的心情，是无可怀疑的，这是此地当局真诚希望和平的证据，如果需要任何证据的话。当我上次见到外交总长时，他似乎满怀信心，前往北京的那个代表团将能够使袁世凯相信暂时保留南京作为首都是可取的，而且能够说服他亲自前来此地接管政府。在南方，对袁世凯的最终目的和野心仍存在着一定的疑忌。袁世凯给总统的那份亲切电报，对驱散革命派首领们中间的疑忌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充分认识到国家所受袁世凯的恩惠，因为当他有一切机会把革命运动镇压于襁褓之中的时候，他在汉阳停止动手，同时因为后来他在实现满清王朝退位避免进一步流血中施展了巧妙的政策，但是，革命派的一般成员，特别是部队，仍对这位前总理大臣抱着不信任态度。此地的政府认为，只有袁世凯同意前来南京，这种不信任态度才会完全消释。它说明人们为什么担心，如果袁世凯拒绝这样做以及由此可能接踵而来的将民国内阁迁往北方，也许在南方各省造成新的混乱，南方各省将把它视为袁世凯不安于新政体并对新政体怀有恶毒阴谋的证据。

除官方人士外，似乎对谕旨没有任何兴奋情绪，若干时候以来人们便已期待着它的颁布。在南京的绅士和商人们中间，相信袁世凯具有诚意的人始终要比官员们中间多得多，他们无疑地感到，袁世凯将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安排退位问题。昨天中午，通过专门燃放礼炮和举行军事检阅，正式庆祝了清帝退位事件。由于留在南京的几乎所有部队约五千人都是新兵，所以军事检阅给人

们留下了革命军的力量和效率很差的印象。总统骑着一匹中国小马，由一名穿着半西式制服的马夫牵引，参加了游行，有一大批随员陪同，但他似乎不如一队女战士那么引人注目，她们几乎完全吸引了少数旁观者的兴趣。

自从我上次给您写信以来，本地报纸公布了民国临时约法草案的其余部分，但由于某些条款仍由参议院讨论中，我正等待着最后文本，然后把译文送给您。它最重要的条款如下：

中国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及信仰的完全自由。他们的财产及人身不可侵犯。事实上，他们象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公民一样，今后不受任何一种可能出现的政治压迫。作为对这些权利的一种抵偿，教育、兵役和纳税都规定为强制性的。总统的权力几乎与美国总统完全相同，而参议院则兼有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职责。不过，总统虽然是行政首脑，但对政府的各项行动绝不负责，各部总长对政府的行动承担全部责任。司法当局也进行了改革。我知道，总统不对国家承担责任一事已遭到参议院的指责，参议院还打算按照法国的制度任命一位总理，以削减总统的权力。我还应当说明：约法规定总统代表国家接见各国公使和大使，从而为各国使馆驻在北京和总统驻在南京设置了另一个障碍。

象我于本月13日电告您的那样，此地当局对邮政管理进行干涉一事已成为领事团向外交总长提出口头抗议的主题。外交总长向我们保证说：政府方面无意干涉邮政管理的现状或使用的邮票，虽然它打算发行一套特殊邮票，仅供在中国使用，以纪念民国的建立。他还答应照此意向革命各省发出指示，因为在那些省份邮政当局现正与地方政府发生纠纷。总统也出席了这次会晤。在访问王宠惠先生之前，我们通过此地邮政司，当然充分了解了邮政局的不满；但我们提出申诉所根据的理由是，使中国邮政组织陷

入混乱无章状态正影响到它与各国邮政联盟的关系。

革命军似乎重新沿津浦铁路向北推进。本月14日，他们的前哨已进入距徐州府十英里以内的地方，张勋提督正准备撤出该地。

伟晋颂谨上 1912年2月16日于南京

第148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3月15日收到

阁下：

关于我上月30日的信，我荣幸地报告：我已经收到上海寄来的银行家委员会头两次会议记录的副本，所指派的该银行家委员会是监督那些保证用来偿付外债和赔款的海关岁入的保管和分配的。这两次会议分别于本月八日和十日举行；有九个外汇银行的代表出席了第一次会议。

该委员会起草了一份报告书，说明按照签订的先后顺序尚未还清的七笔借款，而且还草拟了一份自1911年11月20日第一次欠付之日起，至1912年底为止，对这些借款分期摊还的本金和利息应付日期表。在第一次会议上决定：虽然按照借款合同签字的先后顺序，这些借款排列在前，但应根据分期摊还的本金和利息的应付日期，从手中现有的和今后收到的海关入款中偿付。如果拖欠偿付到期的一笔款项，那么，下笔入款将用来清偿这笔分期摊还的本金以及(或)利息，此后再按照上述报表进行偿还。

举行第二次会议是为了讨论对过期未付的那些本金和利息应索取多少利率的问题；会议商定：对于因借款而过期未付的各部分款项，应按照各笔借款的利率索取利息，但须得到发行债券的那些银行的同意。关于因1895年六厘息金借款而于1911年12月31日应在上海偿付的款项，以及因1896年五厘息金借款而于12月20日到期的款项，二者之间的先后顺序问题，会议作出了有利

于前者的决议。

上述各表同该委员会作出的各项决议一起，由委员会秘书于本月12日及时地通知了上海海关税务司，供他遵照执行；还要求上海海关税务司把目前应付给各银行的那些款项的支票尽快送给它们。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对本金的偿还处于与支付利息相同的地位。根据银行家委员会草拟的支付表，至1912年底为止，应偿还的借款总额共达三百八十七万一千零九十三英镑左右。在正常情况下，海关岁入完全足以支付这笔款项，但正如我在上封信中对这个问题所作的说明那样，如果本金和利息都要支付，到今年4月初，可能没有时间积聚足够的税收，连续不断地履行对借款的偿还。

朱尔典谨上 1912年2月27日于北京

第149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3月18日收到

阁下：

关于我上月24日的信，我荣幸地随信奉英王陛下驻南京领事寄来的另一封信的副本，该信报告南京参议院关于临时政府所在地问题的态度，并且表明南方现已不再完全拒绝关于把北京作为中国永久首都的意见。

朱尔典谨上 1912年3月2日于北京

第149件的附件 伟晋颂领事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自从我上次给您写信以来，碰上中国的春节，一切公务自本月17日至20日都陷于停顿。名义上，政府各机关仅在农历正月初

一停止办公，但由于各机关人员自去年除夕起至昨天为止，都已离开机关，所以各机关在整个这段期间也可能一直关闭。一般人对新政府所倡导的将农历改为公历完全不予理会。他们按照往常的方式而且采用往常的仪式庆祝春节，取回了典当的衣服；街道上充满了穿着他们最好的衣服的人们，互相走访拜年；所有的商店和其他营业机构都已关门。

正如我昨天荣幸地电告您的那样，黎元洪都督的辞职书送到参议院时已为时太晚，不可能同总统和内阁的辞职书同时予以考虑，他于本月20日举行的特别会议上被一致重选为民国临时副总统。在那份电报中，我还曾告诉您关于参议院就临时首都问题投票的某些细节。尽管孙总统对他的辞职附加了一些条件，即临时首都应设在南京，以及袁世凯如当选为他的继任者，应亲自前来南京接任，但参议院在接受孙博士的辞职后，进行了投票，以十六省对一省的多数通过了北京为临时首都，只有一省（广东）支持以南京为临时首都。由于这是辞职总统的一个挫折，人们几乎不能想象他会屈服于它，所以立即对参议院议员们施加最强大的压力，以撤销他们的决定，所采用的主要论点是军队将不会容忍把临时首都迁往北京。无论如何，参议院作了让步，在举行第二次投票时，以超过三分之二的多数赞成南京为临时首都。然而，有人告诉我，如果从第一次投票的数字推断除广东外，所有省份都赞成以北京为临时首都，那是十分错误的。对他们投票的真正解释，是参议院的大多数议员很急于实现和平，所以他们投票支持北京为临时首都，目的在于清除那个使成立联合政府的谈判获得胜利结果的唯一障碍，即首都的所在地问题。

我还获悉：在第一次投票选举总统的时候，有十三省赞成袁世凯，三省赞成孙文，一省赞成黎元洪。我应当说明，马良先生是南京政府的公开发言人，他曾因此事向参议院发表演说，指出

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一致的重要性。他的论点显然很起作用，所以在举行第二次投票时，袁世凯被一致推举担任总统职务。

昨天，我因事有机会见到外交总长，他表示毫不怀疑袁世凯将同意前来南京就任总统，但他不再拒绝以北京为永久首都的意见一事使我感到惊讶。因此，他们已同袁世凯达成某种谅解，这不是不可能的事情。王宠惠先生对参议院投票赞成北京之事所作的解释是，它系根据投票决定永久首都的印象进行的。总统依照约法有权将议决案以及他的反对理由交回参议院，以便重新审议，所以他对此事所采取的行动绝不是违反约法的。

伟晋颂谨上 1912年2月22日于南京

第 150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3月18日收到

阁下：

我3月1日发出的那几份电报，主要是告诉您关于前一天晚上和当天夜间这个首都发生的骚乱。

正象我曾荣幸地通知您的那样，骚乱是由属于第三镇的一个标开始的，该标是袁世凯嫡系部队的一部分，驻扎在陆军学堂。他们中间似乎曾流传消息说：当袁世凯拟访问南京就任总统时，将解散北京的军队；人们将强迫他们剪掉辫子；他们的饷银将从战时编制每月五元减为平时编制每月四元一角五分。不过，骚乱爆发的真正原因仍然是不能断定的。

下午七时半左右听到了枪声，据说是对住在贵胄学堂的南京代表团首先发动攻击，因为他们被认为是坚持要总统前往南京的。代表们逃到使馆区避难，他们住在使馆区的饭店内。这时，驻扎在齐化门外的该镇另一个标动身进城，他们朝天开枪，开始进行焚掠活动。到九时，有好几处房屋被焚；从一个地方观察，有十

二处在焚烧中，大部分都在外务部以北的东城内，少数几处在前门外的东面。东安市场也被焚毁。抢劫已真正开始，士兵们后面跟着一大群暴徒，从而增强了力量。劫掠和枪声通宵持续不断；次日，变兵整天到处游荡，完全无忧无虑，好象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

我们担心那些住在使馆区外面的外国人处在危险之中，派出警卫部队护送他们前来。完成这件事情没有遇到任何困难；整夜观看士兵活动的许多外国人并没有受到干扰。哈德门大街、王府井大街和附近其他街道遭到了焚掠，但他们并不企图杀伤许多人，除非户主在被剥夺财产时进行反抗。对使馆区进行了严密警卫，在各战略据点布置了士兵；但除了一两枚流弹落入英国使馆大院，以及在美国使馆庭院内发现一枚未爆炸的炮弹外，使馆区没有受到骚乱的任何损害。

人们认为引起骚乱的另一个原因，是传闻曹锟统制对唐绍仪和南方代表们向袁世凯施加压力诱劝他南下一事感到愤怒，他的官兵们也是如此。继推翻旧秩序之后普遍存在的不安情绪，大概也是造成骚乱的一个因素。无论是什么原因，袁世凯最信赖的部队发生背叛一事，似乎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前一天（2月28日），我见到了唐绍仪，发现他的情绪极为乐观。他满怀信心地谈到袁世凯将在几天后南下，并且认为总统离去期间维持北京秩序的任务是无足轻重的。根据他的意见，南北的和睦统一将在适当时间内完成，中国各派将提供一个自我克制和爱国主义的榜样，值得全世界仿效。第二天夜间，说这些话的人成为使馆区内的一位避难者，全城变成了一片废墟。

值得注意的是：士兵们进行袭击的首批地方之一是南方代表们居住的贵胄学堂；这个事实以及对满族人所显示出来的明显照顾（满族人几乎没有受到劫掠者的损害），似乎表明，这个运动如

果具有任何政治色彩的话，无论如何不是反对满族人的。

一部分变兵征用了一列火车开往保定府，在该地犯下了类似的暴行，人们认为这些暴行中包括对该地法国教会财产的破坏在内。昨天，传说他们将乘火车返回北京；袁世凯下令拆毁京汉铁路线上的两座桥梁，以阻止他们前进。

唐绍仪在一封便函中要求我召集一次外交团会议，现附上该便函的副本。外务部的几位成员也向我和其他公使口头上提出了类似的要求。昨天下午三时举行的会议认为，尽管已采取严厉措施制止进一步的骚动，但局势仍然是很严重的。经过长久的讨论后，会议决定从天津再调来一千人，作为对使馆卫队的增援，并且每天在街道上武装游行，以便对现存统治当局给予道义上的支持。会议还认为，为保持与大沽的无线电报联系进行安排是可取的；日本公使答应促使他的政府为该项目而派遣一艘船只前往该处。

总统对北京的所有外侨发表一项声明，表示他的歉意，并且说明正采取一切措施，以防止这一悲惨事件的重演。袁世凯于本月1日和2日对部队发出了通告。现附上所有这些文件的副本。

有一大批暴徒已被斩首，他们的尸体被遗弃在街道上。然而，尽管采取了措施制止骚乱，但骚乱还是蔓延到了丰台和天津城。丰台是北京城外通往天津铁路线上的第一站；正如我在昨天的电报中荣幸地向您报告的那样，天津也有部队哗变，并已发生枪击和抢劫事件。

朱尔典谨上 1912年3月3日于北京

第151件 格雷爵士致朱尔典爵士电

1912年3月18日发自外交部

关于您1月30日的来信。

授权您与您的同事们一起，同意暂时停止对借款本金的偿还，如果认为有此必要的话。

第 152 件 海军部致外交部函

1912年3月20日收到

先生：

我奉海军部各长官之命，为了供外交大臣参考起见，送上驻华总司令官本月19日关于中国局势的一份电报的副本。

格林谨上 1912年3月19日于海军部

第 152 件的附件 驻华总司令官致海军部电

1912年3月19日发自上海

当局已把革命军遣送回去予以解散；据说在此地遣散者为一万六千人至二万人；南京、上海和长江各地普遍因此受到骚扰。由于缺乏银钱，不能付清士兵们的饷银或把他们送回家去。我认为，如果遣送更多的部队，他们将引起严重骚乱。我已要求朱尔典爵士向北京当局提出相应的建议。“新城堡”号军舰已前往保护南京，“威尔士”号则开至上海。

第 153 件 海军部致外交部函

1912年3月20日收到

先生：

我奉海军部各长官之命，为了供外交大臣参考起见，送上驻华总司令官本月20日关于英国在华部队调动情况的一份电报的副本。

格林谨上 1912年3月20日于海军部

第 153 件的附件 驻华总司令官致海军部电

1912年3月20日发自上海

经英王陛下驻北京公使和驻广州总领事同意，我已命令约克郡团的士兵自广州返回香港，留驻广州的有“克莱奥”号军舰上的海军部队和一百七十名印度部队。

第 154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3月25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随信奉上本使馆武官韦乐沛中校的一份报告的副本，该报告是关于本月3日夜间丰台发生的有关我们保护铁路北段的事件的。该事件可以很容易显示出具有严重的性质，主要由于韦乐沛中校和巴尔敦先生，从而避免了那些不愉快的结果。我希望把我的感激心情记录在案，对这两位官员处理很微妙局势的机智和技巧，我们是应当感激的。在这样做的时候，我想要补充说明：如果不是驻有皇家英尼司吉林明火枪团以及汉考克斯中校表现出来的毅力和果断，那么，韦乐沛中校和巴尔敦先生为把中国军队和平逐出丰台所作的努力肯定是不会获得成功的。

朱尔典谨上 1912年3月8日于北京

第 154 件的附件 韦乐沛中校的报告 把中国哗变部队逐出丰台火车站附近地区

最近几天内，席卷中国军队这么多单位的不守纪律的浪潮，于2月29日至3月1日夜间蔓延到了驻丰台铁路交叉处的部队中（那天夜间，在几英里外的北京，他们在第三镇的伙伴中发生了骚动）。驻丰台的中国军队，据说总共约两千人，系步兵第十二标

的三个营以及炮兵(野战炮和过山炮)第三标的一部分,都在步兵第六协协统陈文荣^①的指挥之下。2月初,清朝将领们劝告朝廷退位的奏折刚刚发表,当人们担心满族人进行反动活动的时候,这些部队自滦州附近地区匆匆调来。那时,第三镇的几乎所有部队都调来集中在北京及其周围。此后,该镇前来丰台的那部分军队一直留驻该地,并且有一两次已经引起人们的忧虑,例如,英国驻丰台指挥官于2月7日给我来电说:“此地第三镇的将领有钱发饷,但没有把钱发给他们。他们似乎感到极为不满,并且谈论如果本月13日以前不发饷银,便将袭击各车站。”当29日夜北京发生武装骚乱的时候,驻丰台的部队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城内的火光,而且很可能听到了枪声,仅此一项就可能足以促使他们起来闹事,不需要与他们在北京的伙伴有任何实际联系或事前有何安排。3月1日凌晨三时半,我收到英国驻丰台指挥官的下列电报:

“外国人员和一些中国人已撤至英军在丰台的驻地,军队正在抢劫。”

接着,又立即发来如下的电报:

“大约在午夜时,中国军队开始在丰台放火。他们已抢劫火车站;所有外国人都已进入英军驻地,以求保护。在天津取消七时二十分开往北京的列车是可取的。我预料七时南行的列车将不会自北京开出。关于三时南行的列车情况,目前我不知道。”

后来的调查说明:他们曾经冲入三处火车站的各个办公室,抢劫了保险柜,但实际上没有骚扰外国的任何铁路人员。

3月2日晚上,英军驻丰台指挥官来电说:

“车站上的中国卫队从五时十五分南下的列车上带走了两名叛兵。人们普遍存在着很大的激动情绪。火车开走后,一些叛兵

^① 译音。

对第三镇的部队开火。双方都已散去。此地的中国将领说：叛兵企图抢劫开往北京火车上的邮件，所以决定在天亮前将火车停在此地的车站上。叛兵们有过山炮；中国将领说，他不能够捕获他们。我对事态的发展做好了准备。”

今天，指挥英王陛下驻华北部队的库柏准将也电告英王陛下公使说：

“如果允许中国军队大批地驻在丰台附近，那是不可能适当保护丰台铁路的。本月1日清晨，该处驻军的地位是有些不稳固的。由于您希望增援北京的驻军，所以我建议明天派一个营前往丰台，以驱逐那些对列车开枪的叛兵。然后，当一旦需要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自丰台增援北京。我将建议，请求从香港调来印度过山炮连和一个营是可取的。”

英王陛下公使答复说：他赞成这种调动。

因此，英尼司吉林明火枪团（除去驻威海卫的一个连）于星期日（3日）自天津乘火车前往丰台，大约在下午五时十五分抵达该地。汉考克斯中校在途中致电驻丰台的莎美西轻步兵分遣队指挥官沃德劳上尉，要他通知陈文荣协统说：他的部队必须立即撤离火车站附近地方。这个信息及时地送给了陈协统。英尼司吉林明火枪团于下午五时十五分左右到达后，运送他们的一部分列车把莎美西轻步兵分遣队载往北京，该分遣队迄今驻守丰台。

与此同时，收到英军驻丰台指挥官的另一份电报说：

“今天，各次列车均安然通过。此地的部队似乎是平静的。我已经与中国协统商定把他的部队开出火车站，由我率领半个连的士兵予以占领，当列车通过时，将控制住炮兵营房及站台。该协统下令派专车送炮兵前往永定门：他们把用具搬上了车，然后又卸下来，说已取消此项调动。”

由于这份电报，以及有可能（或者更确切地说，有希望）商定

把中国军队全部撤离丰台，而不采取实际冲突的办法，因为就国际关系来说这项办法的最后结果是难以预料的，所以我冒昧地向英王陛下公使建议，促使总统或陆军总长发布必要的命令，将中国军队调往其他地区是可取的。英王陛下公使赞成我的建议，并委派英国公使馆的中文秘书巴尔敦先生与总统进行相应的安排。大约在午夜的时候，巴尔敦先生回来告诉我说：公使希望我陪同他立即前往丰台。因此，我同巴尔敦先生和总参谋部的蒋^①上校（一位漂亮的青年军官，他会说日语）一起，于凌晨零时四十分左右从前门火车站动身，乘坐根据袁世凯的指示由交通部为我们准备的一列专车。

蒋上校有点忐忑不安，认为听到了丰台方面的枪声。他对我们的使命感到悲观，说他曾经被派往丰台与部队进行讨论，昨天早晨从丰台回来。他说，协统是很讲道理的；他认为步兵第十二标也会如此，但炮兵的态度是很固执的，有一位炮兵军官曾使用强硬的语言，他不愿意向我们重述那些话。我们大约在凌晨一时十五分抵达丰台，没有发生任何事故。一切似乎都很平静。我们曾经商定：到达丰台后，蒋上校应独自去会见陈文荣协统，试图安排和平撤军问题，然后把情况通知我们；那时我们（巴尔敦和我）也将去会见陈协统。与此同时，我们去找汉考克斯中校。

汉考克斯中校告诉我们说：他于昨日下午五时十五分左右到达后，便立即通知中国协统，必须在二小时内把他的部队统统调离火车站周围约两华里的地区；该协统表示愿意调开，但要求延长时间，因为有许多补给品需要搬走而且必须准备运输工具，还要安排挪动大炮、弹药等，所有这些事情几乎不可能在夜间完成。汉考克斯中校同意允许他延长到今晨八时为止，并且警告他：如果到那个时候所有部队没有撤离上述地区，他将采用暴力手段驱

^① 译音。

逐他们。他还告诉我们说：在夜间十一时至午夜这个时间内，车务稽查和火车站长前来向他报告，炮兵对驱逐令感到极为愤怒，已向北逃走，好象是要纠集他们那些分散在丰台以北各村庄的伙伴，回来攻击英军的驻地。不过，他认为这个报告没有多大的重要意义。

接着，巴尔敦先生和我前往火车站长办公室，我们在那里听到了丰台火车站被劫掠的经过，它是从3月1日凌晨一时开始的。步兵和炮兵都与此事有牵连。他们抢劫了三个车站的全部财物，其中包括存放银钱的保险柜在内。许多雇用人员均已逃走；火车站长仍继续工作，有四个夜晚没有睡觉。他显得极为疲乏。

清晨四时二十分左右，陈文荣协统派了一名军官前来，说协统将要来看我们。因此，巴尔敦先生和我同这位军官一起，前往火车站长的房间。汉考克斯中校在天桥上面赶上了我们，并和我们作伴。大约二十分钟后，曾来找我们的那位参谋官又同陈协统一起来了，我们讨论了很久，直到早晨六时半左右为止。讨论的结果是双方商定：应提供三十一节车厢和一辆机车，把第三镇的大车、留存的大炮和补给品运往良乡县，大部分炮兵和步兵则开往长辛店。此事需要作许多安排，因为必须从长辛店弄到京汉铁路线上的一辆机车，但京奉铁路上能够觅得车厢。汉考克斯中校同意对时间作必要的延长（超过上午八时），以便能够完成这项撤军行动。接着，陈协统在我们的面前着手发布必要的命令，并由那位参谋官把这些命令送走。于是，还有待于了解军队是否将服从这些命令。

我们大约在六时四十五分结束了会议；巴尔敦先生和我前往里格比先生的住宅。当我们于上午八时左右回到车站月台的时候，我们很宽慰地看到中国人正忙于装车。装车活动占用了整个上午的时间。我们查明炮兵已经开走，但在车站建筑物正北面一个潮湿的大院内，他们留下了两尊新的克虏伯野战炮以及六辆拖带大炮

的前车。我在上午十时左右见到这些大炮的时候，它们已经没有了瞄准器和炮闩。大批村民终于顺利地拖走了这些大炮，在特别潮湿的地方垫了草席。火车于下午一时左右开出，不久前一辆机车从长辛店开来，带来了一列装货的敞车。我们扣留了这辆机车，它把军用火车拖了回来。

京奉铁路的车务稽查曾告诉我们：他们的雇员都不敢乘火车沿京汉线南下；那位同英尼司吉林明火抢团一起前来的西蒙斯上尉曾自愿驾驶机车，如果有此必要的话。当事情已很明显，到那天中午中国军队都将撤离的时候，汉考克斯中校决定把他的那营士兵带回天津（除了琼斯少校率领的两个连仍留在丰台外），并且同铁路当局商定了列车。他们也给巴尔敦先生和我以及蒋上校提供了一列专车，把我们送回北京，我们于下午两时后不久到达。

我认为，巴尔敦先生和蒋上校因为他们在顺利安排此事时采取了机智的态度而应当受到庆贺，此事包含着严重纠纷的一切因素；把这些骚动的部队逐出丰台附近而没有发生战事，这大概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因为此地发生冲突可能给本省现在普遍存在的骚乱提供排外的色彩。

武官 韦乐沛 1912年3月6日于北京

第155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3月29日收到

阁下：

本月3日，我曾荣幸地发电报向您报告说：前一天夜间，军队和暴徒在天津城内进行焚掠。局势已完全超出中国警察的控制之外。德国臣民希利耶医生在驱车经过骚乱地点时，被人开枪打死，但外国人在其他方面没有受到伤害。本信所附代总领事的一

封来信的副本，提供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

两天后，我收到南京外交总长王宠惠的一份电报说：中华民国政府对北京及其附近各地发生的骚乱感到惋惜；它对该局势承担责任，正在派遣援军帮助当选总统恢复秩序。同时，英王陛下驻上海总领事来电说：民军当局正在从汉口、浦口和烟台派遣部队，并为此项目的而租用英国各轮船公司的轮船。据烟台代领事说，该口岸也即将派出部队。这个步骤不但远远没有恢复人们的信心，此地的人们反而对它感到极为不安，因为它制造新的混乱的可能性超过了它有助于恢复平静的可能性。

我于3月6日获悉，第二十镇的两个标已奉命自唐河开往天津，可能于当天夜间启程。因此，我感到应不失时机地设法取消这些部队的调动。各国驻天津指挥官已经于3月5日举行会议，他们在会议上决定：应不允许中国部队进入天津周围二十华里以内的地区，并对总督发出相应的通知。如果中国军队进入该地区，军衔最高的日本指挥官阿部少将将提出抗议。如果此举未能奏效，则将对他们采取敌对行动。

鉴于已经出现的局势，我于次日上午召集一次外交团会议；同时，我要求袁世凯取消自唐河调动两标部队的命令。我还指示波特先生警告烟台都督说：不允许任何类型的中国军队进入天津周围的禁区；各国指挥官正严厉执行此项禁令。

在第二天举行的外交团会议上，我的同事们同意我所采取的行动。袁世凯和烟台都督已各自取消了颁发给军队的那些命令，但为了加倍保证各国在天津的利益不致遭受我们能够加以防止的任何危险起见，我们签署了一项联合的不具名备忘录送交当选总统，提醒他记住我们于1902年同庆亲王订立的协议。我荣幸地附上我们那份备忘录的副本。

我没有听到关于拟自汉口和浦口派遣军队的任何其他消息；

我想很可能是他们至少在目前已放弃该计划。

朱尔典谨上 1912年3月11日于北京

第155件附件1 总领事禄福礼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我荣幸地报告关于本月2日至3日夜间大部分天津城遭到焚掠的情况。

最近北京发生骚乱的消息，显然使天津的下层社会人士感到激动；中国陆军第三镇中一些闹事的士兵，于本月1日和2日自北京乘火车前来天津。人们认为，这些士兵是在我们这个地方发动骚乱的首要分子。天津消防队人员和地方团练以及下层社会中的暴徒同他们相会合。中国警察部队显示出完全没有能力应付局势，据说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曾协助抢劫和纵火行为。

骚乱自晚间十时左右开始，通宵持续不断。抢劫者反复向空中开枪，以恐吓他们想进行抢劫的那些房屋的住户，但打死人的情况是比较少的。他们从四面八方放火焚烧房屋，有好几条主要的贸易街道化为灰烬。

从他们对城内最高庶的商业区进行袭击看来，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组织的。抢劫者显然是受那些了解被选择进行抢劫地方的特征的人们指引的。

没有一个衙门或警察哨所遭受损失。前者有重兵防守；后者没有任何引诱人的东西。暴徒们并非野蛮粗鲁的，他们仅热衷于抢劫。他们中间携带武器的人数是很少的。

北洋铸钱局完全被火焚毁，它的那些贵重机器遭到破坏。该处有大批白银，据说达四十五万元，都已被抢劫者所获得。

天津城警察总局曾在夜间打电话给各国租界巡捕房，吁请帮助平息骚乱。各巡捕房显然不可能接受这些要求。各国军队处于

戒备状态，协助各租界巡捕防止闹事者进入租界。

为了回答要求提供保护的呼吁，一支莎美西郡轻步兵分遣队奉命在午夜前后自租界车站乘火车前往天津城车站。他们非常及时地抵达该处，以阻止一批持有步枪的士兵的袭击。如果火车站及其办公室遭到抢劫，他们将获得丰富的赃物，因为该处大约存有八十万元。负责保护该段铁路的法国军队，于第二天早晨替换了莎美西分遣队。

本月3日，城内的绅士们在总督衙门举行了一次会议，后来通过巡警道向领事团呼吁，要求获得各国部队的帮助，夜间维持城内的秩序。

领事团于该日召开会议，原则上赞成提供这种帮助，如果可能的话，但把采取步骤的方式留待各国部队指挥官决定。直到目前为止，各国指挥官考虑到他们指挥下的部队人数和他们必须保卫的各国租界的广大范围，以及中国哗变部队进攻各国租界的可能性，所以不认为因上述目的派出任何部队是可取的。

自那次骚乱以后，天津城昼夜都保持平静。它的贸易目前处于瘫痪状态；在最有利的情况下，它恢复过来也将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晚上八时以后停止一切交通；人们感到极为不安，担心可能重新发生抢劫。各租界由各国部队很好地加以防守。

禄福礼谨上 1912年3月5日于天津

第155件附件2 给袁世凯的联合备忘录

各国使节荣幸地提醒袁世凯阁下：按照在天津临时都统衙门中派有代表的各国公使于1902年7月12日致庆亲王的同文照会中所包含的，并且在亲王殿下7月18日的照会中被清政府所接受的那些建议，不允许中国军队进入天津城周围二十华里以内的地区。各国驻华北部队指挥官已经把他们执行此项规定的意图通知总督

阁下。

1912年3月7日于北京

第156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3月29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报告：我已经收到外务部首领胡惟德阁下本月8日的一封信，通知我说，袁世凯将于3月10日三时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胡惟德先生在写这封信之前曾来看望我，并就邀请各国使节出席典礼是否妥当的问题征询我的意见。我建议说：正式的邀请可能引起某些使人为难的事情；他仅限于发出典礼的通知是可取的。他完全同意这个意见，但表示希望我召集一次各国使节会议，向我的同事们宣布：虽然没有发出邀请，但政府准备为那些希望出席典礼的外国参观者作出安排。

本月9日，在本使馆举行的外交团会议上一致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唯一正确的方针是不以任何身份出席集会。对我们不能够出席表示遗憾一事已及时转达胡惟德先生。

朱尔典谨上 1912年3月11日于北京

第157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3月29日收到

阁下：

自从我上月8日写信以来，我收到英王陛下驻四川领事官员们的报告表明，局势已有某些改善。

看来重庆军政府要求云南派遣一支远征军进入四川的邀请，是在已故总督赵尔丰为代表的清朝当局仍然统治成都，以及长江

沿岸的合江县仍然坚持抵抗民军进攻的时候发出的。他们恳求云南的帮助；既然为原来的目的已不再需要它，人们认为它仍可以用来使四川省免除迄今遭到的土匪蹂躏的祸患。如果国内其他地区许多军队变成不守纪律的和没有职业的游民的情况可以用来作为一项标准，那么，正如英国驻成都和重庆的两位领事官员所预料的一样，用委婉的话来说，云南部队更可能无意空手返回家乡。

除了对这种情况存有顾虑之外，重庆代领事还报告说：地方当局正致力于平定农村地区，成都和重庆两个行政当局的合并将有利于这一工作。

象四川这样的一些省份，不仅是自给自足的，而且一向对那些较贫穷的省份提供大量的补贴，它们在加入民国之前也许可能倾向于达成协议。四川憎恨满清政府在铁路借款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集权政策；了解它和其他具有自治愿望的省份对民国政府采取的态度，将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新的统治者现在和将来都不得不建立增税制度，以偿还他们在满族人留传下来的外债遗产上日益增加的对外债务。

朱尔典谨上 1912年3月12日于北京

三、关于中国事件的补充函电： 中国第三号（1913年）

第1件 总领事额必廉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4月1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随信奉上我写给英王陛下驻北京公使的一份报告的副本，该报告是关于云南省至1912年2月15日为止的半季度情况的。

（代英王陛下总领事）甘蒙谨上

1912年2月18日于云南府

第1件的附件 总领事额必廉关于云南省至1912年2月15日为止的半季度情况报告

自新年开始以来，云南府最突出的特点，是临时政府为了使行政机构全面开展工作以及为急需公款问题谋求满意解决而进行的活动。由于对腾越不服从命令的革命派进行军事威胁以及云南府任命的一位道台的就职，从而消除了全省统一中最后的一个不协调的因素，蔡锷将军的影响仍然是最大的。某些有权势的云南人因蔡锷都督系湖南人而提出反对意见，一度很可能导致严重骚乱，而蔡锷本人明白表示想要离开云南府前往湖南原籍，这些都幸亏没有成为事实。他仍然是云南的独裁者；在他的指挥下，四川和贵州两省已处于隶属本省省城的附庸地位。

现款问题始终被认为是对临时政府稳定性的最大考验。在中国人和欧洲人中间，都普遍认为，白银供应持续的时间不可能超出二月底，或充其量不可能超出三月中旬。向人们提出自愿捐献的要求没有获得很大的成功，通过这个办法所得到的全部款项大约为三十万元。发行价值一百万两的云南纸币的建议已经失败；募集公债的意见最初提出的时候，是颇受欢迎的，但由于财政司长的坚决反对而被放弃，他赞成举借外债，认为他能够维持下去，直到民国获得承认为止，那时他有信心从外国方面得到一笔借款。有人告诉我，他们曾向南京和广州行政当局要求提供款项。前者已经拒绝，理由是它需要把所得到的全部款项用于对北京的作战；广州方面愿意作一笔商业性的交易，但利率却是本地政府所不愿接受的。在清政府统治下，云南每年从湖北和四川两省得到巨大款项，以应付行政管理的日常开支。如果得不到援助，云南是无力负担这些开支的。因此，作为最后的一项办法，它把注意力转向四川，该省内部的不和大大有助于执行一项迅速制订的计划，不惜任何代价把款项交给云南府。外交司长告诉我，总人数达一万二千人以上的云南部队据有叙府和泸州，并占领了自流井的著名盐井，据说该处每年把七百万两至八百万两的税收给予四川政府。他们已经作了安排，每月从盐井的税收中将拨出三十万两给云南政府。我相信，第一批款项现正运往云南府途中。我不能够从英王陛下驻重庆领事那里得到对这些说法的证实，因为电报联系迄今还没有恢复。这些部队是用四川的钱付饷的，所以使本省财库免除了对它那贫乏的财力的一项消耗。

贵州省的情况给此地政府带来了很大的忧虑。在一位前陆军士官、现任都督^①的领导下，“哥老会”是最有势力的；据说全省很

^① 杨森。

不安宁。外交司长是贵州人^①，于2月3日率领“绥靖军”三千五百人离开云南府。人们预料，如不经过战斗，他是到不了贵阳的：在进入该省城之后，他将使自己作为云南政府的代表担任都督。他带走了二十万元纸币，因为这是可用来填补由于各种原因而完全枯竭的财库的唯一款项。蔡锷将军的明显意图是要兼并四川（或至少是南半部）和贵州，组成云南府统治下的一个大省，由四川提供该政府所需要的大部分金钱。有人谈到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但这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象蔡锷将军这样一位有能力和有远见的人物会从事于这样一种充满危险的活动，而且这种活动的唯一结果将使云南招致中国国民党人士的愤怒。此外，仍有待于了解的是：当四川省从目前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中恢复过来的时候，它对这项安排必须说些什么。

1月5日，蔡锷将军邀请领事团和城内的主要外国侨民前往离城八英里的黑龙潭庙，参加非正式的聚餐；后来，两国领事馆对他的款待进行了同样非正式的答谢。

10日，当局贴出一张告示，宣布采用西历，并规定1月15日开始施行。官方庆祝这个日子，但除了在每家大门口普遍悬挂五色旗之外，人们并不注意这个改变，生意照常进行。现在，人们为庆祝旧历新年正加紧准备，但已出告示禁止燃放鞭炮。

已得到增援的铁路警卫队大约于1月中旬撤退，这是重新发生小规模抢劫行为的信号。在宜良附近的一位外国人（门的内哥罗人^②）的大院遭到袭击和抢劫。这是自12月初发生抢劫以来，人们所报告的对外国人或其财产进行侵犯的唯一案件。

全省和平和秩序的恢复，使那些奉命离开云南府的人们有理由回来。大多数外国人都已回到城内。

① 周沅。按：率领滇军进入贵州的是唐继尧，疑此处原文有误。

② 在南斯拉夫境内。

2月5日，额必廉先生允许传教士们（限于男子）自省城返回东川、曲靖、撒布山^①三地，期限分别为六天、五天和三天，因为中国人已经表示他们的意愿，仅承认他们有责任在云南省内提供保护，强调外国人目前必须不进入四川或贵州。还没有允许传教士们返回昭通，该处离云南府有两周的路程，并靠近四川边境。直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返回大理。

第2件 印度部致外交部函

1912年4月1日收到

印度部副大臣向外交部副大臣致意。为了供外交大臣参考起见，随信送上柏来乐中校关于自北京至喀什噶尔旅途的一份报道，该报道是从英王陛下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那里通过印度政府收到的。

1912年3月28日于印度部

第2件的附件 柏来乐少校^②自札山至 喀什噶尔的旅行

由蒙古和新疆到喀什噶尔（摘要）

一、自札山至萨拉苏默^③ 1911年5月19日，我们越过构成中俄两国边界的那条小河，到达两个肮脏的哈萨克“帐篷”，它们好象是清帝国的哨所。这两个“帐篷”是木制的圆形蒙古包，上面盖着几张毛毡。哈萨克人，汉人称之为哈萨，蒙古人称之为哈萨克，是同吉尔吉斯族有密切联系的，他们过着游牧生活，居住在“帐篷”中，除了喂养骆驼、山羊和公牛外，还饲养大群绵羊

① 译音。

② 第2件内作“中校”。

③ 译音。

和小马。他们是原始的哥萨克人。在边界上的俄国一方，有许多部落也是哈萨克人，但俄国人总是把他们叫做吉尔吉斯人，只承认他们本国的哥萨克人。阿尔泰山的中国哈萨克人从边境伸延到阿尔泰山的东面斜坡，有一位公爷和十二位总管，他们都在萨拉苏默的安本^①管辖之下。公爷居住在该城以西有两天路程的泰里敖包^②，而两位最有权势的总管则是居住在该城北面的玛密，和居住在阿尔泰山东面、戴诺尔湖东南的苏古布。一位领事告诉我：苏古布很聪明；中国人已赏给他红顶戴。总管以下是头人，而重要案件都是由安本审理的。哈萨克人是一个不活跃的民族，除了放羊以外，他们对生活似乎没有兴趣。相形之下，甚至没有进取心的蒙古人也是生气勃勃的。

自札山至萨拉苏默地区大都是由荒山和平原构成的，人口非常稀少，在几条小河旁边发现哈萨克人，那里还有几棵树木。

在札山以东一百十二又四分之三英里的地方，我们乘渡船越过黑色的伊尔第什河。除了萨拉苏默附近的克朗河之外，其他的小河都是涉水而过的。克朗河在萨拉苏默分为两条水道，有木桥横跨那浅浅的急流。

蚊子是一大祸害，特别是在7月份的伊尔第什河一带，它把居民们从平原赶入山中。

二、萨拉苏默 当地蒙古人把萨拉苏木读为萨拉苏默，意思是“黄色的庙宇”。活佛过去常常住在这里，现已迁往更偏南面的地方。汉人称之为承化寺。在地图上，它被错误地称为图儿塔^③，其实它在更偏南面三英里的地方。它有居民一千八百人，主要是来自乌鲁木齐、天津和西北各省的汉人和萨尔特人。萨尔

① 安本即“参赞大臣”。

② 译音。

③ 译音。

特是从波斯语派生出来的一个俄国词，而且也是用来形容各种突厥族的一个好词，这些突厥族大都居住在中国领土内自天山至喀什噶尔一带和雅尔康^①地方，以及俄国的塔什干和安第坚。中国人称他们为缠头，因为他们把头巾缠在头上。他们在城市中是商人，在萨拉苏默同汉人势均力敌；在塔尔巴哈台和伊犁，他们在人数上超过了汉人；在阿克苏、乌什吐尔蕃、喀什噶尔等地，则较汉人占压倒优势。在肥沃的平原和较大的河流两岸，例如在伊犁一带和天山以南自阿克苏至喀什噶尔的各大城市周围，他们也是农民，在伊犁一带被称为“大男子”或种地人。他们在萨拉苏默似乎比在天山以南较有生气，因为他们在天山以南同吉尔吉斯人一样，显得不甚活跃和没有进取心，完全缺乏一切爱国精神和联合的力量。事实上，当我看到他们遭受只不过一小撮清朝人的统治而显然无动于衷的时候，我极为惊讶。这种无动于衷，部分是由于他们天生的惰性造成的，但毫无疑问，部分是由于他们感到宁可要清朝人作为统治者，而不愿要任何其他民族。哈萨克人虽然是回族人，但似乎缺乏宗教。与哈萨克人不同，萨尔特人在天山以南有许多清真寺，似乎具有相当虔诚的心情。在萨拉苏默的萨尔特商人中，没有俄国的臣民。萨拉苏默是一座很新式的城市，有两条大街，一条主要是汉人，另一条则是萨尔特人。房屋是平顶的土房。工资很高，苦力每天得到八马斯（一马斯约合三便士），另加三马斯的伙食费，因为生活费用昂贵的缘故；但仅在夏天有这种情况，因为冬季便不需要苦力了。所以，很难以每天二马斯多一点的代价招募士兵，这是不奇怪的。

安本（“参赞大臣”），通常被称为钦差，直接上奏北京，与蒙古的三位安本和塔尔巴哈台的一位安本不同，他们隶属于满族

① 译音。

将军。在我写这个报道的时候，所有这些安本必须是旗人，因而大部分是满族人。他所管辖的地区，东面自阿尔泰山东部斜坡起，在该处与科布多接壤，一直延伸到西面的绍尔山，塔尔巴哈台地区是从那里开始的。除了萨拉苏默的居民（汉人和萨尔特人）之外，他还统辖哈萨克人和更靠南面的某些蒙古土尔扈特王公。

在萨拉苏默和塔尔巴哈台，都设有一个中俄事务局，它相当于中国一些省城通常设立的交涉使司^①。该局局长是一位精力充沛的、年轻的湖南人，名叫熊安迪^②。

三、阿尔泰山 我们穿山越岭，沿着大道前往科布多，经过了好几个关口，主要是萨拉苏默以东二十五又四分之一英里的乌西岭（海拔八千八百五十英尺）、哈西里克关（海拔八千九百二十英尺）以及在六十又四分之一英里处的乌尔木盖图关分水岭（海拔一万零一百英尺）。6月7日，后面那两个关口受到大堆积雪的严重阻塞，我们穿过时遇到一些困难，但6月27日在我们返回来的时候，那两个关口已经畅通无阻，商队在萨拉苏默和科布多之间自由通过，而在河流两岸有许多哈萨克人的“帐篷”和羊群。中国人说：乌尔木盖图关大约于八月二十日（即10月13日）被雪封闭。我估计，阿尔泰山主要山脉的顶峰在海拔一万一千英尺至一万二千五百英尺之间，是被雪覆盖着的。白天的气候通常很暖和，介于华氏五、六十度之间，但自6月21日至23日下了一场大雪，中午我帐篷内的温度表降到了三十六度。

羊每头值四卢布至四卢布半（合八先令八便士至九先令九便士），奶每瓶值十戈比至二十戈比（合二便士半至五便士），但哈萨克人不饲养家禽。

① 清朝末年，奉天、吉林、直隶、江苏、浙江、福建、湖北、广东、云南等省先后设立交涉使司。见《清史稿》第12册，第3473—3474页。

② 译音。

汉族和萨尔特族的商人在哈萨克人中间巡回推销货物，而我们还遇见三名俄国商人，他们住在阿尔泰山东面的“帐篷”内，出售茶叶、皮靴、布匹等。他们每年自俾斯克前来，大约留住六个月。

四、蒙古和新疆使用的货币是中国的，即银两和铜钱。在萨拉苏默，他们使用银两（一两大约等于二先令六便士），它很象中国的银元，还有半两的银子。不过，我们自札山至喀什噶尔途中都是使用俄国货币（纸币和白银）。一般说来，一卢布相当于一银两的四分之三。当地称一银两为“希尔”，萨尔特人把一银两分为十六坦噶，尽管没有坦噶硬币。人们还使用以两为单位的纸币，但价值波动不定。如在伊犁，纸币是满族将军发行的，但由于他陷入财政窘境，特别是进行伊犁皮革制造厂的投机活动，他把大批纸币涌入市场，结果一银两值伊犁纸币一两三钱。普通的中国铜钱和被称为“红钱”的一种特殊铜钱，都有人使用。红钱是在乌鲁木齐铸造的，三百三十枚红钱等于一千枚普通铜钱。

在喀什噶尔，四百枚红钱等于一两。我发现，萨拉苏默的银块重量同北京汇丰银行使用的“公法”银两是完全一样的。

五、自萨拉苏默至塔尔巴哈台 我们顺原路返回通往札山大道上的伊尔第什河渡口，然后折向西南。这个地区有大片荒凉的平原，边上有些秃山，偶尔有很少几条小河穿过，几乎无人居住，直到绍尔山为止。我们在这里进入了塔尔巴哈台安本所管辖的地区。这些山上大都长满了草，为土尔扈特蒙古人的羊群提供了良好的牧场，他们是同哈萨克族混杂在一起的。

绍尔山及其南面的地区是五位土尔扈特王公管理的，他们在安本的统辖之下。我们会见了和布赛里公爵（他是从和布河及赛里山或绍尔山得名的）；他的汉文姓氏是秦，蒙文叫阿罗拉马扎布，他现年二十四岁，是一个没有子女和腼腆的青年，每年必须

前往塔尔巴哈尔，向安本磕头。他住在一个设有五十个“帐篷”的营地上，那里大约有三百名喇嘛，他们都是无用的人，而且是造成目前蒙古族衰败的主要根源。

这位公爵过着游牧的生活，虽然他在更偏南距离一天路程的阿瓦特地方修筑了一所衙门。地图上有时错误地把他的住处标为王府，“王”是汉字中的“亲王”。他驻扎在乌图拉生河旁，距萨拉苏默大约有一百六十八又四分之一英里，在该处以东五十八英里半的地方大路进入并跨过俄国领土八又四分之一英里，那就是他的领地的范围。在边界附近，我们遇见了一些俄国的哈萨克人。在穿过那块狭长的俄国领土时，我们必须向俄国军官出示护照，他有一个三十名上兵的哨所，这些上兵是札山的哥萨克团提供的。离开边境后，我们沿着丘陵地区走了二十五英里，直到我们抵达塔尔巴哈台大平原，该平原大约有七十平方英里。那里的土地大都荒芜，长着干枯了的野草，但偶尔也有几块耕地，有汉族或东乡族的移民区或农场。这些地方生长小麦、小米和燕麦，但没有鸦片。

这些东乡族人是回民，但我在旅途中没有遇见多少。人们主要在新疆最东部见到他们；他们还散布在甘肃、陕西等省。虽然他们的衣着很象汉人，并且说汉语，但他们属于一个不同的民族，看来没有人能查明他们的起源，甚至弄不清楚“东乡”这个词的意思。他们在两次大起义中遭到汉人的残酷镇压，最近一次是1895年在甘肃的起义。1910年我在甘肃的时候，有些传教士告诉我：他们对汉人仍抱有强烈的反感，并公开谈论报仇的日子，但他们在上次起义后已被压垮，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恢复过来。

六、塔尔巴哈台 它是因为在城西的一座小山上发现大批土拨鼠（“塔拉巴罕”）而得名的。它还被称为“朱古加”，俄国人和萨尔特人通常使用这个名称；中国人的正式名称是塔城厅。

当该地区被中国人于乾隆二十五年和二十六年^①初次征服的时候，安本把他的驻所确定在西北约一百英里的乌尔扎尔。因为中国人不会发“乌尔扎尔”的音，所以他们把他叫做北雅安本。他发现乌尔扎尔的气候太寒冷，于是迁至目前的驻地；中国农民仍然时常错误地用北雅这个名字来称呼目前的这座城市。从前该地区是由郭尔木部蒙古人占领的，他们被称为阿拉图部蒙古人或准噶尔部蒙古人。他们的区域向南伸延至伊犁，被称为准噶尔札，现在这个名称已经废弃不用，但地图上在更偏东的地方仍标志出来。（注意：准噶尔札被分为两部分，一是自塔尔巴哈台伸延至伊犁，二是乌鲁木齐以北地区。）目前，郭尔木人是一个很颓废的民族，我仅在伊犁河流域以南的山区和特克斯河流域遇见过他们。塔尔巴哈台是由两座土城墙的市镇组成的，有一条大街把它们联结起来，大街上全是旅馆和商店。东城被索伦部满族人的移民区所占用，他们来自黑龙江省，还占用了平原上的一些农场。移民区是在该地区被征服的时候建立起来的。有两三个衙门设在西面那座很小的汉城。塔尔巴哈台的人口约四千人，其中将近一半是萨尔特人，而其余的则是从天津和西北各省前来的汉人或哈萨克人。汉人受“厅官”管辖，“厅官”对驻乌鲁木齐巡抚负责。该处还有一位安本，他听命于驻伊犁的满族将军，管理当地的满族人、一千户哈萨克人、土尔扈特蒙古人秦公爵的十四座寺庙（已在第五项中说明）以及郭尔木人的十四座寺庙。在驻伊犁的满族将军和驻乌鲁木齐的新疆巡抚之间对蒙古西部和新疆进行分别管辖的办法，必定是使中国人日益衰弱的一个根源。他们的管辖权经常是重叠的。汉城的北面有一个固定的俄国居留地。现任领事多尔柏齐先生以前在乌鲁木齐和乌里雅苏台，会说蒙古语，

① 公元1760年和1761年。

他很聪明，而且对所发生的事情非常了解。他有两名助手和一名哥萨克卫兵。那里还有一所俄国的邮局。俄国臣民几乎都是萨尔特人。

七、自塔尔巴哈台至伊犁 在最初的六十又四分之三英里的旅程，我们沿着有电报线的大道穿过塔尔巴哈台大平原。在城附近的满族农场上，有几小块庄稼，此外该地区大都是很荒凉的，仅偶尔有一个村庄或驿站，驻有大约六名汉族士兵，这几乎是我们在抵达绥定县之前所遇见的仅有的汉人。

在过了老风口约半英里的地方，我们离开了大道，折向西南，穿过一个更荒凉的平原，该处住着很少的哈萨克人。距迈里山不远，有较多的牧场和哈萨克营地。然后，我们越过乌苏巴拉克山，穿过海拔仅一千七百英尺的艾比湖以西的一个荒凉平原，并越过火吐山（它是塔尔巴哈台安本所辖的地区与新疆省之间的边界），进入了一个更荒无人烟的区域。在七十四又四分之一英里的路上，我们仅经过了三个小的咸水泉。巴罗塔拉距塔尔巴哈台二百零四英里，它的汉名叫“大营盘”。它有二百多名萨尔特人和四、五十名汉人，还有一个札哈部蒙古人（来自张家口附近）的移民区，他们说是在咸丰年间迁来的，但很可能更早得多。他们提供了一些所谓的士兵。我见到过一队士兵，误以为他们是普通的苦力。巴罗塔哈有一块耕种区，大约有一英里宽，一直延伸到巴罗塔哈河流域的中心。种的庄稼是小麦、小米和玉米。

离开这块地方后，经过一座很好的木桥，跨过那水流湍急的巴罗塔哈河，继续向前走三英里，到达另一个荒无人烟的地带。然后，我们穿过那生长着好牧草的博尔塔拉山，终于回到有电报线的大道，距塔尔巴哈台二百四十七又四分之三英里，在荒无人烟的苏台平原上。这里，我们在每一段行程中又遇见了几名汉族士兵（属绥定县的“巡防队”）。在海拔七千零二十英尺的赛拉诺

尔湖周围，有一条很好的道路通往美丽的塔尔奇峡谷（汉名叫“哥子口”），穿过那些八百英尺高的陡峭的小山逐渐往下走，山上长满了相当好的树木，还有林丛和野花，山谷给哈萨克人的羊群提供了牧场。道路往前靠近一条小河，常常有一些维修得很好的小木桥横跨在河上。穿过山谷走了十八英里之后，到达了伊犁大平原。这些地区部分地是由萨尔特人开垦的。卢兆口镇有四、五十家汉人和萨尔特人的土房。

在离绥定县五英里半的地方，道路同甲金特地方俄国电报线路相会合。我没有看见任何鸦片。大路上行人车辆很多。

八、绥定县或伊犁府 俄国人错误地把它叫做“绥东”。它是知府和知县的驻地。它北面没有郊区。城内和近郊有二千多户。在筑有城墙的市内，大都是汉人，主要来自天津，而在城郊及周围地区，几乎全是萨尔特人。比利时天主教会派驻了一位神父（斯坦曼神父），但他们在这里和伊宁都几乎不可能从回民中找到皈依天主教的教徒。

九、新城 它在绥定县东南四英里半的地方，是在起义期间被破坏的怀远城的位置上建立起来的，萨尔特人称之为库拉。它是伊犁满族将军的驻地。大约十年前新疆被改为行省^①，置于驻乌鲁木齐的巡抚管辖之下，此后满族将军的权力大为缩小。汉人和萨尔特人归该省民政当局管理，而满族人、当地蒙古族和哈萨克族各部落归满族将军管辖。在满族将军之下，设有一名副都统。现任副都统系聂国泰^②，当然是满族人，他主管当地满族锡伯部移民区，他们住在新城或在附近平原有移民区。这些锡伯人最初是吉林的一个部落，在一、二百年前才和满族人合并的。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在上次起义中被杀死。

① 新疆改设行省系1884年。

② 译音。

满族将军还任命三名“领队”大臣，他们都是旗人（而且很可能是满族人），通常住在新城。目前，他们是：

（1）穆安重^①，管理郭尔木人。

（2）奎伊^②，管理巴罗塔拉平原的札哈部蒙古人。

（3）富山^③，管理（一）特克斯河流域的阿尔本哈萨克人；（二）伊犁周围加札哈萨克人的几个部落；（三）特克斯河流域吉尔吉斯人的一个小部落。

十、皮革制造厂 它在伊宁西北方偏北约一英里的地方，是满族将军和一位有钱的萨尔特人于1909年开办的。机器是德国的，技工是一位俄国人。最初雇用了一名奥地利的工头，他造出了很好的皮革，但后来他同官员们发生了一般纠纷，于是回国去了。自那时以来，皮革的质量很差。那位比利时神父认为，该制造厂不久就将失败，除非他们迅速找到一位能干的欧洲人担任经理。目前，它的经营是亏本的；满族将军在市场上发行大量的一银两的纸币，企图解除他在财政上的窘境。

自伊宁至喀什噶尔

伊宁是萨尔特的名称，意思是“野羊”；它在汉语中的正式名称是宁远县，但通常称之为金顶寺，海拔二千四百二十英尺。它是伊犁道台的驻地，该道台的管辖权伸展到塔尔巴哈台的厅官。新疆省其余的三位道台驻乌鲁木齐、阿克苏附近的英吉沙尔^④和喀什噶尔。该地设有交涉局，从前称为中俄事务局。伊宁由一座有土城墙的小镇和广大的郊区组成，其中设有商店和贸易区。居民不足三万人，大都是萨尔特人，有少数汉人和一个大的俄国臣民移民区，这些俄国臣民除了俄国萨尔特人和少数俄罗斯

①②③ 译音。

④ 英吉沙尔即“新城”。

人之外，还有诺海人，即来自加山的鞑靼人。

俄国总领事有一支由一名军官和八十名士兵组成的卫队。该处还有俄国邮政局、俄国电报局以及华俄道胜银行的分行。

道台对汉人和萨尔特人享有管辖权，而哈萨克人等则受满族将军的管辖。

该地有一名常驻的比利时神父（拉姆登克神父）。很奇怪的是，从蒙古到天山，哈萨克语是人们交际的通用语言。它同萨尔特语很相似；有一位会说汉语的萨尔特人告诉我：这两种语言中大约有一半词汇是相同的。在天山以南，萨尔特语是各族人民交往的混合语。

一、自伊宁至特克斯流域 我们离开伊宁后，接着到了肥沃的伊犁平原，向东走十五英里，乘渡船越过伊犁河。此地的渡船和伊尔第什河的渡船，是我们在旅途中见到的仅有的船只，虽然特克斯河流域的一些中国木材商人把木材编成筏子漂流到伊宁。这些湖泊或大河中全都没有船只，这是萨尔特人、哈萨克人和蒙古人所表现出来的对进步完全缺乏兴趣的又一事例。

离开渡口后，我们折向南走，越过伊犁平原，那里有一部分是由萨尔特农民（“塔朗齐”）耕种的，一部分则是荒芜的，到了二十六又四分之三英里处，我们进入山区，山上大都是荒凉的，只有很少的郭尔木人（准噶尔部蒙古人）居住。在四十六又四分之三英里处，我们穿过了苏阿苏山脉分水岭的察布查尔关（海拔八千九百五十英尺），在有树丛的小山往下走，到达了特克斯河岸上的阿宁塔盖小镇，距伊宁七十七英里。除了少数郭尔木人的“帐篷”外，该镇大约有五十幢萨尔特人的土房以及二、三家商店。我们在这里离开了通往喀什噶尔的大道，有一座木桥跨过特克斯河。

二、特克斯河流域 我们折向东走，进入特克斯河流域，

经过一座坡度极大而且极不平坦的很原始的桥梁，过河后继续向前走了十六英里。该桥是一名甘肃人和三、四名汉族助手建立的私人投机买卖，没有固定的过桥费。除了吉尔加朗河流域的一位农民之外，这几个人以及特克斯河下游以当工匠和木材商人为生的二十名湖北移民队，是我在天山南面伊宁至阿克苏之间所遇见的仅有的汉人。特克斯河确实是伊犁河的主要支流，但如同中国本部一样，河流每隔几英里便有不同的名称。特克斯河流域大都是牧场，被各部落分别占有，鄂尔木人占用了哥苏东面的那部分。他们在一位名叫苏加塔^①的总管管理之下，该总管住在北面山区中的巴哈州。哥苏河与哥特里河之间的特克斯河流域是阿尔本哈萨克人的冬季住所，他们从南面山区的加拉准高原前来这里。他们在一名总首领（“巴罗”）和三名较低级首领（“总管”）的管理之下。这位叫做姜管事的“巴罗”直接受命于主管新城哈萨克人事务的领队大臣富山，管辖的户数超过七百三十四户。我们有亲眼见到的关于他们缺乏纪律的证据，如一名哈萨克人被带到三名总管面前，被指控为对一名在哈萨克人中间巡回贸易的萨尔特商人进行诈骗。法庭终于变成了总管一伙和被告的朋友们之间的战场。老资格的总管在争斗中眼圈被打得青肿，而且有几处伤痕，争斗结束后被告允许他们把他当做一名囚犯送走，交给伊宁的汉人处理。后来，就是那个总管在租用几匹小马和一个“帐篷”的事情上诈骗我们。

在哥特里河右（东）岸，有一个八十户吉尔吉斯人的移民区，他们和穆札尔特关的一小伙人一起，是天山以北仅有的吉尔吉斯人。他们几乎是和哈萨克人相同的民族，在“帐篷”中过着象哈萨克人那样的游牧生活，在一位总管的管辖之下。目前的总管名叫

① 译音。

梯留柏第^①，是富山指派终身担任该职的。象哈萨克人的首领们一样，他享有鞭打和罚款等次要权力，但重要案件都由富山审理。

自哥特里河左岸沿特克斯河流域直到阿里艾斯河，人民是在一个名叫尤苏普^②的首领（“巴罗”）和九名较低的总管治理之下的哈札哈萨克人，他们管辖的户数各不相同，如我见过的雅帕拉管辖六十户。自阿里艾斯河至穆札尔特口，人民是在正总管和副总管两位首领治理之下的郭尔木人，总管有五名佐领协助，其中四名住在特克斯河以北，名叫巴瓦^③的第五名住在穆札尔特口的沙塔阿玛，他在那里管理十名完全未经训练的郭尔木士兵和大约六十名僚属。在特克斯河上游十英里的艾东盖，另有一个由十名士兵组成的哨所，他们住在“帐篷”内。在特克斯河流域的中国境内和该流域以南的科尔代孟云，有几个俄国哈萨克人的移民区。

在更偏东的特克斯河上，有第三座桥梁，道路在那里自伊宁通往吉尔加朗。特克斯河流域的宽度自六英里至十二英里不等，北面与荒凉的山脉接壤，南面与丘陵地带相邻，这些丘陵地带逐渐增加高度，直到天山主峰常年盖雪的山顶。

三、天山 我们沿着水流湍急的哥苏河走了一小段路程，在特克斯河桥以南七英里处有一座木桥跨越哥苏河。然后，我们折向西去，登上一些丘陵草原，前往加拉云，那里是阿尔本哈萨克人的夏季总部所在地，他们于9月间离开那里迁往特克斯河流域。在继续往西和往南前往哥苏河途中，我们经过了山谷之间的草原，并翻越了那些长满野草的和荒凉的小山。在秋季，这部分地区是无人居住的，但尤尔都斯河的上尔扈特蒙古人在冬季迁到这里来。后来，我们折向北去，前往流入吉尔加朗河流域的小河，发现了加札哈萨克人的另一个住地，共有九百户人家，受一个名

①②③ 译音。

叫布隆齐^①的首领（“巴罗”）和三位较低级的总管管辖。

在更偏北的喀什河旁，也可见到加札哈萨克人，受五位首领（“巴罗”）管辖；在伊宁以北也有加札哈萨克人，受另外五位首领管辖。

吉尔加朗河以南的山上覆盖着云杉树森林，有些云杉树高达二、三百英尺。

继续往西并沿着吉尔加朗河走去，在特克斯河附近有一座桥跨过吉尔加朗河，我们发现阿尔本哈萨克人的另一个移民区，此外还有少数萨尔特人，他们住在土房里，周围有些耕地。走过特克斯河流域时，我们找到阿里艾斯河，哈萨克人在秋季不居住在那里。

四、穆札尔特口 从特克斯河流域到该河流至阿克苏平原的那个地方，我计算长度共有一百零四分之三英里。沿穆札尔特河有一条不陡的斜坡登上阿克苏平原，在各处有八座桥梁跨过该河，道路主要穿过高山之间有云杉树的森林。在库普鲁尔（距沙塔阿玛二十又四分之一英里），我发现在雪地上大约有二十个吉尔吉斯人的“帐篷”。攀登大约一千英尺的雪地，便可到达穆札尔特口的顶端，离入口处三十七又四分之三英里，海拔一万一千四百八十英尺。有一条很艰险的下坡路，穿过两个冰川，在最艰险处有一个小屋，住有四、五名萨尔特人，在冰上凿出踏脚处来，帮助小马下坡。离开这个冰川（穆斯大旺）后，其余是一段不陡的下坡路，穿过光秃秃的高山之间多石的山谷，偶尔经过一个萨尔特人的小村庄，直到“哥勒沙尔”，那是中国人在关口设立的一个“厘金”局卡。

五、阿克苏平原 离开关口后，越过一个荒凉的平原，平

① 译音。

原上偶尔横亘着光秃秃的山脉，有几个萨尔特人的小村庄，我们走了四十六英里，到达自喀什噶尔至乌鲁木齐大道的杰木地方。那里有七、八十家萨尔特人的商店，但仅有两个汉族居民。从杰木到阿克苏二十三英里的平原是相当肥沃的，有萨尔特人的农场点缀其间。平原向南面和西面伸延，逐渐狭小，变得不那么肥沃，并伸入托什干河流域。

六、阿克苏 人们称之为哥勒沙尔（“旧城”），正式的名称是温宿县。它有四、五万居民，除了约一千五百名汉人以及一千名或不足一千名东乡人之外，都是萨尔特人。还有约三百名俄国萨尔特人。汉族知县住在有城墙的小城中的衙门里，它位于满天尘土的大贸易市镇的西面。在南面和西面，有很肥沃的平原，平原上布满了萨尔特人的农场，生长着稻子等农作物。

英吉沙尔（“新城”），正式名称为温宿府，在阿克苏东南方偏南约八英里处，是道台、知府和知县的驻地。它大约有一千名汉人，城内其余的人和那些住在郊区的人都是萨尔特人。

七、乌什吐尔番 它在阿克苏以西六十三又四分之一英里处，隔着一个肥沃的平原，平原上有萨尔特人的农场。这些农场向阿克苏知县交纳贡米。他们和城内的萨尔特人直接受三名首领（“三友”）管辖，这些首领住在阿克苏，解决小的纠纷，但较重要的事情则交给知县处理。驻阿克苏的萨尔特王公没有权力，他们从清朝皇帝那里接受一笔很少的津贴（他们告诉我每年为九百银两，等于一百十二英镑）。

乌什吐尔番有一千八百四十户，几乎都是萨尔特人。他们告诉我：该地仅有一百八十名汉人和一千名东乡人。同知（“厅官”）住在贸易城西边的一座有城墙的小城内。

八、自乌什吐尔番至喀什噶尔 离开乌什吐尔番后，平原逐渐变得不那么肥沃。走完第一段路程（巴什至雅门），即向西

走了二十二英里，该处有一个中国哨所，我们没有见到过萨尔特人。

沿着托什干河流域至苏木塔什，该地区有吉尔吉斯人居住，他们住在土房中，而不是住在一般“帐篷”里。

在距乌什吐尔番六十三又四分之一英里的苏木塔什，我们离开了托什干河流域，沿着荒凉的山区中多石的山谷往上走，经过了一个吉尔吉斯人的小村庄。我们越过距苏木塔什十三又四分之一英里的库尔加瓦什口（海拔一万零八百英尺）和在二十四英里处的阿巴合奇口（海拔一万一千二百八十英尺），然后沿着多石的山谷往下走二十一又四分之一英里，穿过荒凉的克里平原，在二十八英里半的路上仅有一个吉尔吉斯人的村庄，到达皮昌，该处有一个“头目”和大约二十个吉尔吉斯人的“帐篷”。继续向西穿过另一个平原，那里散布着大约六个吉尔吉斯人的“帐篷”村庄；经过一个湖泊的北面，走了六十四英里后折向南去，在荒凉的山区中往下走，前往小托拉苏河旁的朔方加拉尔，该处有一个中国的“厘金”局卡和大约六幢萨尔特人的房屋。这个地区现在又有萨尔特人居住。我们继续往南走八英里，终于离开了山区，向西穿过一个大平原，前往喀什噶尔，南面一望无际。起初农场很少，而且很分散，但在最后十五英里的路上，所经过的地区是很肥沃的，布满了农场、树木和庄稼。

总 结

我很惊奇地发现，新疆汉族的人口竟如此稀少。我从未遇见过大批汉人，除了在大城市里、偶尔在较大的村庄里以及很少几次在路上遇见他们之外。各土著民族（蒙古族）、萨尔特族、哈萨克族以及吉尔吉斯族在人数上大大超过了汉族，但那些民族都很衰弱，因为他们似乎完全缺乏集体精神、爱国心、进步的愿望

和团结力，所以汉人无需害怕他们。自亚伯拉罕时代以来，住在“帐篷”中的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似乎丝毫没有进步。汉人瞧不起那些附属于他们的民族，公开表示他们对那些民族的轻蔑；这种优越感的表现给这些地区的卑下民族留下了深刻印象。各民族如蒙古人与哈萨克人之间存在的敌意，也帮助了汉人。

中国人有一批我所遇见过的年龄最大的官员。必须记住：中国官员是从不积极进行任何活动的，实际上他比年龄相同的英国官员要老十岁。下面提供我在旅途中遇见的十一名主要官员的年龄：

职称	年龄
驻萨拉苏默的阿尔泰安本	60岁以上
营务处总办	64岁以上
驻塔尔巴哈台的安本	58岁以上
驻塔尔巴哈台的“厅官”	60岁以上
驻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	62岁以上
伊犁将军	68岁以上
阿克苏知县	60岁以上
阿克苏道台	64岁以上
乌什吐尔番“厅官”	70岁以上
满族领队大臣(管理特克斯河流域的郭尔木人)	63岁以上
喀什噶尔道台	71岁以上
十一名官员的总年龄	700岁以上

事实上，我所遇见的积极活动的官员仅有：伊犁陆军参将，三十六岁；驻萨拉苏默、塔尔巴哈台和伊宁的交涉局或中俄事务局的委员们；喀什噶尔知府。

英王陛下驻北京公使馆前武官

柏来乐 1911年12月6日于喀什噶尔

第3件 高慎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4月1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随信附上德国舰队司令关于自 1910 年 10 月至 1911 年 10 月胶州湾保护地情况发展的一份报告的摘要,该报告已经在《北德意志公报》上发表。

高慎谨上 1912 年 3 月 28 日于柏林

**第 3 件的附件 德国舰队司令关于自 1910 年
10 月至 1911 年 10 月胶州湾
情况发展的报告摘要**

在我所要考察的 1910 年初,这个殖民地仍遭受着东亚经济危机的影响,在这一年最后几个月中才开始恢复过来。1910 年 12 月,发展又受到挫折,因为发生了瘟疫,仅邻近的山东省就有好几千人死亡,虽然当局为避免这个殖民地遭受传染所采取的措施是完全成功的。不过,尽管有这些不利的情况,经济发展还是很好的。1911 年秋爆发了政治革命,使整个帝国的贸易陷于瘫痪。由于自占领胶州湾以来所采取的政策,这个殖民地遭到革命的影响不如其他大多数地区那么大。自 1912 年初以来,青岛的贸易又显示出相当大的增长,这种增长可望具有持久性。

下面是过去三年间青岛中国海关的收入,单位是马克和海关两:

年 份	马 克	海 关 两
1908- 1909	3,077,978	1,099,278
1909—1910	3,340,459	1,193,021
1910—1911	3,658,256	1,306,520

非中国出产的入口货值,除供铁路和采矿使用的免税器材之外,从去年的 25.9 百万元(约合 51.8 百万马克)增至 28.7 百万元(约合 57.4 百万马克),而中国的入口货值达 4.8 百万元(约合 16.8 百万马克)。出口货值从 1909—1910 年的 29.3 百万元(约合

58.6 百万马克) 增至 32.3 百万元 (约合 64.6 百万马克)。因此, 我所考察的这一年的贸易总值达 69.4 百万元 (合 138.8 百万马克), 而前一年为 64.2 百万元 (合 128.6 百万马克)。

在今年以前, 没有关于德国进口货的统计数字; 过去人们常常说: 德国进口货同英、日、美等国相比所占份额是较少的。现在, 这个说法已被目前的统计数字证明是不成立的。据统计, 自 1910 年 7 月 1 日至 1911 年 7 月 1 日的一年间, 德国的进口货值为 6.8 百万海关两 (合 19 百万马克)。德国进口货主要是针、水泥和苯胺染料。德国还提供修筑津浦铁路的大部分器材, 该铁路现正接近竣工。

1909—1910 年和 1910—1911 年间最重要的出口货是:

	1909—1910 (马克)	1910—1911 (马克)
草帽 纒	22,200,000	14,400,000
落花生	9,000,000	11,400,000
花生油	3,800,000	4,000,000
山东柞丝纒	5,600,000	6,000,000
黄 丝	4,400,000	4,400,000
原 棉	3,600,000
豆 油	1,600,000	3,600,000

这个殖民地的岁入从 4,190,665 马克增加到 5,325,313 马克; 在增加的岁入中, 船坞收入占 797,303 马克, 所以大约有 335,000 马克是由于经济的发展而增加的。

海军当局特别重视的教育机构, 又有了顺利的发展。为德国儿童开办的公立学校, 有一百六十二名小学生入学; 1909 年 10 月开学的德华高级中学, 发展如此迅速, 现已建成第二幢建筑物; 1911 年秋季, 有二百十二名学生进入高级中学。

青岛船坞修造了六艘小汽船、一艘驳船和四座锅炉，都是供私人使用的；巡洋舰队的订货也较去年更多。

德国当局对林业一直是相当重视的，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不仅在殖民地境内，而且在山东腹地所唤起的对这个行业的兴趣，都获得很大的成功。报告最后说：这是德国实业在远东所产生的普遍影响的一个典型事例。

第 5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2年4月5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总司令官和驻上海总领事建议说：如果能够拨出一艘印度海军的运输舰在今后几个月中泊驻香港，将保证在需要时把军队迅速运往上海。

据我看来，鉴于华中地区的形势愈益捉摸不定，该建议似乎是一个明智的预防措施。驻南京领事来电说：该地颇为不安，因为前任总统和总理未付军饷便已离去，这些军队即将发生兵变。

第 6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4月6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报告：3月13日，我收到英王陛下驻广州总领事的一份电报，从该电看来，自3月9日至12日间，广州城内似乎正发生战事。作战双方主要是所谓“民军”与陆军。原因不是很清楚的，但到3月13日，当地政府已经占了上风。由于部队的解散工作已将近完成，所以杰弥逊先生预料不会再发生任何纠纷。因此，人们希望，广州长期的紧张形势已在这个事件中得到解决。

英王陛下总领事又说：外国人的生命财产都没有受到损害。他希望，在本月底以前，能够减少驻沙面的分遣部队。

本月18日，海军中将温思乐爵士自上海来电说：香港军事当局认为，不再有海盗和军队联合对沙面进行有组织攻击的危险，并以为减少驻军，仅保留一百七十名印度步兵，将是很安全的。在该处将保持一支海军增援力量，准备在必要时登陆。

昨天，我电告舰队司令温思乐说：我对拟议中的减少军队一事没有任何反对意见。

朱尔典谨上 1912年3月20日于北京

第7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4月9日收到

阁下：

关于我3月12日的信，我荣幸地附上英王陛下驻成都总领事关于四川省政府与云南分遣部队之间关系的一封信的副本。双方之间进行的互相指责，似乎很可能导致更严重的战争，但由于不再需要派兵北伐，务谨顺先生说：他相信，双方已经开始的谈判，将终于以云南部队撤回他们本省而告结束。云南和四川几乎都不受中央的任何控制；云南部队对四川进行的袭击，大概在一定程度上可由这件事加以说明，即四川是一个富省，它平时提供一部分多余的税收以支持云南。

朱尔典谨上 1912年3月21日于北京

第7件的附件 总领事务谨顺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本月15日傍晚，成都军政府收到他们派遣与滇军首领进行商谈的代表胡景伊等自资州发出的一份电报。该电已于昨日发表，

① 原编者注：参阅《中国第二号（1912年）》，第157件。

大意如下：

“我们到达自流井之后，同滇军司令韩建铎、两个梯团长谢汝冀和李鸿祥、独立团长黄毓成^①等举行了几次会谈。今天，2月16日，签订了一项协定。滇军将于2月22日撤出自流井和贡井，于2月27日撤出犍为盐井工程。他们将同驻叙府、泸州及其他地方的部队一起东下，经襄阳前进，进行北伐。

早些时候由刘启智^②率领派往成都的步兵队应立即开往泸州。请要求刘启智携带他所有的装备，以免稽延。

我们明天开始驰赴成都，作详细汇报。”

今晨，《四川公报》发行了快报，用红纸印刷，发表成都军政府于2月19日收到的南京孙文（孙逸仙）的一份电报的原文：

“清帝退位，民国统一。为纪念民国统一，2月15日将举行盛大庆典。”

由于这项消息到达成都之前那个日子已经过去，所以该报编辑说，本地政府建议于正月十五日，即公历3月3日，庆祝该伟大的事件。

人们也许以为，云南分遣部队既已终于同意撤出四川，现在将要返回云南，因为由于清帝退位，已经没有北伐的必要。但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之前，最好是等待那些被派往自流井的代表们答应提供的关于谈判的详细报告。本月初，滇军与成都军政府之间的关系紧张到了很危险的程度，那时（2月8日左右）军政府都督发表了一个很长的通告，驳斥云南人对他们提出的某些指责。这些指责已通电全国各地，大意如下：

一、成都的“哥老会政府”^③正在奉行一种排斥其他各省人和普遍掠夺的政策。

① 黄毓成的官衔为“骑兵联长”，见《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111页。

② 译音。

③ 原文作“哥会政府”。

二、罗纶正在使成都军政府成为哥老会手中的纯粹工具。仅对那些给哥老会捐献大批款项的人，才答应保护其生命财产。有些人（说明了他们的姓名）被处决或囚禁，因为他们没有钱购买哥老会的职衔。

云南人声称：“现在世界上没有比这更愚昧或更残酷的事情”。他们在向全国宣布成都方面的罪行时说：云南、贵州、湖北、湖南等省的一支大军“准备消灭这些无法无天的反叛者，并为四川人建立一个新的政府”。

另一方面，成都军政府都督指责滇军牺牲了他们所占领的四川的那些部分土地，使他们自己发财致富。“他们对各处盐场横征暴敛，劫夺存放在泸州的二十余万两税款，并运往云南”。都督摘录滇军致云南方面的一份电报（没有泄露该电是怎样落入他们手中的），要求拨给一百支步枪和四万发子弹，但说明“云南方面无需为支付款项而操心”。都督又说：四川在各省中受害最重；他们（尹昌衡和罗纶）无意强迫居民捐献军费，然而滇军缺乏良心，向人们进行敲榨。他们请求中央政府命令滇军立即撤回本省或直接参加北伐。如滇军拒绝此项命令，将证明滇军蓄意破坏四川的完整，或是充当满清的秘密代理人——人民的公敌，其目的是要阻挠对北京采取军事行动。由于滇军“贪婪残忍”，他们正在挑起一场自相残杀战争；如果外国人乘机干涉，象对太平天国首领洪秀全进行干涉一样，那就必须归罪于他们。

当然，情况也许是这样：由于来自北方的共同危险已经消除，曾经在全国如此激烈地互相攻击的敌对双方，对互相厮杀一事将不再受任何约束，甚至不受担心外国干涉的约束。但是，总的说来，我倾向于认为，他们之间的互相攻击将被制止，滇军现将撤回本省。

务谨顺谨上 1912年2月21日于成都

第8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4月12日收到

阁下：

在宣布成立全国共和政府以及人人享有平等权利之后，虽然在北方的北京和南方的广州所发生的事件表明军事纪律已彻底破坏，但汕头上演的一幕插曲证明新制度下的民政当局完全缺乏团结和统一，而且后来引起了更严重的骚乱。

骚乱起源于1月间一个名叫郑宏谔^①的人抵达汕头的时候，他被广州新任都督委派接管汕头地区的最高指挥权，以便联合新共和政府中互相敌对的广州派和客家派。然而，郑宏谔没有达到这个令人向往的目的，仅仅使他本人成为不受双方欢迎的人，因为他曾经迫使双方的首领前往广州。不久，就流传一个谣言：郑宏谔将由一个名叫林志成^②的人接替，林志成为了把军队自广州运至汕头，正租用一艘轮船。

得到这个消息后，在汕头的商人和居民中间引起了很大的激动情绪，他们在尚未承认来自广州的另一位行政官员之前，立即与郑宏谔共命运，表示决心采取他们力所能及的一切措施，防止林志成及其“海盗式的远征队”登岸。

2月14日，他们从广州方面获得消息证实，林志成即将率领一千二百名军队，乘坐一艘特别租用的一千四百五十吨的英国“江州”号轮船，动身前往汕头。郑宏谔集中了一支约四千人的战斗队伍阻止登岸，并命令各炮台开火，如果该轮船力图驶入该港。

15日清晨，英王陛下领事接待了商会成员们的访问，他们请求他为缓和局势做些事情。窦尔慈先生回答说：他不关心林志成

① 译音。

② 译音。

与汕头人民之间的任何分歧；在这件事情上使他关心的只是该船只的国籍；他将采取他认为是可取的一切措施。当那天下午人们向“江州”号轮船发出信号的时候，英王陛下领事因此乘坐“两面神”号轮船气冲冲地向“江州”号驶去。窦尔慈先生登上“江州”号轮船，把情况通知船长，并告诉他说：除非能够安排和平登陆，他将不得不命令该船开走。接着，窦尔慈先生派人去叫林志成，把问题向他作了充分说明，警告他说：他不能够让一艘悬挂英国旗帜的船只冒任何危险。林志成获悉汕头准备对他进行“热烈接待”时，表示很惊讶，并建议：如果该船的国籍是英王陛下领事干涉的唯一理由，那么，用新的民国旗帜代替红色旗，便可以克服那个困难。窦尔慈先生在拒绝接受后面这项建议时，表示愿意协助达成一项和解。在他的要求下，林志成委派两位部下陪他返回汕头，试图和郑宏谔进行商谈。

次日早晨，林志成的两位代表没有象他们所答应的那样，向英王陛下领事汇报，于是英王陛下领事派遣一位使者去询问郑宏谔，郑宏谔答复说：他已明确地通知他们，他将抵制林志成及其部队方面登岸的任何企图。这个决心得到当地商会的进一步证实，因此窦尔慈先生向“江州”号轮船发出信号，要它驶离该口岸。

我已向窦尔慈先生表示，赞同他处理这个事件的明智态度。

林志成在汕头登岸的企图失败后，命令“江州”号船长把他送至惠州府西南约八十五英里的黑子钦湾^①登岸，他似乎确已被派往该处。但是，林志成本人是一个客家人，不满足于留在那个地区。3月11日，窦尔慈先生来电说：林志成与郑宏谔的一伙人在离汕头十英里的地方正进行激烈战斗，郑宏谔一伙人已被驱逐回去。3月20日，英王陛下领事又来电说：经过在汕头城继续发生的战斗之后，林志成的客家部队已击败郑宏谔一伙，不过，他们

^① 译音。

在潮州府仍然是很强大的。幸亏混战时没有伤害外国人，但许多外国人的房屋被子弹所毁坏。

领事团听说广州方面将另派一千名部队前往，所以致电该口岸临时当局，警告他们关于这一行动所引起的危险。但是，广州象其他许多地方一样，也已遭到士兵过多的危害，对于有机会把一部分士兵运往另一口岸一事，大概将感到非常高兴。在这种情况下，我要求总司令官目前在汕头附近泊驻一艘炮艇。

朱尔典谨上 1912年3月26日于北京

第9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4月15日收到

阁下：

附上英王陛下驻南京领事的信，它说明目前构成一种普遍危险的情况。到处都有成群结队的骚动的士兵，叫嚷发放欠饷。一个地区把这种危险转移到另一地区，只不过发现它反过来又从另外某个地区得到一种类似的危险。广州方面把那些海盗和顽固不化的暴徒运往上海和南京，他们又从那里被运往烟台，而烟台正叫嚷要尽快地摆脱他们。我每星期都把各领事要求解散那些骚动的“游客”的紧急呼吁递交总统，但由于缺乏款项，使他不能够提供很多援助。局势愈益恶化。

关于成立政府的各种困难迄今尚未解决；唐绍仪及其内阁是否回来仍然有些捉摸不定。总之，目前的局势显然是令人沮丧的。

朱尔典谨上 1912年3月29日于北京

第9件的附件 伟晋颂领事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昨天，我曾荣幸地电告您：驻南京的大批未发军饷的部队，

正使本地的中国人感到很大的不安，他们担心，类似北京的那种骚乱可能在城内随时爆发。就我所知，粤军是唯一发足军饷的部队。驻南京的其他部队，包括浙江、江西、湖南等省部队以及本地招募的士兵在内，都欠有二至四个月的饷银；虽然人们表示喜好他们甚于喜好他们的华南同伙，但绝没有因此而减少他们的不满情绪。本月17日，发生了两次小的兵变：一次发生在江西部队中间，他们杀死了两名军官；另一次发生在总统自己的卫队中间，它是由江苏士兵组成的。这两次兵变都因给士兵发放部分现款而平息下去，那只不过是鼓励其他未发饷的部队仿效他们的榜样。欠付士兵的饷银显然是由于北京进行的借款谈判出现了障碍，使袁世凯不能够把他许诺南京政府的那部分借款汇往南京。驻南京及长江对岸浦口的部队总数，估计为两万人，其中有三、四千人是为粤军。

上周初，南京方面收到了袁世凯提出的关于他的内阁的部长名单。临时参议院对好几位人选认为是不满意的，然而，它决定在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的决议之前，等待唐绍仪到达。同时，它通过了一项决议案，把各部的数目从袁世凯所主张的十二个部减至十个部，即取消邮电部，并把工业部和商业部合并为一个部。

在临时参议院中大概将引起激烈争论的是提名段祺瑞担任陆军总长。上周在南京举行的一次军官会议上，起草了一份反对任命段祺瑞的抗议书，并递交临时参议院。他们没有建议由谁来担任他的职位，但大家都知道，此地的军队是赞成黄兴留任的。

在唐绍仪到达以及对内阁作出最后任命之前，孙逸仙博士仍继续担任总统，并以总统的资格发布命令，所以目前中国的状况是有两位总统以及有一位处于隐蔽地位的皇帝。看来也有可能：这个国家在若干时间内也许还继续有两个首都，因为在临时参议院内反对把政府迁往北京的意见正逐渐增多。他们无疑地将作

出努力，保留南京作为首都，虽然他们对于总统，也许还有外交总长，把办公处设在北京一事，将不提出异议。

孙文博士与南京地方议会之间关于任命该地民政长的斗争，以这位前任总统的彻底失败而告终，他不仅被迫接受方乾^①先生的辞职，而且不得不任命由该议会提名的人继任。现在，孙文博士与设在苏州的省议会发生争吵，该议会已选举南京和苏州的代理都督庄蕴宽担任实职，尽管南京政府强烈暗示对他的任命是他们难以接受的。庄蕴宽先生提出辞职，但省议会不仅坚持要他留任，而且要求任命他担任全省都督，据说黄兴渴望获得这个职位，而目前的南京城防总监徐绍桢是该城绅商所赞成的这项职位的候选人。他们认为，如果政府北迁，徐绍桢是唯一能够维持南京秩序的人物。我应当说明，徐绍桢将军是以前驻南京的第九镇统制。他不是一个人具有特殊能力的人，但由于他一直很受他的部队的欢迎，所以人们认为，他比其他任何人能够更好地把部队置于控制之下。

伟晋颂谨上 1912年3月19日于南京

第10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4月15日收到

阁下：

我在2月14日的信中^②，曾经谈到最近西江上盛行的对英国船只的海盗袭击以及普遍的无法无天的状态。

我荣幸地送上海军中将温思乐爵士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封信及其附件，您从中将会看到：当问题在于对这些土匪采取行动时，中国的巡逻艇队是完全无用的。

① 译音。

② 原编者注：参阅《中国第三号（1912年）》，第130件。

在写给袁世凯的秘书的一封信中（一并附上其副本），我要求给广州方面发布训令，要它采取适当步骤改善这种局面。然而，我担心：目前北京政府对南方仅有很小的控制权；袁世凯发给该省当局的任何电报都不会大大改善这种悲惨的状况。英王陛下驻广州总领事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说：自年初以来，在香港附近对英国汽艇和领有执照的帆船进行海盗袭击的约十起案件，已经引起地方当局的注意。在大部分案件中，看来袭击来自岸上的和来自当地帆船上的一样多，而且毋宁说是属于“土匪行为”，而不属于“海盗行为”。

朱尔典谨上 1912年3月20日于北京

再者：写了上面那封信之后，我从蔡廷干那里收到了袁世凯于3月30日发给广东都督的一份电报的副本，我荣幸地附上该电的译文。

朱尔典又及

第10件附件1 海军中将温思乐爵士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为了供阁下阅读起见，我荣幸地送上一封信，该信叙述了中国巡逻艇队在西江上的活动。我特别请求您注意分遣舰队指挥官所附的说明信。

我把所有的鱼雷驱逐舰和江面炮艇都用于巡逻上；如果能够迫使新政府改善情况，我将感到高兴。

对目前西江上发生的事情，“土匪行为”这个词似乎比“海盗行为”更加适用：我认为，在沿江某些地方驻扎一些可靠的部队，将立即制止这种骚乱。

现在，我已把我所有的船只用于这种巡逻上达三个月以上，

认为现在是中国人制止这种骚乱的时机。

温思乐谨上 1912年3月16日于上海“花神”号

**第10件附件2 分遣舰队指挥官艾尔斯致
海军中将温思乐爵士函**

阁下：

这份报告说明目前中国巡逻艇队的价值。人们总是见到它们尽快驶离任何骚乱地点。

艾尔斯谨上 1912年3月9日

**第10件附件3 海军上尉厄普彻致驻广州
高级海军军官函**

先生：

我荣幸地报告下列事件。

2月29日星期二傍晚，由于“泰安”号轮船的货物早已抵达，所以该船于下午六时驶往香港，由中国的大炮艇护航。

“安利”号轮船的货物很晚才到达，所以我于下午七时跟着它一起前往。在离合流处不远的地方，我看见几艘拖船、中国炮艇和鱼雷艇以及“泰安”号轮船驶回来。在经过的时候，“泰安”号轮船船长告诉我：石龙^①城外有大批海盜，他被迫驶回，炮艇也是如此，但他没有遭到袭击。

接着，我告诉他跟我走。我在几艘轮船之间鼓轮慢慢驶去，对岸上开着探照灯，但在周围看不见任何东西和任何人。

当我们在归途中驶过的时候，一切都很平静。

^① 译音。

下面是我昨天从“泰安”号轮船得到的说明。

当驶近石龙的时候，他们看见前面有一艘拖船，岸上有一大群人跟着它，对它开火；那群人在靠近“泰安”号轮船时，对“泰安”号开了两三枪。

那艘总是停泊在城外的鱼雷艇，当时开足马力驶了过来，在经过的时候高声叫喊要他们转过头去，并这样告诉该炮艇。它们都这样做了，炮艇首先转头，当它回驶的时候，用一挺机关枪进行了两次扫射。

当再度抵达合流处的时候，炮艇建议说，“泰安”号轮船应当再转身驶过它们，但领航员拒绝接受，船长等候我来。

就我所能查明的情况来说，鱼雷艇在开火开始后，未放一枪一弹，立即逃走；炮艇虽然确曾开火，但最初却似乎不愿意继续向前驶去。

厄普彻谨上

1912年3月3日于江门“035”号英国鱼雷艇

第10件附件4 备忘录

英王陛下公使收到英国舰队司令的一封信，申诉：在广州上游的西江上常常发生海盗和土匪行为，中国当局所采取的镇压措施是不够的和无效的。

英国驻西江的高级海军军官报告说：有好几次，当英国船舶被海盗拦截的时候，负责巡逻这些水域的中国炮舰没有提供帮助，而是以全速驶离骚乱地点。舰队司令又说：在这些不法活动中，岸上的土匪同江面上的海盗一样起了重要作用。他建议：在西江两岸派驻几支可靠的部队，可能制止这些暴行。

朱尔典爵士希望，对广东省当局发出电令，采取适当措施，迅速改善这个严重局面。

1912年3月30日于北京

第11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4月15日收到

阁下：

关于我2月14日的信^①，我荣幸地随信附上黑德爵士对上个月各省情况所作的概述，这些情况是在其他场合没有向您报告的。

朱尔典谨上 1912年3月31日于北京

第11件的附件 黑德爵士所作的概述

由于有大批缺乏纪律的部队等待解散以及缺乏款项给他们发饷，遍及全国的普遍不安状况，已经在另外几封有关各地区的信件中作了汇报。然而，仍有几件事情可以在这里作简要的概述。

最主要的事件是在城陵矶与岳州之间对英国“沙西”号轮船的开火，它位于扬子江与洞庭湖的汇合处。据说，在该轮船行驶于这两个地方之间的一小时内，对它射击了约八十发子弹，但幸亏没有造成损害。地方当局在接受英王陛下领事的抗议后，立即表示歉意，并采取了迅速的行动。在这个事件中，正象迄今所发生的其他几起骚扰外国人的事件一样，似乎仍没有憎恨外国人的迹象。然而，由于部队中所有的纪律都已破坏，显然存在着危险的局势。

经德瑞先生自九江来信说：对将来普遍存在没有把握的情绪，已使贸易在很大程度上陷于停顿，并在人们的头脑中造成焦急和紧张的感觉，一旦谣传有部队自其他地区前来的时候，这种感觉很容易发展成为恐慌。本地政府缺乏稳定性，地方官员丝毫不享有人们的信任。

^① 原编者注：参阅《中国第三号（1912年）》，第130件。

英王陛下领事在发自梧州的一封信中说：在整个梧州、潯州、柳州等府，土匪行为和不法活动是很普遍的，程度上比1905年的起义期间要大得多。主要的劫掠行为是袭击贺县和藤县县城，以及在容县发生的一次战斗中谋杀该县的知县。在对贺县的袭击中，因有附近官员参与其事，土匪们得到了帮助。科尔斯先生又说：地方行政当局因对待囚犯和嫌疑犯所采取的野蛮和专横态度而使它自己不得人心，同时又由于它应付局势时所表现的软弱无力而受到了人们的普遍轻蔑。在江面上行驶的本地帆船为了保证安全通过起见，按照它们所载货物的多少，向土匪们交纳固定的通过税，一般货物的出境税率为每百担二元半，相同数量的大米则为五元。

目前最令人烦恼的省份之一似乎是山东，因为当局已使它成为南北哗变部队的倾泄场所。英王陛下驻烟台领事报告说：在该省北部，大约有一万名各式各样的部队，当局毫无办法弄到款项给他们发饷。到本月底，局势已变得很严重，所以驻烟台领事团采取措施，抗议大批中国士兵进入外国人的居留地，他们漫不经心地摆弄武器是使外国人士感到惊慌的原因。3月24日，朱尔典爵士也把此事提请袁世凯注意，力劝将这些部队撤出外国人的区域。烟台现泊有美国的两艘军舰和一艘运输船，它们泊驻烟台迄今制止了一次真正的骚乱；英王陛下军舰“飞马”号已奉命时常自威海卫访问该地。

第12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4月22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附上英王陛下驻南京领事的一封信的副本，该信送来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原文译本。这部约法将适用到国会起草的一部永久性的宪法代替它为止。人们希望，

国会将在一定的时候根据适当规定的选举权选举产生。

南京临时参议院正遭到极为广泛的批评，因为它无权被认为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机构；人们迫切要求按照临时约法第三章的规定召集参议院。参议院将制订国会的组织及选举法，国会将在临时约法公布之日起十个月内召集，那时将着手起草中华民国的永久性的宪法。

毫无疑问，在管理各民族方面所作的巨大变革，常常是那几个超过他们本国广大同胞智力水平的领导人的工作，但是，很难相信，象临时约法中所规定的各种共和制度，适合于蒙古人、西藏人以及绝大多数中国人的需要。南京临时参议院的教条主义原理与他们的实际活动之间的对比，足以使人们对管理中国的那些新人物的能力产生严重的疑虑。目前，只有总统的命令才是具有效力的法令。

朱尔典谨上 1912年4月3日于北京

第12件附件1 伟晋颂领事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我荣幸地附上临时参议院^①所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一份译文，它是此地外交部惠予提供的，因此可以被视为半官方的。

临时约法中对总统、各部和参议院的权力都规定得很不明确，将来很可能是经常产生争议的根源。例如，临时参议院已把新内阁由袁世凯总统而不由国务总理选定一事作为例外情况，因为根据临时参议院宣读的临时约法，这项职责是归于国务总理的。人们还认为总统有过错，因为临时参议院已决定设立十个部便已足

① 原文作“国会”。

够，他却把各部的数目增至十二个。这些无疑是很容易获得解决的分歧，但它们只不过是性质更严重的其他分歧的前奏，这是非常可能的，因为随着总统、各部和临时参议院之间夺取最高权力斗争的开展，那些分歧是必定会接踵而来的。

自从我上次给您写信以来，军队没有再发生骚乱，但由于北京的款项迄今还没有汇来，局势仍然是有些危急的。就我所知，士兵们已被说服等候唐绍仪回来发饷。有人告诉他们，唐绍仪将带来很多款项，足以满足他们的全部要求。人们希望，他们将不会感到失望。前几天，城内军队的人数已经增加，因为由广西前布政使和都督王芝祥统率的广西、贵州两省士兵约两千人已抵达此地。王芝祥将军虽然是一位民政官员，但他作为一位军人享有很高声誉，是镇压1905年广西起义的将领之一，人们谈论他今后将担任他的原籍直隶省的都督。他也可能担任陆军总长，因为他似乎是具备担任该职务所必需的各项资格的唯一有声望的高级官员，很可能被南北双方所接受。

现在，津浦铁路全线每天行驶两列火车，即从浦口开往该路与德国路段相接的地方。该路仍严重缺乏车辆，因为张勋将军不顾此地政府的抗议，迄今没有退回他所带走的车厢和货车皮。最近已任命一个名叫陶勋^①的人担任新的总办。

伟晋颂谨上 1912年3月21日于南京

第13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4月20日收到

阁下：

关于您2月6日的信^②，我荣幸地报告：拟议中的对外务部

^① 译音。

^② 原编者注：参阅《中国第三号（1912年）》，第91件。

结构所作的修改，已及时地获得所有缔约国的同意。根据这项修改，外务大臣今后可以由皇室亲王以外的人担任。

这里，我可以这样说：最近，外务部已更名为外交部。

朱尔典谨上 1912年4月4日于北京

第14件 陆军部致外交部函

1912年4月23日收到

先生：

一、英王陛下驻北京公使在1912年4月5日的电报中提出建议：应在香港泊驻一艘印度海军的运输船，以便在紧急时能够运送部队前往上海。我奉陆军委员会之命，就此事写信给您。

二、我应通知您：陆军委员会已就此事同印度部商量，并已弄清楚，在中国水域泊驻一艘印度海军运输船的费用，除了自印度往返航行所需的煤炭费之外，每月至少为三千六百英镑。

三、接着，又同海军部磋商，关于在香港租用船只究竟需要多少时间，以便在紧急时运送一支可能有理由派遣的部队前往上海。驻香港分遣舰队指挥官答复海军部关于这个问题的询问说：可以在两三天内作出这种安排。

四、我应询问：在这种情况下，外交大臣是否认为必须执行朱尔典爵士关于在香港泊驻一艘印度海军运输船的建议。

沃德谨上 1912年4月23日于白厅陆军部

第15件 格雷爵士致朱尔典爵士电

1912年4月23日发自外交部

关于您4月5日的电报。

陆军部建议说：遇有紧急情况时在香港当地租用船只，以代替在该处泊驻印度海军的运输船，因为泊驻运输船每月需费

三千六百英镑，不包括煤费在内。

驻香港分遣舰队司令报告：可以在两三天内获得足够的船只。

请查明总司令官及英王陛下驻上海总领事关于这项建议的意见，并发电报告告诉我。

第 16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4月26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随信附上外交部写给我的三封信的译文，那些信分别宣布：新内阁的组成，任命胡惟德暂代外交总长，以及外交部门的汉文名称由外务部改为外交部。

关于最后那个名称的更动，说明这一点就够了：从文学观点看来，名称改得好，因为用“外交”这两个字代替“外务”，消除了可能加之于“外务”这个措词的任何不庄严的意义。

3月30日宣布组成的内阁，体现了那种兼有南北双方提出的人选的尝试。由于各派之间发生了许多争吵，耽搁了内阁人选的产生。甚至还很不清楚，被任命的所有人士是否将接受职务，但人们觉得，如果不冒削弱临时政府已经很不巩固的地位的严重危险，便不能够再继续延期宣布那些人选。

关于各部的数目，应注意的是：以前的商部已被划分为农林部和工商部，而藩属部已完全被取消。后一变化是很重要的，因为它表示想要把蒙古和西藏变成民国的组成部分。

目前，只有内政总长和陆军总长在北京。国务总理不久可望到达，其余的总长大约在两周后到达，但他们究竟需要多久的时间才能够组成协调一致的行政机构，仍有待于观察。的确，当内阁一旦终于获得通过后，孙逸仙于3月29日晚上便立即正式辞去他的临时总统职务，但民军总司令黄兴没有同样表示将个人野心

服从于公共福利的意愿，他目前的态度很可能与联合政府的命运有重要的关系。

您将看到，在3月30日的那封短信中，黄兴的名字是作为参谋总长出现的。这项任命似乎是对他的不满情绪所做的一种安抚，因为总统已拒绝他而支持北方将领段祺瑞担任陆军总长的职务。总统于同一天发布的一项命令，用奉承的词句怂恿他专心致志地处理两江军务。

这显然不足以平息南方的这位煽风点火的人，因为第二天总统发布的另一项命令指派黄兴担任南京留守府将军，继续全权指挥南方各军，而参谋总长的职务给予了另一个被提名的人，但他立即拒绝接受，所以这个职位仍然空着。

这似乎表明：在全国的民政管理方面无论怎样表示接近统一，目前把南北各军合并于一个首领之下是行不通的；由于军事因素仍控制着局势，所以承认南京有一位军事独裁者也许是充满严重后果的。

朱尔典谨上 1912年4月8日于北京

第17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4月26日收到

阁下：

关于我本月8日报告民国新内阁组成的信，我荣幸地随信附上英王陛下驻南京领事关于同一问题的函件。

伟晋颂先生提到关于任命陆军总长和任命黄兴将军担任南京军队总司令问题上所产生的困难。

黄兴系湖南人，自离开学校以来便和革命运动发生联系，在过去十二年或更长的时间内与革命的秘密计划有牵连，是中国留日学生中的领导人物之一，他们曾经组成一个反对俄国侵略满洲

的同盟^①。他返国后，成为一个青年进步党派（在湖南称之为“华兴会”）的首领，在革命派组织中与孙逸仙有联系。总之，现年三十九岁的黄兴是一位实干家；人们将带着不安的情绪注视他目前在南京的活动。

朱尔典谨上 1912年4月11日于北京

第17件的附件 伟晋颂领事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按照袁世凯总统与南京政府之间达成的协议，国务总理唐绍仪于上月24日到达南京，同此地当局讨论拟议中的联合内阁以及获得临时参议院对联合内阁的批准。袁世凯总统以前曾经把新总长们的姓名电告孙逸仙总统，但因为南京方面认为其中几项任命不满意，而且由于临时参议院把各部的数目由十二个减至十个，从而必须从名单上划去两个人的姓名，所以直到上月^②29日内阁才终于由唐绍仪安排出来，对此袁世凯总统和南京政府都表示同意。正如我在上月19日的信中妄加揣测的那样，关于陆军总长的任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此地军方对段祺瑞将军的反对意见如此强烈，所以他获得此项任命的机会似乎是很小的。然而，反对意见终于被克服，理由是：前陆军总长和可供选择的候选人黄兴将军在南京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要在军队中维持秩序的话；因此，即使他获得此项任命，他也不可能前往北京。为了补偿他的不满情绪起见，已任命他担任参谋总长和南京军队总司令。南京的海军人士强烈反对任命蓝天蔚将军为海军总长，因为他不是一位海军军官。后来，这个职位给予了萨镇冰提督，但遭到他的拒绝，最后给了舰长刘冠雄。

① 指1903年留日学生成立的“拒俄义勇队”。

② 原文误为“本月”。

新总长的名单已提交临时参议院批准，临时参议院为此于上月29日晚上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除被提名为交通总长的梁如浩先生之外，所有候选人都获得临时参议院批准。我没有听说反对梁如浩先生的理由是什么，但有人告诉我，国务总理因梁被拒绝而感到极为痛心。在提名另一个人选担任该职位之前，唐绍仪先生将兼任国务总理和交通总长的职务。

人们都承认，新内阁是袁世凯总统的一个胜利。内阁中所有较重要的职位——国务总理、陆军总长、财政总长、内务总长及外交总长——都由他自己所提名的人担任。他们对我所作的解释是：国家的命运既然已置于袁世凯手中，只有让他选择在执行政策中充任他的主要工具的人们，才是公正的。对于各总长的才能，南京方面抱有极为分歧的看法。没有人认为该内阁是很理想的，但人们以为它是在这种情况下所能期望的满意的内阁。然而，普遍的意见是：目前这个内阁的结构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它只能存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在此期间总统这样的人物将控制内阁，他是政府中享有人民信任的唯一成员。

关于内阁和临时参议院迁往北京的问题，迄今还没有作出决定，临时参议院将在本周召开的一次特别会议上进行讨论。反对他们撤离的意见仍很强烈，虽然看来没有人怀疑：鉴于绝对需要有一个唯一的权力中心，整个政府必须终于北迁。在那种情况下，黄兴将军将作为最高军事首脑继续留在南京，而任命一位都督主管该省的民政事务。现在，对于都督的职位有三位候选人：南京城防总监徐绍楨将军；前任内务总长和以前驻苏州的巡抚程德全先生；现在的江苏都督庄蕴宽先生。前两位是孙逸仙总统推荐担任该职的，而最后那位是省议会推荐的候选人。

唐绍仪先生在向临时参议院宣布内阁各总长名单时发表的演说中，还提到政府的财政困难，迫使它必须举借外债，虽然他仅

讲得很简要，而没有说明细节。

上星期，由于又有几千名粤军和浙军自北方回来，所以南京的部队人数有了增加。不过，他们正在进行安排，在今后几天内把所有的粤军约九千人送回他们的原籍。昨天已有两千名粤军离去，今天又将有人数大约相等的粤军开走，太古洋行的两艘船只已被专门租来运送他们。不幸的是，由于没有款项付饷，把任何其他部队解散或送走都被认为是不可能的。

孙逸仙总统将于今天把总统关防移交唐绍仪先生。他已延至本星期三、四离去。我知道，孙先生打算把今后几个月用于在全国演讲共和主义，演讲结束后他很可能将重渡政治生涯。

伟晋颂谨上 1912年4月1日于南京

第18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4月26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随信附上英王陛下公使馆武官写给我的一份报告的副本，该报告是关于最近中国军队中发生兵变的情况的。

朱尔典谨上 1912年4月11日于北京

第18件的附件 韦乐沛中校的报告

上月份，我接连不断地收到中华民国各地关于部队方面发生兵变、抢劫和不遵守纪律情况的报告。

现将那些主要事件简单地列举如下：

在江苏镇江，英王陛下领事于3月1日报告说：一支称为“振兴队”的混合地方部队已失去控制，并制造骚乱。

在山东济南府，第五镇和地方部队自春节以来便已经很难控制，他们进行抢劫，奸污妇女，普遍不守秩序，继续胡作非为，

直到3月2日马龙标^①将军前来统率第五镇为止。

在四川重庆，大约有两三千名滇军于3月初到达。由于他们沿途抢劫和为非作歹，所以自从他们进入四川省以来，各地都对他们关闭城门，人们用三十万两款项收买了他们。

在直隶保定府，陆军第二镇和第六镇于3月2日发生兵变，开始纵火抢劫。各种部队，无论是新兵和老兵，甚至包括警察，似乎都参与其事。第二镇大部分哗变的士兵化整为零，在农村地区进行抢劫。

在直隶石家庄，第三镇士兵和前任山西巡抚张锡銮的亲兵于3月2日夜間哗变，并抢劫地方，包括一些外国人的财产在内。

在直隶天津，城内于3月2日夜間十时左右开始纵火抢劫，这是来自北京的第三镇逃兵会同天津消防队、地方团练以及一群最低阶层的暴徒们干的。骚乱活动通宵未停。他们纷纷朝天开枪进行恫吓，但很少有人死亡；其目的显然是抢劫，而不是暴动。德国医生希利耶在城内进行救护工作时被枪弹击中丧命。值得注意的是，绅士们向外国部队吁请援助。

在江西九江，军队中于3月4日发生骚乱，因为他们与地方革命首领之间有分歧，但实际上很少有抢劫或骚动行为出现。

在广东，一些驻香山的部队于3月5日拒绝解散。

3月8日，“澳字营”被解散后，接着发生了战斗。

3月9日，“陆军”与“民军”之间开始发生严重战斗，持续到3月12日为止。据说打死了大约一千二百人至一千五百人，其中三分之二是平民。

叛兵与驻黄埔和虎门炮台的政府军队又于3月19日和20日发生战斗。在珠江三角洲，海盗猖獗。

^① 马龙标的正式官衔为“山东护军使”。

在山东泰安府、兖州和韩庄，据英王陛下驻济南府领事报告，张勋将军的部队（您会记得，他们是从南京和徐州府北上的）已彻底破坏津浦铁路线上的交通，他们在泰安特别不守纪律。还听说土匪行为在鲁西南极为盛行。

直隶西陵附近的易州，据说于3月9日遭到“地方部队”的抢劫。

在江苏镇江附近运河沿岸的扬州，英王陛下驻镇江领事于3月12日报告说：徐将军^①和他的士兵（大部分都是旧式“地方部队”）约一万人公开哗变。

在西藏，藏军与汉族部队之间于3月16日在江孜与西卡子^②之间的白马江^③发生战斗，汉族军队在战斗中被击败。

3月28日，藏军与汉族部队之间又在江孜附近发生战斗，结果是汉族部队投降和缴械。

在上海，据舰队司令温思乐报告说，自南京送往该处解散的革命军（广东和山东部队）于3月18日在城内发生骚乱。其他的部队被调来对付他们，并对他们开枪，打死三人后，他们才投降。

在广东汕头，据说来自广州的部队于3月20日对该城进行抢劫。

在山东青州，陆军和地方部队于3月23日开始纵火劫掠。他们抢劫了邮政局和大约五十家钱庄、商店等。不过，他们没有对人们采取暴力行动。旗兵和其他部队被用来对付抢劫者，但似乎与他们达成了某种协议，因为仅有一人被杀死。

在陕西西安府，3月23日在自北京调来的部队中发生兵变。据说有两千人在附近村庄进行抢劫。城内的外国人安然无恙。各城门均已关闭。

① 疑指徐宝山。

②③ 译音。

在江苏苏州，士兵们于3月27日在城内开始纵火抢劫。各城门均已关闭。听说官员们都已隐藏起来。

3月30日，英王陛下驻上海总领事报告说：骑兵团仅剩下一百人，其余的都已带着他们的赃物解散。他又说：仅由于叛兵们没有得到枪弹闯进城门，这座城市才得幸免。

在山东烟台，这个月始终驻有来自南方的一大批毫无纪律和难以控制的部队（约一万人），他们对外国人采取无理行动，以及他们漫不经心地处理他们的武器，对该地的和平是一个经常的威胁。都督公开声称：如果没有筹到款项支付军饷，烟台便将发生兵变和抢劫。此外，据说医院内的士兵们总是谈论时机到来时，便开始抢劫。

关于甘肃，4月3日发自西安府的一份电报谈到“甘肃发生的严重骚乱”。

4月4日，英王陛下领事自南京来电说：由于国务总理和前任总统孙逸仙离去而产生了很大的不安情绪；部队逐渐哗变，他们仍未发饷。

应当提到，上述所有那些缺乏纪律的事例，都是在2月29日北京兵变后发生的。在前几周内，还报告了许多其他的事例，例如：滇军、黔军与川军之间的不和和战斗，“西藏边防军”中汉族陆军的哗变，江西部队对城市的劫掠，以及到处发生的不法行为和土匪行为。还必须提到对甘肃宁夏府的洗劫以及新疆发生的骚乱和战事。

在所有这些不法行为和骚乱活动中，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事实，即对外国人的生命财产表现出几乎普遍的尊重，而且一般不存在排外情绪。的确，对于这项普遍规律，是有一些令人遗憾的例外情况的，但基本上可以这样说：革命党人和清方人上一样，对外国人所表示的尊重达到了几乎令人惊讶的程度。

武官 韦乐沛 1912年4月6日于北京

第 19 件 海军部致外交部函

1912年4月26日收到

先生：

我奉海军部各长官之命，附上驻华总司令官本月26日关于英国驻汉口武装部队的一份电报的副本，以供外交大臣参考。

副本已抄送陆军部。

格林谨上 1912年4月26日 海军部

第 19 件的附件 驻华总司令官致海军部电

1912年4月25日发自上海

关于驻汉口的武装部队，已命令皇家工兵和皇家炮兵返回香港，仅留下一百名步兵。此事曾与英王陛下驻北京公使磋商。

第 20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2年4月26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关于运输船泊驻香港一事。收到您4月23日的电报。

英王陛下驻上海总领事来电如下：

“鉴于所说的那些开支，总司令官同意放弃该项计划。他建议：指示分遣舰队指挥官安排船只，以便需要时可以随时立即租用。

我认为：如果本地发生骚乱，事前是不会有预兆的，我们将必须依靠当地的部队；如果发生其他动乱，将有充分的预兆。”

第 21 件 外交部致陆军部函

先生：

关于您本月23日的来信，谈及拟在香港泊驻一艘印度海军运输船，以便紧急时运送部队前往上海一事，我奉外交大臣格雷爵士的指示，通知您：鉴于英王陛下驻北京公使本月26日来电中所表示的意见，他不认为有必要执行朱尔典爵士本月5日来电中所包含的那些建议。

然而，格雷爵士希望批准总司令官的这项建议，即他被授权在香港安排一艘船只，以备随时运送部队之用。

这封信的副本将送交海军部。

兰利谨上 1912年4月27日于外交部

第22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4月29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附上英王陛下驻南京领事的一封来信的副本，该信概述了国务总理在宣布组成新的联合政府的内阁人选名单时，对南京临时参议院所发表的演说。您将看到，唐绍仪估计需要一笔二亿一千五百万两的款项（约合三千万英镑），以满足今年各项事业的开支，这些事业中没有一项是生产性质的。这几乎等于庚子赔款的一半。在过去十年间，偿付这笔赔款使中国财力遭受沉重负担；现在中国已完全停止偿付。对中国表示最良好祝愿的人们，不能不对于这种财政方面的前景感到严重忧虑。我完全同意我的一位同僚几天前对我所说的意见：如果他是中国的敌人，他将建议它任意进行借款，但是，他作为一位诚挚的朋友，感到一定要设法使外国款项的使用具有必要的保证。

看来理解这个局势的唯一政治家就是袁世凯总统。如果不是他详细叙述各省向他提出的要求款项的呼吁，我是不了解他的。昨天，他又提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很坦率地承认：在全国大部分

地区，现在都征收不到税款。

朱尔典谨上 1912年4月11日于北京

第 22 件的附件 伟晋颂领事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自从我本月 1 日给您写信以来，中文报纸已发表国务总理在上月 29 日临时参议院举行的会议上所发表的演说，那时他向临时参议院宣布袁世凯总统选定的内阁各总长名单，以组成新的联合政府。下面是演说的摘要。

国务总理在开始时，提到了全国的骚动状态。他说：新政府的首要职责是恢复秩序；其次，是实行 1900 年以来中国缔订的各项条约中所规定的那些改革，最重要的是废除厘金，以换取关税的增加；第三，是鼓励和发展农、商、工业，为此目的将派一些专家担任专管这些事务的各部门的首脑。

接着，他提到了国家的财政需要，迫使他们举借外债。在中国去年的预算中，估计收入为二亿九千七百万两，支出为三亿五千万两。因此，赤字为五千四百万两^①，还必须加上去年未估计在预算内的额外支出二千四百万两，使总赤字达七千八百万两。此外，有去年 6 月为进行币制改革和修筑粤汉铁路而筹措的二亿两借款的利息达一千万两；还有已经到期但自革命爆发以来没有偿付的中国其他借款和赔款的利息，迄今总共为二千万两。他们还必须计算维持去年 10 月以来招募的那些部队的费用，共有八十镇，其中大约有二十镇可以解散，余下的六十镇需供养到年底。每镇的支出每月为十二万两，总费用为八千万两。他们另需要一千万两补偿房屋所受的损失，一千万两作为对被杀军民的家属的抚恤等，还要有钱应付外国人提出的赔偿要求。最后，还有临时

^① 原文如此，按上述收支数字，赤字应为五千三百万两。

政府迄今的经费七百万两。因此，年底前必须专门准备的全部款额为二亿一千四百万两至二亿一千五百万两。

演说结束时，宣布了各总长人选的名单，唐绍仪先生对每位人选都说好话，虽然他不得不承认：分别被提名为工商部总长和农林部总长的陈其美先生和宋教仁先生，都不是交给他们主管的那些事务的专家。

本月2日，临时参议院举行了另一次特别会议，决定政府是否应当迁往北京的问题；虽然结果是预料中必然的结局，但辩论是很冗长而又尖刻的。最后，以二十票对六票通过了北迁的决议。

前任总统孙逸仙和唐绍仪先生都已于昨日离开南京前往上海。唐绍仪先生的离去是一件出乎意外的事情，使南京居民大感惊慌，因为他们担心：部队对这位国务总理带来必需的款项支付他们应得的欠饷一事所抱的希望已经落空，可能随时发生兵变并洗劫该城。不过，人们正采取特别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此事的爆发。已经上船准备动身开往南方的粤军一标，又重新登岸，正在帮助徐绍桢将军的士兵们巡逻街道。

我应当说明：徐绍桢将军已被任命为参谋总长，显然是接替黄兴将军。不过，他显得确实很不愿意接受该项职务。

伟晋颂 谨上 1912年4月4日于南京

第23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5月3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附上黎元洪的两份电报的译文副本，该电报已发表在本地报纸上，并对公众舆论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份电报是发给袁世凯的，他最近通知我，他欢迎收到这份电报，因为它表达了他完全同意的那些意见。

黎元洪指出，如果没有一个内阁，总统便不能够使政府继续存在下去；然后他详细说明了局势的危险，把外国可能按照1900年联军远征的方式进行干涉作为这种危险的顶点。接着，他说明全国因有大批不守纪律的武装士兵而出现的没有法律的状态，这是革命产生的现象。他坦白地承认，而这一点是所有外国人很久便已感觉到的：解散这些所谓的部队是中国无力处理的一个问题，除非它能够为此目的筹借外国款项；爱国心迫使他认为这是一项痛苦的行动。情况可能是这样，但它是中国将必须终于忍受的。如果外国款项被用来使这个骚乱的国家平息下去，那么，衷心希望这些款项的支出应得到周密的保证。

袁世凯估计，中国有一百万以上的武装士兵；认为国家的唯一希望在于找到一些方法，能够使大部分士兵重操某种形式的安定生涯。但是，中国政治家对于把进行抢劫的人们变为民国的和平公民一事，提不出很多切实可行的建议。袁世凯本人认为：很大一部分人可以在湖广铁路的修筑工程中找到有用的工作；由于长江流域今年遭受了有记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水灾，水利工程可以吸收相当一部分长江部队，但仍然剩下很大一部分人，他们在目前中国生产的发展状态中找不到生计。象孙逸仙这样的空想家轻率地谈论修筑长江大桥，但如果这位前任总统返回广州，他将发现，处理前几个月横行该省的海盗和土匪便是一个足以吸引他的全部精力的问题。

这份电报中最值得注意的问题，也许是它提出了关于中国的精神状态和缺乏任何宗教体系的见解。中国象任何国家能够出现的情况一样，几乎没有宗教。那些进行思考的人们越来越感到，如果没有宗教，教育便不会产生必需的稳定因素。采用基督教作为国教的意见，几乎不能够被认为是一项严肃的建议，但人们偶然提出这一意见，这件事本身就表明近年来舆论所经历的惊人变

化。

这封信中列为附件二的那份电报，是对各派首领发出的一项几乎绝望的呼吁，要他们摒除个人意见，迅速组成一个联合政府，统一南北。南方首领们主要是由于听从了这项尖锐的劝告，才放弃派遣一支南方军队前往北京的危险尝试；黎元洪不允许“大禹之广阔土地”遭到毁灭这个强有力的暗示，显然加速了南京首领们作出前往北京的决定，他们可望于明天到达北京。

朱尔典谨上 1912年4月18日于北京

第24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5月6日收到

阁下：

我在1月30日的信中，曾荣幸地报告：已在上海组成银行家委员会，目的是接受和处理供偿还外债之用的海关岁入。

根据各国使节所同意作为该委员会指导方针的参考条款，海关征收的常关岁入按照与一般海关岁入相同的方式处理，并在三家与1900年前缔订的借款有关的银行之间，即汇丰银行、德华银行与华俄道胜银行之间，进行分配。

3月13日，银行家委员会给我这位首席公使写了一封信，现附上其副本。该信说：横滨正金银行要求将常关岁入在所有那些与赔款有关的银行之间进行分配。该委员会不反对这样做，请求我获得外交团对这项变化的批准。

我在我的同僚中传阅该委员会的信件时，乘机指出：我觉得没有反对这项建议的理由，除了它将把一笔比较小的岁入在看来是多余的一大批银行帐户中进行分配，并需要对最近刚同中国当

① 原编者注：《中国第三号（1912年）》，第113件。

局缔订的那项协议作重新调整。

然而，正象我所预料的那样，那些国家的使节因为他们的银行从这项建议中得到好处，所以赞成这项变化。于是，我于本月12日被授权向外交部提出一份备忘录，通知他们说：该建议已获得外交团的批准，理由是这笔常关岁入已被指定作为辛丑条约赔款的担保物之一，要求他们对海关总税务司发出必要的训令。与此同时，我把所采取的行动通知了银行家委员会。我荣幸地附上这两封信件的副本。

朱尔典谨上 1912年4月20日于北京

第24件附件1 国际银行家委员会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中国海关所征收的常关岁入，现在存入此地汇丰银行，它根据海关总税务司的训令，每周与德华银行和华俄道胜银行进行分配。可是，横滨正金银行要求将该款在那些与赔款有关的各国银行之间进行分配。

银行家委员会不反对这样做。因此，我奉他们的指示，把这个问题提交您，并请您惠允将该问题提交北京外交团，并获得外交团对它的批准。

银行家委员会建议，应按照各银行在赔款中所占的份额存储该款。在过去征收常关税款每年约三百万两的基础上，大致计算出各银行的份额如下：

		每 月	每 季 度
	百分比	银 两	银 两
汇 丰 银 行	11	27,500	82,500
东 方 汇 理 银 行	16	40,000	120,000

续表

		每 月	每 季 度
	百分比	银 两	银 两
德 华 银 行	21	52,500	157,500
华 比 银 行	8	20,000	60,000
国 际 银 行 团	7	17,500	52,500
横 滨 正 金 银 行 (有 限 公 司)	8	20,000	60,000
华 俄 道 胜 银 行	29	72,500	217,500
	100	250,000	750,000

国际银行家委员会秘书

曼 谨 上 1912 年 3 月 13 日 于 上 海

第 24 件 附 件 2 送 给 外 交 部 的 备 忘 录

首席公使在 1911 年 7 月 30 日的备忘录^①中，曾荣幸地通知外务部：各国驻北京使节已对各该国在上海的银行经理发布指示，要他们采纳总税务司制订的八项条款中的计划，把所有口岸的海关岁入用于偿还外债和赔款。

根据该项计划，由海关征收并积聚在上海的常关岁入，是按照和海关岁入相同的方式处理的，并在三家与 1900 年前缔订的借款有关的银行之间，即汇丰银行、德华银行和华俄道胜银行之间，进行分配。

现在，银行家委员会建议：常关岁入应在与赔款有关的各国银行之间，按照每家银行在赔款中所占份额进行分配，而不在上述三家银行中分配。

^① 原编者注：外交部未收到该备忘录。

鉴于根据辛丑条约第六款规定，常关岁入是被指定作为偿还赔款的税收之一，外交团同意该项建议。

因此，外交团请首席公使要求按照此意对海关总税务司发出训令，以便转交上海海关税务司。

1912年4月12日于北京

第24件附件3 朱尔典爵士致国际银行家委员会函

先生：

您上月13日关于在与赔款有关的各国银行之间分配常关岁入问题的信，已及时提交外交团。我的同僚们现在希望我通知您，他们批准该信中所包含的那项建议，即海关征收的常关岁入，应按照各银行在赔款中的份额存储。

今天，我已按照这个意思，向中国政府提出一项备忘录，要求他们对海关总税务司相应地发出必要的指示。

朱尔典谨上 1912年4月12日于上海^①

第25件 格雷爵士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我已收到您上月20日的信，该信报告关于在与庚子赔款有关的各银行之间分配常关岁入问题已经达成一项协议。

在各国驻北京使节所同意作为银行家指导方针的参考条款中，规定：如果到1912年底还没有恢复正常情况，那么，届时将把可以用来偿还赔款的海关岁入结余列出帐目；这种帐目将送交外交团，由他们作出如何处理的决定。

我将很高兴地获悉，这种安排是否仍然有效，或者是因为最

^① 疑为北京之误。

近关于分配常关岁入的决定而使它受到任何影响。

格雷谨上 1912年5月11日于外交部

第26件 陆军部致外交部函

1912年5月15日收到

先生：

一、我奉陆军委员会之命，表示收到您1912年4月27日的来信，并且通知您：为了执行该信最后一段中外交大臣所提出的关于在香港安排一艘船只，以便随时可用来运送军队的那项建议，他们已同海军部磋商。

二、为了供外交大臣格雷爵士参考起见，我应说明：海军部认为，可以依靠一艘适当的船只，以便在香港随时用来运兵。我要询问：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认为有必要实际租赁和配备一艘运输船，从而避免在紧急情况下实际调遣部队时所发生的迟延，估计这种迟延将不超过两三天。

沃德谨上 1912年5月15日于陆军部

第27件 外交部至陆军部函

先生：

关于您本月15日的信，谈及在香港准备好一艘运输船，以便突然发生紧急情况时增援英国驻上海部队的问题，我奉外交大臣格雷爵士的指示，通知您：鉴于英王陛下驻北京公使4月26日来电（副本已送给您）最后一段中所表示的意见，他认为不必承担实际租赁和配备一艘运输船的费用，如果当地海军当局满足于接到通知后，随时可以得到一艘适当的船只。

兰利谨上 1912年5月18日于外交部

第 28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 年 5 月 22 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随信附上袁世凯总统于上月 29 日在所谓临时参议院的开幕式上发表的演说的副本，它说明了新政府打算实行的那些措施的大纲。

总统正确地把财政问题摆在他的计划的最前面，并坦率地承认，必须求助于外国资金，以满足行政方面的需要。暂时发行公债和最后商谈一笔大借款，被认为是处理局势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增加关税和整顿盐税，是主要偿还国家新债务的两项财源。据估计，每年增加关税的收入可多提供一千六百万两；增加的盐税为五千万两。这些数字显然是国务总理唐绍仪提供的，不过，他不能够自认为对这个问题有任何专门的了解。

改进田赋制度和改革币制，是民国政府答应采取的其他措施，总统很有意思地详细叙述了必须听取外国财政专家的意见。

维持任何形式的稳定政府都取决于解散大批不纯的军队，但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虽然人们承认，这些军队所强加给国家财力的重担超过了它的负担能力。解散军队的问题是当前的紧要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不仅需要有钱，而且需要有中国现在十分迫切需要的其他品德。

朱尔典谨上 1912 年 5 月 3 日于北京

第 29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 年 5 月 22 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随信附上中文秘书对今年第一季度北京当地报纸所

作的一些述评。

朱尔典谨上 1912年5月4日于北京

第29件的附件 1912年第一季度北京报纸述评

今年初，在京城各报中，有一股强大的亲满族人的势力。《帝京新闻》公开支持清朝按照去年10月张绍曾所建议的那种形式继续存在下去。《晨报》甚至走得更远，似乎鼓吹一个不一定把皇族亲王排斥在外的责任内阁。北京发行量最大的一家报纸《爱国日报》明显地反对汉人，但这个事实不是出乎意外的，如果人们回想起该报创办人是一位皇族成员，而且又是恒公^①的兄弟。《帝国日报》是反对民国的，但建议不许各亲王留住北京，而且前任皇帝成年后同一位汉族良家妇女结婚。中文报纸中最有影响而又代表温和的粤派观点的《北清日报》，坦率地表示反对改朝换代，理由是：爱新觉罗一家虽然绝不是一个伟大的统治家族，但并不低于明朝人；最好是在剥夺它的权力之后容忍它，而不回复到朱家或赵家的统治，他们分别代表明朝和宋朝。《光华日报》在一月初是亲满洲人的，并且似乎得到庆亲王的资助，因为它从不放过任何机会颂扬他。它反对广东集团，并且攻击当时的总理大臣^②，因为他屈从于唐绍仪及其同伴。可是，它在1月中旬转而支持共和的理想，警告满族统治者当心路易十四和查理一世的命运。

《国风报》创刊于去年夏秋间，目的是要促进原订今年五月掀起的即将到来的革命，它是北京公开主张推翻满族人并剥夺下台皇帝的尊号的唯一报纸。它坚决支持共和的观点，不久便使它同警方发生冲突；它暂时不得不缓和它的调子。

① 译音。

② 指袁世凯。

当1月间的炸弹爆炸事件威胁到总理大臣的生命时(有许多人相信那是满族人的一项阴谋),形势就是如此。从那时起,各报纸的腔调完全有了改变;每家报纸都鼓吹清帝退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晨报》和《帝京新闻》也都变为反对朝廷的。看来好象是总理大臣的粤派人士为促进共和的理想而组织的一个运动;那些嘲笑过共和对中国的实用性的报纸,现在都变得热衷于采用共和。《北清日报》虽然是粤派报纸,但可以公正地称之为不偏不倚的,它从不犹豫地谴责前清王朝的一些较突出的错误,如任命一些无能的和腐朽的亲王统率海陆军,现在它所采取的看法是,袁世凯决不要接受所拟建立的共和国的总统职位。由于作了这项保留,它准备建议给予新政府一个真正的考验。除了《国风报》经常反对袁世凯而且对暗杀他的秘密计划遭到失败公开表示遗憾之外,其他报纸似乎暂时都倒向了他那一边,并称赞他是国家的救星。

2月12日清帝退位成为既成事实之后,每家报纸都热烈颂扬新制度的前景。对袁世凯当选为临时总统,几乎所有的报纸都热情称许,甚至《北清日报》也说:如果他保证决不当第一届总统的候选人,对他担任临时总统的职位便没有重大的反对理由。《国风报》虽然对他的当选感到遗憾,因为他以前的所作所为使他不值得信任,但它表示愿意暂时不作出判断,并且谈到现在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然而,从那一天以来,总统成为各报毫无例外地进行批评和谴责的目标。他的任命受到强烈的非难;他的就职演说被指责为缺乏权威;他个人的品质受到攻击;他被称为善变的懦夫,不知道他自己每天的心情,所以必须对他隐瞒所有不愉快的消息。人们说他的最大优点,是他适于在其他的人领导下担任职务,但他完全不配充当最高的统帅。

各报很自然地把2月29日的兵变作为总统完全无能的一个

迹象。他们说：“如果他甚至不能够防止他自己的部队反对他的权威，他怎么能够要求担任他现在所担任的职务呢？”他怜悯那一群组成中国军队的毫无纪律的人，激起了最猛烈的谴责。甚至那些被认为是政府机构的报纸，如《听益报》^①或《民事报》^②，也避免对袁世凯说恭维话，虽然他们相对地说来是对民国的前途抱有希望的。好几种报刊发表连环漫画，把总统画成一个猴子（故意拿他的姓氏开玩笑），其用意显然是要使他受到轻蔑。《国民公报》发表了一张图画，上面是一个猴子用提琴演奏“乱弹”这个传奇故事，即“他乱弹琴”，亦即“他胡说八道”的俏皮话。《国风报》公开以对他扔炸弹相威胁，除非他改弦易辙。几乎所有的报纸都把他描述为野心勃勃的、残酷无情的、寡廉鲜耻的人物，他没有统治能力，如果不是因为他的成就较小，他可以比得上中国历史上的大卖国贼和大恶棍。

新制度在首都各报的专栏中得不到好感。作家们承认他们自己十分失望，并且声称：由于总统的软弱无力和参议院的专横而又无能，前景是极为黯淡的。《国民公报》说国务总理仅仅适于充当一家洋行的买办；福建人控制的另一家报纸《亚细亚报》说：中国摆脱了满族人的专制，换来的是广东人的独裁。虽然《国民公报》上偶尔发表的一两篇文章可能引导读者认为，有人鼓吹退位朝廷的复辟，但是，直到目前为止，没有迹象表明，满族人的复辟被认为是可想象的或所希望的。据说，一家新的报纸不久即将问世，公开宣布的目的是要促进明朝的事业。在结束这篇述评时，说明这一点才是正确的：各报都热烈赞扬孙逸仙，因为他大公无私地辞去临时总统的职务；人们把孙逸仙与袁世凯作了对比，对袁世凯大为不利。孙逸仙被说成是革命的英雄，始终如一的人物。

①② 译音。

第30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5月28日收到

阁下：

关于我3月31日的信，我荣幸地随信附上黑德爵士对上月各省发生的事件所作的一份概述。

朱尔典谨上 1912年5月6日于北京

第30件的附件 到1912年4月30日为止 各省事件的概述

虽然这个国家在行政上仍处于混乱状态，而且南方各省继续无视北京政府，但总的说来，最近英王陛下领事官员们的报告反映出一种较平静的状态。

关于最近对美国驻巫山（位于宜昌至重庆之间的长江沿岸）传教士所进行的攻击，许立德先生报告如下：

“3月22日，我收到成都学堂教员、奉命护送三位美国教员前往成都的刘先生于上午八时自巫山发来的一份求救电报，因为那三位教员，即塞尔登、霍夫曼、希克斯等先生，遭到海盗的袭击，受了重伤。我把这个消息电告美国驻汉口和重庆领事，并立即安排一名外国医生、一名传教士译员和两艘红十字会船只前往帮助他们。这伙幸存者终于在25日傍晚平安抵达此地。

这次袭击发生在22日凌晨三时离巫山五英里左右的地方。所谓的土匪用刀剑作武器，登上船来；在二十四名船夫中，没有一个人作任何帮助外国人的尝试。霍夫曼先生仅在颈部受了轻伤；塞尔登先生所受的刀伤不下三十五处，所有这些伤口都需要包扎；希克斯先生被刺穿了肺部，显然是当他俯身从小提箱中拿出手枪时被刺的。整个这次袭击仅持续约五分钟之久，土匪所得到的赃

物是比较少的。对伤员来说，幸好附近有一位中国医生，他不是属于开往下游的滇军，便属于开往上游的川军。他用很高明的技术包扎了伤口，所以一位法国医生在白天抵达现场时，感到没有必要重新包扎。

所谓的土匪是用军刀武装起来的，穿的是很贴身的制服，而不是普通苦力的那种肥大衣服，都戴着黑色头巾，这是滇军随从人员通用的一种装束，几天后他们有二百人抵达宜昌。他们是一支有组织的队伍，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们的袭击似乎是有计划的，而且是仔细考虑过的。”

美国驻汉口副领事正在对这次袭击进行调查。同一天，在同一地点，一艘载有十二名中国旅客的船只遭到袭击，有八人被杀死。因此，现在还没有证实，这个案件是否提供了真正排外情绪的证据，但它确实表明，他们不再认真考虑谋害一名外国人的后果，这大概是因为现在土匪们了解到：没有一位官员能够对他们施加刑罚，所以他们可以随意袭击任何旅客而逍遥法外，无论这些旅客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中国为中国人所有”的思想似乎正广泛传播。从日、美、英等国留学回来的学生都强烈地希望控制在中国建立的外国居留地和租界，并且取消治外法权。他们申诉外国人在上海和其他条约口岸给予中国人的待遇，希望把中国的财政、铁路和其他企业置于他们自己的控制之下。

英王陛下驻汉口总领事报告说：整个湖北省的情况已有所改善，但武昌的形势仍造成了令人不安的理由。除了国民党内部显要人物之间的不和以及对职位分赃的普遍不满情绪之外，没有多少钱可以用来支付军饷或提供部队作为他们回家的路费。不过，他们得到比利时的一部分借款，已使问题略有缓和，并且正在逐渐遣散武昌的军队。

河南的局势仍然是远远不能令人感到满意的。部队明显地缺乏纪律，抢劫和骚动是经常发生的事情。陕西已显示改善的迹象，目前西安府一切都很平静。

由于春天的到来和那些较大胆的土匪窜往广东及其他较富庶的省份，西江的情况已有很大的改善。持有执照自南宁开往梧州的帆船，仍继续由警卫艇护航，而附近各口岸的那些帆船则配备了卫兵。据说，以前当过海盗，现在主管至浔州府河道的李里亭^①，在维持航线畅通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但由于报酬微薄，他即将辞职。

我很满意地指出：上月山东北部的形势已有相当大的改善，他们正在认真打算减少分散在该地区的部队人数。4月13日，两艘中国巡洋舰离开烟台驶往上海，船上载着蓝天蔚将军和约七百名士兵；16日，另有一千名军队南行，开往上海和福州。这就使得留在烟台的全副武装士兵剩下四千人左右，现在几乎没有一名士兵留驻在外国人的居留地内。然而，附近地区仍有士兵约八、九千人，但都督打算继续减少和解散军队，直到散布在烟台、登州、荣成和文登一带的士兵剩下四千人为止，这是他认为维持山东该地区秩序所需要的最低人数。部队的举动大体上是良好的。都督似乎准备了大量现款，甚至送给外国人三千元款项购买蒸汽压路机，作为对他们以前生活不便的公开补偿，借以表示他对外国人士的善意。

现在，都督已前来北京，同袁世凯磋商关于把烟台再一次置于济南府的该省当局控制之下的问题。该省南部感到有些不安，因为张勋将军采取了不受制约的态度，他在津浦铁路沿线仍握有一支相当大的部队，拒绝交出他所掌握的车辆，除非达成关于它

① 译音。

不得被用来运载“革命”军的协议。人们将记得，当革命军占领南京时，张勋是指挥驻南京清军的将领。自那时以来，他驻在津浦铁路两侧；据说，他已增募新兵，使他的部队现在达到两万人之多。

黑 德

第 31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 年 5 月 28 日收到

阁下：

关于我上月 20 日的信，我荣幸地报告：我已经收到外交部的一份复照，答复我 4 月 12 日代表外交团和银行家委员会对他们所提出的要求。该复照说：海关总税务司已指示上海税务司，把记入总税务司常关帐内的全部款项，按照各有关银行在赔款中所占份额，转入各该银行存储。

我请求附上外交部的备忘录的译文。

朱尔典谨上 1912 年 5 月 7 日于北京

第 32 件 陆军部致外交部函

1912 年 6 月 4 日收到

先生：

一、我奉陆军委员会之命，关于应外交部的要求自华南指挥部调派英国分遣部队前往汉口的问题，给您写信。

二、您将记得：上个月，海军总司令官在英王陛下驻北京公使的同意下，把皇家炮兵队和皇家工兵队共六十二名士兵送回香港，从而减少了这支分遣部队，目前剩下一百名步兵。

根据我们所收到的报告，过去若干时候以来，没有对各国在汉口租界发动攻击的危险。为此，我应询问：据外交大臣看来，

在汉口继续留驻一支军队是不是必要的。

此信的副本已送交海军部。

沃德 1912年6月3日于白厅

第 33 件 海军部致外交部函

1912年6月5日收到

先生：

为了供外交大臣参考起见，我奉海军部各长官之命通知您：驻华总司令官于5月29日来电报告，正在自广州撤军。

目前，英王陛下军舰“克莱奥”号仍然泊驻该处。

格林谨上 1912年6月4日于海军部

第 34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6月8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随信附上我所收到的英王陛下公使馆前武官柏来乐少校关于他自喀什噶尔至兰州府旅途的一份报道。

朱尔典谨上 1912年5月17日于北京

第 34 件的附件 柏来乐少校自喀什噶尔至 兰州府的旅行

一、旅 程

我于1911年12月15日离开喀什噶尔，带着两辆大车，每辆有四匹马和骡拉着，于1912年4月15日抵达兰州府，全程二千四百三十七又四分之三英里。

所经过的主要城市：阿克苏英吉沙尔或温宿府，在三百四十二又四分之一英里处。此城是中国官员在阿克苏驻节的地方，城

内约有一千名汉人，郊区约有七百名萨尔特人。库车或库车州，在五百三十四英里处，周围有树木和果园，知州告诉我，在两城和周围农村有居民九万人以上，除了三千名东乡人和六、七百名汉人之外，都是萨尔特人。喀拉沙尔或焉耆府将近有六千户（平均每户有五人），他们大都是东乡人，还有许多汉人，仅有少数萨尔特人。该地距喀什噶尔七百七十三英里，海拔三千一百九十英尺，而喀什噶尔为海拔三千七百三十英尺。地势有很大的下降，从多岩石的群山中走下来，进入吐鲁番平原，到达九百四十三又四分之三英里处的托克逊，海拔仅一百三十英尺。离开托克逊后，道路往上倾斜，在九百九十八又四分之三英里处越过海拔三千六百一十英尺的达坂山口，前往乌鲁木齐（汉名为迪化府，更通用的名称为红庙子，因为城北有一座红色的寺庙）。乌鲁木齐的海拔为二千七百四十英尺；据估计，城内和郊区以及人烟稀少的附近农村地区的居民有六、七万人，其中大都是汉人，还有很多东乡人以及约五千名萨尔特人。该地距喀什噶尔一千零六十三英里半（中国人估计为四千一百四十里）。离开乌鲁木齐后，我走南路，因为人们更通常走的经过库城^①的那条路有一个艰险的关口，冬季很容易被雪阻塞。我再次越过达坂山口，往下走至吐鲁番或吐鲁番厅（海拔三百二十英尺），在一百二十五又四分之一英里处。吐鲁番有两座筑有城墙的城镇，相隔约一又四分之一英里；象新疆通常的情况那样，一座城是中国官员的驻地，另一座则是萨尔特人的城镇。两城的所有居民为一千户萨尔特人，九百户东乡人，三百户汉人。道路又是上坡，向北拐了一个大弯，然后到达哈密厅，南面半英里有一座萨尔特人的古庙城，距乌鲁木齐四百二十七又四分之一英里（海拔二千三百四十英尺以上）。两城

① 译音。

的居民有七、八百户汉人和东乡人，大都是汉人，还有五百户萨尔特人。新疆的六、七位萨尔特王公中最重要的一位住在古庙。他对英国旅行者一直非常友好，因为他很感激印度政府送回他的一些流落异乡的臣民而不收费用。这位王公名叫沙木胡硕^①，在萨尔特中间有一定的影响，但大部分王公被剥夺了一切权力，并接受汉人的资助。新疆省和甘肃省的交界处距哈密五百七十三英里半。疏勒河流过安西州(海拔三千五百三十英尺)的北面，距乌鲁木齐六百七十五英里半。该河在2月间解冻以后很难渡过，因为没有桥。安西州是一个贫穷的城市，有三百多户人家，包括附近农村则有九百户。肃州(海拔四千七百多英尺)在八百六十二英里半的地方，有居民约一万五千人，包括周围地区则有三万人。自回民起义以来，肃州已大大丧失它的重要性。甘州府(海拔五千零二十英尺以上)在一千零一十九又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有居民四万人。甘肃省的名称就是从甘州府和肃州得来的。凉州府(海拔五千零二十英尺以上)在一千一百八十八又四分之三英里处，有居民二万七千五百人。兰州府(海拔五千一百二十多英尺)距乌鲁木齐一千三百七十四又四分之一英里，专家们估计它的人口自七万五千人至二十万人不等；我认为十万人大概是一个正确的估计数字。电报线设在自喀什噶尔至兰州府沿途附近地方。

二、经过地区

(一) 新疆：自喀什噶尔至哈密，沿途大都是荒芜的，有一些矮树，仅在城市周围见到一些沃土，在各村庄四周有一些农作物，但居民稀少；我认为，估计新疆全部人口为二百万人是过高

① 译音。

的。最肥沃的地区是喀什噶尔平原和伊犁平原，略差一些的则为阿克苏平原和库车平原，而沉闷的戈壁沙漠自哈密以东六英里半处伸延到疏勒河，陆路为二百三十九英里半。

(二) 甘肃：自安西州至甘州府，沿途主要经过人口稀少的草原或碎石和沙上的原野，偶尔有汉人的农场。过了甘州府，大部分地区人口仍很稀少，在离甘州府七十二英里的丁庄庙^①分界处，海拔逐渐增至九千四百二十英尺，然后下降到兰州府周围的一个相当肥沃的平原。接着，地势又增高，过了六十七英里，到达黄河流域的乌沙岭^②，海拔为一万零三十七英尺。沿着平番河往下走并越过平番河之后，在距兰州府四十七又四分之三英里处离开该河，在荒凉的小山中蜿蜒前进，在离兰州府十又四分之一英里处到达肥沃的黄河流域。甘肃大概是中国十八省中最贫穷的省份。夏之时神父在他的关于中国地理的书籍中，估计该省人口为一千零三十八万六千人，但在该省居住了多年并作了多次旅行的奥托主教认为，那个估计数字太高了。另一方面，鉴于甘肃的面积很广，在黄河流域，特别是在宁夏府和兰州府一带，人口稠密，自兰州府至西宁府以及自兰州府至庆州的沿途耕地很多，所以我得出的意见是夏之时神父的估计数字是过低的。治理新疆省和甘肃省每年都给政府造成亏空，赤字必须由较富省份如四川的津贴予以弥补。新疆似乎在各方面对中国都是一个无益的负担。驻防新疆的中国士兵是我在整个旅途中所见到的最坏的士兵，他们没有纪律，缺乏训练，完全不胜任对袭击进行抵抗的工作，而居民由各衰弱民族所组成，完全缺乏任何团结的力量，显然没有受到任何爱国心、进取心或渴望进步的鼓舞。

①② 译音。

三、新疆的人口

(一) 汉人所占比数很小，仅在乌鲁木齐城和两三座汉城如阿克苏英吉沙尔以及喀什噶尔英吉沙尔，才在人数上占优势。他们大都是不良分子，认为最好是离开他们的原籍。

(二) 萨尔特人或缠头，在吐鲁番流域自喀什噶尔至喀拉沙尔以及自吐鲁番至哈密一带^①，占人口中的大部分。他们生活的主要目的，似乎是要在那些给他们带来最少麻烦的异族主人统治下，过和平的生活。他们是回民。

(三) 东乡人都是回民，人们不知道他们的起源，甚至东乡这个词的意义也是不明确的。他们大概与甘肃和陕西的回民同出一源。他们的语言和衣着都象汉人，但他们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同的民族，在外表上不同于汉人，有较圆的眼睛，等等。不过，他们在人数上大大地低于萨尔特人，居住很分散，显然缺乏团结的力量，以保证没有危险。在喀拉沙尔以及自该城至吐鲁番流域和自吐鲁番流域北面至乌鲁木齐沿途人口稀少的地区内，他们构成人口的大部分，而在乌鲁木齐，汉人是占优势的。在最近的骚乱中，由于缺乏士兵，巡抚不得不招募一些东乡人；因为他们完全缺乏纪律，住在乌鲁木齐的那几位欧洲人带着某些焦虑的心情看待这项措施。巡抚甚至不得不求助于哈密王公的萨尔特士兵。汉人从前曾经企图招募萨尔特士兵，但这些士兵始终证明是无用的，对汉人来说这是一件幸运的事，因为假若这些士兵有任何价值的话，他们将毫不费力地把那些汉人驱逐出境。

(四) 满族人：从前，在乌鲁木齐附近，有一座满城，但它现在已被抛弃了。在塔尔巴哈台附近有一个满族索伦部的移民区，

① 原文如此

伊犁流域附近有满族锡伯部的移民区。我在路上遇见一支有七十名满族锡伯部士兵的队伍，从哈密派去增援驻乌鲁木齐巡抚招募的那些乌合之众——一群衣衫褴褛的人，携带着旧式的单发卡宾枪、长矛和旗帜。

(五) 蒙古人：我在喀拉沙尔一带遇见少数来自玉尔都河¹流域的土尔扈特部蒙古人，而在乌鲁木齐也偶尔见到郭尔木部或扎噶部蒙古人。他们在乌鲁木齐以北占有一片土地，而且还散布在白塔尔巴哈台至天山的山区中。其他的蒙古族诸部落和哈萨克人杂居在白乌鲁木齐至哈密我所经过的那条道路以北的山区。他们还沿着该地区伸展到甘肃北部，有些移民区位于安西州和肃州以南，和西藏人混杂在一起。奥托主教告诉我：他们受着大约三百名王公的统治，这些王公之间是互相分离的，而且同一部落的王公也常常被哈萨克诸部落隔离开来，这些哈萨克人是不喜欢蒙古人的。蒙古人不是危险的源泉，他们象萨尔特人和西藏人一样，也缺乏主动性和团结力。

(六) 哈萨克人：在这次旅行期间，我仅在乌鲁木齐遇见少数哈萨克人。他们是我在中亚细亚所见到的所有没落民族中最衰弱的民族。

四、新疆的革命

革命的发生是由于新任伊犁将军²发现伊犁知府³和统率伊犁陆军的协统杨缙绪⁴亏欠巨额款项，他们为了摆脱困难起见，在伊犁宣布成立共和，杀死伊犁将军，并强迫前任伊犁将军⁵担任

1: 译音。

2: 志锐。

3: 贺家栋。

4: 广福，蒙古人。

都督，否则予以斩首。大约与此同时，有些巡防队在乌鲁木齐哗变（他们大都是湖南人和四川人），但被当地陆军包围，有一百多人被杀死或后来被处决。当我于1月底快要到达乌鲁木齐的时候，遇见四十队士兵，名义上是派去保卫通往阿克苏的各关口，但实际上是为了把他们调开。我于2月1日到达乌鲁木齐时，一切似乎都已平息下来，生意照常进行，所有陆军和可抽调的部队都已被派往西北部，以抵挡伊犁民军的前进。由于官吏方面平时缺乏远见，士兵们没有准备充足的衣服御寒，所以有许多人患冻伤。作为乌鲁木齐陆军缺乏效能的一个例证，仅有一名军官熟悉运用大炮的方法；由于他在镇压叛乱时成为少数几个被害者之一，炮兵变成了无用的废物。巡抚袁大化系安徽人，现年五十七岁，因镇压兵变时的残酷无情而很不得人心。他得到清帝退位的消息后很久，仍继续坚持争夺权力，如果不是出于怀有成为该省独裁者的野心，便是由于感到只有如此他个人才有获得安全的机会，所以在我离去后，人们对他感到额外的厌烦。从我对双方战斗部队的所见所闻看来，他们似乎害怕短兵相接，战斗缩小为三次小规模冲突，其中有一次是巡抚的军队获胜，其余两次则胜利属于伊犁部队。巡抚袁大化享有极端排外的名声，但当我访问他时，我个人发现他是十分友好的。

五、甘肃的革命

在十八省中的每一省作了旅行之后，我得出结论：甘肃人民是最不令人厌烦和最不排外的。这或许是由于他们的性情不那么容易激动，而且还因为他们与低级的欧洲人接触较少的缘故。人们感到不安的主要原因是发生回民起义的危险。回民的两次大起义，最后一次发生在1894年，被汉人以最残酷的手段镇压下去，但效果如此强烈，所以自那时以来回民认识到他们的衰弱，而对

他们的征服者怀有仇恨。在甘肃各城市中，他们仅被允许居住在郊区。他们的重要中心在河州，位于兰州府西南，相隔三天的路程，我即将前往该处访问。中国几乎每一家回民都姓马，他们的首领马安良将军现年六十岁，是一个沉默寡言和意志坚强的人，我最近访问过他。骚乱爆发后，巡抚决定依靠回民，解散兰州府附近的那些极为衰败的陆军，我在二十一个月以前曾参观过那些军队。一队回民士兵被派往该省东北的宁夏府，他们的举动十分残忍，主要目的是进行抢劫。马安良将军被派去同西安府的陕西民军作战，他的每一名士兵都另带一两人运回战利品。他们在实际战斗中被击败，虽然他们带回了大量的掠夺物。马安良将军返回兰州府后，不但没有因为他的失败而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反而厚颜无耻地为每一名被杀死的士兵要求二百两（二十五英镑）的补偿，并拒绝交回枪枝，不肯带着他的士兵返回河州。这时，达成了某种协议，他大约于5月2日动身前往该城。此地的汉族军队有两三营巡防队和都督的卫队（自废除总督的职位后，“都督”是巡抚的新名称）。这些被称为卫队的军队有一千三百人，分为五个营。一名卫兵告诉我，他们每月仅得二千三百文铜钱（一千四百文合银一两，或合二先令六便士），所以他们完全未受训练而且毫无用处，这是不足奇怪的。大约有一千名士兵驻扎在城墙上。他们大都用托尔式滑膛枪武装起来，但也有一些毛瑟枪。不过，他们主要依靠大量石块，并布置悬挂一盏灯，以便夜间识别他们的敌人，这是已过时的族长制时期的作战制度。现在，当局打算重建陆军。最近被任命为该省布政使的彭英甲，很可能被派为都督，以代替目前仅担任署理都督的那位人物^①。彭英甲系盛京的汉人，现年四十六岁，是一位很活跃的人物，对外国人抱有善

① 黄钺。

意。1901年，他任北京附近的同安县知县，依照命令要被枪毙。然而，我把他的情况提交我们驻天津的将领，他被移交给我们，并获得释放，所以他现在对英国人怀有很友好的感情。

六、满族人在甘肃的移民区

兰州府西南二英里处的那座很小的满城，由于水源困难，早已被满族人所遗弃；它现在由九十户汉人所占用。在平番县南二英里的庄浪，有一个两百户人家的满族移民区，另一个在凉州府附近，还有一个在宁夏府附近。我认为，在宁夏府西南方偏南的黄河沿岸的中卫县，也有一个移民区。

七、杂 录

在甘肃，特别是自安西州至兰州府的沿途，被毁坏的房屋和村庄之多，以及农场和村庄广筑围墙，给人们留下很深的印象，这是回民起义的遗迹。象我以前所说的那样，占领新疆是使中国人衰弱的一个根源；如果他们撤出戈壁沙漠，把边界确定在疏勒河（不越过安西州）和偏西的沙州（或敦煌）周围的肥沃地区，那么，他们的境况就会好得多。由于同样的原因，占领或重新占领西藏的任何念头应予放弃。

作为甘肃的军事情况的一个例证，肃州的驻军在名义上有二千三百五十人，但当骚乱爆发时，人们发现，驻军实际上不足三百人，剩下的饷银都落入了官吏的口袋。因此，当驻兰州府的总督拍电报要求派遣援军时，他们只能够给他派去二十名士兵。在我抵达肃州之前，一小队湖南和四川的士兵对起事作了一次轻微的尝试，他们煽动那些愚昧无知和没有武装的农民，所以即使是人数已经减少的驻军也足以毫不费力地镇压他们；一些没有恶意的农民被斩首，因为愚蠢而受到惩罚。甘肃是中国最贫穷的省份，

大部分人口是农民，他们所过的生活经常有遭受饥饿的危险，如果谷物歉收的话。奥托主教带我去他的住宅附近的一些农场，该住宅在凉州府以西七又四分之一英里的松树庄^①，让我了解人们的状况。他们几乎一无所有；奥托主教告诉我：他们没有足够的钱给孩子们买衣服，这些孩子一丝不挂地到处乱跑，或者是仅有一件很小的衣服。幸亏中国人是一个有耐心的和长期饱经患难的民族，总是那么愉快，并尽力维持他们的生存。他们不幸是一个最无远见的民族，他们从不储存任何东西，以备困难的时候应用。如果他们想要这样做，他们将发现那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没有地方存放金钱，并经常有遭到抢劫的危险。因此，看到他们很想种植鸦片，这是不足奇怪的，因为它是增加他们的微薄收入的唯一办法。能够给予他们的最大恩惠，是派遣一位专家前往该地区调查土壤，推荐种植某些有收益的农作物，以代替鸦片。在中国官员的支持下，对这类事情提供实际帮助，将是外国人能够给予中国人的最大的好处。

八、货 币

在全中国领土内，应有一个统一的制度。目前，一切都很混乱。银两被认为是货币单位，目前一银两通常值二先令半左右，但不仅在各省，而且甚至在各个城市，它的价值有所不同。由于使用被称为银锭的银块，它的大小形状各不相同，以致每块银子都必须称它的重量，从而加重了困难；又因为每副天平各有不同的重量，更增加了麻烦和被抢劫的机会。除了许多白银低劣之外，各省白银的质量也不相同；新疆使用的银子常常在四川不被人们所接受。银币，通常是银元——有时候是半银两，如新疆——由

^① 译音。

各省铸造，使混乱情况更为严重，但这些银币仅在所铸造省份通用，或者是常常仅在所铸造省份的部分地区通用。铜币的情况比白银甚至更坏；它们的份量太重，所以很难携带。在某些省份，人们使用“铜子儿”，大致上一百枚折合一元，但常用的货币是“铜钱”，中间有一个孔，通常用绳子串起来，名义上每贯五百文。多少铜钱折合一银两，在各个城乡又有所不同，而且还天天变化。例如，在兰州府的三天中，一银两分别值一千四百一十文、一千四百零五文和一千三百七十文。每贯铜钱总是短少几文，更增加了旅行者的不便，例如：有一天，在某座城市中，九十文铜钱当作名义上的一百文，而另一天则为九十二文，在另一个地方又为九十四文。在山西北部的归化城，有人告诉我，该处的每贯铜钱足有五百文；我出于好奇心，数了两贯，发现它们正确无误，但这是我在全中国十三年的漫游中唯一的一次经历。

在某些城市中，官员们发行纸币，但这些纸币一般仅在城内及附近地区使用。它们通常相当于一银两、半银两、一千文或五百文铜钱，所有这些纸币都在兰州府流通，并按照它们的适当价值使用，但是，象伊犁将军发行纸币的情况那样，他将大量纸币倾入市场，以增加他的收入，所以这些纸币常常仅在当地使用，后来还要打很大的折扣。不幸的是，象中国这样一个贫穷不堪的国家，我以为它有百分之九十的人口经常面临着饥饿的危险，象铜钱那样价值很小的硬币是绝对需要的，但没有理由不彻底检查银币并采取一种统一的制度。当然，它将遭到官吏们的严重反对，因为他们将丧失“榨取”的一大机会，同时还将遭到钱庄老板和货币兑换商人的反对。在目前的制度下，每个人都忙于掠夺他周围的人，反过来他又受到掠夺；一个忙忙碌碌的掠夺者终身的境况，也许同他一生完全诚实而且周围的人也很诚实是一样的。

九、中国的革命

当我于2月9日离开乌鲁木齐的时候，胆怯的人们使我确信甘肃即将陷入混乱状态，但幸亏此事证明是没有根据的，我发现到处都十分平静。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前任总督长庚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和坚定，他虽然被那些因惊慌失措而辞职的大多数高级官员所抛弃，但他象大丈夫一样不怕困难，渡过了暴风雨。作为对他所作贡献的一项酬报，他现在隐居在归化城。我所见到的以前骚乱的唯一迹象，是在肃州城北门附近的一棵树上悬挂着一个人头，但这种景象并不是很稀少的，官员们下令关闭肃州和嘉峪关的各城门。关于政府改变所产生的仅有的明显迹象是：废除总督的职位，名义上采用公历，以及悬挂新的五色旗，上面的红色代表汉族，黄色代表满族，蓝色代表蒙族，白色代表回族，黑色代表藏族。我认为，政府是帝制还是共和，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来说，将没有任何差别。至少在很长的时间内，它不会影响占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苦力或车夫们的生活。然而，动乱将给土匪们带来巨大的机会，他们是危险的重要根源。贪污腐化是广泛渗入中国人生活中的一个祸害，所以我怀疑，它在一个世纪内是否能够被消灭。一个真正诚实的人将认为生活几乎是令人难以忍受的，一般都冒着终身潦倒的危险。

柏来乐 1912年4月29日

于中国西北甘肃省兰州府

第35件 陆军部致外交部函

1912年6月10日收到

先生：

一、我奉陆军委员会之命，关于在华北继续保留额外的一营

英国步兵，超过该指挥部既定编制一事，写信给您。

二、您将记得：由于莎美西郡轻步兵营换防，本应开往印度的皇家英尼司吉林明火枪团第一营，应外交部的要求，仍留驻华北。

三、该营现仍留在华北指挥部，超过了正常的驻军人数；本国防务的步兵编制继续相应地减少。

四、在这方面，我应指出：根据外交部的要求，香港驻军于2月间得到两营印度步兵和一连印度过山炮队的增援，那些部队仍然留驻该处，作为应付中国发生意外事件的后备军。

五、在这种情况下，我应询问：在外交大臣看来，中国的局势是否足以保证11月前后正常地撤退皇家英尼司吉林明火枪团，而不必由另一营部队换防；由于撤军的安排必须符合印度和殖民地换防的总计划，这项计划即将完成，所以我请求您尽早赐复。

沃德谨上 1912年6月8日于白厅

第36件 格雷爵士致朱尔典爵士电

1912年6月15日发自外交部

请把您关于11月前后撤退英尼司吉林部队的意见告诉我。陆军部指出：在发生紧急事件时，可以抽调驻香港的部队。

第37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6月17日收到

阁下：

关于我2月27日的信⁽¹⁾以及以前的信件，为了供您参考起见，我荣幸地随信附上上海国际银行家委员会的第一份报告。该报告

(1) 原编者注：参阅《中国第三号（1912年）》，第148件。

说明，为偿还海关岁入所担保的各项借款，自1912年1月1日至4月30日海关岁入的收支总额。该报告还说明为庚子赔款所征收的税款总额，即至1912年4月30日为止所征收的常关税。我认为没有必要用该报告中所附的各项说明和帐目来打扰您，因为它们都已在报告中作了概述；但是，我满足于指出：该委员会能够支付根据海关岁入所担保的各项借款而应付的分期摊还的所有本金和利息。

这些文件已通过上海的首席领事送给我，因为我是外交团首席公使：为了供我的同僚们参考起见，这些文件正在传阅中。

您将注意到，现在还没有偿付赔款，但这是因为可用于此项目的款项虽不少于六十四万两，却迄今仍然太少了，不便开始拨付。拖欠应付的赔款七个月（最后一次是1911年9月30日支付的），不计利息，达一百七十四万一千一百八十七英镑，大约需要一千一百六十万两至一千三百九十万两，因为兑换率自三先令至二先令六便士不等。除了把偿还赔款延至年底的那项协议之外，偿还借款帐目中的贷方所载明的一百八十多万两款项不能用来偿付赔款，因为所有这些乃至更多的款项需要用于偿还借款。诚然，由于六、七月份应付的款项特别多，借款的偿还拖欠一个时候，这不是不可能的，但到年底，如果贸易象目前一样进行下去，很可能不仅手中有足够的税收偿还1913年1月到期的第一批借款，而且可以有结余转入赔款帐目内。然而，有助于偿还赔款的此种结余只能是很少的，因为除非另有规定，应于12月31日偿还的赔款总额达三百七十万一千一百十五英镑（不计算欠付的利息）。

我相信：目前这份报告将清楚说明，就海关岁入的支付而言，关于赔款帐目的不满意状态完全是由于该项岁入的不足，而不是由于利用该项岁入偿还借款和赔款的安排方面有任何缺点。也许

不需要补充说明：海关收入是目前可得到的唯一税源；六个月之后，中央政府甚至仍不能够从各省征收到任何数目可观的税款。

朱尔典谨上 1912年5月29日于北京

第37件的附件 国际银行家委员会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按照北京外交团于1月间批准的决议第七款规定，“国际银行家委员会应通过各国驻上海领事，向外交团提出一份季度报告，说明中国海关所收税款的拨付情况”，我荣幸地随信送呈：

(一) 说明为偿还中国借款自1912年1月1日至4月30日税款总额收支情况的报告书。

(二) 至4月30日为止海关总税务司在汇丰银行的“洋税”帐目的副本。

(三) 至4月30日为止上海税务司在汇丰银行的“中国借款偿还帐目”的副本以及结算单。

(四) 至4月30日为止上海税务司在德华银行的“中国借款偿还帐目”的副本以及结算单。

(五) 至4月30日为止上海税务司在华俄道胜银行的“中国借款偿还帐目”的副本。

(六) 至4月30日而且包括该日在内通过汇丰银行所付中国借款分期摊还的本息表。

(七) 至4月30日而且包括该日在内通过德华银行所付中国借款分期摊还的本息表。

(八) 至4月30日而且包括该日在内通过华俄道胜银行所付中国借款分期摊还的本息表。

① 原编者注：外交部未收到这些文件。

(九) 至 4 月 30 日而且包括该日在内通过麦加利银行所付中国借款分期摊还的本息表。

从这些报告书中,您将看到,自 1912 年 1 月 1 日至上月 30 日,所收的全部税款达一千二百三十万八千八百二十八两三钱六分。从这笔款项中,已取出一千零四十三万五千七百二十两三钱四分,以支付至上月 30 日而且包括该日在内到期的各项借款所有分期摊还的本金和利息,那些借款都是以海关岁入做担保的。除了这笔款项之外,因各银行对过期未付的分期摊还款项索取利息,所以又支付了六万一千零三十一两一钱九分。手头的净余达一百八十一万三千七百十九两三钱四分,税务司帐内的贷方记载如下:

在汇丰银行的款额	604,025.62 两
在德华银行的款额	604,025.60 两
在华俄道胜银行的款额	605,668.12 两

我还荣幸地随信送上:

(一) 说明为“中国赔款”所收税款总额的报告书。

(二) 至 4 月 30 日为止上海税务司在汇丰银行的“中国赔款帐目”的副本以及结算单。

(三) 至 4 月 30 日为止上海税务司在德华银行的“中国赔款帐目”的副本以及结算单。

(四) 至 4 月 30 日为止上海税务司在华俄道胜银行的“中国赔款帐目”的副本以及结算单。

从这个帐目中并没有支付过任何款项;所收全部税款达六十三万八千二百五十五两三钱五分,税务司“赔款帐目”内的贷方记载如下:

在汇丰银行的款额	212,717.88 两
在德华银行的款额	212,717.88 两
在华俄道胜银行的款额	212,819.59 两

我另附上至上月30日为止海关总税务司在汇丰银行的“常关税收帐目”的副本，表明他有余款一千零二两六钱。

这封信将通过此地首席领事送给您。我还将把此信的副本以及说明“偿还中国借款”和“赔款”帐目收支总额的报告书分送各有关领事。

国际银行家委员会秘书 曼谨上

1912年5月13日于上海

第 38 件 海军部致外交部函

1912年6月19日收到

先生：

我奉海军部各长官的命令，送上驻华总司令官今日发来的一份电报的副本，以供外交大臣参考。

格林谨上 1912年6月19日于海军部

第 38 件的附件 驻华总司令官致海军部电

1912年6月19日发自威海卫

由于革命军在上海附近的嘉兴夺取了英国人的财产，我正派遣“新城堡”号前往该处。

第 39 件 格雷爵士致朱尔典爵士电

1912年6月20日发自外交部

关于英国驻汉口部队的问题。

您是否认为必须继续保留一百名步兵的分遣部队？陆军部已经同我商谈这个问题。他们指出：过去若干时候以来，各国租界没有受到威胁。

第 40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6月21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收到您上月 11 日的信，该信询问：最近关于分配常关岁入的决定，是否使 1912 年底处理海关岁入以偿还赔款的协议受到任何影响。

您所提到的最近那项决定，仅涉及在拨付常关岁入以偿还赔款之前，从总税务司常关岁入帐目内转移款项的保管问题，这笔很小的岁入最初是作为赔款的担保的。该决定对于海关岁入的结余问题没有关系。

我上月 31 日^①的信附上银行家委员会的一份季度报告，它和我所收到的您的那封信在途中互相错过了。该信将有助于说明偿还赔款的情况，在八、九家银行帐目之间以代替三家银行帐目之间分配常关岁入（同海关岁入相反），完全不影响赔款的偿还。

朱尔典谨上 1912年6月4日于北京

第 41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2年6月21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您 6 月 15 日的电报：关于自华北撤退英国军队的问题。

不可能预见 11 月间将会出现什么局势，但前景表明是悲观的，而不是很有希望的；据我看来，它不保证在最近的将来有撤军或减少军队的任何希望。

第 42 件 格雷爵士致朱尔典爵士电

1912年6月22日发自外交部

^① 据本书第 37 件，应为 5 月 29 日。

收到华南总指挥官来电报告说：由于香港边境内的村庄遭到袭击，将于6月25日派遣六连印度步兵巡逻边界并占领据点。

第43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6月24日收到

阁下：

关于我上月6日的信，我荣幸地随信附上黑德爵士对上月份各省情况所作的概述。

朱尔典谨上 1912年6月7日于北京

第43件的附件 1912年5月份各省情况概述

我们不能说，上月份各省情况有任何改善。在四川，扰乱人心的谣言特别多；该省似乎成为中国黄色报刊的畅销场所。鼓动者们和各秘密结社随意散布关于英军通过西藏和阿萨姆^①开进中国以及关于外国商人提出苛刻要求的传说，这些传说成为在中国很大一部分地区重新燃起排外情绪的原因。

在山东，据说义和拳已在临清州周围的好几个县出现，该知州已要求派军队去镇压他们。在整个鲁西地区，抢劫也很盛行。在征收田赋方面遇到很大的困难，虽然关于为满足国家需要征收捐款作为避免举借外债的手段一事，此地也正在进行无益的尝试。张勋正从他设在铁路线上列车内的总部迁往兖州府官邸，似乎表明他目前打算继续留驻该处。

南京留守府已交付商会十万元以上，以便在4月11日兵变的受害人中间进行分配，他们的全部要求达二十一万元。对那些损失在一百元以下的人，全数付清，但其余的人仅得到他们要求中的一个固定的比数，要求的款数越大，支付的比数越小。人们计

^① 印度邦名。

算，通过这个办法，很少有人受到严重的损失，特别是因为那些价值不大的多数赃物已经追回。不过，有迹象表明，南京的动乱现在仍未结束。

英王陛下驻福州领事报告：五月的头几天内，该口岸存在着一种不安的状况。据说，湖南士兵对他们的饷银长期感到不满，并对福建人很不友好，企图对福建人进行一次大屠杀。这个谣言使得大批居民离开福州城；据美、德两国领事看来，局势显得很严重，使他们有理由要求泊驻炮舰。然而，都督以值得人们称赞的敏捷方式采取了行动。一个曾经散发煽动性传单和尚被处决，他的首级和一名因有妨碍治安行动而被斩首的士兵的首级一起展览示众。人们终于恢复了平静。

英王陛下驻汕头领事报告说：到3月底，不受约束的客家人首领林志成^①已赶走广州民军当局所任命的陈洪阿^②，使他在潮州的势力得以巩固。他不企图建立任何形式的地方政府，但满足于向汕头商人尽力索取金钱，名义上是为了维持他的部队。广州当局委派前驻潮州府协统吴祥达^③带领一支足够的部队前往汕头，驱逐林志成并接管控制权。当吴祥达终于到达该地时，他没有采取军事措施，而着手邀请林志成参加宴会，这项邀请被林拒绝。接着，进行了一个月的争论，直到林志成被说服把他离去的代价自三十万元减至八万元为止。这笔钱已交付给林志成，双方所达成的协议是他将尽快率领他的士兵离开汕头。几天后，人们发现，林志成已经带着款项悄悄地溜往香港，留下他那些未付饷银的士兵。汕头商会又一次募集款项，将船票和钱发给士兵，把他们送往广州，但大多数士兵把船票换成了钱，不知去向^④。

①②③ 译音。

④ 原件未署名。

第 44 件 海军部致外交部函

1912 年 6 月 24 日收到

先生：

我奉海军部各长官之命，送上驻华总司令官本月 23 日关于中国动乱的一份来电的副本，以供外交大臣参考。

格林 谨上 1912 年 6 月 24 日于海军部

第 44 件的附件 驻华总司令官致海军部电

1912 年 6 月 23 日发①

全中国普遍的形势较前些时候恶化；应驻广州总领事的请求，又已派遣部队前往该处。

第 45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2 年 6 月 25 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驻汉口的英国部队问题。

关于您 6 月 20 日的电报。

我已仔细考虑此事，目前不能够建议撤退驻军②。

第 46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 年 6 月 26 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报告：英王陛下驻四川、湖北和其他省份领事官员们最近的信件和电报，说明关于外国监督对华借款的建议所重新引起的排外的宣传鼓动。

① 原件未注明发报地点。

② 原编者注：副件于 1912 年 6 月 26 日送给陆军部。

在一份备忘录（我荣幸地随信附上其副本）中，我促请中央政府密切注意这种宣传鼓动可能产生的后果，其主要特点已在备忘录中作了叙述。人们带着某种程度的热忱向国家自动捐献的呼吁仍继续遍及各省，并通过对借款建议的性质作歪曲报道以及援引各国对土耳其和埃及实行财政控制、法国清偿普法战争赔款的事件等，支持这种呼吁，表现出他们不仅对政治经济的基本原理而且对现代历史的简单事实是幼稚无知的。

昨天，我向袁世凯谈到这种宣传鼓动，并诚挚地使他牢记必须在它呈现巨大的规模之前予以制止。他把此事归之于中国人的盲目无知以及对欧洲进行的拖延已久的借款谈判所进行的广泛宣传。他对各省发出一份电报，告诫他们制止反对借款的鼓动，但是，经验表明，此类步骤在目前的情况下仅有很小的效果。

朱尔典谨上 1912年6月6日于北京

第 46 件的附件 致外交部备忘录

英王陛下公使荣幸地促请外交部认真注意在四川、湖北和中国其他各省重新发生的排外宣传鼓动。

3月18日，在四川嘉定，张贴了一份声称是地方当局发布的告示，对每个外国人的首级悬赏一千两，而4月间在四川省内，人们把那些写着对俘获或杀死每名外国人者给予一千元奖赏等字样的木片扔入长江，让它们漂流而下，直到官员们采取适当步骤取出这些木片并予以毁灭为止。

大约与此同时，“红灯会”在安县、大邑、温江、郫县、灌县、大足和其他地方出现。该会活动的特点，与1900年“义和拳”的活动很相似；人们知道它的一些成员身上带着写有“扶清灭洋”字样的旗帜。

这些和其他怀有敌意的表现，无疑是最近反对中国缔订外债

的宣传鼓动所促成的；地方官员实际上是支持而不是制止那些宣传鼓动。英王陛下驻成都总领事本月1日来电说：5月31日，财政司长发布一张以加速征税为目的的告示，声称外国人对中国长期怀有阴谋。各省负责官员对于外国借款的态度既然如此，所以并不奇怪，地方报刊感到可随意发表更加具有煽动性的言论，其必然结果是人民充满了公开敌对的情绪，并使公共的安宁受到严重威胁。

朱尔典爵士想提醒外交部：制止目前这种宣传鼓动的排外倾向，不仅是各省当局而且也是中央政府必须用尽一切办法促其实现的职责。

第 47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6月26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报告，5月15日，我收到香港总指挥官的一份电报说，如果认为有必要保留目前驻扎在广州租界的英国部队，他准备以人数相近的部队替换他们。我征询英王陛下驻广州总领事的意见，他报告说：他认为目前的形势证明有理由于6月初全部撤退那些部队。

我还同海军总司令官进行了磋商。我们同意：虽然毫无疑问始终有可能发生反对革命的事件，但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我们没有理由承担由于换防和留驻英军而带来的巨大费用。目前，有一艘英国军舰长期泊驻广州，必要时部队可以在几小时后自香港抵达该口岸，而在援军到达前，沙面租界的位置使得它是可以防御的。

因此，我今天将此意电告英王陛下总领事。毫无疑问，部队不久便将撤往香港。

朱尔典谨上 1912年6月8日于北京

第 48 件 外交部致陆军部函

先生：

关于您本月 8 日的信，询问中国的形势是否保证于 11 月间自北京撤出皇家英尼司吉林明火枪团第一营的问题，我奉外交大臣格雷爵士之命，随信附上英王陛下驻北京公使来电的副本^①，该电说：在最近的将来，前景不保证有撤军或减少军队的任何希望。

格雷爵士完全同意朱尔典爵士对此事所表示的意见。

兰利谨上 1912 年 6 月 26 日于外交部

第 49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 年 7 月 1 日收到

阁下：

我在本月 6 日的信中报告说：我已向袁世凯抗议反对借款的宣传鼓动在各省呈现的巨大规模；他答应发布电令，说明情况并警告人民不得激起动乱。

给四川当局（它是主要的有关省份）传达这些训令的电报，已在本地报纸上发表，现随信附上一份副本。

朱尔典谨上 1912 年 6 月 12 日于北京

第 50 件 海军部致外交部函

1912 年 7 月 6 日收到

先生：

我奉海军部各长官的命令，送上驻华总司令官本月 6 日关于

① 原编者注：第 41 件。

芜湖骚乱的一份电报的副本，供外交大臣参考。

格林谨上 1912年7月6日于海军部

第 50 件的附件 驻华总司令官致海军部电

1912年7月6日发^①

自南京遣散的士兵们于7月4日在芜湖制造严重骚乱。

暴徒们抢劫并焚烧大商店。英王陛下军舰“黑莓”号和“飞马”号泊在该处。此事已向朱尔典爵士报告。

第 51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7月10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随信附上英王陛下使馆武官写给我的关于最近中国军队哗变的一份报告的副本。

朱尔典谨上 1912年6月24日于北京

第 51 件的附件 韦乐沛中校的报告

最近中国军队在极为分散的地区发生的事变，说明军事动乱的重新出现，并表明纪律的普遍松弛，这种情况是全国的不安定状态以及军队的心目中对他们的军饷和前途捉摸不定所产生的。在北方军队中，关于解散的谣言是造成很大的不满和动乱的原因。

下面是我所说的缺乏纪律的一些事例：

一、第三十四标策划于上月底在南京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兵变，但迅速遭到镇压。6月9日，关于南京的形势，我得到如下

① 原件无发报地点。

的消息：

“城内士兵的数目确实超过了三万人，其中约一千二百人是广东人，其余的大都是湖南、安徽、江苏、山东等省人。

大约一个月前，这些部队的全部轻武器弹药都被收回，除了警备军所有者之外。警备军是一支武装警察部队，有二千四百人，他们似乎是发生骚乱时黄兴所依靠的队伍。

5月26日，驻扎在展览馆的第三十四标策动一次大规模的兵变，但被警备军镇压下去，他们包围了叛兵，并把机关枪对准那些营房。

5月28日，预料另有骚乱发生，在各国领事馆布置了卫队，他们在那里留驻了四天。

同一天，帝制派的两名间谍在城内被逮捕，不久便被处决。

6月1日，外务司长请求各国领事提供帮助。

在中国中南部地区，大约有十万名军队注视着黄兴的动向；南京的上层人士似乎认为，他的离去将意味着灾难。

6月6日，盛传军队起事，是由帝制派的秘密代理人煽动起来的。同一天，驻扎在北门桥附近的第十六标和第十七标奉黄兴之命解散，给予了一个月的军饷。士兵们要求发给两倍的饷银，这项要求被拒绝之后，他们全体开往城南的制造局。警备军又急忙出动，迫使他们逃跑而没有发生任何严重的冲突。南京城在几小时内处于惊慌状态，这是多年来所未有的；有钱人居住区域（城西南部）内的所有银行和大商店都关上了大门。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两个月前大动乱爆发时，也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必须认为局势是异常严重的。

士兵们的情况同两个月前完全一样。他们现在的人数大约有五万人。主要的毛病在于这些士兵几乎没有很多事情可做。星期天不是他们唯一的‘休息日’；我知道，我在南京城北部和中心见

到他们无事可做和到处游荡，这对他们每天的情况是具有代表性的。

士兵们的饷银多少不等。我见到有些士兵每月得到三元半，另外一些士兵每月得到七元半。除了警备军（武装警察）之外，驻军将近两个月没有发饷。此事是确凿无疑的，正象南京没有可供发饷的银钱也是确凿无疑的一样。居民目前的状态显然很惊慌。前几天，一种意外的和完全没有恶意的声音使得满街的商店关上了大门。

张勋回来一事始终是人们感到很可怕的事情，因为它预示反革命事件的即将来临。南京没有任何排外情绪的迹象。天黑后，城内实行戒严令，所有主要街道都有武装警察严密巡逻。”

二、军队策划于6月1日在苏州发动暴乱，但由于过早地泄露给了有关当局，所以遭到失败。英王陛下公使通过英王陛下驻上海总领事收到关于此事的下列说明：

“大约一个月前，曾任代理山东都督三个月之久的牛承业（苏州人）返回苏州，开始在军队中秘密鼓动暴乱，自称为反对革命的领袖，企图消灭都督和其他官员，使他自己成为首领。他的拥护者有（都督衙门的）蒯某^①和几名军官，其中包括县防团的朱统领和指挥该团第一营和第二营的管带，这些人所统率的士兵人都是江苏人，准备跟着他们的长官一致行动。该团第三营（安徽人）和构成其余驻军大多数人的第四十五标及第四十六标，拒绝同牛承业发生任何关系。暴乱订于6月1日中午发动，但5月31日，指挥县防团第三营的管带向当局报告了全部情况。都督派警卫部队和一连炮兵前往两营叛兵在城西北约两英里处的游墅营房，强迫他们于5月31日下午十时左右投降，并交出他们的武器

① 译音。

② 译音。

装备。蒯某和他的两位同事被逮捕。牛承业逃跑了，但朱统领和他的三名部下于次日被捕，蒯某及其同事和两名部下被枪毙。6月2日，朱统领和两营的管带由军事法庭审判，据说其中一人于3日枪毙。对两营哗变的士兵，每人发给九元，并予以解散。忠心耿耿的县防团第三营被调往第四十五标。

从吴淞调去的六百名士兵于6月2日在苏州东北十英里处的外家塘^①下火车，因为动乱已经结束，不需要他们的帮助。

我得到的印象是：如果暴乱象原订计划那样发生，而且都督被杀死，那么，整个这部分地区的军队将普遍起来闹事。”

英王陛下驻上海总领事在提出这份报告的时候，谈到这些情况同导致武昌起义的情况很相似，并且又说：这个事件中最坏的一点是对大约一千名心怀不满的士兵发给军饷，而不予惩罚，他们或许将在上海附近的各小河中进行抢劫。

三、在烟台，中国士兵们的态度似乎日益具有排外性。

6月10日，首席领事把烟台商会关于八千名士兵被安置在居民家中对该口岸贸易所产生的不利影响的一封信，送给担任外交团首席公使的英国公使。首席领事在送这封信时特别说明：“我们还很遗憾地觉察到这些新兵中间迅速增长的对外国人的敌对情绪，它对朋友和敌人来说都是一个威胁。”

6月11日，英王陛下驻烟台领事谈及“由于军队继续驻在此地，人们又一次开始感到焦急不安，军队的人数已经增加，而且缺乏支付军饷的适当款项。”他进一步说：这些无理行动，“如外国人经过时，他们故意吐唾沫，并且军队在行军中遇见外国人或经过外国人住宅时，突然高唱具有排外性的歌曲，都是很经常发生的事情。”他又说：“担心发生兵变的中国商人们，为了安全起

① 译音。

见，又一次把他们的贵重物品运往大连或青岛，有些人还把他们的家属送去，正象他们以前曾经两次做过的那样。内地出产生丝和草帽绳的中心正受到成群结队的土匪和武装逃兵的蹂躏。”

四、在济南府，巡防队于6月13日和14日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兵变。英王陛下驻该地领事对此事所提出的报告如下：

“在驻扎此地的巡防队中，最近似乎存在着一些不满情绪，部分是由于更换总指挥官，部分则是由于本地报纸上传闻该队将被解散。

到处还广泛传说那些主张恢复帝制的代理人试图在巡防队中煽起暴乱。还有另一个传说：最近在天津被解散的士兵，由于希望参与即将发生的抢劫，声称巡防队不久也将遭到失业，诱使他们哗变。

无论如何，在6月13日至14日傍晚，一大批巡防队（看来他们似乎拒绝参加哗变）离开他们在东郊的营房，前往城北几英里处的制造局。他们在这里与制造局卫队谈判，这些卫队也是巡防队，其中多数人已参与哗变，让他们取得武器弹药。

接着，他们走了回去，于凌晨四时从东门闯入城内，在采取行动过程中使用了一挺机关枪。这时，位于城西的租界内已有陆军的重兵驻守，他们对一批绕过租界边缘试图从西面入城的叛兵开火（见到他们的一位外国人说，他们仅朝天开枪）。没有人企图抢劫租界；这似乎是在那里发生的所有开火情况。

那时，抢劫者已经入城，开始抢劫各主要街道。我直到五时左右才被叫醒，可以听到城内的许多步枪声，离领事馆大约有一英里半的距离。这种声音持续到早上七时左右。还发生了大火，焚毁了那条主要街道上约三百码长的范围内以及街后两旁相当长的范围内所有的房屋。骚乱大都发生在西大街，这是城内的一条大街，所有做大买卖的商号都在该处。不过，其他地方的大商店

也遭到抢劫，郊区发生的抢劫很少。

邮政局、全部钱庄以及几乎所有的大商店都被抢劫。我迄今还未听说对损失所作的估计，但数目一定是相当大的。

当然，抢劫者大都是巡防队，但据说城内的少数一般警察、警卫队和陆军在亲眼看到发生抢劫的时候，也抵制不住参与其事的诱惑。一批地痞流氓也参加了抢劫。

陆军第九十四标的一部分部队驻在城内，除了少数情况外，他们仍然是忠实可靠的。我不知道他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真正试图平息暴乱。枪声密集达三小时，但很少有人死亡；据说士兵们仅朝天开枪。

早上七时左右，抢劫者们开始离城，强迫苦力在他们前面搬运赃物。他们前往南面的山区，并进入周围的农村。人们似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制止他们。

断断续续的枪声逐渐越来越少，终于变成了偶尔单独的枪声，一直持续到中午为止。下午二时左右，下了一小时的大雨，对恢复秩序和扑灭闷火很有作用。

我被人叫醒后，便立即打电话给都督，他亲自告诉我，有一千名士兵哗变。

我后来听说：都督已把他自己的妻子和家属送往离他的衙门不很远的罗马天主教会，他们是现今城内仅有的外国人。

这里，我可以这样说：早上七时以前，属于官吏家属的六十名中国妇女和儿童，其中有些人住在本领事馆附近，已来到英国教会避难。

我前往衙门途中，走过那些遭受损失最重的街道，没有看见附近有死尸。大火仍在燃烧，有证据表明损失是很大的。一切都很平静；我走过时没有遇到任何困难。这时，人们十分怀疑：有一批巡防队仍在城内；那些早上带着赃物出去的巡防队又已经回

来，以便夜间继续进行抢劫。陆军将如何行动，也是一件很费猜测的事情。人们感到有些焦虑，但夜间很平静地过去了。陆军于下午七时扫清了城内各街道，那时以后不许任何人留在街道上。

第二天下午，都督派人送信给德国领事说：他保证所有外国人的安全，他们将受到他认为可以信赖的陆军的保护。

我认为在目前的形势下没有任何惊慌的理由，一切取决于陆军（新军第五镇）的态度。马统制个人对他的部队有相当大的影响，人们相信他能很好地控制他们。兵变后头两天夜间他们没有发生动乱，这个事实便是对于将来的一个很好的迹象。”

史密斯领事的这份报告澄清了关于都督为谋求安全而逃往罗马天主教会的谣言。另一方面，都督似乎表现出值得称赞的勇气，并亲自伴随着军队。

五、在盛京，满洲第二混成协第三标于6月19日晚十时哗变。住在该地的语言学者卡迪尤上尉于本月20日打来电话，简要地告诉我关于此事的消息。此地路透社后来发布的消息说：发生胡乱开枪的现象，直到天亮时为止。设在城外北郊的交通银行被抢劫和焚烧，其他好几家银行和珠宝店也是如此。很少有人丧命。外国人未受到任何干扰。外国妇女和儿童在英国总领事馆谋求避难。大约有一百幢房屋被焚毁，但到中午大火已被扑灭。

卡迪尤上尉的消息说，叛兵们未能入城。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暴乱发生在中国陆军的最好的一支部队中间。满洲第二混成协是构成北洋陆军各镇的一支特殊部队，在组成东三省地方的各镇陆军之前，它被借调去满洲。北洋陆军第二镇和第四镇是留在袁世凯（当时任直隶总督）控制之下的仅有的两镇，而其余的京畿各镇已被置于陆军部的直接管辖之下。我继续想起这件事：满洲第二混成协在革命时期是坚决效忠于清王朝的，拒绝接受协统蓝天蔚的诱惑放弃其忠诚，蓝天蔚离开了该

协，后来率领一支革命军自上海前往烟台进行北伐。

六、上海：据路透社消息，6月19日下午，上海城内因军饷问题发生了一次暴乱。有一名士兵被杀死，其余几人负伤，但其他方面的情况并不严重。

6月17日发自上海并于次日发表在《北京日报》的一份电报说：制造局驻军的工资已按期给付，但闸北驻军的饷银没有发放。李将军^①曾提议先发给闸北驻军每人一元，他们拒绝接受。人们不知道不发给他们军饷的原因。

七、在北京和保定府之间的涿州，第三镇部队于几天前发生动乱。步兵第九标标统伊东才^②被他所部士兵杀死。

八、在北京西南约三十英里的白沟河（在琉璃河附近），据说淮军（直隶省部队）第五营和第六营士兵在前几天携带武器逃跑。

九、在颐和园附近警卫部队营房所在的海淀，该部队中最近无疑存在着很大的不安情绪。有关方面似乎打算把该部队中的很多满族士兵调往东陵和西陵，把汉族士兵留驻海淀。这样拆散该部队，使士兵们怀疑将早日被解散。

由于中国官方对此事保持很大的沉默，所以很难获得消息；但无论如何，似乎可以肯定，士兵中间存在着一些严重的不安情绪，而且有些士兵（据说甚至有些军官）已被处决。

十、福州：英王陛下领事于5月15日来信说：“5月份头几天内，人们存在着一种颇为不安的状态。据说，湖南士兵对他们的军饷长期感到不满并对福建人抱着不友好态度，企图对福建人发动一次普遍的屠杀。大批居民离开了福州城。以鼓动人民为目的的令人难以理解的传单到处散发；美、德两国领事请求派遣炮舰。

① 疑指李平书。

② 译音。

炮舰已经派去。一名不守秩序的士兵被斩首，结果他的伙伴们破坏了审判庭，但都督下令派去的一队士兵恢复了平静。”

十二^①、信阳州：据6月18日《北京日报》的报道，该地发生了一次武装闹事。怀有不满情绪的上兵在当地流氓和散兵游勇的帮助下，据说已发动闹事，它首先从机关枪连开始，该连士兵于5月30日未经许可便离开了营房。驻扎在朱家寨、辛店、广水、刘营^②等地的士兵参与哗变。暴乱在6月12日至14日间达到了高潮。人们诱使叛兵们交出武器，并解散队伍，给军官们发两个月饷银，士兵们发半个月饷银。除了在那以前被捕的官兵之外，对叛兵一律给予大赦。那些被捕官兵正等待军事法庭审判。现在，据说附近一带地方已经平静下来。（信阳州在靠近河南南部边界的京汉铁路线上。）

十三、兰州府（甘肃）：据东亚劳埃德协会6月18日发自上海的一份电报说，驻兰州府炮兵因未发饷银而发生哗变。开了许多枪之后，骚乱被镇压下去。

十四、广州：据路透社驻香港记者的消息，沙面来电话：6月14日夜间，在各国租界（沙面）对面发生射击，士兵们在该处追赶反抗者，胡乱连续射击达十分钟之久，有好几名行人因此被杀或负伤，其中包括一名中国医生在内。

这些事件中的一个令人不满意的特点，是当局对惩罚那些不守军事纪律行为所表现的胆怯或软弱无力，那些行为只能是愈演愈烈，而继续不受惩罚。为了对部队作某些重要调动，于6月18日至23日之间把他们自秦皇岛调至北京，中央政府给京奉铁路运输局颁发命令，此事表明它认为首都的形势是不完全满意的。预订自唐河（在秦皇岛附近）、北戴河和留守营（在北戴河附近）

① 原文缺“十一”项。

② 译音。

运送军队的车辆数目是：头等车九辆、三等车五十三辆、装载碎石的货车十辆及篷车三十七辆；这些车辆足够运送一个混成协的四、五千人。然而，晚上十时，驻丰台英军指挥官来电告诉我，该部队的调动已经中止，即运输局已被告知，他们现在无需调派车辆。不过，起初发布的命令是当时的一个重要迹象。

武官 韦乐沛中校 1912年7月120日于北京

第52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7月11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说明，我收到英王陛下驻喀什噶尔总领事论及新疆革命运动进展情况的下述消息：

驻乌鲁木齐的守旧的巡抚与据有伊犁的民军首领之间的不和，于4月1日引起了激烈的冲突，结果袁大化巡抚被击败，损失一千名士兵。4月13日，革命党在阿克苏发动一次暴乱，杀死了道台和知府。关于这个事件的消息在喀什噶尔造成了深刻印象。道台立刻剪掉了他的辫子，劝告汉人也这样做。他还在他的衙门中悬挂一幅卷轴，上面题有“中华民国万岁”字样。可是，有些官员，包括提督乔提台在内，予以拒绝，继续留着辫子。

到4月底，喀什噶尔的道台和提台（提督）调解了他们的分歧，因为提台已经真诚地声明赞成共和，并剪去了他的辫子。由于驻乌鲁木齐的巡抚认识到没有希望保住他的地位并提出辞职，伊犁和乌鲁木齐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已缓和下来。马继业先生说：喀什噶尔的居民仍然是平静的，认为斗争纯粹是一件关系汉人的事情。

① 系6月之误。

5月间，动乱又重新开始，因为库车知州于5日被害，已接受民军都督职位的尹^①道台和喀什噶尔知州于7日被害。提台宣布他自己为都督，全城极为惊慌。可是，谋害者推举了其他官员担任空缺的职位。然而，看来这次事变与其说是反对共和的人发动的，倒不如说是散兵游勇和流浪乞丐发动的。为了满足这些散兵游勇和流浪乞丐起见，提台把他们组成一支新的军队；自那一天以来，喀什噶尔几乎处于他们的摆布之下。文武官员只有听从他们的意见，才能够指导他们。5月20日，马继业先生来电说：这伙人现在已有五百人，正对当局进行敲榨勒索。被他们推举出来的那位道台处于恐怖状态中，遵照他们的命令行事。不过，到本月底，那些首领们之间开始互相争吵。外国人没有受到干扰。

朱尔典谨上 1912年6月24日于北京

第53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7月15日收到

阁下：

唐绍仪突然动身前往天津以及他后来辞去国务总理职务一事，在北京引起了人们的很大兴趣和很多猜测，普遍认为这是一个迹象，表明以唐绍仪为最杰出代表的粤派人士对袁世凯及其政府的政策感到不满。过去若干时候以来，总统与国务总理之间的疏远关系已经可以觉察出来并日益增长；他们之间旧的友谊显然再也经受不住尖锐的政治分歧所造成的紧张关系。因为参与了南北双方在上海举行的会谈，唐绍仪自称为民国的缔造者，并倾向于主张享有超过总统愿意给予他的权力。他属于共和派中的激进派，背后有孙逸仙、黄兴和南方其他领袖的支持。另一方面，总统代表整个国家，避免同革命变革所产生的许多政治派别发生任

① 译音。

何联系。内阁总理的辞职，使得内阁中好几名成员退出内阁；看来总统一度似乎很难继续进行政府工作。事实上，新任命的人选不大可能加强他在国内的地位。接替国务总理职务的外交总长陆征祥一直在国外担任公职，对他本国的情况不了解或没有经验。他是十分和蔼可亲和令人喜悦的，但不具备一位领导人所具有资格，而且他的身体情况很可能证明是他长期任职的一个障碍。总统仍然是中国唯一的强有力的人物，似乎没有被他的朋友的遗弃或他的敌人的诽谤所吓倒。最近，他的敌人散布谣言说，他想要当皇帝。为了对付这个谣言，他发表了一项声明（现附上它的副本），要求所有的人都相信：在革命爆发前很久，他便已信仰共和的理想；请老天爷作证，他绝不辜负国家委托给他的任务。

朱尔典谨上 1912年6月28日于北京

第54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7月22日收到

阁下：

附上临时参议院一致通过的关于邮政的报告，它对于中国有关当局对具有外国色彩的所有机构采取的态度是一个很重要的说明。他们打算解除法籍总邮政司昂黎先生的所有行政权力，并把他的职务降为“头等顾问”，至于他的建议是否被接受，与他无关。邮政机构中的其他外国人将被置于与中国雇员相同的地位，如果他们不服从中国邮政局首领的命令，将被解职。

朱尔典谨上 1912年7月5日于北京

第55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7月22日收到

阁下：

关于我上月7日的信，我荣幸地随信附上黑德爵士对6月份各省情况所作的概述。

朱尔典谨上 1912年7月6日于北京

第55件的附件 1912年6月份各省情况概述

上月份的主要特点，是在驻盛京、济南府和其他中心的军队中发生零星的暴乱。这方面的情况已由武官作了详细报告。所有这些事件的目的似乎都是相同的，即为了进行抢劫；外国人没有受到骚扰。在盛京，据说士兵们的饷银已发至5月底，但由于伙食、制服和其他必需品以及强制认购国家公债扣除了很多钱，所以他们得到的实际饷银是很少的。因此，他们感到十分不满，决定采取现在已几乎被人们所公认的手段来弥补欠饷。对主要肇事者所施加的严重惩罚，绝没有减少他们的不满情绪。

烟台的形势在四月间已表现出改善的迹象，现在又已提供了使人们感到严重忧虑的理由。领事团极力劝告采取措施立即解散或大批调走驻扎在该城周围的军队（约八千人）。中央政府已决定从最近的三百万两借款中抽拨四十万两支付山东北部军队的饷银和解散费用，据说已有三十万两为该目的汇往烟台。袁世凯派朱东藩^①将军前往监督军队的解散，但他到达后发现仍未达成协议；该地的形势仍被说成是很严重的。

四川仍继续经常发生革命鼓动家们所煽起的动乱。布朗先生自重庆报告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认为，除了在那些较大的城市之外，在该省的那部分地区，人们普遍感到生命财产不安全，而那些较小的城市则陷入混乱状态。关于公债投机的事情从四面八方传来；除非迫不得已，商人们不再接受战时纸币，一切迹象表明

^① 译音。

即将发生破产。然而，正是该省的这个地区，似乎在全国捐献运动中起带头作用，人们对此事表现出很大的热情。据说，已把五十万银两汇往北京，另一笔一百二十万银两的款项不久便将接着汇去。发起宣传鼓动的人们竟说一亿银两的款额是终于将得到的最保守的估计；如果他们得到的钱接近这笔巨大款额，那将是一件使人们普遍感到惊讶的事情。他们召开会议，为此项目的发表演说；据说军官们已宣布他们打算捐献一个月的饷银，士兵们为这个事业捐献一个月饷银的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一个有六人为执行委员的机构已经建立起来，以促进这个运动并监督款项的募集；所有行会都已同意劝告它们的成员捐献。借款的建议所引起的排外情绪似乎将大为平息，因为应袁世凯之请正在向人民说明那些建议的性质。重庆的地方报纸用友好的词句写了一封信给代理领事，向他保证：捐献运动纯粹是一个爱国运动，没有排外的倾向性。

同四川的情况相对照，英王陛下驻镇江领事报告说，该地区没有任何反对借款的宣传鼓动的迹象。镇江人民的利益似乎主要是地方性的，关于民国前途的想法没有超出那些利益的范围。对于募集公债作了一次不很热情的尝试，它在人民的心目中是同某种形式的人口调查联系在一起的，该地正在进行这种调查，以便征收人头税。

英王陛下驻南京领事报告说：在江苏省的南京和其他地方，军队中的不安情绪在增长中。人们用金钱收买第三协听从命令，对每名士兵支付十二元和旅途费用，对军官发放两个月饷银，以换取他们同意取消所有应付的欠饷并悄悄解散。可是，后来其他各标，主要是驻临淮关的各标，发生了麻烦，临淮关居民只得支付三千元现银，才能够免遭抢劫，他们被告知这笔交易仅在一周内有效。7月3日，芜湖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动乱，伴有通常的抢

劫和焚烧。

正如上个月的概述中所说的那样，张勋将军已迁到他在兖州府的新居，现在已被说服把他所控制的车辆交回津浦铁路。该铁路线上的运输正在迅速发展，但它有受到阻遏的危险，因为人们拟在浦口终点站设立一个厘金局，该处迄今为止是没有设立的。

6月14日，江苏都督程德全自苏州抵达南京；黄兴将军于当天晚上动身前往上海。

从人们向驻汉口代总领事提供的消息看来，目前河南总的形势几乎是正常的，没有提供任何令人感到不安的理由。

在福州，人们仍处于普遍的紧张不安状态；不能够说那部分地区使它目前所处的实际上不受约束的地位有任何良好的转变。

由于5月底停泊了英国摩托艇“吉安”号，西江上很少发生海盗行为。可是，在梧州地区，陆上的抢劫活动仍继续盛行。有十人或十二人的一些小股土匪到处游荡，抢劫那些分散的房屋。政府仅能勉强维持，却对那项把省城迁往南宁的建议一味进行无益的争论。绅士们分裂为几个派别，互相争吵。人们估计，一个月之后将没有足够的钱支付军饷。

黑 德

第 56 件 陆军部致外交部函

1912年7月26日收到

先生：

一、关于您1912年6月26日的信，我奉陆军委员会的命令通知您：鉴于外交大臣所表示的意见，他们已决定派另一营英国步兵替换皇家英尼司吉林明火枪团——他们订于下一次运输军队时离开华北。

二、这次换防将于11月初实现。

沃德谨上 1912年7月25日于陆军部

第57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2年8月2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昨天签订了一项协议，任命莫理循博士为中国政府的政治顾问，期限为五年。

第58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8月26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附上我所收到的外交部照会的译文。该照会重申为各省铁路制定的那些原则，即除非事前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同外国人缔订的借款将不被认为是有效的。

我已向英王陛下的领事官员们发布通令，要求他们将这份照会的内容通知在他们各自地区内居住的英国臣民。

朱尔典谨上 1912年8月5日于北京

第59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8月21日收到

阁下：

关于我上月6日的信，我荣幸地随信附上黑德爵士对7月份各省情况所作的概述。

朱尔典谨上 1912年8月6日于北京

第59件的附件 1912年7月份各省情况概述

虽然全国的情况还有许多尚待改进之处，但上月份表现出某

些消极方面的改善。军队中没有发生严重的动乱；部队的解散正逐渐实现；人们对政治感到厌倦，纷纷回家进行收割；关于全国捐献的宣传鼓动因缺乏重大的支持，表现出消失的迹象。

英王陛下驻济南府领事报告说：经过上个月的兵变后，该地的情况正在恢复正常状态。他们正采取措施解散主要的部队，希望在三个月内实现。都督本人每一两周检阅一次部队，分成小批地解散他们，每次约二百人。

被派去监督解散驻烟台部队的朱东藩将军，由于北京方面没有给地方当局发布适当的指示，最初遇到一些困难，但他现在已拟订一项计划，只要得到必需的款项，该计划将证明是令人满意的。到这个月中旬，由于士兵和暴民方面爆发了剪辮的狂热，烟台的形势又变得严重起来。一队队用步枪和剪子武装起来的士兵在街道上游行，剪掉他们所遇到的所有那些人的辮子。此事持续了两天，在各阶层居民中间引起了普遍的惊慌：商店关门，街道上空无一人。这个运动的一个重大特点，是他们表现出对外国人的权利完全漠不关心。一队士兵闯入一家外国人的商店，剪掉了所有中国职员的车辮。他们遇见一名属于某领事馆、身穿制服并带着一件公文的信差时，毫不犹豫地剪短了辮子。他们还试图进入柯纳柏公司的办公室，只是由于该公司人员做出使用武力的样子，才阻止了他们。他们顺利地进入法商托齐公司的大院，但人们不费力气地赶走了他们。一名乘坐黄包车的妇女遭到他们拦阻，被迫等待那个苦力剪掉辮子。从英国圣公会大院走失的一个八岁的儿童被他们捉住，在反抗过程中受了重伤。领事团向代理都督提出了严重抗议。最后，统率大部分军队的廉将军^①本人持着手枪巡视街道，以恢复秩序。地方当局后来向领事团表示歉意，因

① 译音。

为士兵们表现不尊重外国人的财产。在英国代理领事的请求下，廉将军贴出一张告示，声称要对重犯此类罪过的人施加严重惩罚。廉将军现已被任命指挥驻烟台的所有军队，在解散军队一事中正努力和朱东藩将军合作。

在南京，英王陛下领事报告说：各阶层人士在精力充沛的程德全将军的管辖下正迅速恢复信心。虽然北京方面仅从许给的二百万两款项中汇了二十万两给程德全，但他们允许他从四川省认购的五十万两国家公债中截留二十五万两，不过他实际上仅得到后面这笔款项中的十万两。都督利用这笔钱解散了各标中的约二、三千名杂牌士兵。这些士兵除了得到他们的饷银之外，还得到六元半作为旅费。但不幸的是，人们发现，大部分士兵用这些钱在城内过着荒淫的生活，现在一无所有地到处游荡，使那些比较平静的居民感到吃惊。程德全在改革内政方面也证明是同样积极的，从黄兴将军留下的烂摊子中迅速理出头绪来，但即使是为了日常费用，他也很难获得足够的款项。

据说，江西省正逐渐恢复正常情况，它在解散部队时没有发生动乱。据说湖北的情况也相类似，黎元洪现在该处声称，在他的指挥下仅有六万人左右，这个数字大约是几个月前他所有的士兵人数的一半。

在湖南、陕西、甘肃、河南等省，虽然据说对外国人没有任何危险，但情况仍很不稳定，抢劫行为和恐怖行为依然猖獗。7月10日，河南府发生一次兵变，伴有抢劫行为。在开封，一支约有三十名武装士兵的军队于7月27日进入省议会，驱逐议员，使他们中间约有十人或二十人受伤。攻击者穿着平民服装，但据说他们是士兵，其目的是要吓唬省议会，它最近曾对他们的行动提出批评。英王陛下大使馆的葛雷医生应中国当局的请求，已前往开封，对负伤的议员提供医疗上的帮助。幸亏今年河南的年景特

别好，因此人们希望，这种年景可以诱使大批士兵返回他们的家园。

四川仍然因高级官员之间的不和而受到骚扰，但人们希望，把居民中的那些比较好闹事的人派去远征西藏，可以消除引起不安的直接原因。关于借款建议的排外宣传鼓动似乎已经瓦解，虽然全国捐献运动仍在继续进行，但它不再受到人们同样热情地欢迎。据说，各省军政府已把去年发行的战时纸币付给许多认购大量公债的人，现在这些纸币几乎是不能流通的。财政部公布的关于迄今已送至北京或正在途中的总款额如下：

湖 南	300,000 两	，已收到
河 南	300,000 两	，未收到
陕 西 ^①	500,000 两	，已收到
吉 林	800,000 两	，未收到
黑 龙 江	150,000 两	，已收到
成 都	500,000 两	，已收到
重 庆	1,000,000 两	，正在途中
南 昌	200,000 两	：仅收到 100,000 两
广 东	1,000,000 两	：仅收到 360,000 两
广东商会	380,000 两	，全部收到
云 南	200,000 两	，全部收到
桂 林	200,000 两	，已收到
总共 5,530,000 两(约合 730,000 英镑)；其中已收到			
2,690,000 两(约合 370,000 英镑)。			

除了上述款项之外，马六甲海峡殖民地、菲律宾等地的华侨也寄来捐款。另一方面，必须记住，北京方面现在没有收到各省通常的任何税款，相反，各方面正极力要求它提供款项。

南方的广西、广东、福建等省实际上仍不受北京方面的控制。英国驻梧州代理领事报告说：没有任何一个民政官员的任命得到

^① 原文误作“陕西”。

了中央政府的积极同意，而军官也都仅由都督任命和调动。在中央政府企图干预的唯一事情上，即关于把省城迁往南宁的问题，它不得不听从地方的愿望。地方当局正在尽力镇压该省内仍很猖獗的抢劫行为。在过去六个月内，仅梧州一地就有五百名以上的土匪被斩首；据说广西其他地区在同样的规模上对土匪实行处决。

黑 德

第60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2年9月5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云南省南部和西部似乎即将发生广泛的武装暴动，人们猜测它是李根源将军策动的，他想恢复他的威望。

英王陛下驻腾越领事认为已出现危急的形势。我已授权他斟酌决定，在必要时和大理府的其他英国臣民及传教士们一起撤往缅甸。他可以向缅甸政府请求派遣一支卫队，如果中国人拒绝提供卫队，而且如果没有卫队就不能够实现撤退的话（看来是有可能的）。

第61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9月14日收到

阁下：

经过军事法庭的简短审判之后，根据总统的命令，于本月16日星期五凌晨在北京城外对张振武和方维进行处决一事，引起了人们的许多批评，他们天真地认为中国已经发展到宪法阶段，此种激烈措施在共和国家中是没有必要的和令人憎恶的。

他们两人中比较著名的张振武，原来是武昌初等学堂的一名教师，但当兵后把自己的命运与革命联系在一起，迅速升任军务

部次长的职务。他似乎对革命事业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并赢得了他的首领黎元洪将军的赞许，然而这种赞许因他后来的行动而丧失了。对他的控告包含在黎元洪将军致袁世凯总统、内阁和临时参议院的几份电报中，他们已把这些材料广为散发。有些控告是颇为含糊其词的，但他被指责大量挪用公款和篡改帐目，以及为推翻目前的政府而策划一次武装起事，这无疑是公正的。据说有材料证明（虽然这些材料尚未公布），他的计划包括谋害总统和副总统，以及使前江苏都督¹陈其美、一度担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总长的黄兴和他本人掌权，分别担任总统、副总统和总司令。当张振武最初成为嫌疑分子的时候，他曾被任命担任蒙古的一个特别职务，这项任命具有给他一个改过机会以及把他调离他的活动地区的双重目的，但他提出一些办不到的条件，并返回武昌重新进行挑拨离间。因此，黎元洪将军用某种借口说服他再度前往北京，因为在北京干掉他所冒干扰的危险较小。他和他的同谋在使馆区内的一家饭店吃饭，当他们前往前门外的住所时，在凌晨几小时内遭到逮捕和枪决。

临时参议院立即要求政府说明情况；经过某些犹豫之后，陆军总长于本月23日作了说明。简单地说，政府提出的辩护，是他们掌握了犯罪的充分证据，国家的安全使得他们绝对有必要采取这个步骤。我认为这个辩护几乎是无可争议的。虽然湖北的议员们在私下谈话中接受总统所作的说明，但参议院的大部分议员认为，政府提出的辩护没有证明他们所视为违反约法的行为是正当的。后来，他们叫嚷要对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进行弹劾，但迄今没有得到必需的法定人数。尽管各方面都提出了抗议，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总统的行动可望引起最激烈批评的武昌，中国各行会

¹ 系上海都督之误。

支持总统的行动。此外，根据大家所说，这个行动对袁世凯总统和孙逸仙博士之间建立的相互谅解的增长似乎绝无妨碍；南北和解的希望集中在这项谅解上面。

朱尔典谨上 1912年8月28日于北京

第62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9月23日收到

阁下：

关于我上月6日的信，我荣幸地随信附上黑德爵士对8月份各省情况所作的概述。

朱尔典谨上 1912年9月6日于北京

第62件的附件 8月份各省情况概述

本月初，由于欠付军饷，浦口爆发了一次兵变。自3月以来，部队除发了几分钱之外，没有得到任何饷银，虽然供发饷之用的款项已于最近交给了军事当局。暴乱蔓延到津浦铁路北面约四十英里的滁州府^①。柏蔚^②将军自南京率领两标部队迅速恢复了秩序，但据说大部分叛兵已带着他们的赃物逃走——这似乎仍然是中国军队中最有效的解散办法。在南京城，付清饷银解散部队的工作，在款项所许可的范围内继续缓慢地进行。不幸的是，人们发现不能够象解散士兵那样地解散军官，因为军官们已被临时委任为都督的军事随从人员。大约已颁发了三百张委任状。山东在解散军官时也遇到了同样的困难，该处部队的解散也在缓慢地进行。

7月底，报纸上发表了关于根据捏造的罪名在西安府处决一

^① 滁州系直隶州，此处原文讹误。

^② 疑为柏文蔚之误。

名罗马天主教会的中国教士的报道，从而引起某些激动情绪。陕西全省的情况仍然是很不安定的，迄今还认为不能够允许女传教士返回该省。

四川和其他重要省份的收成是很好的，但现银短缺和人们普遍缺乏信心，妨碍了恢复正常的繁荣兴旺情况。全国捐献运动不再能找到任何支持者，因为现在人们对于通过这种方式重新组织国家的可能性已经完全绝望。8月13日，英王陛下驻宜昌领事在答复英王陛下军舰“鹞”号的海军少校舰长的询问时，告诉他说：在目前的形势下，该口岸没有必要经常泊驻一艘军舰。“鹞”号军舰大概现已驶至长江下游。

来自云南府和腾越的报道说，该处情况危急。该省军队中间似乎极为不满。云南府都督蔡锷已匆忙动身前往蒙自，而声名狼藉的李根源将军仍在西部占有优势，据说他正在煽起动乱。

关于其余省份的形势，对上一份报告没有什么可以补充。北部的蒙古和新疆以及南部的广东，似乎情况愈益恶化。

黑 德

第63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9月23日收到

阁下：

关于我5月29日的信，我荣幸地随信附上上海国际银行家委员会的第二份季度报告的副本，说明至1912年7月31日为止的三个月内海关岁入的拨款情况。

该报告说明：关于以海关岁入作担保的各次借款至7月底应付的所有分期摊还的本金和利息都已偿清；7月31日手头的结余为3,447,474两。

该季度内没有偿还庚子赔款；赔款帐目的贷方余款为

1,348,116 两。这里，可以指出：因为自去年 9 月 30 日以来没有偿付赔款，所以应于 1912 年 7 月 31 日支付的款额为 2,487,412 英镑，不包括欠付的利息在内。

报告的一些附件已在该报告中作了概述。我仅随信附上该报告的最后一个附件，即上海代理税务司的一封信，谈及转拨十五万二千两厘金税款以偿还 1898 年四厘半利息金借款。这笔借款是专以某些地方的厘金税款作担保的，在今年 1 月份以前，它从未成为一般海关岁入的负担。可是，这笔借款也是以一般海关岁入作担保的。由于厘金税的征收因革命而遭到破坏，所以自今年初以来，偿还这笔借款每月所需的五十万两以上的款项，除了现在从厘金转拨的较小的款额之外，不得不完全由一般海关岁入偿付。

朱尔典谨上 1912 年 9 月 6 日于北京

**第 63 件附件 1 国际银行家委员会秘书致
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关于您 1 月 30 日的信^①，其中指出国际银行家委员会应向北京外交团提出一份季度报告，说明海关岁入的拨款情况，我荣幸地随信奉^②：

(一)说明至上月 31 日为止的季度内中国借款偿还帐目的税款收支总额报告书。

(二)自 4 月 30 日至 7 月 31 日总税务司在汇丰银行的“洋税帐目”的副本。

(三)自 4 月 30 日至 7 月 31 日上海税务司在汇丰银行的“中国借款偿还帐目”的副本以及结算单。

① 原编者注：参阅《中国第三号(1912年)》，第 113 件。

② 原编者注：外交部未收到这些文件。

(四)上海税务司在德华银行的“中国借款偿还帐目”的副本以及结算单。

(五)自4月30日至7月31日上海税务司在华俄道胜银行的“中国借款偿还帐目”的副本以及结算单。

(六)自4月30日至7月31日由汇丰银行支付的中国借款分期摊还的本息表。

(七)由德华银行支付的中国借款分期摊还的本息表。

(八)由华俄道胜银行支付的中国借款分期摊还的本息表。

(九)由麦加利银行支付的中国借款分期摊还的本息表。

(十)上海代理税务司7月1日来信的副本，谈及从厘金税款帐目中转拨十五万二千两，偿付是月5日到期的关于四厘半借款的那一期款项。

从这些报告书中，您将注意到：自4月30日至7月31日所征税款总额为10,011,524.73两，而第一个季度征收了12,308,828.36两。

偿付借款中分期摊还的那部分本息共达8,539,960.54两，而至4月30日为止的那个季度偿付了10,435,720.34两。

过期的分期摊还款项的利息仅为617.17两，而前三个月所付利息为61,031.19两。

存款利息共10,807.85两，经三家保管款项的银行应允，按二厘利息记入帐簿内。

至7月31日为止而且包括该日在内应付的所有分期摊还的本息都已偿清；该日手头的结余为3,447,474.21两，由三家保管款项的银行分配如下：

汇丰银行.....	1,149,364.88 两
德华银行.....	1,149,068.54 两
华俄道胜银行.....	1,149,040.79 两

我还荣幸地随信送上：

(一)说明为“中国赔款”所收税款总额的报告书。

(二)至7月31日上海税务司在汇丰银行的“中国赔款帐目”的副本以及结算单。

(三)至7月31日上海税务司在德华银行的“中国赔款帐目”的副本。

(四)至7月31日上海税务司在华俄道胜银行的“中国赔款帐目”的副本。

(五)至7月31日上海税务司在横滨正金银行的“中国赔款帐目”的副本。

(六)至7月31日上海税务司在东方汇理银行的“中国赔款帐目”的副本。

(七)至7月31日上海税务司在花旗银行的“中国赔款帐目”的副本。

(八)至7月31日上海税务司在华比银行的“中国赔款帐目”的副本。

过去三个月内没有偿付赔款；这个期间所收款额 705,856.94 两以及自4月30日转帐的结余 638,255.35 两，在税务司赔款帐目上的贷方记载如下：

在汇丰银行的款额.....	148,664.12 两
在德华银行的款额.....	283,316.09 两
在华俄道胜银行的款额.....	391,027.69 两
在横滨正金银行的款额.....	107,687.16 两
在东方汇理银行的款额.....	215,442.20 两
在花旗银行的款额.....	94,258.47 两
在华比银行的款额.....	107,721.06 两

各银行也已应允存款利息按二厘记入帐簿内，它总共为 4,004.50 两，已包括在上述各项结算中。

我还附上至7月31日海关总税务司在汇丰银行的“常关税帐目”的副本。

这封信通过此地的首席领事送给您；给各有关国家的领事送去一份副本。

国际银行家委员会秘书

曼谨上 1912年8月13日于上海

第63件附件2 上海代理税务司致国际银行家委员会秘书函

亲爱的先生：

我收到海关总税务司所开的厘金税帐目上的两张汇票，每张各七万六千上海两，分别向汇丰银行和德华银行提取款项。我很感谢您，如果您惠允将这两张汇票送交该有关银行，同时通知他们，这两张汇票代表总税务司所能提供的那部分厘金税款，用来偿还1912年7月5日到期的关于1898年四厘半利息借款中每月分期摊还的款项。

关于此事，我奉海关总税务司之命说明：自从付清1911年12月5日到期的那部分款项以来，各有关税区的厘金汇款几乎已经中断；现在从这方面得到的款项，代表了帐目上仅从苏州和杭州这两个税区不定期得到的那部分货厘，另有很少一部分宜昌的盐厘。

代理税务司 克罗斯谨上

1912年7月1日于上海海关

第64件 海军部致外交部函

1912年9月30日收到

先生：

我奉海军部各长官的命令，送上驻华总司令官本月30日关于自汉口撤回部队的一份电报的副本，以供外交大臣参考。

格林谨上 1912年9月30日于海军部

第64件的附件 驻华总司令官致海军部电

1912年9月30日发^①

关于驻汉口的部队。

我正安排把该分遣部队撤至香港，他们驻在汉口已再无必要。英王陛下驻北京公使已同意将他们撤退。

第65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10月5日收到

阁下：

关于我上月5日的信，我荣幸地随信附上我所收到的外交部照会的译文。该照会说：除非事前得到中国政府的同意，关于矿权的任何外国借款或抵押不能被认为是有效的。

在本月16日举行的各国使节会议上讨论了这个照会，决定不作答复，但我正在把它通知英王陛下各领事官员，供他们参考并作为指导方针。

朱尔典谨上 1912年9月18日于北京

第66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10月9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报告：前几个星期因病不能处理公事的陆征祥先生，

^① 原件未注明发报地点。

已于本月 15 日将外交总长的职务移交梁如浩先生，他对在华的外国人来说更以“M. T. 梁”著称，因为他的“字”是孟亭^①。

新外交总长系广东省人，在美国受过教育，以前曾担任华北铁路总办，牛庄道台，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期间他于 1907 年任天津海关道台，还在一段短暂的时间内任上海道台。袁世凯担任外务部尚书时，把他调到北京任该部右参赞。后来，他和唐绍仪一起在盛京任奉天省参赞。

梁如浩先生精通英语，举止文雅，在应付外国人方面有相当丰富的经验。

您将记得：梁如浩先生曾被袁世凯总统提名为第一届联合内阁中的交通总长候选人，但被南京临时参议院所否决。因此，临时参议院接受他担任外交总长，是袁世凯的影响逐步增长的又一个迹象。

本月 22 日，陆征祥先生辞去国务总理职务也同样被接受。现在还没有任命他的继任者，但很可能是袁世凯的另一个忠实心腹、内务总长赵秉钧，他在陆征祥患病期间任代理内阁总理。

朱尔典谨上 1912 年 9 月 24 日于北京

第 67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 年 10 月 21 日收到

阁下：

关于我 9 月 6 日的信，我荣幸地随信附上黑德爵士对 9 月份各省情况所作的概述。

朱尔典谨上 1912 年 10 月 6 日于北京

^① 梁如浩，字孟亭，又字梦亭。

第67件的附件 1912年9月份各省情况概述

孙逸仙博士和南方其他领袖访问北京，以及他们现在对袁世凯阁下的政策所表示的全面支持，对于全国的统一提供了一个很大的刺激，并加强了中央政府的管理。孙逸仙博士已被委任研究铁路发展问题，黄兴将军研究矿产问题，而陈其美将军将被派往国外调查政治制度。无论孙逸仙博士所鼓吹的计划显得多么空幻和不切合实际，但那些计划的优点，至少是把人民的注意力从政治方面转移到更重要的经济发展问题以及改进中国交通工具的必要性，即使是为此目的而不得不使用外国资本。改进养蚕、耕种、造林等方法的计划也正在各省进行讨论；看来没有什么疑问，一旦恢复了秩序和信心，经济发展问题便将得到有力的推动。

不幸的是缺乏这些合乎需要的条件。抢劫行为 and 不法行为仍从四面八方传来。英王陛下驻南京领事报告说：大约三千名被解散的士兵正在滁州附近进行抢劫，从南京方面已派遣人数相等的部队去处理他们。据报纸上的一份电报说，正规部队已被击败。在武昌，是月底的一次严重兵变幸亏被黎元洪将军所挫败，他及时地得到即将发生闹事的消息，逮捕了首领，但该口岸的形势仍然是很不稳定的。在长江上游的沙市，发生了几起较小的武装骚乱。在西南的贵州省，有二百名士兵被武装土匪所包围和杀死。陕西的情况仍然很不安定，虽然在这里，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外国人没有受到任何骚扰。

福建省仍处于紧张不安的状态。9月中旬，在福州府南面沿海的兴化发生了一次暴乱：已有必要从该地区召回所有的外国传教士。然而，到月底，地方部队使暴徒们遭到严重失败，后来传教士们被允许返回该地区。彭副都督^①在他身边聚集了一支相当

^① 疑指彭寿松。

大的反对当地政府的部队，他的行动引起了某些忧虑，在敌对部队之间似乎一度有发生激烈冲突的危险。不过，现已找到一个解决困难的办法，按照既定的方式把彭某召至北京接受另一项任命，因为他对共和事业有突出的贡献；但现在还不能肯定，他是否将接受这项邀请。

英王陛下领事在自重庆的来信中，评述了四川省财政方面的危急情况，它因去年的保路运动而受到严重的危害，后来又因内地发生骚乱而更进一步遭受损失。地方防务和其他需要动用了成都和重庆的大部分正常税款，偷漏厘金和其他捐税又使税款更为减少。人们公认库藏空虚，迄今尚未提出一个满意的募款计划。与此同时，现银大为减少，严重贬值的纸币有了增加。

驻重庆的陆军第五镇统制熊克武将军，在镇压全省的各次动乱中，表现出劲头很大。他已顺利地打败并处决了暴民首领李绍义^①，李绍义在过去几个月内率领一支约二万名歹徒的部队，在大足县进行大规模的抢劫。熊克武将军现正忙于追逐这支已被驱散的队伍的残余。成都和重庆的政客们为争夺四川的领导权继续进行无益的竞争。

广州的政府仍掌握在一批缺乏经验的青年革命党人手中：由于警察首领的努力，秩序才得以维持。现银十分短缺；在目前行政当局的管理下，人们普遍缺乏信心。

蔡锷都督匆忙访问蒙自回来之后，9月15日在云南府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同盟会和公义和党^②同意联合他们的力量，推举该省目前最有势力的人物李根源将军为首领。10月3日，李根源将军胜利地进入云南府。

黑 德

① 译音。

② 译音。

第68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11月18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随信附上本月22日《政府公报》的一份摘要，说明财政部将派专员前往各省调查财政情况，以便改善中央政府的贫困状态。

朱尔典谨上 1912年10月31日于北京

第69件 陆军部致外交部函

1912年11月22日收到

先生：

我奉陆军委员会的命令，就去年临时增加华北和华南驻军的问题，再一次写信给您。

由于必须对1913年至1914年间部队调动问题立即准备作出估计，所以我请求您查明，据外交大臣格雷爵士的意见，在1913年9月至1914年3月部队集结期间，是否可以撤退所有的或部分的下列驻军：

香港(华南指挥部)：印度旁遮普步兵第二十五营和第二十六营；印度哈札拉第二十四过山炮连。

北京和天津(华北指挥部)：在该处服役的英国第二步兵营。

以上所有部队超过了正常的和平时期上述各指挥部的驻军。

沃德谨上 1912年11月21日于陆军部

第70件 格雷爵士致朱尔典爵士电

1912年12月5日发自外交部

由于对1913年至1914年间部队的调动立即准备作出估计，

陆军部询问：在1913年9月至1914年3月部队集结期间，是否可以撤退所有的或部分的下列增派的驻军：

华南指挥部：两营额外的印度步兵和一连印度过山炮队。

华北指挥部：英国第二步兵营。

请把您的意见电告我。

第71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2年12月6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关于您12月5日的电报。

我不认为，撤退所说的任何增派部队将是安全的。

第72件 外交部致陆军部函

先生：

关于您上月21日的信中谈及1913年至1914年部队集结期间自华北和华南两指挥部撤退增派的军队问题，我奉外交大臣格雷爵士之命通知您：鉴于英王陛下驻北京公使在他12月6日来电中所表示的意见，该电副本已由本部于本月7日送给您，他认为，目前不可能撤退这些驻军。

兰利谨上 1912年12月10日于外交部

第73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2年12月23日收到

阁下：

关于我9月6日的信，转寄国际银行家委员会对于至1912年7月31日为止的三个月所提出的第二份季度报告的副本，我荣幸地附上那些银行家们处理至1912年10月31日为止的季度内海关岁入拨款情况的另一份报告。

正如该报告中所说明的那样，至10月31日，以海关岁入作担保的所有各次借款分期摊还的本息都已偿清；该日手头的结余达9,486,626两。

应于1911年10月支付的那部分分期摊还的赔款相当于2,070,187两，其兑换率现已确定，也已于上季度内付清。由于可用的税款偿付这笔款项尚欠39,656两，差额由汇丰银行从“常关税帐目”内透支弥补，后来已通过各口岸的汇款付清。

朱尔典谨上 1912年12月6日于北京

第73件的附件 麦加利银行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按照您在1月30日的信中所作的指示，我奉命随信送上^①：

(一)说明至10月31日为止的季度内为偿还中国借款的海关岁入收支净额报告书。

(二)自7月31日至10月31日海关总税务司在上海汇丰银行的“洋税”帐目的副本。

(三)自7月31日至10月31日上海税务司在上海汇丰银行的“中国借款偿还帐目”的副本以及结算单。

(四)上海税务司在上海德华银行的“中国借款偿还帐目”的副本以及结算单。

(五)上海税务司在上海华俄道胜银行的“中国借款偿还帐目”的副本以及结算单。

(六)自7月31日至10月31日由汇丰银行支付的中国借款分期摊还的本息表。

(七)由德华银行支付的中国借款分期摊还的本息表。

① 原编者注：外交部未收到这些文件。

从这些报告书中，您将看到：自7月31日至上月31日所收的净税款共达10,567,935.66两，而上季度为10,011,524.73两，第一个季度为12,308,828.36两。

支付借款分期摊还的本息共为4,444,450.24两；至上月31日而且包括该日在内应付的所有分期摊还的那些款项都已偿清，该日手头的结余为9,486,626.60两，由三家保管款项的银行分配如下：

汇丰银行.....	3,162,208.87 两
德华银行.....	3,162,208.87 两
华俄道胜银行.....	3,162,208.86 两
总共	9,486,626.60 两

我又奉命送上：

(一)说明至10月31日为止的季度内为中国赔款所收的常关税净额报告书。

(二)自7月31日至上月31日上海税务司在上海汇丰银行的“中国赔款帐目”的副本。

(三)自7月31日至上月31日上海税务司在德华银行的“中国赔款帐目”的副本。

(四)自7月31日至上月31日上海税务司在华俄道胜银行的“中国赔款帐目”的副本。

(五)自7月31日至上月31日上海税务司在横滨正金银行的“中国赔款帐目”的副本。

(六)自7月31日至上月31日上海税务司在东方汇理银行的“中国赔款帐目”的副本。

(七)自7月31日至上月31日上海税务司在花旗银行的“中国赔款帐目”的副本。

(八)自7月31日至上月31日上海税务司在华比银行的“中国赔款帐目”的副本。

上季度内付清了应于1911年10月支付的那部分分期摊还的赔款,共合银2,070,187.63两。可是,全部入款仅为2,045,827.87两,在付清总税务司所开的支票15,306.88两后,尚缺银39,306.88两。大家商定,所缺银两由汇丰银行采取对总税务司“常关税帐目”透支的办法垫付。各口岸汇来的所有常关税款收到后,即用来扣除这笔透支的款项。

还附上至10月31日总税务司“常关税帐目”的副本,说明借方的差额为39,656.64两。不过,透支款项已于后来付清。

这封信照常通过此地的首席领事送给您;副本将分送给各有关国家的领事。

国家银行家委员会秘书

曼谨上 1912年11月22日于上海

四、关于中国事件的补充函电：

中国第一号（1914年）

第1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3年1月2日收到

阁下：

我曾荣幸地收到您的来信，要求我把对陆军部提出的关于1913年9月至1914年3月部队集结期间的那些建议的意见告诉您。

正如我在本月6日的电报^①中所报告的那样，我不认为，撤退目前在中国服役的任何增派部队是明智的。几乎不可能预测今后将近一年的时间内可能需要多少部队，但我毫不犹豫地说：至少在目前，我们不能够有把握地从华北指挥部调走任何一支部队。

至于华南指挥部，从我所掌握的消息看来，在该地区内保留增派的英国部队是必要的，如同华北指挥部的情况一样。

朱尔典谨上 1912年12月18日于北京

第2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3年1月11日收到

阁下：

① 原编者注：参阅《中国第三号（1913年）》，第71件。

关于我1911年12月17的信^①，我荣幸地报告：今年6月间，中国政府授予当时的上海都督陈其美以全权，同领事团商定将首席领事代为保管的前任道台的保证金归还中国当局的条款。外交团批准了提存一部分保证金的建议，以偿清未支付的中国人的汇票和会审公廨某些费用所应付的款项（没有利息），其余的保证金将交还给都督。

8月，由于陈其美离开上海，外交部通知我说：他们已将他的权力移交江苏都督。最初，产生了一些困难，因为前都督刘某^②和孙逸仙博士上想要参加谈判。可是，领事团直接与当地外交委员陈先生^③交涉，他已被江苏都督授权商定一项解决办法。此事终于在11月底完成，当时所需要的那些条件已经实现。在把许多担保品变为现银后，有1,083,976.51两用来支付外国商人（主要是英国人）手中那些被拒绝支付的中国人的汇票；有150,000两留作会审公廨和地产局的费用。帐目说明书以及剩余保证金和结余现银1,431.32元及58,671.91两，已由首席领事于11月23日交给陈先生。这个拖延了两年多并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和精力的困难问题终于获得解决，使人们感到非常满意。

朱尔典谨上 1912年12月26日于北京

第3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3年1月20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随信附上交通部^④发给中国驻美、英、日等国的外

① 原编者注：参阅《中国第三号（1912年）》，第22件。

② 原文如此，其人其事不详。

③ 原文作“伊万·陈”，不知指何人。

④ 似系工商部之误。

交使节以及某些总领事的一份电报的译文，该电报是关于居住国外的华侨所组成的商会和其他团体推举参议院代表问题的。

朱尔典谨上 1912年12月27日于北京

第4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3年1月20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随信奉上海外交部关于在伦敦用英镑偿还中国对外借款问题的一份照会的译文。

财政部认识到，按照目前的制度，在上海支付大量白银，使中国在兑换率上遭受损失，所以希望采取一种可以在伦敦用英镑偿还到期外债的办法，以代替那种制度。外交团考虑这个问题后决定：该问题是好几个借款合同规定的，所以只有通过同债券持有人直接达成协议，才能够获得解决。因此，这项决定已于本月2日送交外交部。

朱尔典谨上 1913年1月3日于北京

第5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3年1月30日收到

阁下：

我已荣幸地拍电报向您报告关于泸州附近的武装匪徒对一伙加拿大监理会传教士们发动的袭击。这次袭击发生于1月2日，结果使得一名传教士的婴儿乔利夫死亡。有一名土匪在袭击时被捕。英国驻成都代总领事已向地方当局提出强热的抗议，极力劝告他们采取有力的措施，以逮捕其余的该伙匪徒，并对该地区的抢劫行为进行普遍的镇压。本月8日下午，在会见外交总长时，我请他注意该案件的事实；次日，我向外交部提出一份正式备忘

录，要求给该省当局发出最严厉的训令，采取迅速有效的方式逮捕犯罪分子并处理这个案件。我还指示英国驻成都代总领事派一名代表前往肇事地点，对被害婴儿的尸体进行查验。后来，他通知我说：那位代表将于本月10日离开成都，并由该省外交司长提供一支卫队。外交司长还亲自到领事馆，对该犯罪事件表示歉意。

现在，我已收到外交部的一份备忘录，荣幸地随信附上其译文。该备忘录包含代表中国政府所表示的歉意，并通知我已对该省当局发出指示，逮捕应对该谋害事件承担责任的那些土匪。

朱尔典谨上 1913年1月11日于北京

第6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3年2月4日收到

阁下：

我在1912年1月30日的信^①中，曾荣幸地奉上外交团向上海国际银行家委员会发布的那些指示的副本。该委员会的成立系为了安排从海关岁入中按期偿付它所承担的外债。这些指示的第六款如下：

“如果到1912年底还没有恢复正常情况，那么，届时将把可供偿还赔款之用的结余款项立一帐目；此项帐目将送交外交团，由它决定其处理办法。”

国际银行家委员会秘书于1913年1月4日送给我（作为首席公使）一份帐目，说明1912年12月31日上海三家保管款项的银行中联合借款偿还帐目贷方的结余为10,268,202.59两，这个款额后来改正为10,273,682.09两。我于本月8日收到这个帐目后，立即把它在我的同事们中间进行传阅，并订于本月16日召集

① 原编者注：参阅《中国第三号（1912年）》，第113件。

一次会议，讨论该项结余的处理办法。

为实现外交团最后通过的决议，已在两个文件中作了安排，现随信附上其副本。第一个文件是各有关国家公使写给银行家委员会成员的一封同文指示信；第二个文件是我作为外交团首席公使致外交部的一份备忘录。

朱尔典谨上 1913年1月20日于北京

第6件附件1 朱尔典爵士致上海汇丰银行和 麦加利银行经理函

先生：

关于国际银行家委员会秘书本月4日的信^①，我谨通知您，外交团已作出下列决定：

12月31日海关岁入存款的余额以及该日常关岁入存款的余额，应照各国政府在赔款中所占比例，照常汇给各国政府，以偿还这笔款项足以支付的几个整月的赔款以及每年复利四厘的利息。

上述通知将送交中国政府，并要求它对海关总税务司发布必要的指示，以便他发电报转告上海税务司。

请您注意这项通知，并立即实现关于对目前的余款所作出的决议。

朱尔典谨上 1913年1月18日于北京

第6件附件2 首席公使致外交部备忘录

首席公使请外交部查阅外交团与前外务部于1912年1月商定的八项条款中的第六款，该款是关于把海关岁入用来偿还以该

^① 原编者注：外交部未收到该信。

岁入作担保的外债的。该款规定：如果到1912年底还没有恢复正常情况，那么，届时将把可供偿还赔款之用的结余款项立一帐目；此项帐目将送交外交团，由它决定其处理办法。

国际银行家委员会现已提出报告，可供偿还赔款之用的此项结余款项达10,273,682.09两，所以外交团决定：这笔款项以及12月31日常关岁入的余款，应照各国政府在庚子赔款中所占比例，照常汇给各国政府，以偿还这笔款项足以支付的几个整月的赔款以及每年复利四厘的利息。

今天，各国使节将对各该国有关银行经理发布上述意思的指示；首席公使奉各国使节之命要求外交部对海关总税务司发布同样的指示，以便他发电报转告上海税务司。

1913年1月18日于北京

第7件 海军部致外交部函

1913年2月15日收到

先生：

我奉海军部各长官之命，随信附上本部所收到的驻华总司令官今天来电的副本，以供外交大臣参考。该电是关于自广州撤军以及自西江上撤退一部分巡逻艇队的。

本部已通知总司令官，他的建议获得了批准。

格林谨上 1913年2月14日于海军部

第7件的附件 驻华总司令官致海军部电

1913年2月14日发

据总领事的意见，广州不再需要部队。我同朱尔典爵士一样

① 原件无发报地点。

表示同意；即将撤退部队。

请求海军部也批准撤退“灵巧”号和“守门神”号。暂时保留鱼雷艇；西江上的巡逻艇队减少一半。

第 8 件 格雷爵士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我已收到您上月 20 日的信，报告外交团关于处理 1912 年海关岁入结余款项一事所作出的决议。

我批准您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行动。

格雷谨上 1913 年 2 月 15 日于外交部

第 9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3 年 2 月 22 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随信附上黑德爵士对 1912 年第四季度各省一般情况所作的概述，它是根据英王陛下各领事官员的报告写成的。

朱尔典谨上 1913 年 2 月 7 日于北京

第 9 件的附件 黑德爵士对 1912 年第四季度中国 各省一般情况所作的概述

关于各省情况的下列说明，几乎完全是根据英王陛下领事官员们的 1912 年第四季度情报报告编写的。您将会看到，没有连续性的事情可供叙述。各省或多或少地处于设法自救的状态，并且正在承担革命运动的后果，仅仅由于该国具有巨大的恢复力以及居民天生的勤劳，它才得到拯救。散兵游勇进行的小规模的哗变和抢劫，以及关于国会的戏剧性的选举，构成了那些报告的主要条目，而政府人士中的分裂和腐化，在大多数地区仍是很普遍的。

总之，到1912年底，新兴的中国似乎仅在用善意的无政府主义制度代替善意的专制主义制度方面，才是成功的。

山 东

除了南部和西部发生的抢劫以及仅具有地方意义的一两次兵变之外，山东在过去几个月内保持着相当的平静。以前曾经遭到清军抢劫的黄县，于10月20日又遭到民军的洗劫，因为欠付了他们的很多饷银。在临淄县，由于学生们捣毁了城隍庙，大约也在那个时候发生了一次骚乱。在曹州府和兖州府地区，对匪徒们采取了军事行动；现在，都督声称：在该省的这部分地区，抢劫行为几乎已被镇压下去。最著名的首领们均已于12月间被逮捕和处决，但还有两名首领仍有待于捕获。最近，报纸对黄河以北武定府地区发生的抢劫作了报道，该地区通常是没有发生这些动乱的。

对部队正在稳步地进行解散，除了1月初烟台发生的一次兵变之外，很少引起动乱。烟台兵变发生于1月4日，当时几乎所有的旗兵都已付清了饷银，并已把武器交给了他们的统领。他们中间有一大批人已登上将把他们运往北方的轮船。由于发生了某些干扰，有人企图剥夺他们的一部分饷银，那些军队又重新登岸，抢着占领军火库，战胜了卫队，夺取了枪枝弹药，并开始拦截街道上的车辆。其他一些很想参加可能发生的抢劫行为的人，立即同他们会合在一起。一支两千人的陆军和巡洋舰“海圻”号上的二百名水兵立刻处于备战状态，并在街道上巡逻，特别注意保护外国人居住区。第二天，恢复了秩序：哗变的部队乘船前往大连。然而，由于指挥官们之间的意见分歧，人们有些担心将继续发生动乱。有一艘日本军舰停泊在烟台，监视着情况的发展。

在山东，正如其他地方一样，关于北京国会的选举，主要变

成为共和党和国民党之间的竞争，国民党似乎组织得更有力量。可是，大部分居民很不感兴趣；参加投票的人数是很少的，因为人们大都对新制度抱着十分冷淡的态度。

镇 江

镇江一带散兵游勇的抢劫，在过去几个月中似乎始终是断断续续的进行，但当局正在尽力维持秩序。英王陛下公使为传教士们主要居住的那个地区请求并获得了一支卫队，这项措施在防止该地区继续发生抢劫方面证明是很有效的。严重犯罪案件的数目普遍减少，应归功于第六十四标某营管带杨彪^①所采取的行动，杨彪从前是湖北农村中的一个土豪劣绅，现在获得了无情搜捕歹徒的好名声。他不时进行一些大逮捕，把被控告的散兵游勇或平民处死。他亲自用手枪击毙了好几个案件中已被判处死刑的罪犯。

徐州府地区对土匪采取的行动显然具有良好的效果，沛县地区现在相对来说没有土匪，那里的商人们正在重新进行正常的买卖。有一伙散兵游勇，其中大部分是清江浦人，大约于12月底离开徐州府前往镇江。他们从该地乘坐由汽艇拖带的小船，当到达邵铺^②的时候，他们突然跑了出来，抢劫了那个地方所有的汽艇停泊处。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没有继续发生骚乱，并且解散了。

省议会和国会的初选，于12月间举行。关于国会，镇江是第三选区的中心，有选民六十一万二千三百四十一人。这里正象其他地方一样，初选伴随着各种各样的欺诈行为和阴谋诡计，但没有发生骚乱。国民党又是最活跃的党派。

① 译音。

② 译音。

江苏省内运河的情况，比前些年更糟糕。某些地段的汽艇运输是时断时续的，帆船的往来受到了阻碍。英王陛下驻镇江领事正在努力促使地方当局注意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江 西

就江西省而言，1912年第四季度的大部分时间内没有发生重大事件。由于即将进行省议会的选举，作为前六个月的特点的大量行政改革措施已经停止。12月间举行的初选，仅仅有助于证实这个普遍的意见，即中国人的教育程度不足以适应政体中如此激烈的一项变革。行贿受贿、贪污腐化、冒名顶替和其他不法行为，是江西选举的主要特点，正如其他省份选举的情况一样。当地报纸报道了许多关于同一个人投入几十张选票的事例，还谈到许多这样的情况：当一个投票人到达投票站的时候，才发现他的姓名已被当作投了票的人勾掉了。接着在同监督官员发生争论时，投票箱被砸碎，选票到处散落。英王陛下领事报告说：总的说来，人民对选举普遍表现的兴趣超过了原来的预料；但大多数人未必了解政党的意义或他们表示支持的某个特定党派的目的。例如：九江的一位知名人物是保守政党的主席，但同时又是进步政党领导机构的成员。

在南昌，过去若干时间内人们普遍存在着焦虑不安和动乱即将发生的感觉。12月10日，城内几个地区同时发生大火；被派去维持秩序和帮助扑灭火灾的士兵们遭遇到敌对的武装群众。然而，当都督一旦认识到正在发生一场有组织的动乱时，他立即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迅速恢复了秩序。大约有五十名暴徒立即被枪毙，后来又有六十人左右被处死。此地的外国人同其他地方一样，没有受到任何骚扰。该省其他地方也发生了两三次较小的动乱，每次都与散兵游勇有关，但没有一次是大规模的，在每个场合都

迅速恢复了秩序。

芜湖仍保持着相当的平静，但发生了一两次小的兵变，这是由于部队有两个多月没有得到饷银。

汉 口

1912年第四季度内，在驻汉口领事馆所辖全部地区总的形势是平静的；尽管有财政困难和难驾驭的军队制造事端，民军当局在维持较好的秩序以及鼓舞人们对新制度更有信心方面是成功的。黎元洪将军是使敌对的政治党派之间保持和平的主要因素；湖北行政当局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继续担任首脑，这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可是，虽然副总统个人很得人心，他遭到暗杀的危险却是很大的，所以他几乎是被关押在他自己的衙门中的囚犯，该处采取了最严厉的防范措施，阻止未经许可的客人入内，而且他仅在极少数的情况下离开他的衙门。这些防范措施绝不是不必要的，因为有好几次企图暗杀副总统的阴谋已经暴露出来；人们普遍感到，黎元洪将军的政敌正在做不惜一切的努力，使他被撤换。

湖北的财政仍处于混乱状态；为了维持武装部队和满足行政当局急迫需要而进行的觅求必要款项的活动，正遭遇到巨大的困难。湖北军政府发行的大量纸币仍在市场上流通，即使可以兑换现银，也只有在打很大折扣的情况下才可兑换。这些纸币是恢复较健全的财政状况的一个很严重的障碍。

在京汉铁路上，特别是在穿过湖北和河南的那段铁路上，目前普遍存在的情况，十分不利地反映了中国人在没有外国人的严密控制下经营这种企业的力量。普通列车总是挤满了武装暴徒，他们利用他们的军事地位作为掩护，免费来回旅行，并骚扰那些没有恶意的老百姓。在这条铁路上旅行的任何中国人，必须向这些士兵付一笔钱，以换取士兵强迫收票员让他们免费旅行。有一

两位列车员在被这些士兵扔出列车之后发现：反抗是没有用处的。那些拒绝向士兵们付通行费的旅客，被迫站在列车的走廊内。车厢大都是很肮脏的；只有在用武力赶走这些士兵之后，甚至是一位欧洲人才能得到一个座位。有两位军官，一般是具有校官军衔，在列车上“维持秩序”；但他们通常是没有权威的，活动仅限于在各停车地点的月台上大摇大摆地来回走动。列车常常晚点很久；在许多情况下，各火车站站长很高兴地让任何列车通过，而不顾有撞车的可能性。盗窃铁轨上“轨座”螺丝钉的事件经常发生，是使列车遭到危险的根源，因为铁路看来似乎是安全的，但接触时容易挪动位置，于是造成列车出轨。人们还时常申诉货车被盗，通常也同样是这些士兵干的。唯一不受上述各种危害的列车是每周开行一次的快车，因为允许欧洲稽查员对这列快车享有稍多一些的控制权。

河 南

河南当局在维持秩序和制止抢劫方面似乎是不成功的。在人们所报道的无数不法行为中，有一个最胆大妄为的事件发生于12月初，当时有一支五百名骑马的土匪袭击西华县城，抢劫县城后未受干扰地离去，带走了居民中的一些主要人物，他们为释放这些人要求一笔赎金。当局似乎没有力量对付这些土匪，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散兵游勇，握有新式武器。

据报道，陕西也遭到散兵游勇的蹂躏；但甘肃的情况表现出改善的迹象，虽然在回族部队与其他居民之间存在的强烈敌视态度对该省的和平是一个经常性的威胁。

湖 南

在上季度内，湖南没有发生严重的骚乱；不过，虽然部队解

散后使当局不担心爆发有组织的暴动，但它在该省放出了一大批人，他们曾经在很长的时期内完全无所事事，依靠特殊高的饷银过活，不能够和平地安定下来，从事他们平时的职业。因此，没有一个地区不谈论抢劫行为，而在好几座城市内一群群散兵游勇任意闹事，恐吓那些和平的居民，并且与当局相对抗。然而，显然不存在排外的情绪。事实上，英王陛下驻长沙领事认为：对外国人在湖南的绝对安全来说，唯一所必需的条件是那些掌权的人物没有积极反对他们的活动，这一点又一次确切无疑地表现出来了。官吏们那方面继续表示很关心外国人的安全。这显然证明，中国的排外情绪过去是由官方策划的。二十年前，湖南人是顽固排外的；省城长沙是一座禁止外国人进入的城市。

各种新的秘密结社纷纷出现，他们的活动大都只限于对富人和官吏阶层进行有组织的抢劫。当局为维持秩序起见，正在从居民中间招募几支小规模武装警察；英王陛下领事指出：总的说来，年底的普遍情况不是没有希望的。

象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各省财政处于混乱状态。可是，这并不妨碍官员们为公共事务和教育制订一些需要很多费用的宏伟计划；看来在最近的将来似乎只有很少的计划有可能酝酿成熟。司法制度中也采取了许多改革措施，但它在新制度下已经大为蜕化变质。法官们大都是一些比较年轻的人，有一些较肤浅的法律知识，但他们很不熟悉法律的实践，不具备旧制度下知县们所有的各种经验。事实上，法律的实施似乎是新政府的一个最坏的特点。英王陛下驻长沙领事报告说：在涉及英国臣民的案件中，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不断施加压力，以及对当局的拖延敷衍或不守信用多次提出抗议，才能使该案件得到审理。虽然在各个案件中，根据明白无误的证据继续施加压力，终于为原告强行索取到一个很勉强的判决，但领事为了使某项判决得到执行所作的一切努力是没

有结果的。

正如在关于其他各省的情况中所记载过的一样，人们对待湖南的选举处处都是很冷淡的。为准备和传送选民登记名册而出现的拖延或完全忽视的现象是很普遍的。在投票选举之前，候选人方面大肆进行游说。他们所喜欢采取的手段是尽量购买发给每个合格选民的选票，散发给事前他们盛宴款待过的那些人。然而，他们留心直到选举以后才付款，因为那时他们才能查明，那些人是否投票选举其主人。选票似乎卖得高价，而且随意卖掉；每张选票的价格普通是五元，随着投票选举日期的逼近，价格也就上涨。选举的第一天，在许多地区的投票站周围，互相竞争的各派候选人之间发生殴打。投票箱和选票一起常被捣毁；在好几个地方，投票站也遭到破坏。

除了政治动乱之外，由于收成很好，该省的普遍情况正表现出日益繁荣的迹象，贸易大大超过了1911年同期的数字。人们正在采取措施开发该省蕴藏丰富的矿产，其中包括煤、铅、锡、铁、铜、金等矿。他们还提议兴办各种工业和铁路。

宜 昌

在宜昌周围的农村地区，仍非常频繁地继续发生抢劫。归州地区的兴山发生了一起严重的闹事，使地方当局费了六个多星期和动用了大约两千名部队才镇压下去。这次闹事是由红灯会组织的，它在川鄂边境上很有势力。动乱开始时，大约有三、四百人袭击杭县^①的地方士绅。法官进行了干预，并被杀死，他的下属人员也是如此。当时歹徒们公开宣布反对官吏。自归州派了大约七十名士兵去镇压他们的活动，被打得大败，于是向宜昌方面请

① 译音，疑为房县之误。

求增援。宜昌方面派遣了四连步兵，但当他们到达肇事地点时，暴动者的人数已增加到大约三千人，牢固地盘踞在山中。当局不得不从襄阳另派援军携带过山炮前往，然后才终于把暴动者逐出他们的据点。

四 川

成都政治形势中最引人注目的事情，是军方人士在代理都督胡景伊的领导下，取得了完全的优势，并且逐渐清除该省各政党中对权力提出要求的对手。由于胡景伊的阴谋得逞，总统被劝诱撤消迄今由同盟会分会会长张培爵担任的民政长官的独立职位，并把该项职责授与胡景伊本人。同盟会的其他成员均被迫辞职，现在唯一留在重要职位上的会员是外交司长张之相^①，他的地位也是很稳固的。由于军方人士取得优势的结果，几乎所有的衙门和寺庙都变成了兵营；城角各练兵场是非常活跃的地方。

尽管现在保持着良好的秩序，不安和不满的迹象也不是没有的；由许多持不同意见的政党所策划的阴谋经常暴露出来。

四川秩序的恢复，使得各国传教士可以返回他们各自的地区。现在，大多数传教士已带着他们的妻子和家属回到他们的岗位上。部分地由于他们暂时撤退，人们不止在一个地方开始进行活动，完全清除外国传教士对教会工作的控制，把教会中心以及附带把教会财产置于中国牧师的控制之下。这一发展在高度不受约束的四川人的心目中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并且得到那些不信奉基督教而又同样具有排外情绪的地方官员们的倾心支持。这方面的问题在不久的将来需要由各国教会团体作一些巧妙的处理。

英国驻重庆代理领事报告说：四川东部腹地正在恢复正常状

① 译音。

态；目前，在这些地区旅行和居住方面的安全是同1911年12月的情况无法比拟的。不过，武装土匪仍然是人们所担心的，最近在福山附近对一伙传教士发动的袭击证明了这一点，那次袭击使得乔利夫牧师的六岁的儿子死亡。

该省的财政状况仍然是十分令人不满的，虽然有关方面正在进行某些尝试，企图买回大量发行的战时纸币，这些纸币自1911年革命爆发以来在四川泛滥。

云 南

使徒信心会在云南府设立了一个分会，工作人员包括加拿大、荷兰、挪威、丹麦、瑞典等国人士，共有九人之多。该教会的三名成员，其中有两名是妇女，正前往丽江，他们将在那里建立基地，希望同云南的藏族人保持接触。

云南府与法国铁路线上的东京之间的直达火车可望于今年初通车。1910年5月发生的一次严重塌方完全冲走了三百二十八公里处的线路；自那时以来，已在进行修复工作。货物改换运输工具，由一条轻便火车从一边运至另一边。1912年夏季的特点是十分干燥，铁路仅于10月间在三百三十七公里处发生一次中断，当时有一块大岩石落在铁路线上，耽误了八天的交通。预料今年夏天将发生更严重的塌方，因为威胁着八达河山谷中铁路线的悬崖峭壁处于最危险的状态。

在过去的一年内，纸币在云南府顺利地保持住它的票面价值。

广 西

广西的政治形势不需要作特别的说明。在经过大约两个月的会期之后，临时省议会于10月18日解散，没有完成任何有重要意义的工作。关于新的省议会以及北京国会的初选，于12月下半月

举行。共和党和国民党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但国民党很可能获得多数席位。照例有人申诉发放选票过程中的不正当行为，以及暗示行贿受贿的事情，但对选举的兴趣不足以引起人们对这些指控进行任何公开的调查。中央政府通过总统的命令批准六个政府部门的首脑，进一步扩大了它在该省的名义上的权力，但它没有干预都督的各项任命。在该省的许多地区内，抢劫行为仍继续存在，但它未达到不平常的程度。除了驻扎在农村地区维持秩序的那些部队之外，还派了一些小官吏前往各县，他们的专责是搜查不良分子，并掌握成群结队的土匪们的线索。必要时，他们将请求军队协助他们。在上季度内，无论是梧州上游或下游的西江上，都没有关于海盗案件的报道；沿江地区看来已几乎没有土匪。英国人的摩托艇继续得到沿江警察提供的卫队，但中国人的船只必须雇用它们自己的卫队。由于缺少款项，最近使得该县知事减少了沿江警察部队。因此，英国代理领事请求在南宁为驶往该口岸的新的英国船只选派士兵。

12月底，发生了一些纠纷，因为全州圣公会福音堂的开放引起了地方士绅的反对。当时，班为兰主教正在北京，已收到史蒂文斯牧师关于此事的一份报告，于是将该问题提请英王陛下公使注意。朱尔典爵士请求外交部指示都督发布一个告示，消除全州人民对教会在该城进行工作的权利的任何疑虑；同时指示了解该案情况的英国驻梧州代理领事，努力在当地实现和解。

北 海

由于军法很严厉以及对逮捕的任何土匪进行无情的处决，所以北海周围地区继续平静无事。自民军的行政机构建立以来，估计该地区内被处决的人数至少有三千人；人民因此彻底被吓住了。法院不是很受人们尊重的，最近由于法官的撤职在威信方面进一

步受到了损害，因为该法官被牵扯到出卖政府枪枝给村民，表面上的理由是为了保护村民对抗土匪。

现在，经过灵山通往广西的贸易路线是很安全的；内地贸易正再度兴起。人们计划修建许多道路，它将证明对北海地区是大有好处的，如果它得到适当维修的话，但迄今很少获得进展，因为缺乏款项。两条分别通往严州^①和高州的地方性道路正在进行测量，后者已开始测量了七英里左右。

据高州和廉州的报道，有许多小股的歹徒；当局已从灵州派遣一连士兵去增援廉州的军队。10月中旬，有一群歹徒伏击高州部队，夺得了一门野战炮，并杀死士兵五、六十人。这个事件被过于夸大，在农村造成了惊慌，幸亏来自广州的一千名生力军的到达，使此事得以结束。自那时以来，水稻收成很好，该地区相当平静，以致参加在高州美国教会举行的圣经工作会议的代表一百八十二人前往开会和返回家乡，都没有受到骚扰。

选举很少激起人们的热情。同盟会正在进行改组，正式成立国民党，目的是帮助政府对抗三合会所作的努力^②。

琼 州

琼州地区遭到通常的骚乱和海盗袭击，它似乎从来没有完全避免过这些骚扰。最严重的动乱发生在琼州附近的定安一带以及海南岛东南部的陵水地区。

第10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3年2月24日收到

阁下：

① 译音。

② 原文如此，显然错误。

我在上月20日的信中，曾荣幸地报告外交团关于处理可供偿还赔款的关税结余所作出的决议，即该项余款应按比例地汇给各有关政府，以偿还该款项足以支付的好几个月的赔款以及每年复利四厘的利息。

海关总税务司应外交部的请求，照该项意思及时地向上海税务司发出电令；上海税务司立即同国际银行家委员会磋商，以便实现该项决议。磋商的结果，银行家们致电外交团建议说：关于偿付赔款的汇款兑换率应每周确定一次，一个月摊付的款项按周汇付。他们指出：这项安排将对中国政府有利，并避免打乱兑换市场，因为一天购买如此巨额的金币将使兑换市场受到严重影响。

由于外交部已向各国使节提出了一项意思相同的正式建议，所以在本月3日举行的外交团会议上考虑了这个问题，并向国际银行家委员会发出电报说：我们实际上不反对拟议中的这项安排，如果大家有此了解：它不应被认为是一个先例；对分期摊付的款项应付复利四厘，直到付款之日为止。

现随信附上关于这个问题同外交部交换信件的副本。

我从上海报纸获悉：第一批款项已于上月31日支付，那一天确定了关于1911年11月及12月分期摊付款项的兑换率。

朱尔典谨上 1913年2月7日于北京

第10件附件2 致外交部备忘录

外交部上月30日的信，关于为了按比例地偿付庚子赔款过期未付的款项，在把可得到的款额用英镑汇给各国政府时所拟采取的办法，已由外交团及时作了考虑。

国际银行家委员会已经把同税务司磋商后所作的建议通知各国使节，即关于偿付赔款的汇款兑换率应每周确定一次，一个月摊付的款项按周汇付。首席公使奉命通知该委员会，外交团实际

上不反对拟议中的这项安排，如果大家有此了解：它不应被认为是一个先例；对分期摊付的款项应付复利四厘，直到付款之日为止。本月3日，已照这个意思发了一份电报前往上海。因此，现在首席公使荣幸地通知外交部。

1913年2月6日于北京

第11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3年2月27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附上1月9日《政府公报》上发表的关于总统六项命令的摘要。

我荣幸地请您注意，中国方面以外交代表代替道台，作为负责与英王陛下领事进行交涉的官员。

我应指出：道台是对他所管辖领土内的行政机构享有控制权的官员，而新近任命的外交代表不担任这种重要职务。我认为，任命外交委员所要达到的主要目的，是在外国领事与地方当局之间设置一个缓冲的人物，减轻地方当局同外国领事讨论的压力，并使对侵犯英国臣民权利的行为更难得到补偿。

1858年《天津条约》第七款规定：领事和副领事分别与道台和知府平级；授予领事和副领事进入道台和知府衙署并同他们在平等的地位上往来的权利。这项规定的目的是要保证领事们对于影响英国人利益的那些问题，应当获得同他们所驻地区内行政当局的直接有关官员进行商谈的机会。我应补充说：任命外交委员是违犯这项条约规定的。

朱尔典谨上 1913年2月11日于北京

第12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3年3月1日收到

阁下：

关于我本月7日的信，我荣幸地随信附上我所收到的上海汇丰银行经理的一封信的副本。该信报告偿还1911年11月、12月和1912年1月、2月欠付英国的那部分赔款，并送上一份关于英国应得的那部分赔款的报告书，说明为偿清至1911年12月31日为止的半年应付赔款已汇往伦敦的全部净款。

朱尔典谨上 1913年2月12日于北京

第12件附件1 汇丰银行致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我荣幸地收到您1月18日的信，将外交团关于为偿付赔款把海关和常关岁入结余汇给各国政府的决议通知我。

我获悉：为了避免打乱上海的兑换市场，中国临时政府已把兑换率问题留待海关总税务司解决，总税务司把这个问题的处理权交给了上海税务司。

直到目前为止，上海税务司已确定了1911年11月、12月和1912年1月、2月应付款项的兑换率；相当于英国那部分赔款的英镑款额已照常通过电报转往伦敦。

附上一份关于英国那部分赔款的报告书，说明为偿清至1911年12月31日为止的半年应付赔款已汇往伦敦的全部净款为十六万五千八百七十六英镑十先令六便士。

关于1912年1月和2月的汇款二万七千九百八十英镑十八先令七便士，已分别于1913年2月3日和4日汇去。

我获悉：对过期未付的款项，以后将偿付每年复利四厘的利

息，直到汇款之日为止。那时，将把一份说明如何计算这笔款额的详细报告书送给您。

代经理 史蒂芬 谨上 1913年2月4日于上海

第12件附件2 关于至1911年12月31日为止的 半年应付给英国的中国赔款以及 已付款项的说明书

1911年应付的赔款本金总额.....	37,972镑15先令9便士
1911年应付的赔款利息总额.....	297,798镑7先令
<hr/>	
1911年应付总额.....	335,771镑2先令9便士
1911年6月30日已付的一半.....	167,885镑11先令5便士
<hr/>	
应付余款.....	167,885镑11先令4便士

已收的款项和允付的利息

1911年7月31日，28,000镑，至1911年12月31日的四厘利息，153天，	469镑9先令7便士
1911年8月31日，28,000镑，至1911年12月31日的四厘利息，122天，	374镑7先令7便士
1911年9月30日，28,000镑，至1911年12月31日的四厘利息，92天，	286镑6先令8便士
<hr/>	
允付的利息.....	1,126镑3先令10便士
1912年10月26日，28,000镑	
1913年2月 ^① 1日，28,000镑	
1913年2月1日，27,885镑11先令4便士	
<hr/>	
167,885镑11先令4便士	
1911年12月31日，上述应于12月支付的款额.....	27,885镑11先令4便士
减去上述允付的四厘利息.....	1,126镑3先令10便士
<hr/>	
	26,759镑7先令6便士
减去18,986镑7先令10便士的	
184天的四厘利息，余数为1911	
年6月30日已付本金的一半.....	382镑17先令
<hr/>	
	26,376镑10先令6便士

① 疑为1月之误。

减去付给汇丰银行的偿还1911

年赔款的佣金.....	500 镑
	<hr/>
	25,876 镑10先令 6 便士
7月至11月的五个月内，每月摊付28,000镑.....	140,000 镑
	<hr/>
汇往伦敦的总额.....	165,876 镑10先令 6 便士

第13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3年3月20日收到

阁下：

关于我去年12月27日的信，我荣幸地报告：有六位先生已经当选，作为海外华侨在新国会的参议院中的代表。

有选举权的人们在北京集会，他们来自非常广泛的地区，其中包括许多英帝国的领土。我接待了一位先生的来访，他是作为墨尔本的华侨代表前来的。虽然他的父母都是中国人，但他是一位英国臣民；他在澳大利亚开业做律师已有十年，以前从来没有访问过中国。他的选民们显然很慷慨地提供他的旅行费用。他承认，他们很想保持同中国的联系，同时他们希望国会代表将证明是获得商业特权和改善他们的地位的一种手段。我确实猜想：当他到达的时候，他曾希望被提名为议员候选人，但他发现，那些早到此地的候选人已对来访的选民们大肆进行活动。

总统对海外的代表们发表了一次演说，证明他深谋远虑地希望在北京与那些居住在太平洋沿岸、澳大利亚、马六甲海峡殖民地、香港、缅甸、印度等地的有钱的华侨之间取得更密切的联系。

朱尔典谨上 1913年3月4日于北京

第14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3年3月22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报告：我收到了国际银行家委员会对1月31日为止

的那个季度提出的报告，其中他们谈到了那段期间内海关岁入的拨款情况。该委员会的报告可以概括如下：

自1912年10月31日至1913年1月31日所收净税款达9,935,293两，而前一季度所收的净税款为10,567,935两。

偿付分期摊还的借款，包括本息在内，共达6,789,732两。至1月31日为止应付的所有分期摊还的款项都已偿清。

有10,273,682两的款项已转入赔款帐目，1月31日手头的余款为2,186,364两。

关于1911年11月和12月应付的分期摊付的赔款，已确定了兑换率；款项是由四家银行汇去的。那些银行手中的余款可作汇款之用，以偿还1月、2月、3月和4月分期摊付的那些赔款。

朱尔典谨上 1913年3月7日于北京

第15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3年3月22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报告：在同舰队总司令官和英王陛下驻广州总领事商量之后，驻扎在沙面的印度分遣部队已于2月20日撤退，中国的春节已经过去，没有发生任何不幸的事件。

目前，有刺的铁丝网和工事都仍保留；英国陛下军舰“克莱奥”号继续作为高级海军军官的指挥部。

朱尔典谨上 1913年3月8日于北京

第16件 高慎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3年3月25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随信附上桑普森先生对《北德意志环球报》最近发表

的关于1911年10月至1912年10月胶州湾发展情况备忘录所作的摘要。

高慎谨上 1913年3月20日于柏林

**第16件的附件 关于1911年10月至1912年10月
胶州湾发展情况备忘录的摘要**

1911年秋天开始的中国革命对全国贸易具有不利的影响。然而，在各种政治动乱中，青岛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十分安全和平静的，所以许多有影响的中国商人在这个殖民地避难。还值得注意的是，对土地的需求超过了自接管这个殖民地以来的任何一年。殖民地的贸易，受到上述中国商人的定居和腹地丰收的有利影响。

这些情况大大超过了革命的有害效果；因此，中国海关岁入增长了百分之七点六，1911年至1912年间共达1,406,113海关两，而1910年至1911年间为1,306,520海关两。

该殖民地的贸易，从去年的六千九百四十万墨西哥元增加到八千九百九十六万墨西哥元。此外，1911年至1912年间，每元的价值从平均折合—先令十便士增加到二先令。

根据海关署的统计，非中国出产的进口货，除免税的路矿器材外，共达三千零九十万元，去年为二千八百七十万元，而近年来持续下降的中国出产的进口货，从1910年至1911年的八百四十万元增加到1911年至1912年的二千二百零六万元。这个增长主要是由于上述中国居民的增加，但也受了津浦铁路竣工的影响。德国出产的全部进口货共计五千四百万海关两或七十九万六千五百英镑。

1911年至1912年间的出口共计三千七百万元，而1910年至1911年间的出口为三千二百三十万元。这两年内重要的出口货如下：

	1910—1911	1911—1912
草帽纒	7,200,000元	15,400,000元
落花生	5,700,000元	5,000,000元
花生油	2,000,000元	3,200,000元
各种蚕丝	5,500,000元	5,900,000元
家畜	300,000元	700,000元

在这一年内，有七百二十七艘船只结关后离港，登记的吨位总共为 1,136,012 净吨，而去年为五百九十艘船只，1,025,267 吨。

胶济铁路公司的收入有很大的增长，部分原因是由于津浦铁路交付通车，该路在济南与胶济铁路的终点站会合。人们建议，首先修筑一条铁路，自胶济铁路线上的高密车站经过沂州府和峄县通往该省南部的韩庄，以便更进一步地发展德国在山东的铁路。

山东矿务公司自1911年10月1日至1912年9月13日采煤 532,589.5 吨，而去年同一时期采煤 453,275.15 吨。

该殖民地的岁入自 5,325,978 马克增加到 6,739,480 马克，出卖土地和青岛船坞营业的收入是使岁入增加的主要原因。

教育当局正在努力提高青岛作为一个文化中心的重要性。他们为此目的建立的主要机构是德华高级学堂，其中低级班有学生二百八十五人，参加高级班的有六十六人。高级班有四科，即科技、医药、法律和农业。由于地方狭小，人们认为不可能接受许多申请入高级学堂学习的中国人。不过，一幢新房子正在建筑中，不久即将完工。由于许多英国学堂的学生申请进入该高级学堂，所以专门为那些说英语的中国学生开设一个班，目的是教他们学德语，以便他们可以尽快地升入高级班。这个班也已很拥挤。和高级学堂有关的，还有一个科学翻译室，它从事于将德文译成中

文以及将中文译成德文的工作。

第17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3年4月3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人们认为，在袁世凯和国民党之间，很可能将发生一场斗争。国民党强烈反对选举袁世凯为总统，并且说：如果他不撤消他的候选人资格，他就必须打仗。他们相信袁世凯将会屈服，但是，如果他不屈服的话，他们承认已做好打仗的准备，因为他们那方面有武昌部队的支持。

第18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3年4月8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国会两院于今晨正式开幕，没有发生事故。

第19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3年4月10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随信附上一份备忘录的副本。该备忘录是我遵照您的指示送交外交部的，通知他们：就英国殖民地说来，英王陛下政府反对制订关于选举海外华侨代表担任国会议员的章程的政策。

朱尔典谨上 1913年3月27日于北京

第19件的附件 送交外交部的备忘录

去年11月29日，英王陛下公使在同外交总长会谈时，讨论了中国政府颁布的关于海外华侨选举国会代表章程的问题，并乘机警告总长阁下，英王陛下政府对英国殖民地的华侨参加这种选举

有可能提出反对意见。

现在，英王陛下公使荣幸地通知外交部：他奉英王陛下外交大臣的指示正式向中国政府说明，就英国殖民地说来，英王陛下政府对制订这种章程的政策持有强烈的反对意见。

1913年3月27日于北京

第20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3年4月24日收到

阁下：

关于我今年1月20日的信，我荣幸地随信附上上海国际银行家委员会秘书的一封来信的副本，该信要求对分配今年海关岁入余款的安排进行修改。关于目前的安排，您从1912年1月30日外交团致该银行家委员会的同文信件的记述中将会看到，该信列为我那天写的信件的附件五^①。

在本月7日举行的外交团会议上，考虑了这个问题，一致接受该银行家委员会的建议，并于今天用同文信件通知上海各有关银行。我随信附上该同文信件的副本。

朱尔典谨上 1913年4月8日于北京

第20件附件1 国际银行家委员会致 朱尔典爵士函

阁下：

我奉命通知您：本月20日星期四举行了国际银行家委员会会议，讨论关于保管偿还借款的专款问题。

会议决定要求您删去1912年1月30日您的信中的第六款，

^① 原编者注：参阅《中国第三号(1912年)》，第113件。

并把下列词句加入第二款：

“但当存入这些银行的专款一旦供本年偿还 1900 年前缔订的所有借款之后，余款便应立即在主管偿还赔款的那些银行中间按比例地进行分配，直到 1913 年底为止。”

于是，该款的全文如下：

“各主要有关银行，即汇丰银行、德华银行和华俄道胜银行，应当是上海海关专款的保管者，但当存入这些银行的专款供本年偿还 1900 年前缔订的所有借款之后，余款便应立即在主管偿还赔款的那些银行中间按比例地进行分配，直到 1913 年底为止。”

我将很高兴地听到外交团批准上述修改的消息。

秘书 罗伯逊谨上 1913 年 3 月 26 日于上海

第 20 件附件 2 朱尔典爵士致汇丰银行和 麦加利银行经理函

先生：

我请您参阅国际银行家委员会秘书 3 月 26 日写给外交团首席公使的信，该信建议对我 1912 年 1 月 30 日的信^①中所传达给您们的那些指示作某些修改；谨通知您们，外交团已同意删去 1912 年 1 月 30 日的信中所列的第六款，并把下列词句加入第二款：

“但当存入这些银行的专款一旦供本年偿还 1900 年前缔订的所有借款之后，余款便应立即在主管偿还赔款的那些银行中间按比例地进行分配，直到 1913 年底为止。”

于是，该款的全文如下：

“各主要有关银行，即汇丰银行、德华银行和华俄道胜银行，应当是上海海关专款的保管者，但当存入这些银行的专款供本年

^① 原编者注：参阅《中国第三号（1912 年）》，第 113 件。

偿还 1900 年前缔订的所有借款之后，余款便应立即在主管偿还赔款的那些银行中间按比例地进行分配，直到 1913 年底为止。”

朱尔典谨上 1913 年 4 月 8 日于北京

第 21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3 年 4 月 26 日收到

阁下：

正如我在昨天的电报中曾荣幸地通知您的那样，中国的第一届国会于昨天早晨正式开幕。我谨附上外交部的一份照会的译文，它要求把这项消息转达英王陛下政府。

虽然事情已经顺利地过去，而且表面上一切都很平静，但有一股发生磨擦的强大暗流，人们担心可能发生动乱。当仪式结束和两院开始工作的时候，对力量的考验便将发生。袁世凯很可能当选为民国总统，但人们在制订宪法的时候，肯定会企图把他的权力减少到最低限度。那时候，他可能必须在接受一个供装饰用的职位和主张在政府中享有部分实权这二者之间作出抉择。目前的印象是：在采取后一方针时，他将会得到军队将领们的支持。

朱尔典谨上 1913 年 4 月 9 日于北京

第 22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3 年 5 月 19 日收到

阁下：

关于我 2 月 7 日的信，我荣幸地随信附上黑德爵士对 1913 年第一季度各省一般情况所作的概述，它是根据英王陛下各领事官员的报告写成的。

朱尔典谨上 1913 年 5 月 3 日于北京

第22件的附件 1913年第一季度各省情况概述

从生命财产安全的观点看来，我们所收到的英王陛下各领事官员关于上季度的报告，反映了总的形势有所改善。的确，成群结队的土匪仍然在许多地区继续进行劫掠，但各省当局现已对部队进行较好的控制，在镇压骚乱活动中是非常积极的。长期干旱在北方各省造成的灾荒以及把政治和拦路抢劫结合在一起的秘密结社在南方各省煽起的不满，使他们在执行这项任务中受到了妨碍。

另一方面，各省官员们在恢复他们的地方权力的时候，尝到了不受中央政府控制的甜头，没有准备听从北京方面支配的意思。在最近一两次考验力量时，中央政府已证明无力执行它的意志，同意任命当地所推选的地方官员担任各省的高级职务。这个动向究竟会走多远，现在说来还为时过早，但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袁世凯总统目前所奉行的方针政策。

山 东

除了山东某些地区多少带有经常性的抢劫之外，该省的情况在上季度内显然是平静的。没有发生任何具有重要意义的兵变。烟台地方的革命军已终于被解散，由一千五百名陆军代替他们。严重的干旱损害了冬小麦的前景，并造成了某种程度的灾荒。当局最近禁止谷物自山东出口，并规定输入该省的谷物免税。干旱有助于增加武装抢劫案的次数，这种案件在西南部的曹州和北部的乐陵仍然较频繁地发生。在许多地区，农村组成了自愿参加的民团，接替陆军的巡查任务，并帮助维持秩序。

最近人们对津浦铁路的运输提出许多申诉，该路的经营管理权掌握在中国人手中。据说，如果没有佣金，便不能够获得运货

的车辆：这些车辆常常未载东西停在某个车站，而在另一个车站却急迫地需要它们。乘坐普通列车的旅客也遭到很大的不便。总工程师经常促请行政管理当局注意这些缺点，但从得到的答复中仅被告知：铁路是为中国人而不是为外国人经营的，外国人没有义务必须使用它。然而，铁路所提供的更多的便利，大大增加了它的收入，并附带吸引了青岛腹地的一部分贸易。直到最近为止，自济南至青岛的德国胶济铁路，使青岛享有该省铁路运输贸易的垄断权。济南至天津的距离实际上比济南至青岛减少了四十英里；津浦铁路筑成后，山东西部的商人发现，经天津出口货物较为合算，于是天津迅速吸取了直到那时为止被认为是在它的范围之外的大部分贸易。现在，德国胶济铁路宣布减少运费百分之四十，以恢复它的运输。当然，中国津浦铁路也可以采取同样的措施，由于它的铁路线较长和由此产生的它所经营的贸易较多，以及它的终点站所提供的各种便利，如果同其他铁路发生削价竞争的话，将使它处于一个强有力的地位。除非德国人能够将他们的铁路进一步伸入内地，并和山西、河南等省连接起来（据说他们正在努力去做），有朝一日青岛港将不得不满足于附近地区的贸易，而经验证明该地区的贸易比他们原来所希望的要少得多。此外，他们计划修筑一些支线，把山东省各中心和津浦铁路连接起来，而且和烟台相连接，目前终于筑成它所急需的防波堤。

满洲

中国当局为了答复英、日两国领事官员提出的抗议，已在哈尔滨附近出产谷类的地区认真进行镇压土匪的工作。中国官方的报告声称，已有九百二十九名土匪被打死和处决。该报告详细说明了镇压土匪的方法：起初，劝诱最著名的“红胡子”率领他的党羽前来帮助军队消灭他以前的伙伴；后来，在这个行动胜利结束

后，邀请他前来接受远征部队首领们的表扬，他和他的部下被制服了，并被乱刀砍死。人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对那个地区的不法活动进行了一次有效的打击。

江苏和安徽

江苏和安徽交界的地方因抢劫行为而引人注目；此地同其他地方一样，干旱所引起的灾荒，使抢劫案件有所增加。在津浦铁路线上距终点站二十五英里的滁州，今年初得到很坏的名声，所以都督派遣了几千名部队前往。他们驻在该处对当地起了有益的作用，但把动乱的地点移到了另一个地区。这就使得军队自滁州调走，滁州又立即重新开始了动乱，终于在3月11日发生了一次严重的骚动，那是由一些秘密结社的活动所引起的。长江下游最重要的秘密结社是九龙山会，它似乎是由普遍的不满情绪所激起，而不是由任何明确的改革计划促成的，虽然有人还说它是排外的。据说有许多士兵卷入了这项活动。江苏和安徽两省当局大力搜寻该会的成员，并将他们斩首。九龙山会和海龙会在镇江、芜湖和长江下游的大多数口岸都有分会。成员主要有盐枭、散兵游勇和铁路工人，他们这些人应对滁州的骚乱承担责任。驻在该处的一些军官也被卷了进去。3月12日，驻滁州的部队得到增援，毫不费力地驱走了抢劫者，他们逃过了边界，进入江苏^①，自那时以来事情似乎已经平息下去。江苏北部各地的县官已临时被授予成立军事法庭审理严重案件的权力，并有权将这些诉讼直接报告都督，他可以下令将这些案件按照军法处理。

镇江的富裕阶层人士对公立学校管理不当感到厌恶，很多人纷纷回到教会学校。事实上，英王陛下领事特别提到，该地区的中国人在所有的重要事情上具有日益增长的谋求外国援助和支持的倾向。在饥荒时期，该地人民已经知道，从外国传教士那里可

^① 原文如此，疑为安徽之误。

望得到外国的捐献和无偿的援助。对镇江和扬州来说，运河水利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正在进行认真的讨论；但是，向有关的各主要城镇商会进行贷款的建议仅得到微弱的支持，而向外国借款的意见被普遍认为是唯一的解决办法。这笔外国借款的抵押品将是代替旧厘金的货物税。这项新的方案是取消所有的货物通过税，而代之以生产税和目的地（或销售地）税。它现在正全面实施中，至少在镇江周围地区是如此。

江 西

在江西省，上季度内人们最关心的事情集中在该省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冲突上。1月间，由于都督李烈钧采取了不受约束的态度，总统下令扣留七千支步枪和约三百万发子弹，这批军火已卸在九江，系前任江西都督^①在若干时候以前订购的。李烈钧都督不甘忍受这一挫折，将部队从南昌调往九江，而九江的戈克安将军^②准备与中央政府方面共命运。当戈克安将军已证明顽固不化之后，李烈钧都督任命欧阳武^③接替他，并采取进一步的军事措施，以迫使戈克安辞职。3月21日，戈克安的部队与欧阳武指挥的部队之间的冲突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总共大约有三千名部队正在九江集中，戈克安在该地所指挥的有一千五百人。长江流域流传的谣言说，对双方的增援就是南北的公开破裂。人们普遍认为，在安徽、江西、广东、福建等省之间，而且可能还有湖南省，组成了一个积极的联盟，以对抗袁世凯的权力；内战已迫在眉睫。幸亏被袁世凯派去调解军火问题的官员王芝祥仍在该省，经过一些谈判之后，顺利地说服了戈克安将军辞职并离开九江。

① 马毓宝。

② 当时任九江要塞司令。

③ 当时任师长。

这是江西省当局的又一胜利。去年12月，他们拒绝接受北京任命的民政长；今年2月，他们以内战相威胁，除非北京方面撤销对该省政府所购军火的禁运；3月，他们又以诉诸武力相威胁，除非中央政府所支持的一名军官立即被调离他的职务。在所有这三个事件中，声称能够对各省执行其意志的中央政府，听从了江西官员们的支配。现在，只有当北京方面的权力符合他们自己的愿望时，他们才承认北京的权力。在能够使政治上的对手对北京的总统和总理产生怀疑的情况下，宋教仁的被害进一步失去了长江各省的同情，并加强了它们脱离中央政府的活动。

江西还遭受着内部的灾难，部分是由于大部分农作物被去年夏天的洪水所毁坏，部分是由于去年冬天的严寒。

湖 北

尽管连续出现了令人不安的谣言，以及不守纪律的军队与守城卫队之间的某些纠纷，当局在上季度内仍顺利地防止了对武昌治安的任何严重破坏，但在居民中间存在着对前途忧虑不安的强烈情绪。驻有大批散兵游勇，是当地形势中最危险的因素。到3月底，关于即将发生动乱的谣言特别多；许多商人认为，较谨慎的办法是离开武昌，迁往汉口居住。3月28日和29日夜间，当局采取了特别的预防措施，设置警戒哨严密保卫武昌城，但实际上没有发生具有严重性质的骚乱。北洋军的一支相当强大的部队最近被调往汉口，作为对付当地士兵不满情绪的一项防范措施，也可能是为了加强黎元洪将军在同南方各省斗争时的力量。

据湖北其他地区的报道，发生了严重的动乱。成群结队的散兵游勇回乡时，犯下了暴行。

英王陛下驻宜昌领事报告说：在农村地区，仍继续发生不法行为。在满族人以前的据点荆州，大约有一万五千名满族人处于

贫困状态；把他们运往该省其他地区的尝试，迄今未能成功。

河南、陕西和甘肃

中国这个地区持续了很长时间的干旱，使得农作物全部或部分地歉收，引起了人们很大的不安。最近下了一点小雨，但仍然普遍存在着灾荒。这种情况有助于增加一般的动乱和扩大土匪队伍的人数，这不是不自然的事情。据说，河南府附近的农村地区极为骚动。贸易处于停滞状态，许多商人正毅然离开河南。不过，在抢劫行为猖獗的地方，军事当局尽了最大努力驱散那些成群结队的土匪。最近的报告是使人们抱有较大的希望的。

四川

四川省似乎处于秘密结社的控制之下，那些秘密结社披着为了共和利益的政党的外衣，继续欺骗和平的居民，但与此同时，却并非不屑于分享那些附属于他们的匪帮通过多少是有组织的抢劫所得到的赃物。在成都，上季度内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该省关于北京国会的选举上。已经选出三十五名众议院议员代表四川，没有发生严重的困难，但关于参议院议员的选举，必须等待省议会内部的事务获得解决，已证明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代表四川的三十五名国会议员中，据说有二十三名属于国民党，十二名属于共和党。可以说，这个结果不是代表该省的公众舆论，而是代表一个高度组织起来的党派，它的主要目的似乎是为它的成员获得高薪的职位。国民党主张各省享有最大限度的自治权，其中包括选举他们自己的都督和挑选他们自己的行政官员的权利。共和党主张权力集中，愿意将都督和行政官员的任命置于北京中央政府手中。

到2月底，未领到饷银的士兵在宁远府哗变。秩序已经恢复，

但对惩罚首要分子一事未进行认真的尝试。

在那些想要管理他们自己的教堂、不受外国传教士支配的中国教徒代表与传教士本人之间，已经在成都举行各种会议。这个教堂独立的运动正在中国各地普遍发展，但目前财政困难是中国教徒们所遇到的主要障碍。

作为警卫部队组成部分的成都军队，于2月间蓄意袭击万县城，使四川东部也受到骚扰。作最乐观的估计，他们是一支纪律很差的部队，因为欠付饷银和听到他们即将被解散的谣言，从而使士兵们处于哗变状态。有十五家最大的商号和当铺连续遭到袭击和抢劫；已经得到五千两至一万两白银的士兵们，由于市民答应给予一万元，才被劝诱返回他们的营房。这笔款项的支付，避免了进一步的暴行，对有关部队也加发一个月饷银作为赏金。过了若干时候，当局才采取措施严责首要分子，有好几名主要罪犯终于被枪决，不守纪律的一连士兵被调往成都。

在抢劫期间，没有表现出对外国人的敌意，但英王陛下驻重庆领事报告说：在那些申斥列强怀有瓜分和奴役中国的毒恶阴谋的揭帖中得到发泄的某些激怒情绪，最近已在万县出现。

四川武装部队的减少，使得南川、綦江以及其他与失去法律控制的贵州省接壤的各县重新发生武装抢劫和绑架。自重庆派往恢复秩序的一支部队已被一群强大的土匪打败；贵州和四川的军事当局需要采取一致行动，以镇压边境地区的普遍动乱。目前，在各主要道路沿线，每隔五里路程布置一队士兵。情况迄今已有改善，所以邮政局正在努力重新开始通往贵州的邮寄包裹工作，这项工作自1911年铁路风潮开始以来便已中断。

云 南

若干时候以来，云南省普遍存在着很平静的状况；没有严重

的动乱可供记述。人民似乎是幸运的，而且感到满意；部队的饷银已付清，纪律很好，他们没有制造麻烦。据说，该省库藏几乎空虚，但款项即将到来，以供行政当局的日常支出，甚至供采购军火之用。在云南的各阶层人士中，仍存在着对英国人的敌对情绪，因为他们认为英国人对边境地区进行侵略；这种敌对情绪对英国在中国那部分地区的利益起了有害的作用。英王陛下总领事正在力图说服地方当局从今年派往国外的一百名留学生中，送少数人前往香港大学，以便在某种程度上抵销这种敌对情绪。

在地方政府的赞助下，中国佛教促进会已在云南府成立。

广 西

上季度内，广西的政治形势仍保持平静。经常有人报道成群结队的土匪进行武装抢劫，特别是在该省同广东接壤的东南部和东部地区。但是，政府似乎正在尽最大努力恢复秩序；几乎每天都有捕获土匪的报告。上季度内，西江上游地区没有发生海盗行为。

广 东

广东省派往北京国会的议员人数是三十名。有七个选举区。包括汕头在内的第三选举区选出四名议员，该区选民的总人数为二十五万七千五百八十五人。海阳知县和其他官员被告发有不法行为，但控告他们的案件通过妥协办法解决。

广州都督向各县知事发出通令，指示他们立即在农村建立警察。三个月之后，将进行一次正式的检查；根据他们的功绩或缺点判断各地知事的效率。据说，三合会的人数日益增加；另一个结社八卦教也在煽动骚乱，但军事当局目前似乎能够保持控制权。

最近来自广州的消息表明，都督和地方官员们正在逐步加强他们的地位。为了在蒙古进行的战斗，过去若干时间内已向海外华侨发出要求提供款项的呼吁，但更令人怀疑的是，他们所得到的钱是否将用于此项目的。

在该省西南的北海，有严重的淋巴腺鼠疫流行病。由于该口岸普遍存在不卫生的状况，那种流行病在本季度内似乎很可能更加严重起来。许多中国人已在周围的村庄避难，但该疾病在内地似乎没有蔓延很广，虽然据灵州^①的报道已发现一两个病例。灵州地区也是因征收新捐税而发生某些动乱的地方。这些动乱被许威扬^②统领十分残酷地镇压下去，他为了对无辜的村民强行敲诈勒索而毫不犹豫地使用他的部队。后来，许威扬统领被撤职；目前的形势是较为平静的。

福 建

2月初，有人企图谋杀新任民政长张元奇，将一颗炸弹放在他所经过的桥上。张元奇注意到了这颗炸弹，及时停下他的轿子，以保全他自己的性命，但在他前面的两名卫兵被炸断了腿。福州其他地方也发现了炸弹，但在别的地区没有发生任何严重的骚乱。福州周围地区是十分平静的；甚至在兴化，通常是处于不安状态的，自从强迫根除鸦片的种植以来尤其如此，目前正在安定下来，恢复较正常的情况。英王陛下驻福州领事注意到当地人显然倾向于恢复偶像崇拜和革命前的那种服装式样。福建和浙江对中央政府的态度，似乎比南方其他各省的态度更为忠诚；在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可能站在反对南方其他各省而支持袁世凯的那方面^③。

①② 译音。

③ 原件未署名。

第 23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3 年 5 月 19 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附上外交部的一份照会的副本。该照会说：美国代办卫理先生奉华盛顿方面的指示，于昨天向袁世凯转达了威尔逊总统代表美国政府和公民对中华民国的正式承认。

朱尔典谨上 1913 年 5 月 3 日于北京

第 24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3 年 5 月 26 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随信附上袁世凯对威尔逊总统的承认信件所作的正式答复的副本。

值得注意的是，袁世凯在最后的那段话中，提到了“忠实履行现有的一切义务”。

朱尔典谨上 1913 年 5 月 8 日于北京

第 25 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3 年 5 月 26 日收到

阁下：

1901 年 10 月，外务部曾向外交团提出一项要求说：他们应向他们的国民发出指示，各国商人在北京开设的商店和其他企业必须按照条约迁往一个开放口岸。

在前一个月，各国使馆曾收到同文照会说：除了那些供外交使团或供使馆卫队之用的货物外，将来对运入北京城的所有外国货物征收入城税。外交团在答复上述关于入城税问题的照会中，

同时谈到了将各国商业机构迁离北京的问题。他们宣布，他们接受入城税建议的条件，是中国政府不坚持关于将各国商人的机构迁离北京的要求。问题搁置在这里，直到1903年为止。那时，庆亲王又提出了这项要求，写了一封信给外交团，重申北京不是一个开放口岸，并宣称：将来外国商人在城内不再能够自由购买房屋或开设商店。各国使馆对这封信没有给予答复。是年晚些时候，在中日两国谈判期间，该问题又提了出来。1903年《中日通商行船续约》第十款规定如下：

“现在两国议定：如驻扎直隶省之各国兵队及各国护馆兵队一律撤退后，中国即当在北京自开通商场。”^①

1906年，日本公使馆收到外务部多次提出的关于该国国民开设某些商店的抗议，但它每一次都拒绝了中国人的要求，理由是各国商人为了贸易的目的在北京居住已经成为历史上的一项惯例。

自1906年以后，对该问题暂时停止了交涉，直到去年9月为止。那时，外交团收到了外交部的一项照会，重申他们以前提出过的关于迁移各国商业机构的要求。我荣幸地随信附上那个照会的译文。该照会的措词同以前关于这个问题的信件极为相似。它主要令人感到兴味的的原因，是因为它提供了又一个证据，证明中华民国在希望尽力限制外国商业在全国的发展方面绝不落在前届政权的后面。

我还荣幸地附上外交团送给外交部的备忘录的副本，那个备忘录是答复他们去年9月的照会的。您将注意到，各国使团的首脑对他们不能够接受外交部的建议一事感到遗憾；他们不能够接受的理由系根据公认的惯例。

朱尔典谨上 1913年5月9日于北京

^① 中文约本见北京大学法律系国际法教研室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第194页。

第25件附件2 致外交部备忘录

英王陛下公使荣幸地表示收到外交部1912年9月3日的照会。外交部在照会中宣称：各国商人于中华民国元年9月（1912年9月）以前在北京开设的所有商店和货栈应获准照常营业，但他们必须在与中国商人相同的地位上遵守治安条例，并将得到相同的保护；无论如何不得开设任何其他的商店或货栈。

在答复中，英王陛下公使谨说明：虽然根据条约北京从来没有对各国贸易开放，但自义和团动乱以来，关于各国商人在北京内城和外城居住及营业一事，已成为公认的惯例。

人们注意到，中日两国修订条约的委员之间于1903年10月10日互换的照会中规定：在各国军队撤退之后，将在北京内城之外为各国贸易指定一个地方，散居在内城和外城的外国人将需要迁至该处。然而，既然没有表示禁止之意，从以上的叙述中可以推断：在指定这样一个地方之前，外国人居住和贸易的事实是被承认了的。

人们承认：前外务部曾于1903年宣称，对于在那个日期以前开设的外国商店或货栈，将不下令关闭，但除此之外，不得开设其他的商店或货栈；可是，外交团从未表示它同意中国人的建议。

因此，有正当理由阻止中国政府反对那些已住在北京的外国人继续居住和贸易；中国政府不能够有正当理由反对其他外国人享有已经给予他们的同胞和其他各国国民的特权。

在这种情况下，英王陛下公使感到遗憾的是，他不能够接受外交部关于这个问题的建议。

1913年4月28日于北京

第26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3年5月30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随信送上外交部关于外国借款问题的一份备忘录的译文。

您将看到：在没有获得中央政府的同意前，中国政府拒绝承认外国商人以国家的铁路或矿藏等财产作抵押，在中国任何地区贷给公私团体的任何借款。

我正在把该备忘录的副本通知英王陛下的各领事官员，以供英国商人们参考。

朱尔典谨上 1913年5月13日于北京

第27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3年5月30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报告：现已选举了参议院和众议院的代理议长；由于选出了这些官员，国会可以被认为是一个适当组成的团体。

中华民国于本月2日和4日分别获得墨西哥共和国和古巴共和国的正式承认。

朱尔典谨上 1913年5月13日于北京

第28件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3年6月2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报告：总统于本月2日和7日颁布的两道命令已经发表，虽然它们所用的词句有些含糊不清，但中国人认为它们含

有对南方鼓动家们的一项警告以及关于总统在必要时想要采取高压政策的声明。这些命令颁布后接着采取的公开行动，是政府打算粉碎任何反抗企图的一个重要迹象。他们已把驻扎在河南边境上的信阳的北方军队调往汉口，并且正在准备把第六师运至长江沿岸的某个地方，在该处将能够威胁江西。几天前，我得到了这方面的消息，及时拍发电报把他们所拟采取的作动通知了舰队副司令官杰拉姆。总统和他的顾问们似乎认为，显示武力将足以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预料不会出现有组织的反抗，虽然他们承认可能有一些零星的暴动。但如果他们的意图是要调走江西和安徽的都督，代之以他们自己那一派的支持者（这一点似乎是事实），形势随时可能呈现严重的局面。南方也许没有很多可以自由使用的军队，尽管驻南京的第八师很可能重振旗鼓站在它那方面，但它始终可以拒绝运送给养，并通过消极对抗的政策大大牵制中央政府。

一切动乱的根源，在于南北双方之间的政治观点存在着重要分歧。象孙中山和黄兴这样的人，确实与袁世凯和较老的官僚阶层毫无共同之处。孙中山等人赞扬宪法程序，想利用那些程序作为剥夺总统权力的工具。袁世凯等人认为国会没有什么优点，它已经变成名副其实的魔窟；他们在很大的程度上继续按照那些旧的方针路线统治国家。现在，如同在革命时期一样，问题在于如何为了普遍的利益把南北双方团结在一项共同的政策之中。上海领导人也许认识到了他们自己的弱点，似乎愿意迁就袁世凯。

象黎元洪这样温和的人物，向南北双方发出一些热情的呼吁，要求抛开那些分歧意见，但他们的影响对国会没有显而易见的效果。

朱尔典谨上 1913年5月19日于北京

第 29 件 艾斯敦先生^①致格雷爵士函

1913 年 6 月 23 日收到

阁下：

关于朱尔典爵士今年 3 月 27 日的信，我荣幸地随信附上同外交部继续来往信件的副本，那些信件是关于选举代表海外华侨的国会议员章程的。

艾斯敦谨上 1913 年 6 月 7 日于北京

第 29 件附件 2 朱尔典爵士致外交部备忘录

英王陛下公使荣幸地表示收到外交部 5 月 16 日的备忘录，该备忘录是关于选举国会议员代表在英国殖民地内居住的华侨的。

从该备忘录看来，中国政府似乎具有这样的印象，即英国政府仅仅反对实现选举这些代表的方法。英王陛下公使向外交部保证，事实并非如此；英王陛下政府根本反对那些受英国法律管辖的中国人在外国国会中选有代表的整个原则，而选举方法是一个细节，对这个反对意见绝无影响。无论是采取目前的选举方法或采取任何其他选举方法，都不可能避免中国政府在受英国国王管辖的地区内实行干涉的局面。英国殖民地内的中国公民象其他国籍的臣民一样，在他们留住该地期间，有遵守英国法律的义务；不能允许他们把本国的政治争论和内部竞争输入到他们所居住的国家中来。

英王陛下公使正把外交部的备忘录送交英王陛下政府，但他认为必须立即纠正构成国会筹备处所作答复的基础的那种误解。

1913 年 5 月 28 日于北京

^① 英国驻华公使馆代办。

第30件 艾斯敦先生致格雷爵士函

1913年6月28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报告：总统于本月9日发布了一道命令，免除江西都督^①的职务。

在过去几个月间，江西省公然蔑视中央政府，拒绝接受北京方面任命的官员或将任何税款汇往首都，总是装出主张实行最彻底的各省自治的样子。与此同时，该省都督扮演了以孙中山和黄兴为首的南派的支持者中最好战分子的角色。

在没有把握得到款项之前，袁世凯继续持消极态度，实行最大限度的忍耐政策，因为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一个没有付诸实现的威胁在中国人心中将产生的灾难性的影响。当善后大借款的订立使得北方军队可以调动之后，他立即对那些不服从中央的省份发出警告性的命令，同时把军队调往汉口和长江，在必要时作为那些命令的后盾。

江西起初企图进行反击，都督把他的军队调到同北方部队所占地方相对峙的据点，但邻近的安徽和湖南两省几乎没有表示和他一起为国民党的主义而战斗的意向。总统认为时机已到，发出将他免职的命令。

判断这个决定性的行动将引起多少反抗，现在还为时过早，虽然据说江西军队已自湖北边境撤往九江。人们可以预料到将有愤怒的抗议和较小的冲突，但一省试图完成对准备执行中央政府命令的北方强大部队进行抵抗这项力所不及的工作，这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犯有过错的都督一旦被调走之后，总统那方面不大可能把问

^① 李烈钧。

题推向极端。事实上，从伴随免职令而新任命的该省官员中，可以看出妥协的迹象，因为大多数被任命者都是国民党员和前任都督的部下，而都督的职务暂时交给了武昌的黎元洪。

袁世凯已经提出了挑战。通过对江西的威胁所取得的成就大小，可以测定袁世凯对南方各省普遍获得控制的机会。

我向舰队副司令官杰拉姆保持着联系，已请求他安排一艘炮艇暂时泊驻在九江，但英王陛下领事报告说：该处一切都很平静；对居住在该口岸及其附近的避暑胜地牯岭的英国人士，不担心有任何危险。

艾斯敦谨上 1913年6月12日于北京

第31件 艾斯敦先生致格雷爵士电

1913年6月30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中国政府希望从善后大借款的收入中，于7月3日在伦敦用英镑偿清直到1912年12月31日欠付的赔款。

如果您同意这个步骤，请电告至7月3日为止应付的英镑总额，包括利息在内。

第32件 格雷爵士致艾斯敦先生电

1913年7月3日发自外交部

关于您6月30日的电报。

到去年12月31日结欠的款额以及到7月3日欠款的利息，为二十二万九千三百三十三镑八先令五便士。

第33件 艾斯敦先生致格雷爵士电

1913年7月15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关于我6月12日的信。

由于江西军队表现出不满的迹象，北方军队被调入该省，对他们进行恫吓，结果在离九江及其附近的外国人避暑胜地牯岭不远的地方，发生了一次冲突。英王陛下驻九江领事报告说：没有理由认为外国人生命财产处于危险之中；有好几艘外国炮舰泊在该口岸。

第34件 艾斯敦先生致格雷爵士电

1913年7月16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战斗似乎是若干时候以来在长江一带郁积的反抗运动的结果。最近被袁世凯逼迫辞职的安徽都督^①，已被安徽军队请了回来，因为他们拒绝在新都督统率下服役。也已被免职的江西都督领导反抗。

据说，其他省份将参加运动。

自7月13日以来，似乎没有发生实际战斗。

第35件 艾斯敦先生致格雷爵士电

1913年7月17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有迹象表明，反抗运动正在蔓延。南京都督^②已成为当地部队的俘虏，他向驻上海的各国领事发布了关于江苏独立的正式通知。

有人告诉我：总统仍然认为，对中国的偿付能力和完整来说，权力的集中是很重要的。总统阁下相信，不久便将使江西屈服。

第36件 艾斯敦先生致格雷爵士电

1913年7月18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英王陛下驻长江流域各地领事最近报告说：运动是由著名的

① 柏文蔚。

② 程德全。

黄兴和最近被免职的广东、安徽、江西三省都督领导的军事运动。

直到目前为止，除江苏和江西两省之外，其他各省没有正式参加反抗。公开宣布的目的是要打垮袁世凯。北方军队迄今未被打败。舰队司令正前往上海。

第 37 件 艾斯敦先生致格雷爵士函

1913 年 7 月 19 日收到

阁下：

关于朱尔典先生 3 月 7 日的信，我荣幸地报告：上海国际银行家委员会已把他们关于自 1913 年 2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那段期间的报告送交外交团首席公使，该报告说明那个期间海关所收税款的拨付情况。

自 2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所收净税款共达 6,287,877.52 两，或每月平均为 3,143,938.76 两，而上季度每月平均为 3,311,764.36 两。

偿付分期摊还的借款本息共达 2,261,802.24 两；到 3 月 31 日应付的所有分期摊还的款项都已偿清。

至 1912 年 4 月 30 日分期摊付的赔款，已由各有关银行汇去。

艾斯敦谨上 1913 年 7 月 4 日于北京

第 38 件 艾斯敦先生致格雷爵士函

1913 年 7 月 19 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报告：《北京日报》发表了关于 1913 年上半年预算的摘要，该预算已提交中国国会。虽然那些数字只不过是为了供众议院审阅而编制的估算，但它们可以被用来或多或少地反映中国目前的财政状况。这半年所列的赤字为 117,486,572 元，或将

近12,000,000英镑。收入仅仅为51,336,800元(合5,000,000英镑以上),当然没有把通过善后人借款所得到的款项估计在内,那笔款项将为国家债务偿付79,199,844元(合8,000,000英镑),减少了一半以上。另一方面,就行政费用而言,五国银行团为此目的拨出的五百五十万英镑,将支付六个月的费用,即自4月起至9月止,而且包括四、九两个月在内;因此,这笔款项的三分之二不能够用来减少今年上半年所预计的赤字,而因为这笔借款将不得不负担每年一百二十五万英镑的额外利息。

因此,这样揭示出来的财政状况是严重的,当人们记起目前的预算仅包括中央政府的实际费用,而且各省政府都不量入为出的时候,情况尤其如此。例如,陆军部的全部费用规定为22,836,758元(或3,000,000英镑),仅供他们目前控制的约七万名军队发饷之用。其余的大约是那个人数的四倍的军队,都依靠他们所驻扎的那些省份维持,而且从盐税和田赋中发放饷银,那些税款按理是应当上交北京的。在向各省多次拍发电报提出紧急要求之后,政府似乎已从它们那里得到勉强的许诺:1月至6月间汇款总额为18,501,846元(合1,900,000英镑)。它们没有说明提供这些款项的来源,但各省的许诺中最大的一笔款项是江苏的5,370,531元(合500,000英镑以上),人们认为该省仅从盐税中每年所得到的款项便超过这笔款额三倍以上。在盐税改组以前,根据借款合同各省所许诺的每年提供的款项如下:

直隶:1,600,000两(合240,000英镑),以田赋、地契税和烟酒税作抵押。

河南:2,400,000两(合360,000英镑),以田赋、漕粮和地契税作抵押。

山东:2,400,000两(合360,000英镑),以田赋、漕粮、厘金、常关税和烟酒税作抵押。

江苏：3,600,000 两(合 540,000 英镑)，以田赋、漕粮和厘金作抵押。

上述四省已经提供了它们所分担的全部款额，但很难期待它们愿意无限制地继续肩负起全国的重担。特别是广东，它是最早主张建立共和国的，不仅对公共款项未做任何贡献，而且不断迫切要求北京方面提供收回它那些已贬值的纸币所需的款项、部队的饷银以及行政费用。

当然，关于这件事情，是有政治上的原因的。通过汇款前往北京，南方各省将只不过加强它们所坚决反对的北方的优势；而对北京来说，汇款给现已被免职的江西、安徽和广东三省都督，将会向他们提供反对中央政府的军费。

预算中仅提到三个盐区；估计它们在今年上半年内提供下列款项：

长芦盐区.....	1,572,542 元
山东盐区.....	180,000 元
奉天盐区.....	115,000 元

总数为 1,867,542 元(合 200,000 英镑)。毫无疑问，将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之后，中央政府才能够有效地争夺南方各省所主张和行使的那个权利，即保留它们所征收的盐税作为地方的费用。

北京入城税的收入估计为 453,380 元。邮政局可望提供 40,620 元。铁路局预算的赤字为 8,830,000 元(合 900,000 英镑)，而拨给巴拿马博览会的款项为 1,000,000 元。

海关六个月的收入，估计为 29,706,701 元(合 3,000,000 英镑)。

由于没有得到去年同期的实际支出和收入的数字，所以不可能对上述款项的可能准确程度进行任何比较或检验。通

过总统发布许多命令责成所有部门实行最严格的紧缩开支，以及通过他们真正急于想要获得对各省财政事务的控制权，表现出政府认识到节约的必要性。目前的善后大借款至多使该国获得一个喘息的余地；除非对盐税的改组能够有效地实现，将不会留给中国任何确实的抵押品供今后国家借款之用。

艾斯敦谨上 1913年7月4日于北京

第39件 艾斯敦先生致格雷爵士电

1913年7月20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福建于今日发表独立声明；广东已于7月18日发表。

英王陛下驻广州总领事报告说：国民党促使广东采取行动；该省所有的地方官员都属于该党。

据说，最近被派往上海制造局驻防的北方军队已经退出该处，因为他们同南方军队达成了一项协议。吴淞炮台也由南方军队驻守。

在江苏和山东的边境以及在九江附近，北方军队都获得了胜利。目前，冲突仅限于这些地区。令人感到怀疑的是，中国舰队是否将继续保持忠诚。

第40件 艾斯敦先生致格雷爵士电

1913年7月21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我派武官前往汉口，他在途中经过江西，冲突正在该处进行。他的报告如下：

“黎元洪将军已通知我：汉阳和武昌由他能够信赖的北方军队牢固地驻守。没有理由担心对外国人将有什么危险，或担心发生类似革命期间发生过的那些动乱。

北方军队敌得过湖南军队，可是，湖南军队已经集中，很

可能将要打仗。九江的湖口炮台正遭到北方军队的攻击。张勋在徐州打了一个胜仗，正在向南推进。如果北方军队在九江获胜，他们将开往南京，同张勋合作。

黎元洪将军似乎认为，北方军队不久将获全胜。”

第41件 艾斯敦先生致格雷爵士电

1913年7月21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今天，上海制造局仍在北方军队手中。已发布命令，对舰队立即发饷。

第42件 阿迪斯先生^①致外交部函

1913年7月22日收到

先生：

我荣幸地附上我们今天收到的驻北京使节们来电的副本，该电授权银行团向各国偿还至1912年12月31日欠付的赔款。

关于偿还英国的那部分赔款，我将很高兴地收到您的指示。

阿迪斯谨上 1913年7月22日

于伦敦银行街31号汇丰银行

第42件的附件 1913年7月21日北京来电的副本

以下给五国银行团：

“财政总长授权您们偿还至1912年12月31日欠付给各国的赔款以及至付款之日按每年四厘增长的利息，各方有此协议；对任何差额的要求，一旦由各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全面的说明书时，将立即同各国政府进行调整，并予以改正”。

^① 英国汇丰银行董事长。

按照财政总长送给我们的说明书，应于1912年12月31日支付的款额如下：

英国	224,835磅零5便士
葡萄牙	409磅14先令9便士
瑞典	279磅零10便士
俄国	576,210磅12先令7便士
国际团体的要求	664磅15先令11便士
日本	148,473磅15先令9便士
法国	7,870,446法郎98分
西班牙	15,025法郎64分
比利时	942,152法郎67分
意大利	2,955,475法郎50分
荷兰	41,617.94盾
德国	8,147,984.09马克
奥地利	426,226.65克郎
美国	723,730.06美元

第43件 艾斯敦致格雷爵士电

1913年7月24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叛军在过去两天内对上海制造局进行攻击；政府驻军在黄浦江上的舰队的协助下已把他们击退。据说，对位于火线之内的外国人财产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

无论在江苏边境或在江西，都没有发生决定性的战斗，但直到目前为止，政府军处于有利地位。总统于21日通知我说：他对最后结果没有任何怀疑。

第44件 艾斯敦先生致格雷爵士电

1913年7月29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关于江西的形势。

今天前往南京的那位武官报告说：第二师的一部份部队暂时在湖北受阻，但他在上一份电报中所说的那个计划（参阅我7月

21日的电报)正在付诸实现。湖口炮台已于7月25日被占领,陆军的伤亡很少,海军没有任何伤亡。叛军向南撤退,士气十分低落。他们所受的损失不详。大古塘^①于7月26日被占领。北方军队正经过鄱阳湖和南康府向南昌方面推进。他们同那些沿铁路前来在终点站德安附近攻击叛军的部队进行合作。叛军最精锐的部队驻在该地区,但北方军队占有优势,肯定会获胜。他听说:仅有五百名军队驻在南昌;北方军队的到达将受到居民的欢迎。

第45件 艾斯敦先生致格雷爵士电

1913年7月30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最近的报告有助于说明南方军队的反抗仍在继续进行。江苏边境上的南方军队正退往浦口;据说,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已参加北方军队。上海制造局继续击退叛军的进攻,不久便将被昨天到达的北方增援部队解围。预料北方增援部队将进攻吴淞炮台。在上海制造局附近发生战斗期间,炮弹使租界内的财产受到损失,上海城内完全陷入混乱状态。现在,租界和闸北都由地方志愿兵以及从各国舰队登岸的海军部队所控制。

湖南已宣布支持南方各省,但现在还没有积极介入斗争。中央政府继续相信,他们能够应付局势。

第46件 艾斯敦先生致格雷爵士函

1913年7月31日收到

阁下:

关于我本月4日的信,我荣幸地随信附上一份报告书。该报告书系根据提交审计处的实际数字,说明中国1913年上半年的预

① 译音。

算经过修改后的估计数。

从记入1月至6月各部贷方的款额中，您将看到：根据统计数字判断，已实现节约三千万元或三百万英镑以上。内阁对工商部和海军部的经费作了最大的削减。

关于税收，它指出(也许是相当乐观地)：今年上半年的入款很可能是中央政府所征收的最低限度的款额；拯救中国财政的办法，取决于中央政府能够把那些一直被视为国家税收的款项征集起来并解入国库，以区别于各省的税收。目前，中央政府的这项集中政策，正在经受考验。

艾斯敦谨上 1913年7月16日于北京

第46件的附件 报纸摘要：预算和节约

我们收到审计处的一封信，对两星期前发表的今年上半年的预算摘要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其中所列数字，系提交众议院的铅印册子中所披露的款项，但他们说明：这本册子是1912年底编制的，而且包括政府打算从大借款中支付的对各项善后工作提供的款项。3月初，由于善后大借款没有订立，达成协议的前景也是不明确的，所以预算中所包含的那些费用估计数，由内阁重新进行考虑，并作了相当大的削减。那时，不可能把它们提交国会，因为国会还没有组成。下表说明：原来预算中所估计的费用，内阁所削减的款额，内阁所批准的估计数，以及审计处所收到的各部每月费用的估计数。

从该表中，人们将会看到，内阁把估计的费用自168,412,520元减至136,870,003元，差额为31,542,516元。审计处从各部收到的每月费用估计数仅为44,480,646元，但这是因为上半年对外债和内债应付的81,999,188元以及供铁路和交通部其他费用的12,511,843元，都没有计算在这些估计数之内。如果把这些款额

部 别	原 来 的 估 计 数	内 阁 所 作 的 削 减	内 阁 批 准 的 估 计 数	审 计 处 所 收 到 的 估 计 数	向 审 计 处 报 告 的 估 计 数 与 内 阁 批 准 的 估 计 数 之 间 的 差 额	
					增 加	减 少
外交部	2,033,143.00元	2,033,143.00元	2,081,075.103元	47,932,103元
内务部	2,135,701.00元	2,135,701.00元	2,151,168,325元	15,467,325元
财政部	90,530,104.00元	67,353,200元	90,562,750.10元	8,563,562,460元	81,999,186,400元 ^①
教育部	6,287,651.00元	2,304,842,000元	3,982,809.00元	2,413,652,832元	1,569,156,168元
陆军部	22,836,758.00元	3,366,287,405元	19,470,470.59元	20,607,535,425元	1,137,064,830元
海军部	9,954,204.00元	7,403,290,000元	2,550,914.00元	1,986,482,498元	564,431,502元
司法部	1,102,035.00元	426,001,000元	676,034.00元	971,724,000元	295,690,000元
农林部	2,914,553.00元	2,147,736,000元	766,817.00元	444,086,544元	322,730,915元
工商部	13,018,724.50元	11,550,931,000元	1,467,793.50元	4,549,630,866元	3,081,837,366元 ^②
交通部	17,499,647.00元	4,276,076,000元	13,223,571.00元	711,727,985元	12,511,343,015元 ^③
共 计	168,412,540.50元	31,542,516,605元	136,870,003.89元	44,480,646,038元	4,577,991,624元	96,967,349,481元

① 这笔款额代表政府必须于1913年上半年内偿付的外债(76,759,842元)和内债(2,440,608.81元)的款项。

② 这笔款额主要是打算供修建铁路之用的,已被拒绝。

③ 提交审计处的数字仅供该部的实际费用。

加入 44,480,646 元，总数将接近内阁所批准的款数。

在审计处收到和审核今年上半年的全部帐目之前，不可能了解各部的确切费用，但下列款额已记入 1 月至 6 月间各部的贷方：

外交部	2,050,000 元
内务部	2,150,000 元
财政部	89,000,000 元
教育部	3,500,000 元
陆军部	20,000,000 元
海军部	2,200,000 元
司法部	800,000 元
农林部	600,000 元
工商部	1,500,000 元
交通部	13,000,000 元
共计	134,800,000 元

因此，同提交国会的估计费用 168,412,520 元的款数相比较，已节省 30,000,000 元以上，没有超过内阁实际批准的费用。

关于中央政府的实际收入，现在还没有得到报告书。人们将记得，预算估计上半年的全部税收仅为 51,336,880 元。然而，我们可以说：中华民国二年上半年的收入总额是中国政府将征收的最低限度的税款。原因是很明显的。被革命彻底破坏的行政当局迄今还没有恢复它的正常状况；政府没有得到它从前能够依赖的各省的定期汇款。现在，各省的财政情况正受到严厉的检查；我们只能够重述人们最近着重表示的那个意见，即拯救中国财政的办法，取决于政府能够把那些一直被视为国家税收的款项征集起来并解入国库，以区别于各省的税收。

第 47 件 艾斯敦先生致格雷爵士电

1913 年 8 月 3 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关于中国南方的叛乱：一般形势。

中央政府在长江流域继续普遍获得胜利。以南京为基地的叛军正在沿津浦铁路向南撤退；有两师部队很可能开小差，加入北方军队。在江西的北方军队正把叛军驱往南昌，人们预料叛军不会进行认真的抵抗。牯岭不再处于军事行动范围之内。叛军对上海制造局的进攻在过去四天内已经停止。吴淞炮台仍在南方军队的控制之下，但人们预料它不久将被北方军队占领。湖南和湖北部分地区的立场是令人怀疑的，但总统相信，他在一个月之内将完全控制长江流域。

广西省的军队仍然是忠心耿耿的；他们已沿西江而下，向前推进，在广州上游四十英里的某个地方与叛军遭遇。

第48件 艾斯敦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3年8月5日收到

阁下：

以袁世凯总统为一方和以黄兴集团为另一方之间的斗争，现已变成成为长江流域的一次公开的叛乱。

7月的第一个星期中，已被免职的江西都督李烈钧返回湖口，接管了控制鄱阳湖入口的炮台，举起了反叛的旗帜。自李烈钧都督被免职以来，湖北都督、副总统黎元洪便受委托兼任江西都督的职务。他命令前几个星期集中在湖北和江苏边境的北方军队五千人向湖口阵地推进。北方军队的进展，遭到了那些与李烈钧共命运的江西部队的抵抗，在九江与湖口之间的德安^①发生了战斗。这次战斗自7月12日持续到13日，似乎不是决定性的。自上述那一天以来，由于欧阳武背叛北方的事业，使江西的叛军人数有了很大的增加，欧阳武是在李烈钧被免职时受任为护理江西都督的

^① 德安位于九江以南，不在九江与湖口之间。此处原文疑有错误。

军官。7月18日，他辞去中央政府任命的该项职务，宣布他自己为江西都督。他说：他已被该省议会推举担任该项职务。因此，江西的独立已成为一项既成事实，该省的全部军队似乎很可能把他们自己列入反叛阵营。

根据昨天夜间得到的而且我于7月21日电报中通知您的那个消息，黎元洪副总统正赶紧派兵沿江而下，增援上面所说的那五千名士兵。他相信，这支联合部队将不费什么力气，便可攻下湖口阵地。

当前都督李烈钧在湖口如此展开反抗运动的时候，黄兴已前往南京。驻该地的江苏军队全部倒向他那一边。都督程德全因为表示他本人不同情反叛，已被监禁起来；人们用他的名义和关防于7月14日发表声明，宣布南京不受中央政府管辖。驻扎在山东边境附近津浦铁路线上的徐州府的江苏军队，也宣布支持南京政府，而驻镇江和扬州的部队目前仍犹豫不决。

15日，七千名南京军队乘火车北上，进攻驻扎在山东边境的韩庄的二千名忠于北方的部队。这两支部队在利国驿遭遇，于7月16日在该地打了一仗。据说，南方军队已被逐回，并有相当多的伤亡。在这场战斗中，享有善变的名声、率领一支一万人的军队驻扎在兖州府的张勋将军，派遣他的军队二千人帮助北方军队，从而摊出了他手中的牌。自7月16日以来，显然没有再发生战事，双方正忙于派遣援军前往战斗地点。

7月18日，驻扬州府^①和驻镇江的部队明确地表示和叛军共命运。19日，有一千二百名军队携带六挺机关枪离开镇江，乘火车前往上海，上海将成为叛军采取军事行动的第三个战场。他们的目标似乎是上海制造局，该处由郑提督^②和大约一千三百名北方军

① 原文误作兖州府。

② 疑为郑汝成，当时郑的正式官衔为“上海镇守使”。

队驻守。此外，在那附近地方还停泊了好几艘中国军舰。现在，已经采取措施保证向水兵们发放欠付的饷银，所以有理由相信这些军舰将参加对上海制造局的防守。吴淞炮台已悬挂叛军的旗帜。

虽然除上述地区外我没有得到中国其他地方发生的任何实际军事行动的消息，但英王陛下领事官员们报告广东、福建、浙江等省已发表独立的声明。直到目前为止，福建和浙江两省没有表示为支持反抗事业而愿意作战的迹象。可是，今天传闻广东正派兵北上，帮助攻击中央政府。

没有迹象表明南方的反抗具有任何排外的性质；我迄今也没有得到任何消息说明对英国人的生命或财产有任何企图。

我荣幸地随信附上外交部送交所有各国公使关于说明中央政府对目前危机所抱态度的一份备忘录的译文。

艾斯敦谨上 1913年7月21日于北京

第49件 艾斯敦先生致格雷爵士函

1913年8月9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随信附上巡视长江军事形势的英王陛下公使馆武官写给我的一份报告的副本。

艾斯敦谨上 1913年7月25日于北京

第49件的附件 罗伯逊少校关于长江军事形势的报告

英王陛下驻汉口总领事务谨顺爵士盛情为我安排访问武昌的黎元洪将军，并于昨天陪我一起前往那里。由于目前长江流域很不稳定的状况类似1911年的革命动乱，在那次动乱中曾有必要使用驻汉口的各国部队，所以重要的是获得一些资料，据以提出在

军事方面关于这些情况是否有可能重演的意见。因此，我访问黎元洪将军的目的是要得到这些方面的情报：在驻武昌、汉口和汉阳一带的湖北士兵中间是否有可能发生骚乱；目前驻在这个地区的北方士兵是否能够镇压任何这种骚乱；是否担心来自湖南的危险；如果有此担心，黎元洪将军指挥下的部队是否能够对付湖南军队对该省的入侵。和这些问题有关的，是北方军队早日获得对江西部队的胜利的前景，因为获胜后可以使北方军队能够应付湖北的骚乱或帮助平息南京的反叛。

黎元洪将军对所有这些问题的态度是极为坦率的。他说：在驻武昌、汉口和汉阳的湖北部队中间没有发生骚乱的危险，因为已把这些部队分布在湖北各个地区，只有少数人留在汉阳等地。武汉三镇由可靠的部队牢固地驻守，他们的力量足以应付任何地方骚乱。这些部队的分布情况如下：

北方军队第三师的下列单位刚从北京到达：

在武昌：第十二步兵团，第三骑兵团的一个中队，第三炮兵团的一个营，“驻湖北的江南师”的第一步兵团。

在汉阳：“驻湖北的江南师”的第三步兵团，湖北部队的一个团。

在汉口：（十公里处）设有一个兵站，供转运部队前往江西。通常驻有赴该地途中的北方军队。根据我自己的观察，该兵站能够容纳部队二千人左右。除这些部队之外，黎元洪将军说，满洲第二混成旅驻守京汉铁路。

据黎元洪将军说，“驻湖北的江南师”是十分可靠的。该师仅由三个步兵团组成，其中一个团大都是广西人，另一个团是革命期间在江苏招募的山东人，他们构成为前江苏地方部队的一部分。剩下的一个团包含安徽和北方其他各省人，也有一些云南人。该师由黎天才将军指挥，他是云南人，以前曾在广西担任军事指挥

官。在革命期间，他被任命统率这些混合部队，获得了“驻湖北的江南师”的称号。

关于湖南的问题，黎元洪将军说：人们也许预料到来自该地区的麻烦，但北方军队毫无疑问地能够对付任何可能进入湖北的湖南军队。在他亲身感受了湖南军队在革命期间撤出汉阳时的所作所为之后，他对他们的评价很低。

我迄今未能访问湖南；因此，关于对湖南军队的评价问题，我不能够提供第一手的意见。不过，他们始终被以前几位武官说成是好的军队，并且被称誉为战士。长江以南各省的军队中有很大的一个比数是从湖南招募的；我在各个时候见到的那些个别的湖南士兵看来无疑是具有很好的战斗素质。在革命期间，湖南人提供了大批新兵；湖南至少有一支组织得很好的队伍，即驻南京的第八师第三十一团。据说该师已经反叛，它是以前革命军在长江流域的所有部队中最好的一支军队。因此，问题在于黎元洪将军所持的乐观态度，即关于使用目前驻在武昌附近的部队，肯定可以击溃湖南人对湖北的进攻的意见，究竟有多少是合理的。长沙弹药库的爆炸，无疑地将妨碍湖南人的行动。黎元洪将军谈到了这个事件；虽然他没有这么说，但该事件很可能是预先安排的。然而，如果驻武昌附近部队的力量不充足，其他地区的情况可能容许调遣更多的北方援军来驱逐湖南人，不是从北方调遣，便是当江西军队被击退后从江西调遣。

黎元洪将军完全相信北方军队有能力打败江西军队。他说：第二师和第六师为了进攻湖口炮台起见，现正集中在九江附近；获得胜利是没有丝毫疑问的。第六师（很可能有一万人左右）现在几乎都已在九江附近集结；第二师现正用驳船或汽艇运往九江，所以预料不久便可能发动进攻。黎元洪将军说，北方军队在迄今所发生的战斗中都获得了胜利，但他又说，仅有三营军队打了仗。

黎元洪将军希望实现的计划，首先是占领湖口所有的炮台；接着在这些炮台和九江设防，以防止江西军队的重新占领，北方军队在留下一支警卫部队驻守江西后，将前往南京，同张勋合作。黎元洪将军说：张勋已在徐州府附近获得胜利，正在向南京方面推进。

关于北方军队对南方各省可能调来反对他们的任何部队早日获得全面胜利一事，黎元洪将军是极为乐观的。他很轻视象四川这样遥远的省份反叛可能产生的影响，声称：那些省份的干预将为时太晚，没有任何用处。

他没有提及海军，但是，除非海军仍保持忠诚，而且在袁世凯占领长江各炮台之前，使用第二师和第六师对付南京而且在以后必要时对付湖南是行不通的，这当然是很明显的事情。如果海军是忠诚的，并且占领了长江各炮台，那么，占有内线将使北方军队在对付分布如此广阔的长江各省军队方面获得巨大的好处。

驻北京武官 罗伯逊谨上 1913年7月21日于汉口

第50件 艾斯敦先生致格雷爵士电

1913年8月9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总的形势没有发生变化。就长江流域下游而言，叛军的力量显然已被削弱。不过，北方军队在江苏和江西的进展极为缓慢；叛军在南京和南昌附近有很大的势力，没有遭到决定性的失败。人们预料他们不久便会投降，投降时将用借款得到的钱偿清他们的饷银。

广州的形势是很不明朗的。广西部队驻在西江沿岸的三水，据说在等待弹药。广州城内的叛军相互之间发生了战斗，但当忠于北方的部队进击时，他们将很可能联合起来。从香港调来的部队保护着各国租界。

湖南军队为了叛军的利益，已侵入湖北。驻重庆的一个师反

叛后，已宣布四川东部独立。吴淞炮台正遭到北方军队的进攻；上海制造局已经解围。外交团应中国政府的请求，允许北方军队重新占领闸北。

第51件 艾斯敦先生致格雷爵士函

1913年8月11日收到

阁下：

我在本月21日的信中，曾荣幸地报告：由黄兴和已被免职的江西、安徽、广东三省都督领导的反对临时大总统的运动已经开始。

自从上述那一天以来，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促使我改变我的看法：运动的发生主要是由于上述那些人对袁世凯具有个人仇恨，以及国民党希望分享那些已把他们排斥在外的国家更高级和更有利可图的职位。除江西和江苏的军队之外，运动似乎仍然没有得到中国任何重要人物的支持。群众的态度依旧是冷淡的；全国大多数工人很可能还不知道对中央政府正在进行攻击。的确，福建、浙江、广东等省已经宣布独立。然而，直到目前为止，它们还没有在战场上对叛军提供武装帮助。另一方面，过去几周内并非没有迹象表明，国内大部分有文化的人士准备支持（至少在口头上）一个集中的强有力的政府的政策。许多省份的高级官员已写信给总统，支持既存的政权，而全国的商会和行会在对推翻临时大总统的企图表示厌恶方面也没有落后。甚至在广东，商界人士、少数官员和一部分军队竟敢于表示上述意思；我冒昧地认为，这样说并不过份：全国强烈地赞成恢复安定的统治。相信这种统治只有在袁世凯的指导下才可能实现。

关于军事形势，过去几周内事情的趋向是有利于北方军队的。

江西的叛军已被赶出湖口炮台，向省城南昌撤退。自暴乱开始以来，已派遣六千名援军及十二门大炮，增援北方军队。

邻近的湖南省已宣布独立，但它显然采取中立态度，派遣三千名军队前往岳州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北方军队自汉口可能发动的进犯。湖南似乎不大可能积极支持任何一方，因为长沙军火库以及它所储存的武器弹药已于最近被火焚毁。

关于江苏军事情况的一些报告是互相抵触的，但据我了解，我在7月21日的信中说过的，北方军队最初获得了胜利，但接着叛军的兵力有了很大的增加，使他们能够重新占领利国驿及其附近的一些高地。可是，7月22日，张勋将军似乎已获得有力的增援，再度赶走了叛军；第二天，北方军队占领了徐州府，南方军队退往蚌埠——津浦铁路跨过淮河的地方。叛军现仍盘踞在该地，不久便将遭到沿铁路而下的张勋将军的部队以及自西面向该地集结的另一支北方军队的进攻。

当镇江的军队于7月18日明确表示与叛军共命运的时候，有理由认为，指挥扬州驻军的将领已重新考虑他的立场，现已倾向于支持北方。英王陛下驻镇江领事报告说，扬州部队即将发动对该地的进攻；他表示担心，仍留驻该地的那一小支南方军队将被扬州部队赶入英国租界内避难。他已与海军当局商定采取措施，以防止难民进入租界。

叛军所作的最认真的努力，集中于试图占领上海制造局，该局由郑提督和大约一千五百名北方军队防守。一批中国军舰同守军合作，他们顺利地击退了叛军于7月23日、24日、25日和26日的夜间发动的攻击。据说，湖南和浙江的军队最近增援了那些攻击者，而载有三千名北方军队并由五艘军舰护送的两只运输船定于今天抵达上海。

我已收到的英王陛下总领事的一些报告说明，在该作战地区内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敌对双方的部队所发的炮弹，落入了公共租界和上海城内，使得一些人死亡，并对财产造成很大的损失。

由于租界内的欧洲侨民中间感到紧张不安以及上海城内的中国居民中间存在着某些近似恐慌的情况，他们认为，在对制造局的敌对行动开始时，必须出动志愿兵。鉴于南方部队有可能遭到决定性的失败，接着发生溃散，以及难民大量涌入租界，所以他们认为加强居民志愿兵是可取的；从停泊在黄浦江上的各国军舰调来的队伍已为此目的登岸。虽然在叛军发动对上海制造局的各次攻击期间已造成伤亡和损失，但没有人向我报告关于英国人的伤亡或英国财产的损失。我很高兴地能够报告：在上星期发生冲突的其他地区，也同样没有伤亡。仅影响英国财产的一个事件已引起我的注意。本月26日，英国轮船“古图”号沿长江下驶的时候，在镇江对岸遭到中国军队的射击。该轮船和英王陛下军舰“山鹬”号一起驶回肇事地点，要求他们说明情况，他们表示十分抱歉。“古图”号轮船没有遭到损失，它的水手也没有伤亡。

各国在牯岭居住地的境况，继续引起英王陛下公使馆的注意。至少有四个国家的军舰仍在同上周开始时派往该地的一队信号兵保持联系，完全足以应付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

在结尾时，我应补充说：革命运动继续沿着它的方向进行，没有表现出存在排外情绪的任何迹象。

艾斯敦谨上 1913年7月28日于北京

第52件 艾斯敦先生致格雷爵士电

1913年8月13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吴淞炮台已于今晨被占领。

第53件 殖民部致外交部函

1913年8月15日收到

先生：

我奉殖民大臣的指示，送上香港总督关于中国形势的一份电报的副本。

安得生谨上 1913年8月14日于唐宁街

第53件的附件 总督梅轩利爵士致哈考特先生电

1913年8月8日收到^①

广州的形势仍不稳定。

指挥官已辞去都督的职务，由另一名敌视袁世凯和龙济光将军的军官继任。龙济光没有提升。

军队中互相敌对的各派之间发生了一些冲突；有爆发动乱的某种危险。已派遣两百名印度旁遮普士兵前往沙面，作为增援部队。

第54件 艾斯敦先生致格雷爵士电

1913年8月15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关于一般形势。

现在，可以认为叛乱实际上正在瓦解。相当多的北方军队现正从长江对岸逼近南京，只有很少的叛军仍继续留驻城内，他们不大可能进行认真的抵抗。上海至吴淞地区的叛军已完全被扫清。镇江发生了战斗，但忠于北方的扬州部队已占领镇江，南方部队显然已经溃散。湖南正式放弃了独立；无论是在湘鄂边境上或在湖北省内，都显然没有发生战斗。驻重庆部队所宣布的四川东部的独立，也已经取消。

龙济光将军率领广西部队进驻广州，控制着局势。

① 此处系殖民部收到的日期，原件未注明发报日期和地点。

第55件 艾斯敦先生致格雷爵士函

1913年8月18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报告：外交部最近已向外交团提出关于中国南部动乱的文件，中国政府致力于保护它自己，防止外国臣民与叛军首领共同策划。

外交部7月24日的照会要求，把叛军首领黄兴和陈其美逐出上海公共租界，使租界不致被用来作为暴乱的基地。外交团在复照中通知外交部说：领事团已经按照那个意思采取步骤。外交部送给我一份同文照会；我已向那些在设有英国租界的各口岸执行职务的领事们发出指示，防止上述首领隐藏在我们控制之下的各个区域内。

外交部抗议说：九江的叛党为了煽动暴乱，正在利用供各国商人拍发的密码电报。我在回答该抗议时，指示英王陛下领事，要他在英国驻该口岸商人拍发的所有密码电报上签名并加盖公章，作为一项临时措施。

7月25日，北京宣布了戒严令。外交部要求：（一）不允许暴乱分子利用使馆区作为避难所；（二）除各国使馆和银行的函电之外，自使馆区发出的函电应接受中国人的正式检查；（三）应使那些居住在使馆区外的各国臣民负有遵守根据戒严令发布的各项命令的义务。

在7月28日的外交团会议上，各国使节决定：第一款实际上已由辛丑条约作了规定，除受外国人雇佣者外，任何中国人都无权在使馆区内居住；第二款不能够被接受，但各商行的那些密码电报在动乱期间应由各该国使馆盖上公章，免受检查；在中国政府通知各该项命令的性质以前，不能够采取执行第三款的措施。

外交部7月25日的照会，提出了一个人们较普遍关心的问题。它在该照会中谋求外交团赞同所草拟的某些章程，以防止外国人参与目前的叛乱。

中国政府建议：（一）根据领事签署的许可证（如果该附近地区驻有领事的话），外国人的房屋和船舶应受搜查；（二）被发现的任何战争物资，应受到军事法庭的审理；（三）在受戒严令管辖的区域内帮助叛党的外国人，应被逮捕和惩罚；如果外国人系在作战区域内被捕获，应由中国人独自进行审理和惩罚。

外交团对该问题进行仔细考虑之后，不能够接受那些要求，因为他们认为那些要求危害了条约所保证的外国人的权利。首席公使在给外交部的复照中表示意见说：对于外国人被控告与叛党共谋的任何案件，应按照条约规定处理。

艾斯敦谨上 1913年8月3日于北京

第56件 海军部致外交部函

1913年8月20日收到

先生：

我奉海军部各长官之命，随信附上所收到的驻华总司令官上月25日关于中国情况的一封信的摘要，供外交大臣参考。

格林谨上 1913年8月18日于海军部

第56件的附件 舰队副司令杰拉姆致 海军部函（摘要）

先生：

一、我荣幸地报告：“敏捷”号军舰已于7月22日抵达南京；我把我的旗舰从“弗洛拉”号迁到了“敏捷”号。

二、虽然我现在有一条无线电路自汉口通往上海，但发现拍

发无线电报的工作是很困难的。中国沿江各电报局仍接受电报，但他们能否使这些电报畅通是很成问题的，无论如何可以预料到要拖延若干天。因此，一切电报都不得不通过无线电收发；除了收发大量的海军电报之外，各口岸的领事官员都希望军舰发送他们的电报。

由于有五个国家(英、美、德、法、日)的军舰这样互相争用无线电报，结果出现了混乱情况。我已同其他国家议定：每昼夜拨出十二个小时，给每个国家独自使用两小时，其余两小时供一般使用。

三、目前三个作战中心地区的情况如下：

南 京

互相敌对的军队驻在津浦铁路线上的蚌埠，它在浦口以北大约一百英里的地方。北方军队似乎很可能将把南方军队逐回浦口；由于南方军队据有铁路线，他们将能够毫不费力地实行撤退，也许在撤退时破坏他们后面的铁路。

南京的危险在于：被击溃的、士气低落的南方部队可能抵达南京时，未得到饷银，没有满足欲望，因而准备着手抢劫。除此之外，没有理由预先防范南京城内的动乱。

南方的伤兵正在大批南下；对他们仅提供很差的治疗。

我向中国人建议由我们的医务官员提供帮助；他们已接受这些帮助，但迄今还没有利用。中国人说：当他们需要这些帮助时，将送信前来。

上 海

南方军队于夜间发动对上海附近的制造局的攻击，迄今均已完全失败。停泊在该处的中国军舰同北方军队一起防守制造局。

上海的各国志愿兵团已经出动，以便在需要时防守租界。英国和其他国家泊于该处的军舰，准备派武装部队登岸。

我已命令“孟茅斯”号和“汉普郡”号军舰驶往吴淞(这是它们

能够开往离上海最近的地方)：命令“韦兰”号和“尤斯克”号径驶上海。

“新城堡”号、“里布尔”号和“森林云雀”号都已停泊在上海，所以英国在该地的海军部队是很强大的。

九 江

北方军队正获得普遍的胜利，似乎在追击南方军队时仅遇到轻微的抵抗。在过去四十八小时内，没有关于发生任何变化的报道。

四、我从香港方面听说，广州担心发生动乱。“水獭”号和“荣誉”号军舰已奉命驶往该地，“荣誉”号载有二十名海军陆战队士兵。

杰拉姆谨上 1913年7月25日

于南京、英王陛下军舰“敏捷”号

第57件 艾斯敦先生致格雷爵士电

1913年8月23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成都出现了危急的形势，因为被派去对抗重庆叛军的第一师，已与叛军携手合作，祸福与共。据说，他们正向成都进发。他们用死来恐吓驻雅州的尹昌衡将军，除非他宣布反对政府；人们预料他将随时这样做。其他城市也已发生叛乱。

自云南府派来的第一师部队，原来是打算供平定湖南之用的，现已奉命改调四川。直到目前为止，外国人都平安无恙。

第58件 格林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3年9月6日发自东京，同日收到

据说：有些日本人已在南京被杀；日本人的房屋遭到了中国军队的抢劫。此事在报纸上引起一些激动情绪。日本政府已指示

该国驻南京领事提出一份报告，等待收到该报告后，才能作出决定。他们很沉着地处理这个问题。

第59件 格林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3年9月7日发自东京，同日收到

关于南京事件。

外务省政治处长已被暗杀，大概是作为对外务省所采取的态度抗议。此事使形势复杂化了。除非中国方面答应迅速给予赔偿，情况的发展也许很严重，这不是不可能的。

第60件 艾斯敦先生致格雷爵士函

1913年9月8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报告：上海国际银行家委员会已给外交团首席公使送来他们的至6月30日为止的季度报告，说明那段时间内海关所收税款的拨付情况。

自4月1日至6月30日所征收的全部税款达10,500,118.74两，如果与前两个月的平均数3,143,938.76两相比较，每月平均为3,500,039.58两。偿付按月摊还的借款本息达8,674,664.84两，至6月30日应付的所有分期摊还的款项都已偿清。存在三家保管款项银行内的余款于6月30日为8,197,591.11两。

上季度内没有偿付赔款；税务司在各有关银行“中国赔款帐目”内的贷方所有款项总额为1,104,059.94两。

艾斯敦谨上 1913年8月23日于北京

第61件 格林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3年9月9日发自东京，同日收到

关于南京事件。

由于日本领事患病，他现在还没有向他的政府提出报告；人们预料将拖延一些时候。星期日，在外务省前面发生了一次示威，那主要是学生们干的。没有发生暴力行动。

第62件 格林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3年9月11日发自东京，同日收到

关于南京事件。

今天，有一两家认真负责的报纸发表了很强硬的文章，主张：如果中国方面不给予充分赔偿，日本便立即采取行动。昨天，在一家剧院内举行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没有发生骚乱，但人们发表了性质激烈的演说。

第63件 格林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3年9月14日发自东京，同日收到

关于南京事件。

中国政府已同意接受日本政府提出的几乎所有的要求。人们希望，有一两个突出问题不久便可以得到满意的处理。

上述情况是日本方面正式通知我的。

第64件 格林爵士致格雷爵士电

1913年9月16日发自东京，次日收到

关于南京事件。

外相通知我：袁世凯已保证将给予赔偿，但由于公众舆论十分激动，所以日本政府不得不指示日本驻北京公使逼迫中国迅速采取行动。明天将举行三个声讨大会。外相又说：今天报纸上所报道的又有船舰开走一事，是早些时候决定的，它并非对中国的

示威。

第65件 格林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3年9月22日收到

阁下：

关于最近张勋将军统率下的中国军队进入南京城时，有些日本人被杀以及日本人的房屋遭到抢劫的电讯，在报纸上引起了很大的激动情绪。例如，据电讯报道：日本人的商店和医院遭到抢劫，虽然它们悬挂着日本国旗和红十字会的旗帜；一群日本人在前往该国领事馆时受到袭击，其中有三人被杀死；有许多日本人失踪；日本国旗受到侮辱；到处存在着抢劫和混乱状态。昨天，我立即询问外务省，上述报道中有哪些是属实的。外务省次官在答复中告诉我：报纸上的消息有许多夸大之处。松井先生说：就外务省所知，事实是有三名日本人遇害，日本人在南京的所有房屋遭到了抢劫。当局对部队失去了控制，他们对国旗及其他事情愚昧无知；那里存在着混乱状态。不过，所有的日本臣民都已在该国领事馆避难；冯国璋将军的部队正在恢复秩序，他对那些属于张勋将军所率部队的抢劫者加以惩罚。

松井先生说：日本政府已指示日本驻南京领事，对于所发生的事情提出一份详细的报告；等待收到该报告后，他们将决定所采取的行动方针。在此期间，已有六十名海军陆战队士兵登岸保护领事馆，他希望这将是够用的，但必要时可以加派海军陆战队士兵登岸。松井先生又说：他知道，除日本人的房屋之外，其他各国人的房屋也遭到抢劫。总之，他似乎很镇静地处理这件事情，不止一次地着重说明：报纸上的激动情绪被人们夸大了。

格林谨上 1913年9月6日于日本中禅寺

第66件 格雷爵士致艾斯敦先生函

先生：

我必须通知您：我收到陆军委员会的一封信，询问：目前华北驻军的人数（两营英国步兵和一营印度步兵）是否可以减少；该处正常的驻军（一营英国步兵和一营印度步兵）是否可能自1914年5月31日起至少再留驻两年的时间。

在答复陆军委员会的来信之前，我将很高兴地得到您对这些问题的意见。

由于陆军委员会希望早日收到对该信的答复，所以我请您用电报把您的意见通知我。

格雷谨上 1913年9月24日于外交部

第67件 格林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3年9月27日收到

阁下：

我在本月6日的信中曾荣幸地促请您注意的南京事件，突然呈现出较严重的局面，因为外务省政治处长阿部先生于星期五夜间遭到暗杀。阿部先生是一位很受人们尊敬的官员，曾一度担任日本驻伦敦大使馆的秘书，似乎是在下午七时回家走进自己的大门时，遭到两名年轻的身穿学生服装的暴徒的袭击。其中一名暴徒抓住他并不许他活动，而另一名暴徒两次刺他的腹股沟部，接着他们两人都逃跑了。阿部先生力图追赶他们，但不得不放弃追赶，摇摇晃晃地走回家去，第二天早晨在家里因伤致死。人们普遍认为，阿部先生被害的原因，是因为他对《东京日日新闻》发表了关于南京事件的谈话，那次谈话已发表在各晨报上。据报道，阿部先生在谈话中不赞成因南京事件而派遣一位军事特使前往中

国或占领该国的任何地方。人们以为，他的温和态度必定触怒了一些性情急躁的人，他们对官方的态度感到不满，宁愿看到用较快的方法处理南京日本人的被杀以及对日本国旗的污辱。另外，日本报纸已公开进行对南京事件以及早些时候在汉口附近对日本军官川崎大尉和西村中尉所犯下的两件暴行的宣传鼓动。这两件暴行激起了军方人士的愤怒情绪，这不是不自然的事情，结果人们听到了好战的言论。不容易确切查明当局已经采取的步骤，因为报纸被禁止讨论该事件，有一两家人胆的报道该事件的报纸被禁止发行。官方说，已向北京政府提出赔偿要求。由于没有获悉这些要求的性质，所以不可能预料结果如何，但中国政府如果想要避免不愉快的发展，应迅速给予充分的赔偿，这似乎是最可取的。

格林谨上 1913年9月10日于日本中禅寺

第68件 艾斯敦先生致格雷爵士函

1913年9月27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随信附上英王陛下驻南京领事的一封信的副本，该信说明北方军队入城后该城所发生的情况。

张勋将军以前曾经宣布：他进入南京城之后，将不允许任何抢劫或暴行发生。可是，这位将军故意在城外停留了三天，在这个期间纵容他的部队不受约束地为所欲为。9月4日在南京住下来之后，张勋照例行事，张贴严厉的命令，将当场捕获的几名抢劫犯斩首，但到那时已经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可供抢劫。

张勋的上兵在洗劫南京时杀死三名日本平民及毁坏日本人财产一事，已引起相当大的激动情绪。

艾斯敦谨上 1913年9月12日于北京

第68件的附件 索尔慈领事致艾斯敦先生函

先生：

我荣幸地报告：政府军队于9月1日占领南京城之后的三天内，南京的情况确实是令人吃惊的，它完全符合中国中世纪战争的惯例。烧杀抢掠和奸污妇女是获胜的军队不受限制的娱乐。今天早晨，张勋将军相当威风地从东门(太平门)进城，前往位于城东南中心的纳牌楼^①的一座衙门；他就住在该处。两三小时后，冯国璋将军从北门(仪凤门)进城，住在城北紧靠本领事馆的海军学堂。然而，这个住处几乎是不合适的，他打算迁往城内约二英里远的外交司的房子。

纵容军队抢劫三天显然是事先安排的。直到昨天夜间为止，城内陷入一片混乱。昨夜很晚的时候，由于预料到冯国璋将军将于今日入城，于是用他的名义贴出了告示，命令对那些张贴告示后发现的抢劫、奸淫或制造骚乱的人处以极刑。执行命令的能力已于今天早晨充分地表现出来；那些迟迟未去的抢劫者被押往海军学堂，途中当即处决，然后把他们的首级悬挂在大路两旁小胡同的树上。

那三天为全面彻底地抢劫全城提供了充足的时间。几乎所有的东西都遭到了抢劫。那些提出抗议或试图保护他们的东西的人，被残酷地枪杀。因惧怕士兵而逃跑的人们，甚至是妇女和儿童，如果他们被叫喊的时候没有停下来，便在街上遭到枪毙。

现在，南京城一片凄凉景象：居民们生活在破瓦颓垣之中，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已遭到破产。

叛党首领们已经逃走；已投降的士兵都得到了全部饷银并获

^① 译音。

得释放。叛乱的全部后果落到了那些不幸的居民和商人身上，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强烈反对叛乱及其所有的活动。

正如我已在电报中报告的那样，有些日本平民于本月2日在城内混乱期间被杀。日本舰队司令于今天抵达本口岸，已前往日本领事馆。我知道，他将在那里住两三天。

叛军已于本月1日夜间全部被赶出这座南方的城市。那个地区的战斗在整个夜间是十分激烈的。叛军的最后一个据点是南门外的雨花台炮台。他们得到通知说：除非在本月2日中午撤离炮台，该炮台便将受到攻击。他们撤出了炮台。据说，所有逃入这个地区和安徽省的叛军都已进入芜湖和南京以南的腹地。今天，政府军队中的一名军官告诉我，估计他们的人数大约为一万人。

今天下午，有四名冯国璋将军的参谋人员前来拜访我，带来这位将军的名片，询问是否有任何英国臣民遭到损失或伤亡，并对伴随围城而出现的混乱状态所造成的不方便表示这位将军的正式的歉意。

何海鸣和其他首领们似乎已在关键时刻躲藏起来。

窦尔慈谨上 1913年9月4日于南京

第69件 格林爵士致格雷爵士函

1913年9月29日收到

阁下：

上星期内，关于南京事件的普遍激动情绪没有表现出减退的迹象；在户外和公共建筑物内，举行了多次声讨大会。星期日，一个大约有两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在政府机关和国会两院附近的日比谷公园内举行，会上发表了激烈的演说，但没有发生扰乱治安的行为。举行这次会议的日期，是朴茨茅斯条约^①的周年

^① 该条约是日俄两国在1904—1905年的战争后订立的条约。

纪念日，那个日子通常有群众集合示威，反对那个被认为是对日本帝国不体面的和约。在八年前最初的那个日子，也曾经在日比谷公园举行过一次群众大会，由于警察试图冲散会议，结果出现了很严重的骚乱景象，最后必须宣布戒严令。在今年这个时候，当局曾非常明智地指示警察撤离公园，所以没有发生扰乱治安的行为。会议结束后，群众奔向外务省，试图冲进那些把外务省和大街隔离开来的坚固的铁门。然而，那些铁门的周围钉上了结实的链条；群众的企图遭到了失败。后来，有些人翻过铁门，要求外相接见，但他们被告知，外务省内空无一人。接着，群众前往牧野男爵的私人住宅，企图会见男爵阁下。他们在这里所得到的答复，又是外相不在家。他们聚集在外相住宅的周围，直到半夜一两点钟，逐渐感到疲倦，才纷纷返回家去。他们同样访问了首相的住宅。星期三，在明治座剧院举行了一次群众大会，有三千人出席，许多人被谢绝入内。在这两次会议以及其他较次要的会议上，有些国会议员和政治家多少是在公开的场所发表了演说，但没有任何特别显要的人物讲话。整个调子是对他们所认为的外务省的软弱政策表示不满，要求动员和派遣军队占领中国的战略据点。政府的态度始终是镇静的，他们为缓和公众的激动情绪和防止群众的愤怒超出控制而作了一切努力。甚至是那些保持自由行动的重要人物，如犬养先生、尾崎先生以及其他的人，都宣传要有耐心，并指出：必须让中国政府有时间对形势作出令人满意的处理。当然，反对党报纸是很激动的；甚至那些日文报纸，如《时事新报》和《每日新闻》，也开始表现出不耐烦的迹象，但那些用英文出版的日报仍然做出了很好的榜样。有人说，反对党报纸进行宣传鼓动，是因为他们想把政府赶下台。

昨天，听说有一位十八岁的青年人自杀，在他的口袋中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明他谋害了阿部先生。我不知道此项消息是否

属实，但它所作的说明是很详尽的。后来，另一位青年人在外务省的一间接待室中试图自杀，作为对外务省的抗议。

阿部先生的葬礼于星期四举行，没有发生任何骚乱，有一千五百人参加，其中包括首相、外相、海军大臣、加藤男爵、内田子爵、外务省全体人员以及各国大使馆和公使馆的使节。天皇对死者身后授予特殊的荣誉，包括追认他为驻比利时特命全权公使。

格林谨上 1913年9月12日于日本中禅寺

第70件 艾斯敦先生致格雷爵士电

1913年9月29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关于南京事件。

昨天，英王陛下驻南京领事给我发来如下的电报：

“张勋于今天拜访了所有国家的领事，告诉我：关于杀害日本人的事件，即将达成一项解决的办法。他于今晨赴日本领事馆道歉，他的部队将于今天下午接踵前往。”

第71件 艾斯敦先生致格雷爵士电

1913年9月29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关于南京事件。

英王陛下驻南京领事报告说：据他从日本领事那里获悉，张勋的九百名士兵于昨天向日本领事馆致敬，日本的要求已经照办。日本的大部分登陆部队将于两三天内撤退。

第72件 艾斯敦先生致格雷爵士电

1913年10月4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总统的选举日期已订于10月6日，就职典礼订于10月10日。我建议：当选举结果一旦通知我们的时候，便立即承认中华民国。

总统的就职演说将包含一项关于遵守对外条约的声明，该声明已送给外交团。

第73件 格雷爵士致艾斯敦先生电

1913年10月4日发自外交部

您应按照您今日来电中所提出的建议行事，还要代表英王陛下政府送交总统一份贺电。

第74件 艾斯敦先生致格雷爵士函

1913年10月6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随信附上总统的一件命令，它规定惩罚那些对杀害南京的日本臣民一事负有责任的人们。

艾斯敦谨上 1913年9月19日于北京

第75件 艾斯敦先生致格雷爵士函

1913年10月6日收到

阁下：

由于攻陷南京和平定四川的叛乱，关于那些事情我曾荣幸地通过电报向您报告，看来反对袁世凯的人们所进行的武装抵抗已经肯定地被击溃了。然而，有相当多的舆论团体持有这种意见，即反对临时大总统的那些宣传鼓动的瓦解较可能是暂时的，而不是长期的。这个意见的根据，部分是基于北方军队在最近的战役中所采用的方法和获得的最后结果。

首先，必须承认，中央政府及其支持者们所使用的主要武器是贿赂收买。北方将领在战场上没有赢得决定性的胜利，也没有使叛军接受任何“教训”。战事断断续续地进行，在大多数情况下作

战双方相隔的距离甚至连新式步枪也射击不到；接着又几乎在所有的地方进行拖延很久的谈判，结果是确定一个明确的价钱，首领们准备按照这个价钱被“收买”，士兵们则在放下他们的武器并得到一笔现款后准备解散。事实上，为南方各省打仗的陆军士兵和临时招募的苦力，都没有学到在战场上被击败后所必需承担的那些恐怖的经验，而是解散队伍，留下的印象是：因为反对中央政府军队而获得了金钱方面的好处。现在，他们有几万人在南方各省到处流浪。如果他们没有得到象农业劳动那样的工作，在社会治安得到维持的时候，他们必定有助于增加平时的动乱力量，或者是在将来一旦爆发任何有组织的动乱时，参加反叛的队伍。

当叛军的普通士兵们没有什么理由对他们支持南方各省一事感到后悔的时候，他们的首领们至少逃避了总统在一系列命令中给予他们的应得的惩罚，那些命令不时发表在《北京公报》上。虽然有些人的姓名被公布，而且另一些人的首级被悬赏捉拿，但实际上没有一个较重要的人物被捕获和处决。那些在革命运动初期开小差的人，无疑地得到了经济上的利益，作为他们开小差的代价。其他的人通过对商界人士强迫捐献，也肯定得到了好处，几乎在叛军占领的每个地方都有关于此事的报道。由于显然可以得到相当多的财政援助，任何叛军首领未必遭到严重的经济损失；除了那些被撵下台的都督以及各省丧失了职务的某些高级官员之外，他们同前不久他们所统率的士兵们一样，没有理由对他们反对中央政府一事感到后悔。现在，那些反叛的都督以及其他为南方各省进行宣传鼓动的较著名的人物，在国外享受安全避难的好处，他们无疑地将在那里用和平手段尽力使临时大总统的职务难以干下去。

我于7月28日在最近的叛乱爆发后不久所写的信中，曾荣幸地报告：运动没有得到中国任何重要舆论团体支持的迹象。事实

上，在运动的全部过程中，情况确系如此。虽然大部分劳动群众仍持冷淡的态度，但那些与商业和贸易有关的个人及企业强烈表现出对中央政府的胜利抱有同情。在即将发生冲突的每个地方，商会和行会总是对温和的那一方施加影响。在冲突实际爆发之后，许多企业积极支持临时大总统的事业，并且在某些情况下为保卫这个事业作出最严重的牺牲。如果说，在叛乱爆发前，商界人士所持的态度是反对政治动乱，那么，他们在叛乱期间的经历加强了这种态度。几乎每座被南方部队占领的城市都是进行政治谋杀和抢劫勒索的场所。在某些情况下，获胜的北方军队在进驻叛军占领过的地方时，把已遭到他们的对手部分破坏的城镇彻底变成了废墟。使贸易的扩大和商业的信心普遍受到挫折是动乱的自然结果，那很可能将仅仅是暂时的现象，但在正常情况得到恢复后很长时间内，商界人士将记住他们最近的经历；人们有把握认为，他们对于能够维持内部秩序的强有力的中央行政当局那一方将继续加强施加影响。

在冲突爆发的时候，人们担心，将在中国各省的高级官员中间发现有普遍的不满情绪存在。如果中央政府没有得到那么多的现款，而且它的军队早就在战场上打了一个决定性的败仗，那么，这些顾虑可能已经成为现实。但结果证明它们是没有根据的。北方各省对临时大总统仍始终保持着忠诚。云南、贵州、陕西等省的都督通过派遣部队反对邻近各省的叛军，证明了他们忠于总统的意义。湖南、浙江、福建等省的高级官员曾经在不可抗拒的压力下宣布独立，但抓住最早的机会恢复他们对总统的忠诚；通过他们的职位得到承认一事，证明了袁世凯相信他们是忠心耿耿的。甚至在广东和四川，也发现有很多支持中央政府的人，他们在没有重要外援的情况下镇压当地的叛军。没有理由担心，那些在最近已表示坚决支持临时大总统及其反对分裂政策的都督，他

们的同情在不久的将来会发生任何显著的变化。另一方面，一定不要忘记：这一变化也许有可能产生，如果中央政府陷入财政窘迫的状况，而且不再能够开支他们最近用来反对叛军的那些巨额现款。

还要考虑大批从日本和欧美各国大学回来的中国青年的立场，他们构成一般称之为“共和派”的核心。除了已真正掌握某部门的西学并在中国各种职业中获得地位的极少数人之外，那些受过肤浅的外国教育的共和派人士，强烈反对袁世凯的专横统治，就象他们以前反对满清帝国的专横统治一样。他们曾为推翻前清王朝出力；在达到目的之后，发现他们所建立的代替那个王朝的共和国，在管理方法上是专制的，而且对他们的工作没有什么用处，正如他们已经推翻的那个政府的情况一样。人们很难确定，那些归国留学生在最近的叛乱中是否起了任何重要作用。他们中间的很多人未必作为南方事业的积极支持者走上战场，但几乎可以肯定，他们在几千户中国中层家庭中不断进行宣传，赞成孙中山所主张的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反对以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的专制共和国。还必须记住：由于有新近从海外归国的人，所以使得对现实不满的“共和派”成员不断增多；目前的行政当局没有设法安抚这些危险分子。

在这种情况下，认为大多数受过外国教育的中国青年所具有的影响，将继续施加于反对目前所组成的中央政府的力量那方面，这很可能是正确的。毫无疑问，这种作用将使潜伏的敌视北方的情绪持续下去，而那个情绪在南方各省显然是很普遍的。

我在上面试图说明：在所谓镇压最近的叛乱中留下了许多人，从他们中间能够很容易地为一次新的起事招募武装部队；运动的领导人对于重新发动一次对中央政府的攻击，没有什么顾虑的理

由，而有进行冒险的某些直接鼓励；袁世凯处理动乱之所以获得胜利，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他的优越的财政力量，替他打仗的那些部队的优势仅起了很次要的作用。

在今年年底之前，供中国政府使用的款项几乎肯定地将会用完。有些人持有这个看法，即南方各省所抱的希望没有受到明确的或长期的抑制；他们认为，反对势力将选择这个时机，重新发动一次对中央政府的攻击。

撇开对南方各省宣传鼓动家今后行动所作的种种推测，转而考虑临时大总统当前所处的实际政治地位时，必须承认：自袁世凯掌权以来，这个地位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巩固。8月4日左右，他采取了恫吓他的国民党对手的第一批措施，那些国民党人作为国会议员继续留在北京行使职权，并领取薪金。几天之后，盛传袁世凯与上述国民党人之间已达成某种形式的妥协。由于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总统大概认为不再有必要达成妥协，决定采取较严厉的措施。大约在8月20日，传闻总统的政治对手中有许多人遭到逮捕。8月27日，由于逮捕了许多属于国民党的参议员和众议员，逮捕活动达到了顶点。一度有人谈论对总统的违宪行为采取报复措施；国会两院的一个代表团甚至前往故宫，请求袁世凯明确说明他打算要不要和国会一起治理国家。人们不知道他们得到了什么答复，但现在可以说所有的反对力量都已瓦解。有迹象表明，明确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第一届大总统一事，现在将不会再拖延很长的时间。

艾斯敦谨上 1913年9月22日于北京

第76件 艾斯敦先生致格雷爵士电

1913年10月3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袁世凯于今天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

第77件 艾斯敦先生致格雷爵士电

1913年10月12日发自北京，同日收到

关于您9月24日的信。

我不赞成在看到正式选举总统和各国承认他的政府的结果之前，即大约在明年春天之前，减少华北的驻军。目前，在中国许多重要地区，仍施行戒严令。中国人自己对政治前景绝不是很有信心的。

第78件 艾斯敦先生致格雷爵士函

1913年10月13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报告：自从民国临时政府建立以来，以熊希龄为总理的第三届内阁于本月11日组成。

自5月间赵秉钧请假后，中国没有一个担任实职的总理。最近的叛乱对各政党和国会的影响使得早日重组内阁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

总理兼任财政总长的职务，段祺瑞将军和舰队司令刘冠雄仍继续分别担陆军和海军的首脑，其余各部分配如下：

外交部	孙宝琦
内务部	朱启铃
司法部	梁启超
教育部	汪大燮
工商部	张 謇
交通部	周自齐

没有任命农林部总长，该部不久将与工商部重新合并。

熊希龄是唐绍仪领导的民国第一届内阁中的财政总长，人们

将记得他的名字与克利斯浦借款^①有关，该项借款是他辞去财政总长职务后商订的。前不久，他曾担任代理热河都统。

孙宝琦是前驻法国和德国的公使；至辛亥革命时他担任山东巡抚。

朱启铃是上届内阁中的交通总长。

梁启超是维新派康有为的最著名的门生，戊戌政变后他和他的老师一起遭到通缉，后来他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

汪大燮于1905年担任驻英公使，后来担任驻日公使。

张謇是中国的著名学者和企业创办人；他还声称是盐务方面的权威。

周自齐在前外务部任职时，于1911年陪同贝子载振前往英国参加加冕典礼；他作为代理驻法公使，负责于1912年3月与比利时缔订借款。自那时以后，他担任山东都督。

这个内阁虽然名义上是无党派的，但它的成员显然是保守的。它没有国民党的任何成员，而且国会几乎全体一致接受提名，这标志着急进派通过叛乱的被镇压已经遭受失败，那次叛乱是他们中间的极端分子所支持的。

总统多少有些冒失地声称：他已组成“第一流人才的内阁”；每个阁员都承担他应负的全部责任，从而使内阁制得到实现。顺便提一下，它得到另一笔外国借款的帮助。的确，它所享有的国会支持的程度超过了前两届内阁，但是，唐绍仪的命运对任何忽视总统本人仍然行使的实际权力的倾向是一个警告。

新内阁采取了紧缩行政开支的政策，这项政策无论多么必要，

^① 指1912年8月30日中国政府与英商克利斯浦公司签订的五厘金镑借款。

不可能在那群新近被任命的民国官员中间受到欢迎。当地一部分报纸继续散布那些被官方否认的关于总理和总统之间有磨擦的谣言，并且暗示：总统的正式选举现已在望，将必需提出新内阁的人选，那时政府将不再是临时性的。

鉴于中国目前的困难，期望内阁的对外政策有任何显著的变化，那也许是太过份了，虽然迅速接受日本提出的关于南京事件的要求一事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有希望的迹象。

总理和外交、司法两总长在接受他们的任命后前来拜访我的时候，每人都相当详细地谈到了总统和中国政府对英王陛下政府所怀有的万分感激的心情，因为从革命开始以来我们采取了友好和同情的态度，而且在最近的叛乱期间又继续如此，他们希望今后仍可以看到这种态度。

我在每个场合都回答说：英王陛下政府的政策一贯是赞成中国有一定强大的和稳定的政府；我们对于这个目的给予富有同情心的支持，是可以信赖的。

艾斯敦谨上 1913年9月29日于北京

第79件 外交部致陆军部函

先生：

我奉格雷爵士的指示，随信附上英王陛下驻北京代办的一份电报^①的副本，以便提交陆军委员会。该电建议，关于削减华北驻军问题，应暂缓作出决定。

我应通知您：外交大臣完全同意艾斯敦先生对形势所表示的意见，不赞成在最近的将来对驻军作任何削减。

兰利谨上 1913年10月18日于外交部

^① 原编者注：第77件。

第80件 艾斯敦先生致格雷爵士函

1913年10月27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报告：关于中华民国第一届总统的选举，已于本月6日举行。

总统选举法第二款规定：总统应由国会议员组成的选举会选举；选举总统的法定人数由享有选举权的总人数的三分之二构成，通过无记名投票选举。候选人必须获得总票数的四分之三的绝对多数才能当选。这个程序进行两次后，如果尚未获得决定性的结果，则进行第三轮投票，候选人仅限于第二轮投票中领先的两人。在第三轮投票时，仅需过半数票即可当选。

与一般的预料相反，选举活动延续了一整天；需要进行三轮投票，然后临时大总统才能够对他的职务得到合法承认。人们曾经希望：为了使总统就职典礼能够在革命爆发两周年之际举行，国会两院议员一致催促早日进行选举，这预示他们在总统的选举中也将表现出类似的一致性。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在第一轮投票时，有七百五十九名议员出席，其中四百七十一人投票赞成袁世凯，一百五十四人投票赞成黎元洪。其余的选票中，伍廷芳得三十三票，段祺瑞十六票，孙中山十三票，康有为十一票，唐绍仪五票，还有好几个人各得一两票。

因此，袁世凯当选总统所需要的票数尚短少九十九票。于是，举行第二轮投票，有七百四十五名议员出席。虽然袁世凯又获得二十六票，但他仍短少六十二票，才能获得所必需的多数，而黎元洪将军所得的票数已增至一百六十二票。接着，按照上面引述的选举法的条款，必须进行第三轮投票，在袁世凯和黎元洪二人之间作出决定。在最后的这一轮投票中，有七百零三名议员参加，

其中五百零七人投票赞成袁世凯，一百七十九人投票赞成黎元洪，十七人投的票不合规定。因此，袁世凯总统当选，以压倒的多数票击败了他的那位最忠实的而且着重声明无意担任总统职务的副手。选举结果的宣布在国会大楼内外受到了人们的暴风雨般掌声的欢迎。

人们很难查明这种强烈反对袁世凯当选的理由。尽管黎元洪将军多次宣布他不接受总统职位，但他在每次选举中都获得了一百五十名以上的议员的选票。有好几张选票投给了那些从未被认真视为候选人的人们，他们无论如何是没有当选资格的。由于以黎元洪为会长的共和党（或称保守党）在最近举行的一次试选中一致决定通过以袁世凯作为他们的总统候选人，所以国会的这种态度更是出乎意外的。选举系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因此很难查明国会中究竟是那个党派坚持投票选举黎元洪将军，但人们普遍认为，他得到了大部分进步党人的支持，进步党可以被称为先进的党派。选举的一个明显的缺点，是缺乏任何正式的提名候选人的步骤，从而议员们可以绝对自由地投票赞成他们所喜欢的任何人，而不必遵从任何合法程序，甚至不遵守宪法上对总统候选人所作的种种限制。

当天晚上，外交总长以同文照会把选举结果通知各国公使馆。到第二天，所有那些还没有给予承认的国家以相同的方式正式表示承认中华民国。外交部在收到我的照会后，向我表达中国政府对英王陛下政府给予承认的谢意。本月7日，外交总长亲自来拜访我，也请求我转达中国政府对英王陛下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行动以及在过去两年间所抱的态度的谢意。

中华民国副总统的选举于10月7日举行。

与总统的选举不同，仅需要进行一轮投票，黎元洪便以七百一十九张总票数中的六百一十票的压倒多数当选。其余的一百零

九票大约有一半分散在各候选人之中，张勋和孙中山各得一票。

艾斯敦谨上 1913年10月11日于北京

第81件 艾斯敦先生致格雷爵士函

1913年11月3日收到

阁下：

接着谈我今天的那封信中所说的事情，我荣幸地报告：袁世凯就任大总统的典礼于本月十日辛亥革命爆发两周年之际举行。

总统乘坐一辆堂皇富丽的专车，于十时二十分抵达故宫前面的场地，在天安门前的那座大理石的桥下下车，改坐一顶轿子穿过里面的庭院进入宫内的主要广场。当局采取了特殊的防范措施，防止任何可能谋害总统的企图，故宫内外所有的主要通道布置了军队进行警戒。

十一时，总统进入大殿，那里面聚集着各国使团的首脑及使馆人员、中国的主要官员以及国会议员。

总统的誓词如下：“我宣誓，我将最诚挚地遵守宪法，并且忠实地履行总统的职责。”宣誓后，总统宣读了他的声明。他在声明中谈到了他以前的生涯，并勾划了他今后采取的政策轮廓。他演说的主要内容，是坚决主张维持国内治安、办理教育事业、发展贸易以及遵守同列强签订的条约。他希望集中精力对陆海军进行精神上的训练，而不单纯强调军队的人数，以改善陆海军的纪律和效率。

总统宣读他的声明后（附上该声明的副本），离开了片刻；当国会议员们退出后，他回来接见外交团，各国使节按照先例站成一排。

外交团代理首席公使西班牙公使白斯德先生，代表各国政府用法文宣读贺电。总统用适当的词句作答，重申他希望保持同列

强的既存友谊和条约不受损害。接着，总统沿着那一排人走去，依次和各使团首脑交谈，后来各使团首脑向他介绍了各使馆人员。

此时，仅剩下了一个仪式，它也许是最微妙和最富有意义的。在那座过去几个世纪中满清朝廷曾经尽了光辉职责的大殿里，民国总统接受了前皇室代表的祝贺。溥伦贝勒，或象官方《公报》那样简单地称之为“溥伦”，穿着将军的全套制服，宣读了大清皇帝的信，表达那个已退位的王朝对新共和国的祝愿。

后来，总统登上天安门，那里聚集着各国使馆人员，中国的主要官员以及外国报纸的代表。集会中引人注目的人物是一度很著名的姜桂题将军，他现在穿着袁世凯的陆军参谋总部的新蓝色制服。总统从这个很好的位置上检阅了大约八千名部队，其中包括皇室禁卫军各营、总统卫队、北京警卫部队、三营炮兵以及一中队骑兵，他们在三支军乐队演奏的新中国国歌声中走过天安门。

晚上，在新的外交部大楼为外交团举行招待会，在北京的几乎所有的外国人上都曾出席。

今天中午，总统阁下在前隆裕太后的宫殿中为各国使团首脑举行了国宴。国宴后又在皇宫的庭园中举行游园会，参加者有各国使馆人员以及主要的官员和各国人士。

后来，人们了解到，总统就职典礼几乎成为一场灾难。北京侦缉处长陈周英^①少将受了袁世凯的敌人的贿赂，企图以小炸弹为武器，把总统及其全体随从人员炸得粉身碎骨。如果他能够在总统宣誓时实现他的目的，外交团成员也会被卷入这场灾难之中。

幸亏在前一天，那位少将对于举行典礼时分配给他的地方表示为难的态度，从而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对他的住宅进行的秘密调查提供了他犯罪的充分证据。因此，他被移交军事法庭，由该

① 译音。

庭判处死刑。就职典礼后的第二天，对他执行枪决。

艾斯敦谨上 1913年10月11日于北京

附录一 大事索引*

(一) 武昌起义和武汉保卫战

《中国第一号 (1912年)》: 第1件 (1)、第2件 (1)、第3件 (1)、第4件 (2)、第5件 (2)、第17件的附件 (7)、第20件 (8)、第23件 (34)、第24件的附件 (37)、第28件 (38)、第32件的附件 (41)、第35件 (42)、第36件的附件 (43)、第47件及附件4 (48)、第61件及附件 (60)、第62件的附件 (66)、第64件 (66)、第67件的附件 (68)、第71件及附件 (70)、第78件 (73)、第79件及附件2 (74)、第81件 (86)、第82件的附件 (89)、第87件的附件 (96)、第97件 (104)、第100件及附件 (110)、第106件 (133)、第119件 (142)、第124件 (161)、第141件 (173)。

(二) 武昌起义后清政府内部的情况及其采取的措施

《中国第一号 (1912年)》: 第8件 (4)、第10件 (4)、第16件 (7)、第18件 (8)、第19件 (8)、第23件 (34)、第24件的附件 (37)、第25件 (37)、第28件的附件 (39)、第29件 (39)、第37件 (44)、第44件的附件 (47)、第47件 (48)、第51件 (54)、第59件 (58)、第60件 (60)、第79件 (74)、第80件 (84)、第82件的附件 (89)、第83件及附件

* 括号内的数字系本书页码,下同。

(92)、第100件(110)、第101件(126)、第103件(129)、第109件(135)、第139件(172)、第140件(173)。

《中国第三号(1912年)》：第28件(235)、第48件(275)、第77件及附件2(337)、第91件(357)、第101件(367)、第102件(368)、第104件(368)、第117件及附件(426)、第129件(464)、第147件(484)。

(三) 英国军舰在汉口的阴谋活动

《中国第一号(1912年)》：第2件(1)、第3件(1)、第5件(2)、第6件(3)、第7件(3)、第9件(4)、第10件(4)、第17件(7)、第20件(8)、第23件(34)、第28件及附件(38)。

(四) 各国增兵京津并强占京榆铁路

《中国第一号(1912年)》：第11件(5)、第12件(5)、第13件(6)、第26件(38)、第27件(38)、第30件(39)、第46件(48)、第72件(71)、第73件(71)、第77件(73)、第92件及附件(98)、第93件及附件(100)、第104件(132)、第113件(139)。

《中国第三号(1912年)》：第13件(204)、第14件(204)、第19件(206)、第20件(206)、第23件及附件(210)、第33件(238)、第40件(241)、第71件及附件(321)、第84件(348)、第85件(348)、第131件及附件(470)、第134件(473)、第135件(473)、第137件(473)、第138件(474)、第139件(474)、第143件及附件(478)、第150件(492)、第154件及附件(496)、第155件及附件(501)。

（五）英国对上海租界和沪宁铁路进行的阴谋活动

《中国第一号（1912年）》：第31件的附件（40）、第33件（41）、第34件（42）、第36件的附件（43）、第37件（44）、第38件（44）、第39件及附件（44）、第40件（45）、第41件（46）、第42件（46）、第43件（47）、第48件及附件（52）、第49件（53）、第52件（54）、第53件（55）、第55件（56）、第61件（60）、第67件的附件（68）、第99件（105）、第141件（173）。

《中国第三号（1912年）》：第111件及附件（381）。

（六）英国策划截留各口岸关税

《中国第一号（1912年）》：第15件（6）、第40件（45）、第61件（60）、第79件（74）、第100件（110）、第121件及附件（153）。

《中国第三号（1912年）》：第1件及附件1、4（178）、第81件及附件1、2（340）。

（七）关于对外借款和庚子赔款的偿还

《中国第三号（1912年）》：第5件及附件（199）、第22件（209）、第59件及附件（290）、第81件及附件（340）、第82件（341）、第90件（356）、第92件（357）、第113件及附件（412）、第128件及附件（464）、第148件（489）、第151件（494）。

《中国第三号（1913年）》：第24件及附件（559）、第25件（562）、第31件（571）、第37件及附件（584）、第40件（589）、第63件及附件（618）、第73件及附件（628）。

《中国第一号（1914年）》：第6件及附件（635）、第8件（638）、第10件及附件2（649）、第12件的附件（652）、第14件

(654)、第20件及附件(659)、第31件(678)、第32件 (678)、第37件 (680)、第42件及附件(684)、第60件(704)。

(八) 英国干预下的南北停战和议和

《中国第一号(1912年)》：第51件(54)、第58件 (57)、第60件(60)、第78件(73)、第79件及附件2 (74)、第83件及附件(93)、第84件(93)、第85件(94)、第88件(96)、第94件(103)、第95件(103)、第98件(104)、第99件(105)、第100件及附件1 (110)、第101件(126)、第103件(129)、第105件(133)、第111件及附件(138)、第112件(139)、第117件(142)、第122件(160)、第127件(166)、第128件(166)、第129件(167)、第132件(168)、第133件(169)、第136件(171)、第141件(173)、第142件(177)、第143件(177)。

《中国第三号(1912年)》：第2件(180)、第6件(200)、第18件(206)、第21件(207)、第30件(237)、第42件(243)、第46件及附件(269)、第48件(275)、第51件(280)、第56件(287)、第60件(292)、第62件及附件2、4 (295)、第63件(305)、第67件(318)、第78件 (339)、第83件及附件 (343)、第86件(349)、第88件及附件(356)、第95件(359)、第99件(365)、第100件(367)、第106件(369)、第112件(382)、第126件附件5、8 (454)、第127件 (461)、第132件 (472)、第147件及附件(484)。

(九) 关于南京临时政府

《中国第三号(1912年)》：第3件及附件 (197)、第62件及附件3、4 (295)、第96件(361)、第109件(379)、第126件及附件(442)、第127件 (461)、第146及附件1 (481)、第

147 件及附件（484）、第149件及附件（490）、第150件（492）、第152件的附件（495）、第155件（501）。

（十）袁世凯在中外反革命支持下篡夺政权

《中国第三号（1912年）》：第38件（241）、第42件（243）、第48件（275）、第51件（280）、第53件及附件（286）、第56件（287）、第62件及附件（295）、第63件（305）、第65件（316）、第67件（318）、第68件（319）、第69件（319）、第83件及附件1（343）、第86件（349）、第95件（359）、第99件（365）、第101件（367）、第102件（368）、第105件（369）、第106件（369）、第119件（436）、第120件（436）、第121件（437）、第123件（439）、第124件（439）、第126件及附件（442）、第127件（461）、第132件（472）、第133件（472）、第140件（474）、第147件及附件（484）、第149件及附件（490）、第150件（492）、第155件（501）、第156件（505）。

（十一）民国初年的政局和革命派对袁世凯的斗争

《中国第三号（1913年）》：第9件及附件（535）、第12件及附件（542）、第16件（546）、第17件及附件（547）、第22件及附件（555）、第23件（557）、第28件（564）、第29件及附件（564）、第53件（606）、第57件（611）、第61件（615）、第66件（623）、第67件的附件（625）、第68件（627）。

《中国第一号（1914年）》：第17件（658）、第21件（661）、第38件（680）、第46件及附件（686）、第55件（700）。

（十二）关于国会选举和开会情况

《中国第一号（1914年）》：第9件的附件（638）、第13件

(654)、第18件(658)、第19件(658)、第21件(661)、第27件(674)、第28件(674)、第72件(712)、第76件(717)、第78件(718)、第80件(721)、第81件(723)。

(十三) 列强对袁世凯政府的承认

《中国第一号(1914年)》：第23件(671)、第24件(671)、第27件(674)、第72件(712)、第73件(713)、第80件(721)。

(十四) “二次革命”

《中国第一号(1914年)》：第28件(674)、第30件(677)、第33件(678)、第34件(679)、第35件(679)、第36件(679)、第39件(683)、第40件(683)、第41件(684)、第43件(685)、第44件(685)、第45件(686)、第47件(689)、第48件(690)、第49件及附件(692)、第50件(695)、第51件(696)、第52件(698)、第53件的附件(699)、第54件(699)、第56件的附件(701)、第57件(703)、第75件(713)。

(十五) 各省区的情况

① 江西

《中国第一号(1912年)》：第14件(6)、第17件的附件(7)、第61件(60)、第79件(74)、第100件(110)、第126件附件1(164)。

《中国第三号(1912年)》：第47件(271)。

《中国第三号(1913年)》：第11件的附件(541)、第18件的附件(550)、第59件的附件(611)。

《中国第一号(1914年)》：第9件的附件(638)、第22件的附件(662)。

②湖南

《中国第一号（1912年）》：第15件（6）、第17件的附件（7）、第47件（48）、第61件（60）、第79件（74）、第100件及附件3（110）、第124件（161）、第141件（173）。

《中国第三号（1912年）》：第47件（271）、第112件及附件3、4、5（382）。

《中国第一号（1914年）》：第9件的附件（638）。

③广东

《中国第一号（1912年）》：第21件（9）、第45件（48）、第50件（54）、第54件（55）、第61件（60）、第79件（74）、第89件（97）、第100件（110）、第130件（167）、第135件（171）、第141件（173）。

《中国第三号（1912年）》：第12件附件1、2（203）、第16件及附件（205）、第47件（271）、第76件（337）、第112件及附件6、7、8（382）、第153件的附件（496）。

《中国第三号（1913年）》：第6件（529）、第8件（533）、第10件及附件1、3、4（537）、第18件的附件（550）、第43件的附件（590）、第51件的附件（596）、第67件的附件（625）。

《中国第一号（1914年）》：第9件的附件（638）、第22件的附件（662）。

④江苏

《中国第一号（1912年）》：第21件（9）、第45件（48）、第47件（48）、第61件（60）、第67件的附件（68）、第79件及附件1（74）、第87件的附件（96）、第96件（104）、第

100 件 (110)、第 120 件及附件 (142)、第 131 件 (168)。

《中国第三号 (1912 年)》：第 2 件及附件 (180)、第 47 件 (271)、第 62 件及附件 (295)、第 112 件及附件 (382)、第 130 件及附件 (465)、第 152 件 (495)。

《中国第三号 (1913 年)》：第 5 件 (529)、第 9 件及附件 (535)、第 12 件附件 1 (543)、第 18 件的附件 (550)、第 43 件的附件 (590)、第 51 件的附件 (596)、第 55 件的附件 (608)、第 59 件的附件 (611)、第 62 件的附件 (617)、第 67 件的附件 (625)。

《中国第一号 (1914 年)》：第 9 件的附件 (638)、第 22 件的附件 (662)。

⑤ 山西

《中国第一号 (1912 年)》：第 21 件 (9)、第 45 件 (48)、第 61 件 (60)、第 79 件 (74)、第 82 件的附件 (89)、第 100 件 (110)、第 125 件 (161)、第 141 件 (173)。

《中国第三号 (1912 年)》：第 47 件 (271)。

⑥ 四川

《中国第一号 (1912 年)》：第 22 件及附件 (9)、第 61 件 (60)、第 66 件 (68)、第 69 件 (69)、第 70 件 (69)、第 76 件 (72)、第 100 件 (110)、第 110 件及附件 (135)、第 125 件 (161)、第 138 件 (172)。

《中国第三号 (1912 年)》：第 17 件 (205)、第 25 件 (219)、第 35 件 (239)、第 39 件 (241)、第 43 件及附件 1、4 (243)、第 45 件及附件 (253)、第 47 件 (271)、第 64 件及附件 (308)、第 73 件及附件 (325)、第 74 件及附件 (326)、第 75 件及附件 (330)、第 79 件 (339)、第 89 件 (356)、第 93 件 (357)、第 94 件 (359)、第 98 件 (361)、

第107件及附件(369)、第108件及附件(371)、第115件及附件(417)、第116件及附件(424)、第118件及附件(430)、第125件及附件(440)、第145件及附件1(480)、第157件(505)。

《中国第三号(1913年)》:第7件及附件(530)、第18件的附件(550)、第30件的附件(568)、第43件的附件(590)、第46件及附件(592)、第55件的附件(608)、第62件的附件(617)、第67件的附件(625)。

《中国第一号(1914年)》:第9件的附件(638)、第22件的附件(662)。

⑦福建

《中国第一号(1912年)》:第45件(48)、第100件(110)、第141件(173)。

《中国第三号(1913年)》:第43件的附件(590)、第51件的附件(596)、第55件的附件(608)、第67件的附件(625)。

《中国第一号(1914年)》:第22件的附件(662)。

⑧直隶

《中国第一号(1914年)》:第45件(48)、第61件(60)、第79件及附件2(74)、第82件的附件(89)、第100件(110)。

《中国第三号(1912年)》:第13件(204)。

《中国第三号(1913年)》:第18件的附件(550)、第51件的附件(596)。

⑨安徽

《中国第一号(1912年)》:第47件(48)、第79件及附件(74)、第100件(110)。

《中国第三号 (1912年)》: 第47件 (271)、第130件的附件 (466)。

《中国第三号 (1913年)》: 第50件及附件 (595)、第55件的附件 (608)。

《中国第一号 (1914年)》: 第9件的附件 (638)、第22件的附件 (662)。

⑩ 云南

《中国第一号 (1912年)》: 第56件及附件 (56)、第65件及附件 (67)、第66件 (68)、第74件 (71)、第75件及附件 (72)、第79件 (74)、第90件的附件 (97)、第91件 (98)、第100件 (110)、第108件及附件 (134)、第125件 (161)、第141件 (173)。

《中国第三号 (1912年)》: 第26件及附件 (219)、第27件及附件 (232)、第47件 (271)、第52件及附件 (281)、第58件 (287)、第70件 (320)、第110件 (380)、第115件及附件 (417)、第122件及附件 (437)、第141件及附件 (475)。

《中国第三号 (1913年)》: 第1件及附件 (507)、第60件 (615)、第62件 (617)、第67件的附件 (625)。

《中国第一号 (1914年)》: 第9件的附件 (638)、第22件的附件 (662)。

⑪ 陕西

《中国第一号 (1912年)》: 第61件 (60)、第116件 (141)、第118件 (142)、第123件 (160)、第141件 (173)。

《中国第三号 (1912年)》: 第4件 (198)、第44件及附件 (251)、第49件 (276)、第87件及附件 (349)。

《中国第三号（1913年）》：第18件的附件（550）、第30件的附件（568）。

⑫ 山东

《中国第一号（1912年）》：第68件及附件（69）、第79件及附件2（74）、第100件及附件5（110）、第115件及附件（139）、第134件及附件1、5（169）、第141件（173）。

《中国第三号（1912年）》：第24件及附件1、3（217）、第47件（271）、第112件（382）、第130件的附件（466）。

《中国第三号（1913年）》：第3件（526）、第11件的附件（541）、第18件的附件（550）、第30件的附件（568）、第43件的附件（590）、第51件的附件（596）、第55件的附件（608）、第59件的附件（611）。

《中国第一号（1914年）》：第9件的附件（638）、第16件及附件（655）、第22件的附件（662）。

⑬ 广西

《中国第一号（1912年）》：第100件（110）。

《中国第三号（1912年）》：第47件（271）、第130件的附件（466）。

《中国第三号（1913年）》：第11件的附件（541）、第30件的附件（568）、第55件的附件（608）、第59件的附件（611）。

《中国第一号（1914年）》：第9件的附件（638）、第22件的附件（662）。

⑭ 浙江

《中国第一号（1912年）》：第100件及附件4（110）。

⑮贵州

《中国第一号 (1912年)》: 第141件 (173)。

《中国第三号 (1912年)》: 第115件及附件 (417)。

⑯河南

《中国第三号 (1912年)》: 第112件 (382)。

《中国第三号 (1913年)》: 第30件的附件 (568)、第51件的附件 (596)、第59件的附件 (611)。

《中国第一号 (1914年)》: 第9件的附件 (638)、第22件的附件 (662)。

⑰湖北

《中国第三号 (1913年)》: 第30件的附件 (568)、第46件及附件 (592)、第59件的附件 (611)、第67件的附件 (625)。

《中国第一号 (1914年)》: 第9件的附件 (638)、第22件的附件 (662)。

⑱甘肃

《中国第三号 (1913年)》: 第18件的附件 (550)、第34件的附件 (572)、第51件的附件 (596)。

⑲东北三省

《中国第一号 (1912年)》: 第100件 (110)、第141件 (173)。

《中国第三号 (1912年)》: 第47件 (271)、第72件 (325)、第97件 (361)、第112件 (382)、第117件的附件 (427)。

《中国第三号 (1913年)》: 第51件的附件 (596)、第55件的

附件（608）。

《中国第一号（1914年）》：第22件的附件（662）。

⑳西藏（沙俄的野心）

《中国第一号（1912年）》：第141件（173）。

《中国第三号（1912年）》：第11件（202）。

《中国第三号（1913年）》：第18件的附件（550）。

㉑蒙古（沙俄的侵略）

《中国第三号（1912年）》：第11件（202）、第34件（238）、第41件（242）、第50件（278）、第66件（317）、第144件（479）。

《中国第三号（1913年）》：第2件及附件（510）。

㉒新疆（沙俄的侵略）

《中国第三号（1912年）》：第41件（242）、第66件（317）、第80件的附件（340）、第144件（479）。

《中国第三号（1913年）》：第2件及附件（510）、第34件的附件（572）、第52件（605）。

（十六）关于中英交涉

《中国第一号（1912年）》：第47件（48）、第58件（57）、第59件（58）、第63件（66）、第81件及附件（86）、第102件及附件（127）、第119件（142）、第126件及附件（163）。

《中国第三号（1912年）》：第5件及附件（199）、第7件（201）、第15件（205）、第112件附件3（389）、第130件的附件（466）。

《中国第三号（1913年）》：第11件的附件（541）、第13件

(544)、第38件的附件(588)、第46件(592)、第49件(595)、第58件(611)。第65件(623)。

《中国第一号(1914年)》：第2件(632)、第3件(633)、第4件(634)、第5件(634)、第11件(651)、第13件(654)、第19件及附件(658)、第25件及附件2(671)、第26件(674)、第29件及附件2(676)、第55件(700)。

(十七) 关于英军在华调动情况

《中国第三号(1913年)》：第14件(545)、第15件(545)、第19件及附件(554)、第20件(554)、第21件(554)、第26件(563)、第27件(563)、第32件(571)、第33件(572)、第35件(583)、第36件(584)、第39件(588)、第41件(589)、第42件(589)、第44件及附件(592)、第45件(592)、第47件(594)、第48件(595)、第56件(610)、第64件及附件(622)、第69件(627)、第70件(627)、第71件(628)、第72件(628)。

《中国第一号(1914年)》：第1件(632)、第7件及附件(637)、第15件(655)、第53件及附件(698)、第56件及附件(701)、第66件(707)、第77件(718)、第79件(720)。

(十八) 关于中日交涉

《中国第一号(1914年)》：第58件(703)、第59件(704)、第61件(704)、第62件(705)、第63件(705)、第64件(705)、第65件(706)、第67件(707)、第68件及附件(708)、第69件(710)、第70件(712)、第71件(712)、第74件(713)。

(十九) 海外华侨对辛亥革命的支持

《中国第一号(1912年)》：第54件(55)、第86件(94)。

附录二 译名对照表^①

Abe	阿部	Bradley	布雷德利
Adam	亚当	Brethort	布雷索斯特
Addis, C. S.	阿迪斯*	Bristow, H. B.	宝士德*
Addis	艾迪斯	Brooke	布鲁克
Aglen, F. A.	安格联*	Brown, F.	布朗
Alexander	亚历山大	Brown, W. R.	布朗
Allen	艾伦	Brownrigg, D.	布朗里格
Allietto	阿里托	Bryce	布赖斯
Alston, B.	艾斯敦*	Buckanan, G. W.	布坎南
Anderson, J.	安得生	Buri, von	卜利*
Ariyoshi, A.	有吉明*	Caldwell	考德威尔
Arlington	阿灵顿*	Campbell, F. A.	坎贝尔
Bannister, W.	班为兰*	Cardew, R. E.	卡迪尤
Barham	巴勒姆	Carscallen	卡斯克伦
Barter	巴特	Cassels, W. W.	盖士利*
Barton, J.	巴顿	Castel	卡斯托
Barton, S.	巴尔敦*	Charles	查理
Bates, B.	贝茨	Charter	查特
Bayon	白阳	Chaudoin	乔登
Beach	比奇	Clennell, W. J.	乐民乐*
Beauvais, J. J. M.	伯伟*	Coales	科尔斯
Beckensale	贝京色尔	Coates	科茨
Beckman	贝克曼	Comerford, W. E.	科麦福德
Begg	贝格	Cooper, C. J.	库柏
Bertie, F.	柏梯	Craig	克雷格
Blöm	布卢姆	Cross, A. W.	克罗斯
Borst-Smith	博斯特-史密斯*	Cunningham	坎宁安
Bourne	伯恩	d'Anty, P.	安迪*
Brade, R. H.	布雷德	Davidson	戴维森

① 译名后面凡注有*符号者,为通用的汉名。

Day, F.	戴	Hewlett, W. M.	许立德*
de Selves	塞尔伍斯	Hicks	希克斯
Destelan, H. P.	铁士兰*	Hofmann	霍夫曼
Dolbezhe	多尔柏齐	Hosie	霍希
Donaldson	唐纳森	Howell	豪厄尔
Dorjjeff	多尔吉耶夫	Humphreys, C.	汉弗里斯
Drummond	德拉蒙德	Humphry	汉弗莱
Eastes, A. E.	伊斯特丝	Hunt	亨特
Easton, G. F.	伊斯登	Hutson	赫特森
Ellison	埃利森	Inukai	犬养
Embery	安伯理	Irish	艾里什
England	英格兰	Jameson	詹姆森
Evans	伊万斯	Jamieson, G.	哲美森*
Eyres, C. J.	艾尔斯	Jamieson, J. W.	杰弥逊*
Fabig	花必格	Janks	詹克斯
Fiddes, G. V.	菲德斯	Jerome, L. J.	杰罗姆
Fischer	菲舍尔	Jerram	杰拉姆
Forester, M.	福雷斯特	Johnston	庄士敦*
Fraser	弗雷泽	Johnston, H.	约翰斯顿
Fraser, E. H.	法磊斯*	Joliffe, J.	乔利夫
Fulford, H. E.	禄福礼*	Joliffe, R. O.	乔利夫
Gammon, H. W.	甘蒙	Joly	乔利
Giles, B.	翟比南*	Johes	琼斯
Goffe, H.	葛福*	Jordan, J.	朱尔典*
Goodwin	古德温	Kasai, N.	葛西
Goschen, W. F.	高慎*	Kato	加藤
Granville	格兰威尔	Kaufmann	考夫曼
Gray	格雷	Kawasaki	川崎
Grey, E.	格雷	Kawashima	川岛
Greene, W. G.	格林	Keyte	凯特
Groves	格罗夫斯	Kilborn	基尔伯恩
Hamilton	汉密尔顿	King, H. F.	经德瑞*
Hancocks	汉考克斯	Kirke	柯克
Harcourt	哈考特	Knipe	莱普
Head, S.	黑德	Knox	诺克斯*
Hearne	赫恩	Koe	戈意
Helsgaun	赫尔斯冈	Kratze	克勒彻
Henne	亨	Kupfer	库普夫

Lack	莱克	Openshaw	奥本肖
Langeback	兰倍克	Otter-Barry, M.	欧特白
Langley, W.	兰利	Otto	奥托
Leuquin	勒昆	Owen	欧文
Lindstrom	林斯特龙	Ozaki	尾崎
Lockhart, J. H. S.	骆任廷*	Paster, L.	白斯德
Log	洛格	Pearson	皮尔逊
Loveday	洛夫德	Percira, G.	柏来乐*
Lugard	路克德	Piry, A. T.	昂黎*
Macartney, G. H.	马继业*	Pitzipios	皮茨标
Mac Donald, C.	麦克纳乐*	Pontius, A. W.	潘士恩*
MacKlin	麦克林	Pope	朴柏*
Main	梅恩	Porter, H.	波特
Major, A. G.	美哲*	Raemdonck	拉姆登克
Makino	牧野	Reid	李德
Man, H. M. S.	曼	Richard, L.	夏之时*
Manly	曼里	Ricketts, D. B.	里基茨
Manners, P.	曼勒斯	Ridgway	里奇威
Marryat	马利阿特	Rigby	里格比
Matsui	松井	Ritchie	里奇
May, F.	梅轩利*	Robertson, D. S.	罗伯逊
Merklinghaus	麦令豪*	Robertson, R. W.	罗伯逊
Miura	三浦	Roraine, P. L.	罗乃音
Monmouth	蒙茅斯	Ross	罗斯
Morgan	摩尔根	Rowntree	朗特里
Morrison, G. E.	莫理循*	Salquist	索尔吉斯特
Morse, H. B.	马士*	Sampson	桑普森
Moss, G. S.	莫斯	Sanders, A. H.	桑德斯
Mouillac	穆那克	Savage, V. L.	赛斐敦*
Muir	米尔	Sazonof	沙索诺夫
Musso	穆索	Scallan	斯卡伦
Nathan	内森	Schreyer	希利耶
Neave, J.	尼夫	Ser	色尔
N. sbet	尼斯柏特	Sheldon	塞尔登
Nishimura	西村	Shields	希尔茨
Noiret	诺勒	Shipway	西普威
Nyström	奈斯特龙	Shorrock, A. G.	肖乐克
O'Brien-Butler, P. E.	额必廉*	Shorsen	肖森

Sibley	西布利	Twyman, B.	德为门*
Siffert, D.	薛福德*	Uchida	内山
Silcock, H.	西尔科克	Upcher, S. W.	厄普彻
Simkin	希姆金	Vaglio	瓦格略
Simpson	辛普生	Vale	维尔
Sly	斯莱	Veale	威尔
Smith, C. D.	史密斯	Wallace	华莱士
Sowerby	索尔比	Wallenberg	倭伦白*
Sperlein	史柏伦	Walley	沃利
Spitzewski	史毕慈斯基	Ward, E. W. D.	沃德
Stanley	斯坦利	Ward, K.	华德
Steinemann	斯坦曼	Wardlaw	沃德劳
Stephen, A.	史蒂芬	Watne	瓦特尼
Stericker	斯特里克	Watson, J.	沃森
Stevens, P.	史蒂文斯	Watt	瓦特
Stewart, J. L.	斯图尔特	Weiss, F.	魏斯*
Stewart, J. R.	斯图尔特	Wells	威尔斯
Stone, A.	史通	Wellwood, R.	韦尔乌德
Stork	斯托克	Whiteside	怀特塞德
Strauch, von	施特劳赫	Wigham	韦格汉
Sugden	萨格登	Wilden, H. A.	韦礼德*
Symons, R. E.	西蒙斯	Wilkinson, F. E.	伟普颂*
Taylor	泰勒	Wilkinson, W. H.	务谨顺*
Tebbit	戴比德*	Williams	威廉斯
Teichman	泰克曼	Williams, E. T.	卫理*
Tenney, C. D.	丁家立*	Willis, R.	吴理斯*
Thomas	托马斯	Willoughby, M. E.	韦乐沛*
Thompson	汤普森	Wilson	威尔逊*
Torrance	托伦斯	Windsor	温泽
Tours, B. G.	突尔慈*	Winsloc, A. L.	温思乐
Tracy	特蕾西	Woodruff	伍德拉夫
Triffaut	特里佛	Young	杨格
Tuckey	塔克	Zang	赞格
Turner, G. F.	特纳		